中国军事通史 第十六卷

清代前期军事史

目　　录

第十六卷　清代前期军事史

书末附图：

绪　论

16世纪末，满族崛起于我国的东北。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洲贵族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与明王朝相抗衡的“大金”（后金）政权。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进一步表明进取中原与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从农民起义军手中夺取了政权，并最终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从1644年清军入关取代明朝起，至1911年被辛亥革命所推翻，清朝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10帝，共268年。其间，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清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中国处于完整的封建社会，属于中国古代史的范畴；后期，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前、后期在军事的诸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鉴于此，《中国军事通史》将清代军事史分为前期卷和后期卷。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建立，曾给已经腐朽的封建制度带来了活力，使其又能在封建制度的轨道上缓慢地前进，特别是被后人誉为“康乾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政治上空前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国力强盛，有效地抵御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周边国家的入侵，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各方面都达到了兴盛。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制度毕竟已进入了晚期，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闭关锁国、文化专制禁锢人们的思想，它本身固有的矛盾日趋明显。从世界范围来看，鼎盛时期的清朝已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乾隆后期开

始由盛转衰，嘉、道年间更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

清朝又是以我国少数民族满族贵族为主体，联合蒙、汉等民族地主阶级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面临的尖锐矛盾是，满族人数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却统治着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而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汉族，要使其统治长期持续下去，就必须从中原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所以，一方面，清朝统治者重视学习汉族文化，重视继承古老的中华帝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积累下来的统治经验，它的政权及其军政制度都是在明朝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清承明制”；另一方面，清政权及其军政制度又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本民族的传统，竭力提倡和推行满族旧制、旧俗，甚至带着深深的恐惧心理看待并极力阻止满族的汉化。

上述二点，不但极大地影响、制约着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且极大地影响、制约着清朝的军事。

一

清前期军事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关外时期。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努尔哈赤起兵至清军入关的 62 年，在一般通史中是属明史的范畴，但它是清的源头，是清史尤其是清前期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了它，许多问题就难以说清楚，故本卷从努尔哈赤写起。这一时期，经历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和清（后金）对明战争，创立了八旗兵制，建立起由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组成的八旗军队，确立了进取中原与明王朝争天下的战略思想，先后建立了“大金”、“大清”地方政权，力量不断壮大。

顺治至康熙前期。清定鼎北京，从割据一隅的地方政权一变而成为君临天下的中央政权。为真正实现对全国的统治，清王朝

开始实施统一全国的战略计划。经过20年的战争，消灭了南明残余势力，镇压了大顺、大西农民军和各地人民的反清力量，统一了全国；又经过平定三藩的战争和统一台湾的战争，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清王朝根据统治全国的新形势，组建绿营兵，并在改造、完善八旗军制等关外时期形成的军事制度的同时，在明代军事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适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军事制度。

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清王朝在完成统一并巩固了政权之后，即着手经营边疆：通过两次雅克萨之战，驱逐了沙俄侵略者，阻止了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入侵；康、雍、乾三朝，经过对准噶尔的战争、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战争、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等一系列的战争，狠狠打击了边疆地区的割据势力，平定了叛乱，统一了喀尔喀蒙古、新疆、西藏，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基础，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随着国家主权和领土意识的加强，清王朝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

乾隆后期至道光中期。清王朝盛极而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从而引发一系列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王伦起义拉开起义战争的序幕之后，起义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地域一次比一次广，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达到高潮。为镇压起义，已经衰败的清王朝不得不招募乡勇代替腐败的八旗和绿营。起义战争虽然是这一时期战争的主题，但抗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平定张格尔叛乱的战争，则是前一时期反对侵略、反对分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主题的延续。

二

清朝以武功开国，入关以后战争也连绵不断。这些战争情况各异，性质和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战争的主线是统一：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统一。清代前期，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只有这样来认识清代前期的战争，

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时期的军事史。

明朝末年，明王朝政治腐败，边备废弛，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与此相反，处于东北一隅的女真族却正在蓬勃兴起。努尔哈赤这位杰出的女真族领袖，顺应女真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通过30多年的民族统一战争，统一了女真各部，基本结束了女真社会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清（后金）对明战争，既是女真族反抗明王朝民族压迫的战争，也是努尔哈赤及其后继者统一全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清（后金）统治者为了实现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战略目标，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精心的准备，并以“伐大木”的策略原则，在长达26年的战争中，不断削弱明朝的力量，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清（后金）对明战争的直接成果是1644年清军入关，夺取了国家的中央政权，并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开辟了道路。

对清入关取代明朝，过去有一种认识，即基于大汉族主义的传统观念，视汉族及其建立的中央王朝为正统，而把少数民族的满族称为“异族”，把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对全国的统治认为是“异族入侵”，这是十分错误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满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不是“异族”。对于古老的中华帝国来说，清朝取代明朝，只是帝国内部封建王朝的正常更迭，当然不是“异族入侵”。这是不辩自明的道理。

如果从当时历史的大势着眼，我们今天更应该充分肯定清军入关及其以后的统一战争。清入关以后，中国大地上形势错综复杂：以噶尔丹为代表的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崛起于西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正威逼国门，沙皇俄国不但插手中国西北边疆，而且以武力入侵东北黑龙江流域，蚕食中国领土；清与南明以及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张献忠的大西军等数种武装力量并存，相互争斗，

战乱不已。在这样的形势下，统一的中国再次出现像南北朝时期那样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甚至被西方殖民势力肢解，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实际的结果是，定鼎北京的清王朝，手握战争利剑，镇压反清势力，打击叛乱集团，开疆扩土，抵御外敌入侵，从而结束了清初数种政治势力混战的局面，防止了国家的分裂，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清前期统一战争的历史意义。正是由于这一点，清前期统一战争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研究清前期战争，必然会注意到战争的残酷性。清统治者为了征服对方，不择手段，滥杀无辜。在顺治二年（1645 年）的扬州之战中，清军破城之后，连续进行了 10 天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史称“扬州十日”的大惨案。在乾隆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战争中，乾隆帝因厄鲁特人叛服无常，竟残忍地下令对其大肆屠杀，“如稍有可疑，应即先行剿灭”①。这样的事例并不是个别的。统治者在占领地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圈占土地，强令汉人剃发易服，把被征服的百姓赏给官兵为奴，也给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的苦难。这一切，充分反映了统治者的阶级本性，应该予以揭露、批判。但是，绝不可因此而否定清前期统一战争，因为正如列宁曾说过那样，“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却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②。列宁的教导，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清前期的统一战争。

还应该说明的是，在肯定清王朝进行统一战争进步性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否定战争的另一方。清入关后，在进行统一战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三四，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乙巳。

②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6～227 页。

争的过程中，推行民族高压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抗清队伍包括社会各个阶层，既有贫苦的农民，也有地主阶级的士大夫，成分复杂，目的各异，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满怀爱国激情，不顾个人安危，起来反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表现出威武不屈的气节和情操，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三

清前期的军事制度，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武器装备和军事思想等因素的制约，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表现出时代、民族的特点。

满族军事传统与中原汉族军事传统相结合。清朝军事制度的源头和基础是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它根植于关外的满族社会，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形式有很强的民族特色。人口少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满族，在建立后金地方政权的过程中，即开始向汉人学习。入关以后，建立起以满族为主体，满、蒙、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全国政权，清统治者更注意接受中原地区历代王朝传统的统治经验，在关外时期原有军事制度的基础上，继承明朝军事制度的部分内容，建立起保持满族军事传统相对独立性而又适应多民族统一国家国情的军事制度。因此，只讲“清承明制”是不够确切的。

军事领导体制由分权制到高度集中。后金时期，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与之相适应的军事领导体制带有分权制的特点，由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清定鼎北京后，对旧军事体制进行改革，随着皇权的逐渐加强，王权不断削弱，各旗旗主私属的八旗兵变为国家亦即皇帝的军队，有名无实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终被取消，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的兵部并无实权，雍正年间设立的军机处则只是秉承皇帝旨意办事的秘书班子，军权完全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康、雍、乾

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军事集权也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

武装力量体制，以按民族分编为原则。清代前期，国家的正规军队称为“经制兵”，分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八旗兵是继承中国北方民族的军事传统，以满族为主体，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军队，内部按部族分编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绿营兵是清初仿明朝边防镇戍制度，收编明朝降附的官兵和新募汉兵组建的各省地方武装，它是清王朝在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形势下，面对广阔的国土和人口众多的汉人而八旗兵力又严重不足，采取以汉治汉政策的产物。除经制兵八旗、绿营之外，各地还有一些非正规的地方武装，如蒙兵、藏兵、番兵、夷兵等等，也基本上是按民族分编。清王朝实行首崇满洲、优待八旗、以满治汉的政策。在八旗兵内部，八旗满洲是基干，地位最高，八旗蒙古次之，八旗汉军又次之。在八旗、绿营的关系上，则扬八旗而抑绿营。由于八旗兵是太祖努尔哈赤亲自创建，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巩固其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在各方面都给予特殊照顾，不但粮饷、装备等优于绿营，而且拱卫京师和驻守战略要地等重要任务也交由八旗兵执行。清王朝虽然不得不建立由汉人组成的绿营，但对它并不完全放心，一方面在兵力部署上用八旗兵来监视和控制绿营兵，另一方面在军官的职权和选任上规定，八旗都统、将军可以指挥绿营官兵，绿营统兵将领却不能指挥八旗；八旗武官不但可以充任绿营汉人的职位，而且直隶（约今河北）以及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区的绿营中有只能由满人充任的满缺。这些，都充分体现出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性质。

重内轻外的国防格局和边海防建设。清代，靠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夺取并逐步巩固了政权的满洲贵族，对众多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怀有一种恐惧感，惟恐他们起来造反，而清前期外来的威胁还不很突出，所以清王朝防备人民造反胜过防备外敌入侵。清王朝兵力部署以“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为原则，被统治者视

为最精锐最可靠的八旗兵，一半兵力驻守京师，另一半驻守全国各战略要地。原本就是为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而建立起来的绿营兵，遍布各省区的城镇乡村。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了大纵深多层次而又重点突出的防御体系，这是一个既防内又防外但重点是防内的国防格局，即用主要力量防止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禁暴止奸”，以维护和巩固满、蒙、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专制政权。尽管如此，清前期在边防建设上仍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不断入侵，清统治者日益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从而对边防建设的重要性加深了认识。所以，清王朝在牢牢地控制了中原腹地之后，即开始对边疆大力经营，并在对边疆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控制的同时，不断调整国防格局，兵力部署逐渐向边疆地区辐射，以加强边防建设。与以往历代不同的是，清前期与邻国的边界线大都已经明确，中俄东段和中段边界还用两国政府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确定下来。这种近代意义边界的产生，并伴随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识的增强，为近代意义边防的建设提供了前提。清政府在边疆地区采取派驻重兵、筑城永戍、设置卡伦、巡阅边界、设置驿站军台、改善交通通讯等一系列军事措施，使清前期的边防从古代传统型转变为近代型。清前期的边防措施，具有对内对外两种职能，边防的加强，对于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巩固、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边防相比，清前期的海防相对薄弱，康熙中期开海以后，海防有了一定的加强，但由于对西方殖民主义从海上入侵的危险认识不足，海防的重点仍然放在防海盗上，加之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水师战船破旧，也难以担当起防止外敌从海上入侵的重任，终于在鸦片战争中被船坚炮利的英国打开了大门。

四

明清之际，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红衣大炮和鸟枪等

火器大量装备部队并运用于实战，必然会引起部队编制、装备以及作战方法的变化。在战争中，只有顺应这个发展趋势，才能争取战争的胜利，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清（后金）对明战争初期，长于骑射的八旗兵依靠兵士们的勇猛冲杀，曾取得过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最初都没有意识到火炮这种新武器会对战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火器几乎是不屑一顾，后金既不会制造火器，连缴获明军的大量火器也没有充分利用，让几乎全是用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装备起来的八旗兵，去与“凭坚城，用大炮”的明军对垒。在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中，八旗兵均遭惨败。活生生的事实最能教育人，皇太极痛定思痛，认识到如不掌握火器这种军中利器，单凭骑射是难以取胜的。因此，他大胆进行改革，一方面将缴获的明军火器用于作战，一方面重用汉人工匠制造火器，每次军事行动必携带红衣大炮，并建立了几支炮兵部队——乌真超哈、天祐兵、天助兵。结果，后金火器数量迅速增加，至崇德八年（1643年），清军火器已十倍于关外明军，随之战斗力大大增强，为战胜关外明军并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条件。入关以后，火器生产仍保持增长的势头，特别是康熙朝，火器的数量多，质量高，成为有清一代火器研制的鼎盛时期。究其原因，与康熙帝比较开放的思想及相应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康熙帝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但他思想比较开放，不拒绝西方文化，尤其重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认识到西洋火炮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就大力提倡，利用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大量制造红衣大炮，并冲破满族旧的传统观念，让以骑射为本的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学习使用枪炮，还组建了火器营，从而大大推动了火器的发展，保证了平定三藩叛乱等统一战争的胜利。

然而，从雍正朝开始，清代火器不论是品种还是性能，不但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甚至在不少方面还有所倒退。这固然是由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强烈的民族压迫，由于缺少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扼杀、限制了火器技术的发展，但更重要的

是，这一时期统治者的思想趋于保守，再次强调满洲的骑射传统，不再像往日那样重视火器的研制。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限制西方传教士活动的同时，也阻断了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之路，对西方军事科技的进步及其对军事的重大影响茫然无知，而统治者仍以老大帝国自居，恃强傲物，缺少发展火器的迫切感，直到鸦片战争时才惊呼英国“船坚炮利”，但为时已晚。

清前期火器曲折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必须给予高度的注意，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自己的不足，以开放的心态向先进者学习，并制定出适合国情、军情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

清代前期，清王朝在夺取全国政权，经营边疆，抵御外来侵略，完成多民族统一大业的过程中，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传统思想，也是清王朝实施统一战略的思想基础。后金虽是割据东北一隅的边疆民族政权，但统治者早有君临天下、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为达此目的，统治者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寻求理论武器，皇太极称帝后，就曾说过：“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永不易位之理乎？自古及今，其间代兴之国，崛起之君，不可胜数。”① 以此表明清取代明王朝的合理性。在入主中原取得全国政权后，清统治者完全继承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视为头等的战略目标。为此，清王朝一方面用武力镇压各民族的反抗，打击分裂叛乱势力，征服割据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另一方面大造舆论，强调其统治的合法性，批判一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九，崇德七年三月乙酉。

切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思想观念，最为典型的就是雍正帝对于“华夷论”的批判和改造。“夷”，原本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后来则把中原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统称为夷。在以中原汉族王朝为正统的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历来讲华夷之分，辨夷夏之别，有意渲染边疆少数民族的野蛮、落后，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华夷论”不利于民族的融合，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清朝是由入主中原的边疆少数民族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对“夷”、“虏”等含有歧视性的称呼本来就很忌讳，当然更不能容忍汉人利用“华夷论”进行反清活动。雍正帝利用一切机会，批判“华夷论”，指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①，“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②，意为它只是一种地域概念，与道德文化、贵贱尊卑无关，清入主中土，君临天下，是合理合法的。清朝继承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开疆拓土，使大一统的局面超过了历朝历代，实在是中国臣民之大幸。当中国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再讲华夷之分，“妄判中外”，就会成为“逆天悖理”的罪人。尽管雍正帝对“华夷论”的批判和改造，是出于满族贵族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而且清王朝实行的也是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但他强调华夷无别，进一步强化了大一统思想，这对清王朝经营边疆，最终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明清之际，西方殖民主义相继向东方扩张，对中国构成了威胁。清王朝在与沙俄等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萌生了近代领土、主权意识，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应该划定疆界，各守疆土，和睦相处；凡是在版图内的领土和人民，必须置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寸土不可丧失，主权不容侵犯；平时在边疆地区派兵驻守，强边固防，当受到外敌威胁时，则用武力保卫国家领土和主

---

① 《大义觉迷录》卷一，《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4 页。

② 《清世宗实录》卷一三〇，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权。这种认识，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前期的军事思想，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清朝统治者历来认为，“骑射乃满洲之根本”。但如果认为清朝的军事思想就是“以骑射为本”，二者之间可以划等号，并以此作为清朝军事思想落后的例证，则又未免简单化了。骑射，即指骑马射箭等军事技艺，也包括满族在长期的行师围猎生活中形成的不怕劳苦、勇敢顽强、锐意进取的尚武精神和民族性格，它在满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骑射成为满族的民族传统和象征。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一方面在比较安定的生活中，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贪图安逸的思想不断增长，尚武精神渐被磨灭，另一方面满族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上都不断汉化。清朝统治者企图通过提倡“国语骑射”，来保存旧制，抵制汉俗，恢复和发扬八旗兵的尚武精神，以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在这种保守心态下，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不适当地强调满族的骑射传统，在军队建设上必然背上沉重的包袱，拖了自己的后腿。但是，正如乾隆帝所说，“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①，清王朝从来没有把“以骑射为本”作为清军建设的普遍原则。

清代前期兵书，因袭前人旧说较多，真正有创见的很少，传统的兵书已呈现出衰微的征象。值得重视的是，产生了一些具有开拓性质的著作，如第一部从初起之兵的角度论述战略问题的《乾坤大略》，第一部探讨军事范畴的专著《兵镜或问》，等等。边疆军事地理学著作的大量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康、雍、乾三代经营边疆的成就，也是清前期大一统思想和近代领土、主权意识的见证。清前期虽然在古代兵学典籍整理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后人研究、学习古代兵学提供了方便，但也应看到，这是在清王朝专制主义的高压政策下兵学家逃避现实的结果，那种厚古薄今的风气不利于清代军事思想的发展。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二，《兵·教阅》。

综观清代前期的军事史，在战争、军队建设、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都是既有对以往历史的继承，也有发展和提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研究总结。



第一章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及与明朝争夺辽东

第一节　明末军事、政治概况及女真族的崛起

一、明末军事、政治概况

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随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产生和建立起来，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与此同时，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明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明代中后期，虽然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一直到17世纪前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中国的经济仍受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中国仍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社会危机加深，各种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

首先是土地高度集中，加剧了阶级矛盾。皇帝、藩王、官僚、豪绅凭借封建特权，肆意兼并土地。到天启年间，全国的王府庄田竟达50万顷之多。有的省份土地半入藩府，有的州县的土地则多被权贵富豪所兼并，弄得农民无立锥之地。

其次，赋税苛重，致使农民纷纷破产。佃农所负担的地租每亩多达一石二三斗，有的甚至高达二石以上。除地租外，封建国家还征收繁重的赋税，正赋之外，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甚至还有预征。万历末年，明政府以对后金作战为由，每年征收“辽饷”达900万两。崇祯年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征收“剿饷”、“练饷”，每年分别达到330余万两、730余万两。此三项累计合银达2000万两，致使一些农民纷纷破产，沦为奴仆。

第三，政治黑暗腐败。皇帝深居宫中，不理政事。腐朽的宦官、贵族、官僚把持朝政，争权夺利，整个统治机构“如咽喉哽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得通”①，无法运转。朝廷内部一片混乱，派系林立，明争暗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②，接连掀起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的政治风潮。

第四，军力衰弱，边备废弛。特别是在辽东，军官上下欺诳，左右盘结，骄奢淫逸，克扣兵饷，杀民冒功，军纪败坏。辽阳一带，竟有“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之事，少者五六百斤，多者千余斤，而“镇堡之官，亦不以时点检，徒闭虚库”③。辽东总兵李成梁更是骄纵贪黩，苛索殃民，甚至朝廷的赏赉也半充私囊。辽东军屯遭严重破坏，官吏惨毒搜刮，致“辽卒不堪，胁众为乱”④。

严重的社会危机导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使明朝政府面临着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一是城乡人民的反抗斗争，二是由于中央政府力量衰弱和边疆少数民族崛起而引起的国内民族斗争，特别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崛起，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生存。这些重大问题，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为清王朝的兴起、强大和统治全中国创造了条件。

二、女真族的崛起

女真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一个古老民族。先秦时称肃慎。周武王称“肃慎、

---

① 夏燮：《明通鉴》卷七四，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八月，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明史》卷三〇五，《魏忠贤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③ 吴晗辑：《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六，宣祖三十九年（明万历三十四年）七月癸未，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25、2826页。

④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燕、亳，吾北土也”①。汉晋时称挹娄，南北朝改勿吉，隋唐称靺鞨，辽代始称女真，直至明末相沿未改。辽时称开原以南的女真为“熟女真”，开原以北的女真为“生女真”，并设有专门的军政机构进行管理。到12世纪初，女真的一支，即完颜部，在杰出首领阿骨打的率领下，曾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金朝，国号“大金”，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金一度很强大，先后灭掉了辽朝和北宋，统治中国北部100多年。元时，进入长城内的女真人逐渐与汉族融合，留在东北地区的则归辽阳行中书省和奴尔干东征元帅府管辖。

在元明之际，中国东北边境失去了控制，散处于黑龙江、松花江的女真部落又不断兼并，迫使一部女真人南迁。原居住在以依兰地区为中心的松花江以南的女真，向汉族聚居的辽东地区靠近。经过100多年的辗转迁徙，逐渐形成三支：一支分布在浑河地区，东至长白山，南至鸭绿江，称为建州女真；一支分布于明开原边外的辉发河、叶赫河地区，北至松花江中游，称海西女真；在建州、海西女真以北的松花江中下游，北到黑龙江流域，东达库页岛的女真，称“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三大部下又各分若干小部。

建州女真接近汉族，居住地区自然条件较好，因而经济发展较快，成为女真部落中最先进的一支。汉族的铁制农具、牛耕和生产技术的传入，农耕逐渐代替了狩猎，出现了人牛遍野，竞相耕种的情景。同时，在手工业方面，采用鼓风炉炼钢，制造农器、军器。商业、贸易也有所发展。这一切，为建州女真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明朝对女真的管辖及民族统治

明朝初年，东北疆域除直属的辽东都司（后来为九边重镇之

① 《左传》，昭公九年二月。

一的辽东镇）外，又在元朝东征元帅府旧址设立奴尔干都指挥使司，治所在今俄罗斯特林。以后又在女真各部居住地区设立许多卫所，并对各部首领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对女真实施军事行政管理。斡朵里万户府万户猛哥帖木儿被永乐帝任命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以加强明廷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女真三大部和蒙古族的统治。

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女真各部每年都要派使臣到北京向明廷朝贡。在经济上，女真各部与中原地区联系，通过“互市”，用人参、兽皮、蜂蜜等土特产品换取中原地区的食盐、粮食、布匹、铁制农具。通过交换，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进一步传入东北，加速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明朝还从辽东都司到奴尔干都司，设置了许多驿站，在吉林设立造船厂，发展松花江、黑龙江的航运，促进了该地区交通的发展及与中原地区的来往。

明王朝在女真地方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激起女真人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女真各部之间的矛盾和分裂。从成化年间以来，特别是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女真各部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这时，建州右卫王杲、建州卫王兀堂、开原北关的逞加奴、开原南关的王台等女真各部首领，各霸一方，争战不已。其中王台势力最强，对其他各部，远者招徕，近者攻取。女真各部首领有的忠于明廷，有的反对明廷。万历元年（1573年），王杲不断侵犯辽东。七年，王兀堂因反对明朝修筑宽甸等六堡① 及不满明朝官吏在互市中“强抑市价”②，起兵反明。次年，被明将李成梁追歼。李成梁以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为建州部首领，企图通过他加强对女真各部的统治。十一年，李成梁在尼堪外兰的引导下，捕杀了建州右卫都督王杲，又进一步出兵攻破了王杲之子阿台的古勒寨（今辽宁新宾

---

① 六堡：指宽甸、长甸、永甸、大甸、新甸及张其哈剌甸，均在今辽宁凤城以东至宽甸一带。见茗上愚公（茅瑞徵）：《东夷考略·建州》。

② 《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

县境)，逼着城内的人射杀了阿台，以寨投降。尼堪外兰还乘机"唆使"李成梁杀死阿台的部下觉常安（明人称叫场，即努尔哈赤祖父）和塔克世（明人称塔失，即努尔哈赤的父亲)。古勒寨战后，明朝一方面派人对塔克世的儿子努尔哈赤进行"安抚"，同时又支持尼堪外兰做"建州主"，进行分化瓦解。由于连年争战，建州、海西有威望的首领相继死去，女真各部更加混乱，力量削弱，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　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的军事征服

一、征服女真各部

明朝后期，政治腐败，边备废弛，对边疆少数民族管理和控制的削弱，在客观上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女真社会内部的发展，则成为统一的必然趋势。当时，建州女真分为五部：苏克苏浒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和哲陈部。此外，另有长白山三个分支：讷殷部、鸭绿江部和朱舍哩部。海西女真发展为四部：乌拉部、辉发部、哈达部和叶赫部，又称扈伦四部。"野人"女真则有窝集部、瓦尔喀部、虎尔哈部等。各部都有大小首领，各占一城，出现了"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① 的混乱局面。这种分裂割据、战乱不息之势，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女真族人民迫切要求从割据分散、仇杀不已的桎梏下摆脱出来，实现各部的统一。

建州女真居住在浑河、苏子河上游（今辽宁新宾县境内)。那里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地近辽东，在与汉人的长期交往中，尤其是在"马市"贸易中，较多地吸收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见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1 页。

术和文化，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成为女真人中最先进的一支，因而具备更多统一各部的条件。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顺应历史的发展，着手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

努尔哈赤（1559～1626），满族，姓爱新觉罗氏，号淑勒贝勒。出生在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一个女真贵族家庭，祖父觉常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任建州左卫指挥。青年时期，努尔哈赤投军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由于他广交汉人，接受了汉族文化并爱读《六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加之多年的戎马生涯，使他锻炼得足智多谋、武艺超群，为后来大金国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攻取建州女真

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二月，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军误杀于古勒寨，他啖泪含恨，脱离明军，返回建州，以图发展。为了安慰努尔哈赤，明朝让他袭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官职，赐敕书 30 道，马 30 匹。他虽然接受了指挥使的职衔，但并不满足这些恩赐，而是雄心勃勃，“阴有并吞诸部之志”①。当年五月，25 岁的努尔哈赤便以祖、父遗甲 13 副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今辽宁抚顺东）和界凡城（今辽宁新宾西北），消灭了尼堪外兰的势力，首战告捷，开始了征服建州女真各部的事业。当年又占领了萨尔浒城（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统一了苏克苏浒部。

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上层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② 的政策，以强大武力作后盾，积极进行招抚。董鄂部力量较强，一时难以消灭，努尔哈赤便于万历十二年（1584

---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01 页。

年）采取联姻策略，以长女嫁给该部首领何和里，使其归附。浑河部招加城主李岱，本是努尔哈赤同姓人，但因其带兵掳掠努尔哈赤领地，即用武力征讨。不久，俘获李岱，“宥李岱之死而养之”①，攻占浑河部。次年二月，努尔哈赤率领 50 人，掠界凡寨，与界凡、萨尔浒、东家、八儿答四城主交战，大获全胜。不久，又以 500 兵战胜哲陈部。十四年七月，围攻哲陈部的托木河城，继而攻克尼堪外兰之鹅尔浑城。十五年八月，努尔哈赤部下额亦都率领壮士，夜竖云梯，攻下巴里代城。十六年，攻占完颜部。至此，“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②。

努尔哈赤攻取建州五部后，继而向长白山各部扩展。万历十九年（1591 年），兼并了鸭绿江部。两年后，便乘势消灭了朱舍哩和讷殷两部，长白山三部始归统一。至此，共 11 年时间，建州女真全部归于统一。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斗争所以节节胜利，主要是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第一，把一切可以利用、争取、团结的力量，聚集到自己的周围，逐步壮大自己。对背盟通敌者，坚决除掉；对忠诚效力者，结为姻亲；对敌人营垒中虽有箭镞之仇而又能放下武器者，予以收养，甚至封官信用。力量壮大后，便由近及远，先弱后强，一寨一城、一部一族地加以并取。第二，善择战机。例如，当努尔哈赤“走自雄东方”，董鄂部与哲陈部交战时，便乘机对其“蚕食之”③，以扩充自己的势力。第三，表面向明朝表示恭顺，暗中发展自己的实力。他目睹女真首领王杲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过早与明军对抗而被歼灭，尼堪外兰忠于明朝而被唾弃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06 页。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12 页。

③ 苕上愚公（茅瑞徵）：《东夷考略·建州》，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65 页。

的教训，便采取阳做明廷官员，称臣、纳贡，暗则发展自己的两面政策，并收到良好效果。

（二）吞并海西女真

海西女真居住在松花江流域，东界建州女真，西临漠南蒙古，南至开原。努尔哈赤攻取建州女真的节节胜利，引起海西女真四部奴隶主贵族的强烈不安。

俨然以四部首领自居的叶赫贝勒纳林布禄，遣部下宜儿当阿、摆斯汗二人向努尔哈赤施加压力，要求称王，索取土地，责令归顺。努尔哈赤严词拒绝说："国非牲畜可比，焉有分给之理?"① 于是，纳林布禄决定对努尔哈赤诉诸武力。

此时，努尔哈赤正面临十分有利的形势。第一，建州女真统一后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军事力量，兵力达1.5万人。由于所处地域自然条件优越，粮食、军器等供应充足。第二，明朝驻辽东军队主力已入朝进行援朝抗倭战争，为努尔哈赤出兵海西提供了良机。第三，由于明朝多次对海西女真的叶赫、哈达进行残酷袭杀，使其兵力大为削弱。努尔哈赤正是抓住这种有利时机，着手进行统一海西女真的战争。

打破九部军事联盟的古勒山之战，是统一海西女真的关键一战。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联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三部和长白山朱舍哩、讷殷二部及蒙古科尔沁、锡伯、瓜尔佳等三部组成九部联军，合兵3万，分三路向建州进攻②。一路是叶赫部军1万，由纳林布禄和布寨率领，是此次进军的主力；一路是哈达部孟格布禄、乌拉部布占泰、辉发部拜音达里统率的三部联军1万；还有一路是科尔沁部瓮阿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辛卯年，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3页。

② 关于古勒山之战的时间和兵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为癸巳年（1593年）九月，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所记推后两年，而兵力称七八万人，今从前者。

岱、莽古思、明安统率的包括锡伯、瓜尔佳两部的兵马1万人。敌军优势兵力压境，建州部众多有惧色，努尔哈赤却沉着镇静。他派人探明情况，并分析形势说："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①。他根据已侦察到的古勒山（今辽宁新宾县上夹河乡胜利村）地形作如下部署：在敌兵来路上，道旁埋伏精兵；在高阳崖岭上，安放滚木石；在沿河峡路上，设横木为障，据险结阵，严阵以待。同时进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

九部联军中，叶赫首领布寨一马当先，气势汹汹。建州女真按照战前努尔哈赤"伤其一二头目，彼兵必走"②的擒王战术，将布寨紧紧包围，一箭射死。其他各部见叶赫损兵折将，一片混乱，也争相逃奔。努尔哈赤在追击叶赫时，又擒乌拉贝勒布占泰。此役，歼敌4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铠甲1000副，"满洲自此威名大震"③。古勒山之战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建州，而且改变了力量对比，为统一海西女真打下了良好基础，因而成为统一女真战争的转折点。

努尔哈赤击败九部联军之后，乘其散乱之机，运用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策略，积极向海西部发起进攻。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利用哈达和叶赫的矛盾，发兵征哈达。其弟舒尔哈齐率兵千人为前锋，攻打城寨，哈达兵死守。努尔哈赤率兵助攻，激战六昼夜，生擒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二十九年，又乘哈达饥荒，出兵吞并哈达部。

哈达灭亡后，辉发处于建州三面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不利。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因有人质在建州，有求于努尔哈赤，但又不想同建州结盟。他接受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的诱骗，摇摆不定，首鼠

---

①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癸巳年九月，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6页。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癸巳年九月，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7页。

两端。三十五年九月，努尔哈赤统兵进攻辉发，攻其城，杀拜音达里父子，迁其民，灭亡了辉发。

乌拉贝勒布占泰于古勒山之战中被建州女真擒获，三年后获释。布占泰又在暗地里勾结叶赫、辉发两部和蒙古，与努尔哈赤争雄。万历三十五年，建州女真舒尔哈齐及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次子代善等往征“野人”部，在归途中受到布占泰的截击，于是爆发了乌碣岩之战。褚英和代善各率兵500人分两路夹击，乌拉兵大败。此役，斩乌拉兵3000人，获马5000匹、甲3000副。乌拉受到削弱后，努尔哈赤打算进一步拉拢乌拉，以便集中对付叶赫。然而，布占泰却倒向叶赫一边，成为努尔哈赤征服叶赫和统一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及黑龙江中下游的重大障碍。努尔哈赤把乌拉比作拦路的大树，决心予以除掉。他说：“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且将所属城郭，尽削平之，独存其都城。如此，则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① 为砍掉这棵大树，努尔哈赤曾使用联姻誓盟的策略，但都未见效，遂于万历四十一年，再次亲率3万大军征乌拉。

建州军进攻乌拉，连克乌拉河东孙扎泰、郭多、俄漠三城。布占泰率3万兵马列阵以待。两军交战，矢如雨下。努尔哈赤率先乘骑突阵，乌拉军溃败。安费扬古率兵乘胜用云梯攻乌拉城，又用土袋垒成阶梯，先锋军夺门而入，占领该城。布占泰逃奔叶赫，乌拉灭亡。

努尔哈赤三次遣使要叶赫交出布占泰，但叶赫不从。这时，叶赫与明朝关系密切，如正面进攻必受明廷干预，所以努尔哈赤暂时放慢对叶赫用兵。直到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于萨尔浒大败明军之后，努尔哈赤才再次发兵，占领开原、铁岭，切断明朝对叶赫的支援。八月，努尔哈赤令大贝勒代善、二贝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壬子年十月初一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27页。

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等，西向迂回包围叶赫贝勒布扬古驻地西城。额亦都等伪装蒙古兵包围叶赫贝勒金台石驻地东城。金台石、布扬古出城迎战失利，退守城内。后金军竖云梯、推战车登城，与叶赫军拼杀，攻破东西二城，叶赫遂亡。

至此，努尔哈赤吞并了海西女真。

（三）收服“野人”女真

“野人”女真有很多分支，主要是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东海女真居住在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及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包括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黑龙江女真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包括萨哈连部、虎尔哈部、使犬部、使鹿部、索伦部等。

努尔哈赤收服东海女真，先从临近建州女真的瓦尔喀部开始。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努尔哈赤派长子褚英率兵千人攻占瓦尔喀的安褚拉库路，攻取 20 多个屯寨。次年，虎尔哈部部长王格、张格归附。三十七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侍卫扈尔汉率兵 1000 人攻伐窝集部所属滹野路（明朝的呼夜卫，今吉林珲春市东北），俘获人畜甚多。接着，又收抚了那木都鲁、瑞芬、宁古塔、尼马察四卫，其首领降服。三十九年七月，努尔哈赤又派其第七子阿巴泰和费英东、安费扬古带兵千人，征讨乌尔古宸、木伦，俘获千人。接着又征服了扎库塔城。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派兵 2000 人，攻占窝集部厄黑枯棱城（今俄罗斯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纳赫塔赫河地方），俘获万余人，收降 500 户。至此，努尔哈赤基本征服了东海女真，并取代明朝实行统辖。

黑龙江女真一直在明朝的管辖之下。努尔哈赤在征服东海女真的同时，为从明朝手中接管对黑龙江流域的统治权，首先于后金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发兵征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战前，努尔哈赤从每一牛录挑选 6 匹强壮的战马，放到田野养肥，又派 600 工匠到兀尔简河造船 200 艘，作了充分准备。经过 5 个月的征战，取其村寨近 50 处，萨哈连遂成为后金额驸。于是，后金开始治理黑龙江中游地区。同年，又招抚了使犬部的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等 40 人。次年，努尔哈

赤遣兵征服了库页岛附近小岛，黑龙江女真诸部相继归附。

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至四十七年，用了30多年的时间，终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两部和“野人”女真的大部分，发展到“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使“诸部始合为一”①，从而为建立后金政权打下了基础。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其作战指挥和策略运用是相当成功的。第一，对明朝表示恭顺，避免直接作战。如何处理同明廷的关系，是努尔哈赤统一事业成败的关键。明朝误杀其父、祖，他虽痛恨明军，但却以力弱的尼堪外兰为敌手，并接受明朝的官职，六次赴京朝见，取得明朝的信任，所以他统一女真各部的行动未受到明朝的干涉。相反，明朝却把海西的叶赫部看作心腹大患，派辽东总兵李成梁等多次进攻叶赫，不仅造成两败俱伤，也激起了女真人对明朝的不满，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由近及远，由弱到强，逐步蚕食和各个击破女真各部。努尔哈赤最初只不过是建州女真苏克苏浒部中的一支极小的力量，但他正确地分析形势，并采取得力措施。第一步，由苏克苏浒部、董鄂部到浑河部、哲陈部和完颜部，长白山三部较远，放在最后。统一建州后，再以此为后方基地，扩充军事实力。第二步，消灭海西，收服“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叶赫部最远也最强，其部民勇敢、善骑射，所以努尔哈赤先灭哈达，并辉发，吞乌拉，壮大自己，孤立叶赫，然后再发起军事进攻，鲸吞叶赫，达到一举统一扈伦四部的目的。

第三，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军事行动，一开始就宣布实行“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政策，成功地运用招抚、联姻、筵宴、赏赐、封爵、盟誓、赦罪等手段，收到较好的效果。在统一“野人”女真时，努尔哈赤强调“野人”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四年八月，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58页。

女真与建州女真同民族、同语言、同水土、同习俗，始终征抚并用，以抚为主，争取其归附，加之对其上层人物进行拉拢，因而迅速统一了“野人”女真的主要部分。再如，俘获乌拉部贝勒布占泰后，未将其杀死，而是收养起来，并五次联姻，七次盟誓，后布占泰又背盟率兵来战，再败逃叶赫，努尔哈赤统一乌拉，最后还是靠武力完成，但在前后20年中所采取的联姻、盟誓等做法，却有力地分化争取了乌拉部的兵民，为武力征服创造了条件。

二、建立军事农奴主政权

女真各部统一的过程，亦即满族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的过程。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结束了女真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局面，为形成和发展满族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巩固东北边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努尔哈赤为了加强统治，求得巩固和发展，逐步地建立各种制度和机构，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是加强军队建设，创建八旗制度。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兵百人、甲13副。次年，发展到500人。十七年，划分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二十一年古勒山之役时，建州兵就有编为“旗”的记载。二十九年整编军队时，将300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额真一员，并规定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牛录的标志。四十三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已统一哈达、辉发、乌拉等部，又征服了东海女真，幅员益广，步骑增多，除原有四旗外，“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①，正式创立了八旗制度。

第二，创制满文，学习中原文化。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照蒙文字母，谐合女真语音，

---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四，乙卯年十一月癸酉，中华书局影印本。

拼读成句，称之为“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从此，女真人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不仅加强了女真人民的思想交流，而且可以用来翻译汉文典籍，吸取中原封建王朝统治经验，促进与中原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

第三，称王即汗位，设立统治机构。努尔哈赤刚刚统一建州本部时，在费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南）筑城，“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①。这是后金政权的雏形，但对外仍称明朝建州左卫的一部分。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称王。当征服了长白山三部，统一建州后，为扩大其统治机构，于万历三十一年从偏僻狭小的老城费阿拉迁到交通便利的赫图阿拉（后称兴京，今辽宁新宾老城），兴筑城池，建立更大的统治机构，于是该城成为当时女真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努尔哈赤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从而使其王权地位又提高了一步。

努尔哈赤一面对明朝称臣朝贡，声称自己是为明朝守卫疆土，一面则隐蔽发展自己的势力，称雄女真各部。当其征服了海西(除叶赫外)、东海及黑龙江等部，基本统一了东北后，军事实力已足以与明军对抗时，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赫图阿拉称汗登位，建元天命，建立“大金”(史称后金)军事农奴主政权。

第三节　后金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战争

一、萨尔浒之战

（见附图1）

（一）战前形势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标志着他已摆脱了与明朝的臣属关系。后金对明朝，一方面要维护既得利益，继续保持对女真各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丁亥年六月壬午。

部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要冲出旧有的藩篱，扩充实力，从而把战略眼光转向南面的明朝。于是，双方之间一系列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当时，明朝面临的情况是：经过援朝抗日战争，明军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损耗很大；辽东驻军经多次与叶赫作战，也受到很大削弱。由于明朝政治腐败，官僚侵吞军队粮饷，致使其装备陈旧且得不到补充，士卒缺乏训练，且逃亡甚多。辽东边防军名额10余万，实际不过三四万人，且士气不振，战斗力弱。将领“平日不习战，大都以退缩为得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① 这样的军队，已不堪一击，且分散于北起开原、南至鸭绿江口及辽东、辽西的120多个要点，处于易被各个击破的地位。

蒙古方面，科尔沁部已与后金结盟，喀尔喀蒙古已与蒙古联姻，只有漠南察哈尔部与明朝关系密切。察哈尔部企图借助明朝的力量统一漠南蒙古，明朝也企图以察哈尔部为屏障，遏制后金的扩展。朝鲜因受日本侵略而得到明朝的援助，所以朝鲜李氏王朝与明朝形成了军事同盟关系，而对后金却保持警惕，尽管努尔哈赤曾试探拉拢朝鲜，却未达到目的。

东北地区的天灾成了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契机。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天命初，东北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②。严重的灾荒不仅大大削弱了明朝的战争潜力，也使后金统辖范围内的阶级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努尔哈赤抓住这一时机，把女真人的不满情绪引向明朝，并通过战争掠夺以缓和后金的社会危机。

---

① 程开祜：《筹辽硕画》卷四；邹之易：《仰陈末议大伸挞伐疏》，明万历刻本影印本。

②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八，丁巳九年（明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戊申，第2921页。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十六日，努尔哈赤经过多年准备认为时机已到，便对贝勒大臣说："吾计已决，今岁必征明矣。"① 接着，命将士"治甲胄，修军器，豫畜牧"，"伐木治（制）攻具"②，又颁布战法，制订奖惩规定。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誓师，并发布"七大恨"说："吾父、祖于明国禁边，寸土不扰，一草不折，秋毫未犯，彼无故生事于边外，杀吾父、祖。此其一也。虽有祖、父之仇，尚欲修和好，曾立石碑，盟曰：'明国与满洲皆勿越禁边，敢有越者，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盟言，明国背之，反令兵出边卫叶赫。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明国人每年窃出边，入吾地侵夺，我以盟言杀其出边之人，彼负前盟，责以擅杀，拘我往谒巡抚使者纲古里、方吉纳二人，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其三也。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其四也。将吾世守禁边之钗哈（即柴河）、山齐拉（即三岔）、法纳哈（即抚安）三堡耕种田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其五也。边外叶赫是获罪于天之国，乃偏听其言，遣人责备，书种种不善之语以辱我。此其六也。哈达助叶赫侵吾二次，吾返兵征之，哈达遂为我有，此天与之也。明国又助哈达，必令反国。后叶赫将吾所释之哈达，掳掠数次。夫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死于锋刃者使更生，既得之人畜令复返，此理果有之乎？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先因呼伦部（即前九部）会兵侵我，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呼伦而佑我也。明国助天罪之叶赫，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剖断。此其七也。欺凌至极，实难容忍，故以此七恨兴兵。"③ 这篇文告，既是女真人民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正月丙子。

②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三月庚申、二月辛卯。

③ 关于"七大恨"的内容，《满洲实录》、《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明神宗实录》等所载，文字各异，此据中华书局影印本《满洲实录》卷四。

对明朝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的控诉书，又是努尔哈赤利用女真人的民族情绪进行战争的动员令。

努尔哈赤发起对明战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抚顺。四月十四日，后金兵分两路：左路军四旗5000人进取马根单（今辽宁抚顺境），作围攻之势；右路军四旗1.5万人为主力，由努尔哈赤亲率，直趋抚顺。

抚顺是建州女真与明朝互市的重要场所，明守军对后金前来突袭毫无准备。四月十五日晨，后金假冒商人的先遣队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接着，后金八旗主力突入城内，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守将李永芳剃发投降，后金军遂占抚顺。同日，左路后金军占领东州、马根单城寨。明辽东巡抚李国翰急令总兵张承胤赴援。二十一日，张急率广宁镇守张守胤、辽阳副将顾廷相、海州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领兵万人至抚顺，立即分三路尾追后金军。努尔哈赤命代善、皇太极三面环攻明军，追击40里，杀总兵、副将、游击、参将及千把总等官50余员，获马9000匹、甲7000副、器械无数，明军"主将兵马，一时俱没"①。

努尔哈赤攻陷抚顺，是起兵35年以来首次与明军正面交战。初战获胜，大大鼓舞了后金八旗军的士气，努尔哈赤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五、六月间，后金军再次越过边墙，攻取抚安堡（今辽宁铁岭东南）、花包冲堡（今辽宁铁岭催阵堡区花豹冲）、三岔等大小11堡，招降和攻取了崔三屯及其周围的四堡，掳掠了大批人畜财物。七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兵入鸦鹘关（今辽宁抚顺东南），环攻清河。清河同抚顺一样，是后金通往辽、沈的门户。它地势险隘，城四周为高山，左近沈阳，右邻叆阳，南枕辽阳，北控宽甸，为辽、沈屏障。后金军冲到城下，将城围得水泄不通。明城守副将邹储贤、张旆率兵6000多人婴城固守。后金军一面竖云梯猛攻，不避锋刃，一面派人到城下劝降，被明军拒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绝。城上明军施放火器，滚木、礌石齐下，矢石如雨。八旗兵士，八进八退，最后以板车斜靠墙下，从底下挖城墙。守军与后金兵巷战，邹储贤等先后战死，清河陷落，城中粮食财物尽失。

明军在抚顺、清河连遭惨败，鼓舞了后金八旗将士的士气。九月二十五日，后金军劫掠会安堡，大肆屠杀，将300屯民斩于抚顺关，将留下的一人割去双耳，令其持信送给明朝。信中说："若以我为逆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城搦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了此事。"① 这封咄咄逼人、词令强硬的信函，暗示着明与后金之间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势在难免。

（二）双方的战略决策及战争准备

明朝方面，接到抚顺、清河等城和500多个堡寨失陷的消息后，举朝震惊。万历帝朱翊钧说："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他要求督抚"便宜调度，务期殄灭，以奠封疆"②。朝廷内外十分惊愕，议论纷纭。山海关主事邹之易等相继奏疏，力主出兵讨伐。万历帝接受群臣建策，谕令启用旧将，挑选精兵，筹集兵饷，准备大举。他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进攻后金的最高统帅辽东经略，周永春为辽东巡抚，起用原山海关总兵杜松为出关总兵官，征调还乡老将、原四川总兵官刘綎速赴辽东前线。至萨尔浒之战前夕，辽东各路兵马达8.8万余人，另有朝鲜援兵1.3万余人，总计10余万人③。为增加军需，朱翊钧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43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③ 萨尔浒之战明兵参战数字，明清史料记载不一，出入很大：《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万历四十七年正月载主客兵共88550余名；《辽广实录》称9万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四年三月乙卯称20万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及《建州私志》中卷皆称10万人；《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二，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甲寅及卷五七三，万历四十六年八月乙丑合并计算亦10万人左右，从之。

下令借大工及马价各50万作为军饷，并加派田赋，全国共增加200余万两，万历四十七年时达520万两，称为“辽饷”。又从山西、陕西借调大型火炮300位，送往辽东前线。

明朝经过紧张准备，各路人马齐集，但粮饷未备，士卒逃亡很多，将帅又互相掣肘。朱翊钧“恐师老财匮”①，一再催促杨镐进兵。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陈玉庭聚集辽阳演武场，誓师征讨努尔哈赤。议定的作战方针是：分兵四路，约期会师，直捣赫图阿拉，一举消灭后金。兵力部署是：总兵马林为主将，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为监军，率兵自开原出靖安堡，进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总兵杜松为主将，兵备副使张铨为监军，率兵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兵备参议阎鸣泰为监军，率兵自清河出鸦鹘关，从西南面进攻；总兵刘綎为主将，兵备副使康应乾为监军，率明兵及朝鲜兵自宽甸经富察（今辽宁宽甸东北）北上，从东南面进攻。另以一部兵力驻扎辽阳为预备队；以一部驻守广宁（今辽宁北镇），防蒙古贵族骑兵袭扰，保障后方交通。杨镐为诸路总指挥，坐镇沈阳。

明军各路官兵部署就绪后，原定二月二十一日出兵，由于十六日开始降大雪，只好推迟出兵日期。但朝廷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却一再催杨镐进兵。明军尚未出发，师期早已泄露，作战企图、进军路线、兵力部署等也被后金侦知，陷于被动。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善用汉人为间谍，对明军的行动了如指掌。特别是他正确地分析了形势，针对杨镐分进合击的作战指导，制订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② 的作战方针。努尔哈

---

① 夏燮：《明通鉴》卷七六，万历四十七年正月。

② 夏允彝：《幸存录》卷下，《东彝大略》，《明季稗史汇编》本。另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

赤又分析说："我国南路驻防之兵有五百人，其南路兵来，即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① 这就是说，于南路只派500兵士防守，而全部兵力集中在赫图阿拉迎战，从而确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作战方向的选择上，明确指出抚顺一路明军为其主力，要集中全力痛歼，这样，其他三路则不难各个击破。后金还连夜打造盔甲、器械，充实军力。在牛毛岭（今辽宁桓仁县西牛毛大山）一带，砍伐树木，设路障，扼守险隘。在吉林崖（即界凡，今辽宁抚顺市东）筑城屯兵，作为牧马歇兵的前进基地。

（三）作战经过

这次作战，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萨尔浒山之战。二月二十九日，拟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的明杜松军大部分渡过浑河，三月初一日即到达萨尔浒地区，而龚念遂则率领未能渡河的明兵退驻斡珲鄂谟（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中）。杜松以主力留驻萨尔浒山，自率一部进攻界凡。但当日辰时（7～9时），努尔哈赤已率军离开赫图阿拉，并令大贝勒代善为前锋过扎喀关，按兵等候努尔哈赤。皇太极到达后，立即会同代善等继续前进，下午进抵与杜松军对垒的前沿阵地。努尔哈赤率主力到达后，见杜松军兵力分散，且进攻界凡受挫，遂决定以两旗兵力增援界凡，自率六旗主力进攻萨尔浒。努尔哈赤认为，"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②。于是聚集兵力4.5万人（一说3万），向萨尔浒山出发。萨尔浒明军约1.5万人（一说2万），紧急挖堑立栅，布列火器，准备接战。三月初二日，努尔哈赤下令发起进攻，万箭齐射，铁骑奋力猛冲，越堑破栅，一举攻占萨尔浒山。明兵死伤枕藉，四散溃逃。进攻界凡的明兵得知已失萨尔浒山营，军心动摇，不敢再攻。八旗士卒猛冲下来，皇太极所率右二旗亦渡河前来，将杜松军团团围住。杜松

---

①②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三月甲申。

"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欲图聚占山头，以高临下，不意树林复起伏兵，对垒鏖战，天时昏暮，彼此混杀"①。八旗兵奋勇冲杀，大败明兵。杜松面中一矢，落马而死，少数明兵溃逃20多里，皆被后金兵追杀。

第二阶段：尚间崖、斐芬山之战。马林率明军离开开原后，行军速度缓慢。按师期规定，三月初二日应进抵二道关与杜松军会师，可是到初二日中午仍驻三岔口（今辽宁铁岭境内）外的稗子谷，畏葸不前。当他得知杜松军已提前一天到达浑河，才整军向二道关方向前进，但这时杜松军已被全歼。当日夜，马林统兵至王岭关附近。初三日晨，听说努尔哈赤已转兵向北进攻，急忙率兵万人向尚间崖（今辽宁抚顺县哈达附近）集结；派开原道佥事潘宗颜率数千人趋尚间崖东三里远的斐芬山，与斡珲鄂谟的龚念遂部互为犄角，彼此声援；马林自率主力于尚间崖，依山结成方阵，环营挖三层壕，壕外排列骑兵，骑兵外布枪炮，火器外设骑兵，壕内布列精兵，形成"牛头阵"。

努尔哈赤歼灭杜松军后，即转兵向马林军进攻。他仍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战法，先以骑兵进攻斡珲鄂谟，歼灭龚念遂部。鉴于尚间崖明军防守严密，努尔哈赤命八旗兵"先据山巅，向下冲去"。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各自率兵鼓勇急进，与马林军肉搏，夺占了尚间崖。马林率数骑逃奔，副将以下皆战殁，"死者遍山谷间，血流尚间崖下，河水为之尽赤"②。

努尔哈赤攻下尚间崖后，又率兵驰往斐芬山，攻潘宗颜营。潘宗颜据山为营，楯车为垒，环列火器。努尔哈赤令重甲兵持刀在前，轻甲兵操弓矢在后，另有轻骑兵在远处待机。三月初三日早晨开始，后金军发起攻击，明军居高临下，施放火器。两军对攻，矢如雨下，战斗十分激烈。潘宗颜率军越战越勇，使八旗兵速战速决的计划受挫。努尔哈赤迅速厚集兵力，将斐芬山重重包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〇，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

②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天命四年三月甲申。

围起来。明军拼命厮杀，但无外援，战至中午，潘宗颜精疲力竭，背中一箭而死。时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所率援兵进至开原，闻明兵已败，遂仓皇而逃。至此，明北路马林军亦全军溃败。

第三阶段：阿布达里冈、富察之战。努尔哈赤击败杜松、马林军后，又立即转兵南下，以待刘綎军。总兵刘綎所率宽甸路万余明军，和朝鲜李朝所派都元帅姜宏立、副帅金景瑞率领的万余朝鲜兵，于二月二十五日会师后立即启程，向赫图阿拉方向前进，因道路艰险，军粮不继，日行仅 15 里，直至三月初四日，才到达宽甸东北的富察一带。此时，刘綎尚不知杜松、马林已败，所以继续北进。

当天，努尔哈赤留 4000 兵守赫图阿拉，派皇太极等率右翼四旗兵，隐伏在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新宾南）山上的丛林里；阿敏率兵潜伏在冈南谷地，待放过刘綎军一半之后，击其尾部；代善等率左翼四旗兵，在冈隘口前旷野准备正面驰突。

为了诱使刘綎军中伏，努尔哈赤派降人冒充杜松军的“材官”，前往刘綎军告急，催其速进。刘綎误以为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他惟恐杜松独得头功，急命火速进军。当他觉察到自己中计时，部队已进入八旗军设伏的阿布达里冈。后金军 3 万余骑从密林中杀出。明军企图抢占阿布达里冈结阵，但立即受到代善和皇太极的夹攻。两军激战至酉时（17～19 时），未分胜负。皇太极又佯退至瓦尔喀什南谷，纵兵出击。刘綎紧追 300 余里，结果反使自己陷入重围。此役明军被歼万余人，刘綎中矢身亡，其子刘招孙再战，亦力竭而死，明军顷刻大溃。

同日，代善所率八旗兵又移师富察，全力向姜宏立三营兵冲击。朝鲜左右营兵火炮初放，后金铁骑已突入营中。姜宏立急令中军将士死战求生。然而，士卒眼见两营惨败，不敢再战。都元帅姜宏立、副帅金景瑞于三月初五日晨向后金投降。

三月初一日，李如柏军出鸦鹘关后，至初三日仍停滞不前，逗留观望，至虎栏关（鸦鹘关东）即按兵不动。经略杨镐得知杜

松、马林两路败后，才慌忙下令李如柏、刘綎二军回撤。可是刘綎部还未接到命令，即已全军覆没。后金牛录额真武理堪发现李如柏军退兵，令哨骑20名进击。李如柏惊慌万状，明军自相践踏，溃败而逃。

在不到五天的时间内，后金与明朝于萨尔浒等地决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惨败而告结束。这次战役，明军损失重大：总兵刘綎、杜松以下文武将吏亡310余人，士卒亡45870人，失马、骡2.9万余匹①。后金军仅损失2000余人。

（四）双方作战胜败原因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战略性决战，对双方产生深远影响。明军的失败，使其在战略上陷入被动，辽东形势更加危急，而后金则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自此以后，努尔哈赤走上了与朱明王朝争夺全辽和全国政权的征程。后来乾隆皇帝在《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事碑文》中说：经此一役，"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后金之所以取胜，除政治、社会等原因外，主要是努尔哈赤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地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善于用兵，指挥正确。

第一，周密侦察，准确判断敌情。努尔哈赤于战前通过哨探、间谍、商人等渠道，对明军的统帅、兵力部署、行军路线、出师日期等都有准确的了解，并参照天时、地利条件，确定作战方针。他及时掌握明军行动，正确规定基本打击方向。例如，确定首先反击对其威胁最大而又孤立突出的杜松军，然后再实行中间突破，就比较容易地逐次消灭各路明军，使明军分进合击的计划落空。

第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后金与明双方兵力对比，后金居劣势，且主要装备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而明军数量多，又装

---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北图怡府藏本。

备大量火器。在兵力部署上，明军多路对赫图阿拉作向心攻击。努尔哈赤在明军的多路进攻面前，不是被动地作城堡坚守防御，也未分路出击，而是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法，在时间、空间上将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上，使每战都形成绝对优势，保证整个战役的全胜。

第三，扬长避短，速战速决。后金八旗兵利野战，善驰突，机动能力强，而明军善守城，且以火器为长技。作战时，努尔哈赤充分发挥骑兵快速机动能力强的特长，于西路初战取胜后，迅速转移兵力，第二天破马林军，第三天转兵东南，迅速歼灭刘綎军。这样，既弥补了己方兵力不足，又置敌方于被动和猝不及防的地位。为避开明军火炮，还注意利用地形，减少了伤亡。

明军方面，除政治腐败，边备废弛等原因外，作战指挥失措，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一，准备不足，急促上阵。明军虽作了几个月的准备，但杨镐并未针对后金军队的作战特点和战略态势制订作战计划，也未考虑己方军队多系临时调集，且长途跋涉，需要休整，更忽视深山密林、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等对南方士兵作战不利的天候、地理条件。相反，他却自恃兵力数量优势，凭主观愿望指导作战，结果以全线失败告终。

第二，情况不明，指挥失算。辽东经略杨镐不察敌情，对后金八旗兵作战能力、特点如盲如瞽；远居后方，而不亲临战阵指挥，使机动部队既不能随时策应前线，又不能掩护后退。由于杨镐指挥无能，造成长达数百里的进攻正面上，杜松孤军冒进，马林畏葸不前，李如柏逗留观望，刘綎含怨跋涉，各路参差不齐，首尾不相顾，导致四路分进而不能合击，逐个被击败的后果。

第三，兵力分散，主力突出。明军在数量上虽稍居优势，但四路出击，兵力分散，遂失去优势地位。西路杜松军为抢首功，突出冒进，使自己陷入重围，首战失败。其他诸路也互不协调，纷纷陷入困境，从时间、空间上有利于后金转移兵力，依次被其击败。

二、沈阳、辽阳之战

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按军功大小向诸贝勒分发战利品，激励女真奴隶主贵族继续对明进行战争，扩大地盘。同后金的勃勃雄心相反，明在辽东的将士则“军气日益灰沮，人心日益惊惶”；开原商贾士民逃窜几半，宽甸、叆阳等城堡奔溃一空，“辽之为辽，真岌岌乎有不保之势矣！”① 京师则一片混乱，事隔两个月，竟不见朝廷有任何举措。

努尔哈赤稍加休整并扩军以后，便挥师进攻开原、铁岭。开原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界叶赫，是明朝的军事重镇。但守将是刚从萨尔浒败阵回来的总兵马林，攻无能，守无策。守军又腐败不堪，毫无斗志，兵无粮饷，马缺草料。对此，努尔哈赤早已派间谍侦察得清清楚楚。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六月初十日，努尔哈赤调集八旗兵 4 万，以少数兵力佯攻沈阳，牵制明援军，亲率主力从靖安堡入，直抵开原城下，同先期潜入的谍工相配合，不到六天就攻占开原，马林以下皆被杀。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又统兵五六万人，出三岔儿堡，围攻铁岭。铁岭是沈阳北部的重要城堡，努尔哈赤早已不惜重金收买守城参将丁碧。后金军到后，明援军未到，丁碧即“开门迎敌”，城遂陷。八月，后金军又乘胜攻灭叶赫。至此，后金进军沈阳的道路全部打通。

正值努尔哈赤节节胜利之时，明新任辽东经略熊廷弼来到沈阳。他所面临的情况是：仅存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额兵，“全额已亡”；募兵，多为“游食无赖之徒”，不习弓马；援兵，亦为“弱军羸马，朽甲钝戈，不堪入目”②。至于辽东官将，几经战败，已所剩无几，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〇，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辰。

② 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三，万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前经略辽东疏·辽左大势久去疏》，退补斋胡氏刊本。

且无不胆战心惊。军器已丧失殆尽，仅存的弓箭也是断背断弦，缺羽少镞，刀钝枪秃，不堪使用。战马仅存万余匹，缺草缺料。因此，军队已毫无战斗力可言。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明廷任命熊廷弼接替杨镐为辽东经略，他是明末一位有谋有识、刚直不阿、较有见地的将领。他面对后金崛起、辽东已经残破、在力量对比上明朝已由优势转为劣势的情况，上疏朝廷，陈述整顿辽东防务的意见，指出："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而辽镇必不可弃。河东为辽镇腹心，欲报（保）辽镇，而河东必不可弃。开原为河东根底，欲保河东，而开原必不可弃。""然而不守辽沈，必不能保辽镇以保京师；不复开原，必不能保辽沈以保辽镇矣。"① 于是，他招集流亡，整肃军令，训练军队，修复城堡，加强防务，使辽东形势有了好转。然而由于明朝政治腐败，熊廷弼却成了"党争"的牺牲品。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死去，朱常洛、朱由校先后袭位。帝位更迭，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派别斗争。熊廷弼刚直不阿，不曲意奉承专权的阉党分子魏忠贤，结果被加上"废群策而雄独智"、"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② 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排挤去职，由袁应泰代为辽东经略。

袁应泰虽有治辽之志，并进行过一番整顿，但"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③。他在招降蒙古人时，使大批间谍混入辽阳、沈阳，埋伏下很大隐患。袁应泰急功近利，一改熊廷弼的积极防御部署为进攻态势。他认为："抚顺为奴酋出入经由之处，彼可以来，我可以往，是必争之地也。"④ 其指导思想在仓忙收复抚顺，而对辽东全局的战守，却无所画策。

---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三，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己卯。

②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③ 《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④ 《明熹宗实录》卷五，天启元年正月丙戌。

努尔哈赤看到明廷内部派别斗争激烈，皇位更替频繁，经略易人，军心涣散，边防紊乱，认为再次对明军发起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制造钩梯，备置车营，储备粮糗，准备进攻辽沈。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十一日，后金数万人分兵八路进攻奉集堡，揭开了沈辽之战的序幕。该堡位于沈阳东南40里，其西南又有虎皮驿，二者成犄角之势；而奉集堡东北距抚顺、西南距辽阳各90里，是后金进攻辽阳、抚顺、马根单的必经之地。努尔哈赤首指奉集堡的目的，一是试探沈阳、辽阳的虚实，二是切断沈阳与辽阳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明总兵官李秉诚率宣（宣府镇）、大（大同镇）兵声援，未能占领奉集堡。接着，又转攻虎皮驿、王大人屯。八旗兵往来无定，好像要大举的样子，使明军捉摸不定，难作对策。

三月初十日，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沿浑河而下，水陆并进。次日夜，八旗兵佯渡浑河，明哨探举火传报沈阳，守将贺世贤、尤世功大惊，率兵登城。十二日辰时，八旗兵到达沈阳城下，于城东7里浑河北岸扎营。沈阳城“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①。外壕二道，阔5丈，深2丈，涧底插尖木。壕内侧筑拦马墙一道，间留炮眼，排列战车、火炮。城四周及城上设游兵保卫，可谓异常坚固。

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令八旗兵竖云梯，布战车攻城，明军极力抵御。贺世贤见后金兵迟迟不再攻城，把努尔哈赤诱战误认为怯弱，遂轻率地出城对阵。努尔哈赤见明兵冲出城外，即命后金兵边战边退。贺世贤离城越来越远，突然被八旗兵重重包围，力战而死。努尔哈赤立即令八旗将士攻城。城上连发铳炮，久而炮身发热，药装入即发。八旗兵乘机冒死挖土填涧，过壕进逼城下。东门守城兵中的蒙古降人临阵叛明，他们砍断桥索，放下吊桥，后金兵蜂拥而入，沈阳城陷。明副总兵尤世功、参将夏国

---

① 《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乙卯。

卿、张纲以下7万兵民被杀。

沈阳被围时，袁应泰即令总兵官童仲揆、陈策自辽阳黄山率师往援。陈策部北上渡过浑河时，闻沈阳已陷，遂于离沈阳城7里处安营，随即用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等发起进攻，三挫金兵。后金兵用战车抗击，展开激战，陈策战死。这时，各路援军皆先后在城东浑河南北及沈阳城南鏖战。浑河南岸的战斗最为激烈。1万明步兵布置战车枪炮尚未完毕，后金已发兵来攻。总兵李秉诚、朱万良率兵3万赴援，均无功而败。游击周敦吉、石砫，土司秦邦屏渡河营于桥北，副将董仲贵、戚金和都司张名世等率浙兵3000人营于桥南，结阵未就即被金兵击败，副将、把总120余名战死。当时明方评价这次战斗说："自奴酋发难，我兵率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独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①

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又统率大军，"旌旗蔽日，漫山塞野，首尾不相见"②，直捣辽阳城。辽阳是辽东重镇，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重视镇守辽阳，远远超过沈阳。城周围挖壕，沿壕列火器，环城四面分兵把守。沈阳失陷后，袁应泰又撤各路兵马，并力守辽阳，又引太子河水注入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城四面排兵，以加强城防。

三月十九日，努尔哈赤率军经虎皮驿，渡过辽阳城东南的太子河，包围辽阳并诱明守兵出城。袁应泰令全城军民严守，又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5万出东门，至5里处设伏迎击后金军。努尔哈赤见明军被诱出城，立即令左翼四旗兵进击，明军发火炮接战。后金军也施放火器，发起冲击，明军溃散。后金军追至鞍山，胜利返回。另一支明兵从西门出战，遇后金兵而退至城外7里处安营。

---

① 《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乙卯。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六年三月十八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66页。

三月二十日卯时（5～7时），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观绕城之水，西有闸门，可令左四固山兵掘之。东有水口，以右固山兵塞之。"① 遂率右翼四旗兵布战车于城边，令众兵囊土运石，壅塞水口。明军出东门外安营，列枪炮三层，连发火箭抗击，后金兵受挫。由于城东入水口壅塞，城壕干涸。后金右翼四旗之战车兵进攻东门，明兵连放枪炮，酣战良久，明兵被迫后撤。后金兵乘胜驱杀，河水尽赤，明总兵梁仲善、朱万良战死。后金左翼四旗兵在莽古尔泰、阿敏率领下，冒炮火夺占小西门桥后又攻西城。城上火箭、火炮齐发，后金兵又竖云梯，列楯车，奋勇突击，同明军肉搏，激战至天亮，夺占西城一面及两角楼。明监军高出、牛维曜、邢慎言等乘乱逃窜，城内人心混乱。

二十一日，努尔哈赤下令发起总攻。后金军右翼官兵下马，用草木填内壕，攻城北面。袁应泰、张铨等以东城为依托死守。后金兵奋死夺城，因有内应，傍晚从小西门突入城中。袁应泰见事不可为，于城东北角镇远楼自焚。张铨被俘，参将房承勋等以下俱死于乱军之中。

辽阳之战，是后金与明军的又一次交锋。在三天时间内，后金兵攻下辽阳，"河东十四卫生灵尽为奴属"②。

沈辽之战，10天即决胜负。明军如此惨败，在军事上主要是用将不当，指挥失措。袁应泰看不到后金多骑兵、善野战的特点，轻易出城迎战，企图以野战决胜负，失败成为必然。后金取得全胜，主要在善于捕捉战机，准备周详，将士勇猛，指挥得当。特别是能注意扬长避短，诱敌出城，使明军城防火器失去效力，然后于野战中歼敌。此外，努尔哈赤还善于用计行间，及时掌握敌情，并里应外合，有力地配合了战斗行动。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六年三月二十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67页。

② 《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甲戌。

三、广宁之战

（见附图 2）

沈辽之战后，后金迁都辽阳，形成与明政权对峙局面。同年七月，努尔哈赤下令实行“计丁授田”，鼓励农耕，为进一步扩大对明战争作准备。八月，在辽阳东太子河北建筑新城（清朝称东京），将明朝统治东北的中心变为后金征服明朝的基地。为了扩大兵源，后金又规定 20 人当中抽调 1 人当兵。努尔哈赤积极备战，但一直未轻举妄动，而是窥察明朝动静，俟机而动。

沈、辽失陷，明军大溃退，剩下为数不多的明军，有的逃往辽西，有的逃往沿海岛屿，有的渡海到山东、朝鲜。辽东巡抚王化贞称：“辽沈既陷，河（辽河）西汹汹，一无可恃。”① 辽河防线及辽西大片地区一片空虚，后金兵随时有渡河西进的可能。

辽东前线形势使明廷震惊，也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烈和表面化，从而导致战略上的分歧。明熹宗朱由校认为：“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② 于是，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上任后，根据后金缺乏水师，后方不稳，兵力不足，以及八旗兵短于攻坚等情况，于天启元年六月初一日提出了“三方布置策”：第一，陆上以广宁（今辽宁北镇）为设防重点，集中骑步主要兵力，坚城固守；第二，海上以天津为一区，登州府（今山东蓬莱）、莱州府（今山东莱州市）为一区，各置舟师，从海上进行牵制，伺机袭扰辽东半岛沿海地区，从辽东南部打击后金的侧背，使其内顾，并伺机收复辽阳；第三，以山海关为适中之地，屯重兵，设经略，节制广宁、天津、登莱三方，集一事权。八月，他又补充提出：“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③ 从当时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实

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〇，天启元年五月壬寅。

② 《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癸酉。

③ 《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附王化贞传》。

际的积极防御性质的正确方针。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为熹宗所接受，并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事务。同时，任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受经略节制。但是，阉党分子王化贞，不听熊廷弼节制。他对抗熊廷弼，实行“画地分守”的方针，将步骑两万沿三岔河（辽河、浑河汇合后至营口入海处一段）120里防线一字摆开，设点防守，平均使用兵力，采取消极被动的防御部署。另外，王化贞还轻信蒙古察哈尔等部可出兵40万助明的无稽之谈。辽东前线经抚不和及设防思想的混乱，下边将士无所适从，影响了作战方针和指挥的统一，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努尔哈赤夺占辽、沈10个月之后，探知明朝辽东“经抚不和，战守无策”①，决计乘机西渡辽河，直指广宁。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正是河水冰封、人马易渡的好时机，努尔哈赤命多铎等人留守辽阳，自将八旗大军约八九万人，由东昌堡（今辽宁海城市牛庄南）西进。

广宁巡抚王化贞得知后金军西进，仓促布兵防守：令总兵刘渠率兵2万守镇武（今辽宁台安西），总兵祁秉忠领兵1万守闾阳（今辽宁北镇西南闾阳驿），分南北两路与广宁相掎角；副总兵罗一贵（一说罗一贯）率兵3000守西平堡；又在镇宁（今辽宁北镇东）驻兵；王化贞自率重兵守广宁，企图以四堡屏障广宁，阻击后金军的进击。

二十日晨，后金5万人马经牛庄渡过三岔河西进。明“防河兵见势不可当，遂走”②。后金兵乘势追击，申时（15～17时）起包围并猛攻西平堡，其意在引诱广宁周围诸堡明兵前来野战。时各城守军消极自保，不作援应；王化贞蜷缩广宁，不敢出击。在熊廷弼的督促下，王化贞始命各堡守兵驰援西平。努尔哈赤以

---

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八，天启二年正月乙丑。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天命七年正月二十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72页。

一半兵力围西平，另一半兵力迎击增援的明军。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致书西平堡守将罗一贵劝降，遭到拒绝，于是后金兵布战车、云梯，四面攻城。罗一贵率3000兵士凭城固守，三次击退后金进攻，战至中午，矢尽援绝，罗一贵以下将士1万人被杀。明总兵刘渠、祁秉忠、孙得功率兵分别从镇武、闾阳、广宁驰援，至平阳桥（西平堡西北）与后金军遭遇。早为后金收买而心怀“异志”的孙得功投降，刘渠、祁秉忠战死于沙岭（西平堡西北），援兵全部被歼，于是后金兵直指广宁。

广宁城地处医巫闾山西麓，恃三岔河为阻，是辽阳失陷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驻地，城内有守军2万。西平堡失守、平阳桥惨败的消息传到广宁后，城内人心惊恐不安，纷纷奔逃，而王化贞对此全然不知。二十二日，王化贞得沙岭败报后，督将士上城戍守，但军民一片混乱，便狼狈出逃。次日，熊廷弼自山海关率仅有的5000兵士援广宁，行至大凌河（今辽宁锦县），遇王化贞逃回。熊廷弼无能为力，只好掩护军民撤入山海关。二十四日，后金兵占领广宁，进而攻占了河西40多个城堡。

广宁兵败，是明朝政治腐败、用人不当的结果。但许多朝臣从不同派别的利益出发，上疏咎治熊、王二人罪责。结果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王化贞亦被判死刑。

明军遭此惨败，从军事上说，首先是作战指导上的错误造成的。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是积极防御思想，是可以实现的，应当肯定。王化贞画地为守、分兵把口的部署则是消极的、错误的。他对双方力量对比和形势的分析都不符合实际，完全是主观臆想、侥幸取胜的作战指导。而熊廷弼在广宁危在旦夕时，未能及早赴援，与王化贞共同固守；王化贞率师后撤时，熊廷弼非但未严加制止，反做殿后掩护其撤退，应该说是失误。其次，明军士气不振，饷械不足。当时河西明兵虽近10万，但战斗力很差，“人心已去”①。王在晋说：“问兵则曰不精，问器械则曰不备，

① 《明熹宗实录》卷一五，天启元年十月乙亥。

问鞍马则曰不整，装贫做老只想回乡，便保身躯性命。”① 这样的军队，与士气高昂、勇猛善战的八旗兵作战，岂能不败！

后金之所以胜利，除准备充分、将士士气高昂等因素外，主要是：第一，军事指挥上正确地选择进攻时机。明辽东前线经抚不和，作战态势战不像战，守不像守，经略有职无权，巡抚有兵无能，并牵动着朝廷内部互相攻讦、倾轧，致使内外意见相左，指挥不一。努尔哈赤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发起进攻，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其次，寒冬季节对后金兵作战有利。第三，用间成功，里应外合。游击孙得功早为李永芳所策反，伺机叛变。他增援西平堡时，已“潜纳款于太祖”②，当王化贞弃守广宁时，他出城3里跪迎后金兵，使努尔哈赤不战而取广宁。

四、宁远之战

（见附图2）

广宁失守后，战线有从辽河中下游转向辽西走廊的趋势。但是，由于后金占领区汉人反抗斗争的牵制，及明宁锦防线的修筑，后金军未能立即西进。

努尔哈赤为反对明朝的民族压迫而起兵，但他建立后金政权后，对汉人也采取民族压迫政策。他把“剃发”作为汉人降服的标志，并对不服从者进行残酷屠杀。为了防止辽东汉民逃跑，又用武力强迫他们迁到女真聚居地区监管起来。辽民还要担负筑城、修堡、煮盐、运输等繁重苦役。后金政权的这些做法，引起了辽民的强烈反抗。例如，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复州城（今辽宁复县西北）1万余人举城暴动，努尔哈赤派代善、德格类等率兵2万人前往镇压。辽西的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等地的反抗斗争，也此伏彼起。特别是十三山

---

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六。

② 《清史稿》卷二三一，《孙得功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今辽宁锦县东北）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激烈。他们拒不剃发，誓死不降。这些斗争，大大削弱和牵制了后金，使其无法继续西进，并进一步坚定了辽西人民抵抗后金的决心。

广宁兵败，明廷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经略辽东。他畏难不从命而被撤职，明廷又改任兵部尚书王在晋为辽东经略。开始，王在晋也不愿受命，但鉴于解经邦被捕的教训，不敢拒绝。他上任后，持“拒奴抚虏，堵隘守关”① 的主张，力主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城，派 4 万兵防守。这是一个只图苟安、无所作为的消极防御计划，因而受到兵部主事袁崇焕等人的抵制。袁崇焕力主守离关甚远的宁远（今辽宁兴城），营建宁远等城，以图大举。二人分歧严重，首辅叶向高又犹豫不决，兵部尚书孙承宗只好自请行边。

天启二年（1622 年）六月，孙承宗抵山海关，经实地考察后指出，王在晋于关外八里铺筑城的实质在“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②，而袁崇焕等主守宁远，监军阎明泰主守觉华岛（今辽宁兴城东南海面菊花岛）的意见则是正确的。为了支持袁崇焕等人的正确主张，抓紧宁锦防线的构筑，孙承宗奏准撤销王在晋辽东经略职务，调任陪都南京兵部尚书。明廷于是年八月进孙承宗为太子太保，仍以大学士、兵部尚书衔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孙承宗到任后，重用袁崇焕、鹿善继、孙元化等人，修筑宁远城，整饬边备。

孙承宗采取守关外以蔽关内，层层设防，逐步推进，最后收复全辽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此，他派兵重点驻守中前所、宁前屯、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宁远，将防线向前推进 200 里，前哨阵地则推进至右屯卫、大凌河，建立起牢固的宁锦防线，迫使后金军后撤至广宁一带。宁锦防线的重点是宁远。该城按照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原则修成，高 3 丈 2 尺，雉高 6

---

① 《明熹宗实录》卷二一，天启二年四月庚辰。

② 《明史》卷二五〇，《孙承宗传》。

尺，址广3丈，上广2丈4尺，由袁崇焕亲定规制，督责而成，并由他亲自驻守。另以一部兵力守觉华岛，以便水陆配合，屏障山海关。孙承宗还提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① 的政策和措施，安抚关外军民，共守辽西。在他主持辽东军务的4年间，拓地400里，练兵11万，立车营12、水营5、火营2、前锋后劲营8，造甲胄、器械数百万，造船1500艘、战车6万，开屯5000顷，岁入15万，防务渐趋巩固。

正当孙承宗、袁崇焕部署辽东防务取得显著成效之时，明廷内部党争又给前线战事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朝中魏忠贤等阉党分子专权，妒贤嫉能，对孙承宗的恢复大计制造障碍，挟迫明熹宗朱由校罢孙承宗，以阉党高第为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高第同袁应泰一样，向来不懂用兵打仗。他抵关后，下令放弃关外城堡，撤回守兵，于是，锦州、右屯和大、小凌河等地尽失，只剩袁崇焕守宁远孤城。

努尔哈赤侦知高第任辽东经略后，认为进兵时机已到，决定出师夺取宁远。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八旗军约6万人（号称13万）自沈阳西进，十六日到达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北越广宁大路，南达海岸，分路进击。二十三日，后金兵进抵宁远城下。

袁崇焕远离后方驻守宁远，城中守兵不满2万，但城池坚固，兵民士气高昂。其兵力部署是：总兵满桂守东面，副总兵左辅守西面，参将祖大寿守南面，副总兵朱梅守北面，自己调度全局。又将城西的囤粮运往觉华岛，城上架设从葡萄牙输入的西洋大炮11门，据城固守。袁崇焕“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②。然而，驻守山海关的高第却惊惶失措，拥兵不救。

努尔哈赤在发起攻城之前，先派被俘汉人劝降。袁崇焕严词

---

① 孙承宗：《高阳集》卷一九。

②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拒绝："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① 二十四日，后金军以战车攻宁远城西南角。战车用槐、榆二木做成，形如轿，上覆生牛皮，内藏勇士。攻城时战车紧靠城墙，上挡敌锋，勇士在内奋力凿城。城上明军掷滚石、火罐，发西洋大炮，后金兵死伤累累。后金兵又转攻南面，并在两城楼间火力薄弱处凿城，开 2 丈余的洞三四处，冒死登城。袁崇焕镇静若定，令兵士"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②。后金战车被烧毁，攻城士卒被迫退下。二十五日，后金兵再次攻城，因城上明兵火炮猛烈，又未攻克。连续两天攻城，后金损兵折将 1.7 万人。努尔哈赤见人马伤亡太重，撤兵至城西南 5 里处扎营。

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发现距宁远城 16 里海中的觉华岛是袁崇焕贮粮之地，便派武纳格等率兵往攻。岛上守军凿开冰冻，阻敌上岸。后金兵绕至未凿处，占领岛上东山、西山后，大肆劫掠而去。二月初九日，努尔哈赤回到沈阳。《满洲实录》记载："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不怿而归。"当年八月十一日，病卒（一说因受炮伤而死）于离沈阳城 40 里的叆鸡堡。

宁远之战，是明与后金交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此役对后金打击十分沉重，严重挫伤了八旗将士的锐气，中断了自萨尔浒之战以来对明的进攻势头。极大地振奋了明朝的民心军心，扭转了一败再败、一退再退的战局，并促使蒙古察哈尔、喀尔喀各部和朝鲜进一步坚定支持明朝反对后金的态度。

后金此役失败的原因，除了它仍以掠夺、屠杀为目的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外，在军事上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努尔哈赤犯了经验主义错误，骄傲轻敌。过去攻沈辽、广宁皆是利用明朝临阵易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87 页。

② 《明熹宗实录》卷六七，天启六年正月辛未。

将，新任将领不知兵而取胜，此役努尔哈赤机械搬用以往经验，同样想利用高第接替孙承宗之机攻下宁远。殊不知孙承宗虽去，高第同袁应泰、王化贞一样不懂军事，但孙承宗经营的宁锦防线还在，他培养的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将领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轻敌冒进，岂能不败？二是缺乏准备。后金兵攻克广宁已近三年，久未战斗，将领怠惰，士无斗志，器械不利，是敌不过用火器守坚城的明军的。三是在作战指导上，努尔哈赤丢掉了诱敌出城、以计攻取、里应外合等成功的经验，忽视了明军已改用西洋大炮，而仍采用旧法攻城，置自己于避长就短境地，焉能不败？

满族首领努尔哈赤自 1583 年图伦之战开始，经过古勒山、乌拉等战役战斗，用了 36 年的时间统一了三大女真，结束了女真长期互相战杀、互相争夺的局面，促进了女真部族经济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统一战争的结局是建立了后金政权，控制了东临日本海，西界明辽东都司辖区，南到鸭绿江，北到黑龙江、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接着，又用了 8 年时间，经过沈辽、广宁等战役，夺占了辽东大部，为尔后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由于明朝政治腐败和作战指挥等一系列错误，必然导致其步步失败、后退。相反，后金国力、军力的不断发展及战略上、作战指导的正确，决定其步步胜利。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经过战略调整，使这种胜利形势不断发展下去。

第二章　皇太极统一东北及与明朝争夺辽西等地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 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其第八子皇太极即后金汗位。次年，改年号天聪。从此，后金地方政权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之其军事战略也作了调整。在皇太极新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又用 17 年时间，通过用兵朝鲜、统一漠南蒙古、袭扰明腹心地区及松锦决战等重大军事斗争，为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政权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统一东北，稳固后方

一、宁锦战败及面临的形势

皇太极刚刚即位，明新任辽东巡抚袁崇焕即派李喇嘛及都司傅有爵、田成等 33 人赴沈阳，名为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皇太极即位，实则乘机侦其虚实。皇太极深知明朝使团的意图，但仍以礼相待，表示和好。他为了“一意南下”① 攻明，决定先征朝鲜，以解除后顾之忧，即派方吉纳、温塔石等人随明使团回访，以示“两国通好”②。袁崇焕针对皇太极暂缓攻明，先派兵征服朝鲜的意图，提出了“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③ 的战略，以议和作为缓兵之计，乘机进行积极防御的部署。天聪元年

①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十一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 《明熹宗实录》卷八一，天启七年二月辛酉。

（明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后金战败朝鲜之后，即向明朝提出以山海关为疆界，并索取重金，于是议和谈判破裂。五月初六日，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今辽宁锦县）、小凌河（锦县东南）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由，率领后金兵5万多人攻明，初七、初八两日渡过辽河，兵锋直指锦州。

袁崇焕对皇太极的进犯预有准备。他将兵力部署在关外200里地段上，使后金兵不得接近关门。同时，"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①，抚绥蒙古，"大段坚壁清野，以为乘间击惰，以为随机应变"②，采取战与守、筑城与屯种、坚壁清野与乘虚出击相结合的战略指导。结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关外以宁远（今辽宁兴城）为中心，以山海关为后盾，其间中前、中左（今辽宁塔山）、中后（今辽宁绥中）、前屯、宁远、锦州、大凌河诸城，珠联璧合，宁锦防线更加严密坚固。

后金兵渡辽河西攻的警报传来，明朝紧急调整兵力部署：命满桂移驻前屯，孙祖寿移屯山海，宣府黑云龙移守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镇长城，赵率教固守锦州，袁崇焕往宁远居中调度。朝廷调发12万兵马，其中4万守山海关，8万守关外。另以6万分守前屯、宁远、中后、中右四城。在此四城中，宁远最为重要，关系到整个辽西战局的安危。此外，还从关内各重镇调集兵力支援辽西战场。

五月十一日，后金兵抵锦州，四面合围。皇太极见明军有备，先遣使劝降，但守将赵率教回答："城可攻，不可说也。"③于是，皇太极命后金兵分两路，拽战车，抬云梯，轮番进攻西、

---

①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②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一，天启六年八月。见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8页。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中华书局1977年版。

北二面。赵率教、左辅、朱梅等督率守军英勇奋战，炮火、矢石如雨，从辰时（7～9时）战至戌时（19～21时），终将后金兵击退。皇太极受挫后，一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增援，一面远距离围困锦州。袁崇焕认为“宁远兵不可动”①，他一面发骑兵袭扰，遣水师东出牵制，一面请求朝廷调兵增援。次日，皇太极又以骑兵围城，环城而行，但攻城无任何进展。十六日，满桂从山海关驻军中选出1万精兵增援锦州，于爪篱山与后金兵遭遇，经激战，伤亡惨重。二十五日，后金援兵至，休整一日。二十七日，在皇太极的率领下，后金主力转攻宁远，仅留少数兵力监视锦州明军。

二十八日清晨，后金兵驰至宁远，于城四周扎营，对宁远实施包围。袁崇焕早有准备，他命监军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固守，城外前掘深壕，后列车营，以拒后金兵。满桂率援兵于城外助守，总兵孙祖寿、副将许定国于西门扎营，副将尤世威于城东二里列阵。皇太极令迫近城垣的后金兵后撤，企图诱明兵出城，然后一举歼灭。但明兵坚守城池，皇太极企图强攻。代善、莽古尔泰、阿敏等记取努尔哈赤兵败宁远的教训，皆以“距城近，不可攻”为由，力劝皇太极“勿进”。皇太极却说：“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② 他不听劝告，亲自率军攻城。

明宁远守兵奋起抗击。城下，车营都司李春华等部的“红夷”、“木龙虎”、“灭虏”等火器齐发，满桂、尤世威又率步骑兵奋勇冲杀。城上守军在袁崇焕的直接指挥下，发威力更大的“红夷”大炮轰击，并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在激战中，后金兵死伤数千人，“尸横满地”③，皇太极的大帐被炸毁，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受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皇

---

①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五月癸巳。

③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七，北图怡府藏本。

太极见"死者益众，乃撤兵归，终夜东行"①。

六月初，皇太极率兵重新攻打锦州，又遭失败。后金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加之天气炎热，部队大量减员。皇太极见取胜无望，遂下令撤退，于六月十二日回到沈阳。这是后金军在关外继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宁远兵败后的第二次惨败。

宁锦之战，后金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皇太极忽视了明军宁锦防线的存在，在战略战术上重蹈以骑射攻城的覆辙。孙承宗、袁崇焕多年经营的宁锦防线，在第一次宁远之战中已初见成效。战后，袁崇焕又以宁远、锦州为重点，惨淡经营，使宁锦防线成为后金八旗难以逾越的障碍。而皇太极却仍然沿用努尔哈赤时的老一套打法，以骑射攻坚，这就决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此外，在兵力对比上，后金至多不过五六万人，与明军投入战斗的兵力多达 9 万人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在作战时机选择上，时当盛夏，远程奔袭，兵士疲劳，士气低落，加之缺乏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仓促上阵，也决定了后金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宁锦之战形成了明与后金在辽西战场的对峙局面。雄心勃勃的皇太极受到沉重打击，难以继续西进，他所面对的内外形势极其严峻。就后金内部情况而言：

第一，满洲贵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严重。努尔哈赤在夺占辽东的过程中，对广大汉人进行残酷的奴役和屠杀，每征服一地，"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②。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努尔哈赤攻占抚顺后，即拆毁该城，并烧杀抢掠，将所获 30 万人充作奴隶。在占领萨尔浒、铁岭、辽阳、沈阳时，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屠杀，未被斩的也充作奴隶。这种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在八旗兵出征作战时，汉人在后方滋事，乃至用武装斗争进行反抗，使后金统治者受到严重威胁。

---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② 《清太宗实录》卷四〇，崇德三年正月己卯。

第二，后金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农奴除了在田庄进行繁重的耕作以外，还要服差役，因承受不了农奴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被迫逃亡和进行反抗。因此，后金统治者非但得不到农奴对战争的支持，反而使后方更加动荡不安。

第三，满洲贵族内部汗权和王权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努尔哈赤死前，因继承人褚英被废，为协调与解决后金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利的矛盾和斗争，制定了八和硕贝勒共议朝政的制度。这种带有军事民主制残余的制度，非但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反而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后来，他又安排九王多尔衮（第十四子）继承汗位，以大贝勒代善（第二子）摄政，但努尔哈赤死后，诸子不遵遗命，兄弟间争夺汗位更加激烈，最后四王皇太极（第八子）凭借手中的兵权，再加上代善的支持，终于取得了汗位。然而，其他诸王却一直心怀不满，汗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第四，后金军队由于长期征战，厌战情绪日益严重。八旗兵兵士马匹、军器的置办，多数负担不起，致使不少人“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①。因此，八旗兵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实难再战。

第五，连年征战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后金兵的屠杀和抢掠，使百姓惊恐不安，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皇太极即位不久，又遇上荒年，粮食奇缺，物价飞涨，斗米价高达银 8 两，以致“国中大饥”，甚至出现了“人有相食者”② 的惨象。社会秩序混乱，盗窃、抢劫、凶杀等时有发生。皇太极叹息说：“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③

外部形势，也很严重。西边的蒙古诸部尚未统一，察哈尔部

---

① 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宁完我等谨陈兵机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第 16 页。

②③ 《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六月戊午。

林丹汗还依附明朝。蒙古东接后金，南与明朝毗连，在后金与明的军事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努尔哈赤时，虽与喀尔喀五部结盟，诸部表示支持后金反对明朝，但只不过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在后金对明作战时并没有多少支持的行动。只有科尔沁部，因其受察哈尔部威胁，对后金进行过有限的支持。东边的朝鲜，仍与明朝关系密切，在萨尔浒之战中曾派兵支持明朝。尽管后金对朝鲜极力拉拢，朝鲜仍然站在明朝一边，敌视后金。

面对以上内外形势，汉官张弘谟说，后金“家邦未固，亦有不得不回之势”①。皇太极也深感忧虑地说：“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于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② 他清醒地认识到，一旦明、朝鲜、蒙古三方采取联合行动，后金将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二、以稳定求发展的战略方针

皇太极面对危局，审时度势，毅然停止对明战争。他认识到，要实现入主中原与明王朝争夺全国政权的战略目标，决不是短期内单凭武力征服所能达到的，而应先争取时间，求得自身的巩固，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为此，他没有接受一些汉官关于继续对明用兵的建议，也没有继续执行努尔哈赤连续进攻的方针，而是改取“讲和与自固二策”③。天聪三年，他采用汉人高鸿中所献方略，设反间计，使明思宗朱由检中计，错杀袁崇焕。皇太极把和谈的对象转到锦州守将祖大寿及其他边将身上，目的是通过继续和谈，麻痹对方，争取时间，解决面临的一系列亟待

---

① 《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六年正月《张弘谟等请乘时进取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第5页。

② 《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六年六月辛酉。

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天聪二年奏本》。

解决的问题，以稳定内部，徐图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发动大规模的对明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同时，制订了先解决朝鲜和蒙古问题，以解除后顾之忧的战略方针。

在后金与明对峙，辽西战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皇太极采取了一系列内政改革措施：

第一，改善汉人地位，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皇太极认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①，故对过去一系列政策进行了调整。例如，为了解决逃人问题，规定汉官汉民有欲逃跑或暗中与明朝往来者，虽经告发，也概置不论，只要不再犯即不追究。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②。同时，还将从前汉人每13壮丁编为1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的政策，改为按品级每备御给壮丁8人、牛2头，以备役使，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③。政策的调整，使得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的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生产关系的调整，提高了汉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为足食足兵提供了可靠保证。

第二，集中军政大权，保证战争指挥的统一。在上层建筑方面，皇太极着力加强君权和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贝勒的势力。原来八和硕贝勒共理朝政的体制，由三大贝勒轮流掌权，造成八旗并立，军权分散，不能统一指挥，极不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要把军政大权收归汗一人之手，必然要影响诸贝勒的利益。为此，皇太极采纳汉官建议，于天聪三年正月以"向因直（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为由，改为由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代理直（值）月之事"④，以削弱三大贝勒的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甲戌。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

③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

④ 《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正月丁丑。

权力。接着，又制造各种借口，用幽禁、撤职、处罚等手段，相继将威胁汗位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除去。又于天聪五年仿明制设立六部，以贝勒分管部事，从此，一切军政大事即可均由“皇上毅然独断”①。至天聪末年，皇太极已控制了两黄、两蓝、两白六旗，势力深入到镶红旗，结束了八王共治的局面。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皇太极于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称帝，改后金汗国为大清帝国，改元“崇德”，完成了向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转变。他又采纳汉官范文程、宁完我的建议，将八旗在军事、行政、生产诸方面的职能加以分割和转移，改文馆为“内三院”（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使其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咨询和专制机构，从而把皇帝突出到至尊至上的地位。

第三，增设汉军及蒙古八旗，增强军事实力。皇太极即位时，只有单一的满洲八旗，在宁锦之战中已显示出兵力不足。为了限制满洲贵族势力的发展，笼络汉族、蒙古族官员，从天聪五年到崇德七年，又将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领的部队改编建旗，逐渐形成汉军八旗。又于天聪九年征服察哈尔部后，仿照满洲八旗制度组成蒙古八旗。这样，皇太极便成了满、蒙、汉八旗的最高统帅，后金（清）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

第四，发展经济，增强战争的物质基础。辽东本来是比较富庶的地区，但自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黑暗，屯田荒废，农业由盛转衰。女真兴起后，连续几十年的战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皇太极为了巩固统治，适应对明战争的需要，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改革，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又制订“离主条例”，使奴隶得以解放，确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在农业方面，提出以农为本的方针。皇太极说：“厚生之道，全

---

① 《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六年八月《王文奎条陈时事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第20页。

在勤治农桑耳”①。他主张“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②，把发展农业放在治理经济的首位。对缺少耕牛、耕具等生产资料的农民，要给耕牛、耕具；对出猎、工筑占用劳力妨碍农业的，强行停止；对践踏禾苗、破坏农田者，予以法律制裁；随意屠宰牛、马牲畜者，予以处罚；对违农时、误农事者，皆治罪。此外，还重视农业生产的管理，采用汉人先进的耕作技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采取保护和发展的政策。大力发展开矿、冶炼，为生产农具、兵器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与明处于交战状态，互市中断，便利用各种方式开展贸易，用人参、裘皮等土特产品换取汉人的金属、布帛，以解决手工业原料和生活用品的不足。还重视工匠，优待和奖励有贡献的匠人，等等。在商业上减低商税，平抑物价，不准囤积居奇，以刺激商业的发展。

经过对各项制度的改革，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呈现出“国势日昌，地广食足”③ 的景象，为尔后的军事斗争，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三、东征朝鲜

（一）战前形势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它东临日本海，西濒黄海，北面原与明朝毗连，并有水陆交通往来，自后金占领辽、沈等地后，始被截断而成为后金的左翼邻国。

中朝两国自古就是友好邻邦。明朝建立后，李氏朝鲜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万历年间，中朝并肩作战，抵抗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从而更加深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由于朝鲜与明朝有传统的友好关系，并遭受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五，崇德八年六月己卯。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

③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过努尔哈赤的骚扰，所以一直站在明朝一边，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明朝。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明辽东经略杨镐率四路大军进攻后金，朝鲜派军助战。明军惨败，朝将姜弘立率军投降了后金，并受到努尔哈赤的礼待。努尔哈赤致书朝鲜国王，企图乘此迫其归顺，但遭到朝鲜的拒绝。于是，朝鲜对后金的强大密切注视，并注意加强对后金的防御。

朝鲜与明朝陆上的联系虽被后金隔断，但仍保持海上同登、莱的联系，特别是它同意明总兵毛文龙驻守皮岛（今朝鲜之椵岛），收纳和安插辽东“逃人”，并把这看作“小邦（朝鲜）所仰借”①。所以，当后金一再交涉，要求朝鲜将“逃人”送还时，朝鲜却不予理睬，反交还明朝。后金深感来自朝鲜（包括驻守皮岛的明军）的威胁，对朝鲜的敌对行动更加不能容忍。

天命十年（1625 年），朝鲜武将李适、李贵等推翻光海君王位，立李倧为王。后因李倧赏赐不均，引起李适、韩明琏叛乱。次年，李适被擒斩，余党韩润、郑梅等逃入后金，乞求出兵援助。后金新汗皇太极遂乘朝鲜内乱之机，发动了第一次对朝战争。

（二）首次征朝鲜，结兄弟之盟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 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贝勒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统兵 5 万，渡鸭绿江，用兵朝鲜。他授以方略：“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②十四日，后金军攻陷义州，分兵一部向铁山，袭击明毛文龙部。毛文龙部接战失利，还师皮岛。

后金军主力在朝鲜降将姜弘立、韩润引导下，沿朝鲜湾南进，连下铁山、定州、凌汉山城。后金兵进攻凌汉山城时，先喊

---

① 《明史》卷三二〇，《外国一·朝鲜传》。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丙子。

话劝降。城中军民回答："受命守城，当效死。"① 后金兵遂运来云梯，鳞次架城。守城军民虽殊死战斗，矢石如雨，然终因士卒力竭、器械用光而失守。宣川府使奇协战死，定州牧使金搢、行军则有健被俘。

后金的战略目标是先占平壤，进而攻占汉城。阿敏深感兵力不足，遣人回沈阳调后续部队支援。皇太极说："前进事宜，尔等详加审酌，可行则行，慎勿如取广宁时，不进山海关，以致后悔；如不可行，亦勿强行。"② 皇太极一面给阿敏以机动权，一面派蒙古兵前往义州。二十一日，后金3.6万骑兵攻占安州，直逼平壤。城内守军不满万人，向汉城告急。李倧召见大臣商讨对策，有的主张派兵救援，有的主张请求明军来援，但都缓不济急。二十六日，后金军兵临城下，朝鲜守将早已闻风逃遁，城内兵民弃城而逃，后金军遂进占平壤，并于当天渡过大同江，驻营中和（平壤城南）。

朝鲜京城汉城军民听说后金军已席卷大半个朝鲜，一片惊慌。李倧派张晚为都元帅，征诸道兵赴京勤王。张晚奉命以行，至半途闻后金军已攻陷平安诸城，自己亦弃职而逃，致汉城以北更加空虚。李倧遂以大将金尚客留守汉城，自己携眷属逃往江华岛。

二月初，后金兵到达黄州。后金军进抵中和时，李倧曾遣使要求"议和"。后金向朝鲜提出割地、交出毛文龙、借兵1万共同伐明三项条件，其实质是要朝鲜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与后金盟誓。李倧在强敌进逼面前，企图妥协，遭到一些力主抗战大臣的反对。于是他复信阿敏，表示不能与明朝绝交，愿奉行与明和后金都友好的政策。阿敏见李倧未能就范，遂继续进兵至平山、瑞

---

① 〔朝鲜〕李肯诩：《燃黎室记述》二七，《丁卯虏乱》。见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0页。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

兴，施加军事压力，并派刘兴祚率兵去江华岛，胁迫李倧接受议和条件。李倧坚持“退兵而后议和”①，刘兴祚不许。后在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李倧被迫求和。三月初三日，双方在江都西门外筑坛盟誓，朝鲜对后金称“兄弟之国”②。后金基本达到目的，遂留兵一部守义州，撤军回国。四月，后金兵返回沈阳。

后金此次用兵朝鲜，基本上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迫使朝鲜在一定程度上与后金建立关系，逼迫毛文龙退守海岛。后由于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率部众投降后金，使后金初步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再次征朝鲜，订君臣之盟

皇太极第一次对朝鲜用兵，虽迫使朝鲜接受议和条件，但并未使其真正屈服。天聪元年（1627 年）七月，朝鲜迫使后金撤回镇守义州的军队。同年十二月，当后金遣将到朝鲜勒索粮食时，朝鲜只卖给 1000 石，应付了事。向后金所纳贡物，也逐年减少。朝鲜与明朝的关系虽受后金阻遏，但并未完全断绝。李倧坚持与明保持“父子之国”的原则，同意明参将黄龙率军镇守皮岛，保护明朝在朝鲜的利益。

后金深感朝鲜仍未完全归服，企图进一步施加压力。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 年）正月，皇太极以朝鲜不如数奉献贡物为由，致书李倧，并以调遣蒙古 10 万兵马侵扰朝鲜相威胁，六月，又派兵万余自义州浅滩渡江到龙川、定州等地袭掠。朝鲜责其“无故深入，抢掠我边民，攻夺我仓谷，虽以伐岛为名，其实已渝盟矣”③，并将后金兵击退。这更加激怒了皇太极。次年十一月，后金又派使者到朝鲜，索要黄金万两、白金万两、精兵

---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

② 〔朝鲜〕李肯翊：《燃黎室记述》二七，《丁卯虏乱》。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450 页。

③ 〔朝鲜〕李肯翊：《燃黎室记述》二七，《丙子年虏乱丁丑南汉出城》，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469 页。

3 万，并声称“当革兄弟之盟，更结君臣之约”①。朝鲜又未如数奉献。皇太极尤其忌恨朝鲜与明朝的传统友好关系，多次逼迫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往来，但都遭到拒绝，以致后金与朝鲜的关系日趋紧张。

天聪十年（1636 年），后金经过内政改革和经济恢复，力量明显增强。二月，皇太极准备称帝，遣使往朝鲜要其派使臣参加他的登基大典，实际是要李倧向皇太极称臣。对此，朝鲜上下均激烈反对。有的主张拘禁后金使者，有的主张严辞驳斥，有的提出要洗雪以前所受的羞辱。掌令洪翼汉说：“渠苟欲称天子莅大位，惟当自帝其国，号令其俗，何必禀问于我哉！所以渝盟开衅，赫借我口者，将以称于天下曰：‘朝鲜尊我为天子矣’，殿下何面目立于天下乎！”② 李倧采纳了群臣的意见，拒绝遣使。十一月，后金要求朝鲜送回使者，遭到拒绝，皇太极决意再征朝鲜。

朝鲜拒绝遣使称臣之后，即着手备战，“下谕诸道，使忠义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愿从征，期于共济艰难”③。李倧还寄希望于明朝派兵支援，但当时明末农民起义正蓬勃发展，明王朝难以抽出更多军队前往支援。

崇德元年（1636 年）十二月初一日，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沈阳，以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防备西部明军，于次日亲率 12 万大军（满洲八旗 7 万、蒙古兵 3 万、孔耿汉兵 2 万）再征朝鲜。

皇太极先命多尔衮、豪格率左翼满洲三旗、蒙古三旗及蒙古

---

① 〔朝鲜〕李肯翊：《燃黎室记述》二七，《丙子年虏乱丁丑南汉出城》，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469 页。

② 〔朝鲜〕李肯翊：《燃黎室记述》二七，《丙子年虏乱丁丑南汉出城》，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474 页。

③ 〔朝鲜〕李肯翊：《燃黎室记述》二七，《丙子年虏乱丁丑南汉出城》，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476 页。

左翼兵从宽甸路入长山口，又命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300伪装商人，星夜赴汉城监视朝鲜王李倧的行踪，命多铎、岳托率兵千人继其后。初九日，大军踏冰渡过鸭绿江，经义州、定州，向平壤进军。十三日，一支清军抵达平壤，城内兵民一片惊慌，不知所措，该城巡抚逃遁。朝鲜王李倧命判伊金庆征为都检察使，李敏求为副，指挥军民固守江都。十四日，马福塔所率前锋军进抵汉城，并与朝鲜守军接战。此时，朝鲜王李倧已逃往南汉山城。十六日，多铎、岳托等率大军继至，将南汉山城包围。

汉城守兵粮饷甚少，兵力不足，急待四道合兵救援。李倧以俞伯曾为协守使，指挥百官守城堞，“城中受困，而人无畏色”①。清兵围城四五处，处处燃火。多铎又令阿尔津、色勒各率兵力一部设伏，阻击朝鲜援军。二十三日，守城兵出击，清兵死伤甚众。皇太极急派后续部队声援多铎，又令杜勒速携红衣大将军炮等火器赴汉城。二十六日，原州营将权正吉率军来援，城中放炮，举火相应。皇太极率大军渡汉江，包围了南汉山城。城内守兵仅400余人，李倧令各地急速调兵救援。朝鲜一巡抚率兵1.8万人来援，被硕托等击败；另一支援兵约5000人，亦被清军击败。三十日，清军占领汉城。

李倧困守南汉山城，束手待毙。崇德二年正月初，朝鲜全罗道沈总兵、忠清道李总兵所率最后的两支援军，还未到达即被击败。此时，清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所运火炮已矗立在城下。二十二日，江华岛出动30只大船和鸟枪手近千人拒战，也被击败。皇太极乘兵临城下的有利时机，多次致书李倧，令其投降。三十日，李倧接受了皇太极的条件，向清军投降，中止与明朝的同盟关系，而与清结为“君臣之国”，并接受奉大清国正朔、惩办主战大臣、以其子为人质等条件。二月初二日，清军班师回沈阳。

---

① 〔朝鲜〕李肯翊：《燃黎室记述》二七，《丙子年虏乱丁丑南汉山城》，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491页。

皇太极此次对朝鲜用兵，彻底征服了朝鲜，扫清了左翼劲敌，基本上解除了对明用兵的后顾之忧。加之从朝鲜获取了大量物资，增强了军事实力，为全面展开对明战争创造了条件。

（四）双方作战指导的得失

后金（清）两次出征，皆取得胜利，其原因首先是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完备的战略计划，即为实现"西征大计"而战，所以每次都决心迫使朝鲜王就范，不达目的决不收兵。这样，终于使朝鲜由反后金（清）的前线，变成了支持其对明战争的后方。第二，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皇太极两次出兵，都是乘朝鲜不备，以突袭的战法进行的。作战中，充分发挥了八旗劲旅善驰突的特长，使缺乏训练的朝鲜军队无法抵挡。第三，围城打援，迫敌投降。第一次出兵时，朝鲜王李倧逃到江华岛，清军迅速切断其外援，迫其投降。第二次，包围朝鲜京城 40 多天，又备有红衣大炮，完全可以立即攻取，但皇太极仍采取围城打援战法，歼灭了朝鲜诸路援军，迫使李倧称臣。第四，攻城前先劝降。皇太极说："以威慑之，不如以德怀之。"① 清军两次包围朝鲜京城，都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先向朝鲜王李倧劝降，并向守城军民宣谕婴城固守必将造成严重后果，从而瓦解了朝鲜军心民心，致使李倧不得不弃兵器、易朝服，率文武官员投降。第五，充分发挥火炮的威力。第二次征朝鲜，特派携有大量火炮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部参战，又将红衣大炮运往前线，保障了战斗的胜利。例如，江华岛兵多粮足，军民坚守，清军一用红衣大将军炮轰击，守岛兵士"俱各逃溃"②，清军遂顺利登岸。

朝鲜失败的原因，首先是缺乏战争准备。有些有战略眼光的大臣，如金尨国等就预见到后金（清）将入侵朝鲜，并提出了加强国防的建议，但未被李倧采纳。当清军渡过鸭绿江兵临城下时，朝鲜才仓促"征兵"，驱其上阵，安能不败！第二，过分依

---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庚午。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甲子。

赖明朝。朝鲜把“臣事中朝，敬待汉人”① 作为基本国策，事事依赖明朝。后金第一次入朝时，明朝已无力救援，虽派了些部队，但没起什么作用。第二次入朝时，明朝所派监军黄孙茂只在朝鲜呆了十多天，参与谋划，也没起什么作用，后来虽调舟师赴援，但已错过时机。第三，内部不统一，缺乏统一的意志和统一指挥。朝鲜军民和许多爱国将领，坚决抵抗清军的侵略，在兵员不足，既缺乏武器又缺粮饷的条件下，仍奋勇抵抗，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统治阶级内部，“主战”、“主和”两派争执不下，互相掣肘。朝鲜王李倧就是主和派的代表，为了保住李氏江山和身家性命，他两次签字接受了投降条件。因此，朝鲜的最终失败是必然的。

四、统一漠南、漠北蒙古

（一）蒙古各部及其战略地位

1368 年，蒙古贵族建立的元王朝灭亡，其残余势力退据蒙古草原，内部陷入封建割据状态，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明朝人把退据蒙古高原由成吉思汗后裔组成的东部蒙古各部称为鞑靼。鞑靼内部斗争激烈，权臣当政，汗位更迭频繁，并与西部的瓦剌长期争战不已。15 世纪末叶，巴图蒙克即汗位，称达延汗。他击败了瓦剌，并把兀良哈部朵颜、泰宁、福余三卫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对内则打击权臣，统一鞑靼各部，把原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 6 个万户，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察哈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乌梁海（即兀良哈，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和河北承德境）、喀尔喀（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河流域）3 万户，由大汗自统，驻察哈尔万户境内；右翼鄂尔多斯（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土默特（今内蒙古大青山下土默特地区）、永谢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六，仁祖十四年（明崇祯九年）六月庚寅，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554 页。

布（今河北省张家口以北一带）3万户，派济农（副汗）统率，驻鄂尔多斯万户境内。达延汗去世以后，鞑靼部又陷入分裂状态。乌梁海万户被并入其他5万户中，喀尔喀万户分成内外两部分，分别驻牧于大漠南北，其他万户的领地亦有变动。

明清之际，蒙古以大漠为中心，按游牧区域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漠南蒙古，又称内蒙古；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又称额鲁特蒙古。它们各自称雄，独据一方。漠南蒙古东至今吉林，西到贺兰山，南邻长城，北据瀚海。由于漠南蒙古东与后金（清）接壤，西与明朝毗连，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于是成为后金（清）与明朝的争夺对象。皇太极认为，要与明朝抗争，入主中原，就必须使漠南蒙古归服后金，以断明朝之左臂。明朝则认为，要抵挡日益强盛的后金（清），也必须紧紧控制蒙古，遏制后金（清）。

漠南蒙古诸部中，察哈尔部最为强大，其首领林丹汗在明朝支持下，凭借所掌握的八大营二十四部的实力，对周围诸部肆意侵扰，企图统一蒙古。但他深感力量不足，常求助于明朝。其他诸部被林丹汗杀掠，需要寻求外力庇护。因此，在漠南蒙古内部便形成两股军事政治势力：一是以林丹汗为首，主张投靠明朝，取得明朝支持，控制和统治漠南蒙古诸部；一是其他各部的贵族势力，企图取得后金（清）的支持，摆脱林丹汗的控制。

明朝对林丹汗极力支持，每年赏赐大量岁币①，约定共同抵抗后金。魏源说："明人思用东部插汉小王子（即察哈尔），欲以敌大清"②。察哈尔部的强盛以及明朝与林丹汗的联盟，对后金构成严重威胁。

后金则对漠南蒙古各部实行保护和抚绥政策。早在努尔哈赤时，后金就同科尔沁、扎鲁特等部联姻通好，建立军事同盟。天

---

① 岁币：指明朝每年以赏赐名义给蒙古封建贵族的财物和金钱。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6页。

命九年（明天启四年，1624 年），科尔沁、杜尔伯特等部归顺后金。皇太极则采取“恩威并用”和笼络的政策，用给蒙古各部封建主封官赐爵、保留原有封建特权、赐以财物等手段，极力争取那些愿意归顺或动摇观望的蒙古首领；对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则诉诸武力，双方的矛盾日趋尖锐，时刻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

（二）三征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 年）正月，皇太极刚执政不久，即得知林丹汗兴兵攻打喀尔喀诸部的消息，认为这是利用矛盾向蒙古开展政治攻势的大好时机。他立即致书奈曼部、敖汉部首领，示以友好之意。不久，奈曼、敖汉终因受不了察哈尔的侵扰而归服后金。天聪二年初，喀喇沁部、鄂尔多斯、阿巴亥等部，也因不堪忍受林丹汗的蹂躏而组成联军，于土默特部赵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与察哈尔部激战，消灭林丹汗军 4 万多人。联军方面损失也很大。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喀喇沁部致书皇太极，请求出兵援救。皇太极认为形势对后金十分有利，表示同意出兵，但为了稳妥起见，他要求喀喇沁等部派人前来讨论大举的方略。七月，喀喇沁部派遣喇嘛四人，率 530 人的代表团到达沈阳，达成共同征讨林丹汗的协议。

九月，皇太极率兵亲征察哈尔，并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命科尔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自率军到约定地域集结。接着，皇太极率领满、蒙诸路大军西征，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绰洛郭尔连续攻取席尔哈、席伯图、英汤图等地，大败察哈尔兵，并派兵追击至兴安岭。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 年）三月，皇太极决定会同归服的蒙古诸部第二次西征林丹汗。四月初一日，皇太极以贝勒阿巴泰、杜度及额驸扬古利等为留守，亲自率兵出征。次日，渡辽河，正值水涨，他与诸贝勒乘舟渡河，辎重、人马皆浮水而过。经都尔鼻西拉木伦河（今内蒙古沙拉木伦河）、昭乌达等地时，沿途蒙古各贝勒皆率所部兵来会，力量不断增强。十四日，军至博罗额尔吉，派图鲁什劳萨率精兵 500 为先遣队前行。十八

日，大军至哈纳崖，镶黄旗内有两个蒙古人逃往察哈尔，向林丹汗报告了后金军西征的计划。林丹汗大惧，立即率众西奔，并遣人赴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驱逐百姓和牲畜，延长了后金军一个月的进军路程。

皇太极率军于大儿湖之公古里河驻扎，与贝勒大臣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他说："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撄我军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① 在缺乏粮饷的情况下，皇太极令军队进行休整，并颁布纪律："凡大军所至，有拒敌败走者杀之，不拒敌者勿杀，勿离散人夫妇，勿淫人妇女，有离人夫妇及淫妇女者死"②。还颁布了战场纪律："凡遇敌临阵，非奉朕旨，勿得轻进，其应进之处，俟朕指示。若不遵指示，擅自退缩者，贝勒夺其部众，军士处死，妻子没为奴。"③ 又在布龙图布喇克地方召集大贝勒、贝勒及满洲、蒙古、汉官，讨论是暂时退兵还是继续进军。最后决定："先取蒙古部民，复入明地，以图大事。"④ 经过整顿和思想动员，统一了思想，为投入战斗做好了准备。

五月二十三日，大军至木鲁哈喇克沁地方，即分兵两路前进：一路为左翼，由阿济格率领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 1 万，进攻大同、宣府一带察哈尔属地；一路为右翼，由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率兵 2 万，进取归化城、河套一带，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率主力继续向前推进。在先锋部队的侦察和带领下，两翼部队入博多克隘口。大军急速前进，于二十七日进抵黄河木纳汉山，皇太极亦于同日进驻归化。林丹汗闻讯，即携部民牲畜财物继续西逃。后金军停止追击，经宣府、张家口边外抢掠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一一，天聪六年四月庚寅。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一一，天聪六年四月乙未。

③ 《清太宗实录》卷一一，天聪六年五月癸卯。

④ 《清太宗实录》卷一一，天聪六年五月戊申。

一番，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

皇太极此次亲征，沉重打击了察哈尔封建贵族势力，迫使林丹汗弃本土西逃青海，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林丹汗所部在西逃的过程中，离散者十之七八，加上病死者，所剩无几，力量大大削弱。皇太极为了加强对蒙古的控制，次年八月遣使到蒙古各部颁布法律，正式建立起他们对后金的从属关系，密切相互往来。

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二月二十六日，皇太极命贝勒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率兵万人再征察哈尔。半年前，林丹汗逃至青海大草滩病死，其部将在后金招抚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归降，只有林丹汗之妻及其子额哲不知去向。后金此次出兵主要是追寻他们二人。军至西喇珠尔格地方，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率1500户来降，告知额哲的驻地。四月二十日，大军渡过黄河至托里图地方，额哲率部民1000户归降。九月，后金军旋师回到沈阳。从此，察哈尔归附。次年三月，漠南蒙古16个部49个封建领主在盛京集会，尊奉皇太极为共主，上博克达·彻辰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整个漠南蒙古诸部皆臣服于后金（清）。

（三）以招抚为主，统一漠北蒙古

漠北喀尔喀蒙古，因分居于喀尔喀河流域而得名。喀尔喀蒙古原是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汗时的6个万户之一，共12部。其中内喀尔喀5部，居喀尔喀河以东，达延汗封授其第五子阿尔楚博罗特；外喀尔喀7部，居喀尔喀河西，封授其幼子格埒森扎·札赉尔。达延汗死后，阿尔楚博罗特率众越瀚海南徙，清初编旗，属内札萨克。当达延汗诸子率众南徙时，“独其季格埒森扎·札赉尔珲台吉留故土，号所部曰喀尔喀，析众万余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①，称“喀尔喀·多伦·和硕”，即喀尔喀七旗或喀尔喀七部之意。明末清初之际，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汗、札萨克图

①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

汗和车臣汗三部。土谢图汗部据土拉河流域，札萨克图汗部占杭爱山西麓，车臣汗部占克鲁伦河流域。喀尔喀蒙古的游牧地，东起黑龙江呼伦贝尔，南至瀚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至俄罗斯，"东西延袤五千里，南北三千里"①。

喀尔喀蒙古很早即与后金建立了联系。后金统一漠南蒙古，对喀尔喀蒙古影响很大，皇太极趁此有利时机，加强对漠南蒙古的争取和招抚。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喀尔喀车臣汗硕垒偕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致书皇太极与后金通好。次年二月，皇太极派使臣去喀尔喀三部，劝其遣使前来谈判"讲和事宜"。同年十一月，车臣汗遣使至盛京向已经称帝的大清皇帝皇太极朝贡。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喀尔喀三部遣使来朝，皇太极规定喀尔喀三部每年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②。从此，喀尔喀正式臣属于清朝。

（四）统一蒙古的意义及胜利原因

皇太极统一蒙古各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继东征朝鲜解除了左翼威胁之后，又解除了右翼威胁，使后金从根本上扭转了"四境逼处"的被围态势，从战略上完成了对明朝的半月形包围，同时也为迂回袭扰明朝腹地开辟了通路。天聪八年（1634年）十月，皇太极征察哈尔回师后在其父努尔哈赤灵前祭告说："臣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乃者，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禄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附者半，后察哈尔汗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③ 这是皇太极对统一蒙古业绩及其意义的总结。

---

①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清同治六年刊本。

② 《皇朝开国方略》卷二三。

③ 《清太宗实录》卷二〇，天聪八年十月庚戌。

第二，增强了对明作战的力量。皇太极统一蒙古后，扩大了兵源，仿照满洲八旗兵制，编立蒙古八旗。天聪九年（1635年），编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1.6万多名，除盲人和残废者外，凡年在60岁以下、18岁以上的都被编入。从此以后，蒙古八旗作为八旗劲旅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对明作战的生力军。

后金（清）对居住分散、地域辽阔的蒙古族之所以能够顺利而迅速地征服，主要是把军事征服和招抚劝降有机地结合起来，迫使其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对较弱的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主要是以招抚为主，经过遣使、书信往来和谈判，只要对方表明态度，接受后金（清）的统治，不再与明朝来往，不但不再诉诸武力，而且给予恩惠。对力量比较强大的察哈尔部，则主要使用武力，直到将其武装力量全部消灭为止。这就是所谓"慑之以兵，怀之以德"① 的政策。其次，善于利用矛盾，采取恰当的政策和策略。蒙古各部族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特别是林丹汗对科尔沁部进行欺凌和巧取豪夺，引起了该部部民和封建主的强烈不满。皇太极认为："以力服人，不如令人中心悦服之为贵也。"②蒙古各部每次来朝，皇太极都"厚加恩赏"，从而争取了蒙古各部。第三，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兵力进剿林丹汗，得到众多部民的支持。第四，皇太极还采取保护喇嘛教、联姻、封爵等手段，这对缓和矛盾、争取蒙古各方的支持，也收到较好效果。

五、招抚黑龙江流域诸部

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居住着鄂温克、达呼尔、鄂伦春等族。这些民族交错杂居，过着游猎生活。由于生活习惯大同小异，言语相近，因而统称为索伦部和萨哈尔察部。索伦部居住最远，北达外兴安岭，东北至精奇里江上游，西接喀尔喀蒙古。萨哈尔察

---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二〇，天聪八年十月庚戌。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三〇，崇德元年七月丙辰。

部居住在黑龙江城（今黑龙江黑河市）附近。此外，在黑龙江城东南和乌鲁苏河一带还居住着虎尔哈部。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部、萨哈尔察部、虎尔哈部，是三个不同的部族集团。

魏源说："至黑龙江等部，则天命以前未尝征，征之自太宗天聪九年始。"① 此指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努尔哈赤在世时，已经征服和兼并了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并将这些地区的各部族置于后金的统辖之下。

皇太极继位以后，为了稳固后方，对收复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十分重视，并采取"抚慰"政策。他强调满族与黑龙江流域各民族有着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在向黑龙江流域发展时，应向当地人民说明，"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以便用民族感情进行拉拢，使他们自愿地归附后金；又规定，对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②，并以此作为对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基本政策。

在后金和平招抚政策的感召下，黑龙江流域各部族不断前来归附。天聪八年（1634 年）十二月初十日，皇太极命管步兵的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木什喀率章京 41 员、兵士 2500 人，往征黑龙江地方之虎尔哈部。后金军以来朝贡的虎尔哈部夏姓武因屯长喀拜、库尔木图屯长郭尔敦等人为向导，经由科尔沁所属锡伯族的居地绰尔门（即绰尔城，今黑龙江泰来北）北出，直抵黑龙江瑷珲城附近。次年四月，霸奇兰、萨木什喀派白奇及兵部启心郎额色黑、伊木布专程到盛京（今沈阳）报捷：收服虎尔哈部后编户壮丁 2483 人，连同老弱妇幼共 7302 人，收缴大量马、牛、毛皮等。自此，虎尔哈部归附后金。

索伦部部长博穆博果尔于崇德二年、三年两次到盛京朝贡，但他第二次朝贡返回不久，即于崇德四年发动叛乱。皇太极不得不诉诸武力。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第 8 页。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二一，天聪八年十二月壬辰。

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十一月初八日，皇太极遣索海、萨木什喀、穆成格等率军北征索伦部。大军以萨木什喀为主将，伊孙为副将，率左翼兵；以索海为主将，叶克书为副将，率右翼兵，分路进击，约定 40 天后到兀蓝海伦屯会师。清军于次年三月抵呼玛尔河时，博穆博果尔的兵力已集结于铎陈、阿萨津、雅克萨（此三城皆在今黑龙江呼玛以北的江北岸，今属俄罗斯）、乌库尔、多锦（此二城在呼玛西北的黑龙江南岸）一带，拒不投降。清军首先指向雅克萨，举火攻城，激战而克，遂转兵攻乌库尔城。此时，城内有达尔布尼、阿恰尔等所领七屯兵民，坚守不降。清军猛攻一天，终于占领该城。接着，清军又进攻铎陈城，一天未下，次日正准备进攻时，博穆博果尔率兵 6000 人前来增援。清军主将索海、萨木什喀下令撤兵，并于铎陈城至阿里兰之间设伏。博穆博果尔率兵至此，被清军击败，除死伤者外，另有 400 人被俘。博穆博果尔不甘失败，急调铎陈、阿萨津二城兵 400 人阻击清军，又被击败。此役，清军共俘获 6956 人，并得马 424 匹、牛 704 头、各种毛皮 5400 多张，攻占了铎陈、阿萨津等四城及果博尔、博和里等七屯，博穆博果尔率余众逃跑。四月，清军班师回到沈阳。

为了追歼博穆博果尔，皇太极又于当年七月命梅勒章京席特库、济席哈等率八旗兵 40 人并征调蒙古兵 350 人，再征索伦部。皇太极令清军迂回蒙古北边东进，同时扬言将发大军牧马于黑龙江畔，以诱博穆博果尔北遁。清军以益尔公固、图哈纳、绰隆为向导，经过近 3 个月的追击，终于在齐洛台（今俄罗斯赤塔）将博穆博果尔及其妻子家属等共 956 人擒获。崇德六年五月，索伦部蒙塞尔瓦代的儿子巴尔达奇率部来归，又有 1471 人降清。至此，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已全部收复，“辽、金部落咸并于满洲矣”①。

皇太极继承其父努尔哈赤的事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用招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第 8 页。

抚和武力征服两种方式，统一了黑龙江流域。崇德七年，皇太极说："……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①

清朝统一黑龙江流域以后，将各族居民编入旗籍，其壮勇之男丁披甲当兵，成为八旗兵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在各村、屯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负责征收赋税和行政管理。这就使清朝的后方得以巩固，对于巩固东北边防和支持对明朝的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节　皇太极迂回袭扰残毁明朝腹地

一、对明军事斗争的方针

皇太极刚即位时，曾仓促率兵进攻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结果败归。这使他认识到，不具备一定的力量，不采取高明的战略和策略，宁锦防线是难以突破的，而打开山海关，入主中原更无从谈起。经过数年的内政改革和东征朝鲜、西统一蒙古、北底定黑龙江流域的军事斗争，政治上趋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军事力量大大增强，整个形势不断朝着有利于后金（清）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探讨和调整对明朝的战略和策略。为了涣散和麻痹明朝，皇太极致书明廷说："我皇考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而入处汉地，易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欲画山海关以西汉人制之，辽河以东我制之，满汉各自为国。故军未入关而返，原无争主中原之心也。"② 实际上，皇太极一天也没有放弃入主中原与明王朝争夺全国政权的战略目标。

皇太极于天聪三年、四年、七年曾就攻明问题，多次与诸贝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一，崇德七年六月辛丑。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第23页。

勒、大臣、汉官乃至归服的蒙古贵族进行商讨。贝勒济尔哈朗认为："明乃吾敌国，宜取其近京数城，久驻伺隙，别屯兵山海以东、锦州以西，扰其耕获，使不得休息。复分兵半于山海关前立营，半绕入关后，内外夹攻，敌必绌。"① 贝勒多尔衮也说："入边围困燕京（今北京），截其援兵，残毁其屯堡诸物，为久驻之计，可坐而待其毙也。" 贝勒多铎则提出："若止攻山海关外之城，有如射覆，岂可必得？夫攻山海关以外之城，与攻燕京、通州（今属北京市）之城，名虽不同，劳苦则一。臣愚以为，宜直入长城，庶可餍士卒之心，亦可合皇上久长之计。"② 归附后金的喀喇沁蒙古台吉布尔噶向皇太极介绍了入明边的情况，并表示愿与后金联兵，直取京师。这对皇太极制订对明作战方略都有直接影响。

鉴于明宁锦防线防守坚固，海上全由明军控制，皇太极认为，只有越过西北蒙古的丘陵、河谷地区及长城各隘口等明军防守薄弱的地区，才能进攻明朝腹地。他说："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③ 于是，确定了避关外，扰关内，迂回袭扰、残毁明朝腹地，逐步削弱明朝军事实力，伺机与之决战的作战方针。

二、第一次迂回入边，突袭京师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 年）十月，皇太极曾率 10 万大军，对明朝腹地进行过试探性远征。大军自盛京出发，避开宁远、锦州，分道自辽北西进，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到老哈河分兵前进。二十六日，济尔哈朗、岳托、阿巴泰、阿济格等各

---

① 《清史列传》卷二，《济尔哈朗传》，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60～61 页。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一四，天聪七年六月戊寅。

③ 《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二月甲寅。

路军毁边墙分道自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相继入塞，前往遵化与皇太极、代善会师，十一月初后金兵攻下遵化，明巡抚王元雅兵败自刭。皇太极令参将英俄尔岱守遵化，自率后金兵直指北京。

败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明廷除加强京城、通州（今属北京市）的兵力，增强马兰关、三屯营的防御外，又令各地驻军赴京勤王。后金兵则迅速逾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三河，并在顺义、通州附近击败明宣（府）、大（同）援兵后，夺占顺义、通州。明蓟辽督师袁崇焕率军增援，经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丰润、玉田，至马伸桥（今蓟县东）与后金兵一部遭遇。后金兵不战西进，直犯京师，于二十日至德胜门，营于南海子。袁崇焕追至左安门外扎营，后于沙涡门、左安门败后金兵，又追击东撤的后金兵至北运河。皇太极于宁远两次败于袁崇焕，对其早已恨之入骨，此次又被战败，深感已处于有来无回之险境，遂生反间计诬陷袁崇焕。崇祯帝受阉党奸细左右，昏庸不察，竟将袁崇焕逮捕下狱。明总兵祖大寿率部东返锦州。后金兵自京师后撤，十二月初一日南向攻克良乡，分兵一部趋固安抢掠。十六日得崇祯帝将袁崇焕下狱的消息后，皇太极立即回师，在卢沟桥、永定门先后歼灭明副将申甫、总兵满桂、孙祖寿部。后金诸将企图乘势攻城，但皇太极认为，明王朝“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①，遂撤兵东返。

后金兵沿途抢掠蓟州、沙河地区，于次年正月攻占永平、滦州（今河北滦县）、迁安，企图从背后进攻山海关。此时，明各路援军已至，孙承宗已抵山海关督师，后金兵有受东西两路明军夹击的危险。于是，皇太极令阿敏率兵5000人守永平、滦州、迁安等城，自率大军班师。四月，明军开始反攻，相继收复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阿敏惧战，率军逃回沈阳。

---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太宗伐明》，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此役是皇太极迂回入关与明作战的初步尝试。后金的最大战果在于成功地施用反间计，除掉劲敌袁崇焕，对明军起了一定的削弱和破坏作用。皇太极还目睹了明朝关内军备废弛、京师防务薄弱等情况，增强了最终战胜明朝夺取全国政权的雄心。对明朝来说，腹心地区防务空虚和政治上的腐朽已暴露无遗，军心民心受到严重冲击，从此已不可避免地处于后金的严重威胁之下。

皇太极在作战指导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很好地运用了避实击虚、远程奔袭的战法。无论是沿途袭扰还是攻城，皆以所向披靡之势进行突袭，或致书和谈劝降，欲战则战，欲走则走，始终稳操战场上的主动权，表现了惊人的胆略。特别是在袁崇焕赴援京师、战局对后金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皇太极巧施反间计，表现了他过人的智慧。

三、大凌河之战

孙承宗再督蓟辽，收复遵化等关内四城之后，即着手重整关外防务，加固当初由他和袁崇焕共同经营的宁锦防线。崇祯四年（1631 年）正月，孙承宗出关东巡，决定建大凌河城及外围据点。该城位于锦州东 30 多里，是捍卫宁锦、进逼后金的前哨阵地。七月，总兵祖大寿、何可刚率兵正式动工兴建。

皇太极得到明军再次修筑大凌河城的消息，深感不安，下令说："沈阳、辽东之地，原非我有，乃天所赐也。今不事征讨，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① 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行，第二天渡过辽河，召集诸将，宣布出兵征明。八月初一日，大军自旧辽阳城出发，分兵两路：一路由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等率兵 2 万，经义州（今辽宁义县），屯驻于锦州与大凌河之间；一路由皇太极亲率主力，经白土场，趋广宁大道，约定初六日会于大凌

① 《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七月庚子。

河城下。同时，将新铸红衣大炮40位运往大凌河。

驻大凌河城明军，原有官兵1.6万余名，后派出买战马及守宁远的共2200人，实有官兵1.4万余人，夫役商贾约1万多人，全城共计3万余人①。守将祖大寿所部皆精锐，配备大炮火器，防守甚坚，但该城动工兴建只有半个多月，加之辽东巡抚丘禾嘉在动工后又自作主张，同时动工修复右屯城，分散了人力物力，结果大凌河城雉堞仅修完一半，不得不仓促闭门拒战。

八月初六日，后金军进抵大凌河城下。皇太极汲取了宁、锦两次战败的教训，不再攻坚，而是改用围城打援的战法。他说："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② 遂将满洲八旗按方位部署：左翼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围城之东北至正南；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围城之西北至西南。蒙古各部则填补各结合部，汉军总兵佟养性携红衣大炮营于锦州大道，担负阻击任务。又环城掘壕、筑堑：第一道壕深宽各丈许，第二道壕宽5尺、深7.5尺，再于距壕5丈远的地方筑墙。各旗还在自己营地周围挖掘一道深宽各5尺的拦马小壕。于是，大凌河城与外界完全隔绝。

后金军围城不久，祖大寿派小股部队出城诱敌，后金将领图赖率军迎战，两蓝旗进抵城下时，受明军火炮轰击，死伤颇众。此后，后金军不再轻易出战。八月十六日，松山明军出动2000人赴援，被后金阿山劳、萨图鲁什等军击败。二十六日，辽东巡抚丘禾嘉与总兵吴襄、宋伟合兵6000人赴援，与后金兵大战于长山（大凌河城东南）、小凌河间，后被逐回锦州。九月，锦州明军4万人再次增援，以解祖大寿围。明军一过小凌河，即掘壕

---

① 《明兵部呈为王道直题报大凌河城之役明军损失情形本》（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十九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② 《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八月戊申。

布阵，环列枪炮，严阵以待。后金军亦列车盾，两军对峙。皇太极见明军森严壁垒，不敢轻战，决定暂时退军，待明军起行前进时乘隙进击。明军见后金撤退，果然直趋大凌河，阵于长山口。皇太极出兵2万突击，另以一部精锐埋伏于明军归路。明军火器齐发，声震天地，铅子如雹。后金兵以车盾在前，攻击近敌，然后纵骑兵冲锋，矢如雨下，总兵吴襄等逃奔，明军遂溃。一天之内，皇太极击溃明援军4万，俘明监军张春以下将官30多人。

大凌河城被围两个月，援兵不至，城内弹尽粮绝，守城兵士宰战马充饥，战马也因无草料而倒毙。城内居民更是“炊骨析骸，古所没有”①。皇太极乘机连续发动政治攻势。他先写信向祖大寿劝降，又令明降将20多人写信劝降，都被祖大寿严词拒绝。十月中旬，“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大寿等力竭计穷”②。二十五日，祖大寿无奈，遂以其子祖可法为人质，经过与后金反复谈判，于二十八日献城投降，旋被释还锦州。十一月初九日，皇太极下令将大凌河城摧毁，携大小火炮3500位等战利品，凯旋回沈阳。

大凌河围困战，长达三个月，以后金获得全胜而告结束。此役歼灭了明在关外的精锐，打击了明军的士气。后金取胜的主要原因，在于接受了攻打宁、锦的教训，改取围城打援战法，避开明军炮火，充分发挥八旗兵善于野战的特点。第二，战斗中首次使用火器攻城，对取胜起了重要作用。后金兵先发红衣大炮攻于子章台，守台明军不支出降，“其余各台，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③。从此以后，后金兵凡行军、攻城，必携大炮。

---

① 《明兵部呈为王道直题报大凌河城之役明军损失情形本》（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十九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②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天聪五年十月甲寅。

③ 《清太宗实录》卷一〇，天聪五年十月壬子。

四、第二次迂回入边，袭扰宣（府）、大（同）

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 年）五月，皇太极再次与诸贝勒大臣讨论“征明当由何进兵”的问题，最后决定：“今我大军宜直抵宣（今河北宣化）、大（今山西大同）”①。五月二十二日，皇太极率大军西进，渡辽河，经都尔鼻，与蒙古诸军会于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七月初，后金兵分四路南下：一路由德格类率领，进独石口（今河北沽源南），会主力军于山西朔州；一路由代善同其子萨哈廉、硕托率领，入得胜堡（今山西大同北），经大同趋朔州；一路由阿济格、多尔衮率领入龙门口（今河北赤城东之龙门所），与主力军会于宣府，趋大同；皇太极一路为主力，从尚方堡（今河北万全县东之膳房堡）经宣府趋应州（今山西应县），指向大同。各路于七月初八日入边。其目的是掠夺财富，削弱明朝军事实力，并侦探北部边防虚实。

明朝在宣、大一带防务空虚，后金兵“四路纷来，至墙下而始觉”②，守卫的地方官和带兵的将领不战先逃。后金主力部队攻大同不克，转兵攻宣府、阳和等城，皆未克。八月，后金兵攻占代州、应州、朔州、灵丘、崞县、忻州（今山西忻县）。明廷唯恐后金兵东进，京师戒严，令总兵官陈洪范守居庸关，保定都御史丁魁楚等守紫荆关、雁门关；又调总兵吴襄、尤世威等援边。皇太极致书明阳和总兵张宗衡和大同总兵曹文诏劝降，皆遭拒绝。闰八月，后金军攻下万全左卫（今河北万全西），斩明守备常汝忠，歼灭明军近千人。初七日，皇太极率军出尚方堡班师。

皇太极此次亲征，再次证明其迂回作战的战法是可取的。后金军深入至河北西北部及山西北部，纵深至山西中部，攻围大小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一八，天聪八年五月丙申。

②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明档》第 201 号，卷第 8 号。

镇、台、堡50余座，“蹂躏宣、大逾五旬，杀掠无算”①，给宣大地区造成极大破坏，同时也侦知明朝北部边防实情，基本达到了预定目的。

五、第三次迂回入边，进袭京畿地区

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此时，后金已初步征服朝鲜，统一蒙古大部，加之明朝国力空虚，农民起义蓬勃发展，对再次攻明十分有利。五月，皇太极决意出征，并规定若诸将意见不一，“宜听武英郡王（阿济格）剖断”；又教导诸将说：“汉人若出城，野战破之甚易”②。六月，阿济格率大军入喜峰口，受到巡关御史王肇坤的阻击。清军初战，阿山率兵攻下长安岭堡、雕鹗堡，击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万余。明廷闻悉后，京师戒严，令中军李国辅等各守要隘。清军避开明军严密防守的隘口，经延庆直入居庸关、昌平，总兵曹丕昌投降，主事王桂、赵悦，太监王希忠等皆被杀。清军驻营沙河、清河，掠西山，继续南下。崇祯帝急调山东、山西、大同、保定及关外等处明兵5万余人入援京师，由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各镇援兵。但清军按照皇太极的谕令，此次出兵不是为了占据城池，而以掠夺和削弱明军实力为目的，所以未在沙河、清河久驻，于七月初九日引兵良乡，转攻宝坻、定兴、涿州、怀柔、密云等地。此次清军入边，先后克12城，大小战斗56次皆捷，获人畜17.9万。九月初一日，清军携大批人畜、物资，经冷口（今河北迁安东北）东返。

在清兵攻掠城池时，受到汉族军民的强烈抵抗。如入居庸关时，当地军民在大同总兵王朴驰援下，斩杀清兵1104人，俘143人。明朝统治集团虽然腐败，但也有忠义之士奋起抵抗，如

---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二九，崇德元年五月庚午。

辞官居家的前光禄寺少卿鹿善继，在清兵攻定兴时，与知州薛一鄂坚守城池 6 天，最后城破身死。

六、第四次迂回入边，席卷冀鲁

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 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托率军第四次迂回入关攻明。此次作战，皇太极企图使迂回关内和进攻宁、锦相配合，打通山海关通道。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令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豪格、阿巴泰为副，统左翼兵，由青山关（今河北抚宁北 27 公里）入边；以岳托为扬武大将军，杜度为副，统右翼兵，从墙子岭口（今北京密云东 35 公里）入边。约定两路兵于通州会合后南下。九月，两路清军按原定计划入边，经迁安、丰润，抵通州。同时，皇太极亲统大军向山海关进发，以牵制明军。他说："朕亲率大军，两至宁、锦等处，原非为攻取城池也。盖欲牵制彼兵，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①

两路清军于通州会师后，沿京师城北迂回至涿州，又分兵八路，以宽正面、大纵深之势南下：东路沿运河，西路沿太行山，其余六路分置其间。

明廷闻悉，举朝震惊。崇祯帝朱由检急调各地兵马勤王：征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命宣、大总督卢象升率总兵杨国柱、虎大威防易州方向，出其左；移青州、登州、莱州、天津之兵，出其右；檄总兵刘泽清以山东兵遏其前；总督高起潜部为机动部队。十月，高起潜的部下刘伯禄于卢沟桥战败后，崇祯帝遂命诸大臣分守都门，又令孙传庭与总督洪承畴合兵 15 万俱出潼关入援。但是，清军未攻北京而挥师南下。十一月初九日，清军自涿州围高阳。已辞官告老还乡的原明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督率家人和全城人登城守御，誓死不降。十二日城破，孙承宗被

① 《清太宗实录》卷四六，崇德四年五月己巳。

俘，不屈而死，其子孙共 19 人"皆力战从死"①。至十二月底，清军攻下北京附近的 48 城镇，进抵真定（今河北正定）、广平（今河北永年）、大名及直隶（约今河北省）东南部地区，肆意抢掠。清军一部由涞水、新城、定兴出兵，分别向易州、雄县、安肃（今河北徐水）进攻。明督师卢象升退据保定，分兵出御，与清兵先战于庆都（今河北望都），又战于巨鹿贾庄，但因寡不敌众，战败遇害。

崇德四年一月，清兵自顺德（今河北邢台市）、大名转兵山东。明兵部尚书杨嗣昌判断错误，自济南调兵援德州，造成济南空虚。结果，多尔衮却故意绕开德州，经临清、高唐等地直指济南。清兵攻下济南后，明巡按御史宋学朱、布政使张秉文等被杀，德王被执，济南被焚毁一空（史称积尸 13 万）。接着，清兵又攻下东平、莘县、馆陶、阳谷、寿张、兖州。明总督孙传庭自晋州（今河北晋县），大学士杨嗣昌自登州、莱州，祖大寿自青州，安庆巡抚史可法自徐州声援。清兵回师北上，掠沧州、天津后于三月取道青山口（今河北迁西东北）返回沈阳。

清兵此次迂回入关，席卷直隶大部和山东西部，共计攻克 1 府、3 州、55 县、2 关，擒明亲王 1、郡王 1、将军 1，杀郡王 5、将军 6、总督 2，并掠夺大批人畜、物资。

在 10 多年的时间内，后金（清）四次迂回入边和夺占海岛的军事斗争，是在明宁锦防线难以突破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这些作战，消耗了明朝的有生力量，破坏了明朝的战争潜力，并掠取大批明朝军事装备以充实自己，还侦知到明军的虚实，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从而鼓舞了清军士气，为进一步与明军决战创造了物质和精神条件。

---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四，《孙承宗殉节》，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45 页。

七、夺占旅顺及辽东沿海岛屿

辽东半岛及其周围岛屿，在后金（清）与明朝的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辽东半岛及附近的广鹿岛（今属辽宁长海县）、石城岛（今属辽宁庄河县）等岛屿，东渡黄海可达朝鲜，西隔渤海、辽东湾与京津、辽西走廊相望，向南通过渤海海峡和庙岛列岛可直达山东登、莱。努尔哈赤于天命年间占领辽东半岛金、复（治今辽宁瓦房店市西北复州城）、海（治今辽宁海城市）、盖（治今辽宁盖州市）四州及附近小岛后，明朝的防务只得后撤至旅大半岛一个狭窄地带。按照熊廷弼“三方布置策”的积极防御战略计划，明军除在陆上坚守广宁（今辽宁北镇）、山海关之外，又创立了以山东登、莱为中心，西北联络天津水师，东北与朝鲜联为一体的海上防线。因此，后金（清）要威胁明朝京师，不仅要冲破广宁到山海关的陆上防线，还要冲破这条海上防线。

（一）旅顺之战

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年），后金发兵进攻旅顺。旅顺隶属金州，“东联海（州）、盖（州），南近登（州）、莱（州），为兵争之地”①。努尔哈赤时一度与明争夺该地，但未能攻下。皇太极即位，特别是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先后渡海降清后，后金“得将、得兵、得船”②，具备了夺占旅顺的条件。参将宁完我、游击佟整及周一元等人也先后上疏，提出攻取旅顺的建议。于是，皇太极于当年六月十九日遣贝勒岳托、德格类率军万余攻取旅顺。七月初一日，后金先头部队进抵旅顺外围，开始攻城，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尚可喜率兵助攻。明守将黄龙指挥发西洋大炮，又掷火罐、发矢石，双方伤亡很大。岳托乘明兵撤入城内休

---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毛帅东江》。

② 《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七年四月十□《佟整请亟夺水路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第61页。

整，下令发起总攻：一部兵力攻城东北角，一部兵力从北部渡海暗袭，其余在城下攻城。此时，明军火器、火药已用完，黄龙一面派人渡海去登州求援，一面率军固守。偷渡的后金兵于蔡家口登岸，杀向城内。在城东北角进攻的后金兵进展迅速，很快进抵城门前。城内明兵婴城固守，并派出一支部队出城拼杀，因伤亡很大，被迫撤回。双方又于城墙上和街巷里展开战斗，最后明官兵全部阵亡，黄龙被围自刎。初七日，后金军攻占旅顺。

（二）皮岛之战

明天启元年（1621 年），明辽东巡抚王化贞沿辽河摆开一线防御，并派游击毛文龙率兵 220 余人自广宁进河东，企图阻挡后金兵西进。毛文龙从三岔河口乘船南走，先后恢复了被后金占领的猪岛、广鹿岛、石城岛、鹿岛等岛屿，并袭占镇江（今辽宁丹东市东北）。不久，镇江复被后金攻占，毛文龙逃往朝鲜，后据守皮岛等地。

皮岛，又称稷岛、南海岛，位于西朝鲜湾内，北面与铁山半岛隔海相望，西、西南面与中国辽东沿海岛屿的海上联系极为方便，因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文龙被明廷授为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他以皮岛为基地，吸收大批逃难的辽民入伍，队伍很快发展到 2 万多人。明朝控制了皮岛到旅顺之间的沿海岛屿，对后金的威胁很大。但是，明廷对辽东海上防务不予重视，“三方布置策”未能贯彻执行，对毛文龙也很少支持，认为“文龙灭敌则不足，牵敌则有余”，更有人“弃文龙如沟中梗”①。明崇祯二年（1629 年）六月，督师袁崇焕列举毛文龙 12 大罪状，将其杀害。辽东沿海诸岛明军将领不和，甚至互相残杀，士气低落，军队哗变，抗金力量处于涣散无力的状态。

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 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乘皮岛明军混乱之机，命总兵官楞额礼为右翼主帅，喀克笃礼为左翼主帅，率骑兵 1500 人、步兵 4500 人往征皮岛，企图以大军

---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毛帅东江》。

压境之势，联合朝鲜，胁迫岛上明军就范。六月初四日，后金军进抵朝鲜宣川后，分兵四路从皮岛东北至东面隔海对该岛形成包围之势。后金无战船，期待朝鲜支援，但朝鲜表示“借船之事，决不可从”①。后金只从海上搜索到 11 只船，将部队运抵皮岛附近的小岛上。明守军副总兵张焘奉总兵黄龙之命，率军乘战船出海，用火器击敌，给后金兵极大杀伤。副总兵沈世魁率兵连续进攻蛇浦，战斗激烈，杀伤后金兵甚众。后金兵不习水战，缺乏火器，难以与明军抗衡，只得于六月二十八日撤退，第一次进攻皮岛终以失败而告结束。

由于守岛明军将领明争暗斗，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遭诬陷，遂于天聪七年十二月投后金。他向皇太极建言：“速发匠役，前往浑江预造船只，俟春融发兵攻岛。”② 皇太极予以采纳。清崇德二年（1637 年）二月初二日，皇太极征服朝鲜后率大军班师，同时令硕托率汉军转攻皮岛。清军以孔有德、耿仲明等部汉兵为先头部队，四面环攻。明将沈世魁依险置炮，顽强抗击，清军久攻不下，相持月余。清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八旗兵千人增援。他令萨木什喀率八旗护军为先头部队，固山额真阿山、叶臣率八旗步兵在后跟进担任主攻，八旗骑兵和汉军孔、耿、尚部及朝鲜援军担任佯攻，汉军固山额真石廷玉、户部承政马福塔于岛北隅督战。四月初八日傍晚，各路清军乘 70 艘战船分头出发，在佯攻部队的掩护下，主攻部队偷袭成功，首先攻占皮岛西北的山嘴。深夜时清军登陆完毕，经激烈战斗，取得全歼明守军、占领全岛的胜利。明总兵沈世魁被俘，不屈而死，“军兵死者万余人”③。

---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五，仁祖九年（明崇祯四年）六月庚戌，第 3472 页。

② 《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八年十月初二日《尚可喜请造船攻岛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第 100 页。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六，仁祖十五年（明崇祯十年）四月癸未，第 3603 页。

此后，明军辽东沿海防线崩溃。

后金（清）夺占辽东沿海岛屿斗争的胜利，拔掉了明朝辽东海上的据点，从海上切断了明朝与朝鲜的联系，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进一步解除了后顾之忧。

后金（清）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在作战指导上能步骑协调一致，较快地制造和使用战船，解决了渡海工具，利用夜暗实施偷渡并成功地进行登陆作战。其次，善择战机。皇太极能利用明军内部混乱、战将互相残杀的有利时机，果断决策进取。第三，善于利用熟悉海岛地形、长于海上作战并拥有火器、战船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部汉军。此外，借助朝鲜的支持，也是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节　松、锦战略决战

（见附图 3）

一、战 前 形 势

皇太极即汗位之后，虽然遭受了宁锦战败的挫折，但他及时总结失败的教训，战略上作了调整。即使夺取了大凌河城，也未继续向西推进。在以后 10 多年的时间内，后金（清）征服了朝鲜，切断了明朝的右臂，又统一了蒙古，切断了明朝的左臂，使原来明对后金（清）的弧形包围变成了后金（清）的反包围。在此期间，又统一了黑龙江流域，扩大了版图和兵源；冲破了明军的海上防御，从海上对京、津、登、莱形成威胁；多次迂回入边，削弱了对方，壮大了自己。整个战略形势对后金（清）十分有利。“铁骑如云，加以蒙古军士，即取天下，亦有余力。”① 因此，后金（清）主动打破战略对峙的局面，而发动大规模进攻战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〇，崇德五年正月壬申。

役，与明军主力决战的时机趋于成熟。过去，群臣曾多次向皇太极建议进取北京，他都未采纳，而是以“剪枝伐树”之策“残毁”明朝。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人联名奏陈“进取之计”，提出三个方案：一是避开辽西正面战场，继续迂回入边，“直捣燕京，割据河北”，此为“刺心之著”；二是避开宁、锦，“直抵关门”，此为“断喉之著”；三是屯驻广宁，逼临宁、锦门户，使明耕种自废，难以图存，宁、锦可不战而得，此为“剪重枝伐美树之著”。他们力主断喉刺心之著，认为“剪枝之计，可施于勍敌之小邦，不可施于积弱之大国。”① 皇太极认为：过去“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②。在双方军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之后，清军已有能力突破宁锦防线。因此，皇太极决意沿辽西走廊西进，夺取宁、锦。

明朝方面，由于后金（清）多次迂回入边袭掠，国力军力大衰，加之失掉了袁崇焕等一批重臣，宁锦防线已不像以前那样牢固了。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已发展到川、陕、豫、鲁，使明朝统治者处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崇祯帝朱由检一心想要扑灭农民起义，而对清军的进攻则由消极抵抗变为妥协求和。次年，他派兵部尚书杨嗣昌暗中与清议和，企图稳住宁锦前线，移用援辽饷银和兵力镇压农民起义。阉党分子陈新甲接任兵部尚书后，继续向清求和。后因走露消息，遭到朝野的反对而作罢。崇祯十二年，当西线农民军一时受挫起义转入低潮时，明廷便把在西线镇压农民起义有功的洪承畴升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军务，兼筹粮饷，以加强东线力量。

辽西走廊指锦州至山海关之间的沿海狭长地带，是关内通往关外的咽喉。锦州位于走廊的东北端，一直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凌河之战后更成为明军的前哨阵地。锦州往西南依次为松山、

---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〇，崇德五年正月壬申。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第29页。

杏山、塔山，每城间隔约为20里，再往西南40里，即另一军事重镇宁远。宁远是锦州的依托，锦州是宁远的屏障。明与后金（清）经过长期对峙以后，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要入主中原，必先夺取山海关，要夺占山海关必先夺占辽西走廊，要夺占辽西走廊必先夺占锦州。否则，清军即使进了关，也是兵饷无继，进退失据。明朝也很清楚，要保住北京，必须保住山海关，要保住山海关就必须固守辽西走廊，尤其要固守前哨桥头堡锦州。于是，明与后金（清）在辽西走廊的一场大战役终于发生了。

作为进攻一方的后金（清），准备比较充分。皇太极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预先选择义州作为前进基地。义州距锦州只有90里，土质肥沃，适于耕种，是清军理想的后勤补给基地。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分任右、左翼军主帅，率军至义州驻屯，边筑城边耕种。一个多月后，清军于此“修城筑室，俱已完备，义州东西四十里田地，皆已开垦”①。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除当地生产的粮食外，还从朝鲜运来粮食1万包，造红衣大炮60位，招募“善梯者”1000人，又从蒙古喀喇沁部购买良马1万匹，从而贮备了充足的战备物资和兵马。

二、作战经过

松锦之战从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开始，至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结束，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围困锦州，松山决战，占领松、杏等四城。

（一）围困锦州（崇德五年四月～六年八月十八日）

崇德五年四月十一日，清都察院参政、贝勒章京张存仁提出了“围困锦州”和“广布招抚敕谕，探祖帅（指锦州守将祖大寿）心事以招之，体文士性情以安之”的“攻心之策”、“得人得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一，崇德五年四月丙寅。

地之术"①。这是总结了以往对明作战经验教训并符合实际的作战方针。皇太极立即采纳，并传令济尔哈朗、多铎，在义州屯田筑城的同时，立即率兵围攻锦州等处。四月二十九日，皇太极令多尔衮、豪格等留守盛京，亲自率师渡辽河前往义州。五月，皇太极巡视围困锦州情形，并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将城东、北、西三面的庄稼割掉；二是令汉军举炮击毁锦州周围的明军台堡，使其成为孤城；三是实行轮流更戍，每期三个月。次年三月，皇太极又亲率4万余骑至锦州，针对清军"离城远驻"的错误，重申"由远渐近，围逼锦州，所以困之"② 的长围久困原则，对锦州实行严密封锁。此外，还派人秘密入城做蒙古兵的策反工作。为加强围城兵力，又命孔有德、尚可喜、石廷柱、耿仲明等率汉军，携几十门红衣大炮增援。朝鲜也派总兵柳琳率军前来援助清军。

明军闻清兵围攻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辽东巡抚方一藻急调兵援救。早在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五月，洪承畴即出关督师。他令总兵祖大寿、团练吴三桂、分练刘肇基出杏山。七月，总兵曹变蛟、马科、刘肇基、吴三桂合击清兵于黄土台，大败清军。十一月，洪承畴驻宁远，调整兵力部署，筹办粮饷。次年春，洪承畴至松山视察。他认为辽西明军兵力不够，奏请增调宣府、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杨国柱及蓟镇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兵共7万赴援，立即获准。然而，总兵祖大寿部中的蒙古贝勒诺木齐、吴巴什等人秘密与济尔哈朗联系，决定降清，于三月二十四日与锦州城外清军实行内外夹击，迫使明军向内城撤退。锦州外城一破，形势危急，祖大寿派人向朝廷告急。朱由检深感锦州安危关系重大，急命驻守宁远的洪承畴率王朴、唐通、吴三桂等八总兵及副将以下200多员、步骑13万

---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一，崇德五年四月壬戌。

② 蒋良骐：《东华录》卷三，崇德六年三月，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页。

火速驰援锦州。

洪承畴的作战指导思想本是“且战且守”、步步为营、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他说：“久持松、杏，以资转运，且锦守颇坚，未易撼动，若敌再越今秋，不但敌穷，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也。”① 但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张速战速决，监军张若麒也认为应以速战解围。崇祯帝基本支持陈新甲的主张，即派张若麒赴宁远监军，催促进兵。

洪承畴迫于朝廷旨意，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七月下旬率军急进于距锦州五六里的乳峰山西侧扎营。八月初，洪承畴与多尔衮战于乳峰山之东，清军失利而退。至八月初十日，明军控制了松山至锦州间的制高点乳峰山，并与锦州守军协同，夹击清军。清军被迫转攻为守，急向沈阳求援。十四日，皇太极率精骑3000先行，大军继后，火速驰援，于十九日抵松山，寻机决战。

（二）松山决战（崇德六年八月十九日～二十九日）

此次决战是在松山城郊进行的。洪承畴先发6万兵马，在松山城北乳峰山冈结营。步兵于乳峰山、松山城之间掘壕，立7座大营；骑兵驻于山之东、西、北三面。八月十九日，皇太极率清军主力到达松山的戚家堡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并率诸将到前沿阵地勘察。他发现明军“大队集前，后队颇疏”，认为“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②。于是，将主力部队部署在乌欣河南山至海边，横截大道，并于锦州至南海角之间掘三道大壕，各深8尺，宽丈余，包围松山明军，并切断了松山、杏山之间的联系。双方主帅亲临松山前线，主力部队之间的一场战略决战已不可避免。

八月二十日，皇太极先派阿济格率军进攻塔山，夺取了明军在笔架山的储粮。洪承畴担心明军步、骑兵被分割，将数万之众

---

① 谈迁：《国榷》卷九七，崇祯十四年六月乙卯，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八，《洪承畴降清》，第330页。

收缩在松山城内。二十一日，他见形势严峻，立即召开作战会议，拟于次日与清军拼死一战。但诸将对是否继续战斗意见不一，又面临缺粮困难，多主张“回宁远就食”①。监军张若麒也支持回宁远的意见。洪承畴犹豫动摇，遂放弃与清军决战以解锦州之围的计划，决定分兵两路突围。由于军心动摇，尚未等到规定的突围时间，总兵王朴怯战先逃，接着诸将争相逃窜，沿途又遭伏击，明军兵马自相践踏，盔甲遍野，溃不成军。

对明军突围西逃，皇太极早有所料，并作了部署。他命两翼八旗护军及蒙古兵顺序排列，直抵海边，并谕令将士：“敌遁百兵则以百人追之，千兵则以千人追之，敌众则蹑后追击，直抵塔山。”② 当吴三桂、王朴等沿海边逃跑时，清军立即迎头痛击。其他明军也遭清军四面截击，一败涂地。“明兵窜走，弥山遍野，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③ 吴三桂、王朴、白广恩、唐通、马科等及六镇残兵都溃入杏山城，张若麒则由海上逃入宁远。仅曹变蛟、王廷臣撤入松山，与洪承畴共守孤城。

皇太极判断，逃入杏山的明军必然再奔宁远，于是又遣军至杏山、宁远之间扼险设伏。二十六日，吴三桂、王朴率所部残兵逃至高桥，清军伏兵突起，一举将其歼灭殆尽，吴、王二人仅以身免。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清军集中兵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明军其余溃兵全部歼灭。此阶段历时 10 天，清军大获全胜，共歼灭明兵 53783 人，获马 7444 匹、驼 66 头、甲胄 9346 副。明军投海死者及丢弃马匹、甲胄数以万计。

（三）夺占松、锦、塔、杏四城（崇德六年九月～七年四月）

皇太极粉碎明军突围西逃的计划后，便加紧对松、锦的围困。首先，命郡王阿达礼、贝勒多铎等围松山，于城外筑城、掘

---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② 蒋良骐：《东华录》卷三，崇德六年八月甲子，第 49 页。

③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崇德六年八月甲子。

壕。其次，加强前线指挥，命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杜度等人集中兵力围锦州。再次，为防止松、锦明军突围西逃和关内明军前来增援，命蒙古科尔沁亲王武克善、郡王莽珠什哩等人围杏山、高桥。以上措施将松、锦明军置于坐以待毙的境地。

明兵主帅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①，只好守松山待援。松山城地形四周高，中间低，利攻不利守。此时，由于镇压农民起义的西线明军屡屡战败，崇祯帝已很难再组织一支像样的援军。松山城内粮食奇缺，已出现杀战马、人相食的凄惨景象。洪承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二月，守城副将夏成德与清军密约叛明降清。十八日夜，在夏成德的配合下，清兵竖梯登城，歼明道、副将以下官员 100 多人、兵 3063 人。巡抚邱民仰和总兵王廷臣、曹变蛟被俘后不屈而死，总督洪承畴被送往沈阳，不久即降清。

清军占领松山以后，一面集中兵力进攻锦州，一面又派降将祖大乐到锦州城内向其兄祖大寿劝降。锦州被围已近二年，粮尽援绝，祖大寿战守计穷，于三月初八日献城投降。四月初九日，清军用红衣炮攻破塔山城，尽歼明兵 7000 人。二十一日，又用红衣大炮攻杏山，明将开门献城投降。至此，松、锦、塔、杏四座重镇全被清军占领，宁锦防线彻底崩溃。

三、清军胜利原因及影响

松锦之战，清军取得胜利的原因主要有六：第一，战略决策正确。在两次进攻宁远失败后，皇太极着手进行战略调整，中止对明朝的进攻，转兵朝鲜、蒙古，翦除明朝两翼，并歼灭辽东沿海明军，解除后顾之忧，又迂回袭扰明朝腹地，使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己的变化，然后再回头与明军决战，已是稳

---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三，崇德六年十二月甲寅，第 51 页。

操胜券。

第二，围城打援的战法运用得当、巧妙。皇太极既接受了攻大凌河城的经验，也汲取了两攻宁远的教训，因而在攻锦州时，首先于城外挖壕筑垒，切断城内明军与外界的联系，实行长围久困，迫使对方陷于饥境而急待救援，然后在预先设好的战场上埋伏精兵，把“围”、“隔”、“截”、“追”等战法巧妙地结合起来，一举取胜。

第三，敌情判断准确。皇太极对明守城兵力、援军数量、经过道路、作战方针及明将的意见分歧等，都有较为准确的了解和判断，因此能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例如，当了解到洪承畴担心兵力分散会被各个击破，因而主张集中兵力的情况后，就将明援军诱引并稳定在较狭窄的地域内，实施大包围，造成锦州明军和援军两处被围的态势，再集中兵力将援军和守城明兵全部歼灭。

第四，充分发挥火炮的作用。皇太极除令左右翼八旗携带火器外，又命善用大炮的“三顺王”孔、耿、尚参战。在塔山攻坚战中，清军发红衣炮，城崩 20 余丈，然后“由崩处先登，遂克其城”，杏山亦是“以红衣炮击而取之”①。

第五，准备充分，士气高昂。清军从驻屯义州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物质和精神准备都是相当充分的。参战将士采取三个月一轮换的办法，这就增强了战斗力，收到了好的效果。

第六，成功地运用战场政治攻势和秘密策反工作。早在战前，皇太极即派人入锦州城埋伏，专做明军中蒙古将士的策反工作。结果，城内蒙古贝勒诺木齐、吴巴什约降，与清军内外夹攻，迫使明军放弃锦州外城，造成对己十分有利的形势。松山副将夏成德献城降清，也是策反的结果。在长期围困战中，先后敕谕蓟辽总督洪承畴、锦州守将祖大寿及守城官兵劝降，致“洪承畴等在松山曾称上（皇太极）为皇帝，祖（大寿）总兵有请罪投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〇，崇德七年四月辛亥。

降之言"[1]。后来，洪承畴被擒降清，祖大寿亦在援尽粮绝、清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献锦州降清。

松、锦决战是萨尔浒之战后关键性的战役。它对明清双方的存亡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此役以清方夺占整个辽西地区的胜利而告终。皇太极得到的不仅仅是山海关外的广大地区，而是为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从而实现了其战略总方针的第一步。明朝所失掉的也不仅仅是对这个地区的统治，而是大明江山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困境之中，因而大大加速了其彻底覆灭的进程。乾隆皇帝在《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中说："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而帝业定。"这句话恰当地评价了努尔哈赤所指挥的萨尔浒之战和皇太极所指挥的松锦之战两次战略决战的成果、意义和影响。

---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八，崇德六年十月戊申。

第三章　后金（清）时期的军队建设及军事思想

第一节　八旗兵制的建立

一、八旗兵制的起源和沿革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创立了八旗制度。这一制度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过程。

八旗制度起源于“牛录制”。牛录，系满文译音，意为射兽用的“大箭”，很早以前，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额真，汉语‘主’也）”①。明代建州女真就是根据战时需要和女真的习俗，把以往狩猎时采用的临时性武装组织形式加以改组扩大编制成军队的。这支军队在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时，就分为左军、右军和中军。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兵百人，“遗甲十三副”。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的军队发展到500人，并进攻东果部。因军队较多，已出现300人一牛录的军事组织。是年，努尔哈赤率兵攻下翁克落城后，没有杀城主鄂尔果尼、罗

① 《满洲实录》卷三，辛丑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科，而是“赐以牛录之爵（属三百人），厚养之”①。从此牛录不仅是围猎组织，同时也正式成为军事组织了。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已进行 6 年，随着军队数量的增多，已分为四个兵种：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②。至万历二十四年，建州步骑兵约有二三万人。

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努尔哈赤对建州军队进行了一次整编，“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管属……以牛录厄真为官名”③。从此，牛录额真（后称佐领）成为正式的官名，负责军队、行政、生产等一切管理工作。为了加强管理，其下还设副职 2 人，称代子（后之骁骑校），以及章京 4 人、拨什库（领催）4 人。又将牛录的 300 人分为 4 个塔坦（村或部落），由 4 名章京和 4 名拨什库率领。

为了便于领导，所有牛录分属于黄、白、红、蓝 4 色旗帜之下，成为最早的旗。努尔哈赤对军队的一系列改革，为尔后八旗制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除叶赫及边远地区少数部落尚未降服外，大多数女真人已经“归顺”，努尔哈赤一跃而为辖地辽阔、臣民众多的女真大汗了。随着统一的实现，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有效的管辖形式。女真各部居住分散，习俗不一，制度悬殊。有的部落依山沿江居住，捕鱼捉貂，以渔猎为生，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有的女真人室居耕田，役使阿哈，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如果没有统一的正确的管理制度，取代旧日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组织形式，就很难真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甲申年九月，见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9 页。

②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宣祖二十二年（明万历十七年）七月丁巳，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530 页。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辛丑年，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21 页。

正地统一起来。其次，必须将原有的松散的军队，改造成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军队。在此以前的女真军队，纪律松弛，战事有利时，兵将“四出掳掠牲畜财物，喧哗争夺”①，连努尔哈赤也无可奈何；战事不利，则四处奔逃，兵将各不相顾。这种军队是不能担负起维持统一并继续对外进行掠夺任务的。

基于以上需要，努尔哈赤果断地采取了适应当时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有力措施，对原有的牛录制度进行改组、发展和扩大，完善了八旗军制：5 牛录为一甲喇，5 甲喇为一固山，共设 8 固山，每固山为一旗。旗的颜色，在原有黄、白、红、蓝 4 色的基础上，镶以不同颜色的边，即成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旗，连同正黄、正白、正红、正蓝 4 旗，合共 8 旗。各旗三级首领的官名分别为牛录额真（汉名佐领）、甲喇额真（汉名参领）和固山额真，固山额真为一旗之主。这就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②。

皇太极即位后，为了与明作战，扩大兵源，又创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努尔哈赤时，对战争中掳掠的汉人，有的编户为民从事耕种，有的则编在八旗满洲下当兵，并没有单独编旗。由于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皇太极不得不执行“以汉治汉”、“以汉攻汉”、“汉为我用”的政策。天聪五年（1631 年）正月，因总兵官额驸佟养性及监造官丁启明和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等造红衣大炮有功，皇太极特许佟养性率汉官、生员单独为一班，参加一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己丑年，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13 页。

②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的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根据《满洲实录》卷四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的记载，为乙卯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二是根据后来官修的《八旗通志》、《清朝文献通考》等，为甲寅年（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三是根据乾隆《大清会典》，为辛丑年（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今从第一种说法。参见李鸿彬、郭成康：《八旗建立年代考异》，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 年第 1 期；《努尔哈赤一六〇一年建旗考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 年第 4 期。

年一度最隆重的典礼，向皇太极行礼朝贺。他敕谕佟养性："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①] 不久，即正式宣布将满洲八旗中的一部分汉人分离出来，编为旧汉兵一旗。第二年，将汉兵改称汉军，满语号"乌真超哈"，汉译名为重兵或炮兵。崇德二年（1637 年）七月，汉军扩为二旗，分置左右翼，以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崇德四年六月，又改编为汉军四旗，增王世选、巴颜两人为固山额真。至崇德七年，又增四旗汉军，于是汉军八旗建成，旗色与满洲八旗同。

蒙古八旗也是清代八旗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其地位仅次于满洲八旗，而高于汉军八旗。早在天命六年（1621 年）就曾编立"蒙古牛录"，但进一步扩大而编成"旗"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据记载，到皇太极天聪七年（1633 年），已有蒙古二旗，其正式名称为"右营"和"左营"。次年五月，称"右营"为"右翼兵"，固山额真是武纳格；称"左营"为"左翼兵"，固山额真是鄂本克。"蒙古特别是察哈尔蒙古被征服的过程，同时就是'八旗蒙古'编成的过程。"[②] 至天聪九年（1635 年），后金正式编成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同满洲八旗。满、汉、蒙各 8 旗，共计 24 旗。

二、八旗兵制的内容和性质

八旗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军政合一、兵民合一、耕战合一的制度。它具备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职能，而作战则是其主要职能。

八旗制度首先是一种军事制度。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平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八，天聪五年正月乙未，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王钟翰：《清初八旗蒙古考》，《清史杂考》第 121 页，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时耕猎为民，战时则披甲当兵。各个时期佥丁披甲的比例不尽相同。努尔哈赤时，除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外，凡是 15～60 岁的男子，称为“壮丁”、“人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① 但在一般情况下，“满洲出兵，三丁抽一”②。蒙古也是“每三丁抽一人披甲”③。“汉人十丁编兵一名”④。在特殊情况下，则抽调三分之二以上的男丁为兵。

关于牛录的数目，皇太极规定每旗辖 30 个牛录，如多于 30 牛录，超过部分可以补各旗的缺额，以保证各旗牛录的编制数。并曾强调：“有隐匿壮丁者，将壮丁入官，本主及牛录额真、拨什库等，俱坐以应得之罪。”⑤ 这些规定和制度，保证了八旗的兵源。

八旗兵采取三级编制：牛录—甲喇—固山（旗）。每牛录 300 人，设官牛录额真（即牛录章京）1 人；牛录之下为塔坦，人数不固定，设拨什库（或章京），进行管理；5 牛录组成一甲喇，1500 人，设官甲喇额真（即甲喇章京）1 人；5 甲喇组成一旗，每旗 7500 人，设官固山额真 1 人、梅勒额真 2 人。一般说，牛录和旗比较稳定。甲喇作为中间机构，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数目可增可减。在官职名称上，天聪八年（1634 年），又赋予甲喇章京汉名为参领，牛录章京为佐领。

努尔哈赤是八旗兵的最高统帅，并通过其子侄及亲信，统领这支军队。努尔哈赤亲领两黄旗，其次子代善领两红旗，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长孙杜度领正白旗，侄子阿敏领镶蓝旗。

---

① 《清史稿》卷一三〇，《兵》一，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一七，天聪八年正月癸卯。

③ 《清太宗实录》卷五五，崇德六年三月乙巳。

④ 《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七年正月二十日《丁文盛等谨陈愚见奏》，见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0 页。

⑤ 《清太宗实录》卷七，天聪四年十月辛酉。

八旗兵是一支以骑兵为主兼有步兵的军队。天聪五年（1631年）制成红衣大炮后，加上缴获明军的大量火器，又组建炮兵部队。对骑兵的训练尤其严格。训练内容包括培养士兵的勇敢精神，熟悉弓马技艺等。在费阿拉有很大的操场，天天操练兵马。练兵除演习枪、刀、骑、射外，还进行“水练”（跳涧）和“火练”。经过严格训练的后金铁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驰速快，一是突击力强。

八旗制度又具有行政职能、生产职能。努尔哈赤既以旗统兵，又以旗统人。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出则统领军队作战，入则统治人民。后金汗通过各级额真，统治其人民：“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①。牛录额真及其属下村、领催等官员，掌管本牛录、本村屯的民政事务，诸如登记户籍、查勘田地、分配财物、经营房宅、收纳赋税等，因此八旗又是民政组织。八旗制下的部众，“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②。士卒征战回师后，修整器具，治理家业，耕种田地，牧放马匹，为战备提供粮食和兵器，牛录额真又成为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在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转化的过程中，除了兵户、农户进行生产外，还有社园和“屯”，进行粮食和军器等手工业生产，以补充战备用粮和军器供应。此外，牛录额真又多为一族之长或众族之长。一个牛录往往是一个大家族，牛录额真即为该族的族长。但后来招抚日众，同一牛录内不仅有满洲人，也有蒙古人和汉人等，因而该牛录额真就成为众族之长了。

努尔哈赤创立的八旗制度，并不是超脱于各个阶级之上的制度，而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八旗制

---

①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第473页。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七，天聪四年五月壬辰。

度的建立，维护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扩大了汗、贝勒和各级额真的权势。所以，八旗制度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制度，而是包括了军、政、财等各个方面职能的根本制度，而且是进入辽沈以前后金政权组织的特殊形式。

三、八旗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八旗制度对满族的形成和后金（清）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建设起一支正规的善于驰突的军队。八旗牛录和兵士的数目，有一个不断增加和变化的过程。天命六年（1621 年），只有满洲八旗，共有牛录 231 个，兵士 6.9 万多人①。入关前八旗牛录及兵士的最高数目，根据《钦定八旗通志》的《旗分志》，并参考《八旗通志初集》的《旗分志》，满洲八旗约 310 牛录，蒙古八旗 120 牛录，汉军八旗 164 牛录，合计 594 牛录（见附表）②。满洲、蒙古八旗以每牛录 300 丁计，满洲八旗约为 9.3 万余人，蒙古八旗约为 3.54 万人，汉军八旗以每牛录 200 人计，约为 3.28 万人，合计入关前八旗兵共有 16.12 万余名。努尔哈赤、皇太极依靠这支军队，击败了十几万明军，下沈阳，取辽阳，进驻辽东，为后来入关统一全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八旗制度在建立军队、保证兵源、加强国力、巩固和扩大后金辖区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八旗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满族的形成和发展。满族是以女真为主，吸收蒙、汉等族人民，于明末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努尔哈赤通过八旗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部民组织起来，同时又把征服的蒙、汉人民包容在旗制之中。这几十万人来自四面八

---

① 《满文老档》卷一八，《太祖》。

② 摘自李新达：《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载《清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方，语言习惯虽不同，谋生方式悬殊，社会制度各异。这样复杂、松散的混合体，如果不建立起统一的管理制度，很难长期联合，势必分裂混乱，更不能消除各部、族的差异，发展成为新的民族。八旗制度的建立，解决了这个难题，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促进了后金（清）社会生产的发展。努尔哈赤通过八旗把分散的女真部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组织起来，管理和经营农业、畜牧业、采集业、渔猎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八旗人丁的辛勤劳动下，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地颇硗瘠，粮料时苦不足”，发展到“土地肥饶，禾谷甚茂”，自给有余①；从不会纺织、煮盐，手工业极不发达，盐、铁、农具、兵器全靠外地供应，发展到“盛产财物”，有大量狐皮、猞猁狲皮、貂皮、虎皮等珍贵皮裘。“又有棉、丝、绵、布、葛布，复有金、银、铁。凡此皆有，衣食之资，皆可得之”②。因此，八旗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附表：入关前八旗牛录数发展变化统计

旗别	牛录数＼编年	天命	天聪	崇德	时间不详	总计	备注
正黄旗	满				43	43	27
	蒙		2	2	9	13	7
	汉		2	20		22	
镶黄旗	满			2	33	35	27
	蒙		6	1	11	18	3
	汉		4	18	2	24	2

① 《满文老档》卷一三，《太祖》。

② 《满文老档》卷一五，《太祖》。

编年 牛录数 旗别		天命	天聪	崇德	时间不详	总计	备注
正白旗	满		2		47	49	36
	蒙	1	5	1	9	16	8
	汉		4	21	2	27	
镶白旗	满		1		42	43	36
	蒙		8	4	5	17	5
	汉		2	13	1	16	1
正蓝旗	满	3	3		33	39	27
	蒙		11		7	18	4
	汉		13	10	1	24	1
镶蓝旗	满				36	36	33
	蒙		12		2	14	1
	汉			14	1	15	1
正红旗	满			1	30	31	28
	蒙		2	2	8	12	8
	汉		3	9	3	15	2
镶红旗	满		1		33	34	32
	蒙		1	1	10	12	10
	汉		4	17		21	
总	满	3	7	3	297	310	246
	蒙	1	47	11	61	120	46
	汉		32	122	10	164	7
计	共有	4	86	136	368	594	299

说明：①此表不包括包衣牛录数。表内满、蒙、汉分别代表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凡初编时为半个牛录，入关前已改为整个牛录的，一律以整牛录计算。正黄旗满洲、正蓝旗满洲、正黄旗汉军至入关后仍然各有半牛录一个，不计在此表数内。编年为“时间不详”栏，有的在史料记载上写明“国初”，有的未写明，但多数属于努尔哈赤时期，少数属于皇太极时期。“备注”栏内为史料上注明“国初”编制的牛录数。

②“天命”时的牛录数与“满文老档”等文献所载不一致处，应参考“时间不详”、“备注”栏。

八旗制度的建立，对满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肯定八旗制度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看到它的消极面。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贵族，通过八旗制度，加强了对女真和其他各族奴隶、农奴、部民的军事统治，从而给劳动人民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

第二节　武器装备

一、冷兵器的种类、制造和使用

骑射是满族的旧俗，也是满洲本业。几千年来，满族的祖先就在长白山、松花江、黑龙江一带过着狩猎生活。弓箭是他们射猎的主要工具。然而，“骑射”出现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用于战斗。《满洲源流考》记载：“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①。清军作战时，以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敌人无不溃败。努尔哈赤时的哲陈之战、萨尔浒之战等，主要是靠骑射战术以勇猛和快速驰突取胜的。

八旗士卒的主要武器装备是弓箭，所以清朝有“以弧矢定天下”② 之说。根据史书的记载，满族较早使用关内的牛角弓，其法是用兽皮做弓弦，弓胎用榆木制造，“其面缚以牛角，背加以筋胶，加饰桦皮，胎一而角两接，接处用鹿角一块，固以筋胶，加缓木皮于外，曰弓靶。两弰以桑木为之，各长六寸三分，镶以牛角，刻锲其末，以受弦驱，弰与胎斗笱(榫)相接处，光削一面，以鹿角为方，钉于角端，曰垫弦。”③ 这种角弓射程较远，且有力。

箭镞有几种。大约在 15 世纪中期以前，满族基本使用骨镞、

---

① 《满洲源流考》卷一六，《国俗》上，1934 年奉天大同学院刊本。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不忘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6 页。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〇，《兵部·军器》。

角镞和石镞。《建州考》所记："弓长四尺，矢用楛，一尺八寸，青石为镞，是其器械也。"① 此为石镞。以后，由于贸易的发展，从明朝和朝鲜换来铁，其后又设风炉自己造铁，从而铁镞逐渐取代了骨镞、角镞和石镞。朝鲜史籍记载："往时野人屈木为镫，削鹿角为镞。今闻镫、镞皆用铁。"② 从杀伤效力来说，铁镞远远胜于骨镞、角镞和石镞。

军用战箭有铊箭、梅针箭两种。铊箭箭镞较薄而阔；梅针箭箭镞尖且细，可入衣甲。此外，还有猎用箭和教阅箭。行猎用的叫"骨披箭"，此箭"骲头唧铁镞，阔梅针箭镞数倍"③，可以更有效地射杀野兽。用于教阅的是"骲箭"，其箭"以寸木空中，锥眼为窍，矢发则受风而鸣"，故又谓之"响箭"，"铁镞上加骨角小哨者曰'鸣镝'"④。

弓箭的制造是一种专门手工业。女真人早有专门从事这一职业的弓匠、箭匠。努尔哈赤时代的赫图阿拉老城，北门外是专制铠甲的铁匠住区，南门外是专造弓矢的弓箭匠人住的地方。朝鲜通事河世国看到努尔哈赤帐中有"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余名，弓匠三十余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无日不措矣"⑤。由此可见，当时女真的弓箭制造已有一定规模。

除了弓箭之外，后金（清）的兵器还有刀、枪和防护器具铠甲，以及登城器械云梯等。在与明军交战中，又缴获了一些中原地区的兵器，包括冷兵器、火器、战车等。

---

① 陈继儒：《建州考》，宝颜堂秘笈本。

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十，乙未年（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二月辛巳，第619页。

③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④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〇，《兵部·武库清吏司·军器》。

⑤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三五，宣祖二十八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子，第2167页。

二、火器的传入和制造

后金(清)在努尔哈赤时期,只能造刀、矛、弓、矢,不会使用和制造火器,但在对明战争中缴获了大量火器。在大凌河之战中,收缴明军大小火炮 3500 位及鸟枪、火药、铅子无数。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归降时又带来大批火器、火炮。缴获的火器,开始只作为战利品分给各旗,很少用来作战。后来,才逐渐让被俘的明军士卒使用。在沈辽之战中,"李永芳得中国炮手,亲释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①。此后,八旗逐渐使用火器。天聪三年(1629 年),后金军首次入关,包围北京。徐光启奏称:"博询土人,言满桂之败,贼亦用火攻。每一骡负二炮,如田单火牛之法,疾赴我营,以至败衄。"② 但这种炮似乎是一种爆炸性的燃烧火器,而不是管形火器。后金军进占遵化等地后,在大安口遭明军围攻,范文程"以火器进攻,围解"③,用的也是缴获明军的火器,并由汉人施放。天命十一年(1626 年)一月,努尔哈赤率兵攻宁远(今辽宁兴城),被明红夷大炮击退。皇太极即位后,再次率军围锦州,攻宁远,又被击退,后金兵死伤甚众。宁、锦两次战败,使皇太极认识到:要使八旗兵能够攻坚,关键在于掌握和使用火器,特别是火炮,于是下定决心,要建立自己的炮兵部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正黄旗汉军《世职谱档》袭字第三十一号载:骑都尉王承烈之曾祖王天相,征北京时自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带回红夷炮进行仿制。《清太宗实录》天聪五年正月初八载:"造红衣大将军炮④

---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

② 《徐光启集》卷六,《守城制器疏稿·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9 页。

③ 《清史列传》卷五,《范文程传》,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57 页。

④ 红衣大将军炮即红夷大炮,因满人长期被明朝称为夷,颇忌"夷"字,因而以谐音改称"红衣大炮"。

成。镌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先是,我国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① 是年,又造炮40具。

皇太极很重视火器的制造,并对造炮汉人工匠注意保护,予以奖励。因佟养性造炮有功,赏赐白金100两和雕鞍良马等。皇太极公开宣称:“其有势豪嫉妒不从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体、亵法令也,必谴毋赦!”② 对永平、大凌河等处俘获的汉兵炮手200余人予以优待,下令“以王天相创铸红衣炮功,及金世昌继造,不用蜡辄铸成,俱升备御”③。天聪六年正月,皇太极亲往演武场校阅红衣炮表演,佟养性率所统汉兵擐甲胄、执器械列于两旁,置铅子于红衣将军炮内,进行演试。这次实弹演习非常成功,受到皇太极优厚奖赏。皇太极优待降人、优遇铸炮工匠的政策,使得一批被俘汉人乐于为其效力。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牛录章京金世昌因所铸炮弹熔炼不匀,出炮便碎,本应论死,而皇太极却以其过去铸炮有功予以赦免,后来又令其继续铸炮。由于采取上述鼓励发展火器的政策,使后金的火器制造业有了较大发展。天聪七年设立炮局、药局,崇德七年铸成神威大将军炮,次年又命固山额真刘之源、吴守进等率将士赴锦州造炮④。

后金(清)制造的火器数量虽然不多,但缴获的明军火器却逐渐增多。明辽东巡抚熊廷弼说,清河、抚顺失陷,使明朝的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八,天聪五年正月壬午。

② 《清史稿》卷二三一,《佟养性传》。

③ 《清太宗实录》卷一三,天聪七年三月庚戌。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十六。首都博物馆现藏清崇德八年所铸神威大将军炮一尊。另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从清军中逃归明朝的汉人供述,当时满人专造红衣大炮,领导造炮的是永平刘胡子,即刘之源。

"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①。沈阳、辽阳失陷，又使定边大炮3000多尊、百子炮数千尊、三眼枪2000余杆、火箭42万余支、火罐10余万个，尽落清军之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归降时携带大量火器，其中有从西洋输入的红夷大炮。因此，后金（清）火器数目有大幅度增长，至崇德八年（1643年），火炮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关外明军，仅锦州即有大炮100位。明朝辽东巡抚黎玉田面对这种劣势慨叹说："以奴之势力，在昔不当我中国一大县，每临阵犹势相均力相敌也。迄于今，而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矣。"②

第三节　著名军事统帅及其军事思想

一、努尔哈赤及其军事思想

努尔哈赤是满洲八旗的创建者和统帅，后金政权的缔造者，清王朝的奠基人。他以父、祖遗甲13副起兵，在44年的戎马生涯中，亲自指挥过10多次重大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用兵艺术，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之一。现将其军事思想分述如下。

（一）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战争观

努尔哈赤继承了古代"义"、"道"的战争观。他说："夫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③ 在与诸王讨论对明战争时，有的大王阐释说："今因其不道，故成

---

① 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三，万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前经略辽东疏·辽左大势久去疏》，退补斋胡氏刊本。

② 《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兵部题〈御前发下辽东巡抚黎玉田题残稿〉》。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39页。

仇隙，兴师已至其境。”① 这里所说的“天心”、“天意”、“义”、“道”，都是指战争的正义性。每次作战，努尔哈赤都强调分清是非，看看符不符合“天意”，并标榜自己的行动合乎“天心”。

后金的崛起，正值女真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之际，各部族间的争夺战争无休无止。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举起“义战”的旗帜，进行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的心愿。统一战争客观上对结束女真各部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密切女真各部人民的内部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促进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努尔哈赤正式起兵反明时说：“但因明国累構怨于朕，难再容忍，故不得已而兴师也。”②他以“七大恨”告天，申明后金对明战争的正义性。长期以来，明朝对女真各部推行“分而治之”的民族分离政策，极力阻止女真各部的统一，致使其“各有雄长，不使归一”③，并对女真族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剥削，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勒索，使女真地区出现了极为悲惨的景象。女真人遭遇凶年，饿莩塞路，四处乞食，老弱填壑，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举起反明的旗帜，反映了女真民族反抗明王朝民族压迫的强烈要求，因而是符合女真人的民族利益的。

总之，努尔哈赤“义战”思想和战争实践，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它促进了女真族的进步及其与汉、蒙各民族的融合，客观上具有进步作用。

（二）民兵合一，严于教诫的治军思想

努尔哈赤在少年时代，就在明辽宁总兵李成梁部任事，多次参加作战并屡立战功，显露了他的智慧和才能。起兵之后，他十

---

①② 《满洲实录》卷四，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

③ 《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海建二酋逾期违抗疏》，中华书局 1962 年影印本。

分重视军队的组织建设，多次对部队进行整编，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军制的创立，是努尔哈赤的一大贡献。

八旗军制在某种程度上袭用了金的猛安谋克制① 和元的探马赤军制②，继承了中国古代兵民合一的传统，形成军事、生产、行政合一的组织形式。皇太极后来概括八旗兵制的特点时说："南朝（明朝）规矩，兵民为二，民有常业，兵有常粮；我国兵民为一，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兼以收拾兵器。"③ 这种制度，可以使平时经常性的生产、狩猎和军事训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便于发挥女真人善骑射的民族特长，因而与女真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

努尔哈赤对军队的治理，有以下三个特点。

1、重视训练

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军制后，把提高军队素质，培养勇敢精神，使兵士熟谙弓马技艺，作为首要任务。训练内容，有枪、刀、骑、射的演练，还练习跳涧和越坑，称作"水练"和"火练"。努尔哈赤亲自到场督练，优秀者受赏，怯劣者轻则鞭责，重则斩首。经过训练，兵士个个英勇顽强，吃苦耐劳，使八旗军成为一支以骑兵为主善于野战的军队。战术训练方面，骑兵皆披铁甲上阵，分为"死兵"和"锐兵"两个梯队，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打开突破口；锐兵继后跟进，扩大战果。战斗时，八旗军的骑兵进行冲锋、厮杀、摧坚、陷阵，灵活多变，所向披靡，势不可当。

2、严格军纪

---

① 猛安谋克制：女真族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一猛安包括 8 至 10 个谋克，其首领称为"勃极烈"。1114 年规定：300 户为一谋克，10 谋克为一猛安。金熙宗后成为军事编制，同时又是生产单位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

② 探马赤军制：成吉思汗攻金战争中，以蒙古所属札剌儿、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惕、忙兀惕五部族组成的军队，总领于木华黎。战后即镇戍中原。其成员，除蒙古人外，后来又有汉人及色目人参加。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敕谕副将高鸿中稿》。

努尔哈赤制定不成文军令，规定：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所以八旗军纪律严明，号令必行。经过整肃的八旗军，“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也）、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①

为了严格军纪，奖励战功，努尔哈赤制定了赏罚制度。他认为：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立威。每次战斗结束后，立即核实将士们的功罪。有功者，赏以军兵及奴婢、牛马、财物等战利品；有罪者，轻则鞭打、贯耳、囚禁，重则射胁下、斩首，直至夺其军兵及妻妾、家财。

严格的纪律，赏功罚罪的法规，使将士们牢牢树立起遵纪守法、杀敌立功的观念。由于这些制度同将士及其家属的物质利益紧密相联，所以“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②。他们的妻子亦大力支持丈夫英勇作战，争建功勋。

3、慎选将领

努尔哈赤重视将领的选拔和任用。他说：“今国事殷繁，须多得贤人”③。他不看人的身世、背景如何，只要光明正大，忠于国家，就可以任用。他知人善任，唯才是用，根据各人的不同才能委以不同的职务。他对群臣说：“若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干国忠良者，用以佐理国政；有博通古今者，用以讲古。”又说：“有临阵之勇者，于理国则拙而无用；有治事之才者，于从军则亦无用矣。自是任用皆随其材。”④努尔哈赤选将用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人不求全责备，着眼用其所长。他说：“全

---

①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乙卯年十一月，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35页。

③④ 《满洲实录》卷四，乙卯年十月初四。

才者有几？夫一人之身，才技有长短，处事亦有工拙”①，只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努尔哈赤爱将，同时又要求将领忠于职守，遵纪守法。他对尽心效力的将领，视之如子；对不能胜任职务的，及时撤换、调整，决不勉强。他对大臣及诸将要求十分严格，不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关系亲疏远近，“即执政诸王，尚不令枉法”②。这就是努尔哈赤所说的，“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③。

总之，努尔哈赤在军队建设方面的思想，是从女真社会的实际出发，从本民族的特点出发的。他继承了古人的建军思想，又有创造发展。因此，八旗军才成为长于骑射，勇敢善战，战斗力很强的军队。

（三）“智巧谋略为贵”的战略战术思想

努尔哈赤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善于把中国古代兵法的韬略思想运用于自己的战争活动，并提出了“智巧谋略为贵”④ 的战略战术思想。努尔哈赤在攻明战争前夕颁布的“攻战之策”，即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

1、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和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战略及策略

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兵 100 人，遗甲 13 副，力量微弱，处境艰难。在费阿拉称汗时，其兵力也只有 1.5 万人，处于“四境逼处”的危险境地。他认识到，自己处于劣势，要战胜对手，必须造成局部的优势，先弱后强，从北向南，把面前的大小敌人

---

① 《满洲实录》卷四，乙卯年十月初四。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天命八年六月初九，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77 页。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乙卯年十一月，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35 页。

④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四月辛丑，中华书局影印本。

一口一口地吃掉。为此，他对儿子莽古尔泰和皇太极说："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① 这就是他制订的先弱后强、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也是他对以后的统一战争和攻明战争所制订的方略。

为了顺利实现女真内部的统一，努尔哈赤稳住侧背，想方设法把来自明朝、蒙古和朝鲜三方面的威胁变为借助力量。早在起兵之初，他故意把父、祖之仇集中在尼堪外兰一方，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有意回避与明朝为敌，以取得明朝的信任和支持。他又与蒙古科尔沁、喀尔喀各部酋长结盟、联姻，大力笼络，积极扩充自己的力量。对朝鲜，他也表示永结欢好，维持睦邻关系。这就把来自三个方向的威胁降到最低限度，变不利为有利，保证了他有条不紊地完成女真内部的统一。

为实现女真的统一，努尔哈赤采取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策略，逐个加以解决。他先征服了毗邻的董鄂、哲陈、浑河等建州女真诸小部，对较远而强的叶赫、乌拉、哈达、辉发等海西女真诸小部，尽量避免冲突，并以联姻手段进行笼络，缓和彼此间的矛盾，争取同盟者。在统一了建州女真以后，便不断派兵征服较为落后的"野人"女真各部，从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了对海西女真的哈达、辉发等四部的绝对优势，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将他们全部吞并，完成了女真的统一。

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以后，已有足够的力量与明王朝抗衡，便迈出了他的第二步：对明宣战。天命三年（1618 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公开伐明。

总之，在"智巧谋略为贵"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努尔哈赤所制定的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和先北后南、逐步发展的战略及策略，是符合实际的。他正确地运用智巧谋略，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壬子年十月初一，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27 页。

2、"不损己兵而能胜敌"的作战思想

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颁"攻战之策"："平时以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若我众敌寡，我兵不令之见，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若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遇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势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夫不劳兵力而克敌者，是擅知（智）巧谋略，诚为三军之主帅。若劳兵力，虽胜何益？当征战之际，最上者，莫过于不损己兵而能胜敌者也。"①除此之外，他对八旗将士还有许多其他谕令。综合起来，努尔哈赤指导作战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努尔哈赤善于集中兵力破敌。他在统一女真和重创明军的几次大的作战中，都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战法。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古勒山之战中，显示出努尔哈赤集兵破敌的高明。其兵力不到联军的一半，但他指挥若定，对诸将说："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即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必走。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② 于是集中兵力，对准敌军的一路"并力一战"，先击败叶赫贝勒布斋，将其杀死，继而转战其他诸路，各个击败，生俘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努尔哈赤集中兵力破敌的典型战例是萨尔浒之战。他根据明军虽有10万之众，但分兵四路，将帅不协，兵力分散的特点，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兵力，逐个破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37～338页。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癸巳年九月，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6页。

敌，以损兵2000人的微小代价，换取了歼敌5万的辉煌战果。

第二，审时度势，乘虚捣隙。努尔哈赤认为，野战之法的核心是审机宜，决进退；攻城，则“当观其势”①。这反映了他审时度势，灵活用兵的思想。善择战机、创造战机，是努尔哈赤连连获胜的重要原因。他往往乘敌易将时向敌人发起进攻。萨尔浒之战明军失败后，明改派善于用兵又深得人心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努尔哈赤见无隙可乘，未敢发动进攻。后来明廷罢免熊廷弼，以“用兵非所长”的袁应泰代之。努尔哈赤便乘机发起沈辽之战，获得意料中的大胜。不久，明廷再次启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王化贞拥兵10万于广宁，不受熊廷弼节制。努尔哈赤探得此情后，即发起广宁之役，又获大胜。努尔哈赤还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乘虚而入。万历十六年（1588年），他乘叶赫与哈达相互拼杀，哈达的军事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而放松了对建州女真防御的有利时机，发起进攻，迫其归附。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科尔沁部、喀尔喀等部，长期处于混战局面，忽而联合，忽而分裂，放松了对后金的防御。努尔哈赤采取或支援一方、打击一方的形式，或直接进攻的方式，轻而易举使他们一一归附。从努尔哈赤崛起，到建都沈阳，他审时度势，乘隙而入，接连取得胜利，都表现出了一个深于谋略、善于用兵的将帅本色。

第三，扬长避短，避强击弱。八旗军勇敢善战，“善射驰猎”，具有快速机动的特长，但因缺少火器，敌不过以火器守坚城的明军。这使努尔哈赤认识到：野战是八旗军之长，而攻坚是八旗军之短。针对敌己双方的优劣长短，他制定了一套野战战法，诸如以寡击众、设伏诱敌等。努尔哈赤对于攻城，则很谨慎。他说：“至于攻城，当观其势，势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38页。

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① 为了扬长避短，在攻城作战中一般采取诱敌出营、然后聚而歼之的战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在沈辽之战中，根据沈阳城守备严密、易守难攻的特点，采用先以轻兵诱敌出城，再以野战聚而歼之的战法，一举取胜。再如，辽阳城城垒坚固，努尔哈赤先按兵不动，待明守兵出城时，便毫不犹豫地派兵迎战，使明军大败。整个沈辽之战，都体现了努尔哈赤善于扬长避短、避强击弱的作战思想。

第四，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努尔哈赤在统一了邻近建州女真的几个小部，占领了一些城镇后，在赫图阿拉城“筑城三层，启建楼台”，其后即以之为后金都城。随着女真统一事业的基本完成，他积极备战，准备大举攻明。天命三年（1618 年），努尔哈赤决定在临近明朝防守重心的险要之地界凡山上筑新城，加大了后金的防御纵深。萨尔浒之战后，为了进一步掠夺财物与占领土地，努尔哈赤说服诸贝勒大臣及居民们携家带口搬到界凡居住，有意识地使后金基地前移，并以界凡为临时都城。天命五年十月，又把临时都城从界凡迁到距辽、沈更近的萨尔浒。次年三月，后金即以萨尔浒为依托，发动沈辽之战。攻占沈辽后，努尔哈赤又作出迁都辽阳的重大决策，把辽阳作为进军辽西的战略基地。广宁之战后，努尔哈赤认为沈阳是四通八达之处，是伐明、征蒙古、威胁朝鲜的战略要地，又于天命十年（1625 年）三月把都城迁到沈阳。他健全统治机构，整顿军队，缓和与汉人的矛盾，扩大与蒙古的同盟，发展生产，将沈阳建设成为对明战争的后方基地，为进军关内、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第五，采用多种手段侦察敌情。努尔哈赤同历代名将一样，深知掌握敌情的重要性。他接受并发展了古代的用间思想，“倚哨探为耳目”，“最工间谍”，准确及时地了解敌人的情况，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努尔哈赤侦察敌情，主要是用间，手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 338 页。

段巧妙，数量众多。明茅瑞徵任职方主事时，对努尔哈赤善用谍工屡有记载：万历四十八年正月，“辽镇新兵全伍脱逃，奴儿哈赤多遣奸细潜伺内境，市夷数报伯要儿、炒花等与奴酋歃血，约虏从三岔河迤东截漕船，奴酋从清（河）、抚（顺）犯辽阳，游骑往来抚顺间”。四月，“谍……诈称奴酋死，以懈我师，运铠甲赴辽河”①。兵部尚书兼辽东经略王在晋也屡有记述：“奴酋多遣奸细，潜伺内境”，“贼之奸细，混入其中，如沈阳攻陷，皆由降夷内应，其明验也”②。努尔哈赤运用间谍，刺探到明军的兵力部署、兵器配备的数量与种类、将帅的指挥特点、军队的士气、粮秣的多少等情报，有力地配合了后金军对明军的武力进攻。例如，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通过间谍，摸清了明将杜松、刘綎、马林、李如柏等人的指挥特点和师期等情况，了解到杜松与刘綎二人最为惧战，遂先派奸细打入其部，充当向导，终使杜松陷阵，刘綎战殁。开原之战前，努尔哈赤派遣的间谍早已伏于城中，并派人探知到明军将吏昏庸、兵士怯战、主力部队牧马南山而城中空虚等军事情报，于是后金军得以“乘虚而入”，不战而取开原。攻取辽阳城前，努尔哈赤早已利用降将李永芳在明军中的旧关系进行策反，结果后金军攻城时，城内民家、巨族，多为内应。

（四）“恩威并行”、军政兼施的策略思想

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对各部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③ 的策略，后来又将其用于攻明战争。他所说的“恩”、“德”，当然有其特定的内容，诸如谈和、盟誓、赐宴、联姻、赏赐、封爵等，都是一种策略和手段，其目的则是为了怀柔、拉拢、收买、瓦解对方，配合“兵临”以威服敌人。努尔哈

---

① 苕上愚公（茅瑞徵）：《东夷考略·建州》，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6～77页。

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二、卷四，北图怡府藏本。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01页。

赤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将“恩”与“威”、“德服”与“兵临”，亦即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巧妙地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1、攻城前先招降

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兵包围抚顺城后，努尔哈赤首先致书明守将李永芳劝降，说“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大臣相齐之理乎?”企图以官位、结亲诱其投降；同时又以武力威吓，“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倘中则必死矣。”并强调指出：“失此机会，后悔无及”①。李永芳看后，虽没立即作出抉择，但在八旗兵进攻时，他很快投降了。

2、优待和安置俘虏

努尔哈赤为了争取人心，规定了优待俘虏的政策：“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奸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② 对于至死不降的敌军官兵，则坚决予以打击；对放下武器者，则予优待。如攻打翁克落城时，城主鄂尔果尼、罗科二人射中努尔哈赤的头部和颈部，城破后，众将要求将已成为俘虏的鄂尔果尼、罗科二人杀死，努尔哈赤却说：“二人射我，乃锋镝之下，各为其主，孰不欲胜？吾今释而用之，后或遇敌，彼岂不为我用命哉!”于是，“赐以牛录之爵（属三百人），厚养之”③。

努尔哈赤对俘虏的处置，或编入八旗军，或安置务农。夺取抚顺后，对未抗拒者尽皆收养。此战共俘获30万人畜，降民编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40页。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39页。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甲申年九月，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09页。

为1000户，很快让他们与离散的兄弟、父子、夫妻、亲戚、家奴团聚，并分给马匹、耕牛、衣服、粮食等，使其生产、生活有了保障；对来自山东、山西、河东、河西、涿州、杭州、益州等的16名商人，给银子作路费，让他们带着写有“七大恨”的文告，返回家乡；其拆城兵4000人，亦遣归国。

3、用结盟、联姻、厚赏争取敌方军民归附

努尔哈赤善于利用敌营内部的矛盾，离间敌人，争取同盟者。起兵之初，为了对付尼堪外兰，他与苏克苏浒部的瓜喇、诺米纳、刚哈鄯、常书、杨书等“对天盟誓”，结为联盟，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刚哈鄯为妻。不久，诺米纳叛，努尔哈赤以计将他除掉后，对其部众尽还其妻孥，仍令居萨尔浒。在努尔哈赤政策的感召下，归附者日众，数年之间，先后有额亦都、安费扬古、费英东、何和里、扈尔汉等人前来归诚，并成为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后来成为“开国”的五大臣。

为了争取漠南蒙古，努尔哈赤利用蒙古人民渴求统一的愿望和蒙古封建王公互相争夺、分裂割据的有利条件，对各部蒙古封建王公进行分化瓦解，用各种手段争取其归附。例如，他不念科尔沁部两次动兵攻打后金的旧恶，娶科尔沁明安贝勒的女儿博尔济锦氏为妻，联姻结盟。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十子德格类、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也都先后娶科尔沁等部的女子为妻。努尔哈赤还把三弟舒尔哈齐之子图伦的女儿嫁给科尔沁部粤巴台吉为妻，终于以联亲结盟的形式，使科尔沁归附了后金。他又以赐女、赏赉、赐宴、封官爵等手段，与喀尔喀五部结盟，使其与后金“相与盟好，合谋并力，与明修怨”①。科尔沁、喀尔喀由联合明朝、察哈尔抗御后金，转变为联合后金对抗明朝的事实，说明努尔哈赤采用分化抚绥和武力征讨相结合的政策是成功的。

---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天命四年十一月庚辰。

二、皇太极及其军事思想

皇太极，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清朝的开创者。他在跟随其父百战创业时，就跃马弯弓，纵横驰骋，参加了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宁远之战，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于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 年）继汗位，天聪十年（1636 年）即帝位，先后统率八旗劲旅进攻宁锦、统一蒙古、东征朝鲜、迂回袭扰关内，最后同明王朝进行了松锦决战。实践表明，他不仅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现将其军事思想分述如下：

（一）先征服弱小之敌，拆散敌人联盟，尔后集中力量进攻强敌，统一天下的战略思想

皇太极即位后，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他清醒地看到，“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于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①。特别是在力量对比上，明朝“虽兵马屡挫，城池屡失”，但“国势屹然未倾”②，而后金则军事实力不足，短期内难以战胜明朝。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伐大木”的战略思想，为实现进取中原的战略目标，接受了汉官的建策，进一步确立了先征服比较弱小的朝鲜和漠南蒙古，拆散敌方联盟，解除后顾之忧，尔后集中力量进攻明朝，统一天下的战略思想。

对明朝，皇太极采取了“讲和与自固”③ 的政策，通过与明朝和谈，争取时间，巩固和壮大自己。努尔哈赤去世时，皇太极就与明辽东巡抚袁崇焕互派使者，开始“讲和”。和谈延续数年，双方均无诚意。袁崇焕上书熹宗说：“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

---

① 《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六月辛酉。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崇德二年七月辛未。

③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天聪二年奏本》。

说缓之。”[1] 这就道出了袁崇焕议和是以争取时间、加强防御为目的的。后金也同样把和谈当作一种策略，正如汉官高士俊所说：“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2]。不难看出，其真实意图在于通过和谈，麻痹、懈怠明朝，以赢得时间，壮大自己，待机而动。双方对和谈所持态度，决定了和谈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后金一面与明朝谈和，稳住明朝，一面于天聪元年（1627 年）和十年两次派兵东征朝鲜，迫使朝鲜王向后金称臣纳贡，与明朝脱离关系，解除了对明作战的后顾之忧。

对西北的蒙古族，皇太极利用蒙古各部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政策，先后将科尔沁、喀喇沁、奈曼、敖汉等部争取到后金一边，结成共同对付林丹汗的军事联盟，并于天聪二年（1628 年）、六年亲自率兵两次西征林丹汗，终于使漠南蒙古归附。

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皇太极征服了朝鲜，统一了蒙古，解除了后顾之忧，扭转了“四境逼处”的局面，从而对明朝形成了大包围的战略态势。他说：“今为敌者，唯有明国耳。”[3] 这就为全力进攻明朝创造了条件。

对明朝采取军事行动，皇太极也遵循了先弱后强的战略思想。刚继位时，他子承父业，仍以山海关和锦州等地为主攻方向，于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 年）再次率军进攻锦州、宁远，结果失败。他认真总结了宁锦之战的教训，说：“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

---

①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②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天聪六年八月《高士俊谨陈管见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第 24 页。

③ 《清太宗实录》卷二〇，天聪八年十月庚戌。

城邑可也。"[1] 于是，改变战略方向，从天聪三年（1629年）至崇德七年（1642年），先后五次大规模迂回入关，袭扰明朝腹心地区，给明朝军事上以沉重打击，经济上以重大破坏，瓦解了明朝的军心民心，动摇了明朝的统治。皇太极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2] 这就为集中兵力从正面向明朝发起进攻，为最后决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二）积极发展军事力量，重将恤兵，赏罚严明的建军治军思想

皇太极采纳了佟养性等人关于"凡兵食、器械，必先预备整齐，而后可以平定天下"[3] 的建议，认识到勤治农桑，发展经济，扩充实力，争取民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除了奖励垦殖，增强经济实力外，尤重视军队建设。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军制，成员基本上是满族，当时的蒙古人、汉人均隶属于满洲八旗。皇太极则于满洲八旗外，又编组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在保持和发展八旗兵骑射长技的同时，他又重视采用先进的军事技术，下令制造红衣大炮，用大炮和鸟枪装备汉军八旗，组建成后金的特种兵——炮兵部队，使后金在战场上"握全胜之势"[4] 成为可能。

蒙古、汉军八旗的设立，使八旗军制成为有清一代较为完善的军事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不仅扩大了兵源，使满、蒙、汉封建地主阶级的联合更加紧密，也从军事力量上为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条件。

皇太极重视选将任将。他说："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5]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二月甲寅。

② 《清太宗实录》卷六二，崇德七年九月壬申。

③ 《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二日《佟养性谨陈末议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第8页。

④ 《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二日《佟养性谨陈末议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第9页。

⑤ 《清太宗实录》卷二二，天聪九年二月壬午。

他把人才作为治军、治国的根本。在重用满族将领的同时，也重用汉官汉匠。他认识到："知汉人者，莫如汉人。"① 故令汉人荐举人才，对有才能的汉官汉将予以重用。如范文程，在努尔哈赤时只不过是个章京，皇太极则令其参与帷幄，成为他的主要谋士之一。皇太极在加强中央政权，执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凡事都要臣下先去问范文程。范也竭力为后金（清）政权效劳。再如，皇太极对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祖大寿等均"授以高爵厚禄"，以使其"感恩图报，赞襄治理，有裨于国家"②。特别是孔、耿、尚皆封王，所部分别改编为经制八旗汉军，这对壮大后金（清）军事力量，战胜明王朝，发挥了重要作用。洪承畴被俘后，皇太极非但未将其杀掉，反给予很高的宠遇。当时后金诸贝勒大臣感到很不理解，皇太极问他们："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大臣们回答："欲得中原耳。"皇太极饶有风趣地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③ 于是，洪承畴成为清军入关荡平全国，建立和巩固大清政权的得力人物。

关于如何选拔将帅，新附生员杨名显、杨生辉等建言：应做到"随材器使，比较优劣。有文武全才者，固首擢之。如武优而文劣者，亦用之，使得展其武略；如文优而武劣者，亦用之，使得施其文谋。"④ 皇太极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量材录用，对文官武将皆能"随材器使"，做到用其所长。正是这些各显其能的文官武将，帮助皇太极成就了大业。

皇太极很注意通过实战考验选拔人才。例如，在攻打遵化时，正白旗小卒萨木哈图奋勇先登，砍杀明守兵，继而后金兵接连而上，遵化城很快被攻克。在庆功会上，皇太极持金卮慰问萨

---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二二，天聪九年二月乙未。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三六，崇德二年六月甲子。

③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

④ 《清太宗实录》卷二二，天聪九年二月己亥。

木哈图，并说："我军年来皆怯于攻城，况此城较前所攻之城更坚，萨木哈图奋勇先登，殊可嘉也，宜优录之。"① 不几天，就授予萨木哈图以备御之职，允子孙世袭，并赐予巴图鲁（勇士）称号。对随萨木哈图相继登城的下扈什布、多礼善也授予备御职务。攻永平时，称赞奋力登城的副将阿山、叶臣及猛士 24 人为"第一等骁勇人"②，并提拔录用。

体恤士卒，爱惜兵丁，也是皇太极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看到八旗将士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认为这主要是将帅对兵士太严酷造成的，所以一有机会就教育诸将要爱养士卒。他用古时良将将酒投入河中，与士卒同流而饮的故事教育诸将，说："观古史所载，将帅必体恤士卒。如我国额驸顾三台与敌交锋，士卒有战死者，尝以绳系其足曳归，主将之轻蔑士卒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③ 后来，凡战都令诸将把阵亡士卒骨骸收藏掩埋。皇太极认为，对阵亡将士予以安葬，受伤的予以治疗慰问，这是"上恤下之道"④。在皮岛之战中，八旗兵阵亡 40 多人，在埋葬他们的尸骸时，皇太极还专门写了祭文，并特派礼部参政图尔寨持祭文专程往祭。

皇太极爱惜兵丁，体恤兵众疾苦，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表率。对于勇敢堪充营伍而家贫者，查实后，"无妻者配以妻，无马者给马以养之"⑤；对于各旗无力耕种、不能赡养老人者，有兄弟则令其兄弟帮助，无兄弟则令牛录下殷实有粮者供养，不能让老人无依无靠。兵士负伤患病，皇太极都很关心，给予医治。在围攻遵化城时，他得知伊孙的手被炮击伤，亲自去看望；总兵官佟养性部下一兵士脚被炮击伤，他立即派医生前去治疗。对于立了

---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一月甲申。

② 《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二月辛亥。

③ 《清太宗实录》卷八，天聪五年正月己亥。

④ 《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八月癸丑。

⑤ 《清太宗实录》卷四二，崇德三年六月丁丑。

战功的勇士，皇太极更是加意保护，曾下令士卒中“有一二次率先登城立功者，亦不可再令攻城，以示朕爱惜材勇之意”①。

皇太极的恤兵思想，对于笼络人心、缓和军队将士之间的矛盾、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当时八旗兵出征，官兵大都以掳掠为能事，所以皇太极治军，强调严格军纪。每次出征，必先宣布行军和战场纪律。他说：“大军征讨，必纪律严明，方能克敌制胜。”② 对士卒犯有掠夺民众财物、宰杀民众牲畜、毁坏庙宇等罪行的处罚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正是由于对八旗将士严格纪律，才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皇太极注重赏罚，采取有功奖赏、有过必究和鼓励将功补过的政策。他说：“凡行军之际，克城多而我兵俱全者为上，克城多而我兵稍有损伤者为中，至克城少而我兵大损伤者为下，宜罪之。”③ 每次战后，对八旗将士都要按照战场表现和战功大小“叙功行赏”。为树立军威、严格纪律，对违犯军纪、作战失利者，则严加惩处。

皇太极积极发展军事力量，重视将领的选拔和任用，严格治军的思想，大大提高了八旗兵的军事素质，增强了战斗力，为击败明军，战胜农民军，夺取和巩固全国政权，创造了条件。

（三）以持重用兵和改进攻城战术为特点的作战思想

皇太极早年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继汗位称帝后成为后金（清）军队的最高统帅，指挥过多次规模较大的战争，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作战思想。

1、重视战争准备，持重用兵

战争是作战双方力量的竞赛，而战前准备充分和指导正确，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皇太极和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军事家一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二月辛亥。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一一，天聪六年三月丁巳。

③ 《清太宗实录》卷六五，崇德八年六月己丑。

样，十分注意战前准备，待实力增强、条件成熟时再采取军事行动。

后金于宁、锦两次战败后，力量受到很大削弱，而明朝的宁锦防线，由于孙承宗、袁崇焕的多年经营，却日益巩固。皇太极对此是清醒的，尽管汉官高鸿中、宁完我、鲍承先、范文程等一再建言促其早日进取中原，但他却一再推迟，抱持重态度。他认为，要实现入主中原的战略目标，决非短期内单凭武力征服所能达到，必须长期进行多方面的准备。他说："治国之要，莫先安民"①。又说："厚生之道，全在勤治农桑耳。"② 他把调整生产关系，缓和民族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放到首要地位，并注重接受明朝先进的军事技术，制造火炮，增强军事实力。为了削弱明朝，他多次派兵迂回入边袭掠，从经济上军事上削弱明朝，充实后金。经过十多年准备，后金已达到"器械精，粮草备，人马健，将酋勇"，而明朝则衰颓至"军马单，火器少，饷无银，地势孤"，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明臣哀叹说："以奴（指后金）之势力，在昔不当我中国一大县，每临阵犹势相均，力相敌也。迄于今，而铸炮造药，十倍于我之神器矣。抢夺马匹器械，百倍于我之马匹器械矣。虏掠丁壮兵民又不啻十数万生聚矣，捆载辎重金帛又不止百千万财宝矣。其富其强益以骄悍之性，无厌之欲，方张之势，内攻山海，外攻宁远，此必至之情，必然之势也。"③双方军力对比发生变化后，皇太极才定下进行松锦战略决战的决心。

2、周详筹划，慎重决战

入主中原，与明王朝争夺全国政权，是后金（清）的战略目标。天命末和天聪初两次宁锦战败，迫使其不得不慎重与明军主

---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甲戌。

② 《清太宗实录》卷六五，崇德八年六月己卯。

③ 《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兵部题〈御前发下辽东巡抚黎玉田题〉残稿》。

力决战，周详筹划对明战争。崇德五年（1640 年）正月，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人，联名提出一份“进取”大计的奏疏，阐述攻明的战略方针。皇太极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既没有采纳其“直捣”北京的“刺心”之术，也没取“直抵”山海关的“断喉”之术，而是采取了第三种方案，即先取宁锦的所谓“剪重枝伐美树”之计。这是一个周详筹画、持重前进的选择。皇太极认为，要实现进取中原的战略目标，首先必须消灭山海关外的明军主力，破关而入。“欲取（山海）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① 他抓住这个关键，把着眼点和突破口选在锦州。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3、兵权集一，统一指挥

努尔哈赤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保证了战争的统一指挥，顺利地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夺占沈、辽。但后来形成的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制度，分散了兵权。皇太极即位后，凡事不能自专，甚至影响到战争的统一指挥。如天聪三年（1629 年）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大军至中途，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竟闯进御幄，以大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为由，挟迫皇太极班师，严重干扰了皇太极用兵的决心②。

皇太极为使兵权集一，逐步限制、削弱对手。他仿明制设立六部，又设文馆，不久又改文馆为内三院，加强了自己的权力。接着，又以各种罪名囚禁二贝勒阿敏，革去莽古尔泰的三贝勒、代善的大贝勒名号，将他们原来控制的兵权夺了过来。皇太极通过以上手段将军政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旧制，确立了自己“南面独坐”的地位③，为统一指挥以后的战争创造了条件。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9 页。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月辛未。

③ 《清太宗实录》卷一一，天聪六年正月己亥。

4、发展攻城战术

后金八旗劲旅，以骑射为长，善野战冲杀，以驰突取胜。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和萨尔浒之战中，都是充分应用八旗兵的这一特点而胜敌的。后来攻取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时，基本上是诱敌出城，野战歼敌。宁远、宁锦之战，八旗军屯兵坚城之下，面对明朝西洋大炮的轰击，暴露了它的短处，因而两次作战均遭惨败。

皇太极亲身经历了宁锦两次惨败，认识到原来单纯以骑射、野战取胜的作战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条件下的作战需要，因而，改进攻城战术，刻不容缓。他本着扬长避短，取敌之长，补己之短的原则，对攻城战术加以改进。

（1）从诱敌出城发展到围城打援

努尔哈赤时，攻城多采取诱敌出城、聚而歼之的战法，沈阳、辽阳等城都是采用这种战法夺取的。

天命十一年（1626年）和天聪元年（1627年），明军“凭坚城，用大炮”①，固守宁远，八旗兵连战连败，以致“怯于攻城”②。皇太极接受了这一以短击长的教训，遂改取长围久困和围城打援的战法。天聪五年（1631年）攻大凌河城时，皇太极对将士们说：“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③ 他命楞额礼、伊尔登、和硕图等分别从四面包围，环城四面挖壕，八旗兵沿城扎营45处，并令佟养性率汉兵载红衣大炮于锦州大道，拦截明军援兵。明军被围数月，最后“城中粮竭，商贾诸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④，守将祖大寿不得不献城投降。这是八旗兵围城打援战术取得的首次胜利。

---

①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一月甲申。

③ 《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八月戊申。

④ 《清史稿》卷二三四，《祖大寿传》。

松锦决战是围城打援战法获胜的又一战例。当时，皇太极派济尔哈朗、多尔衮率军对锦州久困长围，又掘深壕，沿壕筑垛口，断绝明军外援。明廷派洪承畴率八镇兵13万人马去解锦州之围，皇太极立即倾国中之兵赶至松山一带截击，结果大败明军，迫锦州守将献城投降，进而占领塔山、杏山。此役进一步丰富了攻取大凌河城的经验，使攻城战术有了新的发展。

(2) 从靠机械助攻发展到用火炮攻城

八旗兵攻城，早先采用云梯、战车等机械助攻。天命末、天聪初的两次宁锦之战，由于明军大量使用西洋大炮，后金再借助机械助攻，已无济于事。皇太极深知其短，决心取敌之长，制造火炮。天聪五年（1631年）红衣大将军炮铸造成功后，每攻城必携带而往。后金自开始制造火器并应用于战场后，即迅速地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也引起了攻城战术的变化。例如，攻大凌河城时，后金首先用火炮扫荡了周围明兵盘踞的墩台，为强攻开辟了道路。特别是距城较远的于子章台，垣墙坚固，难以攻取，皇太极遣将8员，率兵500人和全部旧汉军，载红衣炮6位、将军炮54位，连续攻击3天，才轰坏城垛，迫使台内明兵投降。

(3) 由屠城转变为降城

努尔哈赤时，每攻城，即大肆屠杀。天命四年（1619年）攻开原时，明军城外之兵被“尽截杀于壕内”，“城中士卒尽被杀”①，城中财物、金银、牛马皆被掠去。后金军撤离开原城时，又将城毁坏，公私房屋尽行焚毁。努尔哈赤攻打铁岭，同样是一场血腥杀戮。守城的明军全被杀害。攻夺辽阳时，守城明兵被杀者多达7万人。

屠城的做法，往往促使敌方守城军民誓死固守。皇太极即位后，决心改变这种情况。天聪四年(1630年)阿敏从永平撤退时，

---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四年六月初十，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53页。

竟又屠城。皇太极对此大为恼火，把“尽屠永平、迁安官民”①作为阿敏的罪状之一，将其幽禁严处。皇太极通过各种渠道，反复申明不再妄杀的政策，终使明大凌河、锦州城等守城军民决意献城投降，从而避免了一场场大屠杀，顺利地夺占辽西各战略要地。

皇太极的军事思想吸收了中原汉族军事文化的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军事思想宝库，对有清一代军事有重大影响。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七，天聪四年五月乙卯。

第四章　清军入关建立清王朝

第一节　复杂多变的军事、政治形势

自明清松、锦决战到清军入关进占北京，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的军事政治斗争形势处于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东北有生机勃勃的清朝地方政权，中原地区有蓬勃发展的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处于东西两面夹击之中的大明封建政权则摇摇欲坠、岌岌可危。明、清和农民军三大军事政治势力相互间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搏斗，都在极力争夺战场上的主动权。

一、明王朝东和西战战略的破灭

明军在东线战场惨败，连丢松山、杏山、塔山、锦州四城，洪承畴、祖大寿等名将，有的投降，有的被俘，崇祯帝朱由检只好诏令吴三桂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四城。明朝统治集团震惊之余，已深感无力再战。更严重的是内地农民军蓬勃发展，成为明廷的最大威胁。在此情况下，明廷决定暂停辽西战事，把主要战略方向由东线转向西线，调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 年）初，为了稳住东线，崇祯帝密谕兵部尚书陈新甲向清求和。陈新甲秉承朱由检的意旨，派职方司官马绍愉为使臣与清方谈判。由于种种原因，议和使团滞留宁远、塔山等地数月之久，直至五月始到沈阳。

皇太极对这次议和使团比较重视，派出使臣到塔山迎接。清统治集团对议和有两种意见：一是以满洲统治集团为代表，拒绝和谈。他们认为，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一是

汉族官僚集团为代表，主张以黄河为界，分而治之。如祖可法、张存仁等人认为：明朝“盗贼”蜂起，饥馑载途，兵力尽竭，已处瓦解之势；关外九城已失其四，兵将已失十之八九，所倚文臣武将皆被擒获；处于危亡之际的明王朝，如再进攻它，必然要迫使其南迁。为此，他们建议：对明朝要“首广其地，次广其财。广其地，以穷彼国之势；广其财，以竭彼国之力。广地以黄河为界，上策也；以山海为界，中策也；以宁远为界，下策也。广财令彼纳贡称臣，为上策；令蒙古各家索其旧额，为中策；止于关口互市，为下策。”① 皇太极既不同意立即进军北京，也未采纳分而治之的建议，而是主张通过和谈维持现状，稳步实现与明争天下的战略目标。六月初三日，谈判结束，马绍愉一行离沈返京。皇太极在让明使团带给崇祯帝的回信中充分表达了和好的愿望，提出陆上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明方国界，以塔山为清方国界，海上以宁远附近的黄城岛为界等条件。皇太极此举的目的就是先拖住明朝，使明军与农民军互相拼杀，相互削弱，清军乘机保存和扩充实力，静观待变。

明朝使团返回北京后，和谈之事便杳无音信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议和是暗中进行的，事情泄露后，崇祯帝为避免引起朝廷的纷争和混乱，令斩陈新甲；另一方面，崇祯帝认为，清朝的条件太苛刻，如答应画界分治，不但使清方所占宁远以东地区合法化，而且宁远以西仍然随时有丧失的危险。于是，朱由检不得不放弃东和西战的战略意图，支持宁远守将吴三桂选将练兵，增强防御措施，阻止清军向山海关逼近，重新回到两面作战的道路上来。

吴三桂（1612～1678），字长伯（一作长白），原籍江苏高邮，后迁辽东中后所（今辽宁绥中）。明锦州总兵吴襄之子。以父荫袭军职，后授都督指挥，崇祯十二年升任总兵官，镇守宁远。在松锦决战中率部逃跑，战后被降三级，仍守宁远。吴三桂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〇，崇德七年五月丙申，中华书局影印本。

受命之后，收拾松锦战败后的散乱部队，并抽调骨干训练辽民，终于重新组织起一支大军，“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①。吴三桂不时巡防宁西四城，督促各城加固防御工事，增强抵御能力。于是，宁远等城军民重新振作起来，作好了迎击清军进攻的准备。

二、清军攻宁破关战略再次受挫

对吴三桂，清朝最初的企图是进行诱降。清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四月初二日，汉官张存仁献策说：“今松锦既破，明督臣洪承畴就擒，镇臣祖大寿归降，凡明之将帅就（孰）不惶惧？惟总兵吴三桂尚在观望，宜颁御札于宁远城中，详示逆者必杀，顺者必生，有不动其心者乎？”② 皇太极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暂不采取军事行动，而向吴三桂发起政治攻势，企图不战而取宁远及宁西四城。

皇太极令胡宏先、裴国珍、吴三凤、祖可法、陈邦选等连名致书吴三桂劝降，又令吴三桂舅父祖大寿致书劝降，甚至亲自遣使敕谕吴三桂诱降，结果均不见成效，吴三桂继续效忠明王朝。

由于对明宁远及宁西四城守将吴三桂招降失败，皇太极决心诉诸武力，再次迂回入边袭扰明朝腹地，并下令作好准备，伺机对宁远发动军事进攻。当年十月，皇太极任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内大臣图尔格为副将军，率八旗和蒙古兵 10 余万人征明。十一月初五日，左翼兵从界岭口（今河北迁安、抚宁交界处）毁边墙而入；十一月初八日，右翼军从黄崖口（今天津蓟县北）入长城。两路清军于蓟州（今天津蓟县）会师后，经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四，顺治元年三月乙卯，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135 页。

② 《贰臣传》卷二，《张存仁列传》，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铅印本。

京师郊区南下真定（今河北正定）、河间，转攻山东。至次年，攻掠临清，分路掠取兖州、莒县、沂州（今山东临沂）、济宁等地，最后于河间分左右两路班师，至密云会合，出墙子岭返回沈阳。清军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强烈抵抗，但明军多观望不敢战。此次征战历经8个月，攻克明3府、18州、67县，计88座城镇，俘获人畜36.9万口，掠取大量金银财物，使明朝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

在这次征战中，反映出皇太极企图利用或联合大顺农民军的力量灭明的思想。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已略定河南，军势大盛。清军出发前，皇太极谕令部将："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赍书来奏。"① 但是，农民军的宗旨和清军攻明根本不同，因而这种联合是不可能实现的。

皇太极派军出征明朝腹地后，一直在焦急地寻求打通宁远、山海关通道的良策。崇德八年正月，祖大寿献计说："以臣目击机会，先取山海关五城最为上策。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虚实，兵之强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时攻取中后所，收吴三桂家属，彼必为之心动。其余中右所、中前所、前屯卫，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于破宁远，山海军士皆四方乌合之众，不谙阵战，绝其咽喉，撤其藩篱，海运不通，长城不守，彼京师难保，三桂安能固守宁远也。"② 他的设想是立即发兵进攻山海关等五城，孤立宁远，迫吴三桂归附。皇太极采纳其部分意见，并分析了明朝的"必亡之兆"③，准备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但尚未取得进展，皇太极自己于八月病故。顺治帝福临即位后，因其年幼，以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为摄政王。多尔衮继续皇太极的事业，遣师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三，崇德七年十月壬子。

② 《贰臣传》卷五，《祖大寿列传》。

③ 《清太宗实录》卷六五，崇德八年六月癸未。

进攻辽西走廊西四城，于九、十两个月内先后击溃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明军，但因宁远兵民誓死守城未能攻克而撤军。

三、大顺军攻陷京师和山海前线形势剧变

崇祯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于湖北襄阳建立政权。不久，农民军北伐，至十月攻破潼关、西安。接着，李自成又分兵三路夺取陕西、三边，完成了先定关中的战略计划。明廷命东阁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授予全权，代替朱由检“亲征”。李建泰动身去山西招兵买马，刚到良乡（今北京市西南），闻山西告急，就吓得跑到保定城中躲了起来，后溃于真定。次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建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此时，李自成的军队经过整顿共有骑兵60万，步兵40万，合称百万，军纪严明，所向披靡。二月，李自成率领大军主力在山西龙门（今河津西北）渡黄河，破汾州（今汾阳），取河曲（今河曲南）、下静乐，攻太原。

在大顺农民军顺利向北京进军的过程中，李自成一度想招降崇祯帝朱由检。二月初六日，李自成给朱由检及其群臣的诏书说：“兹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又说：“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章尔之仁。”① 诏文降低了对崇祯帝指责的语调，提出只要崇祯帝投降，可允其以附庸国的地位继续存在。

李自成一边向崇祯帝招降，一边乘着节节胜利的势头，继续向北京进军。二月初七日，占领太原，全歼太原守军，俘晋王朱求桂。为了一举攻占明朝京师，李自成决定由太原分兵两路：南路军由刘芳亮率领，出固关（今山西平定东北），趋真定，其战

---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李自成伪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66页。

略目标是先扩大大顺政权的统治区，切断明廷与南方各省的联系，防止明廷南逃，阻挡山东、南直隶明兵北上“勤王”，以便起义军从南面进攻北京；北路军由李自成亲率，出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北上，趋大同，从北面进攻北京。南北两路相互配合，北路为主攻方向。大顺军的南北合进十分顺利，北路军在宁武关与明总兵周遇吉部遭遇，激战7昼夜，全歼明军，于二十九日攻破宁武关。接着，明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守将姜瓖、王承胤、唐通等纷纷投降。

宣府、大同等处被农民军攻陷，京师危在旦夕，明廷再次讨论调兵入卫京师问题。最后，崇祯帝朱由检不顾东线边关安危，只求保住大明政权，竟于三月初六日诏令吴三桂弃宁远和山海关外的全部土地，率兵入关保卫京师。三月十三日，吴三桂弃宁远，率师勤王，尚未到京，大顺农民军已兵临北京城下。

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合围北京。次日，李自成与刘宗敏、李大亮等高级将领亲临彰义门，派投降的原明监军太监杜勋向崇祯帝劝降，提出“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藩”，结果是明朝“当局茫然无应”①。李自成与明联兵抗清的谈判没有结果，遂于十八日下令攻城，次日夺占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政权。

吴三桂弃宁远入关的行动引起了辽东战局的急剧变化。宁远明军一撤，沿途50万军民拥入关内。三月二十日，吴三桂至丰润，接到京师失守的消息，便下令停止前进，驻营观望。李自成一面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兵2万东攻滦州（今河北滦县），直取山海关，一面派人赴吴三桂处招降。吴三桂认为：“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遂决定“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②。他虽有投降之意，但到滦州时，突闻其父吴

① 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卷一，《睿谟留憾》，上海书店1982年版。

②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页。

襄已被农民军追赃拷问，经权衡利害，遂改变主意，坚决与农民军为敌，于三月二十七日击溃农民军唐通部后返回山海关，并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持书向清乞师。从此开始，吴三桂走上降清并企图与清军联合共同对付农民军的道路。

清摄政王多尔衮早已注视着中原农民军的发展及明朝统治不稳和山海前线战局的变化。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二十六日，正当李自成略定三边，并向京师进击之时，清朝就曾遣使前往陕西，向农民军提出“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① 的要求，遭到冷遇。多尔衮得知农民军迅速向京师进军，认为兴师西进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机已到。三月二十六日，顺治帝谕令“修整军器，储糗秣马，俟四月初旬大举进讨。”② 四月初四日，清军即将出发之际，大学士范文程得知农民军已进占北京，即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提出了进取中原的计划和策略。他说：“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③ 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一改过去企图与李自成联合的政策，决意进取中原，与农民军争天下。

四月初，大顺军和清军主力都大规模向山海关方向机动，处于二者之间的吴三桂乞师降清的意向已定，山海关地区的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第二节　山海关之战

（见附图4）

山海关之战，是明清战史上一次重要战役。经此一战，我国

---

① 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三，顺治元年三月甲辰。

③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顺治元年四月辛酉。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李自成农民起义，一下子从夺得全国政权的地位跌落下来，而崛起于东北的满族封建统治者却破关而入，一举从农民军手中攫取到全国政权，并统治中国近300年。

山海关依山面海，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明代后期，经过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名将的长期经营，成为明朝北部边防防御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阵地，拱卫京师的门户。山海关也是后金（清）不可逾越的障碍，八旗兵迂回入边，袭扰明朝腹心地区，但不能“得明尺寸地”，究其原因，“皆由山海关阻隔”① 之故。

一、吴、清联兵的完成

吴三桂派出使者赴清乞师之后，于三月二十九日才收到其父吴襄的劝降信，但吴三桂明确表示拒降。他复信说：“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虽置父鼎俎傍以诱，三桂不顾也。”②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坚决不降，令白广恩、王则尧带犒师银星夜赴永平（今河北卢龙）增援唐通并继续招降吴三桂，结果又被吴三桂击溃。吴三桂以农民军为敌的决心难以改变，遂纵兵至永平府沙河驿大掠而东，“顿兵山海关”，准备“规取京师。”③

四月初，清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作出了进取中原的决策后，即令70岁以下、10岁以上的男丁从军。四月初八日，顺治帝命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④。次日，多尔衮同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等率兵10万向山海关挺进。十三日，进至辽河，闻大顺军已攻占北京，立即召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页。

②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第230页。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乱》。

④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乙丑，中华书局影印本。

开军事会议。降清的原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献策说："我兵之强，流寇可一战而除。"又说："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追剿，倘仍据京城，则扑灭更易。"① 这一建策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军是清军的主要敌人，同时指明了此次出征的主攻方向及行军路线，得到众多文臣武将的赞同。多尔衮采纳了这一建议，传令三军，取道蓟州、密云而不走山海关，以加速进军。

四月十五日，清军师抵翁后（今辽宁阜新市一带），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杨坤、郭云龙持吴三桂书前来乞师。吴三桂的信称："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② 多尔衮得吴三桂欲合师西进之请，深感意外，将信将疑，他将杨坤扣留军中作人质，遣学士詹霸、来衮同吴使郭云龙先持复书到山海关，一则探听虚实，为改变进军路线作准备，一则要吴三桂降清。多尔衮在复吴三桂的书信中说："及伯（指吴三桂）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又说："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③ 从此，多尔衮在政治上、军事上实现了战略、策略的根本转变，从"伐明"转为与农民军为敌。二十日，清军前出至连山（今辽宁锦西）。此时，李自成已亲统大军直指山海关。在此紧急时刻，吴三桂从保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下定向清军投降，"剿灭"农民军的决心，一面部署"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一面又急派郭云龙、孙文焕持书赴连山，敦促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④，合师进剿大顺农民军。

多尔衮接书后，本想进一步观察吴三桂的真实动机，恰在此

---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庚午，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1 页。

②③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壬申；四月癸酉。

④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丁丑。

时得报李自成所率大军已离永平，急驰山海关，为防贻误战机，遂命清军星夜前进。清军一昼夜行200余里，于二十一日黄昏到达山海关外10里处的欢喜岭。随即“高张旗帜，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营觇之。三桂复遣使往请，九王（指多尔衮）犹未信。请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犹未即行。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而全军始至”①。多尔衮和吴三桂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终于最后完成了满汉贵族官僚的勾结。

二、作战经过

李自成连续派人向吴三桂招降，皆未获实际效果，且从吴三桂给其父吴襄的家书中得知他已向清方借兵。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得到吴三桂连续击溃大顺军，并发檄文坚决与农民军为敌的消息后，将吴襄下狱，决意用武力消灭吴三桂。十二日，李自成召集诸将讨论东征事宜，并“决策亲行”②。次日，李自成令牛金星、李牟以老弱万人留守京城，亲率刘宗敏、李过等将士5万及亲简精锐7000人开始东征。这天清晨，大军出长安门，李自成率精锐出正阳门，向通州（今属北京市）开去，亡明太子及永、定二王随往。十五日，李自成至密云，从天津海运米粮充实军饷。至三河县时遇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有投诚之意。李自成中了吴三桂的缓兵之计，放慢向山海关进军的速度，又派明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尚书衔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当得知使者被扣留，吴三桂做好了迎战准备时，已是四月二十日，李自成分析形势，认为别无选择，“成败决于一战”，于是速令大顺军“连营并进”③。吴三桂拒降，他为了阻止李自成东攻山海关，先将当地地主武装组织成营，并于大顺军必经之路列阵。大顺军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吴三桂请兵始末》，第495页。

②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第239页。

③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乱》。

一举将其击溃，直逼山海关。

山海关以关城为中心，四面各有城。东西有两罗城，南北有两翼城，加上长城、关隘、墩台、城堡等，形成相互连结、唇齿相依的防卫体系。南翼城面向大海，敌人无从通过。西罗城面向关内，前有南北走向的石河，成为关城的天然屏障，而河西则为开阔地，成为山海关大战的重要战场。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李自成到山海关后，先于石河与吴三桂率领的明军和乡勇交战。经过大顺军数次猛烈冲杀，吴三桂军的阵线开始动摇，于是李自成采取如下部署：令唐通率部绕道出关，首先从一片石（今辽宁绥中县九门口）向东突击，切断吴军退路；派出数千精锐骑兵，冲破敌阵后直攻西罗城，在后续部队的支援下，分头围攻北翼城和东罗城；李自成亲率主力，继续留在石河西与敌对阵，牵制吴军主力。

交战从早晨开始，农民军先于西北角突击，数百骑直冲西罗城北。同时，集中兵力攻打北翼、东罗二城。双方展开激战，尤以石河一带的战斗最为激烈。大顺军“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①。吴三桂军东西驰突，企图突围，未能得手。至中午，由于农民军英勇攻城，北翼城、东罗城旦夕可下。

清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向山海关疾驰，他采纳洪承畴、祖大寿等人的建议，对入关作了如下部署：以英亲王济尔哈朗率万骑为左翼，入西水关；以豫王多铎率万骑为右翼，入东水关；自将3万骑为主力，从正面主攻，余为预备队。但是，清军于二十一日傍晚进至欢喜岭后，并未立即投入战斗，而是观变待机，仅于当晚派兵击败一片石之唐通部，使李自成从关内外夹击吴三桂并切断吴军与清军联络的计划未能实现。

由于形势万分危急，而清军又屡请不至，吴三桂见情势危急，只得于二十二日清晨率数百亲兵出关降清。多尔衮于欢喜岭威远台与吴三桂盟誓，决定合师镇压农民军。吴三桂剃发称臣，

---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244页。

将山海关城拱手移交给清军。当时，吴三桂约有关宁 5 万之众，加上地主武装共约 8 万人左右①。清军除少数兵力留守沈阳外，约有 10 余万人参战。合计吴、清联军约有兵力 20 万左右。

清军前出至山海关城下，见大顺军炮火向东猛轰，火光烛天，迟疑不敢进。多尔衮也畏惧农民军，不敢贸然轻战，令诸王、贝勒、贝子、公及诸大臣等“毋得越伍躁进”。他令吴三桂充当前锋，“以白布系肩为号”②，先行入关，自己殿后指挥。当天上午，三路清军分别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入关。

吴三桂与清军的联合，使李自成原定在清兵入关前夺下山海关的计划未能实现。于是，李自成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急令农民军沿石河列阵，“自北山横亘至海”，成“一”字长蛇阵，张两翼封锁包围吴三桂军。清军亦“向海列阵”③。吴军则布列于右翼边缘，准备集中兵力，向大顺军突击。当时，正值大风疾驰，尘沙蔽天，天气一下变得十分恶劣。中午，吴三桂首先出动全部精锐与大顺军交战，陷入农民军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困难，而清军却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吴军拼命突围，围开复合，死伤惨重。大顺军个个英勇陷阵，与敌展开肉搏战。双方苦战到太阳偏西，都已精疲力竭，多尔衮见势，立刻令阿济格、多铎率正白旗、镶白旗 2 万骑兵精锐为先锋，从吴三桂阵右突入，“白旗所至，风卷潮涌，皆披靡莫能当”④。清军直冲农民军主力部位，大顺军自相践踏，死伤惨重，共有 15 位将领牺牲，并丢弃大量辎重。李自成见败局已定，率精骑数千撤往永平，廿六日退回北京。

---

① 据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象考察》，《历史研究》1978 年第 5 期。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己卯。

③ 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己卯，第 62 页。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第 244 页。

三、双方作战得失和胜败原因

山海关之战，是明清之际对全国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对农民军和清军都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吴、清联军的胜利为清王朝入主中原开辟了道路。“定鼎燕京，一统之基，实始于石河一战”①。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正义之师，经过长期斗争，最终推翻了明王朝，但山海关一战失败，迫使其不得不采取战略退却的方针。

（一）大顺农民军失败的原因

第一，战略指导上的失误。李自成对清军一直缺乏应有的认识，进入北京之后，虽然对吴三桂做了一系列的争取工作，对关外清军也有一定的警惕，但从整体上看，对明朝残余势力和新兴的清政权的军事实力及政治军事动向认识不足，特别是对清军西进夺取全国政权没有足够的估计，因而没有在京东以至山海关地区部署重兵。李自成满足于已取得的胜利，对夺取和巩固全国政权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认识，更无深谋远虑，对清军入关及其与明朝残余势力的联合，缺乏周全的战略对策和实际措施。他只把注意力放在对吴三桂的招降上，而对其可能降清并联兵镇压农民军，缺乏足够的警惕，更无全盘的战略考虑，以致在吴三桂降清并联合清军向农民军发动进攻时，缺乏应变准备，结果非但未能消灭吴军，反而遭清军突袭，直至全军溃败。

第二，指挥失当，未能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李自成自恃手中握有几十万大军和占有中原、西北、华北大片土地，对与明朝最后一支劲旅关宁铁骑及清军八旗劲旅作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因此，在大顺军胜利地占领北京，部队尚未来得及休整，尤其还没组织好战略预备队的情况下，仓促赴山海关

① 佟墉纂修：《临榆县志》卷首，康熙己酉冬月陈天植序，民国十八年（1929年）铅印本。

应战，陷于被动。李自成预想的作战对象更多的是吴三桂，对清军迅速到达山海关参战未作充分准备，所以农民军对山海关采取三面包围的做法恰巧为吴、清勾结并联军西犯留下一条通路，从而造成农民军的被动态势。农民军在起义之初和发展壮大过程中，采取流动作战和进攻作战的作战形式是正确的，但在攻打明朝多年经营的山海关城时，未能稳扎稳打、久困长围，构筑坚固阵地，也是使自己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

第三，兵力不足，战斗力较弱。清、吴联军号称 20 万，农民军开往山海关的兵力约 8 万人，数量大大少于清、吴联军。以往农民军与战斗力较弱的明军作战，每次战斗一般都投入数倍于敌或更多的兵力。此次作战，作战对象是有“关宁铁骑”之称的吴三桂部和骁勇善战的八旗兵，农民军不但军队数量上劣于敌人，而且在军队素质上也不占优势。农民军多未经正规训练，且连年作战，疲惫不堪，刚进北京未加休整即转兵东征，劳师远袭，对战斗力也有一定影响，有些将士进北京后掳掠了不少财富，一时被富足的天堂生活所吸引，参战立功的激情大减，战斗力已今非昔比。相反，清八旗劲旅经过几十年征战，愈战愈强，且有入主中原、统一中国的共同目标，士气高昂。吴三桂率领的关宁铁骑，为长期戍守宁锦防线的精锐，曾进行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奉命勤王入卫京师时又进行过“报君父之仇”的思想动员，且处以逸待劳地位，因此士气也较高。从以上看来，农民军的劣势地位也是失败的重要因素。

（二）清军取胜的原因

第一，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皇太极时期，清军以夺取关外的宁、锦地方为主，并迂回深入明朝腹地，削弱明朝实力。然而，终皇太极之世，明朝国力、军力虽受到很大削弱，但突破山海关防线，进入中原的条件并不成熟，所以他一直未采纳直取燕京的建议。皇太极死后，福临即位，摄政的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一直力主早日进入中原。“聪慧多智，谋

略绝人”① 的多尔衮，迅速而妥善地处理了满族贵族集团内部因争夺帝位而引起的矛盾，使各派势力在对明战争上彼此协力一致，为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他在逐鹿中原的关键时刻，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当吴三桂自宁远撤兵勤王时，多尔衮立即率兵西向，准备大举。在农民军顺利向北京进军时，多尔衮曾把农民军当作友军，企图联师共同打击明王朝；当农民军推翻大明政权，多尔衮又立即把目标转向农民军，与明朝残余部队联合，共同镇压农民军。多尔衮就是这样巧妙地利用矛盾，及时调整打击目标，并利用李自成进入北京还没有站稳脚跟，以及吴三桂乞师求援的特殊条件和有利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农民军，为进占北京扫清了道路。

第二，作战指导机动灵活，善于捕捉战机。多尔衮出师中原时，原准备出蓟州、密云，截断大顺军后路，一举歼灭农民军；当行至翁后收到吴三桂乞援的来书，战局骤变时，他又毫不迟疑地改变了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南下，向山海关进发。当大顺军进抵山海关，吴三桂抵挡不住而急切要求清军助战时，他认为这是突破山海关防线的关键时刻，立即令清军兼程前进，将十几万大军集结在关外，坐山观虎斗，等待战机；待吴三桂军与大顺军经过激战，双方力量大为削弱时，他才指挥清军突然出吴军之右，一举将大顺军击败。多尔衮不拘泥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能审时度势，灵活用兵，是清军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节　清军进占北京

李自成率军自山海关撤至永平后，一方面四处派人招集散亡诸部，一方面派张若麒等前往吴三桂营中议和。吴三桂以大顺军交出明太子、永王、定王并撤离北京为议和条件。李自成在派议

---

① 《碑传集》卷一，《和硕睿忠亲王多尔衮传》，《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和使团前去谈判的同时，立即作了撤退部署。

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在取得山海关大战的胜利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配属他八旗骑兵1万人，令其急速追击仓促西撤的李自成，他亲统大军向北京进军。多尔衮采纳洪承畴入关前所提的建议，整饬队伍，严明军纪，谕令诸将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① 同时，又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的复仇心理，宣布清兵入关的目的是"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并向汉族地主阶级表示："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②。由于多尔衮采取以上政策，北方的汉族地主阶级立即把对农民起义的仇恨变成行动，使清军毫无阻挡地占领了抚宁、昌黎、滦州、开平、玉田、蓟州等地，于四月三十日进抵通州。所过州县的官员望风迎降。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确悉吴三桂已与清合师西进，气愤至极，遂怒杀吴襄全家共30余口，并命刘宗敏、李岩、李过、唐通等连兵十八营出城抗击吴、清联军，结果大败，损失军士2万多人。北京周围地区的地主阶级纷纷组织反动武装，袭击农民军。大顺军领导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意见不一，农民军纪律松弛，到处掳掠，山海关之战失败后，更完全丧失了整军再战、保卫京城的力量和意志。鉴于此，李自成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返回关中，重新组织力量。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忙在北京登基称帝，即位于武英殿，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第二天，大顺军分两路撤出北京。

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自通州进入北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次日，多尔衮宣布："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③ 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

---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己卯。

② 《碑传集》卷四，《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传》。

③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施，诸如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剃发归顺的地方官各升一级，抗拒者则发兵征剿；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兵丁愿从军或愿归农者，根据情况可分别留用或遣送；还宣布为崇祯帝服丧三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缓和汉族人民的敌对情绪，调整同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集中力量镇压农民军，建立起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

九月十九日，顺治帝福临进京，十月初一日即皇帝位，仍沿用大清国号，定鼎燕京，顺治纪元。这标志着清王朝中央政权的正式确立，从而出现了一个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替代明朝统治的新封建王朝。

清军所以能顺利地进占北京，建立大清政权，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紧追不舍，连续作战，使农民军没有喘息的机会。四月二十二日，吴清联军取得山海关大战决定性胜利。次日，吴三桂即"整兵向京师"①，不停歇地实施追击作战：二十五日抵抚宁，二十六日至昌黎，二十七日到滦州，二十八日占领开平卫(今河北唐山东北开平)，二十九日攻占玉田，三十日到达蓟州，多尔衮即"令诸王、贝勒等率兵急追击之"②。五月初一日，充当先锋的吴三桂进抵北京南郊后要求入京，但"摄政王不许，檄之西行"③，继续追击农民军。次日，八旗军进入北京。在七八天的时间内，吴清联军人不卸甲，马不停蹄，追得日行二三百里的农民军秩序大乱，无法组织战斗。

第二，采取招抚的政策和策略，争取汉族地主官僚的支持。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发布谕令："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④ 多尔衮还注意发挥已降清的范文程、洪承畴等

---

① 《平寇志》卷十一，第244页。

② 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丁亥，第63页。

③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五，顺治元年五月戊子，第155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汉官汉将的作用。他认识到，这些汉官汉将最了解明朝内部和农民军的情况，最懂得汉族地主官僚的心理状态，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以及所提出的有关政策、策略方面的建议，符合实际情况，容易取得故明文武官员的支持，所以对他们的建议一般都予以采纳。如四月十三日洪承畴建议："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① 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在部署向北京进军时即发布了类似内容的命令。再如，汉官汉将鉴于八旗兵深入内地扰民害民的行为不得人心而提出的关于改变清军掳掠作风，打出"出民水火"、"仁义之师"② 旗号的建议，也被多尔衮接受。这些建议，对缓和满汉民族矛盾，争取汉族地主官僚的支持，都有很大的作用，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庚午，第61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癸酉。

第五章　清灭南明和农民军及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见附图5）

第一节　清定鼎北京后的形势及其基本方略

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二日，清军进入北京，夺取了农民军的胜利果实，所控制的地区很快扩展到河北、山东大部。

这时，除清政权之外，在江南有弘光等南明政权，在西安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四川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这几大政治、军事势力之间，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

一、大顺、大西农民军的战略转变

当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主力撤离北京实行战略退却时，清摄政王多尔衮即命令降清的吴三桂及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等“勿入京”①，立即对农民军兼程穷追。五月初一日，清军过卢沟桥，次日抵庆都（今河北望都），追及大顺军。起义军在庆都、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地，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接连受挫。五月初二日，过固关，退入山西。吴三桂和阿济格追至固关，勒兵北返，于五月十二日回到北京。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

李自成率大顺军主力经平阳（今临汾）、闻喜，于七月初一日渡黄河入陕西韩城，退守西安，兵力又有所恢复。由于东有潼关、黄河天险，加之在太原有陈永福、李若星、南梦云、王安民等据守，在陕北延安、绥德（今清涧北）有李过、郝摇旗等留守，李自成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了南取汉中，西征甘肃，确保关中，并以关中为抗清基地，伺机北伐的战略方针。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在获悉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即从湖广转兵四川。六月，张献忠亲率农民军由万县分水陆两路，西克涪州（今涪陵）、绥定（今达县），二十一日下重庆。张献忠留兵驻守，自率大军继续向川西南挺进，相继下泸州、资阳等地，兵锋直指成都。明蜀王朱至澍逃跑未逞，发帑金令士兵守城。八月初七日，大西军发起猛攻。成都城高垣厚，农民军采用地道爆破法于初九日炸开城墙，并在事先派进城内的农民军战士的配合下，一举攻克成都。后分兵四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四川大部地区。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改成都为西京，建立起另一农民政权。大西政权建立后，面临着两个敌人：一是眼前“雄据一方”的地主武装叛乱，二是已进入山西、陕西并威胁四川的清军。顺治二年正月，清军攻破潼关，大顺军一再失利，使清军得以向西南地区长驱进犯。于是，农民军在继续与明残余势力斗争的同时，又肩起了抗清的历史任务。

二、弘光政权以农民军为敌及对清军的退让妥协政策

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即清军进入北京的同一天，麇集在江南的明朝官僚地主集团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监国。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年号弘光，是为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顽固坚持封建地主阶级立场，视农民军为主要敌人，而对清军却不作

任何防范，声称“今日宗社大计”，莫过于“讨‘贼’复仇”①，狂叫农民军推翻明王朝是“三灵共愤，万姓同仇”，鼓动封建官僚地主要“戮力勖勷，助予敌忾”②，企图恢复明王朝对全国的主宰。弘光小朝廷甚至把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农民起义军视为明朝的胜利，认为是清军为他们报了“君父之仇”，立即封吴三桂为蓟国公，赏银 5 万两、米 10 万担，以奖励其“倡义讨贼，雪耻除凶”③ 之功。

弘光朝廷当时拥有较强大的兵力，并占据着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总兵左良玉、左梦庚父子率领二三十万大军驻扎武汉；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四镇，拥有兵力三四十万，驻扎在江淮一带；河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与农民军为敌的明朝残余势力和反动地主武装，有的也编入南明军队系统。这上百万的军队，没有抵御清军南下的任何准备，却把矛头对准了农民军。弘光政权以“江北与‘贼’接壤，遂为冲边，议设四镇，分辖其地”④，命高杰驻守泗州（今安徽泗县），管辖徐州、沛县等十四州县，“经理河北、河南开（封）归（德）一带招讨事”，刘泽清驻守淮北，管辖宿迁、海州等十州县，“经理山东一带招讨事”，刘良佐驻守临淮（今安徽凤阳东），管辖凤阳、六安等九州县，“经理河南陈、杞一带招讨事”，黄得功驻守庐州，管辖滁州、和州等十州县，“经理光、固一带招讨事”⑤。以上合计兵力 12 万人。加上楚额兵 1 万，京营额兵 1.5 万，总计 14.5 万人。史可法为督师，驻扬州，居中调度。在西线，又派遣熟悉四川情况的米寿图、王应熊、樊一蘅等入蜀，组织明军残部和地主武装

---

① 徐鼒《小腆纪传》卷十三,《刘宗周传》,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47 页。

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六，顺治元年五月壬寅，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171 页。

③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④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史可法请设四镇》，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6 页。

⑤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史可法请设四镇》，第 26～27 页。

向大西军进攻。弘光小朝廷的目的是先稳住形势，然后出师扑灭农民起义，以完成“中兴大业”①。

弘光政权对清军则采取妥协、议和，进而与之联合镇压农民军的政策。六月，清军进驻北京的消息传到江南，这对企图恢复全国统治的弘光小朝廷是个沉重打击，但由于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双方立场一致，所以弘光政权不仅要奖赏吴三桂，而且认为“款清灭寇”② 为上策，遂于七月初五日派出兵部侍郎左懋第、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等人为“北使”，同清议和。他们携带黄金1000两，白银10万两，绢1万匹，赴北京酬谢所谓“复仇之义”，并以在“灭贼”之后承认清政权国号，答应山海关外地盘全部归清，每年给清白银10万两为条件，要求“南北同心”，“相约杀贼”③ ，企图与清军联合进攻农民军。但是，清统治者的最终目标在于夺取全国政权，所以对与南明议和并不感兴趣，只是把金银财物如数收下完事。显然，清王朝对南明所采取的不战不和的态度，只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南明政权却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④，抱着划地而治和偏安江南一隅的幻想。

三、多尔衮先剿灭农民军，再灭南明，进而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

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后，即决定以北京为首都，着力推行进取中原，“混一区宇”⑤，进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当时，顺

---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史可法请设四镇》，第27页。

② 李天根：《爝火录》卷四。

③ 陈洪范：《北使记略》，《荆驼逸史》本。《鹿樵纪闻》卷上则称遣使的时间为八月。

④ 《史可法集》卷二，《请进取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⑤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顺治元年三月十五日《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治帝年幼，由其叔父多尔衮摄政，掌握朝政。多尔衮是一位有远见的战略家、政治家，是清王朝入关后实际执政的关键人物。他说：“既得中原，势将混一，自此事无可疑。”① 多尔衮决意要乘势统一全国，然而，当时一些目光短浅的满洲贵族却无此远大抱负，如英亲王阿济格说：“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对此，多尔衮引用皇太极的话予以严厉驳斥：“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并说：“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②

在错综复杂而急剧多变的形势下，为了实现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政策和策略上进行调整。为了收拾人心，令军队驻屯城外，除指定的部分警卫部队外，不准清军官兵随便出入北京；军队不得进入民房，犯者处斩；蠲免“三饷”及一切加派。为了笼络汉族官僚地主及知识分子，他下令为明崇祯帝后发丧，追封崇祯为明庄烈愍皇帝；保留明朝的封建国家机器，优待和重用明朝官吏，“一仍故封，不加改削”③，“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④；宣称“满洲、汉人俱属吾民，原无二视之理”⑤，并遣官祭祀孔子。这些政策和措施，虽然并不彻底，但解除了一批故明官将和地主阶级的疑惧心理，从而得到了他们的广泛支持，为建立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多少缓和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减少了清军剿灭农民军，消灭南明政权，统一全国的阻力。

北京的形势初步稳定后，多尔衮进一步扫清京畿及河北、山

---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仁祖二十三年（清顺治二年）正月庚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739 页。

② 同上，仁祖二十二年（明崇祯十七年）八月戊寅，第 3735 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巳。

⑤ 《清世祖实录》卷四四，顺治六年五月壬申。

东、山西等地，以便为武力统一全国作准备，六月中旬，顺天巡抚柳寅东提出："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指大顺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①。多尔衮审时度势，采纳了这一建议，从而确定了先西北后东南，集中兵力追剿农民军的战略方针。于是，令清军分兵两路，一路由固山额真巴哈纳、石廷柱率领，进军山东，威逼南明；一路由固山额真叶臣率领，进军山西，攻打大顺军，揭开了继续向西北和中原用兵的战幕。当时，正在向陕西撤退的大顺军和在四川的大西军，各有数十万军队；明朝在江淮以南的军事力量基本未受损失，有数十万之众。因此，清军要在辽阔的中原同诸多对手作战，兵力实感不足。于是，在占领了山东、河北及山西部分地区后，多尔衮便令多铎自山东西向渡黄河，会同阿济格进攻大顺军。多尔衮以农民军为主要打击目标的战略方针，可以使清军集中兵力，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处于主动地位。

第二节　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清军入关后，清统治者实行圈地、剃发、掠人为奴等制度，使汉族人民深受其害，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各地人民坚决反抗，抗清斗争此起彼伏。在直隶（约今河北），三河人民首先起义，天津、沧州一带有张承轩、李联芳等人领导的起义；在山东，有著名的嘉祥县宫文彩领导的满家洞农民军，曹州任七、张七领导的榆园农民军；在山西，五台山、吕梁山区等地也都有农民的抗清斗争。抗清斗争的主要力量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和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六月甲戌。

一、大顺军的抗清斗争

李自成率农民军撤回西安后，经过休整，即按原定方针，准备北伐。

顺治元年七月，大顺军从宣大、固关、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处进攻河北。进攻彰德的一路，有兵众 10 万，声势颇盛，迫使清总兵王燝惊呼“人心惊慌，万分危急”，要求派援兵“星夜前来，以救危疆”①。另一路则突袭固关，智取井陉，活捉莫知县，杀死古典史，直捣真定，“如入无人之境”②。起义军发布文告说：“长安二府田，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权将军刘体纯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又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七月初二日，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先恢剿宁武、代州（今山西代县）、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③ 起义军的行动，给清王朝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总兵官王燝、姜瓖等急如星火的请求下，清军加快了进攻山西、河南的步伐。十月初三日，清军占领大顺军在山西的重要据点太原，其后顾之忧完全解除。十月上旬，另一支大顺军 2 万余人渡黄河，攻怀庆府（治今河南沁阳），全歼清怀庆总兵官金玉和以下 1700 余人，清河南巡抚罗绣锦不得不向清廷告急。在此前后，李过率农民军，一路出府谷，一路出保德，于偏关、老营堡等地挫败唐通部清军，攻到了山西外三关地区，清军保德州

---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顺治元年七月《真、顺、广、大总兵王燝塘报》。

② 《直隶巡按卫胤周揭为塘报贼据固关、井陉事》，郑天挺、孙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478 页。

③ 《大同总兵姜瓖为塘报闯寇情形事》，郑天挺、孙钺等：《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 458 页。

这个战略据点岌岌可危。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不利于农民军的因素不断增长。首先是由于对原占领区所建立的农民政权没有采取有力的巩固措施，汉族地主纷纷配合清军进行反攻倒算，有的汉族官绅则公开叛乱。仅四、五、六三个月，在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所发生的叛乱事件即达 70 余次①，从而增强了清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其次，大顺军领导集团中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阴有异志的牛金星挑拨离间，唆使李自成杀害了李岩，引起许多起义军将领的不满，以致“文武不和，军士解体”②，战斗力大大削弱。

顺治元年夏秋之间，清军乘机占领了山东、直隶、河南的大部及山西的部分地区，迫使大顺军再次向陕西收缩。多尔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开始向关中地区的李自成军发动进攻。十月十九日，清军分兵两路，进攻陕西：一路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领吴三桂、尚可喜等部，由大同向榆林、延安进兵，然后南下；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耿仲明等部，从怀庆附近渡河直攻潼关。两路清军预定在西安会师，妄图以钳形攻势消灭大顺军。

十二月，阿济格一军已包围榆林，进至米脂。多铎一军到达河南辉县后，畏葸不前，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才渡过黄河到孟津，先后与大顺军战于洛阳、陕州（今河南陕县）、灵宝一带，于二十二日迫近潼关。潼关地势险要，是西安的天然屏障。潼关告急，李自成、刘宗敏等往援。大顺军以重兵防守，据山为阵。清军集中兵力来攻，大顺军将领刘方亮率军迎战，付出很大牺牲。顺治二年正月初九日，清军红衣炮运至，即发炮攻城。激战三昼夜，双方损失均极为惨重，最后潼关失陷，李自成还兵西安，马世耀等将士大部壮烈牺牲。李过、郝摇旗率领大顺军经过

---

① 参见顾诚：《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北京师大学报》1983 年第 6 期。

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六，顺治元年五月己酉，第 179 页。

激烈战斗后被迫从陕北南撤，延安、鄜州（今富县）相继失陷，西安大顺军腹背受敌。

李自成为了摆脱不利处境，于正月十三日率领大顺军主力20余万人，撤出西安，经蓝田下陕南，退入当年战斗过的商洛山区。接着，由商州龙驹寨走武关，入湖北襄阳，占据武昌。这时，李过、高一功也被迫经陕、川交界地区迂回南下，到达湖北荆、襄一带。大顺军在武昌期间，尚有几十万人，整编为四十八部，又改江夏为瑞符县，建立政权机构，设置官员，铸造“永昌”钱币。李自成认为：“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① 他打算夺舟南下，在东南地区建立基地，继续抗击清军。四月，阿济格所率清军分水、陆两路突然袭来，李自成率军仓促弃武昌南走，经蒲圻到达通山九宫山。五月在九宫山遭地主武装突然袭击，李自成壮烈牺牲，时年四十岁②。大顺政权覆灭后，大顺军余部在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诸将的率领下，分赴湖南、江西山区，李过、高一功亦从陕西撤往湖广荆州地区，坚持抗清。

二、大西军的抗清斗争

张献忠于四川建立大西农民政权后，拥有大西军120营，兵众四五十万，分由四大将军掌握。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19营，镇守川北；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16营，镇守川西；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15营，镇守川南；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20营，镇守川北。

顺治二年（大西、大顺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自陕西挺进西南镇压大西军。清统治者首先对张献忠进行招

---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顺治二年五月丙午，第372页。

② 一说李自成于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退居幕后，指挥大顺军与南明联合抗清，顺治九年伪装高僧退入湖南石门夹山寺，康熙十三年（1674年）病逝，终年69岁。

抚，妄图使大西军放下武器，俯首归顺。十一月，顺治帝福临下诏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徕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遣发大军之前，特先遣官赍诏招谕。方今有志之士，皆欲争先归顺，建立功业。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①然而，无论是以高官厚禄相诱惑，还是以杀戮相威胁，都丝毫没有动摇张献忠的抗清决心。清廷对张献忠诱降不成，即于次年正月二十一日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平西王吴三桂率军南下，前往四川镇压大西农民军。

顺治三年七月，张献忠在成都召开大西军诸将会议，决定乘清军主力正开向东南沿海，而豪格和吴三桂在陕南踌躇不前之机，率农民军北上攻陕西以蹑敌后。同时，确定孙可望为继承人，令其在自己牺牲后"急归明，毋为不义"②，初步确定了"联明抗清"的基本方略。张献忠的作战部署是：令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各率兵 10 万分赴川北，成都都督刘进忠把守川北门户朝天关，张献忠于西充居中调度。十一月，刘进忠叛变投清，把朝天关拱手让给了清军。

刘进忠告知清靖远大将军豪格，张献忠的指挥部设于顺庆府西充县金山铺，并计算出里程和行军需用的时间。在刘进忠的引导和保宁地主诸生罗长元、郑大伦等人的配合下，清军直抵西充凤凰山，准备对大西军进行突然袭击。大西军侦知后连续三次向张献忠报告敌情，张献忠都未予以重视。二十七日，当豪格、鳌拜率军抵近大西军指挥部时，张献忠连盔甲也未及穿戴，匆忙上阵，由于叛徒刘进忠的指认，被清军箭矢击中，不幸壮烈牺牲。

---

①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②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1 页；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8～279 页。

张献忠牺牲后，清军分兵四路追击农民军。大西军失去统帅，队伍大部分溃散。新的大西军领导人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等，为了保存力量，当机立断，决定改变进军路线，攻取顺庆、重庆、綦江后，向川、贵、湘交界山区转移，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第三节　清军“转旆东征”和大江南北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扬州之战

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后，即按照“戮力勠勷，助予敌忾”① 的方针，网罗地主阶级及亡明官僚士绅，部署军事力量，妄图扑灭农民军，恢复明王朝的统治。然而，形势的发展使南明妄图借清军之力消灭农民军的幻想破灭。清统治者对南方所取不战不和的态度只是为了稳住南明，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军在集中兵力“围剿”农民军的同时，即已开始对南明发起政治攻势。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要求朱由崧去帝号，称藩王。他威胁弘光政权说，如不遵行即“俨为敌国”，“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②。史可法虽已预感到清兵可能南下，但对多尔衮仍存幻想。九月十五日，他在复信中提出：“今逆贼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③

机智锐敏的多尔衮，已从回书的字里行间觉察到史可法不肯

---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六，顺治元年五月壬寅，第 171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③ 蒋良骐：《东华录》卷四，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8～69 页。

降清的意蕴，即于十月二十五日作出进攻南京的决策，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师南下。前一天，传檄江南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历数南明之罪："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①。当时因河南告急，多尔衮命多铎军南下后先征大顺军，与阿济格会师西安。十一月，东线南下清军在沂州总兵夏成德的率领下进占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入宿迁。史可法认为"一旦寇为清并，必以全力南侵"。他开始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以清之强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渐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复之无期，而偏安未可保。"② 因此,他决心放弃"问罪秦中"的战略计划,紧急调整部署,以抵御清军继续南下。他遣总兵刘肇基往援,企图收复海州、宿迁二城。十二月二十四日,多铎遣清军分道南下,命山东沂州、济宁清兵从庙湾南渡趋宿、邳二州,命河南彰德、卫辉清兵从孟津东渡逼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徐州。南明驻睢州(今河南睢县)总兵许定国、河南总兵李际遇降清。这时史可法彻底丢弃对清廷的幻想,飞章告急,请求抗清。

但是，弘光政权极为腐朽，它没有抓紧时间进行战争准备，而是内部纷争。朱由崧是个昏庸淫逸的小皇帝，朝廷军政大权把持在阉党马士英、阮大铖、刘孔昭等人手中。这些人颟顸无谋，无意抗清，只知争权夺利，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为所欲为，打击陷害正直的朝臣和抗清将领，以致造成"无为国家实心任事者"③ 的局面。

---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顺治元年十月戊寅。

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八，顺治元年十一月辛丑，第 294 页。

③ 徐鼒：《小腆纪传》卷十，《史可法传》，第 124 页。

顺治二年正月，史可法在数十次提出“和不成，唯有战”的抗清要求遭到拒绝之后，决心大举北伐，抗击清军南下。他命黄得功、刘良佐先率军进屯安徽颍州（今阜阳）、亳州，然后向邳、徐推进；命高杰出兵开封、归德，收复河南失地。但是，黄、刘二人拒不听命。睢州总兵许定国则暗中投降了清军，并杀死高杰，造成高杰“部下兵将大乱，互为雄长；睢州旁近二百里，杀戮无遗”① 的严重局面。

史可法在抗清前线孤掌难鸣，在朝廷又受到排挤，但为巩固前线设防，他亲往徐州，安抚高杰军，制止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瓜分该部的行动，重新安排黄河防务。马士英非但不支持苏北前线抗清，反诬史可法虚张声势。此后，对四镇任何要求均置之不理，南明军战斗力进一步削弱。马士英为了分史可法兵权，又借机提升卫允文为兵部侍郎，总督开、归军务，给史可法抗清造成更大困难。

南明军各部，为了争夺地盘，互相攻杀不已，内部更加混乱。武昌守将左良玉，长期受马、阮的打击，加之东林党人的怂恿，便以“清君侧”为名，率兵东攻南京。马士英急调江北四镇迎击，造成江淮防线一片空虚。这就为清军南下进攻南明提供了可乘之隙。

同年二月初八日，顺治帝谕令多铎：“今既攻破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等，尔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② 多铎于河南接到命令后，遂于三月初五日率师南征，初七日兵分三路向归德进军：一出虎牢关（又名古崤关，在今荥阳汜水镇），由多铎亲率；一出龙门关（今洛阳市南），由固山额真拜尹图率领；一由南阳路，由兵部尚书韩岱等率领。所过30余州县，皆望风迎降。清军很快占领了河南。

四月初九日起，清军由归德分成两路：一路由多铎率领，进

---

① 夏燮：《明通鉴》附编卷二上，清顺治二年正月辛亥，第3569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四，顺治二年二月辛酉。

攻亳州，指向淮南；另一路由都统准塔率领，进攻砀山、徐州，指向淮北。徐州总兵李成栋闻风逃跑。清军占领徐州后，于十三日进抵泗州。史可法集中兵力于清江浦（今江苏淮阴市），准备渡过洪泽湖，以确保泗州。适逢左良玉兵沿江东下，已过安徽铜陵，直攻南京。史可法又受命拱卫京师。他不愿离开抗清前线，认为“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①，于是连章告急，乞请朝廷增兵前线。马士英竟说：“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② 他非但不增兵抗清前线，而且将驻守淮安的刘泽清军调回去打内战，致使史可法部署的江淮防线被破坏。清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于十四日渡过淮河。史可法闻讯，冒着大雨急驰一昼夜返回扬州。

扬州地处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为南京的门户，历来是南北粮运枢纽。史可法督师扬州以来，更使其成为大江南北瞩目的中心。但这时史可法所设四镇的部队大部分已被马、阮调去打内战，扬州已是一座孤城。史可法回到扬州时，城内兵力单薄，附近又无援兵，只有总兵刘肇基率 4000 兵自白洋河来援。史可法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决定凭城固守。

四月十七日，多铎率清军进至扬州城北 20 里扎营，十八日包围扬州城。多铎派降将向史可法劝降，“可法不为动”③，坚决不降。刘肇基请求乘清军未集，与敌背城一战，史可法让其困守不出。二十二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出城投降，守城力量更为薄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史可法只得率 4000 名亲军，前往比较险要的旧城西门坚守，刘肇基则坚守北部。

二十三日，清军将红衣大炮运至扬州城下，次日即以炮攻城。红衣大炮“铅弹小者如杯，大者如罍”④，有的弹重 10 斤 4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顺治二年四月乙丑，第 356 页。
②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议御北兵》，第 202 页。
③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史可法扬州殉节》，第 204 页。
④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史可法扬州殉节》，第 205 页。

两。城墙多次被摧毁，史可法督军民随时修补。二十五日，清军攻城愈急，史可法亦下令开炮还击，杀伤城外清军甚多。双方炮战越来越激烈，攻城巨炮"声如巨雷，守陴者犹不退，发矢石如雨。城下死者山积，攻者反藉叠尸以登，蜂拥蚁聚"①。清兵登城，多次被明军击退。不久西北隅城破，史可法见大势已去，拔剑自杀未死。刘肇基领兵巷战，全部壮烈牺牲，无一降者。

史可法在多铎的威逼利诱面前，毫无惧色。他说："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②最后慷慨就义于南城城楼上。清军入城后，纵兵抢掠，屠城十天，"凡杀数十万人，所掠妇女称是，无一人得存者，扬城遂空"③。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扬州十日"的惨剧。

二、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政权覆亡

清军占领扬州后，即陈兵长江北岸，准备渡江。南京弘光小朝廷的文武官员惊恐万状，不知所措。马士英等人已暗作逃跑的准备。朱由崧临渴掘井，仓促命总兵郑鸿逵、郑彩率水师守瓜洲；副使杨文聪驻金山（今江苏镇江西北），扼守长江。为了统一指挥，又急任杨文聪为常镇巡抚兼辖扬州沿海等处，坐镇镇江，与江北清军对峙。

顺治二年五月初八日夜，清军乘雾从瓜洲放筏入江。镇江明军立即发炮攻击，击毁清军船筏甚多。郑鸿逵等以为清军已被击退，放松了戒备。不料清军"从坎坛桥狭流轻舟飞渡"④，明军发觉时已被包围，仓促间于甘露寺列阵应战，难敌清军铁骑，全

---

① 张纯修：《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

② 刘宝楠、楚桢甫：《胜朝殉扬录》卷上。

③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史可法扬州殉节》，第205页。

④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顺治二年五月己丑，第363页。

军溃败。杨文聪及江苏巡抚霍达仓皇逃奔苏州，郑鸿逵、郑彩则率舟师取海道逃奔福建，镇江遂为清军占领。

镇江既失，南京失去屏障。当时，南京尚有守军23万，但只知醉酒酣歌的朱由崧畏敌如虎，竟于初十日乘马出通济门（一说聚宝门），先逃往太平府（治今安徽当涂），因清军追赶甚急，又逃到芜湖，藏于黄得功营中。马士英、阮大铖则逃奔杭州。弘光小朝廷的文武百官如鸟兽散。清军经丹阳、句容，于十五日兵不血刃地进入南京。戍守南京的23万明军，全部投降。仅存一年的弘光政权到此覆灭。

清军占领南京后，即向芜湖进军。驻守芜湖的黄得功率部迎战，保护朱由崧。清军一面进攻，一面利用叛将刘良佐劝降。黄得功严词拒绝，奋勇战斗，直到战死。左协部将田雄，见大势已去，挟持朱由崧投降了清军。二十五日，朱由崧被押往南京，次年五月被杀于北京。

清军虽占领南京，清统治者深感仅靠武力不能征服江南人民，因而改变策略，由单纯的军事进攻，改为剿抚并用。为此，令内院大学士洪承畴赴南京代替多铎总督军务，并加强政治招抚；派南明降将赵之龙、钱谦益等人到各地诱劝南明官僚地主“投诚归命”。同时，命贝勒博洛、拜尹图、阿山及南明降将李成栋、刘良佐等以军事进攻相配合。

六月，博洛连下常州、无锡、苏州，然后留兵2000守苏州，分兵向松江、太仓等地进攻。南明副使杨文聪自镇江战败逃窜苏州，闻讯清军下江南，又逃往处州（治今浙江丽水）。马士英、方国安先逃至余杭、富阳，继又逃往严州（今浙江建德东北）。十三日，东林党所拥戴的潞王朱常淓（明穆宗孙，潞简王翊鏐之子）向清军投降，清军遂占领杭州。

三、大江南北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在扬州进行血腥屠杀，南京焚烧明宫殿，屠杀城内居

民，掠夺财物，加之清廷重颁剃发令，用暴力强令汉族人民改变习俗，激起大江南北人民的强烈反抗。

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以江阴、嘉定两地为最顽强、最壮烈。

顺治二年六月中旬，清军先对江阴人民施行“招抚”政策，接着又派方亨作江阴知县。方到职后，强令汉人在三天之内剃发，声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激起民众的极大愤慨。闰六月初一日，城北人民首先举义，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剃！”① 四方闻风响应。他们占领县城后，杀死知县方亨和守备陈瑞之。起义民众推县主簿陈明遇和前任典史阎应元指挥作战。陈明遇、阎应元带领民众修城筑垒，制造武器，筹备粮饷，据城以守。他们的斗争得到了附近数十万民众的支持。清兵攻城，各乡兵“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负粮，弃农不顾……虽死无悔”②。守城民众重点防守四门堡，昼夜轮换。清军先后调来10万，“列营数百，围十重，依山起垒，瞰城中，矢集如雨”③。清军发炮摧裂城墙垣，起义民众又用铁页裹门板，用泥土装满空棺材，填塞城墙。清军久攻不下，令明降将刘良佐劝降。阎应元严词拒绝：“我一典史，虮虱臣耳，犹不忘故国。汝爵为列侯，忍背厚恩而攻我，有何面目向人耶！”④ 八月，明降将李成栋攻占松江后，率14万清军增援江阴。十二日开始攻城，用大炮昼夜轰击，二十一日攻破城垣。阎、陈二人率众同清军巷战，全部壮烈牺牲。清军入城后，进行三天大屠杀，“满城杀尽，然后封刀”⑤，共有17.2万人被杀。江阴城百姓与清军搏斗了81

---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顺治二年闰六月辛巳，第383页。

② 韩炎：《江阴城守记》上，《荆驼逸史》本。

③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顺治二年闰六月辛巳，第384页。

④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六，《阎应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⑤ 韩炎：《江阴城守记》下。

天，杀敌7.5万，给清军以重大打击。清军虽然最终占领了该城，但付出的代价很大。

同年闰六月，在江阴以东200多里的嘉定城，由于清嘉定知县张维熙强令剃发，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开明士绅黄淳耀、侯峒曾领导起义者，组织民军，贮粮备草，搬砖运石，加固城防，准备进行长期斗争。清军以降将李成栋为先导，自吴淞转攻嘉定。七月初三日，李成栋督率10万清军攻城。城内民众以粪汁、灰瓶抛灌清兵，使其进攻受阻。夜降大雨，城墙被雨水冲坏，初四日清兵入城，侯峒曾全家投水殉难，黄淳耀自缢身亡。清军对嘉定人民进行了三次大屠杀，史称"嘉定三屠"。

在安徽、江西各地也都有农民起兵抗清。蕲州王六姐于斗方山寨组织农民军，后携明荆王朱常㳽转移至太湖建立抗清根据地。江北的六安、英山、霍山、潜山，河南的固始，湖广的罗田等县农民，也纷纷起兵抗清。皖南池州府（治今贵池）、建德（今东至东北）、东流的农民军，联合江西彭泽、鄱阳（今波阳）、都昌等地的农民军，在了悟和尚和赤脚黑先锋的领导下，出没于饶州府（治今江西波阳）、鄱阳、永丰（今广丰）等地，沉重地打击了清军，吓得江南的清朝统治当局惊呼"可骇可虞"①。

在满族贵族的高压政策面前，一些汉族地主、士绅也积极投入了反抗斗争。如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联合太湖的抗清义师，攻打苏州；顾炎武、王佐才、归庄、吴其沆起兵于昆山，力抗强敌；故明御使金声、诸生江天一起兵于绩溪，吴应箕起兵于池州，温璜起兵于徽州（今安徽歙县），在皖南山区建立抗清基地，等等。

大江南北人民的抗清斗争，虽因起兵仓促，未经训练，加之饷械不足，坚持的时间长短不一，但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延缓了清军南下的进程，表现出人民群众反抗民族压迫的斗

---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顺治二年十一月《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

争精神。

第四节　清军挺进浙、闽及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清军挺进浙闽与隆武政权、鲁监国的覆灭

清军的逐步深入及其在江南各地的暴行，加深了民族矛盾。在此情况下，一些地主官僚纷纷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卷进抗清斗争的潮流。隆武政权、鲁监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

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初七日，南明南安守将郑芝龙、郑鸿逵、苏观生和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于福州拥明太祖的九世孙唐王朱聿键为监国，二十七日即帝位，建元隆武，即隆武政权。兵部尚书张国维、吏部给事中熊汝霖、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及张煌言等人，先后于东阳（今浙江金华）、余姚、宁波、石浦等地组成义军，杀掉清朝招抚使，将朱以海接往绍兴，拥为监国，即南明鲁王政权。

这两个南明政权，都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并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设防。

鲁王政权的军事部署主要依靠张国维。张国维认为：“克期会战，则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坚捣虚，人无接应之暇，此为胜算，必连诸帅之心化为一心，然后使人人之功罪，视为一人之功罪。”① 于是，鲁王朱以海以张国维为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钱塘江，会浙东义师和驻浙江的明军，划地戍守钱塘江南岸：朱大典守金华，总兵方国安守七条沙，总兵王之仁守西兴（今萧山西北），郑遵谦守小亹，熊汝霖、孙嘉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五，《张国维赐剑》，第287～288页。

绩、钱肃守沥海（绍兴东北，钱塘江口）。

隆武帝朱聿键改福州为天兴府，以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苏观生为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肯堂为兵部尚书，封郑鸿逵、郑芝龙为侯，由郑芝龙主持军事。隆武政权在福建采取分区设防的部署：以天兴、建宁（今建瓯）、延平（今南平）、兴化（今莆田）为上游防区，以汀州（今长汀）、邵武、漳州、泉州为下游防区，各设巡抚管辖；福建北部，除在仙霞岭驻重兵防守外，又于岭外170处山险要道设兵把守。共有兵20万人，加上湖广方面拥护隆武政权的三四十万人，合计达六七十万人。此外，还得到浙江、安徽、江西等地义军的响应。大顺军余部也主动同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共同抗清。隆武政权所统辖的地区有福建、湖南、湖北、广东、云南、贵州、安徽、江西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财力和物力条件。

顺治二年七月，清廷命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叶臣等往江南代多铎统率清军。鲁监国各方军事力量会师于钱塘江口的西兴驿，力拒清军渡江。八月，张国维率兵克富阳，控制了钱塘江上游。十月中旬，方国安、王之仁、郑遵谦、熊汝霖力图收复杭州，于城郊与清军连战10天，获小胜。后因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率军前往增援，且风雨大作，箭矢不能发，杭州未能攻克。当时浙西义兵纷起，苏、松、嘉、湖等地反清斗争也节节胜利。在各地人民反清斗争形势的鼓舞下，南明军先后收复了海盐、乍浦等地。但是，两个南明政权之间的矛盾，大大削弱了抗清力量。当时，隆武帝遣刘中藻颁诏浙东。钱肃乐、朱大典认为“大敌在前，未可先仇同姓”①，力劝鲁王以皇太侄身分受隆武帝节制。但鲁监国督师张国维、熊汝霖等坚决反对，劝鲁王拒绝隆武帝的诏令。从此，鲁、唐两个政权不仅不能共同对敌，反而势同水火，予清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清廷命博洛为征南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一，顺治二年十月，第440页。

大将军，令其率军进攻浙、闽。鲁监国所属浙东兵与清军隔钱塘江对峙。隆武政权屯驻于闽浙要道仙霞岭的15万大军坐视不援。五月二十日，博洛军进至杭州，二十七日即渡过钱塘江。南明总兵方国安率部逃往绍兴，江上南明诸军闻讯大溃。六月初一日，清军攻占绍兴，鲁王逃往海上。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等降清，张国维兵败自杀，朱大典于金华自焚，台州（治今临海）、温州、金华三府相继陷落，浙东为清军占领。以后十数年中，鲁王凭借张名振、张煌言、郑彩、郑成功的支持，漂泊于厦门、南澳、舟山等地，虽努力整军经武，抗御清军，收复了浙、闽一些州县，但未能挽回颓势。

顺治八年，清军与南明军在浙东展开争夺战。由于鲁监国定西侯张名振杀定西伯王朝先，王朝先部将张济明降清，使舟山虚实尽泄。当年七月，清平南将军金砺、浙闽总督陈锦等督军分路向舟山进攻。鲁王以大学士张肯堂留守荡胡，由阮进守横水洋，张名振偕鲁王督舟师指向吴淞以为牵制。八月二十一日，阮进与清军战于舟山之横水洋，败溃。左都督张名扬、安洋将军刘世勋率军背城力战，重创清军。张肯堂率城内兵民坚守10余日，城内粮尽。清军掘地道破城，于九月初二日占领舟山。张名振等奉鲁王去金门，漂泊海上，后多次参与郑成功北伐。顺治十年，鲁王自去监国号，鲁王政权遂亡。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鲁王被接到台湾（一说一直在金门），于康熙元年（1662年）死去①。

隆武政权一度标榜出师北伐，收复旧疆，而事实上只是一纸空文。首先，隆武政权只是把“抗清”作幌子，大肆搜刮人民。除了照旧征收“辽饷”外，又大搞“复征”（重复征收），还有“正饷”、“助饷”，甚至提前一年征税，谓之“预征”，弄得人民不堪其苦，失掉了抗清的基础。第二，与鲁王政权矛盾重重，互相掣肘，不能协力御敌。第三，内部文臣武将不和。黄道周、张

---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十，康熙元年十一月辛卯，第779页。

家玉等文臣，主张北伐，但无兵权；郑芝龙、郑鸿逵、郑彩等武将握有实权，为了扩张自己的实力，极力抵制黄道周等人的抗战行动。特别是郑芝龙，拥兵二三十万，又把持着海上贸易，是福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但他擅权专断，把隆武帝作为其扩大权势的傀儡，认为南明的统治不会长久，早已暗通清朝，伺机投降。

早在顺治二年（隆武元年，1645 年），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知郑芝龙已无抗清之意，乃自请率兵出战。由于郑芝龙的阻挠，隆武帝只给黄道周一个月的粮饷和空札数百，令其自行招募军队。当年七月，黄道周出师江西，义旅很快发展到 9000 余人。每至一地，他“抚揖遗黎，联络声势，远近颇响应”①。黄道周从广信（今上饶市）入浙江衢州，十二月至婺源，遇降将张天禄部清军，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次年被害于南京。

在江西，吏部右侍郎杨廷麟与国子祭酒刘同升、巡抚李永茂共守赣州。顺治二年九月，出兵战败清军，收复吉安、临川。次年五月至八月，在云南赵印选、胡一青及大学士苏观生、两广总督丁魁楚部的声援下，于赣州与清军相战 4 个多月。十月初四日，清江西提督金声桓率军乘夜登城，杨廷麟督乡勇巷战，城被炮击毁，杨廷麟及总督万元吉自尽，清军占领江西。

福建的郑鸿逵、郑彩本不愿出战，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出兵浙东、江西。但是，他们刚出仙霞关，行军不到百里，即以饷缺收兵而还。顺治二年十月，朱聿键见福建难保，打算出赣入楚，以会何腾蛟之师。于是令郑芝龙、曾樱留守福州；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向浙江发展；郑彩为御营右先锋，向江西发展。次年二月，清廷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图赖率军往征浙江、福建。隆武帝自福州经建宁逃至延平。郑芝龙正暗中与洪承畴勾结，遂命仙霞岭守将武毅伯施天福军后撤，致清军于八月“从容过岭，长驱直入”②。隆武帝得知清兵已过关，立即由

---

① 夏燮：《明通鉴》附编卷二下，顺治二年七月辛未，第 3598 页。

② 夏燮：《明通鉴》附编卷三，顺治三年八月甲申，第 3637 页。

延平急奔汀州。清军于延平分兵二路：一路由博洛统率直取福州；一路由李成栋导引，追击隆武帝。郑芝龙从此脱离隆武帝，回军南安，准备迎降。八月二十八日，清军攻下汀州，朱聿键被俘杀。存在15个月的隆武政权，就此告终。

郑芝龙回南安不久，清军即攻陷泉州、漳州等地，苏观生退往广州，福建为清军占领。在博洛的诱降下，郑芝龙拒绝其子郑成功及弟郑鸿逵等人的劝告，于十一月到清军营中献印投降，后被送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封同安侯。后因招降郑成功不成，被革爵下狱，顺治十八年十月被杀。其子郑成功及张煌言等在闽、浙沿海继续领导抗清斗争。

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

当清军继续南下的时候，东南沿海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清军的骚扰迫害，掀起了此伏彼起的抗清斗争。

在浙江，海宁（今海宁西南）、平湖一带农民，武装抗拒清军。衢州、严州、处州一带农民，不仅活动于村寨，而且还夺取县城。泰顺县的农民军达两万多人，活动于浙、闽交界的寿宁、福安、福宁（今福建霞浦）等地，打得清军东奔西窜。影响较大的是王翊、王江领导的浙东义军。他们在四明山西北的大岚山依山结寨，抵抗清军。由于黄宗羲率所部从钱塘江退入四明山，壮大了抗清阵营。义军设置五营五司。五营专管军事，五司专管供给。队伍“且耕且屯，不扰于民”，“量富以劝，履亩而税”①，力量不断壮大。顺治五年春，义军“破上虞（今上虞东南），杀摄印官，浙东震动”②。六年大败清军，再攻上虞，占据四明山方圆800里之地，势力发展到奉化。七年十月，清军集中兵力，分两路包围了山寨。大岚山义军寡不敌众，经过激烈战斗，终于

---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五，顺治五年三月戊午，第582页。

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五，顺治五年三月戊午，第581页。

失败。但是四明山区和浙江其他地区人民的抗清斗争，一直持续到康熙年间。

在福建，人民的抗清斗争也很强烈。顺治三年，漳浦农民在卢若腾、邱建会等领导下，攻打县城，杀死清参将陆大勋①。次年三月，南安县农民、渔民起义，与提督赵国祚所派清军殊死斗争。同一年，政和、古田二县农民军里应外合，攻下建宁城，杀死清总兵李应宗、副将曹胤吉、知府高简等。接着，农民军攻占了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松溪、政和、寿宁等县。闽中农民配合抗清义军围攻福州达 14 个月之久。农民军遍及福建各府、县，水陆交通要隘多为其占据，清军几乎难以立足。浙闽总督陈锦不得不承认："闽省虽云已入版图，较之未入版图之地，尤难料理。"② 这反映出福建地区人民抗清斗争的强大威力。

第五节　清军南下湖广、粤、桂和大顺军余部及中南地区人民的抗清斗争

一、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和抗清联合阵线的形成

大顺军领袖李自成于顺治二年（1645 年）五月牺牲后，余部中的一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率领，共有 10 余万人，在襄樊、浏阳一带坚持抗清斗争。另一支由李锦（即李过）率领，与由四川夔州南下的高一功部汇合，共约 30 万人，在荆襄山岳地区建立根据地，控制了湖北西部的广大地区。这时，清军一面向浙闽进军，一面从江西、湖北向南推进，这就使驻守湖南的南明湖广

---

① 沈定均：《漳州府志》卷四七，《灾祥》。

②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转引自郑天挺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304 页。

总督何腾蛟面临着来自清军和大顺军两方面的威胁，也使大顺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大顺军领袖们深感形势严重，便以抗清大局为重，毅然改变策略，决定联合南明军队共同抗清。何腾蛟鉴于清军压境，自己又兵力不足，无力再与农民军为敌，不得不接受大顺农民军合作抗清的建议。于是郝摇旗、袁宗第等被授为总兵官，高一功为总统。李锦改名李赤心，高一功改名高必正，所部号“忠贞营”。不久，李锦、高一功所部30余万，自澧州（今湖南澧县）进抵常德，与南明巡抚堵胤锡合作。何腾蛟亦因与农民军联合立功，受到隆武帝朱聿键的嘉奖，升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为定兴伯；堵胤锡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制高一功部农民军。这样，大顺军与南明军队的抗清联合阵线初步形成。

抗清统一战线的形成把敌对的南明朝官军变为抗清的同盟者，使大顺军摆脱了孤军作战、腹背受敌的局面，消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也使何腾蛟、堵胤锡等南明诸将摆脱了困境，从而扩大了抗清队伍。在湖北荆州、襄阳（治今襄樊市）等地除大顺农民军外，还有南明左良玉余部马进忠、张先壁、黄朝宣等部，何腾蛟将其统一编制，号“十三镇”，人们又称“荆襄十三家”。清湖北巡按马兆煃奏称：“何腾蛟招集流兵亦不下五六十万，雄据湖南，乘便窥伺，我皇上若不急发大兵南下，恐两王已定之疆土，非复朝廷之有也。”①

二、绍武、永历政权的建立

从顺治三年八月开始，清军加快了向中南、西南进军的步伐：征南大将军博洛所部占领福建后，即向广东进攻，此为东路；靖远大将军豪格和吴三桂所率清军，在占领汉中后，向四川进攻，此为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湖北巡按马兆煃揭帖》。

西路；平南大将军孔有德率军进攻湖广、粤、桂，此为中路。

顺治三年冬，在广东又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一个是朱聿𨮁为帝的绍武政权，一个是朱由榔为帝的永历政权。

朱聿𨮁是隆武帝朱聿键的弟弟，隆武政权瓦解后，他从海上逃往广州。原隆武小朝廷大学士苏观生，与当地官绅梁朝钟、关捷先等共议，以"兄终弟及"为由，于十一月初二日① 拥立朱聿𨮁为帝，年号绍武。苏观生被封为建明伯，掌兵部事。朱由榔是桂王朱常瀛之子，隆武时袭封桂王，后受南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广巡抚堵胤锡、广东巡抚王化澄以及吕大器、方以智等人拥戴，于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肇庆称帝，建元永历，是为永历政权。

绍武、永历两个小朝廷，同已覆灭的弘光、隆武政权一样，由于其阶级本性和腐朽性，也不可能真正肩负起抗清重任。大敌当前，他们不是联合抗清，反而同室操戈，在三水、三山口等地交战。清军乘永历、绍武内战方酣之时，向广东进攻。当时，北路孔有德所率清军已攻下岳州（今湖南岳阳），沿湘江南下；东路李成栋、佟养甲所率清军已从福建西进，夺占广东潮州、惠州。十二月十五日，两路清军以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攻下广州。朱聿𨮁、苏观生自杀，绍武政权仅存在 43 天便灭亡了。

永历政权受到较广泛的支持。何腾蛟、堵胤锡等，都首先表示支持该政权。活动于川东地区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和云、贵地区的大西军余部，也相继联合永历政权抗清。瞿式耜、何腾蛟等人，力图整饬内政，消除内乱，坚决抗清。瞿式耜上疏说："今日之势，我进一步，人亦进一步，我退速一日，人来亦速一日。"② 他辅佐永历帝"修纪纲，布威武，抑权阉，招俊杰"③，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所有这些，不仅使永历朝廷一度转危为

---

① 绍武帝即位时间有两说：多数史书载为十一月初五日，《明史·苏观生传》作"十一月二日"，今从《明史》。

②③ 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八，《瞿式耜传》，第 279 页。

安，逐步稳定下来，而且颇有恢弘的气象。

三、中南战场抗清浪潮的蓬勃发展

清军攻占广州后，于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年）初又连续攻陷广东肇庆及高州、雷州（今海康）、廉州（今广西合浦）等地。永历帝从肇庆逃到广西梧州，再奔平乐、桂林。大学士丁魁楚见大势已去，遣人密款李成栋，投降了清朝。

瞿式耜护卫朱由榔从平乐抵桂林后，坚决反对朱由榔弃粤入楚，认为“上留则粤留，上去则粤亦去”①。但朱由榔及其随行人员执意去全州。瞿式耜联络远近抗清势力，部署防务，誓守桂林。三月十四日，清军数万人自平乐进攻桂林，瞿式耜令总兵官焦琏自黄沙镇（全州东北）入援。未几，清军精骑乘虚入文昌门。焦琏提刀引骑兵直冲清营，将其分割为三部分，勇猛冲杀，乘敌溃败，追击数十里。五月，由湖南南下的清将孔有德侦知城内刘承胤挟饷兵变，前来攻城。瞿式耜、焦琏分门守御，发西洋炮击敌，接着开城门出战，连续战斗两天，清军“弃甲仗而奔”。援将马之骥奉瞿式耜之命隔江发大炮，击退从栗木岭来攻的清兵。孔有德“望虞山树木，疑为兵焉”②，只好退兵。七月，焦琏乘胜率军收复阳朔、平乐，思恩侯、陈邦傅夺回梧州。这就是有名的“桂林大捷”。南明军收复广西后，已退往湖南武冈的永历帝又回到桂林。瞿式耜因功受封为临桂伯，焦琏为新兴伯。

十一月，孔有德等率清军进攻全州，何腾蛟督郝摇旗、焦琏、赵印选、胡一青、卢鼎五路出击，连营并进，首尾绵亘300里，清军败退湖南，是为“全州大捷”。何腾蛟因战功被封为侯，授兵部尚书，督师驻全州，赵印选、胡一青亦晋为伯。

大顺农民军余部和南明军联合对清军的坚决抵抗和节节胜

---

① 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八，《瞿式耜传》，第279页。

② 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八，《瞿式耜传》，第280页。

利，推动了中南地区抗清斗争的发展。

顺治五年，清军主力孔有德等部被迫北撤，南明与大顺军乘势反攻。马进忠收复常德；王井才部占领澧州、桃源；李锦、高一功率数十万大顺军出夔州（今四川奉节），连克湖北荆门、宜城，又引兵进湖南，相继攻克益阳、湘乡、湘潭、衡山等县，联合其他南明军，进围长沙。其间，何腾蛟率南明军战于广西，粉碎了清军对桂林的第二次围攻，继而转攻湖南，收复了永州、衡州（今衡阳）等地。顺治五年一年，基本收复了湖南的全部失地，扩大了南明永历政权的统治区。

在广东和江西战场，江西提督金声桓、广西提督李成栋先后叛清归明。他们从清军营垒中分离出来，反映了抗清斗争的深入发展，也标志着抗清联合阵线的进一步扩大。金声桓和参将王得仁于顺治五年正月末在南昌起兵后，不久即分兵进攻九江、赣州。明故臣揭重熙、余应桂、刘士桢等也在武夷山、都昌等地坚持抗清，与金声桓等遥相呼应。李成栋于同年四月在广州倒戈反清后，奉永历年号，接受永历帝的封爵，迎永历帝先至梧州，后至肇庆，并独揽永历小朝廷的大权。

广东的农民、矿工、盐工，包括少数民族瑶民等，群起抗清，互为声援，有力地配合了湘桂战场大顺农民军余部与南明军的抗清斗争。揭阳、程乡（今梅州市）一带的农民军，“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数十百群”①。他们活动于揭阳、东莞、龙川（今龙川西南）、兴宁、博罗等广大地区，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抗清武装。顺治九年，韶州（今韶关）瑶族人民起义抗清。连山（今连山东北）等地各族农民也“四面蜂起，漫山遍野而来，共逼州城”②。

随着中南地区抗清浪潮的发展，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

---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人语·永安诸盗》，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52 页。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顺治九年十月《广东巡抚李栖凤揭帖》。

地人民亦纷纷武装抗清。孙可望、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军余部在四川不断打击吴三桂部清军。从而形成了以中南战场为主体的第二次全国抗清高潮。

四、清军反攻和永历帝的再次逃亡

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年）八月，永历帝返回肇庆，此时永历政权控制两广、湖广、四川、云贵、江西等地，对抗清颇为有利。但永历政权并没能利用已出现的有利形势，扩大战果，这是由南明小朝廷政治腐败造成的。这个小朝廷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对大顺农民军猜忌、防范、限制，不给大顺军发饷，甚至派军官监视或改编农民军，从而加深了农民军和南明官军之间的矛盾，削弱了抗清联合阵线的力量。永历政权内部又分裂成不同的党派，互相角逐。以袁彭年、刘湘客为首的“楚党”，与以朱天麟、堵胤锡等为首的“吴党”，争权夺利，势同水火。拥兵诸将各自称雄，甚至互相攻杀。

处于全国抗清力量包围和打击之中的清王朝，为了加强对南方各地抗清武装的镇压，扭转局势，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了一些调整。首先，巩固和安定后方，以集中力量对付正在后方蔓延的农民起义和降将倒戈事件。第二，严禁民间蓄养马匹和私藏兵器，以限制抗清队伍的扩大。第三，在占领区建立驻防制度，派兵驻防各重要城镇。第四，推行“以汉制汉”的策略，除已派洪承畴坐镇南京，招抚东南各省外，又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令其往两广地区，凡军机事务，悉听其调度。

顺治五年九月，清廷命定远大将军济尔哈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攻湖广；六年五月又命孔有德征广西，耿仲明、尚可喜征广东。

早在顺治五年五月（一说七月），征南大将军谭泰和固山额

真何洛会采取“伐魏救韩之策”①，进围南昌。正在围攻赣州的金声桓等果然撤军回南昌，困守孤城。清军围城达8个月之久，于次年正月十九日，攻陷南昌。金声桓投水而死。二月，李成栋率军由广州增援江西，败于信丰，溺水而死。于是江西大部重新被清军控制。

由于南明诸将之间及南明与大顺军之间矛盾重重，已夺回的湖南各城多弃而不守。顺治六年初，何腾蛟为调解各部矛盾，仅率标兵30人由衡州入湘潭。此时，李锦已弃城东走，湘潭仅剩空城，不久何腾蛟为清总兵徐勇俘获，解送济尔哈朗军营。何腾蛟拒不投降，绝食七天遇害。湘潭、长沙相继为清军所占。

永历政权重新部署兵力：以杜永和为两广总督守广州，堵胤锡与胡一青守衡州，瞿式耜以留守督师兼领江楚各省兵马。济尔哈朗指挥清军继续向前推进，相继攻占湖南衡州、宝庆、永州、沅州（今芷江）、靖州等地，堵胤锡退入龙虎关（今湖南江永和广西恭城交界处）。李锦、高一功等率大顺军退入广西。孔有德率军至衡州后，乘南明军不备，于十二月率军突袭，南明军自相扰乱，逃窜山谷。湖南完全沦入清军之手。

顺治六年年底，清平南王尚可喜和已故靖南王耿仲明之子耿继茂率清军越过大庾岭入广东。除夕之夜，清军攻占南雄，韶州守将、巡抚罗成耀潜逃广州。永历帝欲留李元胤、马吉翔留守肇庆，自己登船西逃。瞿式耜闻讯上书劝阻，认为：“粤东水多于山，良骑不能野合……赋财繁盛，十倍粤西。且肇庆去韶千里，材官兵士南北相杂，内可自强，外可备敌，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② 可是，永历帝不纳，离肇庆奔抵梧州，开始了第二次流亡。

七年正月，清军占领韶州，守将吴六奇投降。二月，尚可喜督清军攻广州。总督杜永和拒绝清军的招降，指挥南明兵从城上

---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五，顺治五年五月辛卯，第586页。

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七，顺治七年正月辛酉，第633页。

发炮，击伤清兵甚多。因城内军民坚守，尚可喜与耿继茂分区对广州实行围困。尚可喜修战船，铸大炮，备火药，造战具，进行充分的物资准备以为持久之计。永历帝命驻三水的陈邦傅和肇庆的马吉翔增援，但二人均惧战不至。郑成功自厦门水路来援，进至平海，因清军袭击厦门，被迫折回。永历帝遣高一功等率大顺军救援广州，南明梧州守将陈邦傅嗔其不附己，遣兵潜袭大顺军老营，结果高一功西入山区，广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防守广州西门外城的范承恩潜通清军，于十月二十八日放弃外城。二十九日，清军发起总攻。尚可喜督军越过城外河网，毁掉木城，扫除前进障碍。十一月初二日，清军以火炮猛轰广州城。城西北角摧毁后，尚可喜指挥清军登城。明军誓死守城，与清军肉搏，战死6000余人。城破，守将范承恩降清，杜永和等退往琼州（今海南琼山）。尚可喜、耿继茂入城后，数以万计的军民惨遭杀害。广州之战后，清军相继攻占肇庆、高州、钦州（今属广西）等地，广东大部地区重被清军占领。

顺治七年三月，孔有德率清军，自湖南永州破龙虎关，进入广西。随后，清军克灌阳，占全州，陷兴安，于十一月初四日过严关（兴安西），向桂林进攻。瞿式耜一面向永历帝报警请援，一面激励守城将士奋起抗击，但开国公赵印选离城逃遁，胡一青、王永祚、杨国栋等部亦携各家老营争先出城奔窜，瞿式耜独留空城，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①。时总督张同敞自灵川归，愿与瞿共留同死。初六日黎明，清军进城。面对孔有德的威逼利诱，张同敞等忠贞不屈，拒不投降，最后从容就义于桂林独秀峰下。接着，南明又丧失了平乐、梧州等地，广西大部为清军所占。

清军向中南地区反攻，重新占领了赣、粤、湘、桂，南明官军基本丧失殆尽。大顺军余部则被迫向湘、桂、黔、川、鄂交界山区转移，并与云、贵、川、黔地区的大西军余部相呼应，继续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三，《临难遗表》，第431页。

坚持抗清斗争。不幸，李锦在转移至庆远（今广西宜山）时病故，高一功在转赴贵州途中战死。余部在李锦义子李来亨的统率下转移至湖北巴东，与先期到达的郝摇旗、刘体纯等部会师，并与鄂西、川东一带的义军结成“夔东十三家军”，继续坚持抗清。从此以后，永历政权在粤、桂的统治基本结束，整个抗清斗争的重心转向西南地区了。

第六节 清军进军云贵与大西军余部和西南地区人民的联明抗清斗争

一、大西军余部联合南明和各方力量坚持抗清

大西军余部是西南地区抗清的主力，也是永历政权在云贵地区的支柱。永历政权朝不保夕，漂流不定，不得不依靠大西农民军余部支撑残局。清军经过连年征战，力量已大大削弱，加之东南沿海有郑成功、张煌言抗清力量的牵制，不得不放慢进军云贵的步伐。大西军余部充分利用时机，整顿内部，发展经济，组织和加强抗清力量，使西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顺治三年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十几万人由“四将军”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等分率，坚持抗清。次年，定北将军艾能奇牺牲，其部属归孙可望兼统，并由孙任全军主帅。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孙可望等吸收了大量的苗族、藏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人民入伍，形成了一支以大西军余部为骨干、有各族人民参加的浩浩荡荡的抗清大军。史载，当时“有众二十余万”①。还组建了新兵种“象队”，提高了战斗力。大西军余部克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岳麓书社 1982 年版，第 133 页。

贵阳，下昆明，北攻川南，逐步建成以云、贵两省为中心，包括四川西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部分地区的西南抗清基地，并建立起以“兴朝”为年号的政权，实行军屯，奖励百姓垦荒，减免租税、田赋，发展工矿业，铸钱制币，还设局制造兵器，因而使云贵地区出现了“物阜民安”、“士饱马腾”①、军声大振的局面。

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 年），孙可望遵照张献忠联明抗清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匡扶明室”② 的思想。六年，为了扶明抗清，大西军又遣使同永历政权谈判。至八年，终于迫使永历政权接受其“联合恢剿”③，共同抗清的建议。大西军则接受永历年号，奉永历正朔，并把永历帝朱由榔接到贵州安隆所（今安笼铺），将该地改名安龙府。朱由榔封孙可望为秦王。从此，大西军清除了后顾之忧，独立地领导西南地区军民，掀起了又一个新的抗清斗争高潮。

与此同时，清廷为镇压反清武装，也在调兵遣将。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 年）九月，赐平西王吴三桂金册金印，命其统所部入川征剿。九年春，清军继续向云贵挺进：孔有德由柳州出河池（今河池西）攻贵州，吴三桂由陕西汉中入川，经保宁（今阆中）犯成都、重庆等地。孙可望决定兵分两路以顶住清军的进攻：一路由李定国、冯双礼率步、骑、象队，共 8 万多人，由贵州出湖南，捣桂林；一路由刘文秀、白文选率领步、骑、象队，共 6 万多人，由贵州入川南，攻成都。大西军统帅部由昆明移驻贵阳，主帅孙可望居中指挥和调度。

大西军兵强马壮，沿途所向披靡，节节取胜。李定国一路，于五月首破湖南靖州，大破清总兵张国柱部，阵斩 5000 余人，继而下沅州、武冈、宝庆。然后督大军攻广西门户全州，并分遣

---

① 李辑玉：《滇南纪略》。

② 徐鼒：《小腆纪传》卷三一，《杨畏知传》，第 311 页。

③ 何是非：《风倒梧桐记》，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92 页。

精兵沿便道直趋严关。清兵大败，“横尸遍野”①，退保桂林。七月初二日，李定国围桂林。孔有德“登城观垒，怯定国据近险，举止失措。”② 大西军以云梯攻城，用象队毁其城门，孔有德遁逃无路，“杀其妻，举火自焚死”③。七月初四日，大西军攻下桂林，广西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李定国督兵占柳州，克梧州，很快收复了广西全境。清廷闻讯，极为震惊，急命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兵10万（一说15万），经洞庭，进军湖广。

与此同时，刘文秀军亦势如破竹，相继攻克叙州、泸州、重庆、成都，收复四川大部地区。清将吴三桂退守保宁。

收复广西后，李定国又挥师趋湖南，南下衡州，北攻长沙、常德、岳州，并分兵一部东扫江西。兵出凡七月，收复郡16、州32，辟地3000里，军声大振。十一月，大西军与清军大战于衡州，激战数十合，杀伤相当。大西军佯败，尼堪率兵追击，李定国伏兵突发，阵斩尼堪。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④，成为南明有史以来最大的壮举。李定国战功卓著，永历帝授其招讨大元帅，总督各省军务。清统治者闻尼堪败死，一度准备放弃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七省，与南明媾和。

大西军在西南抗清的胜利，推动全国各地掀起了第三次抗清高潮，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战场上：一是李定国大西军所在的湘、桂、滇、黔西南战场，另一个是郑成功义师所在的闽、浙、粤东南战场。他们遥相呼应，互相配合，共同抗清。

当李定国东征北伐时，郑成功也奉永历正朔于东南战场向清军发起进攻。顺治九年春，郑成功率部攻长泰，大败清浙闽总督陈锦部援军，遂占长泰，围攻漳州达7个月之久，牵制了清军不

---

① 徐鼒：《小腆纪传》卷三七，《李定国传》，第362页。

②③ 查继佐：《罪惟录》附纪卷二一，《桂王附纪》，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页。

④ 黄宗羲：《永历纪年》。

少主力，客观上配合了李定国部队作战。李定国曾主动邀郑成功会师。郑成功亦派人与其约定会师日期。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围攻新会，郑成功遣军南下广东会师，但因风向不利失期，会师计划未能实现。

郑成功为了策应大西军在西南作战，曾多次与张煌言联师北伐，使清王朝东西难以应付。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是清军进攻云贵与李定国决战的时刻，郑成功联合张煌言大举北伐，"以图牵制"①。五月十三日，郑成功率17万大军，以张煌言为先锋，水陆齐进，北入长江。六月，郑军将领甘辉率军自崇明登陆，夺取瓜洲，直捣镇江。清军于江上设滚江龙（即在长江两岸置木栅，连以铁索，横亘江中，以阻战船通过）、木浮营（又称"木城"，即于江上结大木为筏，覆盖泥土，上可驰马，旁有木栅可置炮，自上流浮下，船遇之立碎）为障。郑军所向披靡，斩断滚江龙，冲垮木浮营，一举攻占镇江，歼灭清军4000多人，清提督管效忠率140人逃往江宁（今南京）。七月，参军潘庚钟建议暂驻瓜镇，分据淮、扬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断北京粮道，以期清廷内变。郑成功认为兵贵神速，遂不从潘庚钟之议，率军攻下江浦，进围江宁。张煌言以芜湖为据点，与江宁城下郑军成犄角之势，连下4府3州24县。清廷闻郑成功进围江宁城，大为震动。

郑成功"累捷自骄"②，听不进部下的正确建议，麻痹轻敌，受清两江总督、南京守将郎廷佐缓兵之计的欺骗，令83营大军于城下牵连困守，坐待敌降，甚至释戈开宴，纵酒捕鱼为乐。七月二十三日，清军突袭郑军营垒，郑军无备，大败。此战，郑军主力损失大半，参军潘庚钟，部将甘辉、万礼、张英、林生等皆战殁，余部被迫登舟出海。十月，郑成功回到厦门，张煌言突围

---

① 魏源：《圣武记》卷八，《国初东南靖海纪》，第333页。

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九，顺治十六年七月壬午，第751页。

后也回到浙江沿海，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二、清军挺进云贵，永历政权败亡

大西军东征北伐，收复了西南和中南地区大片土地。但是，由于永历政权的腐败，地主官僚对抗清联合阵线的破坏，以及大西军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加剧，严重地破坏了抗清斗争的大好形势，最后反使斗争归于失败。

永历小朝廷虽然占据较大地盘，得到大西军和各地农民军强有力的支持，一度出现恢复故土的希望，但这个政权同前几个南明政权一样昏庸无能，没有抗清大计，苟且偷安。小朝廷的大小官僚，除了少数坚决抗清，谋图恢复明朝江山外，多数以抗清作资本，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私利，随时可以屈膝投降。

以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联合阵线内部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有些南明官僚依附在抗清的旗帜下，实际上干的是破坏抗清的勾当。他们不甘心长期与农民军合作，便分化瓦解、腐蚀拉拢大西军的统帅，或者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求一逞。如南明军官张先壁、马进忠、马久成等人见孙可望在胜利面前滋长了个人野心，就挑拨他和李定国的关系，怂恿其称王称帝。孙可望把抗清重任置诸脑后，忌李定国功高于己，因而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李定国一路大西军的抗清斗争，甚至不择手段，要加害李定国。

顺治十年春，孙可望约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实际是企图趁机杀害李定国。李定国接密报为了避免和孙可望发生正面冲突，不得不放弃湖南战场的有利战机，率军南下广西，使孙可望的阴谋未能得逞。孙可望的倒行逆施，严重地危害了抗清大局，不仅使大西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而且使湖南衡、永、靖、沅、辰等地得而复失。

李定国以全力支撑抗清斗争大局，转战于永州、肇庆、柳州等地，并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张名振遥相呼应，准备合兵取广东，北图江宁。但在清军和孙可望的双重压力下，李定国不得不

向广西撤退。孙可望多次派兵赴广西进攻李定国，均遭失败。

顺治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双方再次战于曲靖交水（今交河），孙可望大败东逃，后经贵州逃往湖南宝庆，向清军投降，于十二月初到达长沙。

孙可望降清，对清军的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之前，清军对大西军主要进行远距离围堵：经略洪承畴驻长沙指挥全局，川陕总督李国英、平西王吴三桂驻川北，大将军陈泰、都统阿尔津驻荆州，尚可喜等分驻肇庆、广州，采取“遇出犯湖南、川北、广东之寇则击却之，出境亦不穷追”① 的守势战略。孙可望降清后，“尽图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②，清廷掌握了大西军内讧和云贵的虚实情况，认为应“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统兵进讨”，“相机进取”③。当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廷开始部署向云贵进攻：以固山额真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率兵由湖南西进；以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率兵，由四川南进；以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同提督线国安率兵由广西北进。三路大军先合攻贵州，然后向云南进攻。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九日，又命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等率军征云南。显然，这是采取三面包围、分进合击的战法，企图步步进逼，逐步缩小包围圈，一举消灭农民军和永历政权。

这时，永历小朝廷的君臣们却沉醉于“宴饮恬愉”之中，到处歌舞升平，人皆“不以国事为念”④。李定国掌兵马大权，但他陷入了党派争权夺利的漩涡，力图巩固和扩大个人权势，以致武备不整，防御松弛。在清军的多路进攻面前，李定国采取分兵

---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九，顺治十五年二月，第732页。

②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第139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顺治十四年十二月癸未。

④ 邓凯：《求野录》，《明末十家集》第四册。

把守、消极防御的作战指导，匆忙派部将刘正国、杨武等守贵州北部三坡、红关诸隘口，以防四川清军；马进忠守贵阳。他自率大军西赴永昌（今保山），讨伐反叛的王自奇、关有才等孙可望旧部。反叛虽平，但清军已入贵州。罗托所率中路清军自靖州、沅州，经镇远，于四月攻占贵阳，守将马进忠溃逃。北路吴三桂军攻下三坡、遵义、开州（今开阳）等地，歼南明军7000多人，刘正国撤退云南。赵布泰亦于七月攻占广西南丹和贵州独山等地。贵州大部为清军占领。

七月，永历帝以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李定国当清军未集之时，中清军缓兵之计，“观望逡巡”①，行动迟缓，丧失了击敌的战机。九月，多尼自湖北荆州进至贵州平越（今福泉）。十月，清军各路统帅和将领齐集平越之杨老堡，讨论制定出分兵三路进攻云南的作战计划：北路吴三桂自遵义进，中路多尼自贵阳进，南路赵布泰自都匀进。每路兵约5万，共计15万人，由信郡王多尼担任总指挥。李定国于昆明闻讯后，急忙动员全部兵力，分三路迎击：南路由张光壁守南盘江，北路由白文选率兵4万守七星关（今贵州赫章东），中路由冯双礼守鸡公背（今贵州关岭西北），李定国自率一部守北盘江铁索桥，居中调度。北路白文选至生界立营，摆出欲攻遵义的架式，以牵制吴三桂部清军。因为部署已晚，颓势无法挽回。十一月，北路清军吴三桂自遵义出师，取道水西（今黔西），绕过七星关，很快进至云南沾益。南路赵布泰军自安顺西进，由普安州（今贵州盘县）入云南。李定国率部迎战赵布泰，损失严重，全线溃退。多尼所率中路，自贵阳取道关岭，击败冯双礼军而进抵曲靖。

经此两役，大西军的精锐损失殆尽，已基本丧失了抵御清军的能力。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返昆明。永历帝召群臣讨论向何处去。李定国提出东入湖南，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边缘地带组织

---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五，《吴三桂率清兵取云贵》，第477页。

防御的建议，他认为如此，胜利可复云南，败则南入越南，再从海上至厦门，与延平王郑成功合师进讨。刘文秀部将陈建，则请北入四川。勋臣沐天波则力主退往滇西，急则入缅甸。在众说纷纭的争议中，身为招讨大元帅的李定国，最后附和沐天波西逃的意见。十五日，朱由榔在李定国的护卫下逃离昆明。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多尼、吴三桂、赵布泰所率清军会师于昆明。初四日，永历帝等逃至永昌。清军日逼，二月十五日败南明白文选部于大理，追至澜沧江。李定国闻讯，急令靳统武率兵4000护送永历帝至腾越（今腾冲），自率精兵6000断后。二十日，率部渡潞江（今怒江），设三层伏兵于江西20里之磨盘山，隐蔽待机，约定待清军至山巅，以炮声为号，伏起前后夹攻歼敌。二十一日，清军已有1.2万人上山，前锋已入二伏，不料南明大理寺卿卢桂生投敌告密，清军急忙舍骑而步，并开炮发其伏，双方混战大半日，此战虽歼清军数千人，但李定国部亦损失三分之二，只好退至中缅边境地区继续抵抗，永历帝则经边界的囊木河逃往缅甸。

顺治十七年八月，清廷以爱星阿为定西将军，前往云南会同吴三桂追捕永历帝朱由榔。十八年九月，吴三桂、爱星阿率清军5万人入缅，十二月初进至旧晚坡（今缅甸阿瓦城东60里）。缅甸慑于清兵压境，执朱由榔等人献于吴三桂。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朱由榔被吴三桂押回云南，四月至昆明绞死，永历政权灭亡。李定国悲愤交加，于同年六月二十七日病死在缅甸勐腊。

至此，南明政权前后坚持了近20年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川、鄂交界地区由李来亨等领导的抗清斗争的余波——夔东十三家军，也于康熙三年（1664年）失败，全国的抗清斗争，除了台湾的郑成功之外，已全部被镇压下去。

第七节　各方胜败原因及其作战得失

自1644年至1664年的20年间，是中国大陆上清朝统治者、大西大顺农民军、南明（包括农民军余部）三大军事政治势力角逐并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年代。最后，清军取得了彻底胜利，统一了中国大陆，建立起满汉蒙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现就作战各方胜败原因及作战得失分析如下。

一、大顺、大西农民军的深刻教训

在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之后，农民军比较及时地改变战略，担负起抗清的历史重任，歼灭大量清军，对阻挡和延缓清军南下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农民军的英勇斗争最终归于失败，其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战略上忽视了清军这个强大敌人的存在。农民军的领袖们，特别是李自成，在与明王朝斗争的过程中，对新兴的清政权的存在和清军力量的强大，一直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以致造成战略决策上的失误。他没有考虑和预见到，在消灭北京明王朝后，必然要和清军交战，更没有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能否与明军和清军连续进行两次决战，击败这两大对手。事实上，农民军的军事实力是难以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结果，大顺军自北京撤退时，一溃千里。大西军领袖张献忠也没有高度重视清军这一强大对手的存在，未从中南地区北上抗击清军，而是西逃四川，把力量消耗在与故明地方势力的斗争上。当然，大顺军、大西军在战略退却、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已当机立断地把清军看作主要敌人，但这已为时过晚，无法扭转战局的发展。这是农民军在与清军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中必然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策略上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以联合一切抗清力量共同抗清。大顺军在反对明王朝统治乃至攻占北京后，实行过“追银

追粮助饷”、“割富济贫”、追赃比饷等政策，没收贵族、官僚、豪绅、地主的财产，政治上实行专政。大西军也曾杀贪官，对反动宗室、官僚地主实行镇压。所有这些，起到了大灭地主阶级反动气焰、鼓舞农民军壮志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主要矛盾变化了，农民领袖们却没有迅速调整政策和策略，以减少故明官吏、明军残余和中小地主阶级的敌对情绪，团结和利用一切抗清力量。结果，使农民政权管辖区内本来有抗清倾向的地主、官僚，后来却纷纷倒向清朝一边，从而壮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在对待南明弘光政权问题上，也是如此，一直与其势不两立。当时，一方面清军这个强敌日逼，另一方面江淮以南还有大半个中国，有五六十万军队，如果农民军及时地改变政策，采取灵活策略，利用、团结南明的一切抗清力量，以农民军为主力的早期抗清斗争则可能是另一番情景。但李自成、张献忠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他们的继承者后来实行了联明抗清的政策，但为时已晚。

第三，大顺、大西两大农民军主力未能很好地团结、协同，并肩作战。李自成、张献忠在两军的关系上一直未处理好，直到清军攻下潼关、西安，李自成向河南、湖北撤退时，大顺军和大西军还在争夺汉中，战于川北。这就大大削弱了农民军自身的力量，成为农民军必然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二、南明失败的原因

明朝中央政权被推翻后，在南方相继建立的几个南明政权，延续了近 20 年，几度出现较好的局面。但是，几个南明小朝廷最终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覆亡了，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在政治上，几个南明政权实际上仍然是腐朽的明王朝的继续。几个小朝廷的统治者，无不过着奢侈淫逸、贪婪腐朽的生活。他们虽然以恢复中原，恢复故土相号召，但都没有采取任何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生产，积蓄力量，长期抗战的积极政策。

既不能把人民群众的抗清力量调动起来，也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更提不出能够动员和鼓舞各阶层人士团结抗清的纲领和口号。几个南明统治集团之间，不是协同配合，互为声援，而是闹出一幕又一幕的互相排斥、互争帝统的丑剧。在其各自内部，又是奸佞当道，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内讧迭起。朝廷中虽然出现过一些识大体、顾大局的将领，并在抗清斗争中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他们往往并不掌握实权，不能掌握和控制形势。因此，南明各政权，虽有一定力量，并一度有所发展，但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第二，在军事上，既没有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南明各政权中，一些主战的将领曾提出过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但由于南明小朝廷的反动腐败，都没能实行。相反，一些错误的主张，因为迎合了朝廷苟安妥协、退让逃跑的思想，反而得到了皇帝的采纳。在兵力对比上，清军自西安"转旆东征"时，兵力也不过20万左右，而南明的官军、义军众达五六十万，加上农民军则超过百万。但是，许多将领割地一方，拥兵自保，没有形成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这就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反而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

第三，南明各政权对农民军的限制、打击、分化、腐蚀的反动政策，削弱和破坏了抗清联合阵线的力量。弘光政权以农民军为敌，对清统治者退让妥协，到头来被清军所消灭。隆武、永历政权，虽接受了农民军联合抗清的主张，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未能推进这种有利形势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小朝廷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对农民军怀疑、防范、限制，力图捆绑住农民军的手脚，即使像何腾蛟这样抗清比较坚决的名将，也不肯信任和重用大顺军。有的南明将领，甚至袭击和围堵大顺军，使双方无法继续合作下去。永历政权自两广向云贵转移的过程中，大西军余部已成为抗清联合阵线的主力，但地主、官僚、大小将领不甘心长期与农民军合作，竟然分化、拉拢和腐蚀农民军领袖，利用农民军内部的裂痕，进行挑拨离间。从而使抗清联合阵线遭到

削弱和破坏，导致南明的最后败亡。

三、清军胜利的原因

定鼎中原，完成“一统之业”①，是满族贵族的既定方针。具有远见卓识的摄政王多尔衮，从确立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和维护满汉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制定了联合汉族地主阶级首先镇压农民军，然后消灭南明抗清势力，进而统一全国的军事战略，并贯彻始终，这是清军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而在作战指导上，成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善于机动和集中兵力。正确地运用机动，不但可以出敌不意和掌握战争主动权，而且可以弥补兵力不足。清军以骑兵为主，进入中原以后，尤其利于大规模机动作战。在入关以后的十几年征战中，清军采取的作战样式基本是快速进攻和追击，很少有防御作战的例子。在实施快速机动作战中，清军作战指导上的第一个特点是集中兵力。每战都是集中兵力，打击一个目标，不冒两面作战的危险。清军在北京立足后，有两个作战对象，一是大顺军，一是南明军队。多尔衮毫不犹豫地先进攻山西、陕西的大顺军，而只以少数兵力沿山东、河北缓慢南进，牵制南明军队，甚至以和谈麻痹南明。待大顺军基本被击溃后，立即集中兵力进攻南明，从而既避免了两面作战，又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第二个特点是多路进攻，迂回包围。不论是进攻农民军，还是经略山东、河南、江南，进军西南、西北，均取多路进攻部署。对扬州、南昌、福州、广州、桂林、贵阳、昆明等城的攻取，都成功地运用了包围战法。第三个特点是把握有利战机。如占领湖南、两广后，面对云贵有战斗力的几十万农民军，没有轻率冒进，而是待孙可望与李定国自相残杀，永历政权内讧，抗清联合阵线削弱后，才大举西进，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彻底消灭。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正月丙午，中华书局影印本。

第二，用政治诱降配合军事打击。满汉地主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因此，清统治者对农民军和各地义师、广大民众，始终采取军事镇压，乃至残酷屠杀的方针。而对南明则在军事打击的同时，竭力采取政治诱降手段，笼络、招抚汉族地主官僚，以瓦解地主阶级中的抗清力量，打击南明政权。如：弘光政权的主力刘泽清、刘良佐、左梦庚、李成栋等人所率几十万军队不战而降；隆武政权的郑芝龙，在洪承畴的招抚下，打开仙霞岭关卡，让清军顺利进入福建，自己亦率8万明军降清；南方各省的许多地方武装，也绝大多数投降清军，并成为清王朝镇压抗清斗争的武装力量。

第三，重用降清的汉军汉将。清统治者为了弥补八旗兵兵力不足，将大批降清的明军编为“绿营兵”，并由明降将继续指挥，在战斗中打头阵。早年降清的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等都封为王，率军战斗在南半个中国的各个战场，一直充当镇压抗清斗争的急先锋。洪承畴更受到清统治者特别的信任和重用，在北京期间令其主军机要务，指挥镇压大顺农民军；又先后坐镇江南、湖广、云贵，经略南方，破例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在清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发挥了满族将领难以起到的作用。没有这些降清的汉军汉将，清统治者是很难打败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反抗，统一全国的。

第六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

第一节　荷兰侵略者侵占台湾

一、台湾的地理形势

台湾是我国最大的岛屿，位于祖国大陆东南100多公里的海上，与福建省仅一水之隔。台湾本岛连同澎湖列岛、钓鱼岛、赤尾屿、彭佳屿、兰屿、火烧岛等附岛，面积共有3.6万平方公里。

台湾的地势东高西低。东部为台东山地，由中央、台东、玉山、阿里、雪山等平行山脉组成，统称台湾山脉，其高峰多数海拔3800米以上。玉山山脉主峰高3997米，为全岛最高峰。西部为台西平原，北窄南宽，其中的台南平原为农业最盛、人口最密的地区。中部为台中丘陵，是台东山地与台西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区。其东侧为丘陵，西侧为台地。台中丘陵有不少盆地，较著名的有台中盆地和台北盆地。

台湾的居民绝大多数为福建移民，讲闽南话。高山族为当地土著，是我国诸多兄弟民族中的一个。

台湾的地理形势在军事上极为重要。《清史稿》称："台湾屹峙海中，为东南屏障，四面环海，崇山峻岭，横截其中，背负崇冈，襟带列岛。浪峤南屏，鸡笼北卫，澎湖为门户，鹿耳为咽喉。七鲲身毗连环护，三茅港汇聚澄泓。"① 《台湾纪略》亦称：台湾"地在东南隅，形似弯弓"，台湾平原外有台湾澳，"而澳外

---

① 《清史稿》卷七一，《地理志·台湾》，中华书局1977年版。

复有沙堤，名为昆身。自大昆身至七昆身止，起伏相生，状如龙蛇。复有北线尾、鹿耳门，为台湾之门户；大线头、海翁窟，为台城之外障。舡之往来由鹿耳。”又称澎湖为“台湾门户”，环绕有三十六屿，最大的为妈祖屿，其次为西屿头。各屿唯西屿稍高。“自厦门至澎湖，有水如黛色，深不可测，为舟行之中道”①。可见，台湾是我国东南一大屏障，有重要战略价值。它和海南岛，犹如祖国大陆的两个卫士，时刻警惕着外敌的入侵；而鹿耳门、北线尾、澎湖等地，则是台湾的军事要地。

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台湾在历史上向来是我国的领土。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根据古地理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认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台湾与大陆的古人类就有了往来。新石器时代，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大陆上的文化便传到了台湾。

台湾土著居民的祖先源于亚洲大陆。据一些专家研究，目前台湾高山族保留下来的许多习俗，诸如蛇图腾信仰、断发文身、凿齿、崖棺葬法、男女社交自由，乃至近代还存在的猎人头等，都与古代越人的习俗完全相同。因此，“台湾的高山族与古闽越族的确有密切的渊源关系”②。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提到的“岛夷”和《汉书·地理志》所称的“东夷”，就包括台湾的古越族在内。

我国大陆封建王朝与台湾的接触，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始于三国时期。东吴皇帝孙权为了扩大其经济、军事势力，于东吴黄龙二年（230年）正月，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兵万人，

---

① 林谦光：《台湾纪略》。

② 林仁川：《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文汇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林蔚文：《浅析台湾高山族同胞支持郑成功复台的原因》，《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

“浮海求夷洲及亶洲”，虽没能到达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①。夷洲就是现在的台湾。隋朝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派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今广东潮州市）渡海击流求（今台湾），登陆后，“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陈稜等打败流求人的反抗，“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②。三国和隋朝与台湾两次大的接触，促进了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的互相了解，加强了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唐、宋两代，台湾同祖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唐代已有汉人移居澎湖和台东的“里刘”地区。宋、元时，不仅相互间的联系继续加强，而且中央政府开始在台湾、澎湖正式建立行政机构。宋时，澎湖隶福建晋江县，正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元朝政府为了经营台湾，于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1292～1294年）间在澎湖“立巡检司”③，并在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把福建行省的省治徙往泉州，负责管理台湾和澎湖行政事务。这表明，早在13世纪台湾就已置于中国政府的正式统辖之下。

到了明朝，台湾、澎湖更成了我国国防要地，置重兵防守。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为了防倭寇袭扰，一度把澎湖巡检司裁掉，并将当地居民徙入漳、泉间。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曾“率师入台，东番（台湾高山族同胞）降服”④。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鉴于倭寇的骚扰越来越猖獗，明政府恢复了澎湖巡检司的建制，但不久又废。万历二十年（1592年），因有倭寇将入侵鸡笼（今基隆）、淡水的消息，明朝曾考虑在澎

---

①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隋书》卷八一，《东夷·流求国》，中华书局1973年版。

③ 汪大渊：《岛夷志略·澎湖》。参见荣孟源：《澎湖设巡检司的时间》，《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陈孔立《元置澎湖巡检司考》，《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④ 连横：《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

湖设兵戍守，五年后“始设游兵，春、冬汛守”①。明代澎湖巡检司的辖区包括台湾本岛。

明中期以后，由于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和明王朝日益腐朽，国内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沿海人民被迫渡海为生。有的拿起武器，组织海上武装，如林道乾、颜思齐、郑芝龙等。他们在海上既要冒风涛之险，又要跟倭寇和西方殖民者作斗争，还要反抗明朝官兵的迫害。为了取得立足点和物资供应，他们多把台湾作为后方基地。郑芝龙还鼓励福建沿海人民到台湾开发，因此，闽、浙沿海人民便一批一批地移往台湾。

以上说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源远流长。在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之前，台湾与祖国大陆不仅有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早已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

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殖民者相继东来，抢占殖民地，进行掠夺性的贸易，亚洲东南海洋成了西方殖民者横行海上的“走廊”。台湾宝岛，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更引起西方殖民者尤其是荷兰人的窥视。

荷兰对中国的侵略始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殖民者“驾大舰，携巨炮”，以“通贡市”为名，对我国沿海各地进行袭扰②。他们企图夺占一个地方，作为控制对华贸易和掳掠中国人的基地。万历三十二年，荷兰舰队司令韦麻郎率兵侵入澎湖，明朝都司沈有容率50艘战舰抵抗。侵略者看到兵力悬殊，只好撤退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建巴达维亚城（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天

① 连横：《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第8页。

② 《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启二年（1622年），东印度公司派科纳里斯·雷约兹率军舰17艘、侵略军1000余人，再度侵入澎湖，筑城盘踞，妄图长期占领。同时，还派兵袭扰福建沿海的漳洲、厦门及台湾等地，截劫商船，贩卖中国人到巴达维亚去做奴隶。天启四年八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又派马尔登·宋克率战舰“热兰遮”号到达澎湖。明朝福建巡抚南居益率兵与侵略军激战，最后把侵略者赶出澎湖，俘其头目高文律等12人。但是，荷兰侵略者并不死心，他们从澎湖败逃出来，又转到台湾，在台南台江登陆，逐渐将势力扩展到临近地区，侵占了台南。天启六年五月，西班牙殖民者派兵300名进入鸡笼，进而窃踞了台北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荷军在台湾北部击败西班牙殖民军，霸占了整个台湾。

第二节　台湾人民反抗荷兰侵略者的斗争

一、荷兰殖民者的暴虐统治

荷兰侵略者霸占台湾以后，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在经济上，荷兰殖民者不但以台湾为基地排斥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竞争，独占对华贸易，而且将占领区的土地全部攫为己有，称为“王田”，强迫当地农民耕种，并交纳繁重的地租。按照规定，上等田每甲（等于11.1亩）每年纳谷18石，中等田15.6石，下等田10.2石。地租之外，侵略者还向汉人征收人头税，“每丁年纳四盾。领台之初，岁收三千一百盾，其后二十年，增至三万三千七百盾”。他们还用武力胁迫高山族人民纳狩猎税，最初“猎者领照纳税，月课一盾……其后增至十五盾，岁入三万六千盾，少亦二万余盾”，并设关榷税，“岁亦十余万金”①。此

① 连横：《台湾通史》卷一七，《关征志》，第339页。

外，高山族人民每年还要向荷兰殖民者交纳几万张鹿皮。

在政治上，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以后，首先组织了殖民统治机构“评议会”。该机构上听从巴达维亚总部指挥，下设各级统治机构，对台湾人民实行最残暴、最野蛮的统治。他们为了控制人民，实行“结首”制度，即把数家或数十家居民编在一起，叫做一小结，指定一人为结首。令数十个小结为一大结，也指定一人为结首。通过这些大小结首对台湾人民实行严密控制。又利用高山族人民的传统习惯，通过“长老”来统治高山族人民。

在军事上，他们在台驻扎军队，建立军事据点。明天启五年(1625年）在一鲲身（今台南市安平镇)① 修筑起第一座城堡台湾城，荷兰人称热兰遮城，其后又在北线尾建筑了热堡，在魍港建筑了弗里辛根堡。清顺治七年（16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决定：“热兰遮城堡，即使在太平时期，守军也不得少于一千二百名。”② 实际上，荷兰守军最多时曾达2200人。其中1/3以上的兵力驻守在台湾城（热兰遮城）及其附近，另将近1000名士兵分派到全岛各地，以便加强控制。

为了在精神上奴役台湾人民，荷兰侵略者还派遣大批传教士进入台湾，建立教堂，强迫台湾人民做礼拜、学荷兰文，进行奴化教育。这些传教士和荷兰官吏一样作威作福，任意欺压人民。

荷兰侵略者还进行罪恶的贩卖奴隶的活动。明天启三年(1623年)，他们强迫1400多中国人为其“运土造堡垒，造好以后，把他们运往巴达维亚卖掉”③。据彼德·盖尔揭露，这些被俘的中国人多数在运往巴达维亚途中已大部被折磨死了。盖尔说：

---

① 鲲身即是沙堤。《鹿樵纪闻》卷中第六页载：“湾之外，复有沙堤，名曰昆身，自大昆身至七昆身止，起伏相生，环抱如龙。”

②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上，见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③ 〔荷兰〕威廉·庞德古：《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83页。

"他（庞德古）所提到的在澎湖群岛劳役的一千四百名俘虏当中，被带到巴达维亚准备出卖或作为契约劳工的却不多。在赫伦宁根号（Groningen）和哈尔凌号（Haerlem）上的一百八十人，无疑是已经运到了，而留在澎湖群岛的一千一百五十人，在 1623 年 9 月间就已经死了很多，在准备运往巴达维亚时只剩下五百七十一人，而到了 1624 年 1 月，能够活着登上巴达维亚的只有三十三人。"①

台湾人民稍有违抗，即遭到荷兰侵略者的血腥镇压。他们对台湾人民残暴蹂躏，严刑拷打，任意杀害，甚至施以"车裂"、"五马分尸"等惨无人道的刑罚，其残暴行径令人发指。这在当时，就连荷兰远征队统帅宋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中国沿岸的掠夺行为，激起了全中国的愤怒和反抗，把我们看成和谋杀者、暴君、海盗一样。我们对付中国人的手段确实也是非常刻薄和残酷的。"②

二、台湾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在荷兰殖民者 38 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一刻也没有停息过，给予殖民者以重大打击，充分展现了台湾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高昂斗志。

明天启四年（1624 年），目加溜湾社 200 多名高山族同胞在汉族人民的支持下，袭击荷军堡垒，放火烧毁栅栏，迫使敌人逃窜。崇祯元年（1628 年），新港社高山族人民揭竿起义，麻豆、目加溜湾等社高山族人民闻风响应。崇祯八年九月，麻豆社高山族人民袭击并杀死住在当地的荷兰侵略者 60 余人，并联合肖垅、目加溜湾等社共同抵抗荷兰援兵，最后终因弹药不济，麻豆、肖垅二社陷入敌手。据统计，从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1641～1643

---

①② 彼得·盖尔：《〈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英译本序》，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

年）三年时间内，就有 58 个高山族村社武装反抗荷兰侵略者，给了他们以沉重的打击①。

台湾人民反抗荷兰侵略者最大的一次斗争，是清顺治七年（1650 年）郭怀一领导的起义②。郭怀一原是郑芝龙的部下，后来在台南定居下来。他目睹台湾同胞备受荷兰人的种种欺压、凌辱，十分愤恨，早就有了驱逐荷兰人的打算。起义者计划在这年中秋节晚上，由郭怀一以"大结首"的身份，宴请荷兰官吏、商人和军官，出其不意，一网把他们打尽，然后乘势夺回赤嵌城（荷兰人称普罗文查，今台南市）。但由于内奸出卖，计划泄露，郭怀一决定提前起义。八月初七日，郭怀一带领群众袭击赤嵌城，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 1.6 万人。郭怀一身冒炮火，指挥起义军向荷兰殖民者勇猛冲杀，不幸阵亡，其部下 1800 多人也壮烈牺牲，起义最后失败了。事后，荷兰侵略军对台湾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起义军的一位副首领龙官"被活活烧死，尸体拉在马后，游城示众，然后头颅被割下挂在竿上"。另外还有 4000 名男人、5000 名妇女及一些儿童"被俘或被杀"③。这是荷兰殖民者在台湾欠下的一笔大血债。

台湾人民的这次反荷武装起义，虽然在侵略者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力量。台湾各族人民决心继续进行斗争，并渴望得到祖国人民的支援，早日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

---

① 参见丁名楠：《十七世纪中国人民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的胜利斗争》，《历史教学》1962 年第 3 期。

② 郭怀一起义时间诸说不一，此据乾隆《台湾府志》及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此外，还有三种说法：C.E.S《被忽视的福摩萨》说是 1652 年；《诸罗县志》谓 1640 年；《台湾县志》谓 1658 年。

③ 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 115 页。

第三节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

一、郑成功的战略决策与战争准备

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人，明平国公郑芝龙长子。因受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倚重，授总统使、招讨大将军，赐姓朱，名成功，人称“国姓爷”。

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郑成功曾苦苦劝阻，不果，遂率部至南澳（今属广东），起兵抗清。他以福建厦门、金门为基地屡创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清军。他屡拒清廷招降，并乘机加紧整军备战。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五月，郑成功与原南明鲁王朱以海、将领张煌言合师北上，入长江，破瓜州，克镇江，围南京，连占数十州、县。在大好形势下，郑成功骄傲轻敌，屯兵坚城，无所作为，终为清军所败。七月，仓促退守金门、厦门一带。郑成功深感金门、厦门为“弹丸之地”，粮饷来源困难，出战又有内顾之忧，而抗清是长期的斗争，不能不作长久立足的打算，所以产生了收复台湾的想法。当年十二月，郑成功召集诸将议决：“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前镇、仁武镇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眷”①，并着手进行准备。

在郑成功对收复台湾进行酝酿决策的过程中，何廷斌（一称何斌）起了重要作用。何廷斌，福建南安人，原为郑芝龙部下，因不愿随郑芝龙受清朝招抚，留在台湾，后来当了通事（翻译），取得了荷兰驻台总督揆一的信任，“事无大小，悉以咨之”②。何

①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三年十二月。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廷斌长期居住在台湾，对荷兰殖民者蹂躏台湾各族人民的暴行极为愤慨。顺治十四年，他随同荷兰人到厦门与郑成功谈判贸易问题，便暗中把台湾人民受荷兰侵略者欺凌和不断进行反抗的情形，以及荷兰人在台的兵力部署情况，告诉了郑成功，并力劝郑成功早日收复台湾。郑成功委托他在台湾代收来往于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商船贸易税。何廷斌回台湾后，秘密办理此事，但不幸于清顺治十六年春事情败露，“突然被剥夺了职务和待遇，不久便因债主的追索而破产”，于是，“他逃到郑爷那里去，由其引荐给国姓爷”①。何廷斌抵厦门后，把在台湾绘好的标有台湾的水系、港道及荷兰的兵力分布、炮台设置状况的地图② 交给郑成功，再次建议他收复台湾，并表达了愿做向导的愿望。何廷斌的情报，成为郑成功决策的重要依据。何廷斌的爱国行动，代表着台湾各族人民渴望解放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 年）的金、厦海战，郑成功虽然取胜，但军粮问题仍未解决。这时，从海上西援李定国的军队班师，人数大增，军粮供应更加困难。次年正月，李定国出师战败，孙可望降清，永历帝逃往缅甸，“成功闻之，欷歔叹息，而心愈烦”③。郑成功感到，收复台湾已不容踌躇，于是召集诸侯伯、提镇、参军等文武官员，再次讨论进军台湾问题。他认

---

①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上，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 127 页。

② 何廷斌向郑成功进献地图的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 1659 年，杨英《先王实录》记为“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前年”即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 年）；二是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二记为辛丑年，即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 年）正月；三是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记为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 年）正月。用 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加以印证，该书上卷记有一台湾商人珠哥在 1660 年阴历五月间在厦门时“曾因朋友关系造访过逃往厦门的通事何斌”，这说明在此之前何廷斌已到厦门。为此，本书从第一种说法。

③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 155 页。

为，形势紧迫，“附近无可措足，唯台湾一地离此不远，暂取之，并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①。于是，郑成功作出“亲征”台湾的重大决策②。这是郑成功战略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变，也是一个十分英明而大胆的决策。这对结束祖国的分裂局面，维护祖国的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郑成功在酝酿、讨论收复台湾的过程中，在物资上、精神上作了周密充分的准备。

（一）筹备粮饷

郑军所用粮饷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从闽、粤、浙沿海征集或购买。郑成功除略地取粮外，还往各县派征。据统计，自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 年）十月至顺治十八年四月，郑成功出动兵力征粮共达 24 次之多。每次大县不下 10 万，中县不下 5 万。清朝官员说：“海逆十余万，饷官数千员”③，到处征粮措饷。顺治十七年，杨鹏举在密陈奏疏中说：“臣闻上年海逆未犯镇江之先，贼计奸狡，密令奸细假扮商人，各处籴米，贮于江口等处，以及金山寺中。海船一到，即便运去。”④ 可见郑成功克服了清政府“迁海”政策所带来的困难，从福建、浙江等地筹集到大量的军粮。二是从海外进口一些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顺治十八年，荷兰人樊·吕克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在此新修的两艘

---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 156 页。

② 郑成功决策进取台湾的时间，学术界（包括台湾）有五种看法：一是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 年）正月，李定国战败，孙可望降清，永历帝朱由榔逃往缅甸，大陆各省基本被清军占领时；二是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 年），郑成功北伐失败，何廷斌进献台湾地图时；三是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 年），清军进攻厦门被郑成功击败后；四是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 年），郑成功海上起兵抗清时；五是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 年），台湾郭怀一起义反荷时。今从第一种看法。

③ 《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户部残题本》。

④ 《明清史料》己编第六本，《内阁中书舍人杨鹏举残奏本》。

大帆船，主要装载着米、干食品、硝石、硫磺、铅、锡等，也驶回中国沿海。”① 同年七月，荷兰从巴达维亚派出的增援舰队在中国海域截获的一只厦门大帆船，从上边劫夺走了50拉斯特（合50多吨）大米。这说明，郑成功还经常从东南亚进口大米及其他作战物资。三是何廷斌在台湾秘密筹集税款。据统计，何廷斌共从荷兰人手中得到银数十万两，对缓解郑成功军队的供给困难起了一定作用。

（二）练兵造船

郑军分陆师和水师，以及亲军和独立营，其数量在收复台湾之前约有70余镇，总兵力约24万人左右②。陆师又分步兵、骑兵和炮兵，并编有大刀队、弓箭手、盾牌队等。此外，尚有民众武装数万。

郑成功为了收复台湾，特别重视修造船舰，组建水师。他说：“我所致力者，全赖水师。”③ 铜山（今福建东山）是郑军造船的主要场所。战船大者为水艍、犁艚，次者为沙船、水底熕、先锋船等。船设二层，都是帆船。较大的战船，也有用竹帘作帆的。当时往来于大海的多是大青头（因船多饰以青色而得名），载重3000～4000担，长约10丈，宽2.5丈，高1.5丈，吃水8尺，其构造和性能适于作战。

在军器制造方面，有不同类型的铳、炮。有一种“副龙熕”炮，长1.36米，重165斤，铜铸。顺治十七年郑成功指挥水师

---

①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上附《可靠证据》第17号，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197页。

② 参见杨彦杰：《郑成功兵额与军粮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岳成驰：《郑成功军事制度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关于郑军人数，文献记载有多种说法：杨英《先王实录》称“数十万之兵员”；江日升《台湾外记》称“雄兵二十余万”；郁永河《伪题逸事》称“养兵十余万，……战舰数以千计”，等等。《台湾外记》所载比较接近专家考察的结论。

③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四年五月十一日。

于青屿、海门水域与清军作战时，曾用“副龙熕”炮击败清军。还有一种炮，镌有“大明永历乙未年铜炮”铭文，也是郑成功制造的①。

郑成功训练部队十分严格。他治兵以“胆勇为上，束兵次之”②。郑成功认为，只要达到将勇兵锐，部队的其他素质也就容易养成。为了进行战场纪律的训练，在练兵场用绳索划地为战界，退越绳索者杀；畏缩不前或无令后退者杀；无令轻战者虽胜亦杀。经过训练的水师“舳舻陈列，进退以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跃上下，矫捷如飞”③。

（三）侦察敌情

早在顺治十四年，何廷斌首次来厦门时，郑成功即向他布置了秘密搜集情报和勘测航路的任务。何廷斌回台湾后，将了解到的荷军兵力配备、设防、航路等情报绘成地图，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到厦门送给郑成功。此外，郑成功还经常通过台湾渔民和俘虏了解台湾的情况。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郑成功即作了如下部署：郭仪、蔡禄二镇率军前往铜山协守；参军蔡协吉协助郑泰留守金门；洪元佑、杨宽等守南日、围头一带，接连金门，以防清军乘虚袭取；洪旭、黄廷等辅佐郑经守厦门，调度各岛；郑成功率领马信、刘国轩、杨英等从厦门移师金门，“候理船只，进平台湾”④。东征舰队分为两个梯队：郑成功亲率文武官亲军、右武卫、左右虎卫、提督、骁骑镇、左先锋、中冲、后冲镇等为第一梯队，共有战舰120艘，部队2.5万人（一说战舰350艘，兵士4万人），克期先行。第二梯队由黄安等指挥，

---

① 朱捷先：《郑成功铸造的永历乙未年铜炮考》，《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②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二年五月初六。

③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四，《四库全书》本。

④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二月。

共有战舰 20 余艘，部众 6000 人。其作战方针是：首先收复澎湖，作为前进基地，然后乘涨潮之机，通过鹿耳门港，于台江实施登陆作战，并切断台湾城与赤嵌城两地荷军的联系，分别予以围歼，再收复台湾全岛。

二、荷兰殖民者的作战准备及兵力部署

荷兰殖民者早就担心郑成功迟早要收复台湾。自顺治十六年(1659 年)以来，由于郑成功东征台湾的传闻越来越多，荷兰侵略者深感“福摩萨的末日和国姓爷的到来已经迫在眉睫”①，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战争准备措施。

(一) 增强兵力，储备物资

顺治十七年六月，荷兰侵略者从巴达维亚派遣 12 艘战船并运载 600 名士兵增防台湾。这支舰队在燕·樊德朗带领下，于八月抵达台湾。但由于樊德朗认为郑成功不会马上进攻台湾，不听从揆一将其全部兵力和舰船增防台湾的意见，结果只留下“赫克托”号、“斯·格拉弗兰”号和小帆船“白鹭”号、小快艇“马利亚”号等 4 艘舰船和 600 名士兵，自率其他舰船返回巴达维亚。加上荷军原来在台驻军，总兵力约 2800 人，其中驻台湾城 1000 多名，赤嵌城 400 名；舰船 4 艘，小艇多艘。此外，“评议会”还决定，已服役期满而准备返回巴达维亚的士兵，都不准退伍，延长在台湾的服役期一年。

荷兰侵台长官揆一害怕被围，命令“所有城堡都配备以足够的兵力、军火和其他军需品”，并警告荷兰人：“国姓爷即将进犯，必须随时准备抵抗。”②于是，把散存各地的米谷和 3 万磅火药等大批物资运入台湾城，城内仅贮存的木材就足够 8 至 10 个月之用。

---

①②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上，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 129 页。

（二）搜集情报，实行封禁

荷兰侵略军贝德尔上尉认为："应该深入调查国姓爷对于公司的意图，并充分掌握他在厦门备战和装备的情报。"为此，荷兰侵略者除了通过传教士、商人、渔民探索消息外，还于1660年10月31日派专人前往厦门，以索要郑成功对巴达维亚的复信为借口，"刺探他对鞑靼人的态度，以及在厦门大规模备战的情况"①。

荷兰侵略者最怕台湾各族人民与郑成功里应外合。他们怀疑台湾人民的每一反抗行动，都是郑成功指使的，因此，禁止任何中国人进入赤嵌城，把华人长老和群众中有声望的人拘禁在台湾城内，以恐吓当地居民，使之不敢接应郑成功。他们不准商船与中国大陆贸易，以免减少台湾的物资储备和增强郑成功军队的物质力量；不准台湾渔民下海捕鱼；不准台湾人民与大陆通信、通航，以防走漏消息；强迫人民迁出森林，到台湾城周围居住，以便于控制；严禁人民从外间获得武器。

（三）调整兵力部署

1660年冬，荷军侦知郑成功"必将"收复台湾的动向后，决定撤销进攻澳门的原定计划，并宣布"一切处于戒备状态"②。同时，对兵力进行了调整：台湾城及其附近小岛和海面，兵力1140人，舰船多艘，由揆一率领；赤嵌城，配属兵力500人，由描难实叮率领。其他港口和城堡约有数百人守卫。荷兰殖民者获悉郑成功将要收复台湾，深感驻台兵力不足，又急忙从巴达维亚派来12艘船舰，600名士兵增防台湾。直至战前，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总兵力约2800人。鹿耳门港因早已沉船堵塞航道，加之水浅礁多，不便通行，所以未派兵防守。揆一的设防意图

---

①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上，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138页。

②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上，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140页。

是：依恃台湾城炮台的火力，居高临下，控制一鲲身和北线尾岛之间的大员港，另派“赫克托”号等战舰防守此港海口，阻止郑军登陆。

三、作 战 经 过

（见附图6）

（一）横渡台湾海峡，占领澎湖群岛

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 年）二月，郑成功率师在金门“祭江”，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三月初十日，一切准备就绪，船舰将士集结于料罗湾，候风进发。二十三日午刻①，天时霁静，郑成功亲自率领第一梯队自金门料罗湾放洋，向东挺进。

二十四日晨，船队已横越台湾海峡，陆续到达澎湖群岛，郑成功驻山峒内屿。次日，郑成功到各岛巡视，认为澎湖在军事上很重要，遂令张在等四将领留守，自己率军继续东征。澎湖到台湾虽只有 52 海里，顺风只要四更半可达，但若遇上逆风，就十分困难。二十七日郑成功军驶抵柑桔屿（今东吉屿、西吉屿）海面时，突然刮起暴风，只好返回澎湖。因大风不止，郑军携带的粮食已所剩无几。岛上百姓主要靠捕鱼为生，他们把自己仅有的蕃薯、大麦、黍稷等都捐献出来，合共百余石，亦不足大军一餐之用。如果无限期地停驻澎湖候风，不仅会影响军心，更重要的是不能按预定日期开进鹿耳门港。根据郑成功事先调查，要按照何廷斌探测的港路进入鹿耳门，必须利用每月初一日或十六日的大潮，如错过时机，就要向后推迟半个月。在此情况下，郑成功当机立断，决定进行强渡。指挥中军船队的将领蔡翼和陈广等鉴于风大浪险，力劝郑成功不要贸然从事，请求暂缓开航。郑成功

---

① 郑军离开金门的时间有三种说法：《台湾外记》卷五，谓二月初三日；《海上见闻录》卷二，谓三月二十二日；《先王实录》记为三月二十三日。今采《先王实录》之说。

果断地说："冰坚可渡，天意有在。……不然，官兵岂堪坐困斯岛受饿也。"① 于是，他下令立即起碇开船。

三十日晚一更时分，郑成功留下陈广、林福、张在等率兵3000人、船12只驻守澎湖，自率船队冒着暴风雨，横渡海峡，"成功坐驾（指挥船）竖起帅旗，旁列五方，中悬龙纛。发炮三声，金鼓震天。令洪暄引港船先面东而去，诸提镇照序鱼贯"②。他们同风浪搏斗了半夜，于四月初一日拂晓③ 航抵鹿耳门港外。郑成功先换乘小船由鹿耳门登上北线尾，踏勘地形，并派出精良的潜水健儿进入台江内海，侦察荷军情况。

（二）巧渡鹿耳门，登陆禾寮港

荷军据点台湾城、赤嵌城，位于今台南市。当时这里海岸曲折，两城之间有一个内港，叫做台江（亦称大员湾）。台江西南面有七座山屿相连，叫做七鲲身。每座山屿相距一里多，彼此"毗连环护"。一鲲身北面隔海有北线尾小岛，其间海面叫大员港（又称台湾港或安平港）。北线尾北侧为鹿耳门港。荷兰人筑的城堡台湾城在台江西侧的一鲲身，赤嵌城在台江的东侧，互为犄角。

从外海进入台江有两条航路：一条是大员港，叫南航道，在北线尾与一鲲身之间；一条是北航道，在北线尾与鹿耳门屿之间，即"鹿耳门航道"。南航道口宽水深，船易驶入，但港口有敌舰防守，陆上有重炮瞰制，必须经过战斗才能通过。北航道水浅道窄，只能通行小舟，大船必须在涨潮时才能通过。1627年荷军曾在北线尾岛北端建有热堡，1656年在一次台风中倒塌后便不再派军防守。荷军认为，凭此"天险"，只要用舰船封锁南航道海口，与台湾

①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三月三十日。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158页。

③ 《先王实录》记为永历十五年四月初一，而所有荷兰官方和私人记载都说郑军船队于1661年4月30日即阴历四月初二拂晓到达台湾，两说相差一日。

城、赤嵌城的炮台相配合，就可阻止郑军登陆。

郑成功之所以选择在鹿耳门港突入，一是掌握了该地的潮汛规律，即初一、十六两日大潮时，水位要比平时高五六尺，大小船只均可驶入。郑成功从澎湖冒风浪而进，正是为了在初一日大潮时渡鹿耳门。二是何廷斌早已探测了从鹿耳门到赤嵌城的港路。所以，郑成功实施登陆作战路线、地点的确都是正确的。

四月初一日中午，鹿耳门海潮果然大涨，郑成功密令“何斌坐斗头，按图纡回”① 而进。郑军大小战舰顺利通过鹿耳门后，立即分兵两路：一路登上北线尾，一路驶入台江，准备在禾寮港（今台南市禾寮港街）登陆。

台湾城上的荷军原以为中国船队必从南航道驶入，忙于用大炮拦截，未料到郑成功却躲开了火力，船队从鹿耳门驶入台江，在大炮射程之外。荷兰侵略者面对浩浩荡荡的郑军船队，“骇为兵自天降”②，顿时束手无策。郑军船队沿着预先测度好的港路鱼贯而入，切断了台湾城与赤嵌城荷军的联系，迅速于禾寮港登陆，并立即在台江沿岸建立起滩头阵地，准备从侧背进攻赤嵌城。在北线尾登陆的一支郑军，由宣毅前镇陈泽督率，扎于鹿耳门，以牵制荷兰侵略军兵船，兼防北线尾。

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见祖国的大军到达，争先恐后地“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③。根据荷兰方面记载，郑军的登陆行动得到中国居民中2.5万名壮丁的帮助。南北路土社高山族群众闻讯接踵而至，“男妇壶浆，迎者塞道”④，表现了台湾人民热烈欢迎祖国军队收复台湾的爱国热情。

---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159页。

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十，顺治十八年三月，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64页。

③〔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142页。

④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正是由于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援，郑军不但顺利登陆，而且为分割包围盘踞台湾之敌创造了条件。

（三）水陆战台江，迫降赤嵌城

郑军胜利登陆，包围赤嵌城荷军，并割断了赤嵌城与台湾城之间的联系。当时，坐镇赤嵌城的荷军司令官描难实叮属下兵力约400人，龟缩在台湾城中的荷兰侵略军长官揆一属下约有1100多人，战舰和小船各两只。荷军兵力虽弱，但气焰嚣张。侵略者狂妄叫嚷："二十五个中国人合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荷兰兵"，"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① 揆一妄图凭借其船坚炮利和城堡坚固，分兵三路向郑军实施反扑：一路令战舰向停泊在台江的中国船只进攻，一路由贝德尔上尉（又名拔鬼子）率兵240人抵抗从北线尾登陆的郑军，一路由阿尔多普上尉率兵200名乘船增援赤嵌城。

郑军从禾寮港登陆扎营后，即遭到赤嵌城荷军炮击。同时，荷军又放火焚烧马厩、粟仓。郑成功"恐被焚毁粮粟"，派杨英等率军前往看守堵御，"由是各街米粟，看守完全，无敢侵扰"②。接着，郑成功调整了部署：令左虎卫王大雄、右虎卫陈蟒率领铳船控制鹿耳门海口，以便接应第二梯队登陆；令宣毅前镇陈泽率兵防守北线尾一带，以保障主力侧后安全，并置台湾城荷军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另派兵一部监视台江江面，切断赤嵌城与台湾城的联系，为从海、陆两面打败荷兰侵略军的反扑作好了准备。

四月初三日，在北路发生了北线尾陆战。北线尾是一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沙洲，南端与台湾城相对，北端临鹿耳门航道。荷军贝德尔上尉趁郑军刚刚登陆，率领240名士兵，乘船沿台江岸边急驶北线尾，上岸后即分两路向郑军反扑。贝德尔指挥荷军以

---

①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145页。

②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

12 人为一排，疏开战斗队形放排枪，逼近郑军。陈泽率大部兵力从正面迎击，另以七八百人迂回到敌军侧后，夹击荷军。荷兰文献记载：郑军"箭如骤雨，连天空似乎都昏黑起来"①。贝德尔发现自己腹背受敌，手足无措。他所指挥的荷军士兵的勇气，这时则完全为恐惧所代替，许多人甚至还没向敌人开火便把枪丢掉了。他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②。郑军乘胜猛攻，将荷军"一鼓而歼"。"夷将拔鬼子战死阵中，余夷被杀殆尽"③。

南路增援赤嵌城的荷军，也被郑军战败。这支 200 人组成的援军由阿尔多普上尉率领，乘船沿台江南岸驶往赤嵌城，企图为描难实叮解围。郑成功发现后，立即出动"铁人"军④ 还击。他们双手挥舞大刀（荷兰人称为"豆腐刀"），奋勇向荷军砍去。200 名荷军士兵只有 60 名爬上岸，当即被"铁人"消灭掉。阿尔多普率残部逃回台湾城。

阿尔多普出援失败，赤嵌城守敌越发着急。描难实叮派人前往台湾城，要求揆一再派百余人援救赤嵌城。评议会研究，台湾城的处境危险，兵力不足，"如果再派出一支援军，则用以保卫热兰遮城堡及其周围地区的全部后备军将不足五百名。而这支队伍又是由战斗力最弱、最缺乏作战经验的士兵所组成的，……所以决定拒绝普罗文查要塞司令的请求"⑤。

---

①②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 145 页。

③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四月初三日。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记载：在此役中，荷军"上尉（指贝德尔）及其部下一百十八人全部战死"，其余"逃命的战士们徒涉过水深及颈的水面，由领航船载返大员。"

④ 据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四载：郑成功亲军士兵，身穿坚厚铁盔、铁铠及两臂、裙围、铁鞋等，又制有铁面，只露眼、耳、口、鼻，妆画五彩如鬼形，手执斩马大刀，专砍马脚，临阵有进无退，名曰"铁人"。

⑤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 146 页。

荷兰海军以仅有的两艘战舰和两艘小艇阻击郑军。荷军战舰船体较大，设备先进。其船“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①。郑成功以60艘大型帆船（每船配置两门大炮）包围荷兰战舰，荷舰“赫克托”号首先开炮，其他战舰也跟着开火，郑军水师在镇将陈广及陈冲的指挥下，个个奋勇争先。经激烈战斗，“赫克托”号被击沉。其他敌舰企图逃跑，又被郑军船舰紧紧包围。郑军用五六只大帆船尾追“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展开接舷战、肉搏战。英勇的郑军士兵冒着敌人的炮火爬上“斯·格拉弗兰”号，砍断船索，又用铁链扣住敌舰船头斜桅，放火焚烧。“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受重创挣脱逃跑，通信船“马利亚”号战败后逃往巴达维亚。

荷军海、陆三路作战均告失败，赤嵌城和台湾城已成为两座孤立的城堡，相互间的联系完全断绝。荷方承认，当时赤嵌城守军“力量单薄，处境危急”，“热兰遮城堡也由于地势关系，难以坚守，热兰遮市区更是完全处于敌军的包围和控制之下”②。

郑成功随即加紧对赤嵌城的包围。该城周围45丈，高3丈6尺，城墙上有4座炮楼。四月初三日，郑军的士兵在赤嵌城外抓到描难实叮的弟弟和弟媳。郑成功对他们讲明利害，令其回城，劝说描难实叮投降。接着，又派部将杨朝栋和翻译吴迈、李仲前往劝降，表示绝对不会加害他们，并允许荷兰人带走自己的财产。四月初四日（5月2日），赤嵌城的水源被台湾人民切断。描难实叮见援兵无望，孤城难守，不得不挂白旗投降。这样，郑成功在登陆后第四天，就收复了赤嵌城。

描难实叮投降后，奉郑成功之令前往台湾城劝揆一无条件投降，遭揆一拒绝。郑成功与诸将分析形势，认为不给侵略者以迎

---

① 《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

②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147～148页。

头痛击，敌人是不肯投降的，于是命令军队从鲲身南端登陆，“移扎崑身山（即一鲲身），传谕候令进攻台湾城”①。

（四）围困海上堡垒，荷军献城投降

台湾城是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城堡坚固，防御设施完整。城周长227.6丈，高3丈多，分3层，下层深入地下1丈多，“城垣用糖水调灰垒砖，坚埒于石”②。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数十尊。荷军炮火密集，射程远，封锁了周围每条通道。城内荷军尚有870人，凭城堡继续顽抗。但是赤嵌城被郑军占领之后，台湾城已是一座孤城，城内缺粮、缺水，荷军处境十分困难；加之当时南贸易风季节刚刚开始，要等待6个月进入北贸易风季节后，才能将台湾的有关情况告知巴达维亚，然后再等6个月才能利用下一次南贸易风季节取得巴达维亚的援助，防守更加困难。

郑成功在迫降赤嵌城后，为了牵制台湾城荷军，即派兵前往七鲲身设伏。他命令黄昭：“尔可带铳手五百名、连环熕二百门，分作三队，前往鲲身尾，列阵以待。”命令杨祥：“尔可带藤牌手五百名，从鬼子埔后绕过鲲身之左，横冲截杀。”又命令萧拱宸：“尔整艍仔船二十只，看彼队伍将过七鲲身，欲与我们交锋，随即摇旗呐喊驾驶，作过去攻城状。彼兵见之，自然慌乱，不敢恋战，破之必矣”③。荷军行至七鲲身，还没来得及列阵对垒，即被杨祥率领的藤牌军冲垮，死伤过半，其余士卒狼狈退守台湾城。郑成功令士兵立栅，设炮台，加强对七鲲身的防守，同时令杨英、何廷斌以粟6000石、糖3000余担补给军队。

自四月初以来，双方一直进行着零星战斗。郑成功一方面积极准备攻城，一方面又于四月十二日和二十二日两次写信给揆

---

①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四月初七。

② 范咸等：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十九，《杂记·楼堞》，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③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160页。

一，令其投降。又调集28门大炮，于二十四日凌晨摧毁了台湾城大部胸墙。荷军于城上集中枪炮还击，并出城抢夺郑军大炮，被郑军弓箭手击退。

郑成功鉴于台湾城城池坚固，强攻一时难以得手，为了减少伤亡，进一步作好准备，决定采取“围困俟其自降”① 的方针。他一方面派提督马信率兵扎营台湾街围困荷军，一方面把各镇兵分驻各地屯垦。同时，郑成功还到高山族人民聚居的四大社（新港、目加溜湾、肖垅、麻豆，均在今台南县）进行巡视，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五月初二日，郑军第二梯队6000人在黄安、刘俊、颜望宗、胡靖、陈瑞、陈璋等人率领下，乘船20艘抵达台湾。郑军的兵力得到加强，供给得到补充后，从五月初五日开始，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挖了一条很宽的壕沟，围困荷军。六月初郑成功又三次写信劝揆一投降。揆一仍幻想巴达维亚会派兵增援，拒绝投降。

五月二十八日，荷兰殖民当局得到荷军在赤嵌城战败和台湾城被围的消息后，即匆忙拼凑了700名士兵、10艘战舰，由雅科布·考乌率领，经过38天航行，于七月十八日（8月12日）到达台湾海面。他们见郑军战船阵容雄壮，踌躇不前，加之风浪很大，在海上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之后，才有5艘战船在台湾城附近海面碇泊。其中“厄克”号触礁沉没，船上士兵被郑军俘虏。郑成功从俘虏口中得知荷兰援军兵力情况后，加紧进行围城和打援部署。

闰七月二十一日，驻台湾荷军当局决定：用增援的舰船和士兵，把郑军逐出台湾城市区，并击毁停泊在赤嵌楼附近航道上的郑军船只，以摆脱被围困境。其兵力部署是：以两艘战船迂回到市区侧后江面，摧毁郑军炮位；出动步兵三四百名进攻市区；另派三艘战船、两条双桅船和15只小艇，袭击附近海面的10余艘

---

①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郑军战船，以进行牵制。评议会任命卢特·塔华隆·贝斯为总指挥，要求对郑军“决不饶恕船上任何人，见人就杀，不留一个”①。

荷军分水、陆两路向郑军发起进攻。海上，荷舰企图迂回郑军侧后，焚烧船只，反被郑军包围。郑水军隐蔽岸边，当敌舰闯入埋伏圈后，立即万炮齐发。经过一小时激战，击毁荷舰两艘，俘获小艇三艘，使荷兰援军“损失了一个艇长，一个尉官，一个护旗军曹和一百二十八名士兵，另有一些人负伤”②。荷军其余舰船逃往巴达维亚。陆上，荷军的进攻同样遭到失败。此后，荷军再也不敢轻易与郑军交战。

台湾城荷军被围数月，军粮得不到补给，加之血痢、坏血症、水肿等疾病流行，因而士气低落，不愿再战。十月，揆一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命运，企图与清军勾结，夹击郑成功军。揆一的使者到福建后，清军要求荷兰人先派战舰帮助他们攻打厦门，然后再解荷军之围。揆一无可奈何，只好派雅科布·考乌率领漂泊在海上的三艘战舰、两只小艇前去攻袭厦门。考乌心存畏惧，中途转舵驶往暹罗（今泰国），以后又逃回巴达维亚。于是，荷军勾结清军夹击郑军的企图完全落空，士气更加低落，不少士兵为求活命，陆续向郑军投降。

郑成功从俘虏中了解到荷军的上述情况，决定把对荷军的封锁战术“转为进攻，在对方从巴达维亚或中国大陆获得救兵之前，向热兰遮城堡的守军发动猛烈的攻击”③。为此，增建了三

---

①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可靠证据》第9号，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211页。

②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171页。

③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177页。

座炮台：一座在乌特利支圆堡[①] 南端，两座在其东端，并配备了 28 门巨炮，挖了许多壕沟，以控扼荷军的炮台。

十二月初六日（1662 年 1 月 25 日）清晨，郑成功下令炮轰乌特利支圆堡。在两个小时内，郑军发射炮弹 2500 发，在该堡南部打开了一个缺口，当天占领了该堡。郑军居高临下，立即利用此堡改建炮台，向台湾城猛烈轰击。荷军困守孤城，岌岌可危，揆一在城上督战，看到城防已被突破，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派通事李仲入城劝降。李仲对揆一说："此地非尔所有，乃前太师练兵之所。今藩主前来，是复其故土。此处离尔国遥远，安能久乎？藩主动柔远之念，不忍加害，开尔一面：凡仓库不许擅用；其余尔等珍宝珠银私积，悉听载归。如若执迷不悟，明日环山海，悉用油薪磺柴积垒齐攻。船毁城破，悔之莫及。"[②] 荷兰殖民评议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形势及对策。台湾城被围已近 9 个月，荷军死伤 1600 余人，能参加战斗的士兵仅剩 600 余人，且已弹尽援绝，疾疫流行，"形势已完全绝望"。评议会认为："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可怕的命运将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而这样坚持对公司也没有什么好处。"[③] 揆一走投无路，只得同意由评议会出面同郑成功谈判。经过五六天的会谈，揆一"愿罢兵约降，请乞归国"[④]。

---

① 乌特利支堡，是台湾城周围的外堡之一，坐落于台湾城南侧一个小山上。该堡位置险要，是控扼台湾城的锁钥。荷兰人认为，该堡一旦被郑军占领，"热兰遮（即台湾城）城堡也必将失陷"。参见 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 167 页。

③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 182 页。

④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 168 页。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 年 2 月 1 日）①，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签字投降。荷军交出了所有城堡、武器、物资，包括伤病员在内的约 900 名荷兰军民，最后由揆一率领乘船撤离台湾。

至此，荷兰侵略者在台湾 38 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宝岛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四节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意义及取得胜利的原因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军事斗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成功尝试。通过这一斗争，驱逐了荷兰殖民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捍卫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明朝末年，统治阶级腐败无能，不能担负起保卫国家的职责，致使台湾被荷兰、西班牙殖民者所侵占。其后，南明政权立足不稳，朝不保夕，更顾及不到台湾问题。清军刚入主中原，正忙于征服各地的战争。这两股力量都不具备收复台湾的条件。而在海上起兵的郑成功，发扬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外来侵略的斗争传统，在人民的支持下，终于驱逐了荷兰殖民主义者，使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第二，郑成功收复台湾，保持了台湾的社会安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和建设，为清初台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

---

①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 182 页。《台湾外记》说是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1662 年 1 月 22 日），阿布列特·赫波特《爪哇、福摩萨、前印度及锡金旅行记》称 1662 年 2 月 10 日，即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62 年 2 月 10 日），均误。

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下，台湾高山族、汉族人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台湾建立政权，以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领天兴、万年二县，设官置守，并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大兴屯田，将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封建生产关系引入台湾，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闽、粤、浙沿海居民移入台湾的骤然增多，直接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进一步繁荣了海上贸易。

第三，郑成功收复台湾，鼓舞和支持了亚洲各地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正值西方殖民者在世界各地横行和争霸海上的时代，也是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对其进行激烈反抗的时代。郑成功所取得的胜利，直接阻止和打击了西方殖民者的东进，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独立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四，郑成功收复台湾，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在战争准备、战斗编组、作战指挥、后勤补给及作战时机的选择等方面，特别是利用风汛、潮汛方面的经验，对以后进行渡海登陆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郑成功取得胜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正如郑成功所说，“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①，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之后，对台湾人民肆意蹂躏，犯下了种种暴行，早已激起了当地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急切盼望祖国派兵驱逐侵略者。福建沿海人民也屡遭荷兰殖民者的劫掠和袭扰，希望过和平安定的生活。郑成功东征台湾，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

---

①〔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153页。

益，因此，在战争的全过程中，始终得到高山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广泛有力的支持。荷兰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台湾居民都支持郑成功，甚至连荷军内仅有的两个黑人奴隶也怀着对殖民者的满腔义愤，参加到反对荷兰殖民者的行列。

第二，正确的战略决策。对于东征台湾，不仅有郑成功的部将吴豪等人反对，就是当时有名的抗清将领张煌言等也极力劝阻。他认为，清朝统治者虽然基本统一全国，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将骄兵懦”，“灾异非常”，“征科繁急”，已是“天怒人怨”，应利用康熙帝玄烨年幼，“因将士之思归，乘士民之思乱，回旗北指”，继续与清军抗争。而东征“区区台湾”，“使壮士涂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碛，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①。这种意见不但夸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把东征台湾看作是放弃“雪耻复仇”的大业而向枝叶之地撤退，看不到东征台湾的战略价值，显然是错误的。郑成功没有采纳张煌言等人的意见，决意东征，颇具战略眼光。首先，郑军力量削弱，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难。北伐失败，兵员损失十之六七，最优秀的战将损失 10 多人，粮食、船只的损失更无法计数。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1660 年）的金、厦海战，郑成功虽取胜，但郑军人力、物力已消耗到极限，实无力再战。闽浙沿海，经过连年战争，已是经济衰颓，民不聊生。郑成功仅据金、厦两岛，兵员、军粮都无法解决。其次，全国抗清形势急转直下，金、厦难以立足。郑成功虽击败进攻厦门的清军，但就全国来说，清军已占领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滇都（今云南昆明），李定国奉永历帝逃奔缅甸，抗清斗争已成强弩之末。在此情况下，已失去其他抗清力量呼应的郑成功“地蹙军孤”②，为清军日逼，金、厦已难久守，东征台湾是唯一正确的抉择。再次，台湾沃野千里，

---

① 张煌言：《张仓水集》，《冰槎集·上延平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郑亦邹：《郑成功传》卷下，顺治十八年。

是理想的抗清基地。何廷斌自台湾到厦门，“盛陈沃野千里，为四省要害，措绝大海，实霸王之区”①。郑成功所需要的正是一个能够繁殖人口，积蓄物资，而且有大海隔绝清军进攻的抗清斗争基地。

第三，果断而出敌意外的作战指导。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是我国海战史上规模最大、距离最远而又指挥出色的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也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突出的一个战例。

这次渡海登陆作战，在作战指导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详细掌握台湾情况，作好充分的登陆作战准备。从金门到台湾，海上航程 160 多海里。实行这样远距离、大规模的渡海作战，需要对天候、潮汐、航道、风向，以及地形和敌军布防等情况进行细致、周密的侦察和了解，否则，将会因某一点考虑不周而功亏一篑。郑成功除了在物质、精神上的充分准备之外，战前曾多次派人进入台湾探察、测量，以核实从各方面、用各种手段所获得情报的准确性。根据海上作战特点和中转站澎湖、鹿耳门港的具体情况，进行编队，并对作战计划反复进行讨论，做到了行动统一，计划周密。

2、注意隐蔽作战意图，大胆利用恶劣天候条件。在郑成功东征台湾之前，荷兰侵略者多次派间谍，甚至派出使者以“谈判”名义前往金、厦刺探军情。郑成功根据斗争的需要，讲究斗争策略。“他不习惯于公开发表自己的意图，而经常为了需要，故意放出一些风声”。荷兰侵略者供认：“在谈话中，我方可靠的使者曾企图刺探他对鞑靼人的态度，以及在厦门大规模备战的情况。国姓爷不但是勇敢的战士，同时也是高明的政治家。”② 荷兰使者又禀报说：由于郑军保守秘密，荷军摸不着头脑，如盲如

① 郑亦邹：《郑成功传》卷下，顺治十八年。

② 〔荷兰〕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上，见《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第 138 页。

督。郑成功利用大风大雨和夜暗的恶劣天气，从澎湖连夜向台湾进发，乘大潮突入鹿耳门，致使敌人惊叹郑军“兵自天降”。他还抓住东北信风期即将过去，荷军难于向巴达维亚求援的有利时机，果断地对台湾城实施围困。郑成功的这些做法，隐蔽了作战意图，有利于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保障了登陆的成功和战争的胜利。

3、正确选择渡海航线和登陆场。郑成功在航线选择上，确定先占澎湖，然后登陆台湾岛，是比较稳妥的。澎湖列岛位于大陆与台湾之间，是登陆台湾的跳板和屏障。先占领澎湖，既可使登陆台湾有了可靠的前进基地，缩短了航程，又可保障后续梯队的航渡和后勤支援。鹿耳门航道虽然水浅、港窄、礁多，并有沉船堵塞，但荷军疏于设防，于此巧渡，完全出敌意外。登陆场的选择也是保障作战胜利的重要环节。郑军选择禾寮港、北线尾两处登陆，一方面打乱了荷军部署，迫使其急忙派军奔赴北线尾，另方面隔断了荷军军事要塞台湾城与赤嵌楼的联系，并有利于及时得到禾寮港附近居民的支持，为尔后迅速扩大战果创造了条件。

4、集中兵力，围点打援。郑军登陆成功后，立即集中了60艘大型战船，一举击溃台江中的荷军。包围赤嵌城荷军之后，当阿尔多普率200名荷军沿台江南侧增援时，郑军“铁人”迅速出击，一举将其消灭。郑军包围台湾城以后，一方面实行长期围困，不断消耗荷军实力，一方面密切注视海上有无敌人增援。当荷兰巴达维亚当局派遣雅科布·考乌率援军到达台湾海面后，郑军火炮齐发，将其大部歼灭。未参战的荷舰吓得逃往远海，再也不敢靠近台湾。

5、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在战争过程中，郑成功总是以武力攻取为后盾，并巧妙地利用“谈判”这个武器，减少了损失，达到了战胜敌人的目的。

6、重视后勤保障，及时解决粮食补给。郑成功把“措饷养兵”、“略地取粮”① 看作是致胜的必要条件。远距离渡海作战，

---

①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六年十一月；八年六月。

后勤保障更是关系作战成败的大问题。出师台湾之前，郑成功已于金、厦储备了大量军粮，并派何廷斌在台湾秘密筹集了不少粮饷。郑军到澎湖后，被风阻困了7天，粮饷不继，但郑成功依靠群众，就地取粮，基本得到解决。登陆成功后，郑成功首先派官兵夺占荷军的粮仓，又派杨英等深入民间征集粮食。在对台湾城实行久困长围后，为从根本上解决乏粮问题，令官兵就地屯垦。军粮问题的解决，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第五节　郑成功的治军思想

郑成功驱逐外国侵略者，为维护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创造了光辉的业绩，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同时，郑成功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他在长期军事实践中形成的战略思想、作战思想等前已有述，现仅就其治军思想的几个特点加以补充。

一、边作战边扩军

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郑成功举义时只有90人。面对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清军劲旅，郑成功认识到，要实现“计图恢复”① 的战略目标，必须选将练兵，扩充军队。他赴南澳招兵至300余人，于次年至鼓浪屿。从此，便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转战于闽、浙、粤沿海地区，发展壮大队伍，在10多年的时间内达到20多万人，成为东南沿海抗清的重要力量。郑成功建军的特点是，边战斗边扩军，使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其兵源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吸收青年农民、渔民入伍。郑成功起兵抗清，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他们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郑军，大批青年农

---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檄》，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0页。

民、渔民踊跃参军，仅东山一地就达万人以上。许多渔民参军后成了郑军战船上的老大、水手和领航，东山渔民俞求多、翁求多，晋江县的萨祖武等，后来都成为郑成功军队的战将。

二是收编农民军和义师。郑成功举义抗清后，在与闽、浙各地农民起义军和抗清义师并肩作战的过程中，逐步收编了其中的部分部队。这些部队，多则数万，少则数千。例如，万礼就是原活动于福建诏安一带的农民军领袖，后来他率部加入了郑成功的军队。

三是合并郑芝龙旧部。在郑成功爱国行动的感召下，原郑芝龙将领林习水、施天福、张进、林察、王秀奇、陈霸、黄廷所率旧部，先后归附。特别是合并了郑芝龙旧部中势力最大的郑联、郑彩、郑鸿逵的部队，吸收了其部将洪旭、陈魁、陈俸、蓝衍等，对于发展和壮大郑军的实力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改编起义投诚军队。一些清军和地方武装集团的将领，如刘国轩、姚国泰、郝文兴、杨世德、马信等，在与郑成功作战的过程中率部投降。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 年）十一月，清朝漳洲协守刘国轩献城归降后，郑成功授刘国轩都督佥事，管护卫后镇事，江振曦为大监督，其下文武官照旧任事。后来，这些降将随郑成功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严密军队组织

郑成功军队主要分为水师和陆师两大部分。此外还有一些特种兵。陆师按军、镇、协、领班、队的序列编制。军，侍卫队编前后左右中五卫亲军，作战部队编前后左右中五军。军下为镇，设有五常镇、五兵镇、五行镇、五援镇、五冲镇、五宣镇等。镇下为协，设前后左右中五协。协辖正领班五员。每领班下辖五队，每队分为五方旗。合计每镇编制士兵 2500 名。水师编为前后左右中五楼船镇，一至十水师镇，前后左右中水师镇。此外，还有果毅左右先锋、前锋、中权、后劲、神器、火器、神桃、骁

骑、铁骑及角、亢、氐、房、心、尾等28宿营。这些独立营多为特种兵，根据作战需要进行调遣。

在官制设置上，陆师亲军设总兵一员，作战部队五军设总督五军戎政一员，总制五军。军设提督一员，主作战机宜；总理监营一员，左右协理监营各一员。镇设镇将一员，总管全镇兵事，设副将一名佐之；监督监营、督阵官、戎政司马各一员，随镇监督征战。协设协将一员，掌一协之兵事。水师设有总督水军勋爵一员，正副领兵各一员，正副坐营大厅都督各一员，正旗鼓中军都督一员，副旗鼓中军副总兵一员，以及参军主事、正副领兵都督佥事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郑成功军队组织十分严密。首先，水、陆师基本采取“五五”编制法，每镇中协为预备队，左右前后协各管一方正面作战，这实际上是把古代方阵运用于海上，有利于战斗队形的变换。其次，每协中配有长兵、短兵及藤牌、滚被等防护器具，可以互相配合。第三，从五军戎政到提督、镇将、协将，为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便于作战指挥；军、镇两级分别设有总理监营、监督监营，既分别配合提、镇处理征战事宜，又自成系统，不完全受提、镇控制，对提、镇反有监督作用①。

三、重视水师建设

水师虽非郑军主力部队，但在两栖作战中却占有重要地位。所以，郑成功十分重视水师建设。他多次谕令将士：“至于水师，尤我长技。”② “惟水师一项，最为吃要。”③ 郑成功起兵时，只有林察所率领的16艘战船。自顺治七年十月，郑成功接受郑芝

---

① 钱海岳：《郑成功在军事上的贡献》，《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年第3期。

②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一年九月。

③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三年七月初一日。

莞组建水师的建议后，即派前冲镇阮引、右冲镇何德、前军周瑞负责筹建水师，陆续建成水师20镇，兵力4万人左右。

为发展水师，郑成功对舰船修造也相当重视。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命冯澄世设局厦门，在东山、厦门、海澄等地大量制造舰船。到顺治十二年，郑成功已拥有大小战船5000多艘。

四、严格军纪军令

郑成功十分重视严格军队纪律，赏罚严明。他要求将士必须树立爱民思想，严禁扰民。他指出："古云'民为邦本'，虽取民之中，必存爱民之意，其约束禁条，不啻三令五申。"① 根据这一思想，制订了《出军严禁条令》11条，诸如"不准奸淫、掳掠妇女"，"不许擅毁居室"，"严禁混抢"，"禁宰牛"等等②。有一次，部队行军至湄州（今福建湄州岛），一兵士取水时拾人一只鸡，被监营发现，带兵将领甘辉主动承担责任，挺身受责10棍，犯纪士卒枭示，"以故军令严明，官兵遵守，进城秋毫无犯"，"威声振江南"③。由于郑成功一再重申禁令，反复教育官兵，所以军队的群众纪律总的看是较好的。

郑军战场纪律更为严格。早在顺治七年，郑成功就规定战场上"有奋勇拔克者，新擢重赏；退却者，不论总镇官兵，立即枭示"④。次年，又颁布了《杀虏大敌中敌赏格》。时值郑成功率师南下广东声援李定国抗清，由郑芝莞留守厦门，清将马德功乘虚攻厦门。在保卫厦门的战斗中，施琅"身率数十人与虏对敌"，击退清军，特赏花纹银200两，加二级；属下陈勋等赏100两。

---

①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②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二年五月初七日。

③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④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四年六月。

而郑芝莞畏敌逃跑，使厦门被清军掳掠一空，损失黄金 90 余万两，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因而被处斩①。郑芝莞系郑成功叔父，亦不免死罪，反映了郑成功能够做到执法无私，赏罚严明。顺治十二年，郑成功又先后重申“军前不用命者斩，临阵退缩者斩，副将以下先斩后报”，“凡攻城略邑有功，先赏后报；有罪镇将会议，先斩后闻；其官兵奸淫抢掠，连罪将领；阿私不举，罪总制”②。在转战闽、浙的 10 多年中，几乎每一战役结束后都召集文武将吏集议，总结经验教训，分首功、次功、又次功三等定赏，按照《杀虏大敌中敌赏格》议定官兵功罪。

郑成功强调将领必须为人表率，指出：“兵之勇惰，在乎将领。如将领稍却，则兵虽勇，亦不肯向前；如将领敢勇，必勉力赴敌。”③ 他本人向来身先士卒，到演武场亲临督操，在战场上冒着炮火坐阵指挥。所以，他要求将领尤为严格。顺治十二年大阅时，因郝文兴训练军队不合要求，命即处死，后由于诸将力保才免于一死。收复台湾后，吴毫因掠夺人民银米被处死。在战场上，陈震、曾猛因退却阵斩，林德因未战先退而枭示，等等。

正是由于郑成功严格军纪，信赏明罚，他的军队才能做到令无不行，禁无不止。在北伐入镇江时，郑军夜宿地铺，不入民家；在南京兵败被清军包围时，将士严守命令，听从指挥，宁肯立着战死，也不退却。因此，才出现四方闻风向化，百姓壶浆迎师，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

①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五年四月初十日。

②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九年五月；十月二十八日。

③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十二年五月初六日。

第七章　康熙平定三藩的战争

从康熙十二年（1673 年）十一月至二十年十月，清王朝进行了平定三藩的战争。这场战争，时间长达八年，地域波及十数省，规模较大，是 17 世纪中后期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同时也具有统一战争的性质，它对清朝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第一节　三藩割据势力的膨胀

顺治初年，为了消灭南明政权，清朝重用降清明将，以大学士洪承畴经略东南五省，以定南王孔有德进攻广西，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仲明进攻广东，平西王吴三桂进攻四川、云南。在向南进军期间，耿仲明于顺治六年（1649 年）死于江西吉安，其长子耿继茂袭爵。孔有德则于顺治九年被李定国围困于广西桂林，势穷自杀，因无子继嗣，定南王遂废。十六年清军攻占云南之后，南明诸政权已相继败亡，清王朝基本统一了中国大陆。于是，清廷命洪承畴偕清宗室洛托等率八旗劲旅陆续还京，而以吴三桂留镇云南、贵州，尚可喜留镇广东，耿继茂留镇福建。康熙十年（1671 年），耿继茂死，其长子耿精忠袭爵。史称吴、耿、尚三王为“三藩”。

三藩画地镇守，享有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他们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逐步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发展成为称霸一方的独立王国。

在军事上，各藩都有自己的军队。他们所统属的军队，名义上隶属八旗，实际上是独立的部队。三藩之中，吴三桂势力最强，军队也最多，计八旗兵 53 佐领，绿营兵 10 营 1.2 万人，丁

口计数万。耿精忠、尚可喜二藩也各有八旗汉军15佐领及绿营兵六七千人，丁口各达2万①。这些藩王部队，兵骄将悍，专横跋扈，已成为严重威胁清王朝统治的军事力量。

在政治上，吴三桂独揽云南、贵州的军政大权，不仅“云、贵督抚咸受节制”，而且还有设官委任的特权，“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其所除授号曰‘西选’，西选之官遍天下”②。耿、尚二藩虽无掌管地方的行政大权，然其封建淫威和专横亦极为严重。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广东“招纳奸宄，布为爪牙，罔利恣行，官民怨讟”③，耿精忠亦在福建结纳地方势力，属下为非作歹，“倚势朘民，所在逞虐，相沿已久，遂成积威之渐，督抚噤不敢问”④，成为一方之患。

在经济上，吴三桂不仅没收明朝贵族沐天波田庄700顷为藩庄，而且还大量圈占军田、民田，凶狠地奴役和剥削百姓。为扩充其实力，在辖区内广征赋税，垄断盐井、金矿、铜矿生产，“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以给军需”⑤。他遣使至西藏，设茶马互市，自征关税，更课赋于各土司，以充实其府库。对于支出，“户部不得稽迟”，任其挥霍。尚之信藩下所

---

① 关于三藩兵力，说法不一。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说：“耿、尚二藩所属各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万。三桂藩属五十三佐领，绿旗兵万有二千，丁口计数万。”《清史稿》卷四七四《吴三桂传》：“三桂所部五丁出一甲，甲二百置佐领，积数十佐领”，又“疏请部勒降兵，分置十营，营千二百人”，“又疏请置援剿四镇”，照此计算，吴三桂兵力约有3万余人。《逆臣传》所记与《清史稿》同。

②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

③ 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卷一，康熙十二年三月壬午，《四库全书》本。

④ 许旭：《闽中纪略》，《昭代丛书》癸集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5页。

⑤ 《明季稗史汇编》，《吴耿尚孔四王合传·平西王吴三桂传》。

属私市私税，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又“在广东令其部人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①；“凡凿山开矿，煮海鬻盐，无不穷极其利；于是平南之富，甲于天下”②。耿精忠在福建也是“横征盐课，擅设报船，苛派夫驿，勒索银米，久为民害”③。当时，“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④，造成清朝政府财政上的巨大困难。

三藩势力在地方横行霸道，对人民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吴三桂在云南骄奢淫逸，其所居五华山朱由榔旧宫，堂皇无比。他把明黔国公沐氏的7万亩庄园变成自己的别墅，把原来耕种的农民变为佃户，强迫他们缴纳租税，又“潴其坟墓，庐其室家，役其妻孥，荐绅士庶及于农工商贾，惴惴焉唯旦夕之莫保”⑤，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尚可喜、耿继茂到广州较早，他们侵夺民田，设立王庄、官庄和牧场，弄得许多农民无地可耕，被逼为佃户者又受重税盘剥，兴建藩府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尚之信“素桀骜”，生性嗜酒，“醉辄杀人”，且“所为益不法”⑥。广东的大小市利差不多都被其部属霸占。耿精忠“纵其下为奸，利夺农商之业，潜引海外私贩，肆行无忌，大为闽人害”⑦。总之，三藩在滇、黔、粤、闽的肆虐，造成这些地区民不聊生，百姓疲惫，已处于与当地人民尖锐对立的状态。

藩王贪婪，不仅引起人民的不满，而且与地方官员发生矛

---

①③《清圣祖实录》卷九四，康熙二十年二月甲午，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三编，《三藩之乱》，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2页。

④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

⑤ 刘坊撰：《天潮阁集》卷二，《云南曲序》，民国五年（1916年）铅印本。

⑥《平定三逆方略》卷一，康熙十二年三月壬午。

⑦《平定三逆方略》卷一，康熙十二年七月丙子。

盾。顺治十六年正月，曾在广东任职的兵科给事中杨雍建上疏反映广东的“害政大端”，请求将当时同镇广东的尚、耿二藩中之一个调往他省，以缓和广东人民之疲困。清廷虽确认藩王之害，但只是将耿继茂调往福建了事。次年十一月，四川道御史杨素蕴上疏，指出吴三桂威权太重，期望朝廷收回用人大权。结果触怒了吴三桂，吴反上疏诬陷杨素蕴。当时，正值吴三桂追击永历帝的关键时刻，朝廷对三藩不得不采取忍让、迁就的态度。这清楚地反映出，三藩势力的存在，不仅加深了这些地区的阶级矛盾，而且与中央集权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

第二节　撤藩之议及平定三藩的战略决策

一、撤藩的缘起及争议

康熙帝玄烨对三藩的嚣张跋扈，颇有感触。他以历史上地方割据势力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为鉴，认为三藩势力如继续发展下去，必将酿成大患。所以，他严重关注三藩的动向。他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① 又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② 可见康熙一直把三藩视为心腹之患，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康熙初年，对三藩特别是对吴三桂，已经逐步限制其事权。例如，要其缴还出征时用的大将军印，收回其统兵权；裁其用人题补权，大小文官皆由吏部题授；解除其总管云南、贵州两省事

① 《清圣祖实录》卷九九，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务职任，两省事务统归督抚管理，等等。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使吴三桂怨恨在心，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一些南明残余势力，看清了三藩割据的形势，企图利用和怂恿吴三桂进行反清复明活动，认为“今天下之机杼在王，王若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时也”①。这不仅加速了三藩叛清的进程，也坚定了康熙帝撤藩的决心。

康熙十二年三月，清廷借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之请，正式决定撤藩。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说：“臣年七十，精力已衰，愿归老辽东，有旧赐地亩房舍，乞仍赐给。”② 尚可喜所请，成为康熙帝撤藩的大好时机。他说：“今广东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迁移安插，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③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应如所请”，“既议迁移，似应将该藩家属兵丁均行议迁，惟广东左右两营绿旗官兵，仍留该省。”④ 兵部亦同意将绿营兵仍留广州，交由广东提督管辖。

康熙帝同意尚可喜撤藩的诏令，牵动了吴三桂、耿精忠二藩，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问题。同年七月，“可喜乞归奏允，三桂不自安，乃具疏请撤”；耿精忠“闻可喜奏允，亦不得已疏请撤兵”⑤。实际上，吴三桂是在试探清廷对他的态度。康熙帝顺水推舟，假戏真唱，同意将二藩撤离，即令户、兵二部就二藩属下官兵家口如何迁移安插一事“确议以闻”。户、兵二部认为：“三桂及所部五十三佐领官兵家口，应俱迁移”；“精忠及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悉应迁移”⑥。但议政王、贝勒、大臣在讨论吴三桂要否“迁移”时，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康熙帝为慎重起见，又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确

---

① 《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五，《上平西血书》，上海书店 1981 年版。

②③ 《清圣祖实录》卷四一，康熙十二年三月壬午。

④ 《清圣祖实录》卷四一，康熙十二年三月丁酉。

⑤⑥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康熙十二年七月庚午；丙子。

议，画一具奏”，结果仍持两议：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人，同意撤藩，提出：“应将王本身并所属官兵家口，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并“应暂遣满洲官兵戍守，俟戍守官兵到日，该藩起程”；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不同意撤藩，其理由是：“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今若将王迁移，不得不遣兵镇守，兵丁往返与王之迁移，沿途地方民驿苦累，且戍守之兵，系暂居住，骚扰地方，亦未可定，应仍令吴三桂镇守云南”①。撤藩与反撤藩之争，实质上是关系到巩固国家统一还是听凭三藩分裂割据的大问题。尽管多数大臣过高地估计了三藩势力，畏缩不前，但康熙帝坚持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构想，他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②，遂采纳了米思翰、明珠等人的意见，命吴三桂所属官兵家口，全部撤移。

二、三藩叛乱的爆发

清廷作出撤藩的决定后，于康熙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遣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往云南，尚书梁清标往广东，侍郎陈一柄往福建，持诏谕经理撤藩事宜。康熙帝深知云南方向不会顺利，特赐予折尔肯、傅达礼御用佩刀各一把。吴三桂自负功高，认为自己与尚可喜情况不同，不会夺其王爵，上疏请撤，原非本意，不过是借此试探清廷的态度以释其疑，没有想到却于九月接到撤藩诏令，因而大失所望。他故作恭顺，答应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启程，实则一再拖延，暗自与所部都统吴应麒、吴国贵，副都统高大节及其婿夏国相、胡国柱等密谋叛乱，部署其亲信将领扼守关隘，许进不许出，以封锁消息。

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串通心腹，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

---

① 《清圣祖实录》卷四三，康熙十二年八月癸卯。

②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第63页。

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为“周”元年，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公开发动了叛乱。叛兵扣留了折尔肯、傅达礼。云南提督张国柱及总兵杜辉、柯铎，布政使崔之瑛等投降叛军。吴三桂还传檄远近，并致书平南王、靖南王二藩，及贵州、四川、陕西等地故旧将吏，“要约响应”①。清廷派往贵州为吴三桂搬移准备船只和粮草的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闻变，星夜驰驿急赴京师。吴三桂派兵追捕，辛珠、萨尔图被杀，党务礼等逃脱。

吴三桂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打出“复明”的旗号，欺骗人民。他在讨伐清王朝的檄文中，自称“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以“恭奉(朱三)太子”“敬登大宝”② 相号召，并拜谒明永历帝陵，酹酒山呼，举兵反清。实际上，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又杀永历帝朱由榔父子于昆明，其“兴明”之说，既不能自解，也不能欺人，反而成为当时天下有识之士的笑柄。

在吴三桂的煽惑下，慑于他的威势，贵州提督李本深、巡抚曹申吉、总兵王永清，相继降吴。当时，明朝降清的文臣武将多为所动，不少人蚁附到吴三桂“兴明”的旗帜下。据统计，参与叛乱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共 26 名，其中明朝降清的武将即达 20 名③。一时间，分裂割据势力甚嚣尘上。

三、清廷的平叛部署及准备

康熙帝对撤藩一事态度异常坚决，但又缺乏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错误地认为：“三桂子、精忠诸弟皆宿卫京师，谅无能为变。”④ 因此，他既不同意遣满洲兵前往戍守，也未作好战

① 《清史稿》卷四七四，《吴三桂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三编，《三藩之乱》，第 454、455 页。

③ 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3 页。

④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第 63 页。

争准备，只是选派云贵总督前往赴任而已。十二月二十一日，党务礼、萨穆哈自贵州驰驿到京，报告了吴三桂“以所部兵反”①的消息。次日，湖广总督蔡毓荣的上疏又奏报了吴三桂反叛的最新情报，一时举朝震惊，遂引起撤藩与不撤藩的第二次争论。大学士索额图竟提出杀掉当初主张撤藩的大臣，向吴三桂赔罪；有人还力图与叛军和解。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既不动摇撤藩的决心，也不诿过于人，他主动承担起有关撤藩的全部责任，说：“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② 从而迅速平息了争论。

为了控制局势，平定叛乱，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康熙帝连下数道谕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派兵增防湖广（今湖北、湖南）控制战略要地荆州。康熙帝认为，荆州乃咽喉要地，关系最重，为稳固军心民心，遏制叛军北进之势，急派前锋统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 1 名，兼程前往荆州，并进驻常德；命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诸将，驻守荆州，阻止叛军由此渡江北上；调派八旗满洲、蒙古每佐领前锋各 1 名、护军各 7 名、骁骑各 10 名，汉军每佐领骁骑各 5 名，总计官兵约 1.1 万人，增防湖广。

第二，加强四川、广西两省防守。四川、广西皆与云南、贵州接壤，为其两翼。控制四川，战争初期可以防止叛军由云、贵进入川、陕，威胁北京；转入反攻时可以作为进取云南的基地。康熙帝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星驰入川，“凡自滇入川险隘之地，俱行坚守”③；随又命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护军统领瑚里布为副将军，率部同将军瓦尔喀由汉中入四川。控制广西，可以牵制叛军北进，故授孔有德之婿孙延龄为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统兵固守。

第三，建立兖州、太原等后援部队基地。康熙帝欲从北京派

① 《清圣祖实录》卷四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丙辰。

② 《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

③ 《清圣祖实录》卷四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丁巳。

八旗兵平叛，有人担心“军需浩繁”，主张就近调绿营兵。户部尚书米思翰则认为：“贼势猖獗，非绿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劲旅会剿。军需内外协济，足支十年，可无他虑。”① 但从北京发兵远征楚蜀，路远难以骤至，且必致士马疲劳。而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故康熙帝令“发兵驻防，秣马以待，所在有警，便即时调遣”②。他命副都统马哈达率部驻兖州，扩尔坤率部驻太原（后改驻西安）。

第四，停撤耿精忠、尚可喜二藩，以稳住福建、广东局势，集中兵力打击吴三桂。

第五，颁发诏谕，声讨吴三桂罪行。十二月二十七日，正式下诏削除吴三桂王爵，并宣谕云贵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见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毋怀疑虑。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③ 对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等大臣，则极力笼络，谕称：“尔等皆朕擢任股肱之臣，扞御边境，绥辑军民，惟尔等是赖”④。对在直隶各省的原吴三桂藩下文武官员，不论是现职的还是闲住的，均宣布吴三桂之叛与其并无干涉，即使有亲属现仍在云南，亦不株连，毋需疑虑。

第六，集中物力财力，支援平叛战争。吴三桂叛后，有的官员担心国家财力不能支持战争。户部尚书米思翰则认为“军需内外协济，足支十年，可无他虑”。康熙帝同意他的意见，决定将内府所储钱粮，分年发给军队使用，各直省库金、仓粟，可根据前方需要进行调拨。还规定，在为前线筹集粮饷的过程中，严禁

---

① 《清史稿》卷二六八，《米思翰传》。

②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康熙十二年十月庚申。

③④ 《清圣祖实录》卷四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壬戌。

“借端私派”，一切动用官帑，不得苛派，如从民间购买，要严格按市价支给，“勿纤毫累民”①。

第三节 战争经过

一、吴、耿二藩占据南方六省

战争初期，形势对清军十分不利。吴三桂以云贵为基地，遣部将王屏藩进攻四川，继而攻汉中；遣马宝等自贵州进攻湖南。在湖南战场，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沅州（今芷江），总兵官崔世禄被俘。十三年初，吴军继续北进，攻陷常德，不战而得澧州（今澧县）。湖南巡抚卢震弃长沙退至岳州（今岳阳），提督桑峨、总兵官周邦宁向荆州方面收缩。由于清军进援迟缓，长沙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以城叛降。长沙的失陷，对战局影响很大，“卢震先奔，杨遇明（原广东提督）内叛，人心已摇”②。四川方面，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和总兵官谭洪、吴之茂，于十三年正月投降吴三桂。叛军前锋指向巴东，“四川夔州（今奉节），所在贼氛甚炽”③。二月，广西将军孙延龄叛投吴三桂，杀都统王永年。三月，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响应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据福建反清，执总督范承谟。在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内，滇、黔、川、湘、桂、闽六省相继失陷，当地清军猝不及防，不是投降就是后撤，人心动摇。唯平南王尚可喜按兵不动，固守广东。

清军四处设防，军事上处于被动。南下清军行动缓慢，顺承郡王勒尔锦，都统珠满、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尔度齐，前锋统领硕岱等迟迟不离京师，出京以后亦行动迟缓，直到十三年一二月甚至三月，才抵达荆州、武昌，却又畏葸不前，顿师江北，致使

① 《清史稿》卷二六八，《米思翰传》。

②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康熙十三年二月乙巳。

③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康熙十三年二月甲寅。

吴三桂军顺利占领沅州、衡州（今湖南衡阳）、长沙等地。

为了扭转湖南战场和全局上的被动状态，清廷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各战略要地的防御。在湖南正面战场，加强长江中游要地防御。除勒尔锦、硕岱所率清军已到达荆州外，又派和硕额驸华善镇京口，江宁将军额楚、镇海将军王之鼎分率八旗、绿营兵各1000驻防安庆，尼雅翰、珠满率兵赴武昌、岳州，都统鄂鼐赴襄阳，彝陵（今湖北宜昌）总兵官徐治都立返原地，副都统佟国瑶驻防湖北郧阳，抵御吴三桂军北攻。在西线陕西战场，命都统席卜臣为镇西将军往守西安，副都统科尔昆、汉军副都统吴国祯赴汉中。东线闽浙战场，命内大臣希尔根为定南将军、礼部尚书哈尔哈齐为副将军率师赴江西，副都统席第、提督赵国祚驻南昌，副都统根特巴图鲁援吉安。清军占据这些战略要地，对安定民心、军心，遏制吴三桂军北进势头，切断各藩之间的联系，有重要意义。

第二，加紧向前线机动兵力。在周密驻防的基础上，开辟了京师——德州——兖州——江宁——安庆，京师——太原——西安两条兵员输送线。并命顺义、沧州、德州等10处驻防满军迅即会师德州，在尼雅翰、马哈达、席布、根特巴图鲁率领下，分期分批开赴兖州、安庆，然后再转赴湖南、江西等地。这样部署，不仅可“据上游之势，扼长江之险”，而清军逐次向前推进，且可“无鞭长不及之虑，无远征劳顿之苦”①，从而使在金陵（今南京）的清军，旦夕可移镇安庆；在兖州的清军，旦夕可移镇金陵。西路赫业、瑚里布、席卜臣、穆占、延布所率清军已抵太原，梯次开赴西安，然后再分兵入汉中、四川，兵力得以及时向前线机动，有利于战事的进行。

第三，加强驿路建设，驰递军情。规定：每400里一程，设笔帖式一员。自北京至荆州，7程；郑州至武昌，3程；直隶真

---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三，康熙十三年二月丁未。

定至汉中，10程；南京至北京，11程。“遇有紧急军务，星驰接递，迟者以违误军机治罪”[1]。因此，效率较平时的驿传为高，一般由北京到甘肃9日可到，往荆州、西安5日可到，往浙江4日可到，使皇帝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军情。

第四，制定绿营官兵赏格。“凡绿旗官兵效力行间，立有破敌功绩者”，都要给予官职、赏赉[2]。除已有定例议叙外，又补充规定：阵亡、殉难官员，自千总至兵丁给恤银，大小官员俱准荫子弟；挺身先登及越众冲锋者，依功大小授以守备、千把总等官，等等。

总之，在战争初期，叛军一举占领南方六省广大地区，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清廷及时采取以上措施，有利于阻止吴三桂军继续北上或东下，从而扭转被动局面。

二、湖南战场转入相持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吴三桂亲赴常德、澧州督战。此时，叛军中有的主张疾行渡江，全师北上；有的主张沿江东下，扼守运河，绝清军南北粮道。吴三桂担心其子吴应熊等在京会遭不测，对上述建议皆不采纳，令诸将不准北进，并于四月释放折尔肯和傅达礼，让其转递奏章，冀图同清廷裂土议和，画江而治。康熙帝令勒尔锦严加警惕，毋堕其谋。为了表示平叛的决心，康熙帝下令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处死。

吴三桂得知吴应熊、吴世霖被处绞的消息后，惊恐至极，除继续在湖南用兵外，立即分兵两路攻清：西路由王屏藩率领，出四川北攻秦陇，再东向进攻山西、河北，直窥京师；东路自湖南东攻江西，企图与福建耿精忠合兵。此时，耿精忠已派都统马九玉、总兵曾养性、白显忠等分取福建延平（今南平）、邵武、福

---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康熙十三年三月乙丑。

②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康熙十三年三月壬辰。

宁（今霞浦）、建宁（今建瓯）等地，全闽皆下，又约吴三桂北伐，共取江西、江南，从而给清军左翼造成很大压力。

清廷以湖南战场为重点，不断加固长江防线，伺机发起反攻。至十三年年底，先后从京师、蒙古、盛京（今沈阳）、黑龙江抽调八旗劲旅，开赴荆州、襄阳、安庆、武昌、九江、京口等战略要地，以增强长江防线军事力量，其统帅有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将军尼雅翰，都统珠满、巴尔布等。为了适应南方多江河的情况，清廷加强水师建设，令勒尔锦沿江“预备战舰，严加守御”①，令江南绿营兵“习水战于黄浦江”，“以备策应”②。康熙帝重视火器的作用，命南怀仁制造便于携带的轻型火炮，“以资征剿之用”③。为了加大长江防线纵深，还加强了河南驻防。“河南府乃四达之地，距潼关、郧、襄皆近，驻师其地，则所在有警，俱可策应”④。这些措施，为以后发起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吴三桂在常德、澧州等地坐镇指挥，并派吴应麟坚守岳州，于城外筑壕三层，挖陷阱，遍植鹿角，并于洞庭湖峡口立木桩，阻清军舰船南下。同时又充实澧州、石首、华容、松滋（今湖北松滋北）等地兵力。由于军饷、军资的需要，大大加重对湖南人民的勒索；又砍伐湘西、贵州的森林，大造船舰；勾结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强迫百姓参军。

康熙帝始终以吴三桂为主要打击对象，以湖南正面战场为主要作战方向，并把岳州、长沙、澧州作为争夺的要点。清廷从多方面调集兵力，企图首先恢复岳州。康熙十三年六月十三日，以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旗下兵之半及蒙古兵4000人开赴岳州，贝子准塔率旗下兵之半及蒙古兵6000人往荆州。十月初，命总督蔡毓荣率绿营兵往岳州。另外，还先后从荆州、京口

---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丙午。

② 《平定三逆方略》卷八，康熙十三年七月癸酉。

③ 《平定三逆方略》卷八，康熙十三年八月壬寅。

④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〇，康熙十三年十一月庚申。

调战舰350余艘支援岳州。清军在岳州地区也曾打过胜仗，如七月二十五日，察尼、尼雅翰先于七里山以炮攻城，与吴应麒等部7万人大战，歼敌万余，并在洞庭湖沉敌船10余艘，取得大胜。但是，岳州三面临湖，地势险要，吴军于陆路一面踞守颇坚，猝然难下，且各路清军互相观望，迁延不进，岳州未能攻下，致使吴三桂较长时间地盘踞大江以南地区，与清军处于对峙状态。

康熙帝也很重视江西、江南、浙江战局的发展，并不断增强左翼战场兵力。他指出："江南沿海濒江，甚属要害，俱应有备。其江西水陆皆与楚、闽接壤，尤宜固守。"① 在康熙十三年内，除令江西巡抚董卫国加强固守外，先后授和硕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率兵保固江南兼管江西；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兵转战江西、湖广、广东。令安南将军华善驻守京口，扬威将军阿密达增防江宁（今南京），派副都统胡图、马哈达率所部及左翼察哈尔兵自江宁增防杭州。这些措施，保护了江南财赋重地，有力地阻挡吴、耿会师江西及合兵北上。

陕西与四川接壤，稳定陕西对平叛战争极为重要。早在康熙十三年二月，康熙帝即以刑部尚书莫洛为陕西经略，命其率领满洲八旗驻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主持军务。六月，又派贝勒董额为定西将军率满洲八旗与蒙古兵，经陕西向四川进兵。但清军进入四川后前进受阻，饷道被截，粮饷不继，被迫后撤。陕西提督王辅臣早与莫洛有隙，又因莫洛歧视、欺压绿营兵而导致矛盾激化，遂于十二月初四日借口马疲饷缺，于宁羌（今宁强）发动叛乱，炮矢齐发，杀死经略莫洛，占据略阳。董额退缩迟延，不追蹑剿杀，借口粮饷不继，退归西安，致使吴三桂叛军占据汉中。吴三桂授王辅臣为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犒师银20万两，并命王屏藩由汉中出陇西应援。王辅臣代吴三桂散布伪札，陕、甘数十州县叛降，或被叛军攻占。甘肃巡抚华善疏言："逆贼王辅臣，今据关山迤西（东），岐山迤北，黄河迤南，与蜀贼连结，

---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康熙十三年正月癸酉。

加以西番土回，乘隙屡犯，河西危甚。”① 大西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至康熙十三年底，战争已进行了一年，清军集中兵力于湖南正面战场，双方虽各有胜负，但随着闽、浙的耿精忠和陕甘王辅臣的叛附，又形成了东线和西线两个战场，叛乱进一步扩大，清军更加被动，清朝腹心地区的八旗兵、绿营兵倾巢出动，甚至连留都盛京的驻军也不得不内调。

三、平定陕甘王辅臣之叛

王辅臣叛后，清廷对他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康熙帝以极大的容忍态度，先派给事中苏拜偕王辅臣子王继贞前往招抚，又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再颁招抚敕谕。康熙帝允诺，只要王辅臣率所属官兵归诚，“即令率领，仍还平凉原任，以往之事概从宽宥”。为促使王辅臣反正，他甚至把事变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为王辅臣开脱罪责，说：“莫洛与尔，心怀私隙，颇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则朕之知人未明，俾尔变遭意外，忠荩莫伸，咎在朕躬，于尔何罪？……今变起仓卒，情非得已，朕惟加矜恤，并勿致谴。”②

与此同时，康熙帝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加强西线兵力。康熙帝得知王辅臣叛乱的消息后，即强调说：“王辅臣兵叛，不可不速发大兵，前赴西安，保固秦省。”③ 他谕令调鄂尔多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等蒙古兵，河南府（治今洛阳）、襄阳、京师等地八旗兵，增防西安；令将军阿密达速赴西安。第二，令大将军董额派兵接应四川广元、保宁（今阆中）前线清军退回汉中，令云贵总督鄂善派兵赴兴安（今陕西安

---

① 《武臣传》卷四，《张勇传》，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铅印本。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五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壬子。

③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庚子。

康），与襄阳等处驻军相互策应，以保固汉中。第三，调盛京、乌拉（今吉林市）兵至京师，并命兵部预派满洲、蒙古兵以备救援。令支户部库银15万两，采办陕西驻军所急需的粮草。第四，加强山西防御，确保京师安全。命副都统鄂泰为建威将军，率八旗兵驻太原，防守汾州府（治今汾阳）各处；增设山西提督，令新任山西提督周卜世率所部绿营兵驻平阳府（治今临汾）。

清廷对王辅臣进行招抚，王辅臣一面上疏强调兵变乃莫洛激成，乞朝廷遣使安抚，一面留兵驻守秦州（今甘肃天水），自己率部返回平凉。康熙十四年二月，王辅臣部向省城兰州进攻。初五日，城内抚标兵叛，巡抚华善等奔凉州（今武威），王辅臣部占领兰州。在王辅臣的煽惑下，甘肃省固原、巩昌（今陇西）、临洮，陕西省定边、葭州（今佳县）、吴堡、清涧、米脂等地先后叛应，三水（今旬邑）、淳化、白水、蒲城、韩城等地"土寇蜂起"①。吴三桂叛军王屏藩、吴之茂部已占据汉中，吴三桂令其出陇西应援，企图与王辅臣联军，以取道陕甘进攻北京。

康熙帝深感形势严峻，急令清军向王辅臣部进攻：大将军董额率部平定秦州，将军阿密达率部进取平凉，提督张勇、巡抚华善、总兵王进宝等率部进攻兰州，三路兵马协力夹剿，以定临洮、巩昌等处，并命调拨红衣大炮配合攻城。鉴于八旗兵力有限，而绿营兵地位低下，待遇菲薄，积极性严重受挫，康熙帝决心提高绿营兵地位，重用汉兵汉将，授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封靖逆侯，命其"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节制，一切征剿机宜，听尔便宜以行，镇将各官，悉听统辖调遣"②；授宁夏总兵官陈福为陕西提督；加甘肃总兵官孙思克左都督，西宁总兵官王进宝都督同知。

康熙十四年三月初，董额率军进抵秦州城下，包围该城。四月二十日，叛军万余分从四川、平凉来援。康熙帝认为，秦州一

---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三，康熙十四年二月辛丑。

②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三，康熙十四年三月丁丑。

地，异常重要，“欲平陕西诸寇，必先取秦州”①；“倘秦州之军可虑，西安亦且难保”②。他令陕甘总督哈占、四川总督周有德等调兵、运炮赴援。不久，孙思克率部从巩昌来援，清军兵力大增。城内叛军惧战，叛将巴三刚逃走，总兵陈万策率官兵8470名出降，清军于闰五月三十日收复秦州。此后，清军又相继收复了绥德、延安、巩昌、兰州、定边等地，王辅臣部叛军重点固守平凉、固原等城。

康熙帝把平凉确定为重点打击目标，他说：“底定全陕，惟在速取平凉。逆贼王辅臣一日不灭，则秦省百姓一日不安。”③为此，他一方面继续对王辅臣进行招抚，一方面命将军张勇、毕力克图、阿密达会同大将军董额等迅速进取平凉，提督陈福速取固原后与其夹攻平凉，并令清军固守陕西陇州（今陇县）以断敌后路。王辅臣为麻痹清军，致书董额，求其代奏，乞请“再颁赦诏，遣威望大臣受降”④。八旗兵将领缺乏斗志，不思进取。总督哈占不顾大局，只想增兵西安自卫，大将军董额不速率兵进剿，反而一意专主招降。康熙帝严厉批评他们，指出王辅臣乞降，不过是为苟延日月计，提醒他们慎毋因其诈降而贻误进取之机，谕令急攻平凉。在康熙帝的一再斥责下，董额、毕力克图、阿密达等人终于在八月十五日率部进抵平凉。然而，他们“但图自便，惮于攻战”⑤，虽兵力不少，却不围城，任城中叛军四出。王辅臣分兵救固原、袭庆阳，致使围攻固原的清军失利败退灵州（今宁夏灵武），原已就抚的庆阳亦复为敌占。这时，吴三桂叛军在王屏藩、吴之茂的率领下，由川入陕，企图应援王辅臣。康熙帝认为，敌人乘隙侵犯，是欲图分散清军兵力，所以应急图攻取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五五，康熙十四年五月甲戌。

②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四，康熙十四年四月甲寅。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五六，康熙十四年七月癸丑。

④ 《逆臣传》卷二，《王辅臣传》，民国二十五年《贰臣传》附刊本。

⑤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九，康熙十四年十月甲戌。

平凉，以绝敌应援之念。他谕令董额等将领，迅速夺占平凉南山，从高处用红衣大炮轰击，并断敌粮道以困之。十二月初，董额等督军攻占离平凉城3里的第一关厢，对南山屯扎。此后，清军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相反，宁夏发生兵变，提督陈福遇害。

康熙帝认为，陕甘不能即定，四川叛军尚在窥伺，都是由于平凉没有攻下，因而“目前攻取平凉最为急务”①。而王辅臣虽经多次招抚，仍顽梗不化，“非以兵威重创之，不能使之革面”②。但是，董额屯兵平凉，旷日持久，无所作为，康熙帝对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十日，康熙帝命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图海，姓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一年前，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叛乱，京师兵力空虚已无兵可派。图海奉命为副将军，与抚远大将军信郡王鄂札，率由八旗家奴刚刚组成的部队，迅速平定叛乱，深得康熙帝赏识。所以，在董额师久无功的情况下，康熙帝命图海率部急赴陕西，总辖全省满汉兵马，董额以下悉听节制，以平定王辅臣叛乱。二月二十六日，图海率八旗每佐领骁骑一名、护军二名离京，五月十七日至平凉③。十九日，与总兵官孙思克率兵至城北虎山墩，相视形势，研究战法。虎山墩为一要地，高数十仞，王辅臣派精兵据守。图海认为虎山墩为平凉咽喉，控制此地，即可断敌饷道，平凉城可不攻自破，遂率兵强攻。叛军万余人，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布列火器挨牌，突出迎战。清军分路进击，至墩前，叛军居高临下，以火器下击，清军轮番仰攻，步步进逼。激烈的战斗自巳时一直进行到午时，大败叛军，终于夺占了虎山墩。城中一切，历历在目。图海令在虎山墩架设大炮，轰击城内敌营，叛军异常惊

---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一，康熙十五年正月辛卯。

②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七，康熙十四年七月庚寅。

③ 此据《清圣祖实录》、《平定三逆方略》，而《碑传集·图海传》、《清史列传·图海传》、《国朝先正事略·图海传》等书则记图海“三月至平凉”。

恐。图海乘机遣参议道周昌携康熙帝赦诏入城招抚。王辅臣走投无路，献军民册及吴三桂所授伪敕、印，于六月十五日亲往图海军前，叩头谢恩，剃发归降。

平凉攻城战，是西线战场关键性的一战，也是扭转整个战局，改变清军不利态势有重要意义的一战。此后，西线战场形势迅速好转，特别是由于张勇、王进宝、孙思克等汉将及绿营兵发挥了重大作用，使清军很快收复陕、甘及川北地区。西线陕、甘战场的胜利，挫败了吴三桂迂回进图中原的企图，使清军可以抽出兵力去消灭东线和湖南叛军。

四、闽浙耿精忠的归服

靖南王耿精忠于康熙十三年（1674 年）三月十六日叛附吴三桂后，即兵分三路北上。东路曾养性率兵向浙江温州、台州（今临海）、处州（今丽水）进攻，西路白显忠率兵进攻江西广信（今上饶）、建昌（今南城）、饶州（今波阳），中路马九玉率兵进攻浙江金华、衢州，并联络严州（府治今建德东）、徽州（今安徽歙县）反清武装。耿精忠遣使约吴三桂攻取江苏、安徽、江西，以图联军。为壮声势，耿精忠还约潮州总兵官刘进忠扰广东，约台湾郑经掠福建。

耿精忠叛乱后，康熙帝迅速进行了应急部署：命内大臣希尔根为定南将军，率军赴江西，命都统赖塔为平南将军，率兵赴浙江，然后从江西、浙江合攻福建。因耿精忠系怀顺王耿仲明之孙，康熙帝念其祖父前功，所以对他一向与吴三桂相区别，并采取重在招抚的政策，对其在京诸弟及其属下也采取宽容态度。是年六月，清廷派工部郎中周襄绪及耿精忠原属下陈嘉猷携敕前往福建招抚。但康熙帝特别强调，不可因招抚而误进剿机宜。耿拒不就抚，继续率军北上。为加强浙江、江西战场清军的兵力和指挥，清廷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率师赴浙江，并增设江西总督。耿将曾养性企图攻占衢州，被浙

江总督李之芳所阻，败于金华、绍兴。

康熙十三年八月，奉命大将军杰书等抵杭州，欲先攻台州。宁海将军傅喇塔尚未至台州，总兵官阿尔泰等已据黄岩反叛。由于耿军入浙，金华、严州、宁海、余姚等地反清武装蜂起。清军与叛军在各地作战，各有胜负。十一月底，康熙帝命杰书先剿耿精忠，"若剿除耿逆，则小丑自灭"①。此后，清军与叛军在台州、处州、衢州等地反复争夺。十四年八月初，将军傅喇塔部从间道进围黄岩，耿军大将曾养性败走温州，余部献城降。清军又连克太平（今温岭）、乐清、青田。与此同时，清政府连续向耿精忠进行招抚，康熙帝还遣耿精忠弟耿聚忠携敕前往。虽然耿精忠拒不接纳，但清政府的招抚政策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如浙江总督李之芳于是年冬疏报，招抚温州、台州等处叛军总兵等200余人、兵4000余人、民众11万余人。这时耿军军饷匮乏，军士逃亡，内部不协，有的按兵不动，有的愿为清军内应。但大将军杰书、将军傅喇塔等人瞻顾不前，徒以文移往来为事。十五年初，康熙帝谕令杰书速攻温州，然后向福建进军。

康熙十五年六月，王辅臣归降，叛军对西线清军的压力大大减轻，康熙帝下令增兵江西。当月初六日，耿精忠军焚毁江西建昌、新城等地营垒，撤回福建。康熙帝认为，这必定是耿精忠为郑经所逼，清军应乘此机会，迅速向福建进兵。大将军杰书、都统赖塔等奉诏率部由浙江向福建进攻。为断敌饷道，杰书率军于八月十五日猛攻衢州西南衢江东岸的大溪滩，并乘胜夺占江山县城。耿军大将马九玉惧怕后路被截，慌忙弃营从衢州遁走。赖塔等率部急进，二十日至仙霞关，分路夹攻，守关敌军献关迎降。清军进入福建，长驱直进，连克浦城、建阳、建宁等地。杰书遵康熙帝"以时事晓谕耿精忠早降"的谕旨，再次写信招抚耿精忠，指出："与其絷颈受戮，不如率众归诚，仍受王爵，保全百万生灵。况郑锦（经）与尔有仇，尔当助大兵进剿立功，何久事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五〇，康熙十三年十一月戊子。

仇人为叛逆?"① 这时郑经已经占领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兴化等府，兵逼福州；耿精忠部在福建各地官兵多依附郑经，在浙江的曾养性被困于温州一隅，耿精忠知“大势已溃”②，遂有降意。九月十九日，耿军延平守将耿继美献城降，耿精忠剃发待罪，并派人赴延平献伪“总统将军”印，迎清军入福州。十月初四日，大将军杰书率部抵福州，耿精忠出城迎降。康熙帝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所部随大军征剿台湾郑经军，图功赎罪。由于耿精忠已降，福建各地叛军纷纷投诚，困守浙江温州的曾养性也献城投降。杰书集中兵力打击郑经，至十六年二月，兴化、泉州、漳州、海澄等府县先后收复，除郑经仍据厦门外，福建、浙江基本平定。

五、江西和两广的平定

耿精忠附叛之后，即由福建出兵江西，企图与已进入江西萍乡的吴三桂叛军会师。清定南将军希尔根、定远平寇大将军岳乐、扬威大将军喇布先后率兵入赣，与叛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使吴、耿会师的企图终未能实现。

康熙十五年二月，岳乐部清军复袁州府（治今宜春）萍乡，准备进攻湖南长沙。吴三桂为了牵制清军，令大将高大节乘隙率数万兵力围攻吉安。吴军于二月二十日攻陷吉安后，高大节令韩大任留守吉安，自率精兵4000人北攻清江（今清江西南）、新喻(今新余)、奉新等地，断岳乐军后路。康熙帝认为，吉安为通广东之路，最关要害，遂命将军哈尔哈齐率师由江宁赴援，与喇布、希尔根等亟取吉安，并调江南、安徽、湖南岳州等地八旗兵和红衣大炮增援江西。虽然哈尔哈齐、额楚等率兵于五月二十六

① 《逆臣传》卷二，《耿精忠传》。

②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二，康熙十五年九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日进至吉安城下，但康熙帝对江西清军的进展甚为不满，他批评喇布“惟坐守省会，日事骑射，不思经理军务，恢复疆土，诿避偷安”，批评希尔根“不思报国，日惟晏坐省城，安逸日便”，要求他们痛改前非，力图报效，协力攻取吉安①。在康熙帝的严督下，喇布、希尔根始离南昌赴吉安前线，但仍迁延观望，而韩大任则据城死守，致使10万清军屯扎吉安城下，劳师糜饷，毫无作为。吴三桂因清军攻长沙、围吉安，即派大兵驰援。十二月，喇布疏报吴军数万援吉安，已距城20里许；总督董卫国亦疏报吴三桂大将马宝率三四万人救援吉安，已进至永新、安福。清将军额楚等率兵迎战，三次失利。尽管如此，因此时福建耿精忠已降，建昌、抚州、南昌等处满汉清军转调吉安、袁州等地，将军穆占正率兵向岳州进军，对吴三桂形成巨大压力，于是，救援吉安的吴军于康熙十六年正月初九日仓促撤走。由于长期被围，吉安城内吴军粮匮势蹙，难以继续坚守，韩大任率部于三月二十一日夜弃城逃跑。清军收复吉安，打通了进军广东之路，稳固了由赣入湘清军后路，江西形势大为好转。

韩大任率部先后逃往宁都、万安、泰和、永丰等地，到处都遭到清军的围追堵截，吴三桂派出的接应部队又受到穆占部截击，韩大任无奈，于康熙十七年二月率官954员、兵丁13319名至福建汀州（今长汀）投降。清军继续打击留在江西的吴三桂叛军。三月，在万安、泰和等地，总督董卫国率部斩杀韩大任部众4万余，招抚总兵以下官员300余员、兵丁4.6万名，江西基本平定。

平南王尚可喜始终忠于清王朝。吴三桂发动叛乱之初，曾遣人致书尚可喜，约其反清，他断然拒绝参加。其姻亲耿精忠公开叛乱后，他上疏表明大义灭亲的心迹，请求朝廷发兵平叛。康熙帝感其忠诚，把两广地区军务全部交他办理，广东文武将吏悉听其节制，并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

---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五，康熙十五年七月辛巳。

王，由其子尚之孝袭封，令其父子剿灭闽、粤、桂叛乱。时广东形势十分紧张。潮州总兵官刘世忠早已叛清，台湾郑经派刘国轩等率兵配合其攻破尚之孝普宁（今普宁北）大营，进攻惠州。高州总兵官祖泽清据城反叛，勾引广西叛将高雄、董重民等，连陷雷州（今海康）、廉州二府和德庆、开建、电白（今电白东）等州县，围攻肇庆。叛军自东、西两面夹攻尚可喜，致广州形势危急。六月，康熙帝命前锋统领觉罗舒恕率兵援广东，并多次调兵赴援。十五年二月，尚之信叛附吴三桂，接受招讨大将军称号，改旗帜，易服装。两广总督金光祖秘受吴三桂节制，不久也叛附吴三桂。尚之孝兵单势孤，被迫自惠州退还广州，入援清军也回至江西。尚可喜忧愤而死，广东大部被叛乱势力占据。

吴三桂企图将广东经营成后方基地，遂遣总督董重民代金光祖，巡抚冯甦代佟养钜，分守要冲。尚之信、金光祖虽叛，但又都秘密同清军保持联系，要求投降。十六年（1677 年）三月，清廷命署副都统莽依图为镇南将军，率军自江西夹攻广东。此时福建已经平定，将军拉哈达、都统赖塔亦奉命率军自闽南赴潮州。北、东两路清军进军广东，给叛军以极大震慑。四月二十九日，莽依图进抵江西边境的南安（今大余），叛将严自明献城降，清军进入广东，克南雄，直抵韶州（今韶关）。五月初四日，尚之信率广东省城文武官员及兵民等剃发归降。金光祖、冯甦、祖泽清等先后归顺，刘进忠也于六月初六日在潮州投降。

吴三桂听说广东有变，急遣马宝、胡国柱等自湖南率军南攻广东，七月，与清军战于韶州。清将莽依图率军赴援，穆占亦赴乐昌切断吴军后路。喇布率军进取湖南衡州、永州（今零陵），以图牵制。韶州为粤赣咽喉，又北接湖南，为一战略要地。清军据城坚守，马宝以炮猛攻，清军退保土城。江宁将军额楚援军至，内外夹击，马宝等弃帽峰山，败退衡州。清军乘胜收复仁化，广东大部恢复。

广西将军孙延龄，于康熙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据桂林叛清，响应吴三桂，自称安远大将军，杀曾参劾过他的都统王永年、副

都统孟一茂等，占领平乐、梧州等地，吴三桂封其为临江王。不久，广西提督马雄、总兵郭义亦于柳州附三桂，于是广西为吴三桂占据。孙延龄招兵买马，其军编为5镇，兵力约1万人。

清甘肃庆阳知府傅弘烈，曾密奏吴三桂早有叛谋，反坐诬谪戍广西梧州。吴三桂叛后，他假意接受吴三桂所授信胜将军之职，暗中募兵置将，联络义勇5000多人，为清军收复两广积蓄力量。他密约尚可喜共同恢复，并以大义利害劝说孙延龄早日反正。十六年四月，傅弘烈迎清军莽依图部于广东始兴，清廷授其为广西巡抚、抚蛮灭寇将军，令其与尚之信进取广西。傅弘烈率兵收复梧州、浔州，又分兵大败吴军于昭平、贺县（今贺县东南），收复两县，并招降郁林（今玉林）、博白等一州四县。

清军进攻广西，威胁湖南吴三桂军后路，吴三桂悉锐来争。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吴三桂至衡州，派马宝率部由湖南宜章入广西富川，派其孙吴世琮等诱杀孙延龄，占据桂林。康熙帝命莽依图、傅弘烈由梧州、封川（今广东封开）经贺县进取平乐、桂林；为牵制吴军，又命尚之信、额楚等进攻湖南宜章、郴州。十七年春，莽依图、傅弘烈分率八旗兵、绿营兵进围平乐，吴三桂派吴世琮率兵分水陆两路来援，据河扼清军饷道。清军作战失利，败退梧州，莽依图率部就饷于广东德庆，前所收复的郡邑皆失。康熙帝令尚之信选精兵1万、赖塔选福建藩兵和广东潮州标兵6000增援，又命将军舒恕自江西赣州、额楚自广东肇庆向梧州进兵。但各部兵皆不至，莽依图亦退缩不前。吴世琮率军数万来攻，傅弘烈率所部绿营兵与战，在郁林、梧州、平乐等地多次失利。十二月初，藤县失守，吴军水陆进逼梧州。十八年正月，莽依图、傅弘烈率满汉官兵迎战，三路夹攻，大败叛军，吴世琮利用夜暗弃营撤退。清军乘胜收复浔州、桂林。五月，叛将马承荫据南宁降，吴世琮纠众围攻，城中食尽，危在旦夕。莽依图、额楚、舒恕等率兵倍道兼程救援，重创叛军，吴世琮身负重伤，仅率数十骑逃遁，于是，南宁解围，广西平定。

六、湖南战略决战

（见附图7）

从平叛战争一开始，康熙帝一直把湖南战场视为关系战略全局成败的关键，认为“三藩”之中吴三桂为主要敌人，湖南为主要战场。他说：其他战场“虽屡奏捷，朕不为喜，吴三桂乃贼渠，惟破岳州、澧州，方可喜耳。”①

经过前三年的作战，吴三桂已失去陕、甘和闽、浙、粤、赣等省，左、右两翼已被翦除，湖南主战场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清军则对湖南形成包围之势，稳操战略上的主动权。正如赵翼所说：“时东西两巨寇既降，乃得以全力办三桂。”②

湖南是吴军集中的地区，也是吴三桂力保的地区。特别是澧州、岳州、长沙、衡州，驻扎着吴军的主力。吴三桂坐镇湖南督战，与江北勒尔锦、察尼等所率清兵对峙。他无意渡江北进，却不时遣兵西去陕、甘，东出江西，声援王辅臣、耿精忠，但皆未能达其目的。而清军在石首之虎渡口、太平街，洞庭湖之君山等战斗中，虽曾击败过吴军，但勒尔锦、察尼、尚善等清将也多次失利而撤退。他们因惧怕吴军“深浚濠堑，多用火器”，而“止知画地自守，图保身躯，不能少进尺寸”③。清军未能乘胜向湖南战场纵深地区推进，澧州、岳州等地一直未能攻下。

康熙帝对攻取湖南的作战方针，早在东、西两线战事进行的过程中就有部署。鉴于吴三桂固守岳州、长沙等战略要地，清军沿江“静坐日久，未移尺寸”④，康熙帝决意分兵绕过岳州，迂回攻取湘东、湘南。为了进攻湖南，破岳州、长沙之敌，进行了

---

① 《清圣祖实录》卷四九，康熙十三年九月戊辰。

② 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一，《平定三逆述略》，光绪辛丑埽叶山房石印本。

③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一，康熙十五年二月甲戌。

④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二，康熙十五年三月庚寅。

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一是调发制造战船。康熙十五年七月，命江西、江南等地采办木材，交偏源巡抚韩世琦督造战舰；十六年正月，命发京口沙虎船60艘，安徽巡抚造沙船40艘，以足百艘之数；同年六月，命江宁巡抚造鸟船40艘；九月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江南督造鸟船60艘、沙船200艘。二是调运火炮，命将江西、西安、荆州及新铸的20位红衣大炮运往湖南。三是加强湖南兵力，先后命勒尔锦、察尼、尚善等清将渡江，分路进兵湖南；在西线王辅臣归降后，立即于康熙十五年九月实授署前锋统领穆占为都统，佩征南将军印，分拨陕西、河南及荆州等地精兵，令其率领开赴湖广前线，寻机与吴军决战。

吴三桂在耿精忠、王辅臣、尚之信降清后，已处于孤军作战的地位，在战略上由进攻转入防御。当他获悉清军增兵湖广后，即于康熙十五年十一月自松滋后撤至岳麓山（在长沙西）进行调度，在战略部署上不得不采取守势：遣胡国柱率兵坚守长沙，马宝、高起隆自岳州后撤至长沙城外，以成犄角之势；遣韩大任、高大节东攻吉安，阻挡江西清军西进，屯兵湘北，以牵制南下清军。

康熙十五年至十六年，清将岳乐、穆占、尚善、鄂鼐、色度等所率清军云集湖南，但湖南战局仍未有大的变化。穆占率兵进围长沙，福建、江西清军进兵广东，吴三桂为确保长沙，于康熙十六年十一月由岳麓山移驻衡州，以分散清军兵力。

十七年初，清军平定江西，收复广东后，又攻占湖南的宜章、郴州（今郴州市）、永州等地及广西的部分地区。穆占所部清军于湘东对吴三桂发起攻势，攻取了茶陵、永兴等县，遂转军北上，与安亲王岳乐共攻浏阳、平江，并招降了驻湘潭的吴军水师将领林兴珠。清军占领湘东北地区后，对岳州形成包围之势。

吴三桂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加之长期用兵，已是兵饷不继，形势日绌。自发动叛乱以来，其后方基地云南、贵州、四川，屡年歉收，米一石价五六两，盐一斤价三四百钱，军需浩

繁，赋税苛重，致“征催严迫，怨声四起”①。即使曾被其收买拉拢的苗、彝土司，也多起来反对他。年已67岁的吴三桂，因“疆宇日蹙，且军兴调发，财用耗竭，川、湖赋税不足供兵饷，恐四方见轻，情竭势绌，乃思窃帝号自娱”②，遂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于衡州称帝，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置官命将。

吴三桂建都衡州后，着手加固其周围的防御。这时，清征南将军穆占自茶陵南下，收复郴州、桂东、兴宁、永兴、桂阳等地，威胁衡州。吴三桂以永兴为衡州门户，即令马宝、胡国柱率军前往争夺。穆占遣护军统领哈克山、前锋统领硕岱率兵往援。清军作战失利，大部退回郴州，哈克山和都统伊里布阵亡，硕岱入永兴城内死守。吴军攻城，用炮轰破城墙，清军立即用竹篓、布囊装土填补，双方日夜激战。驻茶陵的简亲王喇布，驻郴州的征南将军穆占，皆屯兵不进，不敢前往增援。

正值永兴数次战危、旦夕被敌攻下的紧急时刻，吴三桂突然于八月十七日在衡州忧忿病死，夏国相、马宝等拥立吴三桂孙吴世璠继承帝位，改元洪化。吴三桂的突然死亡，对其军队士气影响颇大，围攻永兴的诸将闻讯，立即于八月二十日夜撤军而去，永兴围解。

康熙帝一直把攻取岳州作为平叛战争特别是湖南战场的关键。但是由于湖南前线清军统帅勒尔锦和尚善等人畏缩不前，也由于湖南是吴三桂的基地，叛军力量雄厚，极力固守，故清军在岳州一直无所作为。对此，康熙帝十分不满。康熙十七年三月，康熙帝命尚善图功赎罪，并提出了水陆齐进，断敌饷道，攻取岳州的方略。五月初一日，又采纳投诚的原吴三桂亲军水师右翼将军林兴珠以及詹事宜昌阿的建议，令清军水师进洞庭湖，于君山、扁山等处泊舟，在九贵山陆路立营，水陆联络，断敌饷道，

---

① 《明季稗史汇编》，《吴耿尚孔四王合传·吴三桂传》。

②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第67页。

防止长沙、衡州、常德之敌来援，以便合势剿御。他特别强调，岳州既克之日，“即乘虚速取常德、澧州诸处，勿令贼得为备”①。当月十八日，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湖广总督蔡毓荣、提督桑格等，率水师进驻洞庭湖，向吴军发起进攻。此时清军在岳州已拥有鸟船100艘、沙船438艘，多于吴军舰船数倍，但因九贵山尚未驻兵，叛军仍能往来此地以通樵采。康熙帝指出：“岳州为湖南咽喉要地，必此地恢复，则长沙、荆州之兵始能前进。”② 于是，他调荆州等地清兵增援岳州，令水陆官兵于九贵山设立一营，令水师小船携载火器，乘夜袭扰敌营，使敌不得宁息。八月初，尚善病死，康熙帝令贝勒察尼代为大将军，统率诸路清军进攻岳州。但是清军将帅仍彼此观望不进，康熙帝见诸将军“破贼无期”，提出要亲统六师赴湖南前线，在议政王等极力劝阻下，才打消此议。不久，传来吴三桂病死的消息，康熙帝预料“贼必内变”，于是谕令诸路将军乘时齐统大兵，分路进剿，指示大将军察尼等“水陆夹击，速取岳州”③。

岳州吴军被围数月，粮食火药等物均感缺乏。吴应麒于九月内两次派兵船冲出清军包围，赴湘阴取粮，尽管如此，军中粮食也仅仅能支持到十一月。为打通饷道，从十月下旬起，吴应麒频频派水师舰船进攻陆石口、柳林嘴，但均被清军击败。十一月初，湖水干涸，清军水师移泊布袋口，并用数千根木头打桩做牌，拦截上流，阻止吴军出入，以绝敌粮饷。为尽早攻取岳州，康熙帝对察尼增兵的要求均予满足，从江南调子母炮，从长沙、江西调兵，并将原增援永兴的部分八旗兵转调岳州。先后增援岳州的清军达3万人，使岳州前线总兵力达到10万人，与吴军兵力基本相当。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清军加强了政治攻势。早在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帝刚刚得悉吴三桂病死的消息，就向各路将军大臣指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七三，康熙十七年五月庚子。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七五，康熙十七年七月己未。

③ 《平定三逆方略》卷四一，康熙十七年九月辛丑。

出，“元凶既服天诛，胁从宜施宽典”，谕令他们“宣布德意，广示招徕”，招抚吴军人员①。在岳州城内粮食已断，吴军饥馑日甚，而其打通饷道的努力一再受挫的情况下，清军的政治攻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据在岳州前线的詹事宜昌阿奏报，岳州城内“伪属官兵相继归诚”②。吴军将军杜辉暗中派人与清军联系投诚，事情暴露，于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吴应麒绞死，同时被杀的还有总兵数人及杜辉的弟侄亲丁等。但吴应麒的残忍杀戮，更导致其内部人心解体，就在杜辉被杀的当天，岳州吴军总兵陈华、李超等即率文武官弁兵丁家口投诚，其后，岳州吴军官兵投诚的更是络绎不绝。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吴军总兵官王度冲、将军陈珀等各率舟师出降，另有吴军官兵及家口数千人亦于同一天归降。吴应麒见大事不妙，遂于当日傍晚率数万人弃城逃往辰州（今沅陵），清军于第二天早晨进入岳州城。

岳州一失，吴军在湖南的根基动摇。正月二十七日，大将军勒尔锦乘势指挥大军自荆州渡江南下，不战而复松滋、枝江、宜都等地，向湖南挺进。湖南吴军如惊弓之鸟，不战自溃，长沙守将胡国柱于正月二十九日弃城西逃辰龙关（今沅陵东北），清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复长沙。二月，清军数路并进，势如破竹。岳乐收复湘潭；察尼复湘阴、安乡；喇布复衡山、衡州、耒阳；勒尔锦复澧州、常德。吴军将领毫无斗志，吴国贵、夏国相由衡州南逃永州，为穆占部清军击败，再西逃新宁。三月，清军复宝庆（今邵阳）、永州、道州（今道县）、永明（今江永）等地。八月，清军攻占新宁后，喇布和岳乐合军攻武冈，将军林兴珠、提督赵国祚率兵奋击，大败吴军，占领武冈、枫木岭，吴国贵中炮而死，夏国相逃往贵阳。至此，除辰州、沅州等少数地区仍被吴军占领外，湖南基本平定。

湖南战场是平定三藩战争的主战场，对整个战局有重大影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七六，康熙十七年八月丙申。按：《平定三逆方略》记在九月壬寅条。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七八，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庚寅。

响。由于清军基本控制了湖南，吴军只占有云、贵、川三省，清军的最后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

七、进取四川、云南、贵州

（见附图 8）

康熙十八年初，清军收复岳州、长沙，湖南基本平定，康熙帝一方面利用吴军因军事节节失利而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势，加紧对吴应麒、夏国相、王屏藩、马宝、郭壮图等叛军头目的招抚，一方面谕令清军从陕西向四川进军，为进取云南、贵州作准备。

四月，宁夏提督赵良栋上疏提出进兵汉中、兴安以图四川的建议，康熙帝命驻在陕西的抚远大将军图海等进兵。但是以图海为首的满洲八旗将领怯懦畏敌，犹疑不前，于是，康熙帝决心重用汉将。十月，他命将军张勇、王进宝和提督赵良栋、孙思克等率绿营兵平定汉中、兴安，恢复四川，并说："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① 奋威将军王进宝由栈道前进，收复陕西凤县、甘肃两当县，当月二十七日抵汉中，吴军大将王屏藩后撤四川广元，清军收复汉中，年底又拔广元。提督赵良栋于十月克甘肃徽州（今徽县）、陕西略阳，十一月与王进宝会师宁羌大安驿。图海等亦收复兴安等地。随后，王进宝和赵良栋分兵两路入川：十九年正月，王进宝自广元进，大败吴军，生擒吴之茂，王屏藩自杀，清军收复保宁、顺庆（今南充）二府。同月，赵良栋败敌于白水坝，收复龙安府（今平武），威逼成都，守城吴军总兵、巡抚皆降，清军遂收复成都。与此同时，湖广提督徐邦治、将军吴丹亦奉命向四川进军。

湖南、四川先后平定，进取云南、贵州的条件基本成熟。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命湖南、广西、四川等地统兵将领分路进

① 《清圣祖实录》卷八五，康熙十八年十月辛未。

剿，攻取云贵。三月，大将军察尼率部袭破辰龙关，辰州吴军守将率官兵万余人不战而降，湖广总督蔡毓荣亦率部收复泸溪、溆浦、麻阳（今麻阳西南），打开了进兵云贵的通道。新任云贵总督赵良栋疏言进兵方略，请以湖广官兵取贵州，以广西、四川官兵取云南，"定期八月终，诸路齐进，直捣云南"①。康熙帝悉允其所请，并调兵遣将，调整部署。在此之前，已命安亲王岳乐率部分驻湖南八旗兵还京，以贝子彰泰继任定远平寇大将军，以湖广总督蔡毓荣为绥远将军，统辖官兵，平定云贵；以赵良栋为勇略将军、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至是，复命彰泰、蔡毓荣统率驻湖广满汉大兵在沅州集结，经镇远进取贵州，此为东路；命贝子赖塔为征南大将军，率广西满汉大军，由南宁进取云南，此为南路；命赵良栋会同将军吴丹，先取遵义，后取云南，此为北路。因云贵多山地，康熙帝令"皆绿营步兵居前，满骑继后"，并特命汉官蔡毓荣"节制汉兵先进"②。为调动八旗官兵的积极性，又许诺于平叛胜利后将满洲、蒙古、汉军官兵参战以来的"所有借贷，无论数百万，俱令户部发帑代还"③。

闰八月，康熙帝命兵部传谕湖南、四川、广西诸路统兵将帅，按原定之期，速行进剿。

闰八月十二日，蔡毓荣率绿营兵自沅州分三路进取贵州，彰泰率八旗兵于十八日继进。时吴军为了打破清军合击，以主力犯四川，泸州、永宁（今叙永西）、叙州（今宜宾）俱陷。康熙帝命彰泰部速取贵阳，分兵取遵义，以断入川叛军后路。彰泰、蔡毓荣等遵照康熙帝谕令，迅速进兵，十月中旬连占镇远、平越（今福泉），二十一日收复贵阳，吴世璠、吴应麒等连夜逃往云南，原贵州提督李本深和文武官员归诚。清军收复贵阳后，又相继收复安顺、石阡、都匀诸府，贵州基本平定。十一月，清军攻

---

① 《清圣祖实录》卷八九，康熙十九年三月壬子。

②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第70页。

③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第71页。

克永宁，控制鸡公背（关岭东北）险要，叛军1.3万人烧毁铁索桥后退守盘江西岸。铁索桥为滇黔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清军乘吴军败溃之际速行进剿，本可一鼓作气直捣昆明，但彰泰、蔡毓荣等在贵阳停兵不进月余，丧失了歼敌的大好时机，受到康熙帝的严厉批评。直至康熙二十年正月，彰泰、蔡毓荣部清军才在土司龙天佑、沙起龙等部民众的帮助下，架浮桥渡过盘江。二月，吴军在江西坡(今晴隆西)利用天险，以大象迎战，清军兵马惊溃，死伤山积。两天后在沙子哨、腊茄坡再与敌激战，终于取得胜利，收复新兴所(今普安)、普安州(今盘县)。与此同时，征南将军穆占、提督赵赖率满汉官兵败吴军大将军高起隆、将军王会等部2万人于平远(今织金)西南山，高起隆败走，王会率部投降，清军相继收复平远、黔西、大定(今大方)，贵州全部平定。

南路赖塔军自南宁出发，经田州（今田阳）、泗城（今凌云）、西隆（今隆林）入贵州。康熙二十年正月初一日败敌于石门坎，复安笼所（今安龙县）。二月初二日与吴将何继祖、詹养所部2万人战于黄草坝（今兴义），生擒将军詹养以下千余人，夺营22座。十一日抵云南曲靖，十五日与东路彰泰、蔡毓荣军会师于交水（今沾益），相继收复马龙、杨林、嵩明等地，进至昆明城东归化寺立营。二十一日，吴世璠遣胡国柄、刘起龙率兵万余，出城列象阵拒战。清彰泰军和赖塔军分别从左、右两翼向吴军进攻，自早晨激战至傍晚，阵斩胡国柄、刘起龙及总兵9人，生俘600余人，吴军败退入城。清军将领“恐攻城损兵”，遂令诸军占据近城南坝、萨石街、走马街、双塔寺、得胜桥、重关等要地，“扼吭立营”①，掘壕围困，同时大力进行招抚。

吴世璠婴城死守，并急调四川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等回救。早在康熙十九年，吴世璠命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犯四川，陷泸州、永宁、叙州等地。康熙帝命吴丹、赵良栋于黔、蜀

---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三八，《章泰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6页。

要路，增兵御敌，相机进取，并从京城、荆州等地调八旗兵增援。其后，又命王进宝镇守保宁，图海镇守汉中；将作战不力的满洲将军吴丹、鄂克济哈解任，以佛尼勒为建威将军调遣永宁一路官兵，以都统纪哈里为宣威将军调遣建昌（今西昌）一路官兵，与赵良栋一起歼灭进犯川南的吴军。二十年三月，康熙帝得知吴世璠调马宝等应援的消息，认为“逆贼胡国柱等退援云南，事关重大”，所以严令将军佛尼勒、赵良栋等“于文到之日，即各统官兵，速行蹑击，勿令得援云南”①。在各路清军的打击下，吴军退援云南的行动彻底失败，胡国柱穷蹙自杀，马宝、夏国相投降，吴世璠由四川调兵回援的企图落空。吴世璠还曾向西藏达赖喇嘛乞师，其书信也为清军截获。

康熙二十年四月，赵良栋奉命“速进云南”②，他率所部宁夏绿营兵从雅州南下，渡金沙江入云南，九月进抵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彰泰、赖塔两路清军会师。这时清军已围困昆明半年有余。尽管吴军不少将领率部投诚，但由于清军在离城40里安营，一面临昆明湖，一面抵山，湖中没有设兵断敌水路，吴军米粮照旧能从水路运入城内，所以清军的围困是围而不死，难以给吴军造成致命的打击。赵良栋到达昆明后，主张近城速战，他说：“我等大兵连营四布，不就近速战，迨至日久，米粮不继，满兵无妨，绿旗兵何以存立耶？”彰泰反对赵良栋的意见，说：“皇上豢养之满洲，岂可轻进，委之于敌！且尔兵远来，亦宜休养，何可令其伤损？”③ 赵良栋不同意彰泰的意见，他自率所部逾壕而进，逼攻城下，又在昆明湖内“横筏施楼橹”④，截断城内吴军的补给线。这一招果然奏效，城内吴军粮尽援绝，十分窘迫。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九五，康熙二十年三月癸酉。

② 《清圣祖实录》卷九五，康熙二十年四月丙申。《平定三逆方略》卷五七，康熙二十年四月辛丑。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七，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壬申。

④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第72页。

但是，10余万清军① 长期围困昆明而不能破城，对清军十分不利。九月二十二日，康熙帝谕令速取昆明，他说："云南省城围困已久，若不速为克取，未免劳敝兵民，糜费粮饷。今逆贼外援已绝，株守孤城，穷迫已极，……今惟迁延时日，待贼食尽，恐粮饷渐至于虚糜，兵丁亦苦于疾病。其移檄大将军贝子彰泰、赖塔等，均派戴罪官兵及投诚绿旗官兵，速行攻取云南省城。"② 彰泰、赖塔等遵谕进逼城下。十月初八日，吴世璠被迫派兵出城，在归化寺一带与清军展开激战，但终被清军击败。清军乘势攻城，赖塔进兵银锭山，蔡毓荣夺重关及太平桥，穆占、赵良栋等夺玉皇阁。城内吴军军心动摇，吴将余从龙、吴成鳌于二十二日出城投降，清军统帅尽得城中虚实，彰泰遂督令各路清军四面逼城猛攻：赵良栋攻得胜桥，蔡毓荣攻大东门，林兴珠攻草海，赖塔等分兵攻华浦，并遣人入城招降。清军昼夜环攻，吴军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二十八日，线緎、吴国柱等吴军将领密谋，欲将吴世璠、郭壮图等擒献清军。吴世璠、郭壮图闻变，走投无路，自杀而死。二十九日，线緎等率众出城投降。

至此，历时8年的平叛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第四节　平定三藩的意义和双方作战得失

一、平定三藩的历史意义

首先，扫除了封建割据势力，使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赵襄忠公事略》，清光绪壬寅广益书局石印本。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初五日，康熙帝说："征讨云南时，满汉官兵合计四十余万。"（《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七）当指当时动用的全部兵力，并非单指围困昆明的兵力。

② 《清圣祖实录》卷九七，康熙二十年九月辛未。

康熙帝决定撤藩，本是为了消除威胁清廷的藩王割据势力，但由于吴三桂叛乱，撤藩被迫停止。平叛战争的胜利，使撤藩终于成为可能。吴三桂及其孙吴世璠已死，残余势力被消灭。尚之信、耿精忠两藩王分别于康熙十九、二十一年被处死，其属下旗员俱撤还京师，官兵归入八旗，绿营兵留驻广东等地，设将军、副都统统辖。清政府通过撤藩，将选吏大权收归中央，划一了军队编制，对地处边远的云贵、两广、福建实现了有效管辖，为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人民生活的安定创造了条件。

其次，三藩割据势力被荡除后，使清政府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平定其他分裂割据势力，进而完成统一大业。清政府平定三藩之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统治日趋巩固，为消灭台湾郑氏集团，使台湾与大陆重归统一创造了条件，也为集中力量解决准噶尔部噶尔丹割据势力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进一步得到发展。

第三，有利于边防的巩固，使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外患。17 世纪后期，在西方殖民势力积极向东方侵掠的同时，沙俄也猖狂地对我黑龙江地区进行侵扰。清朝平定三藩之后，国力军力增强，为以后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从而阻止了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

二、清军胜利的原因

康熙帝平定三藩战争的胜利，主要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的成熟和正确的战争指导。

（一）平叛战争符合中国社会走向统一的要求

三藩分裂割据，破坏了国家的进一步巩固统一，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恢复生产、安定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企图煽动和利用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以达到分裂割据的目的。可是，当时的民族矛盾已经下降到次要地位，人心思安，不愿再使这一矛盾激化。特别是，人们对吴三桂

充当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政权刽子手的形象记忆犹新，对他忽而叛明，忽而叛清的行径非常鄙视，所以他那“反清复明”的口号并没有什么号召力，相反却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各族人民对叛乱者是深恶痛绝的，连以反清著称的明朝遗老王夫之也宁愿隐居深山，不肯为三藩做事。由此可见，三藩作乱是违背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愿望的。

相反，清朝平定三藩，则符合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利益。曾亲身经历当时情景的法国人白晋说：“吴三桂之乱的最大危险性，就在于它有可能导致其他叛乱事件的爆发。”① 毫无疑问，如不及时镇压这场叛乱，中国将陷入更为严重的分裂割据状态，各族人民必将大受其害。因此，在战争过程中，不仅满族人民，其他各族人民也积极支持清政府的平叛战争。清军入滇时，“所在猓苗（彝族）皆仰慕皇仁”，纷纷下山，“或输馈粮糗，以资我军，或乡（向）导前驱，并力杀贼”②，就是明证。人心的向背，是清朝必胜、三藩必败的根本原因。

（二）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

1、正确及时地作出平定三藩的战略决策，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

康熙帝缜密观察分析形势，坚决撤藩，是与其“习知中外利害与前代方镇得失”③ 密不可分的。他深知走向统一和安定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的要求，而三藩割据则是阻碍时代前进的逆流。他看重秦始皇统一中国，集权中央的进步作用，指出汉朝分封制和唐代藩镇割据则成为国家分裂、地方割据之乱的根源，吴三桂“乃唐藩镇之流”④，必须裁撤。历史的借

---

① 〔法〕白晋：《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 页。

②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四，康熙十五年六月己卯。

③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第 62 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史部五·纪事本末类·平定三逆方略》，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鉴，使他更加清醒而坚决，对撤藩一事坚定不移。清廷内部对此多次进行讨论，意见分歧，在战争进程中又出现过反复，吴三桂、达赖喇嘛也提出过裂土议和、划江而治的要求，康熙帝都不为所动。他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大一统、高度集权的国家。如果不是康熙帝正确及时地作出撤藩的战略决策，并为此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平叛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周密的战争准备，是平叛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藩乱起，各地突变，人心浮动。康熙帝首先批驳了反对撤藩的种种论调，明显地支持主张撤藩大臣的意见，统一思想和行动，又及时地镇压了北京城内杨起隆的反清活动，继而迅速地平定了察哈尔部布尔尼的叛乱，以解除后顾之忧，稳定后方。事发后，迅速调兵控制诸战略要地，拦阻叛军；诏削藩王官爵，发布平叛檄文，宣谕各地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以稳定军心民心；开通通往前线的运输及通讯线路，保证了兵员、后勤补给，以及军情的送达。在作战物资准备方面，令专职官员筹办粮饷，调配马匹，制造火器兵器，修造战船。这对战争的胜利进行也都起了重要作用。

3、审时度势地进行战略指导，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关键

在战争全过程中，康熙帝始终统筹全局，驾驭全局，指导全局。战争开始不久，吴三桂很快占领了滇、黔、川、湘等广大地区，并一度亲赴松滋前线督战，大有渡江席卷中原之势。不少地方的清军守将，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军事上陷于被动。不久，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广西的孙延龄亦叛，对清军更加不利。在此紧急时刻，康熙帝急速调兵遣将，控扼战略要地，暂停耿、尚二藩的裁撤，在战略上变被动为主动。接着，康熙帝抓住主要矛盾，在已形成东、西和正面湖南三大战场的情况下，始终把湖南战场作为主战场，在平定了陕甘王辅臣和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的叛乱之后，客观上改变了清军所面临的分散兵力、多面作战的不利态势，置吴三桂于孤立无援、三面被围的不利地

位，使清军能够最后集中更大的兵力、正面突破湖南战场，夺取战争的全胜。

4、灵活地采取“剿抚并用”、“恩威兼施”的政策和策略，是分化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重要手段

在平叛战争中，除用武力歼灭叛军外，康熙帝还灵活地采取一些政策和策略，使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分化瓦解敌人，且收到较好效果。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等，都是这样争取他们投降的。“剿抚并用”、“恩威兼施”的策略，之所以收到成效，主要是由于能区别对待，政策落实：对藩王统治区的人民，劝其安分自保，毋听诱胁；对投诚官弁，量材录用；对士卒，尊重本人意愿，或编入清军或回故籍归农；对叛乱头目，一般也可将功赎罪。事实证明，康熙帝这一政策和策略的运用，既分化瓦解了敌人，又减少了自己的损失，大大缩短了战争的进程。

5、重用汉兵汉将，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清朝的汉兵，即绿营兵，本来地位低下，作战时又担负最艰险的任务；汉将亦往往不受重视，受制于满将。但平叛战争以来，八旗兵、满将的弱点和绿营兵、汉将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战争初期，勒尔锦等率八旗兵南下，竟屯兵江北，畏葸不前。这说明，入关后30多年的八旗兵，在优裕的生活中磨损了锐气，已失掉了当初勇敢善战，凌厉无前的气概。到了战争中后期，在多山林沼泽的南方作战，八旗骑兵更失去其优势。相反，绿营兵不仅数量多，而且以步兵为主，适合山地作战。尤其陕、甘绿营兵，更是骁勇善战，为康熙帝所倚重。在所有派出的满旗将领中，只有图海在西北、岳乐在闽浙、彰泰在云贵获得些战绩，其他如勒尔锦、察尼、尚善、珠满、喇布、鄂鼐等皆“退缩不前”、“老师糜饷”、“坐失事机”，康熙帝提拔的汉军绿营将领，如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以及浙江的李之芳、福建的姚启圣、广西的傅弘烈等，在平叛战争中都发挥了远比满将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三藩失败的原因

三藩叛乱一时占据了半个中国，但经过 8 年的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其所以失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苟安保守，战略失误

吴三桂用兵，一向持重谨慎，不贸然从事。他在云南举兵叛乱时，“年老更事多，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①。政治上的苟安保守，导致其缺乏战略头脑和战略眼光，军事上陷入保守主义。吴三桂进军湖南饮马长江之时，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清军仓促应战，尚未部署就绪，且将领畏怯，行动迟缓，如果吴三桂乘胜进取，渡江北进，可直指北京。沿江东下，既可夺占南京，控扼江淮，又可迂回北上。当时吴三桂召集将领研究战略计划，这几种方案都有人提出过，但吴三桂为保住既得利益，抱着“事纵不成，可画长江而国”的目的，对北上东下的意见都予以否定，严令部队“毋得渡江”，准备长期与清军对峙，从而贻误了战机，由战略进攻逐渐转为战略防御。当王辅臣起兵响应时，吴三桂本可派重兵助王辅臣，以取道四川，迂回陕、甘，进取北京。但吴三桂只令四川王之茂、王屏藩出蜀骚扰，由于兵力不多，措施无力，只有很少的兵力进入陕、甘。吴三桂这两次战略上的重大失误，使康熙帝赢得了调兵遣将的宝贵时间，于湖南正面战场部署了严密的防御体系，挡住了吴军前进的势头；于西线用有丰富经验的图海经略西北，迅速解决了王辅臣的叛乱。所以，吴三桂的失败，虽由康熙帝运筹决策之高明所决定，但也与吴三桂在战略上保守、作战指导上的犹豫观望、坐失事机等有直接关系。吴三桂死后，其亲信争权夺利，各有所图，但在苟安保守上倒是与吴三桂相一致，他们不肯舍弃滇、黔根本，所以否定了吴国贵北向以争天下的战略，最后只好株守一隅，坐等失败。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第 68 页。

（二）未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更缺乏统一指挥

在叛乱前，吴、耿、尚三藩王本来就割据一方，矛盾重重。三藩之间也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吴三桂虽曾遣兵东出江西，西上陕、甘，但耿、王为保存各自的实力，并不与吴认真配合作战。尚之信、孙延龄对吴的号令也是能推则推。例如，吴三桂多次催促尚之信出兵发起攻势，尚之信却不服从调遣，反密派心腹到清军中谋求反正，为自己留条后路。当时台湾的郑氏势力也是一支与清王朝敌对的重要力量，但三藩并未能很好利用。相反，耿、郑联合不久，即翻脸闹矛盾，致郑军乘虚占了半个福建，给清军以可乘之机。在康熙帝"剿抚并用"策略下，各叛军大小头目纷纷叛吴降清，最后吴三桂成了孤家寡人。总之，尽管三藩军事实力的总和并不小，并已占领江南半壁江山，但由于分散作战，未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更未能实行统一指挥和密切协同，失败是必然的。

（三）继续在占领区推行暴政，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

三藩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变本加厉地搜括人民。吴三桂的后方基地云、贵、川，屡年歉收，米价昂贵，为应付繁重的军需，又加税田亩，地丁额征达每亩五六钱，致使百姓怨声四起。吴三桂死后，叛军向云贵败退时，又是沿村抢掠，蹂躏百姓，致民受涂炭。叛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每征粮二石米，只算一石，民最为苦"①。失去人民拥护的叛军，所破州县，旋得旋失，最后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七日，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八章　康熙统一台湾

康熙元年（1662 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去世，在此后的 20 多年时间里，以郑经、郑克塽为首的郑氏集团与清政府隔海对峙，造成台湾与大陆长期分裂的局面，这是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繁荣，违背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当时，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清复明斗争已经平息，清王朝在逐步统一大陆后，已建立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帝国。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满汉间的民族矛盾得到缓解，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开始走向和平安定、休养生息的新时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对付西方列强的侵略，是时代的要求，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郑氏集团的反清斗争就已失去了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而蜕变为阻碍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的地方割据活动。更为严重的是，郑成功的继承者郑经宣称台湾“远在海外，非属（中国）版图之中”，郑氏集团在台湾的“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①，企图以俯首称臣来换取清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藩属国，使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为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消除东南沿海的长期威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清政府从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62～1683 年）对台湾郑氏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完成了统一台湾的历史使命。

---

① 《郑经复孔元章书》（永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0 页。

第一节　剿抚并用，夺取金门、厦门

一、清郑间和谈破裂

郑成功于清顺治十八年十二月(1662年2月)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先后采取了在台湾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开荒屯田发展台湾经济、部署台湾的军事防御、安置郑氏集团人员及家属等一系列措施,以巩固和建设台湾作为新的反清基地。郑氏集团势力控制的地区除台湾、澎湖外,还包括大陆福建沿海的金门、厦门以及铜山(今东山岛)、南澳等岛屿,其中金门与厦门是郑氏集团在大陆沿海地区经营多年的抗清根据地。郑成功渡海攻台前,命其世子郑经坚守金、厦,其战略意图是:取台、澎以为基地,连金、厦以抚诸岛。然后广通外国,训练士卒,进则可战而恢复中原之地,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①。清政府要消灭郑氏集团,进而统一台湾,其战略目标也自然首先指向金、厦二岛。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八日,一代英豪郑成功病逝于台湾,年仅39岁。随后,在台湾的郑成功之弟郑世袭和在厦门的郑经,几乎同时宣布自己为郑成功的合法继承者,由此形成了台湾与金门、厦门隔海对峙,势同水火的局势,双方都在整军备战,准备用武力最后解决问题。

清福建总督李率泰于当年六月得知郑成功去世,郑氏集团内部分裂,即将火并的消息,立即邀请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等人星夜驰抵剿郑前线漳州,共商剿抚事宜。李、耿等人最后商定,当此郑氏内乱之际,遣使招抚,令其自行瓦解,不战而降乃是上策。于是派人赴厦门与郑经议和,提出郑经及其部属如能遵制削发,离岛登岸,归顺清廷,朝廷将不咎既往,并厚爵加封,予以优待。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郑经在东有郑世袭分庭抗礼，西有清军虎视眈眈的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下，决定采取“阳和阴违，俟靖内乱，再作筹画”① 的对策，即假意同意和谈，以为缓兵之计，待东渡台湾，平定内乱后再作处置。于是，他派使者杨来嘉赴漳州与清方细商招抚事宜，并将以前郑军从各州县缴获的25枚印信及假造的郑氏集团人员、船只清单献给清方，以迷惑清廷。

清廷得到李率泰、耿继茂关于郑氏有意接受招抚的报告，一面命即刻送郑方使者杨来嘉入京细商招抚事宜，一面下令福建各路清军原地待命，广布间谍，加紧进行离间、招降郑氏集团的活动。

郑经见假议和之计奏效，清军的威胁已暂时解除，立即集结部队，于是年十月初挥师东征。由于当时在台郑氏诸将对郑氏家族的内部争斗多持观望态度，只有黄昭、萧拱宸等少数将领支持郑世袭，郑经所部顺利在台湾登陆，击溃支持郑世袭的部队，迅速控制了台湾局势，确立了其在郑氏集团中的统治地位。

康熙二年正月，郑经回师厦门，着手清除在金门、厦门的反叛分子。郑经的伯父郑泰长期担任郑氏集团户官之职，管理贸易和财政事务，掌握大量钱财，在郑经东渡平乱期间，主持金门、厦门的军政事务，军事上也有很大实力，本来就已招致郑经的猜忌。郑经在台湾时，又搜出郑泰给黄昭的密信，信中表示了支持郑世袭做郑氏政权继承者的态度，这就更加激化了二人间的矛盾。六月，郑经在周密筹划之后，设计诱擒郑泰，将其杀害，又派人往金门查抄其家。郑经处置郑泰，直接导致大批郑军倒戈，郑泰之弟郑鸣骏及子郑绪昌带领1.5万余名郑军官兵到泉州向清军投诚，使金门守备一时空虚，严重削弱了郑氏集团的实力。

郑经率军从台湾返回厦门时，杨来嘉也从京城回到厦门，向郑经报告了清廷坚持要郑氏集团削发、登岸的和谈条件。郑经对与清廷和谈本无诚意，此时他认为已无后顾之忧，故转而采取强硬态度，坚决要求“依朝鲜例”，只“称臣纳贡”，决不“削发、

---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第175页。

登岸”。于是，郑经继位后的清郑间第一次和谈遂告破裂。

从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到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最后统一台湾，清廷与台湾郑氏集团之间共进行了10次和谈。在这一系列和谈中，双方分歧的焦点都集中在“依朝鲜例”和“削发”这两个问题上。而“依朝鲜例”又是郑氏集团在历次和谈中提出的首要条件，也是其谈判的基本立场。所谓“依朝鲜例”，就是要求清政府依照当时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模式来确定中国大陆与台湾、清中央政府与郑氏割据政权的关系。朝鲜是中国的邻邦，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朝鲜成为中国的藩属国。郑氏集团坚持“依朝鲜例”，就是要清政府承认台湾为中国的藩属国，把台湾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这与清政府统一台湾的主旨完全相悖，当然会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二、清军夺占金、厦

因郑经坚持“依朝鲜例”，拒绝削发、登岸，清廷招抚策略失败，决定改抚为剿。康熙二年十月，清军兵分三路：一路自海澄（今福建龙海东南），主将是原郑成功旧部，后投降清朝的海澄公黄梧和水师提督施琅；一路自同安，主将是福建总督李率泰；一路自泉州，由清军与荷兰舰队[①]组成清荷联军，清方主将是福建陆路提督马得功，荷方主将是舰队司令博尔特。清军此役的战略意图是分进合击，一举攻占金门、厦门二岛。

郑经认为清荷联军这一路是劲敌，对其威胁最大，于是决定由骁勇善战的大将周全斌率水师精锐迎击泉州方向的清荷联军，

---

① 康熙元年（1662年）至三年，总部设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三次派舰队到中国沿海和台湾地区，企图利用清郑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伺机再占台湾。清政府对此有所警惕，虽一时借用其力量，但对荷方提出的建立反郑军事联盟的建议和条件，反应冷漠，拒不与之签订任何协议，终于使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其余诸将率部守住各水陆要道，监视并阻击其余各路清军。郑经与洪旭等在大担列屿观战接应。其意图是集中精锐，破敌一路，以达迫使其余清军不攻自退的目的。

十月十九日，郑军舰队与清荷联军相遇于金门乌沙港海面，立即展开激战。清荷联军有荷兰大型战舰 14 艘，清军战舰 300 余艘，帆樯如林，炮声如雷。郑经见势不敌，率部退出浯屿（金门西南）。周全斌驱 20 艘战船冲向清荷联军，其船在海面上往来迅疾，如平地走马。荷舰船体庞大，行动不便；火力虽强，但命中率极低。周全斌率郑军船队冲过荷兰舰队，突入清军战阵，乘清军船队猝不及防，阵形混乱之机，围攻清军主将马得功的指挥船。交战良久，清军死伤甚众，马得功恐被擒受辱，跳水自溺而死。其余清军无心恋战，纷纷溃逃。荷兰舰队失去了清军的配合，也退出了战斗。此役，擅长海战的郑军水师最终取得了胜利。

清军虽然在乌沙港海战中失利，但由黄梧、施琅率领的海澄方向的清军秘密招降了守卫陆路要地高崎的郑军将领陈升，并于二十一日出其不意地攻占了郑氏集团在大陆沿海最重要的根据地厦门，一举打乱了郑军的整体防御体系，导致郑军全线败退：守卫同安方向的郑将林顺退至镇海（今福建龙海东南），周全斌退至浯屿，郑经与洪旭等人则率部退至铜山。清军随即占领了金门。

清军取得金门、厦门后，黄梧建议以荷兰舰队为先导，会集各路清军，立即进攻铜山，生擒郑经。总督李率泰认为，清军虽占领了金、厦，但乌沙港之战，提督马得功战死，实力大受损伤，而郑军基本是全师而退，损失不大。况且目前郑氏集团已成惊弓之鸟，进逼过急，就会逃逸至台湾，剿之愈发困难。不如乘其军心混乱，风声鹤唳之际，展开攻心战，"四处招降，以散其党羽"，可兵不血刃，获得全胜。如其顽抗，再挥兵进剿不迟。李率泰遂令各路清军暂停进攻，然后一面遣使赴铜山对郑经进行劝降，一面令黄梧、施琅利用其在郑氏集团中的旧关系，对郑经的属下进行招降、策反活动。郑经仍坚持"依朝鲜例"，不削发、不登岸等条件，双方谈判失败。黄梧、施琅领命后立即派人往铜山、镇海等处招降。

施琅以故旧之谊劝说退守镇海的郑将林顺率部降清，不久，守卫南澳的郑军将领杜辉也到广东揭阳港向清军投诚。

三、郑经退据台湾

据守要地的郑军将领纷纷降清，铜山就成为失去屏障、孤立无援的孤岛。郑经见部下众叛亲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知大势已去，暗中做好了逃往台湾的准备。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郑经命周全斌、黄廷率部断后，自携明朝宗室、缙绅及郑军残余官兵六七千人乘船撤离铜山，仓皇东渡台湾。郑经逃离后，断后大将周全斌因与郑经心腹洪旭等人有矛盾，担心到台湾后受其排挤，遂统兵至漳浦向福建总督李率泰投诚。黄廷也接到了黄梧的招降密信，与周全斌同时归顺了清廷。至此，李率泰的攻心、招降策略大获全胜，清军果然兵不血刃就拿下了铜山，郑氏集团在大陆沿海的抗清基地完全丧失。据史料记载，从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年，郑氏集团共有文武官员3985人、士兵10万余人向清军投诚，大大削弱了郑氏集团的实力。

郑经逃抵台湾后，立即采取措施，加强防务，以抵御清军对台、澎的进攻。由于澎湖地处大陆与台湾之间，是台湾的海上门户，又是海上交通要道的必经之地，郑经将台湾的防御前沿设在澎湖。郑军在澎湖湾内的娘妈宫修筑营垒，在左右峙设置了报警烟墩和炮台，由薛进思等将领统兵守卫。

第二节　清军攻台失利与清郑间的和平对峙

一、清军三攻澎湖失利

（一）施琅率师三攻澎湖

施琅，原名施郎，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自幼随其

父施大宣出海经商，熟悉沿海水域地理、气候情况，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又从师习兵法、战阵及诸般武艺，成年后即以智勇兼备闻名乡里。后慕名投郑芝龙麾下效力，屡立战功。清顺治三年（1646 年）随郑芝龙降清。当时坚持抗清的郑成功久闻施琅精通阵法，尤长于水战，遣人邀之共图复明大计。施琅应邀前往，在郑成功部下任左先锋（一说为左冲锋）要职，参与郑氏集团军机大事的谋划，甚得郑成功的信任和倚重。施琅追随郑成功前后约有 5 年时间，参加了很多重要战役，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二人意见发生分歧，关系逐渐疏远，矛盾日益激化。顺治八年，施琅因擅杀从将曾德而触怒郑成功，遭拘禁后乘隙逃脱，投降了清军，其父、弟均遭郑氏杀害。施琅复降后，由于胆略过人，又熟知郑氏集团内部情况，且在与郑军的作战中战功卓著，累迁至福建同安总兵官。康熙元年（1662 年），施琅经国史院大学士苏纳海力荐，担任了福建水师提督的重要职位。在清军夺取金门、厦门的作战行动中，施琅率福建水师剿抚并用，克浯屿，下金门，招降陈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康熙帝“素谙海务，矢志立功”的褒奖。

康熙三年三月，在清廷军事进攻、政治招抚和经济封锁①的打击下，郑经被迫率余部退守台湾。当年六月，施琅与李率泰、耿继茂联名上疏朝廷，请求乘胜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七月，朝廷下旨，同意施琅等人乘胜攻取台湾的意见，授施琅为靖海将军，由郑氏降将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辅佐，“统领水师，前往征剿”，并指示施琅：“凡事会议酌行，毋谓自知，罔

---

① 自顺治十三年（1656 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廷对郑氏集团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封锁。其措施一是“禁海”，即严禁一切船只出海，从事海上贸易及捕渔等活动；二是“迁界”，即将沿海居民内迁 30～50 里，在靠海的一侧开界沟、筑界墙、立界碑，并驻兵戍守，严禁越界，从而在沿海与内陆之间形成隔离地带。其目的是断绝海内外的经济、政治联系，使郑氏集团困守孤岛，不战自溃。

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寇盗。严设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大兵一至即时迎降者免死。……务期殄灭逆孳，副朕倚任之意”①。

施琅接到朝廷进军台湾的命令后，即着手实施攻台行动。他认为“澎湖乃通往台湾之要冲，欲破台湾，必先攻取澎湖”，如能“飞渡澎湖，则将扼据咽喉，进逼巢穴”②，对台湾的郑氏集团形成强大威慑。为此，他将攻台作战行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攻占澎湖，在澎湖设立清军大营，观察台湾形势；第二阶段，根据风向、地形及敌情相机而动，出奇制胜，夺取台湾本岛。

郑经得到施琅将率军攻台的情报后，立即抽调屯田部队的三分之一、侍卫部队的一半，共计 1 万余人，配备 40 余艘战船，命大将颜望忠率领，驰援澎湖，加强澎湖的防务。同时，又在台湾本岛各港口、要塞加紧部署防御力量。

当年十一月，施琅率部发起第一次进攻澎湖的行动，但清军船队出海不久，即遇到迎面而来的强大海风，船队难以逆风而行，只好返回出发地。清廷接到施琅出征失利的奏报，指示施琅“与在事将弁酌情商议，伺机进取，以奏肤功，勿以日久为虑”③。施琅接旨后，加紧进行再次出征的准备工作。次年三月二十六日，施琅率清军水师从金门蓼罗湾启航，第二次向澎湖进发。由于海上风轻浪平，靠风力推进的清军船队航速甚为缓慢，航行了三昼夜，仍不见风起，只得靠岸停泊。二十九日再次出航，又遇顶头的东北风，风力强劲，海浪翻涌，施琅无奈，只得将船队撤回金门。

---

① 《清圣祖实录》卷十二，康熙三年七月丁未，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施琅题为舟师进攻台湾途次被风飘散拟克期复征事本》（康熙四年五月初六日），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 51 页。

③ 《施琅题为舟师进攻台湾途次被风飘散拟克期复征事本》（康熙四年五月初六日），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 50 页。

康熙四年四月十六日，天空放晴，万里无云。施琅于当日午时第三次下达出发命令，清军水师分别从金门附近的乌沙头和浯洲屿起锚，数百只战船浩浩荡荡地向着澎湖方向进发。航行一昼夜，至十七日午时时分，澎湖岛屿上的小山尖已依稀可见了。就在这时，海上风云突变，清军遇上了一场罕见的海上风暴。转眼间，船队被风浪冲得四分五裂，阵形大乱，无法聚拢。施琅只得下令鸣炮返航。此次海上遭遇风暴，绝大多数清军都死里逃生，物质损失虽然不大，精神上的打击却是相当沉重的，在清军官兵心理上留下的阴影更是久久难以消除的。

（二）清军攻台失利的原因

从康熙三年十一月到康熙四年四月，施琅统率清军船队三次进军澎湖，都遭失利。三次失利，从表面上看都是由于天时风向等自然因素造成的，但从其内在原因来看，却是清廷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攻台行动的必然结果。

在政治方面，当时康熙帝年纪尚幼，按顺治帝的遗诏，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辅助幼帝，佐理朝政。但野心勃勃的鳌拜使用阴谋手段排斥异己，培植党羽，逐渐形成了独揽朝政的局面。这样就破坏了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使清廷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不断激化，削弱了清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当时盘踞西南和东南地区的“三藩”（即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成为巩固和加强封建国家统一的严重障碍。尤其是福建和广东，地处清政府对台斗争的最前线，“三藩”势力把持着这些地区的军、政、财大权，使清政府无法全力以赴地实施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

在经济方面，自明末清初以来，连年的战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清政府的财政也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而十分拮据，入不敷出。据顺治十二年（1655 年）清工部给事中王命岳的上疏，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为白银 1814 万两，支出为 2261 万

两，赤字达447万两①。这样的财政状况，是很难为一场大规模的远海作战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的。

从军事上来看，清统治者统一中国大陆，主要依靠八旗骑兵和绿营步兵，这是其军事优势所在。但其对海战既缺乏实战经验，又没有足够的信心。对于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清政府一来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二来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清廷欲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主要依靠福建水师，而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原郑氏集团的投诚人员，清统治者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这无疑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削弱其战斗力。由于这些因素，清政府的综合军事实力虽然远超过台湾郑氏集团，但其海上力量却明显敌不过郑军水师。所以即使清军能顺利抵达澎湖，也无必胜的把握。

攻台清军主将施琅还从作战部队的具体状况分析了失利的原因：一是投诚官兵的许多亲属都在台湾，"新附人心，参差未一"，不能奋勇向前；二是出征部队多为临时拼凑，未经充分的选拔及训练，是"鸠乌合之众"；三是将领们无决策权，只是"奉有成命，勉应击楫"，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所以施琅强调，出征失利虽因"风涛之险"，但"人谋亦未允臧"②。

值得一提的是，清军攻台船队中途而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据荷兰方面的有关著述披露，此次武力攻台行动有荷兰舰队参与。荷兰海军提督博尔特派出战舰10艘、士兵1000人，与清军水师联合进军澎湖。清军主将施琅虽与郑氏集团有杀父之仇，但他从民族大义出发，不愿荷兰人染指台湾，更担心清荷联军取胜后，荷兰殖民者再次侵占台湾。因此，施琅屡次对荷兰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遇到强劲海风之际，施琅就以此为借口，率清军船队返回了③。此事虽不见于清方记载，但也不至于是空穴来

---

① 《清史稿》卷二四四，《王命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边患宜靖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③ 详见赖永祥：《清荷征郑始末》，载《台湾风物》第四卷第二期。

风，从中倒可以看出施琅的良苦用心，他是想完全依靠清朝自己的力量进攻台湾，其目的不仅是要剿灭郑氏集团，而且要统一台湾。这也表现出施琅深远的战略眼光和爱国精神。

二、由战转和——清廷对台策略的转变

（一）清廷对台策略的转变

清军三次攻台行动均告失败，其消极影响是深远的，以至于后来清廷中很多人谈海色变，对武力统一台湾丧失了信心。另外还有一些人怀疑参与此次行动的施琅等原郑氏集团投诚人员心存异志，有意破坏攻台行动。同时，自郑氏集团退守台湾，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的战事已经结束，饱受多年战乱之苦的百姓渴望恢复宁静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清廷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也难以负担福建、广东等地大量驻军的粮饷供应。这些因素导致清政府的对台策略发生变化，从以武力统一为主一变而为停止武力行动，完全寄希望于通过和谈方式统一台湾。在这种情况下，裁减驻闽清军已势在必行。康熙五年（1666 年）正月，福建总督李率泰在给朝廷的上奏中说："闽海余氛，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洵为至计。惟是将众兵繁，若撤之太骤，不无惊惶；太迟，又恐贻患。目下当安反侧之心，日久务防难制之势。"① 由此可见，清廷已经下达了撤军的旨意，只是仍在考虑撤军的最佳时机。李率泰奏折中'目下当安反侧之心，日久务防难制之势"，是针对郑氏投诚人员而言的。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原郑军官兵，降清后加入了清军，驻扎在福建沿海一带。这一带原本就是郑氏集团的老巢，郑氏集团在此有一定群众基础。清廷对郑氏投诚人员怀有戒心，这也是其急于裁减驻闽部队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熙七年，清廷在大多数朝臣对台湾主和不主战的情况下，否定了施琅再次武力攻台的意见，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完全放弃

① 《清圣祖实录》卷十八，康熙五年正月丁未。

对台武力行动。这些措施包括：裁减大部分福建水师官兵，焚毁所有战船；福建水师的重要将领如郑鸣骏、周全斌、何义、黄廷、杨富、陈蟒等人（皆为原郑军投诚人员）立即调离福建，或进京，或派往外省屯田垦荒，其余投诚人员也分批调往外省垦荒；放弃福建沿海包括金门、厦门、铜山、南澳等在内的所有岛屿，将清军防线收缩至距海岸 30～50 里以内的内陆地区（亦即清政府对台湾的经济封锁线），摆出一付只守不攻的架式；解除施琅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福建水师建制也随之取消），改任内大臣，加入汉军镶黄旗。

与此相联系，郑经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军事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将颜望忠所率增援澎湖的部队和战船撤回台湾，宿卫部队各回原建制，屯田部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派往各港口、要塞的警戒部队也都调回原驻地。这样，台湾海峡两岸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以往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由此缓和下来。由于双方都不具备吃掉对方的实力，故在军事上都采取防御姿态。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只不过暂时将主要注意力从外部转移到内部，都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从康熙四年下半年到康熙十二年，清政府与郑氏集团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海峡两岸出现了和平对峙的局面。

（二）和平对峙时期的两次和谈

清廷焚船撤军，在军事上对台湾郑氏集团采取守势，将统一台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和平谈判上。康熙六年和康熙八年，清政府先后两次主动派出使者赴台湾与郑氏集团议和，寻求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康熙六年五月，清使孔元章渡海赴台，面见郑经，提出清方拟定的三项议和条件：一、以沿海地方与台湾通商；二、郑氏集团向清政府称臣纳贡；三、郑经遣子入京作为人质。同时又转交给郑经一封其舅董班的劝降信。郑经虽然厚待孔元章，但拒绝接受招抚。他答复孔元章说："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先王

在日，亦只差‘剃发’二字，若照朝鲜事例，则可。”① 郑经所谓“先王”即指郑成功，郑成功在清顺治九年（1652 年）至顺治十一年与清朝的谈判中，也的确提出过“依朝鲜例”的要求，但当时郑成功尚未收复台湾，所以他的“依朝鲜例”的前提是承认自己“为清人”，并“奉清朝之正朔”，为清朝之臣属，只是要求控制一定的地盘，保持原有的体制和军队而已。而郑经一再坚持的“依朝鲜例”，在内容上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企图把他统治下的台湾变为纯粹意义上的“外国”。这在郑经给其舅董班的复信中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今日东宁（即台湾），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指大陆）哉？倘清朝以海滨为虞，苍生为念，能以外国之礼见待，互市通好，息兵安民，则甥亦不惮听从；不然未有定说，恐徒费往返耳。”②

孔元章见郑经口气如此强硬，态度如此傲慢，知道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只得返回大陆。但清廷对和平统一仍寄予希望，当年八月，再次派孔元章赴台议和。由于双方都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十月，谈判最终破裂，孔元章回京复命。

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果断地铲除了把持朝政、权倾一时的鳌拜集团。六月，康熙帝亲自主持了对台湾郑氏集团新的一轮和谈，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赶往福建，与靖南王耿继茂和时任福建总督的祖泽沛共商招抚台湾郑氏集团的办法。七月初，福建兴化知府慕天颜（加太常寺卿衔，以提高其身份和规格）和都督佥事季佺，受命持朝廷诏书及明珠致郑经的亲笔信赴台议和。郑经礼待慕、季二人，但拒不接

---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第 194 页。

② 《郑经复董班舍书》（永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 69～70 页。

诏，并表示，如清廷接受其“依朝鲜例”、“不削发”、“不登岸”等条件，则可称臣纳贡，否则没有谈下去的必要。慕天颜代表清廷指出，郑氏集团若能翻然悔悟，削发归顺，定会受到朝廷的宽大和重用，“不然，岂寡楼船甲兵哉”，向郑经施加军事压力。但郑经冥顽不化，双方交涉10余日没有结果。之后，郑经派礼官叶亨、刑官柯平随慕天颜等同往泉州，继续谈判。

康熙帝在得到明珠等人有关第一轮和谈结果的报告后，于八月敕谕明珠等人，明确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①，表明了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鲜明态度和原则立场。同时，为实现和平统一，康熙帝也作出了巨大让步，同意郑经“不登岸”的条件，允许其世代留守台湾，不触动其在台湾的现行体制和统治地位。这对一个封建统治者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充分体现出康熙皇帝争取和平统一的诚意。

慕天颜、季佺带着康熙帝旨意再赴台湾，劝郑经遵制削发。慕天颜对郑经说：“贵藩乃遁迹荒居，非可与外国之宾臣者比”，称臣而又不削发，于礼不通，也不足以表示归顺诚意。明珠等给郑经的信中也指出：天子明察万里，深切体谅你等对台湾的眷恋之情，允许你等世守台湾。但认为你等是中国人，不宜援引朝鲜之例，你等虽以外国人自居，圣上却将你等与中国人同等对待。“夫称臣纳贡，既已遵国制，定君臣之义，譬犹父子。从无父子而异其衣冠，岂可君臣而别其章服！此剃发一事，所当一意仰从，无容犹豫者也。”② 郑经蛮横无理，继续声称“东宁（台湾）偏隅，远在海外，与（中国）版图渺不相涉”，“苟能如朝鲜例，则敢从议，若欲削发，至死不易”③。从而导致此次和谈又以失败而告结束。

清政府寻求政治解决台湾问题途径的和谈攻势屡次受挫，从客观上看，是由于台湾郑氏集团顽固坚持分裂与对抗立场造成

① 《明清史料丁编》丁第三本，第272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第207～208页。

③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第208～209页。

的，但从主观上分析，则是由于清政府在和谈策略上存在严重失误。这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对台和谈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致命威胁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做后盾。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避免战争给双方造成伤害，不失为统一策略中的上策。但和谈只有在谈判双方的基本立场和主要目的一致或相容，并都抱有诚意、愿意作出一定让步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而当时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之间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双方的矛盾是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兴王朝与旧王朝残余势力的矛盾，是统一与分裂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性质是尖锐对抗的，事实证明是无法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统一，武力行动应置于主导地位。但清政府不但没有及时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支能够威胁郑氏集团生存的水师部队，反而在军事上采取消极保守的防御方针，裁撤水师、焚烧战船、收缩防线、搁置武力，在长达 8 年的和平对峙时期里，对台湾没有采取任何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完全寄希望于通过和谈使郑氏集团放弃对抗和分裂立场，当然是达不到目的的。

与此同时，“三藩”与清政府的矛盾日趋激化，“三藩”称霸一方的局势不但对清政府的权威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形成威胁，而且严重干扰了统一台湾的行动，因此，“削藩”问题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统一台湾问题暂时被推到了次要位置。

第三节　击退郑氏集团进犯大陆沿海的斗争

一、郑军对大陆沿海的进攻与清军的反击

（一）郑军乘三藩之乱夺占闽、粤七府

郑氏集团自康熙三年（1664 年）退据台湾后，对大陆一直

取守势，未发动过主动的军事进攻，但并未放弃与清政府为敌的政治立场，也没有放弃夺回其在大陆所失地盘的企图，而是时刻在窥测时机。康熙九年，郑经得知平西王吴三桂有反清意向，即派推官吴宏济持其亲笔信面见吴三桂，极力怂恿吴三桂起兵造反，并慷慨许诺将自己的军队交吴三桂指挥。康熙十二年，清廷下达撤藩令，吴三桂、耿精忠等遂萌反志。八月，耿精忠遣漳浦人黄镛致书郑经，书中有"孤忠海外，奉正朔而存继述；奋威中原，举大义以应天人。速整征帆，同正今日疆土；仰冀会师，共成万世勋业"① 等话。郑经接书大喜，认为反攻时机已到，立即调集各地屯田部队，经过迅速的整编和动员，于十月亲自率领开至澎湖，等待大陆方面的进一步消息。十一月，清廷见吴三桂已公开反叛，为控制局势，分而制之，下旨停撤靖南、平南二藩，以安其反侧之心。耿精忠因此也暂且收起叛心，静观时局的发展，并再次致书郑经，要其暂缓起事。郑经见火候未到，便收兵返回台湾。

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受吴三桂煽惑，终于扯起叛旗，公开反清。他又一次派黄镛赴台与郑经联络，请求郑经与其联手，水陆并进，夺取江、浙地区，并声称将福建全省的水师船只统交郑经指挥。吴三桂也书招郑经"大引舟师，径取金陵（南京），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②。郑经得信，即刻率部起程，直驶厦门岛。他既未遵照吴三桂径取金陵或天津的指令，也未接受耿精忠水陆配合攻占江、浙的建议，而是率军在厦门登陆，将兵锋直指郑氏集团曾盘踞多年的福建沿海地区。而且这样一来，郑军也可以暂时避免与清军正面交锋，有利于保存实力。

郑经瞩意福建，但福建是耿精忠的势力范围，必然引起耿精忠的戒心。耿精忠在得知在厦门的郑军"兵不满二千，船不过百只"后，认为郑氏没多少利用价值，又担心其跟自己抢地盘，于

---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第 211 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第 217 页。

是下令沿海戒严，重申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断绝与郑经的往来。郑经仍坚持自己的既定方针，并作出以下部署：一是在厦门训练士卒，整顿水师，又密令部下黄兴、杨信潜入漳州、泉州等地收集情报，并对耿精忠的部将进行策反活动，以为郑军内应；二是为保障后勤供给，派李德赴日本铸永历钱，并购买军火，派杨贤督船往南洋进行贸易，筹集军饷军粮；三是驰令留守台湾的陈永华抽调台湾屯田部队的六分之四运送到厦门，以加强实力。然后，郑经命柯平到福州面见耿精忠，对耿氏背约提出抗议。耿答复柯平，要求郑经留在原地，不得轻举妄动。郑经决定以武力与耿精忠争夺福建沿海地区，命刘国轩等将领率军发动进攻。耿精忠军中有不少将领与郑氏有旧交或为郑氏降将，所以郑军一路招降纳叛，进展顺利，很快就占领了同安、海澄、泉州、漳州等地。

康熙十三年底，吴三桂出面调停郑耿之间的冲突，力陈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次年年初，耿精忠向郑经赠送大型战船 5 艘，以求媾和。于是双方以枫亭（福建仙游东南 50 里）为界划分势力范围，枫亭以南属郑氏，以北归耿精忠，并订立通商贸易、有事相援、互不侵犯几项和约。此后，郑经转而向西，与平南王尚可喜争夺广东沿海地区。郑军先后攻占了广东东部潮州府（治今潮州市）属澄海、揭阳、潮阳等县。康熙十五年，郑军继续西进，又攻占了惠州。这时，吴三桂的叛军也已抵达广州以西的三水，对尚可喜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二月，尚之信乘其父尚可喜病重，向吴三桂投降，加入叛乱阵营。在吴三桂的主持下，尚之信与郑经也划界讲和，以东莞、新安（今深圳市西）、石浓（即石龙，在东莞东北）为双方停战分界线，相约互不越界。郑经巩固了在粤东的地盘后，再次转锋东向，进攻福建耿精忠所辖地域。从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的两年多时间里，郑氏集团势力发展迅速，其全盛时期的控制范围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兴化（治今莆田市）、邵武、汀州（治今长汀）和广东的潮州、惠州等七府之地。

（二）清军长驱入闽，郑经退守海岛

郑氏集团乘三藩之乱进犯大陆，清廷深感事态严重。但由于当时清军的主要敌人是吴三桂，康熙皇帝综观全局，决定把主战场放在湖南，重点打击吴三桂，对福建的耿精忠和郑经则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策略。康熙十三年八月，他指示福建总督郎廷佐："入闽之日，海寇（指郑氏集团）宜用抚，耿进（精）忠宜用剿，或用间，相机便宜以行"①。到康熙十五年，郑经背弃前盟，夺占了属耿精忠管辖的福建汀州等地。此时耿氏前有清军，后有郑军，已陷入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被迫收缩战线。清军乘机大举进攻，于八月二十日攻克要塞仙霞关，打开了入闽的门户。九月，清军克复建宁（治今建瓯市）、延平（治今南平市）等府，兵锋直指福州。耿精忠见大势已去，遂向清军投降。

耿精忠降清后，清军便以耿军为前导，向郑氏集团占据的地区发动进攻。郑经任命许耀为总督，屯兵于乌龙江（闽江南支）西岸，抵御清军。清军将主力10余万人马集中在乌龙江东，包括耿精忠的马上金枪手和赖塔、喇哈达等统领的满、汉骑兵步卒，沿江岸列阵数十里，旌旗遍野，号角连营，铁骑往来奔突，声势浩大。另有一支清军乘船迂回至闽安，夹击郑军。郑军精锐仅12镇万余人，沿江设防。郑军主将许耀胸无韬略，隔江望见清军势盛，心虚胆寒，临战向郑经辞职，未获批准。十月，清军渡江进攻。有人建议许耀乘清军半渡之际，挥师进击，许耀不听。待清军过江列阵，许耀才仓皇下令迎战。郑军前锋被冲稍退，许耀即率先逃跑，郑军随之溃败，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役，郑军死亡6000余人，丢弃辎重不计其数，士气大丧，其在大陆的败局由此开始。十二月，清军攻占邵武、汀州二府。康熙十六年初，清军又乘胜进攻兴化、泉州、漳州。郑军粮饷不继，军心涣散，望风而逃。郑经见败局已定，于是放弃海澄，退

① 《清圣祖实录》卷四九，康熙十三年八月丁酉。

守金门、厦门等岛屿。镇守粤东地区的郑军将领刘国轩闻讯，也率部逃往厦门，与郑经会合。至二月底，清军收复了郑氏集团所占据的闽、粤七府之地。

（三）双方的对峙与和谈

郑氏集团退守金、厦等沿海岛屿后，仍保持着一定的实力，而清军的水师尚未恢复，陆上优势一时难以发挥作用，故清郑间的战局形成僵持状态。康熙十六年四月，福建清军主帅康亲王杰书派人赴厦门与郑氏议和，并修书一封，劝郑经“转祸为福，归顺本朝，共享茅土之封，永奠山河之固”①。郑经坚持原来的立场，谈判搁浅。杰书见郑经态度顽固，遂催造船只，准备向海岛发动进攻。其时，漳州人蔡寅以左道惑众，乘郑经败退，收拾其余党，诈称明“朱三太子”，聚众数万，头缠白布，在漳州北部与泉州交界的靖南、长泰、同安等县境内屡败清军，声势日盛。杰书调集清军对付“白头贼”，对郑经只好仍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同年七月，杰书遣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等再赴厦门议和，提出郑军退出沿海岛屿，郑方所提“依朝鲜例”等条件可代为向朝廷题请，以息兵安民。郑经与诸将商议后，又进一步提出“欲安民必先息兵，息兵必先裕饷”，要求清方割让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府作为郑军的筹饷之地，然后郑方保证据守海岛，不再内侵。对于郑经等人的无理要求，清方使者不敢作主，返回复命。杰书又派监生吴公鸿持其亲笔信前往，为尽早结束战事，杰书在信中竟作出无原则的让步，建议郑军撤出沿海，退守台湾，“自处以外海宾臣之列”，并说，郑经“如感朝廷之恩，则以岁时通奉贡献，如高丽朝鲜故事；通商贸易，永无嫌猜，岂不美哉!”② 孰料郑经对杰书的重大让步并不领情，又得寸进尺地提出沿海岛屿全部划归郑氏所有，并由清政府供给郑军粮饷。和谈又告失败。

---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七，第261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七，第265～268页。

杰书在和谈中一再退让，更助长了郑经的气焰。康熙十七年春，郑经命刘国轩对福建沿海地区的清军发动反攻，以进一步向清廷施加压力。刘国轩利用水师的机动性，忽水忽陆，出没无常，使赶来围剿的清军疲于奔命。刘国轩又与"朱三太子"蔡寅的人马相呼应，分散了清军的兵力。三月，刘国轩率郑军攻至海澄城下，清福建陆路提督段应举据城死守。刘国轩令士兵环城挖掘沟堑数重，引江水灌入沟中，沿沟堤排列火炮，重堑复垒，围困海澄。清军援兵四集，多次企图突破重围，入救海澄，都被郑军击败，伤亡惨重。六月，郑军攻占海澄，段应举等守城将领自缢而死，满汉将士 2 万余人，战死及泅水逃出者过半。海澄陷落，使福建清军大为震恐，纷纷退守漳州，不敢出战。刘国轩乘胜挥军北上，水陆并进，占同安，围泉州，又分遣部将连下南安、永春、德化、安溪、惠安等地，郑军的另一支部队也攻占了长泰和漳平。一时清军节节败退，郑军则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四）姚启圣的招降措施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遏止郑军的进攻势头，清廷于康熙十七年五月对福建的军政大员进行重大调整，撤销郎廷相的总督之职，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吴兴祚为福建巡抚。姚启圣临危受命，他冷静地分析形势后认为，刘国轩攻下海澄后不立即进攻漳州，而是舍近求远去攻泉州，是其大大的失策。他还分析道，郑军总兵力不过 3 万，集中起来才对清军有威胁。现在郑军攻占了很多城邑，必然要分兵把守。"众分，则势弱；势弱，则破之易也。此兵法所谓'兵多贵分，兵少贵合'者"①。

战局的发展正如姚启圣所料，郑军在占据了一些城池后，兵力分散，战线拉长，攻势果然减弱。郑军以重兵围攻泉州，但却久攻不下，粮饷军需的供应发生了困难，不得不加重对百姓的搜刮和役使，以致郑氏集团在沿海地区渐失民心，军心士气也开始动摇。这一局面的出现，为清军开展招降活动提供了契机。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八，第 281 页。

还在康熙十六年时，康亲王杰书在与郑氏集团的议和失败后，曾向康熙帝报告说“海贼（指郑经）无降意”，康熙帝随即答复：“郑锦（经）虽无降意，其附逆人民有革心向化者，大将军康亲王仍随宜招抚”①，康熙帝这一招降郑经下属官兵、瓦解郑氏集团基础的旨意，得到姚启圣的充分领会和贯彻。姚启圣擅长策反。升任福建总督后，在协助杰书等清军将领对郑军发动积极的军事行动的同时，又抓住时机，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策反活动。为达到削弱郑氏集团的社会基础，动摇其统治根基的目的，姚启圣首先从处理好对郑军家属及亲族的政策入手。他的前任郎廷相认为福建人大多与郑氏官兵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怀疑他们暗中资敌、通敌，普遍不予信任。姚启圣上任伊始，即广张布告，申明郑氏在沿海地区盘踞多年，当地百姓不可能与其无任何瓜葛，但绝不能以此株连无辜。他下令今后禁止以与郑氏有牵连为借口，进行诬告、陷害和挟私报复等活动。他还在搜罗人才时，对曾追随郑氏后来改邪归正，又确有才能的人委以重任。这些做法对争取民心，消除沿海民众的敌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姚启圣又采用郑氏投诚人员黄性震的建议，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以官爵、资财等招纳郑军官兵。对来降的郑氏人员不但给予赏银，而且让他们乘坐装饰华美的车马，身着鲜丽的服饰，往来招摇于漳州、泉州的郊野。有的降兵降将又逃归郑军，姚启圣等人也佯装不知，不加制止。这些人跑回去后以其所得向同僚官兵炫耀，在衣食都发生困难的郑军中引起很大震动。姚启圣又将一些房屋馆舍装饰一新，摆上各种生活用具，门上大书郑军某某将领公馆，放风说某月某日某某将领将来投诚，已为其准备好住所，使郑军上下左右互相猜疑，人心浮动。姚启圣还制订了《招抚条例十款》，张榜公布，以使郑军官兵人人皆知。

姚启圣的招降活动对郑军官兵产生了巨大的瓦解作用，康熙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七一，康熙十七年正月庚辰。

十八年年初，镇守沿海要地的郑军五镇大将廖琠等即率部向姚启圣投诚，在此前后投诚的郑军官兵络绎不绝，据统计，数年间有10万以上的郑军先后降清，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军事行动。

二、清军剿抚兼施，郑经败逃台湾

（一）清军的军事进攻

清军在实施一系列招降措施的同时，也没有停止军事进攻，而是恩威兼施、剿抚并用，以政治瓦解与武力进剿相结合，全力将郑军赶回海岛。康熙十七年（1678年）七月，清军兵分三路：将军喇哈达出安溪，福建巡抚吴兴祚迂回至永春，福建水陆提督杨捷进抵河市（今晋江东北），对围困泉州的郑军实施合围。重新组建的福建水师也驶抵闽安遥相策应。八月，清军水师总兵林贤率舰队进攻定海（今连江东北），大败郑军水师。郑军水师中镇萧琛于惊慌失措之际谎报军情，称清军大队水师已自福州赶来。郑经担心厦门遭到攻击，急令刘国轩撤泉州之围，退守厦门。九月，郑经得知萧琛所报军情不实，怒斩萧琛，命刘国轩领兵进犯漳州。姚启圣与赖塔、耿精忠等率满、汉骑步协同作战，在漳州附近大败郑军，相继收复长泰、同安，后又连续重创郑军于江东桥、潮沟等地，迫使刘国轩退守海澄。

（二）清军扭转战局后的和谈

郑军在海澄深沟高垒，防守严密，而且海澄三面环海，清军无强大的水师部队，故一时难以攻克，双方又形成对峙局面。康熙十七年十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将军赖塔、提督杨捷等人，派漳州进士张雄前往厦门与郑经议和。为结束久拖不决的战事，将军赖塔在给郑经的亲笔信中竟不负责任地许诺说，如果郑经肯退守台湾，则“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郑氏可永远占据台湾，“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

市之日本"[1]。姚启圣在给郑经的公函中则劝郑经认清形势，幡然悔悟，解甲释兵，放弃对抗和分裂立场，使大陆与台湾的军民都不再遭受战争之苦。他授意张雄最低限度要得到海澄，始可与郑方言和。同时，姚启圣又指示清军耀兵于江东桥等地，向郑经施加压力，以配合谈判行动。张雄等人到厦门后，郑经以礼相待，但坚持认为海澄是厦门的门户，决不放弃。张雄等返回复命。姚启圣不甘心，又派泉州乡绅黄志美再赴厦门议和，要求郑军退出海澄，郑经仍持前议，将黄志美送还。姚启圣见郑经等人态度强硬，议和难以实现，经请示朝廷批准，于康熙十八年正月再度严厉推行迁界法，"福建上自福宁（府治今霞浦），下至诏安，赶逐百姓重入内地，或十里，或二十里。凡近水险要，添设炮台，星罗棋布，稽查防范"[2]。在加强经济封锁的同时，加大招降工作的力度，以进一步分化、瓦解郑氏集团。

五月，福建清军统帅康亲王杰书见郑军仍固守海澄，清军难以攻破，于是派使者苏埕到厦门与郑军谈判，并又一次允诺郑方如退回台湾，则可"照朝鲜事例，代为题请"。郑经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冯锡范仍坚持海澄是厦门门户，不可轻易放弃，最起码要将海澄作为双方可自由往来的公共区域。苏埕指出："欲照朝鲜事例，贵藩当退守台湾。凡海岛归之朝廷，以澎湖为界，通商贸易"，因此海澄不可能成为公共区域[3]。谈判陷入僵局，于是郑经派傅为霖为使者与苏埕一同赴福州面见康亲王杰书，作进一步商谈。最终由于郑方不肯放弃海澄而使谈判破裂。

（三）福建水师的重建和壮大

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清军在与郑军的作战中，一再处于被动不利境地，尤其是对盘踞海岛及濒海地区的郑军不能实施有效的

---

① 魏源：《圣武记》卷八，《康熙戡定台湾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9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一，第287页。

③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八，第292页。

打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水师部队。康熙十五年，当时的福建总督郎廷相向朝廷请求恢复和重建康熙七年遭裁撤的福建水师，设立水师提督和左右二路水师总兵。翌年，清政府恢复了福建水师建制，命海澄公黄芳世兼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十七年，新任福建总督姚启圣痛感清军水师力量的薄弱和缺乏训练，在当年九月给朝廷的上疏中指出：郑氏集团之所以能长期割据台湾，并威胁沿海地区安全，依仗的就是一支具有丰富海战经验、实力雄厚的水师部队。所以对郑军作战，“水战更重于陆战”。只凭借陆上优势进行陆战，无法彻底消灭郑军水师；要取得海上作战的胜利，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水师部队。他还指出，选任重臣为专职水师提督，使水师部队得到系统、全面的训练和正确的指挥，是福建水师建设的当务之急①。十一月，清廷复设福建水师提督。

康熙十八年四月，康熙帝任命精通海务、骁勇善战的原湖广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也是原郑军投诚将领）接替王之鼎为福建水师提督。同时，批准万正色携带岳州全部战船及水手到福建赴任，又从总督标下调拨1.4万人编入水师部队，从江苏、浙江选取战船百艘，从湖广拨发新式西洋炮20具，一同调往福建，加强福建水师的力量。此后，姚启圣、吴兴祚等人在福州等地又督造了大批战船，并招降了一部分郑军水师。由于上自朝廷、下至福建军政大员对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师部队已达成共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重建时间不长的福建水师迅速壮大，经过万正色的精心组织和训练，成为一支精锐善战的海上劲旅。

（四）清军水陆并进，郑经逃归台湾

至康熙十九年初，郑军在清政府军事进攻、政治瓦解和经济封锁的三重打击下，战斗力大为削弱。清军则大兵压境，水陆齐集，逐渐完成了收复沿海岛屿的战略布势。当年正月，万正色率

---

① 《姚启圣题为请复设水师提督事本》（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一日），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164～165页。

由240艘战船、28580名官兵组成的福建水师开至定海待命，并进行海上攻击作战演练，威慑郑军。郑经也调集所有水师部队，部署于海坛、南日、湄州等沿海岛屿及崇武（今泉州湾东北）、臭涂澳（今惠安东南）等海角，构成对清军水师的梯次防御。其中水师副总督朱天贵统领战船200余艘镇守第一线阵地海坛岛；水师总督林升率100余艘战船，坐镇臭涂澳，随时准备北上增援。

这时，清军福建前线将领在进攻时间上发生意见分歧。总督姚启圣和陆路提督杨捷认为，水师组建不久，实力不足以击败郑军。为了战则必胜，他们主张福建水师再训练一段时间，并补充新造战船，同时联络荷兰舰队，待荷兰船到，于半年之后再发起攻击。巡抚吴兴祚和水师提督万正色则认为，水师实力强盛，士气高昂，足以破敌，不必等待荷兰舰队；此时海上正值北风，清军占据上风的有利位置，若等到下半年，风向一变，就失去了战机。所以，他们主张立即向郑军发动进攻，并制订了作战方案：由万正色统水师兵分二路，一路攻海坛，一路迫近厦门；福建督、抚、提各率所部由陆路分别向郑军盘踞的厦门、海澄附近的海仓、松屿、浔尾、石浔等地同时发起攻击，与水师的海上行动相互配合，共歼郑军①。

由于联络荷兰舰队之事迟迟没有结果，吴兴祚、万正色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当年二月，万正色从定海率先向海坛郑军发动进攻，姚启圣、吴兴祚等也立即采取行动，从陆上夹击郑军，配合海上作战。万正色的水师在海坛港口与郑军展开激战，将朱天贵所率郑军及林升的援军驱赶至外洋，占领了海坛岛。与此同时，清军陆上部队封锁了海岸及各港口，安放大炮，阻止郑军船只靠岸。郑军水师无法停泊和取水，林升只好率领全部水师撤退至金门蓼罗湾。消息传到厦门，郑经及郑军诸将均认为水师是战

---

① 《姚启圣题为订期进攻海坛厦门事本》（康熙十九年二月），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198～207页。

败逃至金门，一时人心惶惶，郑氏集团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郑经传令刘国轩说："思明（即厦门）将危，海澄何用?"要其立即放弃海澄，回守厦门，共商进退之策。这时，守卫谢村、鼓浪屿一带的郑军将领陈昌降清，刘国轩闻讯，无心恋战，遂弃城、寨而走，退至厦门。厦门陷入一片混乱，郑军官兵或降或逃，留在城中的也只顾抢掠，无心作战。郑经与刘国轩、冯锡范等人见势不妙，乘清军包围圈尚未合拢，率数千残兵败将仓皇逃回台湾。在金门的郑军水师统领林贤也随后向台湾方向逃逸。朱天贵带领部分郑军水师窜至铜山，在姚启圣招降政策的感召下，举部向清军投诚。至此，清军全部收复了福建沿海地区及岛屿。

第四节　因剿寓抚，统一台湾

一、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

（一）康熙帝作出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

康熙帝从与台湾郑氏集团多次和谈失败的教训和郑经武力进犯大陆的威胁中认识到，以纯粹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实现统一，必须诉诸武力。康熙十八年（1679年），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尚在进行当中，康熙帝即已定下了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清实录》载："上欲乘胜荡平海逆，乃厚集舟师，规取厦门、金门二岛，以图澎湖、台湾"①。在清军收复金、厦等沿海岛屿，郑经率残部逃台后，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条陈"平海善后事宜"八款，其中之一即为"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②。但清廷却下达了部分裁减福建满、汉军队及水师部队的命令，康熙帝在给兵部的谕令中明确指示："台湾、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七九，康熙十八年二月甲戌。

② 《姚启圣题为评议平海善后条款事本》（康熙十九年八月），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218～221页。

澎湖，暂停进兵。令总督、巡抚等招抚贼寇。如有进取机宜，仍令明晰具奏"①。部分撤军和"暂停进兵"的指令并非放弃武力攻台的既定方针，而是尽快恢复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减轻人民的负担，做好攻台的各项准备，等待攻台的最佳时机。这体现了康熙帝对战争阶段、时机的精心把握和对渡海作战的慎重态度。

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病死于台湾，郑氏集团因权力之争内部矛盾激化，实力人物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杀死郑经长子郑克壓，拥立冯锡范之婿、郑经的次子郑克塽。郑克塽年仅 12 岁，郑氏集团的实际权力落入冯、刘二人手中。

当年五月，姚启圣将郑经去世、郑氏集团内讧的情况上报朝廷，并请求"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巢穴"②。康熙帝认为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已到，遂作出了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六月初七日，他在与大学士等会商后发布谕旨："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其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③。这一决策在清政府高层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应。当时反对武力统一台湾的人在朝廷中竟占据主流，他们均认为"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④。在前线将领中，对武力统一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即上疏力陈"台湾难攻，且不必攻"，连此时福建的最高军事长官宁海将军喇哈达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内阁学士李光地及施琅、姚启圣等人则支持对台湾使用武力。

从当时的情况看，清政府武力统一台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统一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康熙帝高瞻远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九一，康熙十九年七月辛酉。

② 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卷四。

③ 《清圣祖实录》卷九六，康熙二十年六月戊子。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戊寅。

瞩，把握时机，顺应时势，作出进军台湾的历史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二）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及获得“专征”权

康熙帝在定下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后，就开始考虑水师主将的人选问题。当时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虽然擅长水战，驭军有方，战功卓著，但却是武力统一台湾的坚决反对者，康熙帝果断地将其调离水师，改任福建陆路提督。这时，姚启圣与吴兴祚联名上疏保举施琅，内阁学士李光地也向康熙帝推荐施琅。李光地还提出施琅堪当水师提督的四条理由：一是施琅全家被郑氏所杀，与郑氏是世仇，可以信任；二是诸将之中惟有施琅最了解郑氏集团内部的情况，“无有过之者”；三是施琅智勇双全，“不是一勇之夫”；四是郑氏集团“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其气先夺矣”①。

经姚启圣、李光地等人的保举，康熙帝对施琅有了基本的了解和信任，但他还要当面考察一下施琅的才能，于是在内廷备宴，召施琅询问攻台之策。施琅侃侃而谈，从容分析了清郑双方的形势，并陈述其用兵方略。康熙帝听后十分满意，遂于康熙二十年七月作出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的重大人事决策。

同年十月，施琅到福建前线上任。但不久即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在攻台作战的出征时间、进军路线、兵力使用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致使攻台行动被一再延误。康熙帝为了改变施、姚二人争执不下、相互掣肘的局面，保证攻台行动的顺利实施，于二十一年十月作出决定，授予施琅“专征”权，由其一人全权指挥清军的攻台行动，姚启圣则坐镇福建，负责清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这样，就保证了清军攻台指挥系统的协调一致，使施琅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军事、政治才能，实施其既定的攻台方略。

（三）施琅的“因剿寓抚”战略方针及实施方案

---

①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一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03页。

攻台行动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统一大业的成败。施琅是清朝大臣中最坚决的主战派，一贯主张以武力统一台湾。他深思熟虑，潜心谋划多年，制订了“因剿寓抚”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核心是以战逼和，即以军事手段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尽量避免在台湾本岛引发战争。“因剿寓抚”的重点在于“剿”，军事进攻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努力寻求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二者的关系是先剿后抚、以剿促抚，也就是采取武力行动，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台湾郑氏集团接受和谈条件，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其具体实施方案分三个步骤：第一阶段，以水陆两栖部队攻占澎湖，消灭郑军有生力量。澎湖是台湾的海上屏障，控扼着当时台湾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海上通道。占领澎湖，大兵压境，使台湾门户洞开、贸易受阻，可形成威胁其生存的逼近威慑。第二阶段，占领澎湖后，引而不发，做好攻台准备。同时，派使者赴台与郑氏集团和谈，迫其向清政府投诚，实现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若和谈失败，郑氏集团负隅顽抗，就采取第三步行动，进军台湾本岛。以清军主力舰队直抵台湾政治中心承天府（今台南市）西面的安平港，实施正面牵制；同时派出两支精锐的快速舰队，一支向南封锁打狗港（今高雄市），一支向北封锁蚊港（即魍港，在今嘉义县境）和海翁窟港（今大安港），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在控制了台湾进出的主要港口水道之后，对台湾实施围困，并派人进一步招降郑氏集团，或促使其内部发生激变，不战自溃。如仍不能达到目的，则对台湾实施登陆作战，先扫清城市以外、村落之间的郑军，再攻取郑军困守的孤城，最后武力夺取整个台湾岛，彻底消灭郑氏集团。

二、澎湖决战

（见附图 9）

（一）双方战前准备

施琅在康熙二十年十月赴任福建水师提督之后，在争取“专征”权、排除反战派的阻挠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进行

战前准备。他上任伊始，即着手对福建水师进行整顿和加强，包括选拔得力将领、对水师官兵进行海上作战演练、修造可以经受海上风浪且具有一定攻击力的战船、监制海战及登陆所需器械等等。他不断派出间谍深入敌后，利用在郑军中的旧关系，进行策反和情报工作。他还派遣小分队乘快船到澎湖附近海域，对郑军进行佯攻和火力侦察，以弄清其兵力部署和防御设施等情况。

在充分了解敌情的基础上，施琅制订出攻台作战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台湾海峡的气候特点，选择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季风是台湾海峡最明显的气候特点。每年的冬季，风向偏北，风力强劲，海上风急浪高；夏季风向偏南，风力较小，海面也较平缓，但夏季又是破坏力极强的台风的多发期。对于当时以海风为主要动力的清军舰队来说，气候风向利用得当，则可借助风力，一帆风顺，为取胜创造有利条件；利用不当，判断失误，就可能遭到海风的袭击，重蹈康熙三年、四年攻台失利的覆辙。因此，根据海峡季风气候规律来选择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对于清军攻台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施琅凭借多年海疆活动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对海峡季风规律的掌握，决定把渡海作战的时机选在夏季的六月。施琅认为，冬季北风刚硬强劲，不利于舰队的航行和停泊。澎湖之战，未必能一战而胜，一旦舰船被海风吹散，就很难迅速集结，发起二次进攻。夏季的西南季风则比较柔和，海上风轻浪平，清军船队可编队航行，官兵可免除晕眩之苦，也有利于舰队集中停泊，实施下一步作战行动。同时，由于夏季多台风，按常规此季节不宜渡海，所以敌方防备定然松懈。此时发起攻击，可使敌猝不及防，取得兵法所谓“出不意，攻无备”的奇效。为避开台风的袭击，施琅选定夏至前后20余日为最佳渡海和作战时机，他凭着以往航海经验判断，这段时间中风浪最平和，台风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在进攻路线的选择上，施琅根据风向和已知的敌方防御情况，决定清军船队从铜山启航，乘六月的西南季风向东穿越台湾

海峡，首先夺取地处澎湖主岛以南、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屿(今澎湖望安乡)一带。这样就可获得船队的锚泊地和进攻出发地,并占据上风上流的有利位置,向澎湖发起攻击。攻下澎湖,扼敌咽喉,然后兵锋直指台湾,可顺利实施“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

郑氏集团方面，澎湖历来是其海上防御的重点。早在康熙三年郑氏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时，为防备清军攻台，就对明天启年间荷兰人留下的防御工事进行了恢复和增修，并部署了常驻部队作为海防前哨。康熙二十年，郑军主将刘国轩得知施琅的主攻目标是澎湖，便亲到澎湖部署防御。刘国轩在乘船仔细巡视了澎湖各岛之后，根据其地形、地势对已有的防御设施进行完善，在各险要之处又修筑了新的设施。他将郑军指挥部设在澎湖港湾内的娘妈宫（在今澎湖马公镇），建炮城守卫。在港口两侧的西屿、内外堑、牛心湾和鸡笼屿、风柜尾、四角山以及港口外的虎井屿、桶盘屿等处设立炮台，又在沿海岸便于登陆的地段修筑了短墙，设兵把守。这样，郑军水师与岸上炮台相互配合，在澎湖构成了以娘妈宫为核心的海岛防御体系，工事星罗棋布，坚如铁桶。康熙二十二年四五月间，刘国轩在得到施琅将于夏季乘南风进剿的情报后，即选拔台湾精壮敢死之士，并抽调佃丁民兵，将可动员的商船、文武官员私船改装为战船，一起调配、部署于澎湖。使澎湖守军增加到 1.7 万余人，大小船只约 200 艘，集中了郑军水师的精锐。刘国轩拉开架式，严密布防，企图在澎湖与清军决一死战，一举挫败其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

（二）清郑澎湖海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上旬，施琅将由福建水师和部分陆师官兵组成的清军水陆两栖部队集结于铜山，进行临战前的最后准备。他用米堆成“沙盘模型”，向将领们明确而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作战意图和方案，又下令在各战船的船帆上以大字书写本船主将的姓名，这样既便于指挥，又可根据其进退以定赏罚。施琅属下游击蓝理自愿担任破敌先锋，领取了“先锋银锭”。施琅于是犒赏全体将士，举行誓师仪式。清军攻台部队共有官兵 2 万余人，

战船230余艘，船坚炮利，士气昂扬。

六月十四日清晨，施琅一声令下，清军舰队肩负着统一台湾的历史使命，浩浩荡荡驶出铜山港，风帆鼓起，龙旗飞扬，向着东北方向的澎湖进发。

六月十五日申时（15～17时），清军舰队抵达澎湖西南的猫屿（在今七美乡）、花屿（在今望安乡）一带海面，与小股郑军巡海哨船相遇，敌未作抵抗即向澎湖主岛方向逃逸。清军按计划顺利夺取了八罩屿作为锚泊地，并派官员乘小船到郑军未设防的将军澳（在八罩之东）、南大屿（在澎湖列岛的最南端，即今七美屿）安抚岛民。

刘国轩虽得到情报说清军将于夏季发动进攻，并为此加强了澎湖的守备力量，但他与手下诸将均认为：施琅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而已，因为“六月风波不测，施琅是惯熟海务者，岂敢故犯突然兴师乎?”① 所以当他接到哨船的报告说清军庞大舰队已占据八罩海域，时刻都有可能向澎湖发起攻击时，大感意外，匆忙组织迎战。这时部下丘辉等向刘国轩建议乘清军刚到，立足未稳之际，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刘国轩则认为：澎湖处处设防，清军舰队无避风港湾可停泊，值此台风多发季节，一旦风起，清军无处容身，必然溃败，“此乃以逸待劳，不战而可收功也”②。他吩咐属下，坚守不出。

十六日晨，施琅率清军向郑军防御阵地发起进攻。刘国轩指挥郑军水师在澎湖港湾内排列横队，依托岸炮火力抵抗清军。清军船队由于行动不一致，将士争功，前后拥挤冲撞，队形发生混乱，部分战船被突然上涨的潮水冲近敌炮台，陷入郑船和岸上火力的包围之中。先锋蓝理被流炮击中，肚破露肠，仍拖肠血战，奋呼：“今日诸君不可怯战，誓与贼无生还!”③

---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九，第335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九，第336页。

③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九，第337页。

施琅见前军危急，驱船冲入敌阵，奋力救出被围战船，激战中眼部负伤，只得率军退出战斗。刘国轩看到清军退却，也不追赶，下令鸣金收兵。这时丘辉建议，乘清军新败，于当晚派水师袭击清军的锚泊地。刘国轩坚持“谨守门户，以逸待劳”，只等台风一起，清军将不战自溃。丘辉等怏怏而退。

十七日，施琅将船队撤回八罩屿进行休整。施琅久经战阵，初战失利后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一方面严申军令，赏功罚罪，以激励官兵的斗志；一方面组织诸将及时汲取失利的教训，并对下一步作战行动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和部署。总兵吴英根据清军战船数量占优势的情况，提出以五船围攻郑军一船，以“五梅花”阵破敌的计策，这样既可免除战船互相冲撞之患，又可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各个击破敌船。此议为施琅所采纳。

十八日，施琅派船先攻取了澎湖港湾外的虎井、桶盘二屿，扫清外围。十九日，施琅亲自乘小船到澎湖内、外堑等处侦察敌情及地理形势。二十、二十一两日，施琅派老弱残兵分两路佯攻内、外堑，以为示弱骄敌之计。

二十二日晨，经过充分休整和准备的清军向澎湖郑军发起总攻。施琅将清军船队分为四部分，其编成、任务是：施琅率 56 只大鸟船居中，编成主攻船队，正面进攻郑军主阵地娘妈宫；随征都督陈蟒等率 50 只赶缯船、双帆艍船居右，编成东线攻击船队，从澎湖湾口东侧的䴚内突入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配合主攻船队夹击娘妈宫；总兵董义等率 50 只赶缯船、双帆艍船居左，编成西线攻击船队，从湾口西侧的内堑进入牛心湾，为疑兵，牵制西面的郑军；其余 80 只战船为预备队，随主攻船队跟进。主攻船队 56 只战船，分为 8 股，每股 7 只，各作三叠，成梯次队形前进，施琅居中指挥。战斗一开始，双方均发炮对射，一时炮矢纷飞，烟焰蔽日，咫尺莫辨。接敌后，清军按照施琅“遇贼船一只，即会数只合攻”① 的命令，变换“五梅花”阵，

①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十，第 344 页。

集中兵力击敌。战斗进行中,南风大发,波涛汹涌,清军处于上风头,诸船借风势扬帆疾进,奋勇杀敌。正酣战间,东、西线船队赶来,与主攻船队一起合击郑军。刘国轩见其军十丧七八,败局已定,匆忙率残部31只战船从澎湖北面的吼门逃往台湾。施琅见海上作战取胜,遂令清军分抚诸岛,招降守岛郑军。防守娘妈宫、内外堑、风柜尾、四角山、将军澳、西屿头等处的郑军孤立无援,纷纷卸甲投戈,向清军投降,澎湖列岛全部被清军占领。

二十二日一战,自辰时(7~9时)至申时(15~17时),激战一天,清军大获全胜,毙敌将军、副总督以下大小将领340余人、兵士1.2万人,生俘大小将领165人、兵士4853人,击毁、缴获战船194只。清军在十六日、二十二日两次作战中,共有329人阵亡,1800余人负伤。

澎湖海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一次罕见的海岛攻防战役。从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看,清军在数量和质量上略占优势,郑军则是依托坚固防御阵地,以逸待劳,双方可谓各有优长,实力相当。最后的结果是,清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全歼郑军精锐,攻占澎湖列岛的辉煌战绩,这与清军主将出色的指挥艺术是分不开的。

在渡海时间的选择上,施琅决定在风浪较平缓、同时又是台风多发季节的六月渡海,这样,一来保障了清军舰队在发起攻击前的安全航行和停泊,二来可出奇制胜,达成战役突然性。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

在进攻战术的运用上,施琅采取了多路分兵,奇正并用的战法,对几个方向上的防御之敌同时发起进攻,有效地打破了郑军的防御体系,使其顾此失彼,左支右绌,失去了整体防御的威力。

在进攻时间的掌握上,施琅为把台风袭击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抓住战机,速战速决,只用了七天时间就干净、彻底地歼灭守敌,取得了澎湖海战的胜利。

此外,郑军主将刘国轩在防御上过于消极保守,没有利用清军初抵澎湖、远航疲惫和初战失利、主将负伤等时机,向清军发起主动进攻,而是收缩于港湾之内,一味死守,将取胜的希望寄托在台

风等自然因素之上，这也是导致郑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澎湖海战是清郑双方带有决战性质的一次作战。经此一战，郑军精锐丧失殆尽，军心动摇，士无斗志；清军占有澎湖，士气旺盛，为统一台湾本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三、恩威兼施，和平统一台湾本岛

（一）施琅的政治攻势

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大兵压境的有利态势。这时，施琅为贯彻“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下令暂停军事进攻，一面休整部队，补充弹药给养，做好进军台湾的准备；一面发动政治攻势，推动台湾问题向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为在澎湖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他严禁杀戮，张榜安民，宣布免除三年的租税徭役，使澎湖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对台湾的居民也不能不有所触动。他实行优待战俘的政策，为战俘疗伤治病，并允许投诚及被俘郑军官兵返回台湾与亲人团聚。这些人回到台湾，将其所见所闻辗转相告，产生了巨大影响。施琅向台湾军民发布了《安抚谕诚示》，宣扬清政府宽大投诚者的政策。他又派原刘国轩的副将曾蜚赴台做刘国轩的工作，促其劝说郑克塽等人向清政府投诚。

施琅与郑氏集团有杀父之仇，全家有数十口人丧于郑氏之手，但他能摒弃家仇，以国事为重。施琅对刘国轩、冯锡范的部下郑重表示：“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① 这对消除台湾军民的“恐施”、“恐清”心理起了很大作用，表现出施琅不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武将，而且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卓越的政治才能。

（二）兵不血刃收台湾

---

①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一一，第705页。

施琅对台湾郑氏集团的招抚策略，康熙深表赞许，并立即向台湾郑氏集团颁布了赦罪诏书，严正指出：郑氏集团割据台湾，人民饱受其苦，这种局面应尽早结束。郑克塽等人若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不但以往罪过全部赦免，而且将得到清廷的优待①。

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内部围绕今后的出路问题有三种意见。一是将领黄良骥提出，率台湾现有军队、战船渡海征服吕宋，以吕宋为基业，图谋东山再起。此议得到一部分人的赞同。二是刘国轩主张向清政府投诚。他认为澎湖失守，军心民心已经瓦解，台湾随时都可能出现大乱，只有归顺清廷，求得宽恕，才是唯一出路。三是冯锡范反对降清，他先是支持黄良骥等人攻取吕宋的主张，后又企图分兵死守台湾，顽抗到底。最后，在内外压力的逼迫下，刘国轩的主张占了上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闰六月初八日，郑克塽派人与清军谈判，表示愿意投诚，但又提出留居台湾的要求。施琅严辞拒绝，并提出：刘国轩、冯锡范必须亲自前来面降，将台湾的人口、土地全部移交清政府管理；郑氏集团人员遵旨剃发，迁入内地，听从清政府安置。七月初五日，郑克塽等人表示完全接受清方的条件，向清政府上表投诚。和谈取得成功，为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铺平了道路。

同年八月十三日，在郑氏官员的引导下，施琅率军从台湾的鹿耳门（今台南市安平港北）入港登陆。施琅沿途察看形势，感叹进入台湾的通道“港道纡回，地势窄狭，波涛湍急，可谓至险至固”②，庆幸能兵不血刃地平定台湾岛。十八日，施琅主持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宣读了皇帝的赦诏，郑克塽等遥向北京方向叩头谢恩。然后，施琅带领清军顺利接管了台湾全境。至此，台湾如离散多年的游子，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丙申。

② 施琅：《靖海纪事》下卷，《舟师抵台湾》，第110页。

四、清政府巩固和维护统一的措施

（一）统一台湾后的善后措施

统一台湾后，施琅代表清廷进行了一系列善后安抚工作。他亲撰祭文，前往祭祀郑成功庙；对投诚的郑氏集团官员以礼相待，不加任何歧视和侮辱；对郑军投诚官兵发给粮食和俸饷，军官陆续送往大陆，士兵愿意归农的许其归农，愿意继续当兵的加入清军。为保护台湾的百姓，他整肃军纪，严厉禁止一切损害台湾人民利益的行为，公布了《谕台湾安民生示》、《严禁犒师示》等，恢复台湾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以往的苛捐杂税实行减免，制止原台湾地方官员犒军扰民。

此外，清政府也兑现诺言，对投诚的郑氏集团成员进行封赏，封郑克塽为一等公爵，刘国轩、冯锡范为伯爵，俱编入汉军上三旗。刘国轩功高，被重用为天津总兵。其他文武官员及士兵也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这些善后措施对于消除台湾军民的疑惧心理，稳定台湾的社会秩序，巩固统一的成果产生了巨大作用。

（二）清廷关于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与在台建府设防

就在清政府举朝欢庆数十年海患一举荡平之际，关于台湾的弃留问题在清朝高层官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将台湾居民迁徙到内地，然后放弃台湾，退守澎湖。他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台湾与大陆远隔重洋，清政府对其鞭长莫及，一旦受到外敌入侵，难于救援，丧师失地，有损国威。而且上万名官兵长守孤岛，难免再次形成反叛割据的局面。二是派兵驻守台湾，每年要耗费大量钱粮，必然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三是台湾不过是一个海中孤岛，没有开发利用的价值。因此台湾应及早放弃，甚至可以任凭荷兰殖民者等外国势力重新侵占。与这种损害国家利益，将祖国领土拱手让与外人的错误论调相对立，一些有见识的文武官员，主张在台湾驻兵设防，对台湾行使管辖权。特别是施琅，他深知台湾的弃留是关系到国家能否

长治久安的大事，于当年十二月上《恭陈台湾弃留疏》①，对台湾的弃留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保留台湾的主张：

首先，指出了台湾在海防上的重要性。他说：台湾虽远在海外，但“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堪称祖国东南之屏障，直接关系着江、浙、闽、粤四省的安危，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对台湾弃而不守，不但“海盗”等匪徒会以之为巢穴，扰乱海疆，更为严重的是若听任荷兰等外国势力占据台湾，他们必以此为立足点，威胁海疆，窥伺内地，沿海诸省的安全将无法保证（施琅在后来的《海疆底定疏》② 中又指出：中国东南地区安全的最大隐患在海上而不在陆地。陆上的威胁有形可察，易于消除；海上的威胁则难以预测，应该防微杜渐）。针对放弃台湾、只守澎湖的错误主张，施琅指出：“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则所以固澎湖。台湾、澎湖，一守兼之。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这就是说，放弃台湾则澎湖即如大海中的孤舟，面积狭小，驻兵有限，而且其地距台湾近，离大陆远，根本守不住。只有台、澎并守，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形成防御纵深，才能确保东南沿海的安全。因此施琅认为，对台湾“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其次，阐述了台湾经济上的发展前途。他说：台湾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植被丰茂，盛产硫磺、水藤、糖蔗、鹿皮等，各种日用品基本可以自给。而且台湾“舟帆四达”，极利于开展海上贸易，经济必然会繁荣发达。所以施琅认为台湾“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是一个富饶的宝岛，海防的重镇，是皇天赐予大清朝的，决不可轻易放弃。

第三，对台湾的驻防制度、粮饷供应等问题提出了建议。他

---

① 施琅：《靖海纪事》下卷，第 120 页。

② 施琅：《靖海纪事》下卷，第 132 页。

主张在台湾设总兵，在澎湖设水师副将，实行三年一易的换防制度。驻防部队可以实行屯田，寓兵于农，争取就地解决粮饷问题，不给内地造成过多的经济负担。

施琅对台湾地位、作用和海疆安全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因而很快受到了康熙帝及众多王公大臣们的重视。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正月，康熙帝谕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①。一锤定音，结束了清廷上下对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当年四月，清政府在台湾建台湾府（下辖凤山、诸罗、台湾三县），隶属福建省。又采纳施琅的建议，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 8000，分为水陆八营；在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 2000，分为二营。

清政府又于康熙二十二年底至二十三年先后进行了展界和开海，即宣布废止对沿海各省的禁海、迁界法令，安排被迁离故土的沿海百姓返回家园，恢复正常的农业、渔业生产和海上贸易活动。这些措施促进了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密切了两岸的贸易往来和交流，对巩固统一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五节　统一台湾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一、统一台湾的战略意义

清政府统一台湾并在台湾建府设防，其战略意义重大而又深远。从历史、文化和地缘的角度来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台湾正式设立府县等官方机构，使台湾成为中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则自康熙二十三年始，此举无疑

---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从政治上进一步确定了大陆与台湾之间不可分割的隶属关系。

从军事上看，清政府在台设立府县并长期驻兵守卫，是确保台湾和大陆沿海地区安全的重大措施，同时也对整个中国国防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使台湾地区不再遭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台湾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被西方殖民者视为进行海上贸易和扩张行动的必争之地，成为他们垂涎的对象。同时，台湾孤悬于大海之中，其防御能力受到很大限制，没有大陆强有力的支援，迟早会重遭被外国势力侵占的厄运。如前所述，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荷兰殖民者重占台湾的野心一直没有放弃，曾屡次三番派遣舰队来华，采取各种手段企图达到其侵略目的。虽然荷兰舰队三次来华最终都铩羽而归，未能得逞，但靠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起家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决不会因此打消侵占台湾的念头。要使西方殖民势力最终放弃觊觎台湾的野心，只有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清政府在完成统一台湾的历史使命后，在台湾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辖机构，部署了常驻的防御力量，并以大陆雄厚的实力为后盾，台湾的安全才得到了根本的保障。

第二，巩固和加强了我国东南地区的海防。清王朝在台湾、澎湖部署永久性防御力量，使台湾地区与大陆形成一个防御整体，大大巩固和加强了中国东南地区的海防，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东南海疆。从 16 世纪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相继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并先后侵占我澳门和台湾，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威胁。自从清政府统一台湾，在台湾建府设防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的 150 多年时间里，西方殖民者再也未敢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及岛屿发动大规模的入侵。

第三，国家的统一和东南海疆的安定，使清政府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北方沙俄的入侵和威胁。17 世纪中期，沙俄乘清军与明军作战，黑龙江流域防务空虚之机，派兵越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先后占领了雅克萨、尼布楚等地。清王朝多次要求和谈均被置之不理。清廷统一台湾并在台建府设防后，东南海

疆的安全有了保障，因此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对沙俄军队的自卫反击作战。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在康熙帝的亲自谋划和指挥下，清军取得了收复雅克萨的胜利，从而制止了沙俄对我国东北的进一步侵略，使这一地区获得了较长久的安宁。几年后，清政府又征服了得到沙俄支持的噶尔丹部，粉碎了沙俄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颠覆、分裂活动，巩固了我国的西北边防。

二、统一台湾战略策略运用的经验教训

综观清政府统一台湾战略策略运用的经验和教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有机配合。和平统一可避免给双方造成巨大损失，是统一策略中的上策。但决不能放弃武力，一味求和。强大的武力和武力行动是统一的基础和后盾，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必要保障。实施武力统一同样也不应放弃任何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清政府充分利用武力行动和军事威慑的作用，因剿寓抚，以战逼和，最终和平统一台湾本岛的历史经验是成功的。

第二，高层和谈与争取中下层工作双管齐下。高层和谈的目的是感召对方决策者率众投诚，其作用是由上而下的；争取中下层的目的是瓦解对方的社会基础，孤立极少数上层顽固分子，推动局势发生有利于统一的变化，其作用是由下而上的。两项工作双管齐下，相辅相成，才能形成全面而有效的对台政治攻势。

第三，及时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取得对台斗争主动权的关键因素。没有确立或没有及时确立海上力量的优势，陆上实力再强大，也只能望洋兴叹，难免在策略和行动上陷入消极被动。有了海上优势，掌握了主动权，统一的进程才能缩短，统一的方式也更加灵活，获得更大的选择余地。

第四，审时度势，全面把握统一的条件和时机。政治基础是否稳定，经济实力是否雄厚，军事手段是否强大，统一时机是否

成熟，都关系到统一行动的成败。条件和时机不具备，盲目的行动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负作用。一旦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就应果断决策，以正确、可行的战略和策略指导统一行动，实现统一目标。

第九章　清前期的军事制度

第一节　建立、健全各级军事机构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定都北京，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并逐步统一了全国。清承明制，其军事制度，是参照明代的一套办法制订的。另一方面，清王朝又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满、汉、蒙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封建政权。因此，满族自身的军事传统与中原汉族军事传统相结合，则成为其军事制度的明显特点。伴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强化，军事上的高度集中统一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一、中央统兵体制及军事机关

清代中央军事领导体制，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二是掌管军事政令的机关，三是与军事有关的其他机关。

（一）最高军事决策中枢——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亦称"国议"，是国家最高权力中心，也是最高决策机构。成员皆为满洲贵族，汉人不得参政。这一制度由努尔哈赤创立，他特设理政听讼大臣5人与八旗主旗贝勒共议国政。当时旗主世袭，旗兵归旗主私有。因此，凡军国政要皆由旗主共议。这种制度，分散了皇帝的权力，不利于皇帝集权，所以从皇太极开始，在利用这种共议国政制度的同时，也开始了为皇帝集权而进行斗争。皇太极将八旗主旗贝勒封为亲王，将议政人员扩大到所有的贝勒甚至贝子，又令每旗增设议政大臣3

人。皇太极死后，八旗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对皇权威胁甚大。顺治初，为了适应消灭南明和镇压农民军频繁战事的需要，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对军政大事进行决策的中枢。为了集中兵权，顺治帝亲政后对旧体制开始革新，将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定为上三旗，由皇帝亲统，并将固山额真改称都统，梅勒章京改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章京称佐领，昂都章京称总管，表示皇帝是天下共主。从此，皇帝大权独揽。康熙帝亲政后进一步改革，为了削弱以鳌拜集团为代表的诸王势力，设立了"南书房"，作为他改革政要的机要秘书班子。这样，诸王所掌五旗，经过不断地更移世袭、递降、分封，旗主的权力渐被削弱。各旗都统等官员，也为皇帝所任命，掌管旗务，八旗之军政亦渐移于都统。实质上王大臣会议已逐渐演变成参议会议，从而向加强封建主义集权迈进了一大步。雍正年间，设立皇帝的御用机构军机处，使军权完全操在皇帝一人之手，议政王大臣会议大权旁落，徒具虚名，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终于被最后废除。

（二）秉承皇帝旨意办事的特殊中枢机构——军机处

军机处，一称"办理军机处"，全称则为"办理军机事务处"，设立于雍正八年（1730 年）①。

军机处本是在对噶尔丹策零用兵期间设立的临时机构，初称军机房，雍正十年铸给印信，始正式用"办理军机处"之名。雍正十三年十月，军机处一度被取消，乾隆二年（1737 年）恢复后，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 年）四月才最后被废止。

军机处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既无衙署，又无专官。军机处

① 军机处设立的时间，有雍正七年、八年、十年诸说。十年说，以正式颁发印信为依据，忽略了在此之前称为"军需房"、"军机房"的初始阶段。七年说，从西北用兵算起，有资料可为佐证，目前尚难断然否定此说。但现存军机处专项档案《汉军机处档案总册》自雍正八年始，乾隆四十八年弘历在上谕中称"自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五一），其他可为旁证的资料亦很多，相对说来，八年说更为可信。

位于宫中乾清门西侧，隆宗门内，军机大臣办公之处名为军机堂。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均为兼职。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枢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京堂等官员中特简，无定员，少则三人，多则六七人，偶有多达十余人者，其中满、汉各一人为“领班军机大臣”，又称“军机领袖”或“首枢”。初入军机者，称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有见习之意，须待一二年后奉旨实授，始可去掉“学习”二字。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枢曹”，为军机处办事官员，均为内阁中书、六部、理藩院等处官员兼充，初无定员，嘉庆四年（1799 年）定满、汉章京各两班，每班 8 人，共 32 人。每班设领班章京 1 人。

军机处的职掌，是“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①。其具体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第一，负责皇帝谕旨的撰拟和奏折文书的处理。军机大臣秉承皇帝的旨意，拟写谕旨，经皇帝阅定后发出。凡公开宣示中外的，由内阁发出，称“明发谕旨”；涉及机密事件或个别谕行的，由军机大臣用寄信的形式密发，称“寄信谕旨”，简称“廷寄”、“字寄”。官员的奏折，皇帝阅后亦交军机大臣处理。

第二，常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皇帝出巡，或遇有战事，凡山川地势、道里远近以及兵马钱粮等，均需考查确实，一旦皇帝查询，或绘图，或缮单，即时呈递。

第三，办理皇帝交办的有关军事谋略、施政方略等军国大政。交军机处议奏或密议的，军机大臣讨论后要提出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酌。交军机处会同有关衙门合议上奏的，一般也由军机处主稿。

第四，重要文武官员的补放任免，由军机大臣开列名单，奏交皇帝选任。

第五，审办重大案件。

---

① 《清史稿》卷一一四，《职官志》一，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第六，稽查各部院汇奏事件。各省督抚年终汇奏事件，经各部院衙门查核后，汇送军机处复加考核。

第七，军机大臣奉旨以“钦差”身份，往各地考查或处理军政事务。

军机处办事的特点，一是缜密，它靠近内廷，办理的均为军政大事，又有严密的规章制度，从而保证了机密性；二是快速，军机处人员精干，凡所承办的事务，一律当日办完，从不耽搁，皇帝的谕旨，廷寄的，根据内容的重要程度决定递送的缓急，日行从300里至800里不等，这样高的办事效率，保证了皇帝的决策得以迅速地贯彻执行。

军机处的设置，是清代军事指挥系统的重大改革，军机处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和作用，削弱了内阁的职权，使皇帝“乾纲独揽”，标志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三）掌管军事政令的机关——兵部

兵部，为中央六部之一，是管理全国军事及武职官员任免的机关。兵部最早设于天聪五年（1631年），以贝勒1人总理部务，下设承政4人（满洲2人，蒙、汉各1人），参政8人，启心郎1人，笔帖式无定员。其后，设官屡有变动。顺治元年（1644年），改以满、汉尚书主持部务，下设满汉左右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雍正元年（1723年），以大学士兼理部务，皆特简，无常员。乾隆年间，兵部额设职官为：尚书，满、汉各1人；左右侍郎，满、汉各1人；堂主事，满4人，汉1人。下设武选清吏司、车驾清吏司、职方清吏司、武库清吏司。

1、武选清吏司

掌“武职除选、封荫及征伐、训诰，颁其政令”。设郎中，满洲3人，蒙、汉各1人；员外郎，满4人，汉2人；主事，满、汉各1人。分设都统房、升调科、将材科、诰敕科、架阁科及山东、广东、福建、浙江、河南、江南、云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科等机构。

2、车驾清吏司

掌“驿传邮符，中外马政”。设郎中，满3人，汉1人；员外郎，满2人，蒙古1人；主事，满、汉各1人。分设驿传科、脚力科、马政科、马档房、递送科等机构。

3、职方清吏司

掌“天下舆图，以周知险要；叙功、核过，以待赏罚黜陟”。设郎中，满4人，汉2人；员外郎，满3人，蒙、汉各1人；主事，满、蒙各1人，汉2人。分设承发科、督漕科、关引科、黄旗科、白旗科、红旗科、蓝旗科及直隶甲、两江甲、川陕甲、两广甲等机构。

4、武库清吏司

掌“兵籍、戎器，乡会、武科，及编发戍军”。设郎中，满2人，汉1人；员外郎，满、蒙各1人；主事，满、汉各1人。分设督学科、编军科、俸粮科、五府科、营科等机构。

兵部管理行政事务的机构有会同馆、捷报处、督催所等。会同馆掌京师驿传事务。捷报处掌接各省递送的奏折并转交奏事处进呈，以及将皇帝批阅后的奏折和军机处寄发的谕旨加封后发送各地。满档房掌管兵部档案，呈办兵部满、蒙官员的升补差委。汉本房掌缮写满、汉字题本。司务厅掌收、办外省衙门来的文书，以及稽查提、塘官的勤惰。督催所掌督促武选、职方等四司承办的文件。当月处掌监堂印，签收在京各衙门及铺递文件，分各司办理①。

兵部本为最高军事机关，但自雍正年间设军机处之后，凡用兵大事，皆由军机处秉承皇帝意旨直接办理，兵部已无实权，“兵部之职，不过稽核额籍，考察弁员而已”②。实际上，兵部仅为管理全国绿营兵籍和武职官员的机构，八旗则主要由八旗都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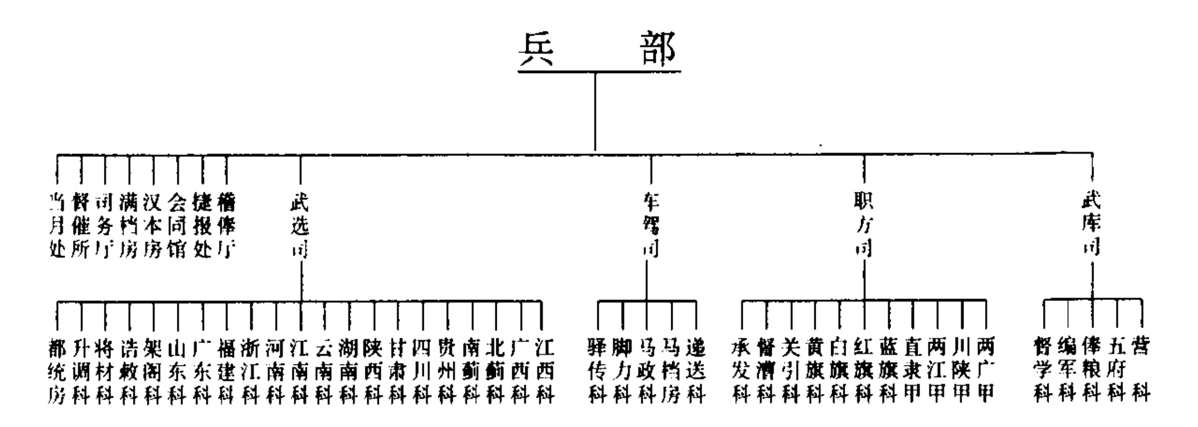
---

① 乾隆《大清会典》卷五九，《兵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四七，《吏部·书吏·经制额缺·兵部》。

② 永瑢：《历代职官表》卷十二，《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

衙门管理。

附：兵部机构简表



盛京兵部设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是盛京五部中最后设立的一个部。部设侍郎 1 人，郎中 2 人，员外郎 4 人，堂主事 4 人，笔帖式 12 人，驿站正副监督各 1 人，均为满人。分左右二司，“分掌驻防、驿递、简核军实之事”①。

（三）掌管军事的其他中央军事机构

1、八旗都统衙门

八旗都统衙门是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衙门的总称，系掌管旗务的最高机关。满、蒙、汉军八旗，旗各设都统（从一品）1 人，副都统（正二品）2 人，“分掌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之政令，以宣布教养，厘诘戎兵，厘治土田，稽核户口”②。为办理上述事务，雍正元年（1723 年），谕令建立八旗都统衙署办公。八旗都统、副都统下辖：参领（正三品），满、汉各旗各 5 人，蒙古各旗各 2 人，合共 96 人；副参领（正四品），员额同上，掌颁都统、副都统之政令以达于佐领；佐领（正四品）、骁骑校（正六品），员额相同，计满洲各 681 人，蒙古各 204 人，汉军各 266 人，掌佐领下之政令。各旗另设随旗行走散秩官，无定员，以供本旗之使用。八旗各都统下还设有印务参领、印务章

---

① 《清朝通典》卷二五，《职官·盛京五部官属》。

② 永瑢：《历代职官表》卷四，《八旗都统》。

京、印务笔帖式，以掌“章疏、文移、案牍及翻译、行遣之事。”①

八旗都统的职掌有二：一是管理军务，即“厘诘戎兵”，包括旗营编制增减，挑选兵丁，操军事训练，管理兵器、马驼，平时奉命驻防稽察，战时率兵作战；二是管理旗务，诸如户籍、田宅、教养等。

八旗都统衙门的内部机构还有：印房，折房，俸饷房，银库，派差房，督催所，户口房，马档房，档案库，米局等，各自分掌印信、折奏、俸饷、文件、档案等事务。

八旗设有值年旗，负责办理八旗共同事务。雍正年间，先令八旗各都统轮流值月，后又设立值月公署。乾隆十六年（1751年），因值月制度办事迟延，推诿成习，遂改为值年制度，故称之为“值年旗”。设值年旗大臣 8 人，于都统、副都统内特简，年终更换。值年旗大臣于值年旗公署办公，掌八旗会理之事。下设值年旗参领、章京，掌章奏文移；笔帖式，掌翻译。

此外，还设管理旧营房大臣、管理新营房大臣，掌统辖的营房官兵；管理官房大臣，掌八旗官房之事；管理左右翼铁匠局，掌两翼四局（每翼各二局）推补匠役额缺及匠役之赏罚。

2、太仆寺

太仆寺是掌管全国马政的机关。顺治元年（1644 年）设立，附设于兵部武库司，掌两翼牧场的行政管理，当年年底裁撤。次年二月复设，至雍正三年（1725 年）建署成为独立机构。初设卿满、汉各 1 人，少卿满 2 人、汉 1 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以后，派大臣 1 人兼管，至嘉庆十三年（1808 年）停派。以后规定卿满、汉各 1 人（从三品），少卿满、汉各 1 人，员外郎满、蒙各 2 人，主事满、蒙各 2 人，满主簿 1 人，笔帖式 16 人，经承、厅书、司书 9 人，合共 38 人。其内部机构，设左右二司及主簿厅。两司掌考核左右二翼厂马之数而计其功过、赏罚

① 永瑢：《历代职官表》卷四，《八旗都统》。

等事。主簿厅掌本寺章奏、文移及档案事务。太仆寺下辖边外（内蒙古地方）左右两翼马厂①。

3、警跸护卫机关——侍卫处

清朝在入关前即有“侍卫”。侍卫机构初称“领侍卫府”，后定名为“侍卫处”。顺治元年（1644年），定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6人，内大臣（从一品）6人，散秩大臣（从二品）无定员。一等侍卫（正三品）60人，二等侍卫（正四品）150人，三等侍卫（正五品）270人，蓝翎侍卫（五、六品）90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以武进士之娴骑射者，拔置侍卫”②。雍正五年（1727年）定：武进士一甲第一名，授一等侍卫，第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10人为三等侍卫；三甲选10人为蓝翎侍卫。此外，尚有主事、署主事、协理侍卫班领、侍卫班领、署班领、侍卫什长等官。至于御前大臣、御前侍卫、御前行走等名目，皆为常日侍值者，因靠近皇帝，必须从侍卫内特简。

侍卫处的主要任务是选拔八旗兵组为亲军，由领侍卫内大臣统领，内大臣、散秩大臣翊卫扈从。协理、主事、笔帖式分掌章奏文移。侍卫掌环卫周庐，轮流侍置。平时分两翼宿卫：乾清门、内右门、神武门、宁寿门为内班，太和门为外班。巡行驻跸如宫制，朝会、祭祀出入则宿卫道路。

二、地方统兵体制及军事机关

清代地方统兵体制，与中央统兵体制相对应，也分两大系统：一是八旗系统，由八旗都统、将军统属，其下设八旗驻防衙门，称为军府制；二是绿营系统，由总督、巡抚、提督统率，其下设总督衙门、巡抚衙门、提督衙门，称为督抚制。整个地方军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八八，《太仆寺》；《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三，《兵·马政》。

②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六，《侍卫处》。

事调遣指挥大权，集中于皇帝。

（一）督、抚、提衙门

清代的督、抚制度是在明代督抚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沿袭明制，又有所不同。如明代总督、巡抚均领有兵部尚书、侍郎或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职衔，此为本官；总督、巡抚到地方是钦差大臣身份，是临时性的。清代，因尚书、侍郎、都御史等皆有定额，不能多加任命，所以总督、巡抚虽照例带这些衔称，但皆为加衔，不为实官。一般来说，清代的总督总管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政与民政，巡抚则是一省的地方行政长官。大致是军事归总督，民事归巡抚，但巡抚也兼管本省的一些军务，未设总督的省份更是如此，而提督则属于听命于总督并节制各总兵的专职武官。督、抚、提及其以下的总兵、副将等皆设吏，办理绿营的各种事务。

1、总督衙门

总督（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者为正二品，兼兵部尚书衔者为从一品）掌一省或数省的文武、军民，总理戎政，保卫边疆。全国共设总督 8 人，即直隶（辖今河北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分，驻保定）、两江（今江苏、安徽、江西，驻南京）、闽浙（今福建、浙江、台湾三省，驻福州）、湖广（今湖南、湖北，驻武昌）、陕甘（今陕西、甘肃，驻兰州）、四川（驻成都）、两广（今广东、广西、海南，驻肇庆）、云贵（今云南、贵州，驻昆明）总督。各总督设置先后不一，统辖范围大小不同，前后亦有变化，其应否兼尚书衔，由吏部请旨确定。

总督为辖区内的最高军事统帅，除节制所辖省区内提督、总兵及其所统辖的部队和巡抚所统领的直属部队外，还有直属部队，称为“督标”。督标一般有中、左、右三营或中、左、右、前、后五营。有的省还设城守营、水师营或海防营，兵额多少不一。总督衙门内设有书吏、笔帖式等，承办各种事务。

2、巡抚衙门

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者，从二品，加兵部侍郎衔

者，正二品），是总管一省地方政务的长官。其职掌名义上以民政为主，实际上兼理军民，与总督无大差别。在不设提督的省份，为便于节制本省各镇总兵，巡抚则兼提督衔。除直隶、四川以总督兼理外，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设巡抚1人①。江苏巡抚驻苏州，其他各省巡抚均驻省城。其职责除民政外，与军事有关的是督理粮饷、主考武科。巡抚直属部队，称为"抚标"，标下一般分左、右二营，有的设城守营或捕盗营，兵额多少不一。巡抚衙门设有书吏、笔帖式，承办各项事务。

3、提督衙门

提督（从一品）是所在省绿营的最高武职官员，也是清代汉人武职中职位最高的衔级，其职责是"统辖本标官兵及分防营汛，节制各镇，阅军实，修武备，课其殿最，以听于总督"②。乾隆朝提督设置如下：山东、山西、河南、江西不专设，而以巡抚兼任；陆路提督9人，即直隶（驻古北口）、福建（驻泉州）、陕西（驻固原）、四川（驻成都）、广西（驻柳州）、云南（驻大理）、贵州（驻安顺）各1人，甘肃2人（驻甘州、西安）；水师提督1人，即福建（驻厦门）；兼辖水陆提督4人，计江南（驻松江）、湖广（驻常德）、广东（驻惠州）、浙江（驻宁波）各1人③。这18人中，除巡抚兼任的4人外，其他14人分别听各省总督节制。提督所辖提标，一般有五营，个别省份是四营或三营。此外，还设有城守营及所属各协营。提督下辖各官及提标兵

---

① 乾隆《大清会典》卷四，《吏部·官制·外官》。甘肃巡抚后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裁。

② 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五六。

③ 永瑢：《历代职官表》卷五六。安西提督后移驻巴理坤，再移驻乌鲁木齐。嘉庆六年（1801年）置湖北提督驻襄阳；湖广提督改称湖南提督。八年，安徽巡抚兼提督。十五年，设广东水师提督，驻虎门。参见《清史稿》卷一一七，《职官志》四。

额，多少不一。

提督下设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不同等级的官职，并设有不同等级的办事衙署。

（二）八旗驻防衙门

八旗驻防衙门是八旗兵驻守地方的办事机构，所设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等官，统率所属驻防地之旗兵，并都设有衙署办事。初设于顺治二年（1645 年），后成定制。地方所驻八旗、绿营两大系统，在统率体系上有明确划分：属八旗军政及民政方面，皆以将军以下各官领之，而纯属地方行政及绿营兵事务范围者，则由督抚处理。

1、将军衙门

将军（从一品），为旗兵的最高长官，与加尚书衔的总督同，因驻防各地方，也称为"封疆大员"；与总督驻在一个省区的，如会同奏事，要以将军领衔。其实权虽不如总督，但地位则高于总督。全国共设驻防将军 13 人，分驻盛京（今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绥远城（今呼和浩特）、江宁（今南京）、福州、杭州、荆州、西安、宁夏（今银川）、伊犁、成都、广州等地。驻防各地将军的职衔，都冠以所驻地名，如盛京将军、吉林将军等，并且以所辖地区大小及地理位置的重要程度，分别规定所属官兵额数。各将军衙门，一般设主事、笔帖式、助教、书吏，有的设典吏、司官、外郎，办理所属事务。有的衙门内又设有内部组织，如绥远城将军衙门下设左司、右司、印房三个单位，伊犁将军衙门下设印房、粮饷处及驼马处。各将军衙门所统八旗军，一般有马军，有步军，东北及福州、杭州、广州等处，还兼有水军①。

2、都统、副都统衙门

都统（从一品），官阶与将军同。驻防都统 2 人，分别在张家口、热河（今承德）置衙门，办理所属事务。张家口都统，因

---

① 《清史稿》卷一一七，《职官志》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四四、五四五，《兵部·官制》。

兼辖察哈尔游牧之事，故一般称“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兼管木兰围场及游牧之事。二都统衙门都设有笔帖式等官办事。

副都统（正二品），其驻守地区有将军者，由将军兼辖，无将军兼辖者，则主衙署全面工作。无将军兼辖的副都统有 4 人，分驻直隶密云，山海关，山东青州，甘肃凉州（今武威）。属将军兼辖的副都统 29 人，其中奉天（今沈阳）、锦州副都统 2 人，归盛京将军兼辖；吉林、宁古塔（今宁安）、伯都讷（今扶余）、阿拉楚喀（今黑龙江阿城）、三姓（今依兰）副都统 5 人，归吉林将军兼辖；黑龙江城（今黑河市爱辉）、墨尔根（今嫩江）、齐齐哈尔副都统 3 人，归黑龙江将军兼辖；江宁、京口（今镇江）副都统 2 人，归江宁将军兼辖；杭州、乍浦副都统 2 人，归杭州将军兼辖。以上各地副都统，除与将军同城者外，各统率一部分官兵，防守所驻之城，防务汇总于兼辖之将军。此外，福州、宁夏、成都各 1 人，荆州、西安、伊犁、广州各 2 人，分别归同城驻防将军兼辖，与将军共同统辖所属驻军，办理本城防务①。

城守尉、防守尉等官，亦分设衙门办事。

第二节　八旗兵制的完善

按民族分编是清代军队编制的重要原则，也是清代军制的特点。清定鼎北京后，正规军有八旗和绿营两种，称经制兵，因其有一定的数额限制，所以又称额设制兵。此外，还有“土兵”、“乡兵”、“团练”等，都是在一定地区临时招募，就地使用，而且随时可以解散，所以不是经制之师，也不是全国性军队。

一、八旗常备兵制的建立

八旗兵原是一种兵民合一的体制，“出则备战，入则务农，

① 参见《清史稿》卷一一七，《职官志》四。

兼以收拾兵器"①。清军入关后，形势的变化，对八旗军队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清王朝已经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要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兵民合一”的八旗进行改造，建立一支专业性的正规化的军队。第二，清帝已是主宰全国的君主，有力量在经济上对八旗人员给予“优待”，保证供应，使其不事生产，专业为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八旗组织失去生产职能，八旗军队从过去兵民合一的体制改变为常备兵制。

新建立的八旗常备兵制，规定八旗内凡年在 16 岁以上的男丁，都要登记于丁册，然后按照兵丁类别，定出名额，在各佐领下“挑补”，并实行按民族分编的原则，编入满、蒙、汉八旗兵相应的单位。例如，满洲、蒙古兵编入亲军的每佐领下 2 人，编入前锋营的每佐领下 2 人，编入护军营的每佐领下 17 人，鸟枪护军每佐领下 6 人，等等。在各佐领下“挑补”的兵丁，分别立营训练，称为额兵。额兵之外有“随甲”，是各级八旗官员的随从，按官员品级分拨，如领侍卫内大臣满洲都统有随甲 8 名，蒙古、汉军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有随甲 6 名，等等。再剩下的为“余丁”。“余丁”和未满 16 岁的“幼丁”，可挑补“养育兵”，编入预备役。在余丁和幼丁人数不足时，年龄可放宽至 9 岁以下，而且还可从本参领、本旗下统一挑补，从而扩大了八旗兵的兵源。

从顺治八年（1651 年）开始，确定以镶黄、正黄和正白旗为上三旗，余为下五旗，凡事以上三旗、下五旗为序。这样的区分，对八旗兵制有直接影响，皇帝是上三旗的旗主，直接统辖上三旗，皇帝的宿卫也只能由上三旗子弟组成的亲军担任。

皇权的加强，削弱了八旗王公贵族的权利，加强了皇帝对八旗兵的控制。顺治十七年（1660 年）将八旗的统率官由满语称谓改为汉语称谓，即将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

---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敕谕副将高鸿中稿》。

真分别改称为都统、副都统、参领和佐领。从此，八旗的内部事务，上归京师八旗都统衙门统一管理，实质是听命于皇帝一人，而不再归旗主私有。雍正八年（1730年），清世宗胤禛不通过旗主就撤销了17名护军守卫王府的任务，令其守卫皇宫，八旗旗主只能听命。这说明皇帝的意志已成为至高无上的，八旗贵族不得干涉。此外，皇帝又陆续分封王子、王孙到下五旗，使各旗不再单独由本旗旗主一人掌握。以上这些变革，削弱了旗人与本旗王公贵族的依附关系，使他们由旗主的私属转变成皇帝直接统治下的子民。这样，当他们挑补成为八旗兵士后，也就成为皇权的忠实工具。

八旗兵的人数，入关前，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共有611佐领。入关后，由于人口增加和战事的需要，至康熙年间新增满洲360佐领，蒙古89佐领，汉军108佐领。合共京师八旗有1168佐领（包括半分佐领），驻防八旗800多佐领，全国共有近2000佐领。按每佐领平均出兵100人计，约20万人，达到八旗兵数的顶峰①。雍正以后，八旗佐领数有增有裁，总的趋势逐渐减少。

二、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

八旗兵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兵力约各占一半。

（一）禁旅八旗

驻守京师的八旗兵称为禁旅八旗，任务是守卫京师，宿卫扈从，遇事则派往各地。禁旅八旗中负责直接扈卫皇帝的称“郎卫”，除“郎卫”之外负责拱卫京师的称“兵卫”。郎卫和兵卫分属不同的系统。郎卫主要由侍卫和亲军营担任，属侍卫处管理，由领侍卫内大臣统辖。兵卫中的骁骑营属八旗都统统辖，其他如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一，《佐领》；魏源：《圣武记》卷一一，《武事余记·兵制兵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9页。

前锋营、护军营、火器营、健锐营和步军营设统领统率，不受八旗都统制约。

禁旅八旗中各营的任务和编组等情况如下：

1、亲军营

亲军营为禁卫军之一，附属于侍卫处，职掌为宿卫扈从。亲军从上三旗满洲、蒙古中选拔，每佐领下2人，共995人，以亲军校75人、委署亲军校77人领之。亲军中每旗选60名随侍卫班入直，余皆随护军营护军一体直宿差遣①。

2、前锋营

前锋营为禁卫军之一，其职掌是平时在紫禁城内外轮流值班守卫；皇帝简阅，充列首队，介护军以列阵；皇帝出巡，则警跸宿卫，于御营一二里外立前锋旗以为门户，列帐守卫。

前锋营最早设于天聪年间。天聪八年（1634年），以巴牙喇营前哨兵为噶布什贤超哈，顺治十七年（1660年）定汉名：噶布什贤超哈为前锋营，噶布什贤超哈噶喇依昂邦为前锋统领，噶布什贤章京为前锋参领，并设前锋侍卫、前锋校等官。营分左、右两翼，左翼由镶黄、正白、镶白、正蓝4旗官兵组成，右翼由正黄、正红、镶红、镶蓝4旗官兵组成。营设前锋统领2人统之，左、右翼各1人，掌本翼前锋之政令。下设协理事务前锋参领2人，前锋侍卫2人，前锋校4人，笔帖式4人，掌章奏文移；前锋参领16人，前锋侍卫16人，委署前锋侍卫8人，前锋校96人，分掌所辖营众。营兵由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挑选精锐2人组成，共1770人。其中一半人习鸟枪，称“鸟枪前锋”，设什长领之；另一半称“一般前锋”，设队长领之。什长、队长均在前锋兵内选充，每旗各6人②。

3、护军营

护军营为禁卫军之一，其职掌是平时守卫紫禁城内外，稽察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〇，《兵·禁卫兵》。

② 永瑢等：《历代职官表》卷四五。

出入；皇帝出巡，则任扈从宿卫。

护军营始于天聪年间的巴牙喇营，顺治十七年定汉名为护军营。初以上三旗护军守卫宫禁，下五旗护军护守王公府第，遇行围出征则八旗一律分拨。雍正七年（1729年），定八旗护军均司禁卫。营兵由八旗满洲、蒙古兵中选拔精锐充任，每佐领17人，共约1.5万余人。设护军统领，每旗1人，掌护军之政令。其下设协理事务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每旗各1人，护军校、笔帖式每旗各2人，掌案牍文移。护军参领，满洲每旗10人、蒙古每旗4人，副护军参领同护军参领，护军校、署护军参领均每旗7人①，分掌所辖营众。

4、圆明园护军营

圆明园护军营全称是"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护军营"，由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圆明园内务府三旗护军营组成，为禁卫军之一，其任务是护卫圆明园，保证皇帝驻园以及出入园途中的安全。

圆明园护军营组建于雍正二年（1724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职制基本确定。八旗护军营设掌印总统大臣1人，总统大臣若干人（由王公大臣内简充，无定员）；下设营总8人，护军参领8人，副护军参领16人，署护军参领32人，护军校、副护军校各128人，笔帖式40人，分别按旗率领。内务府三旗护军营设营总1人，护军参领3人，副护军参领3人，署护军参领3人，护军校9人，副护军校3人，笔帖式4人，分别按旗率领。圆明园护军营兵员，由护军、马甲和养育兵三部分人组成。初设时仅3216人（内八旗护军营护军3000名，养育兵96名；内务府三旗护军营护军120名），其后不断增加，乾隆间增至4400余名②。

---

① 乾隆《大清会典》卷九八，《护军统领》。另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〇、《历代职官表》卷四五，护军校为"八旗满洲、蒙古每佐领下各一人"。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一，《兵·禁卫兵》。

5、步军营

步军营为禁卫军之一，负责京师地区的守卫、门禁、缉捕、巡夜、稽查、断狱、编查保甲、执行禁令等事，兼有卫戍、警备、警察、法院的性质。

顺治初，以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步兵合组为步军营，设步军统领统辖，绿营巡捕营另以兵部职方司汉主事督之。康熙三十年（1691 年），定步军统领兼辖绿营巡捕营，遂成定制。巡捕营原设中、南、北三营，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增设左、右二营，遂称巡捕五营。步军营设统领 1 人，其全衔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统辖八旗步军、绿营巡捕五营官兵。嘉庆四年（1799 年），增设左、右翼总兵各 1 人，协助步军统领。

步军营分八旗步军营和绿营巡捕五营两部分，乾隆朝总兵力约 3.1 万人。八旗步军营约为 2.1 万人，设翼尉，左右翼各 1 人；协尉、副尉，每旗各 3 人；捕盗步军校，每旗满洲 3 人，蒙古、汉军各 1 人；步军校，每旗满洲 21 人，蒙古、汉军各 8 人；委署步军校，每旗满洲 5 人、蒙古、汉军各 2 人。另设城门领、城门吏、门千总和信炮总管、司信炮官等。八旗步军营官兵按八旗方位分汛驻守，稽查内城；捕盗步军校掌缉捕盗贼，稽查奸宄；城门领、城门吏、门千总等，掌内城九门、外城七门门禁；信炮总管、司信炮官，掌守白塔信炮。

巡捕五营官兵分汛防守外城及京郊地方。乾隆四十六年定兵额 1 万人，其中马兵 4000 人，战兵、守兵各 3000 人。设副将 1 人，专管中营（嘉庆二十二年添设中营参将 1 人）；参将 4 人，分管南、北、左、右四营。游击、都司、守备、千把总、外委等官若干。嘉庆四年定，副将为"提督中军"，中营为"提标"；左翼总兵管南、左二营，右翼总兵管北、右二营①。

6、骁骑营

① 永瑢：《历代职官表》卷四六；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五六。

骁骑营为禁卫军之一，是八骑兵最基本的作战部队。

天聪八年（1634年），以随固山额真（旗主，后定汉名为都统）行营马兵为阿礼哈超哈，此为骁骑营之始。顺治十七年（1660年），定汉名为骁骑营。骁骑营之马兵称为“马甲”。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下选马甲20人，汉军每佐领下选马甲42人①，共约2.89万人。京营八旗的骁骑营满洲、蒙古、汉军各自为营，共24营。汉军骁骑营附有枪营、炮营和护炮的藤牌营。驻防八旗则满、蒙、汉混合编组为营。

7、火器营

火器营为禁卫军之一。掌京师守卫，皇帝出巡则备扈从。

汉军八旗向以善用火器著称，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即于每旗专设一营操练鸟枪②。八旗满洲、蒙古以骑射为本，康熙三十年始选满洲、蒙古习火器之兵，组建火器营。营兵原设鸟枪护军、鸟枪马甲和炮甲三种，八旗满洲、蒙古每佐领下鸟枪护军3人，鸟枪马甲4人，炮甲1人，共7395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裁鸟枪马甲，每佐领下增设鸟枪护军3人，遂以每佐领下鸟枪护军6人、炮甲1人为定制。其后，又增养育兵1650人，连同鸟枪护军5200余人、炮甲880人，总名额达7800余人。该营原在城内，乾隆三十八年一半移至城西蓝靛厂，为外火器营，留在城内的为内火器营。内外火器营设掌印总统大臣1人（乾隆四十一年设，于总统大臣内特简），总统大臣若干人（初无定员，雍正六年定置6人，以王、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兼任），掌全营之政令。内、外二营各设翼长1人（乾隆三十九年设），署翼长营总1人，营总3人（乾隆二十八年设），鸟枪护军参领4人，副鸟枪护军参领8人，署鸟枪护军参领16人，分掌本营训练事务。内火器营分枪营和

① 《历代职官表》卷四四、《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均作41人。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丙午，中华书局影印本。

炮营，分习枪、炮；外火器营专习鸟枪。官兵除枪、炮之外，亦练习步射、骑射，外火器营还兼在昆明湖教习水战。武器配备，鸟枪护军每人鸟枪 1 杆，内火器营炮营每旗子母炮 5 位①。

8、健锐营

健锐营为禁卫军之一，是专习云梯的特种兵部队，故又称"健锐云梯营"。其职掌是平时守卫香山静宜园，皇帝巡幸派官兵扈从，负责行宫巡逻、救火等事。

健锐营组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 年）。乾隆十三年，因征金川"久而弗告其功"②，弘历遂命于八旗前锋营和护军营中挑选年壮而勇健者千人，操演用云梯攻碉之技，不久即派赴金川。次年返京后，即在香山专设一营，名健锐营，分左、右两翼。兵力初建时为 1000 人，乾隆十八年达 2000 人，另有养育兵 100 人(养育兵陆续增至 800 余人)。营设掌印总统大臣 1 人，总统大臣若干人（无定员，于王、公、大臣内特简），掌全营之政令。左、右翼，各设翼长（初为翼领）1 人，署翼长前锋参领 1 人，前锋参领 4 人，副前锋参领 8 人，署前锋参领 16 人，前锋校 50 人，副前锋校 20 人。营内有"番子佐领"1 个，其成员为征金川带回的番民，设佐领 1 人，防御 1 人，骁骑校 2 人领之。训练内容以操练云梯为主，也练习马步射、鸟枪、驰马、跃马、舞鞭、舞刀等。另外，还设前锋 1000 人，赶缯船 32 只，练习水战，水师教习由天津、福建水师营选送③。

（二）驻防八旗

分驻京师以外全国各地的八旗兵为驻防八旗。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四三，《兵部·官制·火器营》；卷一一六六，《火器营》。另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一、《历代职官表》卷四七，火器营裁鸟枪马甲、设营总等，事均在乾隆二十九年。

② 弘历：《实胜寺碑记》。

③ 永瑢：《历代职官表》四七；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六八，《健锐营》。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开始派遣八旗兵驻防直省各地。当年三月驻防济宁，六月驻防西安，十一月驻防江宁、杭州，以后逐步遍及全国各地，并形成制度。

驻防之始，主要是出于战时的需要，后来则主要是为了镇慑地方。驻防地点和兵力最初都不固定，时设时撤，后来才逐渐固定下来。驻防八旗的任务，平时防守各战略要地，保卫边海防，并监督绿营，战时则整军参战。

驻防八旗由满、蒙、汉八旗官兵合组为营，官兵旗籍仍隶属在京之原佐领，旗务归于在京各八旗都统，防务归于兵部，日常的管理训练等则统于驻防将领，或统于将军，或统于都统、副都统，或统于专城的城守尉、防守尉，其下设参领、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职。

驻防八旗大致可按地域分为东北驻防、畿辅驻防和直省驻防兵。

东北驻防，从天聪年间即开始驻兵于牛庄、盖州（今盖州市），以后又相继在盛京、锦州、宁远（今兴城）、兴京（治今新宾西南老城里村）、辽阳、金州、旅顺、宁古塔、齐齐哈尔、珲春、瑷珲等61处驻防，兵力38661人，在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之下分别设副都统或总管、城守尉、防守尉等统率。

畿辅驻防，从顺治初开始，先后在独石口、张家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天津、热河（今承德）、密云等27处驻防，兵15844人，分别设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统率。

各直省驻防兵，分设于江宁、西安、太原、德州、杭州、福州、荆州、开封、伊犁等27处，分别设将军、副都统、城守尉等统率。

以上八旗驻防兵共105处，兵约11万人①。驻防八旗的兵种除步、骑外，齐齐哈尔、瑷珲、墨尔根、呼兰、吉林乌拉（今吉林市）、金州、福州、广州等地设有水师营。

---

① 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二～卷一九一统计。

驻防八旗兵力部署，以重点驻防和便于机动为原则。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是当然的驻防重点。在畿辅和直省，则形成了以下四条驻防线：

一是由北京经绥远（今呼和浩特）、宁夏至凉州的京畿、长城驻防线。京畿地区，由近及远，于昌平、顺义、三河、良乡、玉田、宝坻、雄县、滦州（今滦县）、霸州、永平（今卢龙）、沧州、保定等地派八旗驻防；又沿长城，东起山海关，于罗文峪、冷口、喜峰口、独石口、古北口、张家口、右卫（今山西右玉）等地驻防，形成对北京外围多层次的环形防御地带，也是自北京向全国各地机动兵力的战略要地。

二是由德州经开封至西安和杭州的黄河、运河驻防线。此为全国中心地区，所以驻防也较密。自京师沿运河经德州、镇江，到杭州的八旗驻防，早在清初已经部署完毕。康熙年间，除进一步加强运河沿线驻防外，又从德州，经开封到西安，设置了黄河驻防线。

三是由江宁经荆州至成都的长江驻防线。顺治时先于江宁、镇江设将军驻防。康熙时，又于荆州、成都设八旗驻防。荆、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廷十分重视，驻军阵营也较大。

四是由杭州经福州至广州的东南沿海驻防线。于杭州、福州、广州相继设八旗驻防，兵力也较多。

雍正和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叛乱之后，又向归绥、宁夏、凉州、庄浪（今甘肃永登）和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派八旗驻防，沿海也增加了天津、浙江乍浦两个驻防点，从而构成了全国各地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八旗驻防。

第三节　绿营兵的建立和发展

一、绿营的建立和任务

（一）绿营的建立

绿营兵又称绿旗兵，是清军入关后以归附的明军为基础组建

的军队，因其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而得名。“国初定八旗之色，以蓝代黑，黄、白、红、蓝各位于所胜之方，惟不备东方甲乙之色。及定鼎后，汉兵令皆用绿旗，是为绿营。”①于是，绿营兵成为清朝的两大正规军之一。

清廷组建绿营兵的原因有四：第一，八旗兵数量少。入关之初，满、蒙、汉八旗兵大约20万人左右，同数十万兵力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和南明军队作战，显然不敷分配。为了适应在广阔的地域内与人数众多的敌军作战的需要，就必须再建一支部队。第二，八旗兵不但兵数过少，而且只长于骑射，在东北大平原对明军进行野战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但到了关内，特别是南方的河汊水网和西南的崎岖巉岩地区，则无用武之地。第三，“以汉制汉”是满洲贵族征服和统治中国的成功经验。清军从东北打到关内，定鼎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出谋画策，依靠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所率天助、天佑等汉军的征战来实现的。为了征服全国，清朝统治者自然愿意招募汉人，另组军队。第四，清军入关后，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仅靠八旗兵驻防几个重要据点，难以应付各地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事变，要想稳定形势，巩固对全国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顺治六年（1649年）南赣巡抚刘武元向清廷上疏说：“国家之大事在兵，得一省必镇定一省，连络声势，既不烦于远调，呼应即灵，又不难于速灭，而久安长治之策，端在于此。”②清廷采纳了这一建策，在明朝于关山要隘设镇戍守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组建绿营兵，使其同八旗兵一样，成为清朝镇压人民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二）绿营的任务

清朝建立绿旗兵，开始主要是为了在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和在征服全国的战争中弥补八旗兵力的不足。统一了全国并建立起

---

① 嘉庆《大清会典》卷三五，《绿旗兵》。

② 《皇清奏议》卷三，刘武元《安攘十计疏》。

满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之后，绿营兵和八旗兵一样，则主要用作镇压人民的工具，以及镇守边疆及其他差役等。归纳起来，绿营的任务主要有三项：

第一，镇守地方，防止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从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在长达20年的清初统一战争中，绿营兵同八旗兵一样，成为清王朝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此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各种形式的反清斗争并没有止息。于是在内地18省的镇守，监视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则成为绿营兵的重要任务。

第二，戍守海边防。绿营兵不但参加了平定准噶尔上层贵族分裂叛乱的战争，而且被派赴新疆、蒙古和西藏等边疆地区屯戍。乾隆末以后，东南沿海各要地绿营兵也是加强防务的重要力量。

第三，杂务。如催护粮船的漕标各营，河工防汛的河兵，治塘工的塘兵，以及解犯护饷等差的差役兵和京师巡捕营、守陵各营等。

绿营兵的任务十分广泛，兼有军队、警察、差役、河夫等多种性质。其中有些是与八旗兵共同完成的，有些则完全由绿营兵担任。

二、绿营的营制和兵额

绿营的编制序列，除在京师的巡捕五营（又称京营）隶属于步军统领外，驻守在各直省的，则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统辖：由总督统辖的称为“督标”（其中由内河总督统辖的称为“河标”，由漕运总督统辖的称为“漕标”），由巡抚统辖的称为“抚标”，由提督统辖的称为“提标”（四川、新疆由将军统辖的称为“军标”），由总兵统辖的称为“镇标”。标以下设“协”，由副将统辖；协以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辖；营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外委分别统辖。全国有总

督10人，巡抚15人，提督14人，总兵60人，副将119人，参将163人，游击375人，都司429人，守备812人，千总1653人，把总3414人①。

绿营军区的划分以地形和作战需要为原则，与行政区划并不一致。乾隆朝划分为11个军区，分别是：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两江（辖江苏、江西、安徽）、闽浙（辖福建、浙江）、湖广（辖湖南、湖北）、陕甘（辖陕西、甘肃）、四川、两广（辖广东、广西）、云贵（辖云南、贵州）。军区最高军事统帅为总督，但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只统辖本部标兵，不是军区级军事统帅。提督为一省绿营的最高军事统帅。在编有水师的省区，提督或水陆兼辖，如江南、湖广、浙江、广东；或水陆分设，如福建。巡抚本为地方行政长官，但山东、山西、河南3省因不设总督，而以巡抚兼提督衔为最高军事统帅；江西巡抚兼提督衔，虽可节制本省各镇，但因设有总督，还要受总督的节制。

镇是军区以下绿营的最大编制单位，全国共设66镇②。各军区设镇多少不一，山东、山西、河南各设2镇，湖广、四川各设4镇，直隶、两江各设5镇，陕甘设7镇，两广设9镇，闽浙、云贵则各设13镇。就省份来说，同样是设镇多少不一，安徽最少，仅设1镇；多者，浙江5镇，广东7镇，福建8镇，云南9镇。设镇多少，皆由所在地区的战略地位所决定。

绿营兵部队按其所属，区分为标、协、营、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直属部队为“标”，其任务是居中镇守，作战时则为机动力量。副将所统属的为“协”，其任务是协守本镇之要害。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统属的为“营”，其任务是分守本镇各地城邑关隘。千总、把总所统属的为“汛”，其任务是备御道路、边境。标是绿营的主力，以集中屯驻为原则，其下一般编为2～5营，分别以中、左、右、前、后为番号。协从总督、

① 乾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一一二，《营制》。

② 乾隆《大清会典》卷六三，《兵部·职方清吏司·营制》。

提督、总兵分出，其下或编2营，或编3营，也有不编营的。营从总督、巡抚、总兵、副将分出，也有从标营、专营分出的。标与协、营虽无从属关系，但对其有统属的权力。汛从协、营分出，是绿营最基层的单位，以分散配置为原则，每汛兵自数人至数十人不等，“通计天下守路防汛之兵，不下二十余万”①，约占绿营兵总数的三分之一。

绿营兵兵额，往往因时而异，历朝都不相同，但大体保持在60万左右。顺治朝绿营兵数已不可考。据《大清会典》、《中枢政考》等书载，历朝绿营兵数为：康熙朝578204人，雍正朝584899人，乾隆中期648345人，嘉庆朝661873人，道光初638215人②。应该指出，实际兵数要少于以上数字，这是因为：第一，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前，绿营兵将领自提督至千把总，按规定都有虚缺的亲丁名粮，约6.5万人③，这都包括在绿营兵总数以内。第二，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谕令裁虚缺名粮以增补实兵，法定的虚缺不复存在，但由于政治腐败，“积弊相沿，仍属有名无实”④，绿营兵实数仍比兵额要少许多。

乾隆《大清会典》指出：“凡营制，相都邑之冲会、山用之险要，设戍置兵，立之将帅，授之节制，以绥靖嘉师，控驭遐裔。”⑤ 这说明，绿旗营的建制是由地理形势的重要程度决定的。所以，各军区绿营兵额多寡悬殊，以乾隆中期为例：闽浙最多，达10.8万余名，占全国绿营兵数的17%。以下依次为陕甘、两广、云贵、两江、直隶、湖广、四川、山西、山东，河南最少，

① 孙嘉淦：《汛兵授田疏》，《清经世文编》卷七二，《兵政》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03页。

② 除道光朝据《中枢政考》外，其余各朝均据该朝《大清会典》，参见罗尔纲：《绿营兵志》，1984年版，第62页。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兵制》。

④ 王先谦：《东华录》嘉庆朝卷三七，嘉庆十九年二月丁亥。

⑤ 乾隆《大清会典》卷六三，《兵部·职方清吏司·营制》。

只1万余名，占2%①。这是因为，闽浙区地处东南海疆，海防重要，除陆军外，还设有水师，所以兵数独厚。陕甘为边防重地，虽无水师，兵数仍占第二位。两广区的广东与闽浙区情况相同，所以驻兵也较多。河南属腹心地区，地形平旷，易于步骑调动，驻兵可以稀疏一些。

各镇编制不同，其兵额也多少不一。如山西的大同镇，本标及所辖各协、营兵18687人，为行省各镇中兵数最多、营制最密的一镇。云南永北镇仅本标3营，兵1953名，下无协防，为行省各镇中兵数较少、营制较疏的一镇②。这是由于大同镇是北京的藩屏，必须配备较多的兵力，而云南虽地处边远，但处于四川建昌镇和云南鹤丽镇、楚姚镇之间，相安无事，兵额不必太多。同样，协、营的疏密和编制的大小，也是如此。

三、绿营的兵种

绿营区分为马兵、步兵和守兵三种。从担负的作战任务看，马兵、步兵皆为巡防征战之兵，即战兵，与驻守城寨之守兵不同，故马兵、步兵与守兵对称为战、守；从执行作战任务的方式和装备看，步兵和守兵都不骑马，与骑马作战的马兵不同，故马兵与步兵、守兵对称为马、步。

马兵、步兵、守兵不是单独组营，而是混编成营。清初兵部曾有马三步七的规定，福建巡抚张学圣提出异议，认为各直省地方，“有水、有陆、宜步、宜马之不同”，应“听各该省督、抚酌量地方情形，通融裒益”③，兵部接受其建议，确定各省马、步、守三者之比例，根据地形而定的原则。马兵以驰突见长，便于机动，有利于远

① 参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209页。

② 乾隆《大清会典》卷六三，《兵部·职方清吏司·营制》。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档案，转引自罗尔纲：《绿营兵志》，第218页。

距离作战，特别是在广袤的平原及沙漠地带，最能发挥其优长，为宜用骑之地。所以，陕西、甘肃等地所编马兵比例较大，达十分之六。至于崇山峻岭、河汊水网地带，骑兵行动受到限制，则宜用步兵，如广西、江西、安徽等地马步比例为马一步九或马二步八。

绿营中还编设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水师虽不骑马，但同样有马、步、守之分，这是因为马、步、守又是绿营兵等级的区分，马兵的地位、待遇最高，步兵次之，守兵最低，遇有缺额，亦按此顺序拔补，即步兵从守兵内拔补，马兵从步兵内拔补。

第四节　俸禄和兵饷

俸禄和兵饷是封建国家为豢养官将和常备军所开销的固定经费，是统治阶级维系国家行政权力和军事职能正常运转的必要前提。清军入关以后，随着常备兵制的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军队的俸禄和兵饷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

一、武官俸禄

俸禄是清政府发给官将的银、米，其中包括正俸、恩俸、养廉、津贴等项。这项制度，大致确立于顺、康两代，至乾隆中叶渐趋完备。

正俸是法定的正式俸给，因经年计算，又称年俸。文武官职的俸禄，按品级（即从正一品、从一品到正九品、从九品，共九品十八级）支给。各品级武官的正俸由俸银和禄米二项构成。在京武官的俸银，自正、从一品的 180 两① 至从九品的 31.52 两；禄米，自正、从一品的 180 斛至从九品的 31.52 斛，分别有差。在外各省的武官俸额也是按品级颁发，但与在京武官不同，其品位少，俸额低。俸额自正一品的 95.812 两、从一品的 81.6942

① 清制，16 两为 1 斤，1 两合 37.3 克。

两，至七品的12.471两，分别有差。在外武官无禄米，但却另给“薪银”，自一品的144两至七品的33.0352两，多少有差①，参照《清朝文献通考》卷八九列表如下：

附：武官俸禄表

数额 类别 品级	在京武官			外省武官		
	俸银（两）	禄米（斛）	职务举例	俸银（两）	薪银（两）	职务举例
正一品	180	180	领侍卫内大臣	95.812	144	
从一品	180	180	满、蒙、汉八旗都统	81.6942	144	驻防将军、都统、提督
正二品	155	155	满、蒙、汉副都统	67.576	144	驻防副都统、总兵
从二品	155	155	散秩大臣	53.458	144	副将
正三品	130	130	包衣护军统领	39.34	120	参将、城守尉
从三品	130	130	包衣骁骑参领	39.34	120	驻防协领 、游击
正四品	105	105	副前锋参领、佐领	27.394	72	防守尉、都司
从四品	105	105	包衣佐领	27.394	72	察哈尔副参领
正五品	80	80	步军校、监守信炮官	18.76	48	守备
从五品	80	80	委署护军参领	18.76	48	守御所千总
正六品	60	60	亲军校、前锋校	14.9648	33.0352	营千总
从六品	60	60	委署步军校	14.9648	33.0352	卫千总
正七品	45	45	城门吏	12.471	33.0352	把　总
从七品	45	45	七品典仪	12.471	33.0352	
正八品	40	40	八品荫监生			外委千总
从八品	40	40	委署亲军校、委署前锋校			
正九品	33.1	33.1	各营蓝翎长			外委千总
从九品	31.5	31.5	太仆寺马厂委署协			额外外委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四二，《国用·俸饷》。

在京武官主要是八旗系统，待遇较高，而外省武官主要是绿营系统，待遇普遍较低。以俸银数额为例，同是正、从五品，正、从六品，在京武官比外省武官要高出3倍。

正俸之外，有时皇帝特令给予加俸，谓之“恩俸”，因往往双倍于正俸赐给，又称“双俸”。养廉银也是加俸的一种，是在官员薪俸低薄时的一种津贴。文职官员和武职官员在雍正年间已发给养廉银，绿营武职不发养廉银，但有分扣兵丁名粮作为得项，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始照文职例发给养廉银，其数目如下：提督岁支2000两，总兵1500两，副将800两，参将500两，游击400两，都司260两，守备200两，千总120两，把总90两，经制外委、千总、把总18两①。养廉银约为官员俸薪等费的2～3倍。雍正以后也列入武官的正常收入。此外，还有公费、出征俸饷等。

二、兵饷制度

兵饷是清代俸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按月发给士兵银、米，故称月饷。顺治初年始定饷章，康、雍、乾三朝随军制的变化略有修改补充，遂成定制。清代兵饷包括八旗兵饷和绿营兵饷两大部分，虽银、米兼支，因兵种不同又略有差异。

（一）八旗兵饷

八旗兵饷分为在京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情况。在京八旗由亲军、前锋、护军、马甲、步兵和相当数量的工匠组成。其饷糈，由于各兵种的不同，而分别支给不同数额的银和米。

从顺治初开始，八旗前锋、护军、领催、骁骑，每名月给饷银2两，匠役1两，后屡有变动。康熙初，大规模的战事已经结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八旗兵饷亦有所增加，至康熙二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二，《户部·俸饷·外官养廉》。

十五年（1686年）形成定制：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每名月给饷银4两，骁骑、弓匠、铜匠每名月给饷银3两，皆岁支米48斛；步军领催每名月给饷银2两，步军每名月给饷银1.5两，铁匠1两至4两，皆岁支米24斛；炮手月支饷银2两，岁支米36斛；由觉罗补前锋亲军护军者，月加饷银1两；养育兵月支银1.5两，不给米。官畜马驼，每马驼月给豆草折价银3两①。

除饷银、饷粮外，还有"行粮"制度。八旗兵士出征，其原饷仍在京城支领，而在行营中另领一份口粮，称"行粮"，标准是每名兵士每月给银6两，每日米8.3合，马草2束，料5升；佐领每月加米8.3合，银6两；骁骑校每月加银4两②。

还有一种丁粮、马乾。丁粮是支给八旗驻防官兵家口的口粮，马乾是马草料。八旗驻防武职随军家口和马匹数都有规定：将军家口40名，马50匹；副都统家口35名，马40匹；协领家口30名，马30匹；佐领家口20名，马20匹；防守尉家口14名，马15匹；骁骑校、有品级笔帖式家口12名，马10匹；领催、骁骑家口7名，马六匹；弓匠、铁匠家口5名，马3匹③。

八旗兵士，都领有世袭土地，称为"旗地"。这是清初圈占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八旗官兵，计有14万余顷④。普通士兵占田多者数十亩，少者十数亩。旗地虽然不代替兵饷，但它是旗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待八旗官兵的一项特殊措施。

（二）绿营兵饷

绿营兵饷，也随兵种和驻地的不同而异，但共同点是普遍低于八旗兵饷。

京师巡捕营饷银，马兵月给饷银2两，步兵1两，皆月支饷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四二，《国用·俸饷·兵饷之制》。

②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页。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五五，《户部·俸饷·各省兵饷》。

④ 《清史稿》卷一二〇，《食货·田制》。

米3斗。此外，每马一匹，月支给豆草银2.5两①。

各省镇标马兵饷额多定于顺治朝。顺治元年（1644年）定各镇马兵月给饷银1.5两，步兵1两。四年，改定各镇马兵月给饷银2两，步兵1.5两，守兵1两，无论马、步、战、守，每名月给饷米5斗。五年，改定兵丁月给饷米3斗，此后遂成定制。此外，每马一匹，冬春季月支豆9斗，夏秋季月支6斗，草均30束（每束重七斤）②。绿营水师支饷与步兵同。此外，绿营兵也有战时发放"行粮"的做法，但无严格规定。

绿营兵丁的实际收入，往往比明定饷额少得多。这是因为兵饷数额还必须先减去各种扣除，诸如朋扣、赔桩、军械费、衣帽费、房费、罚俸饷等。"朋扣"，即棚扣，为买补营马而设，按月扣除。计马兵月扣1钱，步兵0.5钱，守兵0.3钱。赔桩，即营马未及年限倒毙的罚款。康熙年间规定，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等地，马于一年内倒毙者赔银7两，每过一年减0.5两，满五年后免赔③。清廷运用这一合法手段，不仅把军马的购置费用全部转嫁给绿营，而且使政府增加了一笔机动的军饷来源。据统计，平均每年朋扣银近45万两，再加上赔桩银两，长年积累，数量十分可观。此外，带兵将领的一些非法克扣，更置绿营士兵于饥寒痛苦之中。

三、俸饷制度的特点

综观清代的俸饷制度，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民族特色明显，等级差别悬殊。清军的俸饷，划分为许多类别和等级。八旗和绿营不同，在京的和在外省的有别。八旗，特别是满洲八旗将士的利益放在首要的地位。其等级差别更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四二，《国用·俸饷·兵饷之制》。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五五，《户部·俸饷·各省兵饷》。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五四，《兵部·马政·马罚》。

是严格、悬殊。例如，宗室系统武官的俸禄，自亲王至奉恩将军，凡10等21级；在京武官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凡9等18级；在外武官为7等14级，且俸额标准差别甚大。其中，宗室和满、蒙上层贵族的俸额标准，与任何系列相比都保持着突出的高额地位。如和硕亲王岁俸银高达1万两，禄米1万斛，比正一品官（岁俸180两、禄米180斛）高55倍。绿营兵饷也只有八旗兵饷的1/3到1/2。清朝的这些规定，是要保证满洲贵族的“首崇”地位和各族上层分子的特殊利益，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巩固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

第二，巧立附加俸饷，控制拉拢官兵。清军官兵，除正俸、养廉银之外，还有不少名目的附加俸、饷。如八旗、绿营武官，有恩俸、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等补贴。官兵出征，另有战时俸饷，遇有特殊情况，还有“加赏饷银”。清朝统治者通过这些附加饷项，不仅有效地控制和拉拢了八旗、绿营官兵，而且对鼓励他们忠于职守和效力疆场，也有一定作用。

第三，避免地方擅权，有利兵权集于中央。历史经验证明，兵权与财权有密切关系。军队粮饷如由带兵将领就地筹集发放，不仅会造成多少不一的矛盾，而且往往出现官兵只忠于将帅的现象，导致将帅擅权，对抗和威胁中央。清朝统治者将俸饷的审核、批发、奏销总汇于户部，紧握饷权。户部内分司管理，都对皇帝负责。地方督抚虽与中央户部地位平行，但户部有皇帝授予的准驳之权，而且可以监督地方管理俸饷的布政司，使其不能分权。由于国家紧操饷权，避免了地方擅权，从而保证了兵权集中于中央。

第五节　军事训练和奖惩制度

清军入关之前就有长于训练的传统。入关以后，为了适应频繁战争的需要，清统治者对军队的训练更加重视。顺治帝说：“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

仰荷天休，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① 康熙帝也多次谕令八旗都统等，要加强军事训练。他尤其强调训练火器，认为："火器关系武备甚为紧要，应严加操演，以裨实用。"② 雍正帝也说："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明武备为先务，而兵丁之武艺，亦未有不勤加训练而能有成者。"③ 乾隆帝针对八旗兵懒惰、战斗力下降的情况，谕令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对八旗兵"不时教导，务使骑射优娴"④。由于统治当局的重视，逐步形成了八旗和绿营的训练制度。

一、八旗训练制度

八旗兵的训练，可分为京师禁旅和各省驻防八旗两种，二者略有不同。

京师禁旅八旗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步射和骑射。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亲军，每月分别练骑射 2 次，步射 4 次，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基本上是每月习射 6 次，都统以下各官亲临监视。春秋二季擐甲习射 2～4 次。先进行分练，然后进行合练。骁骑营春秋分操 2 次，合操 1 次，秋季则会诸营大操 1 次。八旗汉军鸟枪兵于春秋二季从第二个月开始各演鸟枪 45 天，每年合操 2 次，九月于卢沟桥演试火炮，每三年鸟枪营兵与炮营兵合演。汉军藤牌兵每年春秋二季四旗合操 1 次，八旗合操 1 次。初冬演习步围，每年 2～3 次。步军营及巡捕营，八旗步军营步军习步射，城门骁骑习鸟枪，均在春秋操演。巡捕三营（乾隆后改五营）除练弓矢外，春秋亦习鸟枪。火器营每月逢四、九日演炮，逢二、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八，顺治七年三月戊寅，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九，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己未。

③ 《清世宗实录》卷一一四，雍正十年正月丁卯。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二，《兵·教阅·直省教阅》。

七日演鸟枪，逢六日校射，冬季则八旗合操，每年秋后奏请去卢沟桥演放子母炮10天。健锐营训练内容增加了云梯、跃马、舞鞭、舞刀、水战等项目。

驻防八旗的训练与禁旅八旗大致相同，也规定为春秋二季合操，要求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直接掌管，亲临校视，并根据训练成绩的好坏进行赏罚。对直隶八旗水师营的训练，于每年春秋二季由将军、都统、副都统等率兵驾战舰操练。出海训练一般在每年的四月至八月，因为这个季节天气晴和，潮平风顺，其他季节在营内讲习水务，学习有关知识。同时还要求学会使用箭矢和鸟枪，以及藤牌、大刀、钩镰枪、过船枪、斧、钺等①。

二、绿营训练制度

绿营兵的训练，多沿用明代的方法，本着"随时训练，因地制宜"② 的原则，按照兵种、任务和地区的不同，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火刀、长枪、挑刀等技术，不分兵种、任务和地区，都要训练。从地区来说，如直隶绿营兵，除普遍训练骑射、鸟枪、火炮外，宣化镇还添设藤牌兵，紫荆关改设鸟枪兵。除军事技术训练之外，更重要的是战术训练。沿袭明代的做法，各省绿营兵于每年的秋季霜降时，由将弁带领整队入演武场。军士环甲训练，中军先立大纛于场正中，统兵大臣用军旗指挥，进行操练。步兵、骑兵分别列队，闻鼓而进，鸣金则止，连环无间，更出迭入，进行各种队形的变换。操练的兵器有长矛、藤牌、劚刀、短刀等各种冷兵器，并根据地形变换奇正。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兵士手中刀、矛、弓箭、盾牌的作用，不断提高战术技术水平。

为了不使训练走过场，提高训练质量，还采取了一些保障措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三七，《兵部·简阅》；《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二，《兵·教阅》。

② 《清史稿》卷一三九，《兵·训练》。

施。顺治十一年（1654 年）定阅操赏银之制，规定绿营兵每年给予操赏银，定期演习骑射，优者酌量奖赏。雍正五年（1727 年），由于浙江兵娇气懦弱，骑射生疏，命从陕西兵中挑选出 100 名身体壮健、弓马娴熟的兵士赴浙江教习，促进了浙江各标绿营的训练。乾隆帝要求各督抚提镇恪尽职守，严加整饬军队，命大臣前往各地检验其训练优劣，并命绿营抛弃两仪、四象、方圆等无裨实用的旧阵法，改仿京营阵式训练。

绿营水师，无论内河还是外海水师营，其训练各按季节、气候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做法。一般是每年的春秋或夏秋季节，乘战舰列阵扬帆，鸣角发炮，进行练习。雍正六年，为了加强浙江、湖北、湖南的水师训练，从福建挑选优秀水兵前往教习。乾隆十五年（1750 年），为了加强闽、浙水师出海巡洋的能力，规定二省内各水师总兵官每两月会哨一次。会哨时，上汛先巡北洋，后巡南洋；下汛则先巡南洋，后巡北洋。定海、崇明、黄岩、温州、海坛、金门、南澳等水师总兵官，南北会巡，在指定地点“蝉递相联”，并由督抚派员稽察。

总的看来，绿营兵的训练并未形成严格的制度，也不正规，往往演花架，图虚名，流于形式。乾隆后期已训练甚稀，不得不“饬各抚臣实力整理”。道光年间，山西满、汉“营伍废弛”，新疆、湖南、广东、四川营伍也是“日久生玩，满营则奢靡自逸，汉营则粮额多虚”①。训练的废弛，成为清军战斗力大大削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简阅与大阅制度

简阅又称校阅，是八旗、绿营由王、大臣或督抚定期检验部队教练情况的制度，也是促进军事训练的手段和形式。

八旗简阅军士，从顺治年间开始，骁骑营每月三旬，逢二、

① 《清史稿》卷一三九，《兵·训练》。

逢六日校射。雍正五年复准，骁骑营校射以每月上旬逢四、逢八，中下旬逢三、逢八，共进行6次。该营春秋季节擐甲胄，步射2次，骑射2次。护军营每月校射6次，与骁骑营同。春秋二季验看骑射，官兵擐甲胄，马、步射一二次，三年一次考验甄别。同时还规定：每年校阅自七月十六日开操，至来年四月十六日停止；每年春季于二月十五日起，三月初一日止，秋季于七月十五日起，八月初一日止，各于本旗城上演习鸣海螺，委司官巡查；八旗大炮、鸟枪，由兵部三年一次奏请运往卢沟桥演放一月。八旗汉军每年秋季到卢沟桥演放火器。满洲八旗火器营成立后，也令每年秋季赴卢沟桥操演，并照火器营、护军营例，每三年考验一次。每年京营八旗官兵大操，必须在每旗于一处合操的基础上进行。乾隆帝针对一些旗营大臣只在帐幕内互相对阅，并不亲赴队伍操演的情况，规定："八旗合操时，阅兵王、大臣等，逐次前往监看稽察，如有无故不到者，同阅之王、大臣指名题参议处。"①

各省驻防八旗官兵简阅制度，与京营八旗相同。各省八旗水师营，每年春秋二季，将军、都统、副都统等，督率官兵分驾战舰操演。外海水师出海口操演，内河水师出江口操演。操演时列阵，掌号发炮，完毕后由督率官弁讲习水务。

绿营简阅营伍，从顺治年间即开始。乾隆初年规定，各省督抚提镇对所辖营汛，应根据距离远近，一年或数年亲自前去查阅一次。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每年派遣钦差大臣赴数省查阅营伍，"以验其技勇之生熟，兵数之虚实，粮马之盈亏，以觇该督抚提镇平时训练整饬之实政"②。由于对简阅的重视，钦差大臣、督抚提镇层层抓紧，对提高绿营兵的技术战术水平，增强纪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大阅是皇帝检验部队训练成果，考察部队战斗力的隆重的阅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三七，《兵部·简阅·八旗简阅军士》。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三八，《兵部·简阅·绿营简阅营伍》。

兵仪式。早在天聪年间，皇太极就曾举行过大阅。崇德八年（1643年）大阅，满、蒙、汉八旗队伍绵亘20多里。顺治十六年（1659年），福临谕称："大阅典礼，三年一行，永著为例。"① 康熙年间多次大阅，仪式越来越隆重。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大阅于南苑，八旗官兵排为三队：第一队汉军火器营，鸟枪步军居中，炮位列左右；满洲火器营，鸟枪列炮之两旁。第二队前锋兵居中，八旗护军列两旁。第三队列八旗护军，两翼则设应援兵。皇帝率皇子等均擐甲，前张黄盖。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各部院大臣均扈从。鸣角者三击鼓，步军齐进，鸣金而止。发鸟枪后，火器营、马步军枪炮连环齐发，顺序前进，鸣角收军。

雍正以后，大阅制度更加完善、周密。雍正六年（1728年），对大阅的官兵数目、器械、营伍都作出规定。受阅队伍要列阵按顺序前进。首队之前为汉军火器营、八旗火器营，首队前锋营，次队护军营。以上八旗各营共委出大臣49人，将校1361人，兵18771人。军阵分左右翼前进。此外，对各营所占地面面积、间隔距离，都有明确规定②。乾隆三年（1738年）规定，以后大阅，皆按照顺治十六年定例，三年一次，其办理事宜照雍正六年规定举行。

清代大阅的地点，主要在南苑、卢沟桥、玉泉山、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畅春园等地。

四、军 纪 军 令

清朝统治者在建军治军的实践中，十分重视军队纪律的建设。

早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就先后制订颁发了一些军纪军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二，《兵·教阅·大阅》。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〇四，《兵部·大阅》。

令。入关后，清王朝逐渐掌握了全国政权，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顺治、康熙两朝又相继制订了新的军纪军令。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发兵平定吴三桂叛乱，为防止军队扰民，兵部奉旨制订《出师禁例》。二十九年七月，清廷派两路大军征讨噶尔丹，为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康熙帝令颁发军令，就军器、军马的管理，驻营、行军、作战的方法，以及严禁骚扰百姓的法规等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三十四年十二月，在出兵征讨噶尔丹之前，康熙帝“特规酌旧制，参以新谟”①，制订军令17条，内容更加详细具体。

其后，因军备废弛，八旗兵和绿营兵纪律败坏，战斗力降低，雍正、乾隆两朝对军队纪律的建设更加重视。雍正帝认为，自古用兵之道，以申明号令为首务，平日必须申明号令，使三军之士无不熟知深晓，倘其中或有不遵者，则按军律置之于法，虽领兵将帅亦不能以己意一毫轻重于其间。但是，“承平日久，新进少壮之人未曾亲履戎行，则于从前规制未必一一谙练”，故胤禛于雍正九年（1731年）特令大臣等酌议军令条约41条，经其亲加鉴定，颁发军中。这个条约，“凡大端细务，莫不备载其中”②，为清前期最为完备的军令。乾隆帝当政之后，继续整饬军务。乾隆十三年（1748年），弘历认为“今刑律内玩寇老师，有心贻误，竟无正条，非所以重军务儆戒失律也”，“自应稽察旧案，明著刑章，俾众知畏法，方能鼓勇用命”③，于是命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详酌定议。军机大臣等遵旨增订军令三条（实为雍正九年《军令》中的三条），宣示将帅。以往的军令都是约束弁兵的，而这个军令专门为统兵将帅约法，这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四十九年，乾隆帝鉴于清军士气低落，认为“整肃营伍固在督抚之实心督饬，而平时操演讲习，更在将弁之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九，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

② 《军令》，清雍正九年满、汉合璧内府刻本。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八一，《兵部·出征·军令》。

面为指导，兵丁之明晓军律”①，所以颁发《行军简明纪律》10条。《行军简明纪律》的特点是，不但规定了兵丁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而且讲明了为什么。如第一条：“兵丁随征剿贼，俱应奋勇直前。其见贼退走者，不过各惜身命，心怀畏怯。试思：临阵退走，律应斩首示众；若能杀贼立功，必蒙升赏；即或阵亡，国家自有恤典，子孙俱得邀恩。兵丁等与其临阵畏葸，难逃国法，何如争先杀贼，奋不顾身？况勇往直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能生，此理甚明。该管将官等平时将此谆切告诫，务令兵丁等咸知大义，临阵时自必勇气百倍，可期杀贼立功。”②

清前期的军纪军令，包括作战纪律、行军纪律、军营纪律、保密纪律、民众纪律，等等，内容十分广泛，规定也很严厉，特别是作战纪律更是如此，动辄斩首。这对清军的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关于清代前期军令的内容，兹征引如下：

附：军令

（一）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军令

（1）大军出征，本都统、护军统领、副都统、参领等，审视官兵甲胄弓矢，暨一切军中器用，务期坚利。兵之盔尾甲背及战矢之干，各记名其上。马烙以印，鬃尾处系小牌，书旗分佐领姓氏以为记号。马不烙印追银二两，箭不书名追银十两，给举首之人。

（2）启行时，凡兵众必各率行装，按旗队以次前进，不得零星散乱，后先越走。自出国门以至旋师，当各遵守，违者鞭责示警。

（3）在道，毋离纛，毋酗酒，毋喧哗，毋叫呼，不遵者该管官即行捕责。

（4）所过地方，不得扰害居民及蒙古部落，如侵犯子女，掠夺马畜，蹂躏田禾，及擅离营伍入村庄山谷强取一物者，兵丁厮役俱从重治罪，其该管官及厮役之主一并议罪。

（5）边境以内，凡兵役在逃，立刻缉拿，依定例治罪。出边而逃，该管大臣即发官兵，务穷追捕，以正军法。设追缉不获，往追人从重治罪，伊主并该管官一并严处。

（6）下营务按旗列幕，不密不疏，如越旗乱次前后搀杂者，将该管大臣、官员

①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军令》。

分别治罪。其兵役内有愍不畏法，盗马上零星诸物者，惩以鞭责；盗马匹及鞍辔者，视盗赃多寡，按律治罪。

(7) 出哨，毋携大纛，各带本旗颜色小旗，远距大营设哨，勤加巡视。比暮，则还就近地，勿举火，勿携帐，一人一骑，其马备鞍以待，昼则近身牧放，夜则刈刍拴喂。设寇至，探明即飞报大营。若无寇妄报，与寇近不知以致传报稽迟者，主将即将该汛坐哨官兵立刻正法，军前示众。

(8) 值夜巡徼官兵，必张弓束服袴韡，并解甲囊以备，不可怠忽。无事人昏夜不得擅行，行者必问，如衣服器械有异即行擒拿。苟贪睡偷安，或人数缺少，该管大臣察出，严治其罪。

(9) 与寇相近，管兵将军、大臣酌派前锋参领率兵往探，务详审贼情虚实、地势险易，并严饬营中，夜无燃火。

(10) 对敌列阵时，主将必度地据险。寇或布野，或结骆驼鹿角为营，我军分列行阵，指明某队某旗当击敌阵某处，战时鸣角进兵，战毕仍鸣角收兵。官兵或弃其部伍混入他人部伍，或轶出本阵往附他人尾后，或逡巡观望逗遛不进，照所犯轻重，正法、籍没、鞭责、革职。至我军分阵进击，某旗对阵，敌坚不动，即发所备援兵助击之。又对面临阵时，王、贝勒、贝子、公、大臣、官员，或不依次喧阗拥入，或见敌寡不请擅进，此一次功不议，仍以罪论。

(11) 敌阵动摇，我军攻入，当严禁官兵，不得掠人畜财物，如不遵军法，贪行攫取者，重惩不贷。

(12) 敌败北，即选兵马追之，随派队伍接踵继进。倘追兵堕其伏中，或遇寇游兵，我后队兵与之接战，前队兵仍行追进。

(13) 师旋日，当严行禁止：凡军器不得售卖、存留与诸蒙古，违者从重治罪，该管官一并议处。

(14) 驼马为师行要需，须择水草善地牧放，夜则加意巡防，起营时留官兵于后，收察遗失驼马，审其印烙牌记，各交原主。其疲乏者，即于就近地方官，或村庄居民，或扎萨克蒙古处，辨色登数，交与饲养，仍以其数报明兵部。如有将遗失驼马隐匿乘用，或因其疲乏委弃宰杀者，严治以罪。令驼马原主开明遗失疲乏驼马颜色数目，亦报兵部登记。

(15) 军糈关系綦重，凡出征官兵，须各计口按日支领携带。倘不如额，查出即从重治罪。

(16) 有职掌大臣、官员，原各有亲随兵卒，不得复于大兵内抽取，以分兵势。如委署人员及官之原无亲随兵卒者，许各抽一名。

(17) 凡大兵存驻处，毋令闲惰，每日较射，磨砺器械。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九，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

(二) 雍正九年 (1731年) 军令

(1) 战阵之际，原凭掌号，击鼓鸣金以为进止。若有官兵违令，闻声不进、闻声不止者，俱斩。官兵战阵之际，务须奋勇前进，若有回顾畏缩，交头接额私语者，俱斩。

(2) 专司掌号击鼓鸣金之人，闻掌号击鼓鸣金之令即便掌号击鼓鸣金，闻停止之令即便停止。违令者，满洲、蒙古兵丁鞭四十，绿旗兵丁捆责三十棍。如遇打仗之时，违令者，斩。

(3) 凡关系军情，大将军密传及一应军令，转传之人如敢将其中要言私自增减，并将疑似法令添造者，斩。大将军紧密军令，晓谕其人后，其人私告他人，以致宣扬误事者，斩。

(4) 官兵杀伤良人冒功者，斩。

(5) 官兵将他人战功冒为己功，及诡称实在效力，将无作有，以轻报重者，斩。

(6) 官兵沿途欺压民人番夷，强掳什物柴薪，并强买强卖，拆毁良人房屋，淫污民人妇女者，俱斩。

(7) 指称梦寐之中眼见鬼神，无故造言生事，谣言惑众者，斩。

(8) 兵丁中途染病，该管委署护军校、领催、红旗管队，即同护军校、骁骑校、千总、把总一同验确，禀明该管官员，令医调治。如不行验看调治，该管委署护军校、领催鞭五十，红旗管队捆责四十棍，护军校、骁骑校、千总、把总插箭。如兵丁妄称患病，懒惰偷安者，斩。

(9) 大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领兵提督、总兵密议军情之时，如有私行偷听者，即系泄漏军机之人，犯者斩。

(10) 差往探听贼人形势之人，畏缩不往，妄称已到彼处，及以少报多，以多报少，探信不实者，即系贻误军机之人，犯者斩。

(11) 如有遗失马匹，其获马之人，即禀明该管官员，如敢隐匿不禀，私行乘骑，不行给还失马之人，满洲、蒙古兵丁鞭五十，绿旗兵丁捆责四十棍，仍插箭游营。如敢私行屠杀，或偷卖与他人者，俱斩。

(12) 兵丁偷盗马匹潜逃者，该管官即派兵丁头目追拿，如系战阵之时，枭首示众；如系扎营地方，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

(13) 扎营地方，每夜放卡兵丁，必须轮班坐卡，务宜严整，留心访察。如寅夜有事，一面秘密递禀申明，一面整齐等候，如敢混行，移动走散，恐怖喊叫，以致乱营者，斩。

(14) 兵丁故意私语嗟怨，长吁短叹者，系满洲、蒙古兵丁鞭七十，绿旗兵丁捆责六十棍。被责之后复犯，并战阵之时故违者，照煽惑人心例，斩。

(15) 兵丁不守军令，无故声喊，并在营内混行走动，高声言语，白昼犯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五十，绿旗兵丁捆责四十棍；如起更后声喊妄动，以致乱营者，斩。

(16) 兵丁将该管官所谕之言，口是心非，辞色之间显形傲慢者，满洲、蒙古兵

丁鞭五十，绿旗兵丁捆责四十棍。如乖戾不遵，有意抗违，以致误军机者，照不遵约束律，斩。

(17) 堆放草厂兵丁，不加意防范，以致失火烧毁草厂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如系对敌要地失火烧毁者，斩。

(18) 兵丁不加意防火，致烧毁衣服器械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五十，绿旗兵丁捆责四十棍。如系存贮火药地方失火，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该管护军校、骁骑校、委署护军校、领催、千总、把总、红旗管队，概行插箭游营。如系对敌战阵之际，营内失火，以致误事者，兵丁并该管委署护军校、领催、红旗管队，俱斩。

(19) 兵丁有夤夜梦惊者，其左右并同一帐房之人，不许随顺声应，即行唤醒，如敢混行声应，以致搅乱合营之人者，应声之人满洲、蒙古兵丁鞭七十，绿旗兵丁捆责六十棍，该管委署护军校、领催、红旗管队，插箭游营。如近贼营犯者，俱斩。

(20) 出入营门之人，务当严查。如敢无故私行放人入营者，看守营门之人，满洲、蒙古兵丁鞭七十，绿旗兵丁捆责六十棍。如打仗之时犯者，斩。

(21) 差往探信之人，如遇投诚贼人，先行禀明领兵官员。如不行禀报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七十，绿旗兵丁捆责六十棍。如不将投诚贼人解送该管官，以致复行逃散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如将军情虚实泄漏者，照泄漏军机律治罪。

(22) 大兵进剿败贼后，如有遗失马匹财物，务须等候大将军军令，始行派拨官兵收取。如不候军令，私行前往夺取者，插箭游营。如夺取搅乱队伍者，斩。

(23) 凡有倚强压弱，酗酒为非，不遵该管官约束者，分别鞭责、插箭。

(24) 营内所挖井泉，不许污秽，其饮马泉水务须另挖，不许马匹践踏。违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

(25) 兵丁口粮，甚宜爱惜，兵丁支领口粮之时，以及支领之后，如敢混行抛弃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该管委署护军校、领催、红旗管队等，如不呈报者，插箭。

(26) 行兵之时，如遇有草地方，俱当看明踪迹陆续行走。如有不顾队伍，左右参差混行，以致践踏路旁好草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扎营之时，牧放马驼羊只，如敢不在所指牧厂牧放，任意到处践踏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仍插箭游营，该管官插箭。

(27) 兵丁沿途牵领运米马匹，如敢私盗一升一合，并偷盗同行兵丁口粮，以及毁伤盛米布袋，不行修补，以致抛弃米石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

(28) 军器等项内，撒袋、腰刀、皮绳不行收拾牢固，以致遗失，并应带器械不随身携带着，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该管委署护军校、领催鞭四十，红旗管队捆责三十棍，护军校、骁骑校、千总、把总等官插箭。

(29) 兵丁路见他人遗失腰刀、战箭等物，即行拾取，禀明该管官查问给还。如见物不拾，并将所拾之物不行给还者，满洲、蒙古兵丁鞭四十，绿旗兵丁捆责三十棍，均插箭游营。

(30) 并无紧要事件，私行跑马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五十，绿旗兵丁捆责四十棍，仍将马匹撤回，令其步行。

(31) 兵行之时，各按队伍依次行走，无论道路坦平窄狭，后队俱不得过前队。违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五十，绿旗兵丁捆责四十棍，仍插箭游营。

(32) 扎营之后，各营兵丁每帐房派出一人，看蓝旗出营各自寻取柴薪，看黑旗出营各自取水。兵丁出营大小便者，各营守门官员头目，验明所带照牌，放出。如起更后，非奉差出营者，一概不准出营。如违，满洲、蒙古兵丁鞭四十，绿旗兵丁捆责三十棍，该管委署护军校、领催、红旗管队等，不行约束者插箭。

(33) 夜传军令，怠慢不遵，以及巡查坐堆偷安眠睡，以致误更旷班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该管红旗管队不行查报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五十，绿旗兵丁捆责四十棍。打仗之时犯者，斩。

(34) 兵丁在营，敢在该管官员面前妄行动作，骄慢无礼者，耳鼻插箭游营。

(35) 各营马步兵丁，枪炮手所带火药，不行加谨收贮，以致潮湿不能著火，及携带行走之时，玩忽怠慢，以致抛撒，并应用之时任意糜费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五十，绿旗兵丁捆责四十棍，该管红旗管队插箭游营。如不加谨，以致遗失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该管委署护军校、领催、红旗管队插箭游营。

(36) 兵丁所带铅弹，务令按枪口之大小，如式制造。如铅弹不合枪口，平日演放查出，满洲、蒙古兵丁鞭五十，绿旗兵丁捆责四十棍，仍插箭游营，该管委署护军校、领催、红旗管队插箭游营，护军校、骁骑校、千总、把总插箭。如系打仗之时，将此等不合枪口之铅弹滥用者，兵丁立斩，该管委署护军校、领催鞭一百，红旗管队捆责一百棍，护军校、骁骑校、千总、把总插箭游营，营总、参领、参将、守备记大过一次。

(37) 行兵之时，马驼吊膘，并牧放各项牲畜羊只之处，俱有传文，官兵理宜遵照吊膘牧放。如不按法吊膘、乘时牧放者，承管兵丁系满洲、蒙古鞭一百，系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该管护军校、骁骑校、委署护军校、领催、守备、千总、把总插箭。

(38) 沿途扎营地方所有井泉，饮马之时务须挨次往饮，毋许争先，以致壅塞。如敢故意违犯，以致践踏污秽井泉者，满洲、蒙古兵丁鞭一百，绿旗兵丁捆责八十棍。

(39) 统兵将帅，玩视军务，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国事者，拟斩立决。

(40) 将帅因私忿、娼嫉、推委、牵制，以致糜饷老师，贻误军机者，拟斩立

决。

(41) 身为主帅，不能克敌，传布流言，摇惑众心，藉以倾陷他人，致误军机者，拟斩立决。

——《军令》，雍正九年满、汉合璧内府刻本

(三) 乾隆十三年 (1748年) 军令

(1) 统兵将帅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

(2) 将帅因私忿、娼嫉，推委、牵制，以致糜饷老师，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

(3) 身为主帅，不能克敌，转布流言，摇惑众心，藉以倾陷他人，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军令》

五、军 功 奖 赏

清统治者十分重视奖励军功，并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戎行，振兴士气。奖励军功，一是议叙，二是赏赉。

(一) 议叙

清军官兵有军功，报兵部核议，以定功赏等级，是谓议叙。凡行间将帅著有功绩，并有特旨优叙者，由兵部复议奏请，随时酌定。由统兵将帅列序官兵功绩等次造册报兵部者，兵部核实后，据功绩大小，按5个等级给予不同的奖励。八旗官兵，给以印轴，称为功牌。功牌以紫绫为面，用洁白厚纸，四边墨印螭文，内注明功次，在填写功绩及年月处钤用部印，编次号码。功牌尺寸有统一规定，功等越高，尺寸越大。应授世职者，移咨吏部，甄别情况，按等第授给。未达授世职标准者，由部注册，准予积算。绿旗官兵第功议叙者，称“功加”，其不及加等加级者给“军功记录”：一等功者，准功加一等，记录2次；二等功者，加一级，记录1次；三等功者，记录3次；四等功者，记录2次；五等功者，记录1次。立功多者，积算授以世职。凡提督有

功加至十等，总兵有功加至十二等，副将有功加至十四等，参将有功加至十六等，游击有功加至十八等，都司有功加至二十等，守备有功加至二十二等，千总有功加至二十四等，俱授给一云骑尉。

对清军官兵军功议叙，分门别类，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

1、叙八旗官兵军功之制

(1) 克城

凡用云梯攻城，视城之大小，攻之难易，分等次授世职。攻克府城者分 5 等：一等叙 6 人，分别授一等轻车都尉、二等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骑都尉兼一云骑尉、骑都尉、云骑尉。领战官授骑都尉，指路官（一作指示官）及射箭官并授云骑尉。二等叙 4 人，授世职自三等轻车都尉以下，依次递降。领战等官与一等同。三等叙 3 人，授世职自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以下。四等叙 2 人，授世职自骑都尉以下。领战官并授云骑尉，指路官克两城者授云骑尉。五等叙 1 人，授云骑尉。领战官克两城者亦授云骑尉，克一城者注册。克州城者分 4 等，一等议叙视同克府城之二等，克县城者分 3 等，一等议叙视同克州城之二等，其余均以次递降。克卫城与克州城同，克所城与克县城同。克敌堡寨，则视其堡寨大小与城之等次议叙。

(2) 越众前驱

凡攻战之时，在与强敌相持之际，有能越众前驱，引导众军随进克敌者，叙 3 人，第一人咨吏部授世职，次分别给越众前驱二、三等功牌，均注册。积两次三等功牌者，准作一次二等；积至两次二等者，咨吏部授世职。

凡齐力与敌交锋之时，有于本旗行队前出众冲锋，引导本旗大队随进克敌者，叙 3 人，分别给本旗前进一、二、三等功牌，均注册。积两次三等功牌者，准作一次二等；积两次二等功牌者，准作一次一等；积至三次一等者，咨吏部授世职。

如对敌之时，官兵力战，敌仍不退，执纛人有能鼓勇首进者，照越众前驱例，叙 3 人，第一人咨吏部授世职，余以次递

降。对敌时，一旗内有参领下执纛人在众参领前首进者，照本旗前进例，叙3人，第一人给一等功牌，余以次递降。

(3) 水战

能超登敌舟杀贼有获者，视舟之大小，分为3等。一等舟叙5人，第一、二两人均咨吏部分别授世职，第三至五人分别给一等舟之三、四、五等功牌，均注册。积两次五等功牌者，准作一次四等，以次递加，积至两次三等者咨吏部授世职。二等舟叙4人，第一人视一等舟之第二人，授世职，其余以次递降。其功牌注明二等舟，自二等功牌至四等功牌均注册，积至两次二等者，咨吏部授世职。三等舟叙3人，第一人视二等舟之第二人，其余以次递降。其功牌注明三等舟，自一等功牌至三等功牌均注册，积至两次一等者，咨吏部授世职。其不列等次之常舟叙3人，其功牌注明常舟，自一等功牌至三等功牌均注册，积至三次一等者，咨吏部授世职。凡在舟督战官视第二人，余官视第三人。在舟之前锋校、护军校、骁骑校等视第四人，均按舟论功。

(4) 招抚

如招抚敌人千名以上、敌舟30艘以上者，为五等军功。招抚人数每增500名、舟数每增10艘，各加一等。招抚人数至3000名、舟至70艘者，为一等军功。招抚人数自3500名以上、舟自80艘以上者，临时酌量从优议叙。

招抚城池，以府、州、县、卫、所为等次，招抚府城为一等军功，其余以次递降，有名寨崖为五等军功。

2、叙绿营官兵军功之制

(1) 克城

凡用云梯攻城，分别等次授职。克府城者，分5等：一等叙5人，分别授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二等叙4人，授职自游击以下；三等叙3人，授职自都司以下；四等叙2人，授职自守备以下；五等叙1人，授千总。克州城者，分4等：一等议叙视克府城二等，以次递降授职。克县城者，分3等；克卫城、所城者分2等，递降授职亦如之。议叙五人、四人者，领战

官功加四等，指路官功加二等。议叙三人、二人者，领战官功加二等，指路官功加一等。议叙一人者，领战官功加一等，指路官不叙。若城被炮击及凿毁，兵丁因而乘势先登者，叙1人，授千总，领战官功加一等。

（2）倡众破敌

凡强敌在前，阵坚垒固，能倡众战胜者，叙3人，分别授守备、千总、把总。若势均力敌，有于本营中冲锋前进者，叙2人，分别授千总、把总。

（3）水战

能超登敌舟杀贼有获者，分为3等：一等舟叙4人，分别授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在舟督战官加三级，同战官加二级；二等舟叙3人，授职自守备以下，以次递降，督战官及同战官以次分别加级记录。炮手夺舟者叙功与兵丁同。以炮击沉舟者，二舟授把总，三舟授千总，多者以次递加。

（4）招抚

如招抚敌人500名以上，或一等大舟5艘，难民5000人以上者，计其多寡大小，记录加级及功加等次各有差。招抚二等中舟10艘、三等小舟20艘以上，或难民2000名以上者，纪录一次。招抚敌人至2000名，大舟至10艘，中舟至20艘，小舟至40艘，难民至5000名者，功加一等，数多者以次递加。

（二）赏赉

对有军功的官兵，除议叙授世职外，并给以赏银。其规定如下：

1、赏八旗官兵之制

（1）克城

以府、州、县、卫、所为等次。克府城者，赏5人，分别赏银500两、350两、250两、150两、100两，领战官、指路官、射箭官分别赏银350两、250两、100两，抬云梯人各赏银30两。克州城、卫城者，减府城一等，赏4人，分别赏银400两、250两、150两、100两。克县城、所城者，减州城一等，赏3

人，分别赏银 300 两、150 两、100 两，其领战官、指路官、射箭官及抬云梯人均以次递降给赏。凿毁城垣者，视云梯攻城例给赏。用大炮攻城，不论城之等次，均赏 3 人，分别赏银 200 两、100 两、50 两，领战官视第二人，指路官视第三人。炮手，克府城各赏银 15 两，克州城、卫城各赏银 10 两，克县城、所各赏银 5 两。夺门入城及无云梯而疾走登城者，赏 3 人，分别赏银 150 两、100 两、50 两，领战官视第二人，指路官视第三人。

(2) 越众前驱

凡与敌人相持时越众前驱克敌者，赏 3 人，分别赏银 100 两、80 两、60 两。于本旗行队前出队，冲锋前进克敌者，赏 3 人，分别赏银 50 两、40 两、30 两。执纛人鼓勇首进者，照越众前驱例赏；在官兵将及 10 人前进之后续进者，赏 1 人，赏银 50 两；一旗内执纛人在众参领前首进者，照本旗前进例赏 3 人，续进者赏 1 人，银 20 两。

(3) 水战

超登敌舟杀贼有获者，视舟之大小，分 3 等赏赉。一等舟赏 5 人，第一人赏银 250 两，其余以次递减 50 两。二等舟赏 4 人，第一人视一等舟第二人给赏；三等舟赏 3 人，第一人视二等舟第二人给赏，均以次递降。不列等次之常舟赏 3 人，分别赏 80 两、60 两、40 两。

2、赏绿营官兵之制

(1) 克城

以府、州、县、卫、所为等次。克府城者，赏 5 人，分别赏银 250 两、200 两、150 两、100 两、50 两。克州城者，减府城一等，赏 4 人。克县、卫、所城者，并减州城一等，赏 3 人。

(2) 倡众破敌

遇强敌能倡众战胜者，赏 3 人，分别赏银 50 两、40 两、30 两。于本营中冲锋前进者，赏 2 人，分别赏银 30 两、20 两。

(3) 水战

一等舟赏 4 人，分别赏银 100 两、80 两、60 两、40 两。二

等舟赏 3 人，分别赏银 80 两、60 两、40 两。三等舟赏 2 人，分别赏银 60 两、40 两。以炮击沉敌舟者，每舟赏银 20 两。

除军功议叙赏赉外，对出征阵亡、病故或临阵受伤者，亦据情给予议叙恤赏。议叙赏赉，不论何种情况，八旗官兵与绿营官兵的待遇都是不平等的，八旗官兵的待遇远比绿营官兵高。

第十章　清前期的武器装备和马政

第一节　冷兵器

一、冷兵器的形制和种类

清代在创业、开国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冷兵器一直起着主要作用。清统治者自诩："我朝以武功开国，弧矢之利精强无敌。"① 但清前期基本处于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期，冷兵器只是袭用明代已有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大的发展，或者说只是在个别方面有所改进。

清代兵器的来源大体有四个方面：一是满洲人的传统兵器，二是沿用或仿制的明代兵器，三是参照历代兵器形制改造的兵器，四是边疆少数民族进贡来的兵器。

清代冷兵器，大致分为长兵器、短兵器、射远兵器三类。

长兵器有枪、刀、镋钯等类型。

枪类包括钩镰枪、双钩镰枪、蛇镰枪、火镰枪、火焰枪、长枪、手枪、钉枪、十字镰枪、虎牙枪、雁翎枪、犁花枪、矛、戟等。它们是清军的常用兵器。八旗装备的长枪，其形制与明代长枪大同小异，刃长 7 寸，杆长 1 丈，末端安有铁。虎枪，刃长 9 寸。绿营用长枪，刃长 7 寸，柄长 1.3 丈，围长 3.7 寸。

刀类包括挑刀、偃月刀、宽刃大刀、片刀、滚被双刀、虎牙刀等。刀类不太适用奔驰的骑兵，所以八旗兵已不多使用长柄刀，汉军藤牌兵和绿营也只使用挑刀、偃月刀、宽刃大刀等。挑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

刀主要用来装备藤牌兵，其他各种刀多用来装备绿营兵。

镋钯类是一种兼用于攻防的多刃长柄兵器，清代绿营兵保留和仿制了明代镋钯类兵器，有马叉、凤翅镋、五齿铁镋、月牙快钯、通天钯等。

短兵器包括刀剑、锏鞭棒、斧镰、系兵四类，是用以近战和自卫的兵器，通常配属火器手、弓箭手、长枪手、牌手等使用。

清朝常使用的短柄刀有佩刀、云梯刀、剸刀、长刃大刀、双手带刀、背刀、窝刀、顺刀、宽刃扁刀、船尾刀等。佩刀为清军官兵常用的短兵器，刃长2.2尺，宽1.3寸，柄长4.2寸。顺刀为健锐营特别装备的兵器，形如短剑，刃长8寸，柄长3.4寸。剑多仿唐宋形式，有单剑、双剑、长剑、短剑之分。锏、鞭、棒是用以打击敌人的杂式短兵器，有绿营兵用的双锏、双锤、棒、虎头棒，八旗健锐营用的铁鞭，汉军用的连枷棒，其形制特点基本与前代同。

斧镰是一种砍割兵器，是八旗和绿营的重要装备。八旗兵用的有前锋左翼斧，背削而长，刃径4寸，背阔1.1寸，自刃至背4.5寸，横置柄首，榆木柄长1.2尺。右翼斧，刃平、背微狭，刃阔3.4寸，背阔2寸，自刃至背3.2寸，横置柄首，桦木柄长1尺。长柄斧、双斧，供绿营使用。长柄斧，自背至刃8.5寸，刃径7寸，背径4寸，厚1寸，横置柄首，柄长4尺。双斧，刃如半月，背方，刃、径各4.6寸，背径1.5寸，厚0.4寸，自刃至背4.5寸，横置柄首，柄长1.6尺，一人使用。八旗前锋营装备的斧有圆形刃和平行刃两种。

系兵是用铁索或绳索，在一端或两端系上兵器，利用投掷出去的力量打击或钩敌，主要有绳标、流星锤、飞爪、铁莲花等。这类兵器的优点是用毕可以收回，连续使用，但抛出的距离受一定限制。

射远兵器，有弓弩、标枪、飞叉等。弓箭是清军的主要兵器，特别是八旗精于骑射，更为必备。

弓箭在入关前就是八旗的主要兵器，入关后又有一定发展。

其优点是轻便，射击速度比火绳枪快，并有一定的精确度。直到18世纪末，清军腐朽，骑射之风衰落，加之火器的迅速发展，弓箭才逐步为鸟枪所代替。清代弓的弓干，北方用榆木或檵木，南方削竹制造。一般长3.7尺，面傅牛角，背施筋胶，外饰桦皮，干一而角两接，接处加鹿皮。两弰用桑，长6.3寸，傅牛角。弰干之间为弦床，谓之垫弦。弓的强弱，看其干面厚薄、筋胶轻重而定。1力至3力，用筋8两、胶5两；4力至6力，用筋14两、胶7两；7力至9力，用筋18两、胶9两；10力至12力，用筋1斤10两、胶10两；13力至15力，用筋2斤、胶12两；16力至18力，用筋2斤6两、胶14两①。清代弓箭种类名称很多，官阶品秩不同，弓的尺度纹饰也各异，按战斗、田猎、校阅、信号等不同的用途，也有不同的形制。训练、习武用的弓，重练力气，力大者可拉开数十斤甚至上百斤之弓。就使用材料来说，考试用弓，多以榆木为干，丝做弦；战斗用弓，重在射的，不求力大，但求准确，多用鹿皮做弦。箭的区别主要在箭头：战斗用箭，箭头用铁制造，尖形的叫梅针箭，棱形的叫钺箭；训练用箭，箭头用木制造，有孔，叫骲箭，又叫响箭。此外，围猎用箭叫哨箭。官员在箭的羽间写衔名，兵丁写姓名。撒袋也按官的品位高低配带。弩有弓弩、弹弩，但在清代已不多使用了。

标枪是用臂力投掷的兵器，用木或竹杆制成，铁镞。绿营装备有手镖、犁头镖、铁头镖等，其形制与明代基本相同。因其投掷距离和杀伤力有限，随着鸟枪的普遍使用而逐渐被淘汰。

飞叉是满洲八旗常用的传统兵器，铁铸，长约9寸，叉头约占三分之一。用插袋盛装，斜背在肩后，头向上，可用来在几步之外叉敌人。

防护装具有甲胄、盾牌。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清制，1斤=16两，约合596.8克。

清代甲胄的名称很多，据乾隆二十一年《钦定工部则例造盔甲式》，有马兵绣蟒铁盔、步兵绣蟒铁盔、铜虎头盔、铁虎头盔、棉盔、马（步）兵有裙袖绣花蟒铁甲、有裙袖铁钉棉甲、锭铜护心镜铜钉棉甲、战裙、夹布滚衣等63种。除所用材料有铁、铜、皮、棉的不同外，其形制并无大的差别。胄，又叫盔，以铁（或铜）制成帽形，上锐下平，合缝处压以铁梁，叫“盔梁”，盔前安一铁占，叫“遮眉”，上遮盖一铁檐，下为覆碗形的护额，另外有用锦缎做表里、中敷铁叶、外面钉以金属钉的护项、护耳、护颈。盔顶竖有金属管，以插盔枪和表明官职等级的各种饰物。棉盔是下层官兵用的，主要用棉花和缎、布制成。甲是一种防护服，用料根据官品高低而异。贵族用的铁甲，用绸缎做表里，中敷铁叶，外面钉铜或金、银质的钉子；一般官兵用的棉甲，用绸或布做表里，内装棉花，外钉铜钉。将校和兵丁甲胄的颜色，各从旗色。清代盔甲比明代轻便，更适于战斗要求。清中叶大量使用火器后，甲胄的防护作用虽大大降低，但仍是部队的重要装备，直至晚清时才停止使用。

盾牌多沿用或比照明代仿制，有藤牌、虎头皮牌、燕尾牌、挨牌、圆木牌、盾等。例如，盾，木制，长2.6尺，下阔1.3尺，绘龙首，横木二道，系藤挽之。虎头牌，长2.9尺，上宽1.5尺，下宽1.1尺，蒙以革，面绘虎头双爪，背横木二道挽之。因其多用竹、木、藤制成，所以对矢石、枪刀等冷兵器有一定防护能力。清中叶火器大量使用之后，盾牌则逐渐被淘汰。

此外，在军器范围内尚有旗纛、营帐、梯冲、金鼓等。

清军旗纛，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钦定工部则例造旗纛式》①，有镶火焰边贴金云蟒缎纛、镶火焰边贴金云蟒什长旗、贴金飞虎牛肚式缎纛、贴金飞虎牛肚式小缎旗、方式镶圆月心绸纛、方式镶圆月心绸什长旗、大帅旗、布标旗等共98种，各以颜色、形状、图案以及尺寸的不同来区分部别和官员的职级。八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

旗旗纛，“各以其色为辨”①，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均为方幅，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均左平右锐，镶边，其中镶黄、镶白、镶蓝三旗皆红缘，镶红旗白缘。都统旗中绣行龙图案，八旗佐领、领催旗，满洲、蒙古不施绘绣，汉军绣飞虎图案，汉军藤牌营参领、领催旗绣飞熊图案。旗纛尺寸亦各不相同。都统旗，方幅者宽5尺，长5.8尺；左平右锐的镶边旗宽5尺，中长6.4尺，上下各长4.6尺，杆长皆1.3丈。佐领纛长4.2尺，宽5尺，竿长1.2丈。护军校小旗三角，直长1.2尺，斜长2.3尺，竿长5.5尺。绿营旗纛，直省标、营大纛皆绿色，裁幅为三角，宽5.8尺，直长5.8尺，斜长1丈，边作火焰形，或绘云蟒，或绘飞熊，随地而异，制无定式。绿营大帅旗，用黄布料，方幅广1.8丈，长1.4丈，两面大书“帅”字，加号带长1.5丈，广1丈，竿长1.6丈，刻木葫芦为顶。对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及其补授时的旗制，以及盛京、江宁、西安、吉林、杭州、成都、广州、伊犁诸将军和热河、京口、归化、山海关、青州、凉州、察哈尔等都统、副都统的旗制，也有明确规定。

帐房则有官用帐房、兵丁帐房的区别。官用帐房，用蓝布制造，高6.5尺，下宽1.2丈，深6.4尺，上施梁为脊，用两柱支撑，幕布斜垂至地，如人字形，两边用布围，下加垂檐7寸。王、贝勒、贝子所用的毡帐，穹顶衔椽，幕用白毡，椽用斜竹，使幕布和椽交叉为墙，外围白毡，下围朱帘，顶高9尺，墙高4尺，径1.4丈。还有一种供校阅用的凉棚，用蓝布搭成，分单、夹两种，长1.8丈，横2.7丈，中间用横梁为脊，阔9尺，两端承柱，高1.74丈，檐分四面，高7.5尺，周围用10柱支撑，用布围为墙，前开两窗，中开门，后用白布为屏，彩绘五彩麒麟。兵丁帐房，用白布制作，如职官帐房之制。

---

① 《清朝通典》卷七八，《兵·旗纛》。

二、冷兵器的制造、配发和管理

"凡军器，造自工部，部掌其政，制度有定式，给发有定数，简阅有定期，年久朽损或出征残阙者，准如数修补。官兵新旧接代，令交明军器。自制者给直（值）。营伍赢余军器，令官兵典守以备用。有损敝者毁之，私卖私典者论。"① 这是军器制造、配发与管理总的原则。

关于军器的制造，大体可分为中央制造和地方制造两种。顺治初规定，"军器由兵部图式，移文工部制造。"② 顺治五年（1648年）又规定："八旗兵丁需用甲胄、军器，移文工部制给，或给银令其自制。直省兵丁需用铠仗，动支本地钱粮造给，报部核销。其守护陵寝兵丁及八旗新满洲、宁古塔新满洲人等应给弓箭甲胄等项军器，该管大员奏准咨部，弓箭由部给发，甲胄等项由部转行工部造给。"③《大清会典》更明确规定："八旗各营需用军械，移文各承办处制给，或给银令其自制。各省绿营军械，动支钱粮造给，报部核销。"④ 这就是说，八旗兵器由中央制造，而绿营兵所用兵器，要由直省督抚题请就地制造，并需具题经兵部核准。又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七五，嘉庆十二年（1807年）定，直省各标营，遇有应行修制军装器械，需用银数在1000两以上，由督、抚造册具题，1000两以下，造册兵部，兵部均按例核明，俟核准之后，方准动项修制请销。如不候部文，擅自动项修制报销的，将承办、出咨各官照添建营房率行请销例议处。这些规定，都是为确保军器制造的权柄操于中央，防止地方任意制造。

---

① 乾隆《大清会典》卷六七，《兵部·武库清吏司·军器》。

② 《清朝通典》卷七八，《兵·军器》。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一，《兵部·军器·军器通例》。

④ 光绪《大清会典》卷五二，《兵部·武库清吏司》。

军器配发，一般是根据军器的性能、官职的大小和兵丁的职责而定。“凡给发军器，金鼓以示进退之节，海螺以定朝昏之聚散，旗纛以一瞻视，甲胄以卫身，器械以制敌。各营兵之专习者为弓箭，为鸟枪，为炮，为藤牌。兼习者，为长枪，为大刀，为挑刀。水师则有排枪、钩镰枪、标枪、大斧、火箭之属，水陆异用，险易异宜。”① 同时，还要“各辨其等与其式，颁则定以数。”②

军官所用军器，按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配发。例如，八旗世爵及文武官各备甲1、胄1、弓2、撒袋1、佩刀1。其箭矢数视品秩之大小而定，公550支，侯500支，伯450支，子400支，男350支，轻车都尉250支，骑都尉200支，云骑尉150支；武官，一品至五品视同子、男至云骑尉，六品以下的均100支。直省督、抚、提、镇及副将、参将以下官，应备弓矢甲胄，各按品级定数，与八旗武职相同③。

兵丁所用军器，顺治五年（1648年）规定：马兵每名给甲1、胄1、撒袋1、弓1、箭40、腰刀1；步兵每名给甲1、胄1、腰刀1，其步兵内之弓箭兵给弓1、箭30，长枪兵给长枪1，直省兵均照此发给。

关于军器的管理，规定了简核点验制度。凡京营军器，三年一次，由八旗奏请，特命王公大臣验阅。驻防八旗军器，各将军、都统、副都统于到任后，率所属简稽，同城限二个月，外属限三个月完成。游牧处官兵军器，由部奏请，特命大臣验阅。简核时，要检查其盈、绌、利、钝，并将情况上报。直省各标、营的军器，责成都司、守备为专管官，副将、参将、游击为兼管官，如有动用、修补，估价详报，给公项治备，岁终汇总送布政使核销。督、抚、提、镇每年委官察验，取具甘结，岁终汇疏保题，以册达部，稽核亏缺者以法论处。顺治四年（1647年）规

---

① 《清朝通典》卷七八，《兵·军器》。

②③ 光绪《大清会典》卷五二，《兵部·武库清吏司》。

定，兵丁甲胄及一应器械，由兵部每年春秋二季各简阅一次。次年奏准，每年秋季点验八旗护军营、骁骑营器械，春季点验前锋营、步军营器械，令该管官互相稽察。又定点验军器，若盔甲、弓箭等项全无者，官革职，兵鞭100，革退；军器缺少及箭上无字并书他人姓名者，官罚俸一年，兵鞭50；兵器损坏者，官罚俸两月，兵鞭20；如所属官兵盔甲、弓箭等项全无及军器缺少或损坏者，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惩罚。十六年，规定绿营兵官兵军器按季点验，并由兵部奏请，派大臣往各地阅视，三年一次。

雍正十年（1732年）议准，直省各营军装器械，属总督、巡抚所辖的，由督抚委官盘察；提督所辖的，由提督委官盘察。各镇，属督、提统辖的，由该镇委官盘察，送督、抚察核；若无督、提统辖，各该镇委官盘察。年终，都要将盘察的军装器械数目，分别标营造册，保结送兵部察核。如保题后仍有缺少，将从前盘察官罚俸六个月，督、抚、提、镇罚俸三个月。倘委官明知缺少，伙同捏结报称并无缺少的，降三级调用①。

清政府特别规定："禁其私造私毁"②。对于私藏私造兵器，看守仓库不经心而丢失军器，偷窃、私卖兵器，汛守处所及本营衙署失火烧毁军器者，将兵民及管官等，均照例分别议处治罪。这些规定客观上对社会治安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统治阶级的意图是防止人民反抗。

第二节　火器

一、火炮、鸟枪、火药的种类和性能

（一）火炮

清代火炮，名称繁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钦定工部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

② 光绪《大清会典》卷五二，《兵部·武库清吏司》。

则例造火器式》开列了85种不同名称的火炮：母子炮、威远炮、靖氛炮、决胜炮、得胜炮、行营炮、靖平炮、提行炮、铁行炮、靖海炮、靖蛮炮、灭逆炮、神威炮、荡寇炮、红衣炮、西洋炮、发贡炮、贡炮、带子贡炮、霸王鞭炮、赵公鞭炮、百子鞭炮、鞭炮、百子炮、班机炮、过山鸟炮（又名鸟机炮）、佛郎机炮、劈山炮（又名开山炮）、信炮、号炮、河塘炮、威风炮、涌珠炮、连珠炮、转轮炮（又名腰边炮）、独弹炮、车炮、喊炮、响炮、地雷炮、通关炮、扳槽炮、鲎尾炮、斗头炮、四把连炮、大将军炮、二将军炮、将军炮、磨盘炮、漆炮、西瓜炮、千里马炮、定更炮、独子砂炮、砂炮、亘底炮、碗口炮、坐地炮、九箍炮、竹节炮、无名大炮、无名中炮、无名小炮、虎威炮、追风炮、追风独眼炮、虎尾炮、虎蹲炮、马蹄炮、马腿炮、马卵炮、牛蹄炮、牛腿炮、牛尾炮、鸡脚炮、替子炮、笔管炮、静街炮、铜沙炮、铜百子炮、大小铜炮、铜贡炮、铜马卵炮、千里马铳、扳槽铳。① 这些火炮的命名，有的是根据其形制，如磨盘炮、马脚炮、牛蹄炮之类；有的是根据其用途，如信炮、号炮、定更炮；有的是根据炮弹的不同，如西瓜炮、百子炮、独弹炮；有的是沿袭明朝火炮名称，如佛郎机炮、发贡炮，红衣炮其实也属于这一类；有的是根据其威力，如虎威炮、追风炮，等等。上述85种不同名称的火炮中，有很多种火炮由于缺乏文图资料和实物，现在已经难以了解其本来面貌了。

清代火炮的种类，《清朝文献通考》曾进行过区分：按材质分为铁质、铜质、铁心铜体、铜质木镶、铁质金饰几种；按重量分为轻型、重型两种。当时的新型火炮，如果按装填弹药方式和弹道特性等方面综合考察，大致可分为红衣炮、冲天炮、子母炮三种类型。此外，还有神机炮等中国传统型火炮，等等。

1、红衣炮类型

红衣炮是明末从欧洲传入的一种大型前装火炮，明代称为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器》。

"红夷炮"，清代因讳"夷"字改称"红衣炮"。这种火炮身管长，身管与口径之比多在20：1以上；管壁较厚，且从炮口至炮尾逐渐加厚，能承受较大的膛压；炮身置有准星、照门，中部有双炮耳，架于炮架之上，既能保持炮身的平稳，又可俯仰，以控制射程，故具有弹道低伸、射程远、命中精度高、杀伤力大等优点，是当时最具威力的火炮。清代的火炮，多为红衣炮型。

（1）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重型火炮。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造，铜质，共61门。"重自三千六七百斤至六七千斤，长自九尺七寸五分至一丈二尺，膛口自三寸八分至四寸九分，用铁弹自十斤至二十斤，火药自五斤至十斤，铁轴炮车均全"①。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有《武城（成）永固大将军炮图》，并详记该炮的形制："前弇后微丰，底如竹节。重自三千六百斤至七千斤，长自九尺六寸至一丈一尺一寸。杂锲花文、蕉叶文、回文，隆起十道，皆锲星文，近口为照星，底左右镌：'大清康熙二十八年铸造武成永固大将军用药十斤生铁炮子二十斤星高四分九厘制法官南怀仁监造官佛保硕思泰作官王之臣匠役李文德颜四'，清、汉文。小者受药五斤，铁子十斤。载以四轮车，辕长一丈五尺，铁环七。"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此炮实物，炮身前细后粗，中部有双炮耳，尾部有球冠，炮身镌有满、汉两种文字，与光绪《大清会典图》所记基本一致，仅"星高四分九厘"改为"星高六分三厘"。经实测，炮长362厘米，炮口内径155毫米，外径461.5毫米，炮尾底径528.7毫米，膛深330厘米，铁弹重10千克。

（2）神威无敌大将军炮

重型火炮。康熙十五年（1676年）造，铜质，共52门。"内：重二千二百七十四斤铜炮八位，各长七尺七寸，口径一尺，膛口三寸七分，底径一尺二寸，铁弹重八斤，用火药四斤；重一千六百十有三斤铜炮二十四位，各长七尺六寸，口径八寸五分，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器》。

膛口三寸三分，底径一尺一寸，铁弹重六斤，用火药三斤；木镶大炮二十位，各重八百十有七斤，制同上。炮车均全”①。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有《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图》，对该炮的形制有较详细的介绍：“前弇后丰，底如覆盂。重自二千斤至三千斤，长自七尺三寸至八尺。不锲花文，隆起五道，面镌‘大清康熙十五年三月　日造’，汉文。受药自三斤至四斤，铁子自六斤至八斤。载以三轮车，横梁承炮。辕长一丈二尺二寸，后二轮，辕间一轮，各十有八辐。辕旁施铁环以挽之。”

1975年在齐齐哈尔出土一门，炮身完好，无炮车。该炮上镌满、汉两种文字：“神威无敌大将军　大清康熙十五年三月二日造”。炮身前细后粗，有五道隆起，中部有双炮耳，尾部形如覆盂，底端为球状。炮口有准星，底部正上方有照门，以备瞄准。火门为长方形。炮膛底部尚遗存一枚实心铁弹。经实测，炮重1000千克，长248厘米，炮口内径110毫米，外径275毫米，炮身底径345毫米，弹重2.7千克，直径约90毫米。

(3) 神功将军炮

重型火炮。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由木镶炮改造，共80门，“各重千斤，长七尺一寸，膛口二寸七分，用铁弹三斤八两，火药一斤十二两，炮车全”②。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有《神功将军炮图》，记其形制：“前弇后微丰，底如覆笠。重千斤，长七尺。不锲花文，隆起五道，近口为照星，中镌‘大清康熙二十八年铸造神功将军用药一斤十二两生铁炮子三斤八两星高四分制法官南怀仁监造官佛保硕思泰作官王之臣匠役李文德颜四’，汉文。载以三轮车，铁索承炮，辕长一丈二寸，辕间板轮一，不施辐”。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神功将军炮，炮长189厘米，炮口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四，《工部·军火·铸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记重一千六百十三斤的为铁炮，误。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器》。

内径50毫米，外径180毫米，炮身底径215毫米，膛深146厘米。管心铸铁，口箍、尾球镶铜，炮身以木包裹，火门有盖，开在后铜箍上。炮车为三轮平板，后立螺旋铁柄，以调整火炮俯仰角度。

（4）神威将军炮

轻型火炮。康熙二十年（1681年）造，铜质，共240门，“各重三百九十斤，长六尺六寸，火门后径五寸七分，口径三寸三分，合膛铅子重十八两。用火药八两，中的至一百弓；用火药九两，中的至一百五十弓。口箍之上立星表，与甲乙线相等，炮车全”①。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有《神威将军炮图》，记其形制：“前弇后丰，底如覆笠。重四百斤，长六尺七寸。不锲花文，隆起五道。近口为照星，旁为双耳，中镌‘大清康熙二十年铸造神威将军用药八九两铅子十八两星高七分制法官南怀仁监造官法保钱齐布陶三泰宁古塔吴喇代匠役李文德颜四’，汉文。载以双轮车，辕长九尺五寸，不加绘饰，端饰铁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此炮实物。该炮前细后粗，底如覆笠，炮身有隆起六道，前有准星，后有照门，中设双炮耳。火门圆孔形，孔周围有正方形浅池，上安一活动盖，以防止火门和药室内火药受潮。实测数据：炮长212厘米，炮口内径53毫米，外径110毫米，炮身底径约19厘米，炮膛深198厘米。

（5）制胜将军炮

轻型火炮。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造，铜质，共48门，“内：四十六位，各重五百斤，长五尺一寸，膛口二寸四分，用铁弹三斤，火药一斤八两；重三百六十斤者二，各长五尺，用铁弹二斤，火药一斤”②。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八有《御制制胜将军炮图》，记其形制：“前弇后丰，底分瓜棱。重五百斤，长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器》。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四，《工部·军火·铸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记该炮“膛口三寸四分”。

五尺。不锲花文，隆起四道，近口为照星，面镌‘大清康熙三十四年景山内御制制胜将军用药一斤八两生铁子三斤星高五分远放酌量加药移与斗上眼用之总管监造御前一等侍卫海清监造官员外郎巴福寿笔帖式硕思泰噶尔图匠役李文德袁四’，汉文。载以双轮车，通髹朱，横梁承炮，辕长一丈，前横木二道，轮各十有八辐。”

(6) 威远将军炮

轻型火炮。铜质，共26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造10门，“各长三尺一寸，重一百七十斤，铅子重十九两”；康熙五十八年造16门，“各长三尺，重一百四十斤，铅子重十五两”①。

此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门，火门方形，火门盖已缺，有准星、照门，炮身铭文用满、汉两种文字：“大清康熙五十七年景山内御制威远将军总管景山炮鸟枪监造赵昌监造官员外郎张绳祖笔帖式张秉义工部员外郎阿兰泰笔帖式杨天禄匠役李文德”。实测数据：炮长107.5厘米，膛深91厘米，口径50毫米。山海关城楼兵器陈列室展出的两门，一门长101厘米，口径40毫米，一门长100厘米，口径50毫米，满、汉铭文均是：“大清康熙五十七年景山内御制威远将军总管景山炮鸟枪监造赵昌监造官员外郎张绳祖笔帖式西尔格工部员外郎实相笔帖式康格匠役李文德”。

另有一种铁质威远将军炮，雍正五年（1727年）造，共10门，“各长一尺七寸七分，重四十五斤，铅子重二十八两，用火药十四两”②。

(7) 龙炮

轻型火炮。铁质金饰。康熙十九年（1680年）造8门，“各长五尺七寸，重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铅子重十三两至十四两”。康熙二十五年造1门，“长四尺五寸，重八十斤，铅子重五两二钱”③。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有《龙炮图》，记其形制：“龙炮，铸铁，前弇后丰，底如覆笠。重百斤，长四尺五寸。通

①②③《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器》。

髹以漆，口镀金蝉文，中为云龙，近后为蟠螭。隆起六道，加星斗，旁为双耳。受药二两四钱，铁子五两二钱。车如子母炮第一之制。”

(8) 铁心铜炮

轻型火炮。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造，共85门，“各长五尺八寸，重一百斤至一百二十斤，铅子重四两五钱至五两”①。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有《铁心铜炮图》，记其形制：“铁心铜炮，铸铜为体，内以铁。前弇后微丰，口如螺旋。重一百十斤，长五尺六寸。青绿色，不锲花文。隆起六道。受药二两四钱，铁子四两八钱。载以四轮车，辕长一丈二尺一寸，辕端横木加铁环六，余俱如神威大将军炮车之制。”

2、冲天炮类型

冲天炮是一种短身管、大口径的前装滑膛曲射火炮，身管长仅为口径的数倍，发射爆炸弹，射程远近受射角和装药量的影响，在射角45°的情况下射程最远。这种火炮因形似石臼，在西方一般称为“臼炮”，为迫击炮的前身，多用于野战和攻城。

(1) 威远将军炮（铜冲天炮）

与红衣炮类型的“威远将军”炮同名而不同制，此系曲射火炮。铜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造5门，“钦定名号为威远将军（即冲天炮）。各长二尺一寸，重二百八十五斤至三百三十斤，生铁弹重二三十斤”②。康熙二十九年造铜冲天炮8门，“各长二尺三寸，重五百六十斤，生铁弹重三十斤”③。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八有《御制威远将军炮图》，记该炮“前哆后敛，形如仰钟。重七百五十斤，长二尺五寸，口锲花文，周镌梵文，中双鱼形间以荇藻，隆起五道，底横连铁轴，受药自八两至六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器》。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四，《工部·军火·铸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则称此炮“钦定名为‘威远大将军’”。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四，《工部·军火·铸炮》。

斤，铁子自三十斤至三十五斤……载以四轮车，通髹朱，轸长四尺九寸，面立木以限铁轴，前后横梁，当炮中下承两轴，贯板轮不施辐。”炮弹为圆形爆炸弹，内装火药，引线长出弹外。发炮前，首先在炮膛药室填满火药，间以木，加土寸许，然后把铁弹从炮口装入前膛，弹外用火药填实，再加潮土，并用蜡封炮口。点放时，先点燃炮弹的引线，然后迅速点燃火门烘药。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此炮一门，炮身有方棱铜箍六道，后部满、汉文阴镌：“大清康熙二十九年景山内御制威远将军总管监造御前一等侍卫海青监造官员外郎勒理笔帖式巴格匠役伊邦政李文德”。炮长69厘米，口径21.2厘米，前口壁厚7.9厘米，底径约32.5厘米。炮膛分为前膛和药室两部分，前膛深37.5厘米，药室深16厘米，直径10厘米。

(2) 铁冲天炮

与威远将军炮、铜冲天炮形制基本相同，据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冲天炮图》：“冲天炮，铸铁，前哆后敛，形如仰钟。重自三百斤至三百八十斤，长一尺九寸五分。隆起五道，旁为双耳，近耳锲花文。受药自六两至一斤，铁子二十斤。用法如御制威远将军炮。载以四轮车。”

3、子母炮类型

子母炮是一种轻型后装火炮，由一门母炮和若干子炮组成，是明代由葡萄牙传入中国的“佛郎机铳”的改进型。“子母炮，皆铸铁，前弇后丰，底如覆笠”①，后腹开口以纳子炮。战时，子炮可预先装填好弹药，轮流装入母炮后腹，可以减少装填弹药的时间，提高火炮的发射速度。清代子母炮类型火炮主要有康熙年间的铁子母炮、雍正年间的木柄子母炮以及奇炮三种。

(1) 康熙年间的铁子母炮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造202门，“各长五尺五寸，重八十斤至百斤，铅子重四两至六两”。康熙六十年造6门，“各长五

---

① 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

尺，重百斤，铅子重五两”①。据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该炮“重九十五斤，长五尺三寸，通髹以漆，不锲花文，隆起五道，加星斗，旁为双耳，子炮五，如管，连火门，各重八斤，受药二两二钱，铁子五两，炮面开孔与子炮相称，用时内之，固以铁钮，递发之相续而速。”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年间的子母炮，母炮炮身前细后粗，底如覆笠，炮身有箍五道，前有准星，后有照门，中有双炮耳，膛底相对有长方小孔，以铁钮固定子炮和母炮。母炮长182厘米，口径32毫米。子炮呈圆锥形，空重6.5千克，长25厘米，口径31毫米。

(2) 雍正年间的木柄铁子母炮

据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该炮“重八十五斤，长五尺八寸，末加木柄，后曲而俯，以铁索联于车上”。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年间造木柄铁子母炮，身管细长，无箍，前、后部镀金花纹和云龙，末端镶木柄，曲而俯，柄上开槽置火绳枪机。该炮用于作战时，炮手需手握木柄，以食指扣动扳机，火绳向下，接触子炮火门，点火发炮。该炮母炮管长221.5厘米，口径26毫米；子炮空重2.175千克，长26.5厘米，口径26毫米。山海关城楼兵器陈列室陈列的一门木柄子母炮全长226厘米，炮管长172.5厘米，口径25毫米，口外径52毫米。

据有关资料，雍正五年（1727年）造子母炮34门，其中，“镀金子母铁炮十七位，重四十八斤者六位，各长五尺二寸，铅子重四两，用火药二两；重四十斤者一位，长五尺五寸，铅子重二两六钱，用火药一两三钱；重三十六斤者十位，各长五尺五分，铅子重二两五六钱，用火药一两三钱”，“镀银子母炮，重四十八斤者十位，重三十六斤者四位”，“子母铁炮三位，重四十八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器》。

斤者一位，重三十六斤者二位。尺寸均与锓金铁炮同"①。

此外，嘉庆五年（1800年）曾造子母炮55门，"每炮一位，身长五尺六寸，子炮五个，每个长八寸五分，膛口均径一寸。每子炮一位，随插捎、朝天镫等什件一份。各共重一百五十斤有零。铅子重三两，用火药一两五钱，烘药二分，火绳二寸"②。

（3）奇炮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造，铁质，"长五尺六寸，重三十三斤，铅子重二两五钱"③。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有《奇炮图》，记其形制："奇炮，铸铁，后通底，旁加牡钥。重三十斤，长五尺五寸六分。通髹以漆，不锲花文。近口为照星，中加斗。素铁火机，旁为双耳。子炮四，如管，连火门。受药自九钱至一两，铁子二两六钱。后加木柄，曲而俯，下为屈戌，开柄以内子炮。从牡钥中固以铁钮，递发之相续而速。柄末缀立瓜形，青缎为之。载以铁盘，铁錾承炮耳，下以三木撍之，末铁镈"。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奇炮一门，炮管长180厘米，口径27毫米，有准星、照门，膛底贯通，可装入子炮。炮管后装木柄，下为环纽，可以开合。每奇炮1门，配子炮4枚。子炮呈锥形，长14厘米，口径28毫米，重0.73公斤。炮置于三脚支架上，便于调整射击方向和角度。奇炮为后装炮。发炮前，打开木柄，从膛底装入子炮，然后合上木柄，用铁钮固定。木柄前部置火绳枪机，以绳索控制，点火方便。

4、神机炮类型

神机炮是一种中国传统型火炮。由于没有准星、照门，射击精度受到限制。在佛郎机和红夷（衣）炮传入中国之后，神机炮已显得落后了，但仍是清军装备的主要火炮之一。神枢炮也属于这一类型。

---

①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器》。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四，《工部·军火·铸炮》。

(1) 神机炮

据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神机炮，铸铁，前微弇，后微丰，长二尺六寸五分，中隆起四截，不加星斗，不锲花文，载以四轮木箱，轮不设辐，通髹朱。"

原北京历史博物馆收藏有道光年间制造的一门神机炮，长47.5厘米，口径135毫米，炮身铭文有"道光三年九月制造"等字。

(2) 神枢炮

铁质。形制与神机炮相似，据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神枢炮"长二尺四寸七分，中隆起四道，亦载以四轮木箱，如神机炮之制"。

(3) 得胜炮

铜质。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得胜炮"前弇后丰，口如铜角，重三百六十五斤，长六尺三寸……隆起三道，旁为双耳。受药六两，铁子十二两。载以双轮车，通髹朱，正箱为铁鋬以承炮耳，辕前后出，长一丈二尺六寸，皆施铁环，轮在中，各十有八辐"。

5、其他

(1) 九节十成炮

乾隆十三年（1748年），第一次对大金川用兵期间制造。铜质。"重自七百九十斤至七百九十八斤，长自五尺一寸至六尺九寸……用药自一斤四两至一斤八两，铁子二斤八两，载以四轮车"①。该炮的特点是炮管前后粗细若一，分为九节，除第一节炮口和最后一节末端，每节一端为阳螺纹，另一端为阴螺纹。在不便通行的山川河湖之地，可以"分负以涉险远"，作战时又可合成一体。炮车中安一带有半圆形缺口的立木，炮身即安放在半圆形缺口处。立木左右各有一铁柱，夹住炮身，使之稳固。右铁柱长于左铁柱一倍，上端向前弯曲，装瞄准具。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四，《工部·军火·铸炮》。

(2) 虎尾炮

康熙六十年（1721年）造，铁质，共2门，“各长三尺，重二十七斤，铅子重二两”①。虎尾炮是清代重量最轻的火炮，具体形制不详。

(3) 信炮

铁质，筒状，上下若一，“自四十斤至八十斤，长自一尺六寸至一尺八寸，不锲花文，隆起四道，受药八两”②。将炮竖立于地面，装入火药，朝天发射。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有《行营信炮图》。信炮是阅兵、训练、遇有紧急情况以及作战中用以发布号令的火炮。顺治十年（1653年）在京师白塔山设“信炮处”，正阳、崇文、宣武等内九门各备信炮五门。紧急情况时鸣放信炮，八旗官兵闻炮声立即披甲提枪，赶赴预定岗位，文职官员则奔赴午门听候命令。

(4) 台湾炮

该炮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清军缴获郑军的火炮，铜质，“前弇后微丰，口形如钵，重自三百斤至七千斤，长自四尺三寸至一丈二寸，杂锲花文、蕉叶文、蟠螭人兽形，间以番书，隆起十道，中为龙文双钮，可贯绳悬之。受药自一斤一两至十斤，铁子自二斤二两至二十斤。载以四轮车”③。

(5) 回炮

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在平定大小和卓的战争中缴获的一种轻型火炮，铁质，“前弇后丰，长五尺，口锲蕉叶文，通鋄金银花纹，隆起七道，素铁火机”④，配有木鞍，用骆驼等驮载。

（二）鸟枪

鸟枪是清代最主要的单兵用火器。清代鸟枪的名目，亦如火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器》。

②③④ 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一〇〇。

炮一样繁多，《皇朝礼器图式》所列枪名达53种，大体可分为御制枪、御用枪、花枪、交枪、套枪、线枪、奇枪、兵丁鸟枪等几大类。这些类别，多从火枪的外部特征来区分，如所谓的花枪，不过是枪身“刍起为花文”；所谓的线枪，不过是枪身四周为八棱，如线形，等等。各种不同名目的鸟枪，在形制结构上并没有大的不同。其分类，如按发火装置，可分为燧发枪和火绳枪；按有无膛线，可分为线膛枪和滑膛枪；按装填弹丸方式，可分为前装枪和后装枪。

1、火绳枪

火绳枪是一种利用火绳枪机点火发射的火枪。火绳枪机是早期的机械点火装置，由蛇形杆和扳机组成，蛇形杆前端夹有阴燃的火绳。发射时，扣动扳机，通过杠杆或弹簧作用，将蛇形杆推向下，使火绳接触枪管尾部的火门，点燃烘药，烘药引燃枪膛内火药，将弹丸射出。

（1）大线枪

线枪是清代最原始的一种火枪，前装、滑膛，没有准星、照门，不用搠杖（通条），弹用“砂子”（即散子）。据《皇朝礼器图式》载，线枪有20种，大线枪是其中之一。大线枪“重八斤十四两，长五尺五寸，素铁火机，受药一钱五分，砂子八钱”①。其余的19种线枪与大线枪构造基本相同，所不同的仅是枪的重量、长度以及装药、砂子的多少，枪重从八斤八两到四斤十两，枪长从五尺七寸到四尺，装药从一钱五分到一钱，砂子从八钱到四钱。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九有《大线枪图》、《轻锐花线枪图》。

（2）御制禽枪

康熙年间御制，前装、滑膛，有准星、照门，木枪床前端开一洞穴插搠杖，枪床下置叉架，弹丸为铁子。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御制禽枪，全长157.3厘米，筒长110厘米，口径14毫米，

① 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九。

枪托上有铭文："御制禽枪长三尺五寸重六斤药重二钱子重三钱四分"。另有一种小禽枪，"重五斤七两，长三尺二寸八分，受药一钱五分，铁子一钱七分"。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八有《御制禽枪图》、《御制小禽枪图》。

(3) 御制奇准神枪

乾隆年间御制，前装、滑膛，有准星、照门，置搠杖、叉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此枪，全长 203 厘米，筒长 155.6 厘米，口径 17 毫米。枪筒上镌汉字"大清乾隆年制"，枪床尾部的雕云纹白玉托上镌"奇准神枪长四尺五寸重九斤二两药二钱子五钱"汉字。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八有《御制奇准神枪图》。

(4) 兵丁鸟枪

前装、滑膛，木枪床下置铁叉架。"重六斤，长六尺一寸。不锲花文，素铁火机。受药三钱，铁子一钱"①。兵丁鸟枪为清军装备用枪，以枪托的颜色区分部队部别，满洲、蒙古八旗为黄色，汉军八旗为黑色，绿营兵用红色。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九有《鸟枪图》。

(5) 十喜花膛缅子枪

嘉庆、道光年间制造，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为前装式线膛火绳枪。全长 150 厘米，筒长 106.5 厘米，口径 16 毫米。枪筒上有准星、照门，筒后部有银镀金"喜"字款。木床上镶铜，刻有"用药贰钱铅丸五钱贰分壹百弓有准"等字，下安叉架。膛内有较深的直槽，可以减少弹丸与膛壁的摩擦，便于从枪口装填弹丸。装弹前要用松软的织物将弹丸包好，再用搠杖将其捣至膛底，使弹丸与膛壁之间没有空隙，以防止射击时从直槽泄漏膨胀的气体。

(6) 抬枪

是一种前装、滑膛、用火绳点火的重型鸟枪，道光年间制造。长七尺五寸，木鞘长五尺，用药三两五钱，铅子重五钱，可

---

① 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九。

装五个，射程可达三百步①。

（7）奇枪

康熙、乾隆时期制造，为后装式滑膛火绳枪。奇枪枪管底部贯通，用以装填子枪；枪管一侧置铁钥，以与枪床固定；枪柄与枪管后端相连接处可以开合，以便于将子枪推入后膛。每杆奇枪配子枪 6 枚，子枪为一管形铸铁壳，“长二寸四分”，有底，底侧有火孔，内装弹药。射击前，先将枪柄向下打开，将装填好火药和弹丸的子枪推入后膛，子枪的火孔恰与火门相通，然后将枪柄闭合，用铁钥固定。发射时，火门烘药被火绳点燃后，火焰由火孔进入子枪，引燃里面的火药，将弹丸射出。由于子枪内可以预先装好火药和弹丸，所以奇枪有效地提高了装填和发射速度。不同名目的奇枪，其重量、长度、弹丸大小各不相同。树鸡神花奇枪，“重六斤，长三尺五分，……受药二钱，铁子三钱八分”；花奇枪，“重五斤十二两，长三尺五分”；花线奇枪，“重四斤十二两，长三尺三寸五分，……受药二钱，砂子三钱二分”②。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九有《树鸡神花奇枪图》、《花线奇枪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杆奇枪，全长 130 厘米，铸铁枪管长 108 厘米，口径 13 毫米。

2、燧发枪

燧发枪是利用燧石枪机点火发射的火枪，比火绳枪先进，具有点火可靠、使用方便等优点。16 世纪初，世界上最早的转轮式燧发枪在德国诞生，约在明末传入中国。清代前期的燧发枪有转轮式、撞击式等不同的类型。

（1）御制自来火二号枪

自来火枪是清代对燧发枪的统称。此枪为康熙年间御制，系转轮式燧发枪，前装、滑膛，“重三斤，长二尺八寸，……受药

---

① 耆英：《酌拟添造抬枪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898 页。

② 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九。

一钱二分，铁子一钱八分五厘"①。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实物，全长135厘米，筒长90厘米，口径11毫米。枪筒上置准星、照门，枪床上安叉架、插搠杖，枪机为带金属弦的钢质齿形转轮，机头呈鸭嘴形，衔燧石。发射时，上满轮弦后，扣动扳机，机轮转动摩擦燧石生火，点燃火门烘药。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八除有《御制自来火二号枪图》，还有《御制自来火大枪图》、《御制自来火小枪图》。

(2) 镶骨燧发枪

乾隆年间制造，撞击式燧发枪，前装、滑膛。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实物，全长118.5厘米，筒长88厘米，口径17毫米。有准星、照门，枪机头呈鸭嘴形，衔燧石，前竖火镰，火镰底部折曲扁平，即为火门盖，发射前呈关闭状态。机头内安压簧，通过制动锁与扳机相属。发射时，扳起机头，扣动扳机，机头下旋，利用压簧的弹力，燧石猛烈撞击火镰，产生火星，引燃火门烘药，进而引燃膛中火药。

上述鸟枪类别名目虽多，但用来装备部队的只有火绳枪类的兵丁鸟枪和抬枪两种，其余的火绳枪，以及技术比较先进的燧发枪，几乎全是皇帝狩猎用枪。

(三) 火药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明代的火药制造技术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火药配方中硝、硫、炭的比例与现代标准黑火药已相当接近。清代前期的火药，总体上说，大体维持在明代的水平上，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还有所下降。

清代火药分为军需火药、演放火药和烘药。军需火药与演放火药的配方相同，但军需火药是实战用火药，要求比较高，质量也比较好；演放火药又称常操火药，是供军事训练和演习用的火药，比军需火药质量要差。烘药是点火引爆用药，与普通火药的配比不同。清代前期的火药配方，见诸文献的并不多，傅禹纂辑

---

① 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八。

的《武备志略》刊印于康熙朝，其中虽有“制火药方”（硝五斤、黄一斤、茄杆灰一斤），但该书“惟钞撮《武经》诸书及明茅元仪《武备志》”①，实为《武备志》的删节本，所以不能据此认定其为清康熙朝的火药配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十八年时，“火药每万斤，用硝八千斤，硫磺一千五斤十两，广胶六斤四两。烘药每百斤，用硝八十三斤十两八钱，硫磺十有四斤七两五钱”②。这个火药配方，由于缺炭的用量，计算硝、硫、炭的配比自不能精确，但大体可以看出，硝的含量过高。《钦定工部军需则例》记载，乾隆年间，云南省配火药 1 斤，用硝 11 两 8 钱，硫磺 2 钱 1 分，柳炭灰 2 钱 1 分，硝、硫、炭的配比为 73.75∶13.12∶13.12。另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嘉庆二十三年规定，“配药百斤，计用熬过净硝八十斤，炭面十二斤八两，磺面十斤，共一百二斤八两（二斤八两预备抛洒）”；配造烘药，“计硝一两二钱八分，磺一钱六分，麻秸炭一钱九分二厘，共一两六钱三分二厘（三分二厘预备抛洒）”③。硝、硫、炭的配比，火药为 78.05∶9.76∶12.19，烘药为 78.43∶9.80∶11.77，比乾隆年间有所进步。到了道光年间，广西提督陈阶平加工制造的火药，硝、硫、炭的配比为 74∶11∶15，与现代标准黑火药 75∶10∶15 的配比已相差无几，所以“火药较前猛利，现在该省各营枪兵打靶，均已一律加远”④。因此，道光帝谕令两广总督、广西巡抚等督饬各营，均按照陈阶平的火药配方和制造方法，实力办理。又据道光二十年（1840 年）的资料，造火药 10 斤，“用牙硝八斤，磺粉一斤二两，炭粉一斤六两”⑤，在石臼中捣 3 万杵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〇，《子部·兵家类存目》。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四，《工部·军火·火药一》。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五，《工部·军火·火药二》。

④ 《清宣宗实录》卷二九〇，道光十六年十月丁巳，中华书局影印本。

⑤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六，《工部·军火·火药三》。

而成，硝、硫、炭的配比为 76.19:10.71:13.10。

清代火炮的炮弹，有实心弹和爆炸弹两种，实心弹又分实心铅弹和实心铁弹，从弹形上则有球体和长体的不同。使用爆炸弹的火炮是威远将军炮（冲天炮）。弹壳为铸铁，球形，中空，留一圆孔，置两耳铁环。用法是先从圆孔处装填部分火药，再用螺旋木缠药线，外裹绵纸，插进细竹筒里，放入弹内，下面药线长出一二寸以接触火药，上面药线长出六七寸于弹外，然后把弹壳内空处装满火药，以铁片盖住弹孔，并用蜡封固，即可往炮管里装填，以备发射。爆炸弹是一种威力巨大的炮弹，“迸裂四散，为用最烈”①。清代虽然很早就制造出爆炸弹，但是在演习和实战中却很少应用，以至于后来像林则徐这样的人都不知道清代有过这类炮弹。鸟枪弹丸有铁子（铅子）和砂子两种。铁子是一种与枪管口径一致的单个弹子，砂子则是一种散子，所以又叫喷砂。

二、火器的配发和管理

清代前期，火器的配发由兵部掌管。战争期间，重要的火器，往往根据需要，由皇帝随时调拨，如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坐镇江西的平寇大将军岳乐于康熙十四年（1675 年）奏请发 20 门西洋炮，康熙帝立即谕令：“南怀仁所造火炮，著官兵照数送至江西，转运安亲王军前”②。康熙十六年三月，康熙帝又将红衣炮 20 门发往正在围攻长沙的安亲王军中。和平时期，以集中使用和存贮为原则，配发清军各部。顺治初年，八旗各设炮厂、火药厂，以存贮火炮和火药。康熙三十年，建立八旗火器营，集中使用火器。火炮，内火器营炮营满洲八旗每旗配子母炮 5 门，其

---

① 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八。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五八，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庚子，中华书局影印本。

余大小火炮分存于汉军八旗炮局，各省清军按1000名甲兵装备火炮10门（威远炮4门、子母炮6门）的标准配发，郡邑城守、边海要隘及水师战船各存炮于其所，兵少及非险要处所则存炮于督抚提镇驻扎之地，需用时发放。鸟枪，内火器营枪营和外火器营以及汉军枪营每兵配发1杆，各省清军配发数额原无定限。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鉴于"各处营伍所用器械，向来原无一定之例"，武弁到任后往往以个人所好和擅长的兵器训练所属兵丁，"兵丁之技艺，每视该上司之去留以为转移，非训练专精之道也"，故谕令各省将军督抚提镇，除骑射要普遍学习外，部队应用何种兵器，应"因地制宜，酌定规制，永远遵奉"。当年议准，"官兵军器内鸟枪一项，能冲锐折坚，最为便利。如腹内省分，地势平坦，利用弓矢；至沿海沿边省份，山深林密，利用鸟枪。应将腹内省分，每兵千名设鸟枪三百杆，沿海沿边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四百杆"①。根据以上原则和规定，雍正五年至七年间，确定了各省兵器的编配，其中山东、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等省，鸟枪占50%以上，加上炮兵，火器约占60%左右，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火器编配比例最高，1000名兵中有鸟枪兵600名、炮兵100名，达70%。此后，除个别地区稍有修正外，雍正五年至七年的规定成为清前期清军兵器编配的定例。(见表)

火器的配发和使用，八旗和绿营有所不同：一是八旗中设有专门使用火炮和鸟枪的火器营，而绿营中则不设集中使用火器的部队；二是精良的火器，如子母炮等，只配发给八旗，绿营严禁使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太原总兵金国正上疏，请求捐造22门子母炮，发给所属绿营兵操练，兵部拟同意其所请，但康熙帝断然否定了兵部的意见，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② 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雍正帝又重

① 《清朝通典》卷七八，《兵·军器》。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六，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丁酉。

申此规定，并谕令各省将已装备绿营兵的子母炮全部换下送至京师。

雍正五年清军兵器编配表（‰）

地区	鸟枪兵	炮兵	弓箭兵	藤牌兵	长枪兵	大刀兵	片刀兵	挑刀兵
山东省	500	别设	300	100	100			
山西省	400	别设	600					
福建省	500	50	300	50	50	50		
浙江省	400	50	300	100	50		100	
广东省	500	100	200	100				100
云南省	600	100	200	100				
贵州省	600	100	200	100				
广西省	600	100	200	100				

火器的使用、更换、修理年限，均有明文规定，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钦定军器则例》规定，东北各城和京师旗营以及古北口、热河（今承德）、山海关等处的火炮，二十年更换一次；太原、河南、西安、杭州、福州、广州等地的火炮超过三十年才能更换，确实有炸裂的情况才“准其铸造”，满十五年而炮口、火门确有冲破、宽大现象的才“准其修理”①。

与冷兵器一样，火器也有简核点验制度，一是核查有无缺额，二是有无损坏，未满使用年限如有损坏，据情责令有关人员赔补，使用年限已满而不堪使用者，则造册报部重造，或由储备火器中调拨。

火药和炮弹、枪弹的消耗都有定量，并规定了训练演习时使用过的实心炮弹回收制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规定，各省清军每年演炮铅铁子照数拾回备用。雍正十一年（1733年），又规定了损耗比例：拣七耗三。道光十五年（1835年），规定更为具体：西安、凉州八旗兵和广西绿营兵，全用铅弹，要全数拣

① 《钦定军器则例》卷四，《驻防》。

回；盛京（今沈阳）、江宁（今南京）、广州满营，铅弹、铁弹兼用，铁弹全数拣回，铅弹拣七销三；京口、天津沿海等地，拣九销一；贵州省因山径丛杂，拣拾困难，可以拣六销四；其余的京师、外省满汉各营，不论铁弹、铅弹，都是拣七销三。鸟枪所用铅弹，除贵州一省是拣六销四外，其余地区一律拣七销三。

三、火器的制造

清代火器的制造，同冷兵器一样，分为中央制造和地方制造两种。凡中央制造者，皆由兵部定图式，交工部制造。康熙朝中央在京师制造枪炮的地方有三处：一是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康熙初年设立的养心殿造办处是为宫廷造办各项器物的机构，内设枪炮处，为皇帝制造枪炮，称为“御制”，如康熙时的自来火大枪、自来火二号枪、自来火小枪、禽枪、小禽枪5种御制枪，乾隆时的奇准神枪、准正神枪、纯正神枪、连中枪、应手枪、威赫枪、威捷枪7种御制枪，都出自养心殿造办处，乾隆四十年造办处曾制造了60杆御制枪。二设于景山，产品亦称“御制”，如康熙三十四年的制胜将军炮、康熙二十九年的威远将军炮和康熙五十七年的威远将军炮，炮身铭文都有“景山内御制”字样。养心殿造办处和景山所造枪炮，主要供皇宫和八旗兵使用，要求高，质量好，最重要的要由皇帝亲自指派的官员任总管监造，一般的则由景山有关人员任总管监造，工部委派的官员任监造。三设于铁匠营，由工部管辖，所造枪炮主要供绿营兵使用。何时制造枪炮，制造多少，视实际需要而定，并无定规。枪炮造成以后，要由钦命的官员验收，然后下发部队使用。

地方如需要制造枪炮，一般要由总督、巡抚联名奏请，并将工料银等一并报工部审核，待皇帝批准后才能制造。在战争中，或因情况紧急，或因地形复杂不便转运，统兵将领或地方官员奏请在当地制造，清廷大都予以支持，如平定两金川战争期间，在四川多次铸造各种大炮：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巡抚纪山

制九节劈山大炮20余门，每门重300余斤；乾隆三十六年，总督阿尔泰铸成重3000斤大炮一门，装药十一二斤，生铁子重20斤；副将军温福先是因军营中三四千斤重的大炮难于抬运，改铸七八百斤炮位，后又因这些炮子轻力薄，改铸重炮，从1000斤～4000斤不等；乾隆三十九年，定西将军阿桂奏请铸造冲天炮，乾隆帝即命侍卫阿弥达带炮子及炮式并技术人员前往。和平时期，清廷控制严格，禁止私造私藏枪炮，违者议处治罪。子母炮因系八旗火器，各直省不准制造。偏僻荒野之地，为防虎防盗确需鸟枪者，准照营兵鸟枪式样制造，但要刊刻持枪者姓名，呈官编号登记。

火药的生产亦由工部管辖。顺治初，工部在京师"设濯灵厂，委官制火药，特命大臣督之"①。濯灵厂制造火药系手工生产，有石碾200盘，每盘一次置火药30斤，碾一至三日（演放火药碾一日，军需火药碾三日）可成，生产能力相当可观。制造火药的方法，先将炭粉、硫磺粉和硝水按比例倒入药缸内，搅拌成稀泥状，凉干待用，然后放在石碾上碾轧（道光年间某些地区改用石臼木杵舂捣，"以三万杵为度"），不时往上洒水，最后把碾好的火药倒入大笸箩内，用木棒抽打，再用手搓成圆球状，过筛，即成颗粒状的火药②。碾造军需火药完工之日，要奏请钦点大臣验收，合格方准储库备用。检验火药的方法和标准是："然（燃）之掌中不伤手，乃为尽善"③。康熙三十一年规定，濯灵厂每年需造演放火药20万斤，烘药二三千斤，储备军需火药30万斤、烘药4000斤，随用随补。雍正二年规定，军需火药储存满10年者，即改作演放火药，陆续取用。其后，清廷又准许各省督抚提镇根据所属各营每年需用火药数量，动用公费在当地制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军器·火药》。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五，《工部·军火·火药二》；卷八九六，《工部·军火·火药》。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六，《工部·军火·火药三》。

造，备足规定的数量：潮湿的地区以三年的需用量为基数，高燥的地区则以五年用量为准。平时所用火药，即从备用火药中支取，并用新造火药补足缺额。

清代前期的火器制造，康熙朝达到了高峰。康熙朝，尤其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以前，战争的需要，康熙帝的重视，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火器的研究和制造。据《清朝文献通考》不完全的记载，从康熙十四年至六十年的47年间，仅中央制造的各种火炮即达905门之多。该书漏载的还有不少，如载于光绪《大清会典图》卷九八的“御制金龙炮”即是，该炮制于康熙二十年，“重自二百八十斤至三百七十斤，长自五尺八寸至六尺”，可见不止一门。说康熙朝在清前期各朝中火炮产量最多，当不为过。康熙朝铸造的火炮，质量好，品种齐全，既有红衣炮型，也有冲天炮型、子母炮型，还有奇炮等新型火炮；不仅有大口径的重型火炮，而且有许多便于携带的轻型火炮，代表了当时改善火炮机动性能的发展方向。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火炮与西方的火炮大体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从雍正朝开始，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强大的国力、闭关锁国的政策和“以骑射为本”的保守思想等原因，清廷对火器研制和生产的迫切感大大减少，从而使火器的研制和生产停滞不前。嘉庆、道光两朝，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火器的研制和生产也严重滑坡，性能落后，质量低劣。嘉庆四年（1799年），曾将“神机炮”、“神枢炮”共160门改铸成“得胜炮”，结果“以多易少”，射程比原来的“可及百步之外”缩短了不少①。为加强海口防御，道光朝注重重型火炮的生产，但由于技术和生产工艺落后，火炮质量低劣。道光十六年（1836年），广东虎门新铸大炮59门，竟有10门炸裂。二十年，齐齐哈尔请求造炮，道光帝准其制造5门，特谕“按照咨取厢黄旗神威将军炮，并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六，《八旗都统·兵制》。

《皇朝礼器图式》样尺寸详细估计"①。神威将军炮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制造的一种铜炮，《皇朝礼器图式》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敕修，可见这时清廷除了重制160年前的火器之外，已经拿不出任何的新东西。与西方国家相比，嘉、道时期中国的火器已经大大落后了。

四、火器研制家

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朝火器的发展，与南怀仁、戴梓、李文德等一批杰出的火器研制家和优秀工匠的突出贡献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南怀仁

南怀仁（1623～1688），比利时人，原名 Ferdinand Verbiest，字勋卿，一字敦伯。顺治十四年（1657年）随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东渡来华，十六年抵中国，在西安传教，次年奉召至北京，协助当时任钦天监监正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理历事，康熙三年（1664年）坐汤若望案下狱。康熙七年被清廷起用，掌钦天监监务，修订历法，制造天文仪器，后任太常寺卿、通奉大夫等职，官至工部右侍郎。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688年1月28日）病逝于北京。从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南怀仁奉命"制造轻巧木炮及红衣铜炮共132门，以应当时戡乱之急需"②。由于所造之炮质量好，受到康熙帝和前线将士的一致好评，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熙二十年以后，南怀仁又先后督造了神威将军炮、冲天炮。二十八年，工部采用南怀仁生前的设计，铸造"武成永固大将军炮"61门、"神功将军炮"80门，大炮炮身上均镌"制法官南怀仁"字样。南怀仁所造大炮，一是数量

① 《清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编号3018。转引自胡建中：《清代火炮》。

② 南怀仁：《熙朝定案》，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抄本。

多。据《熙朝定案》和《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的有关资料统计，南怀仁造炮513门，在康熙朝中央铸造的905门大炮中，所占比例达到56.7%；二是质量好。康熙二十年神威将军炮造成之后，240名八旗炮手在约三个月的训练中，共发射实弹2.16万发，其中有几门炮连放三四百发炮弹也毫无损伤。康熙帝在前往卢沟桥观看了八旗炮手的实弹演习后十分满意，特赐南怀仁御服貂裘，并赞扬他说："尔向年制造各炮，陕西、湖广、江西等省已有功效。见今所制新炮，从未有如此之准者。"① 康熙二十八年按南怀仁的设计制造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更代表了当时造炮的最高水平。三是注重轻型火炮的制造，代表了清前期火炮制造向改善机动性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造炮的同时，南怀仁对造炮理论进行了总结，撰成《神威图说》一书，于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进呈御览。该书是一部包括"二十六题之理论，四十四图之解说，并加数端同类之用法"②，系统地讲解准炮之法的理论专著。可惜的是，此书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借助南怀仁写于康熙二十二年的《形性之理推》一书，可约略地了解其主要内容：一是利用"正对星斗之法"改正火炮的偏向，提高射击精度；二是利用仰角和射程之间的关系，通过查表和计算，确定并调整火炮的仰角，以命中预定目标③。这对清代火炮的制造和炮兵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戴梓

戴梓（1649～1726），字文开，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谪迁辽东，客籍沈阳，自号耕烟老人，人称耕烟先生。他自幼勤奋好学，"自喜于书，无所不读，尤好兵家言"，"抱经世大略，凡象纬、句股、战阵、河渠之学，靡不究悉"④。因此，他在众

①② 南怀仁：《熙朝定案》，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抄本。

③ 参见舒理广、胡建中、周铮：《南怀仁与中国清代铸造的大炮》，《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

④ 《耕烟草堂诗钞》附录《耕烟先生传》，《辽海丛书》二。

多领域里都学有专长，诗、书、画皆佳，诗作挺劲有力，绘画尽诸家所长，书法兼有董其昌、米芾之神韵；通音律，曾参与纂修《律吕正义》；对治水也颇有精到见解，所撰《治河十策》，为河道总督于成龙所得，至乾隆中人们仍多用其说；又晓天文，精算法。与一般文人不同的是，戴梓还善于动手，曾研制成运输木材的机器和西洋珐琅器。

戴梓最主要的成就在于火器研制方面，他曾研制成功多种火器，成为清初著名的火器研制家。康熙十三年（1674 年），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赴闽浙征讨耿精忠，从小就立下报国之志的戴梓以布衣应聘从征，“为王陈天下大势如指掌”。十五年，因父丧回乡守制，不久又奉康亲王之命，返回军营。时台湾尚为郑经占据，为了早日统一台湾，戴梓“制冲天炮以献”。十九年，戴梓随康亲王班师回京，受到康熙帝的召见，授翰林院侍讲，先后入直南书房、内务府养心殿。为加强清军的火力，康熙帝十分重视火炮的研制。时在钦天监任职的比利时人南怀仁夸耀“冲天炮出其国”，但他花了一年时间也没有制造出来，而戴梓只用八天就造成了。康熙帝十分高兴，“率诸臣亲试之，即封炮为‘威远将军’，镌制法官名，以示不朽”。戴制冲天炮，“子在母腹，母送子去，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①，与《清朝文献通考》、《皇朝礼器图式》中的记载相吻合，是一种射角大、炮管短、大口径、使用爆炸弹的新型火炮。冲天炮威力巨大，康熙三十五年，在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昭莫多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戴梓研制的另一种火器是连珠火铳。有关连珠火铳的最早记载见于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纪昀（1724～1805）的《阅微草堂笔记》，但不称“连珠火铳”而称“鸟铳”。稍晚的昭梿（1776～1830）在《啸亭杂录》中称为“连珠火炮”，《清史稿·戴梓传》始称“连珠火铳”。据纪昀记载，乾隆年间他曾听戴梓之子戴亨说：“少时见先人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

① 《耕烟草堂诗钞》附录《耕烟先生传》，《辽海丛书》二。

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①，《清史稿·戴梓传》说连珠铳“法与西洋机关枪合”，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也说它“类似近代机关枪”，都是对“连珠”错误的理解。其实，戴铳仍然是一种后装、滑膛、单发的燧发枪，但由于它能预贮弹丸二十八发，并且使装填弹丸与击发联动，从而简化了装填手续，大大提高了发射速度，这在当时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发明创造。戴梓还仿造成功“蟠肠鸟枪”。康熙二十五年，荷兰国王遣使来华，进贡方物，其中有“蟠肠鸟枪”。戴梓奉康熙帝之命，很快就仿造了10支，由康熙帝回赠荷兰来使。

然而，戴梓的发明创造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像连珠火铳这样一种比较先进的火器，戴梓研制成功后，只能“器藏于家”②，没有正式制造装备部队，以致“乾隆中犹存”，后来竟失传了。戴梓晚年更是不幸，早就对其怀恨在心的南怀仁等人诬陷他“通东洋”，康熙帝竟轻信谗言，将戴梓发配辽东。戴梓无以为生，“鬻书画卖文自给，常冬夜拥败絮卧冷炕，凌晨蹋冰入山拾榛子以疗饥”，当他78岁获赦免时，因贫困交加死于返乡途中。

清代前期，对火器制造做出贡献的还有：善造大炮的长洲（今苏州市）人薄珏，研制成子母炮爆炸弹的武备院铁匠伍连登，优秀工匠李文德等。李文德是康熙年间火炮的主要制造者，他的名字出现在康熙二十年的“神威将军炮”、二十八年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和“神功将军炮”、二十九年的“威远将军炮”（冲天炮）、五十七年的“威远将军炮”等火炮的铭文上。这些火炮，工艺之精湛、造型之美观、炮体之坚固，都达到了清代前期的最

①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

② 《清史稿》卷五〇五，《戴梓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另据昭梿《啸亭杂录·戴学士》，戴梓曾向康亲王杰书“献连珠火炮法”。

高水平。

第三节　马政

清代马政虽承明制，但较之明代更为完善，也更为重要，有“军政之莫重于马”① 和“马匹为行军第一要务”② 之说。这与清代开国全赖骑射有密切关系。早在入关前，皇太极统一察哈尔后，看到那里是畜养马匹的好地方，遂设置牧马场。入关之后，又设立专门机构和官员掌管此事。

一、军马的管理机构及其职掌

清初于陕西省设苑马寺七监，大库口外设种马场，皆隶于兵部。康熙初，先裁寺监，后决定大库口外种马场事务归属太仆寺，并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交由太仆寺管理，原设大凌河（今辽宁锦州北口外）、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均在河北独石口外）马场，交由上驷院管理③。于是，整个马政分由太仆寺和上驷院管理。按照分工，中央用马隶兵部的太仆寺，皇帝内厩马隶上驷院，八旗、绿营用马则由其各自养牧和管理。

太仆寺是专掌牧马事务的机构，初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初无官署，后几经变动，于雍正三年（1725年）建衙署办事，并不断完善。设卿，满、汉各1人；少卿，满、汉各1人，“掌牧马之政令”。所属有左右二司和主簿厅。左右二司，分设员外郎满、蒙各1人，主事满、蒙各1人，“掌核左右翼场马之数而计其功过”。主簿厅，设满主簿1人，掌本寺章奏、承发、文移及档案事务；笔贴式16人掌翻译。后来厅内又设有经承、厅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三，《兵·马政》。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五〇，《兵部·马政·军马》。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四八，《兵部·马政·牧马一》。

书、司书等官，以管档案、承发等。太仆寺下辖左右翼两牧场①。

上驷院是掌管御用马匹的机构，其前身是御马监，顺治十八年（1661 年）改为阿敦（满语，马群意）衙门，康熙十六年（1677 年）改为上驷院。设兼管大臣，无定员，由皇帝特简；卿 2 人，掌在京内外厩及边外各牧场之政。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分设左右二司：左司设郎中 1 人，侍卫、员外郎各 2 人，主事 1 人，掌均齐、赏罚；右司设侍卫、员外郎各 2 人，主事 1 人，掌各马场马厩之俸饷刍豆。另有堂主事 2 人，掌章奏、文移；笔贴式 25 人，掌翻译；侍卫 21 人，随侍皇帝，内以 8 人兼骑试御马；司鞍长 2 人，司鞍 8 人，司辔 20 人，掌管鞍辔等物②。

八旗兵用马，由两翼派出的副都统掌管。“凡牧马，八旗马每岁季春由部以出牧之数具奏，并列副都统名，请每翼简用一人掌出牧事。”③ 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康熙帝谕议政王大臣、八旗都统，令八旗各管官严格管理军马事宜，如有“怠玩从事，致羸瘦误公者，将该管大臣从重治罪，其参领以下拨什库以上及拴马之人，俱照军法治罪。”④ 各地驻防八旗一般都设有管理马驼的机构或专职管理人员，如伊犁将军衙门内设有驼马处，设司官 5 人，管理驼马。城守尉、防守尉衙门内，也有专官管理驼马。

绿营兵用马，由各省督、抚、提、镇掌管，一般都设有管理马驼的机构和人员。乾隆元年（1736 年）规定，甘肃甘州（今张掖）提标和凉州（今武威）、西宁（今属青海）、肃州（今酒泉）三镇标各设马场一处，各以游击一人统率。十三年又定甘州

---

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七二，《太仆寺》。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三，《兵·马政》。

③ 乾隆《大清会典》卷六六，《兵部·马政》。

④ 《清朝通典》卷七九，《兵·马政》。

提标和凉州、西宁、肃州三镇标各设驼场一处。四十年定巴里坤三场，以游击、都司、守备各一人统率。

二、军马的种类、数量与编配

清代中央用马主要是供皇帝使用，叫“内马”，供仪仗用的叫“仗马”，供扈从等用的叫“官马”，而供各地八旗、绿营兵直接用于作战的叫“军马”。从马的性别来分，雌性马即牝马，曰“骒”；雄性马即牡马，曰“儿”；经过阉割的牡马叫“骟马”①。

太仆寺所掌马政，屡有变化。原定骒马 40 群，骟马 8 群，至康熙年间分别增至 88 群、16 群。雍正三年（1725 年），“定在厂马以四万匹为率”②。乾隆五年（1740 年）奏准，两翼马厂共计骒马 152 群，骟马 16 群，在厂马匹足 4 万匹为止，加孳生多余 7224 匹（内骒马 8 群计 1512 匹、骟马 16 群计 5712 匹），合计骒马 160 群，骟马 32 群，共计 192 群、47224 匹。乾隆三十年，太仆寺马匹达 6 万余匹。

上驷院所管，一是京城的内厩、外厩，二是口外马场。内厩设于皇城，外厩设于南苑。康熙年间定：皇城紫禁城内有御马及走马各 1 厩，俱随时增减，无定额，御马厩附应差公马 5 匹，设仗马 1 厩 30 匹，附应差公马 10 匹；东安门内设公马 4 厩各 200 匹，设驾车马 1 厩 70 匹，羸 30 匹；西安门内设川马 1 厩，无定额，驼 1 厩 100 匹，附应差公马 15 匹；南苑御马及内马共 6 厩，无定额，每厩附巡群马 30 匹，设瓮山公马一厩 240 匹。总共 17 厩，大约 3000 匹。以后略有变化。所属口外大凌河牧场，康熙八年初设时有牝马 10 群，至乾隆十二年（1747 年）有牝马 36 群，共 1.97 万匹。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顺治年间初设牝马 20 群、骟马 6 群，至乾隆六年（1741 年），除移住达里冈爱牧场 20 群外，尚有牝马 124 群、骟马 40 群、走马 1 群，每群 350 至 500

①② 《清史稿》卷一四一，《兵·马政》。

匹不等，合计约六七万匹。达里冈爱牧场，康熙三十九年初设时有牝马3群，以后马群和马匹数量均有增加①。

八旗牧养马数，顺治初年定八旗及内府三旗佐领下额设马驼，每年由兵部酌定。顺治十五年（1658年）定，亲王出征，军马400匹，郡王300，贝勒200，贝子150，镇国公100，辅国公80，不入八分镇国公70，辅国公65，将军80，副将军70，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统皆60，其下多少不等，最少者护军、领催各6匹。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敕出征兵一人马4匹，4人为伍，一伍主从骑8匹，驮器粮用具亦8匹。五十一年，核定军中职官马数，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16匹，侍郎以下递减，经略、大将军各25匹，副将军以下递减。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定额以马10万匹为限。乾隆十六年（1751年）奏准，八旗仅牧养官马即2.77万匹②。后对各省驻防八旗经制马数也作了明确规定。乾隆中期，八旗经制马数约9万多匹。

绿营兵军马，官员骑坐马皆自备，称为"例马"；马兵用的马为"骑操马"。官员例马，顺治六年规定：提督15匹，总兵官12匹，副将8匹，参领、游击6匹，都司、守备4匹，千总、把总2匹。兵丁骑操马则根据各营马兵的编制而定，或马步各半，或马四步六，或马三步七，或马二步八，或马一步九，或不设马，皆照实数报兵部。以后略有增减，乾隆中期绿营经制马数有10万多匹。

以上八旗、绿营马数，为平时经制数目，到战时又须于经制额以外解拨，解拨数目的大小及兵员与马匹的比率，一般要视战地的远近、地形的好坏等客观条件而定。例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征准噶尔，安西绿营兵2000人，而调往巴里坤的军马为4700～4800匹，其兵员与军马的比率为1∶2.4。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三，《兵·马政》。

② 《清史稿》卷一四一，《兵·马政》。

三、军马的牧养与管理

清代马政各系统下辖马匹、牧场，都设有官员、兵丁负责管理和放牧。太仆寺所属牧场，分左、右二翼，均在口外。左翼四旗牧场在张家口外东北140里处的哈喇尼敦井，东西长150里，南北宽130里。右翼四旗牧场在张家口外西北310里处的齐齐尔罕河，东西长150里，南北宽32里。两牧场界定区域，彼此不得侵越。设统辖两翼牧场总管1人，两翼牧场总管2人，副管1人，防御2人，翼领4人，骁骑校3人，护军校8人，协领10人，护军314名。牧群每群设牧长、牧副、牧丁管理①。

上驷院管理的军马在京城内厩、外厩喂养，内外厩共17处。厩设厩长1人，厩副2人，厩丁多少不一，并设有医长、医师和兽医，为马医治疾患。所属口外大凌河牧场在盛京锦州府北口外，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和达里冈爱牧场在独石口外，均设官司牧，其中有总管2人、翼领3人、笔贴式8人。军马分群放牧，牧群设牧长1人、副牧长1人或2人，牧丁若干名，负责牧养。

八旗军马，除一部分在内地拴养外，每年春夏驱赴口外牧场牧放，叫做“出青”，秋冬回圈，叫做“回青”。出青时每旗派副都统1人、参领2人，率领部分官员兵丁赴水草丰处游牧，可以节省大量草豆钱粮。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指出：“宋、明时论马政者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则六万，羊则二十余万，若将此马与牛羊驱入内地牧养，则日费万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费丝毫之饷，而马畜自然孳息，因定额以马十万、牛六万、羊二十一万为限。向年疫气盛行，蒙古马畜多倒毙而官厂与彼同在一处，毫无损伤，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满山谷间，历七八日犹络绎不绝也。”②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八八，《太仆寺·建置》。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三，《兵·马政》。

绿营牧场始于乾隆元年（1736年）。先是各提标就地喂养，雍正十二年（1734年）吏部尚书刘于义署理陕西总督兼办军务事务，见“连岁西路军需，调解马匹，陕、甘两省购觅甚难，俱从北路归化城等处解送，不惟糜费钱粮，且长途远涉，难免疲乏瘦损之弊”，且陕、甘为“边防要区，原宜多为畜养，以备应用”①，便奏请并于乾隆元年获准在甘州、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拜带湖设四牧场。后来又在安西、乌鲁木齐、巴里坤、伊犁设牧场。这些牧场位于甘肃、青海、新疆水草丰茂之地，气候凉爽，利于马匹生息繁衍，为最佳养牧之地。各牧场以游击1人为总统，马群以千总、把总1人为牧长，外委、千总、把总1人为牧副，兵10人为牧丁。

军马的牧养管理制度很多，主要有均齐、赔桩、买补等制度。

均齐，是清代马政中奖惩制度的一种。奖惩的原则是：均齐时，骒马“比原额孳生多者议赏，孳生少及缺额者议罚”；骟马“倒毙少者议赏，倒毙多者议罚”②。中央用马和八旗、绿营牧马多为三年均齐一次，但乾隆十三年改直省绿营马为五年一次。以乾隆元年（1736年）定甘州、凉州、西宁、肃州提镇标马场为例，所养军马，均齐年限为三年，届期由总督委官察验，并将赏罚情况具题。所牧马匹，不论牝牡，每三匹取孳生马一匹为定额。若三年内一群马多孳生一匹以上者为三等赏，千总、把总加一级，外委记录二次，兵每名赏银一两；多孳生80匹以上者为二等赏，千总、把总加二级，外委加一级，兵每名赏银二两；多孳生160匹以上者为一等赏，千总、把总、外委都以应升的官任用，兵每名赏银三两。如在此定额内，少孳生20匹以下的为三等罚，千总、把总罚马5匹，外委及兵各责40；少孳生40匹以

① 刘于义：《请设马场疏》，《清经世文编》卷七三，《兵政·马政》，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八八，《太仆寺·职掌·牧课》。

下的为二等罚，千总、把总罚马7匹，外委及兵各责50；少孳生80匹以下的为一等罚，千总、把总罚马9匹，外委及兵各责60。如于原牧数内缺少的，千总、把总革职，罚马18匹，外委革去顶戴，仍各责80，兵责80。提、镇、游击等官，以五群牧马（一马场）的总情况为赏罚标准：五群得赏的，游击加二级，提、镇加一级；四群得赏、一群得罚的，游击加一级，提、镇记录二次；三群得赏、二群得罚的，游击、提、镇无庸议赏议罚；三群得罚、二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六个月；四群得罚、一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调用，提、镇罚俸一年；五群全罚的，游击革职，提、镇降一级调用。若在原牧数内缺少的，除将千总、把总罚出马数补入外，余由游击、提、镇各半分赔。这个制度，对于促进牧场马匹的繁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甘州牧场，乾隆元年（1736年）牧马1200匹，到嘉庆六年（1801年）除拨补营缺暨口老变价外，存场马多达18万匹。

赔桩，是对清军官兵因牧养马匹不精心致使军马未满年限而倒毙的一种惩罚制度。顺治七年（1650年）规定："营马系对敌及追盗贼损失者免其赔补，走脱、被窃失者著落本人赔补，若倒毙者每马以十两为额，令其赔补，名曰赔桩。"① 每年递减一两，至第十年免于赔补。康熙三年（1664年）又规定：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营马，以三年赔桩，过三年者免；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西安、甘肃，以五年赔桩，过五年者免。次年，对赔桩银两的数目作了规定：三年赔桩的省份，一年倒毙，本兵赔银7两，合队2两，本管官1两；二年倒毙，本兵赔银6.5两，合队1.7两，本管官0.8两；三年倒毙，本兵赔银6两，合队1.4两，本管官0.6两；三年以后，免其赔桩。五年赔桩的省份，自一年倒毙至三年倒毙之分赔，均如三年赔桩之省；四年倒毙，本兵赔银5.5两，合队1两，本管官0.5两；五年倒毙，本兵赔银5两，合队0.7两，本管官0.3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三，《兵·马政》。

两;五年以后免其赔桩。赔桩年限的不同，是根据各地气候条件而定的。黄河流域气候干爽，马的寿命较长，所以赔桩年限也较长；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气候潮湿，不宜马匹生存，所以赔桩年限较短。太仆寺、上驷院所属马群，也有类似的惩罚规定，但不称“赔桩”。总之，赔补、赔桩的目的是促使负责牧养的兵丁爱护马匹，保证各牧场贮存一定数量的马匹。

买补，是在营马缺编时，由有关人员买马，以补足缺额。清代有朋扣银的名目。副将以下军官兵丁，于每月应支银两内预扣一部分，存于营中，以备买马之用。顺治七年（1650 年）规定，如果马倒毙，赔补年限已满，准予动支朋扣银买补。乾隆十六年（1751 年）奏准，八旗牧养官马 20773 匹，每匹每月给马干银 3 两，因京城草豆价格昂贵、银不敷买，便交热河、近京各庄头分领牧养 3000 匹，交直隶各标营牧养 7000 匹，如有倒毙照八旗例于马干银内按月扣存买补。各省绿营营马缺额，顺治三年（1646 年）规定，由各省督、抚、提、镇“或就近买补，或报部拨给”。不久又规定各营马缺，“开数报部，本部于各营拨给”①。绿营买补马匹的地域，乾隆朝以前主要到长城以北的口外采买，叫做“口马”。但随着作战地域逐渐推向南方，军马因气候、草料不能适应而倒毙。所以自乾隆朝开始，南方标营不得不就地采买“土马”。乾隆中期征缅甸，大量征用“滇马”，因其能“历险登危”，“日驰数百里”，“涉峻奔泉，如履平地”②，成为进军缅甸马匹的中坚力量。

买马的手续，“直省购买营马，至口外者咨部，至邻省者咨该地督、抚，均按数印烙给照，令所过地方官弁察验。若于照外多买及将私马附入照内者罪之。”③ 有时根据军事需要，还可直接从牧场拨给。顺治三年（1646 年）定各省营马缺额，开数报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三，《兵·马政》。

② 师范：《滇马》，《清经世文编》卷七三，《兵政·马政》。

③ 乾隆《大清会典》卷六六，《兵部·马政》。

部，由各群拨给。

此外，对于马匹的牧养管理还有许多法律性规定。例如，把马匹与军器一样规定为禁品。清初，除现任官准许养马外，其余一律禁养。以后虽有所放宽，但康熙元年仍“禁民人养马”，规定“有私贩马匹，为人首告者，马给首告之人。其主有官职，予重罚。平民荷校鞭责”①。对于克减官马草料等等，也都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① 《清史稿》卷一四一，《兵·马政》。

第十一章　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

第一节　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

一、沙俄向东方的扩张

俄国（在我国明清典籍中又称鄂罗斯、罗刹），本来是一个欧洲国家，它原来的东部疆界远在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相隔万里，并不接壤。

公元1300年，俄罗斯在莫斯科建都，称莫斯科大公国。当时，它还是由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的一部分。直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它通过兼并其他俄罗斯诸侯的领地，才建立起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并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到瓦西里三世（1505～1533）时，俄罗斯所有的土地都并入莫斯科大公国的版图，其疆域"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及第聂伯河上游，东抵北乌拉尔山脉的支脉"①。从这时起，封建农奴主们在加强对本国农奴统治的同时，开始了对外的扩张。

1547年，伊凡四世亲政，他不满足于"莫斯科大公"的称号，自称"沙皇"（Царь，系拉丁语Caesar——古罗马独裁者"恺撒"一词在俄语中的音转）。伊凡四世不但决心在国内确立起像古罗马皇帝那样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且在国外也要步恺撒的后尘，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和奴役更多的人民。伊凡四世对周围各国的领土扩张是从"向东

---

① 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61页。

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① 开始的。1552 年吞并了喀山汗国，1556 年又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汗国。在控制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后，伊凡四世即开始策划掠夺西伯利亚领土。1581 年，一支在沙皇政府支持下的哥萨克武装，越过乌拉尔山脉，侵入西伯利亚汗国。经过 10 多年的残酷战争，终于在 1598 年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沙俄在占领地区修筑城堡，作为巩固占领地和继续向东扩张的据点。1587 年俄国人在鄂毕河和托博尔河会流处建立的托博尔斯克城，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西伯利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沙俄对西伯利亚扩张的时期正是资本原始积累和全俄市场开始形成的时期。16 世纪末，俄国各地商品交换日趋活跃，出现了一大批商业资本家。到 17 世纪，随着全俄市场的形成，西伯利亚的貂皮等其他资源更成为俄国贵族掠夺的目标，代表这些人利益的沙俄政府加快了向东侵略扩张的步伐。

沙俄向西伯利亚扩张的时候，那里的大多数民族都处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有些还过着氏族生活，各氏族之间联系很少。这种状况，使各民族不可能结成统一的抗俄力量。因此，在征服西伯利亚汗国之后，沙俄竟能以有限的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肆无忌惮地向东推进。西伯利亚的地理条件也有利于侵略者迅速东进。他们一般是沿江湖行舟，至水尽处即将船连带船上的物资从陆上搬运，遇水道又驾舟前进。他们采用这种"水陆联运"法，于 17 世纪初期由鄂毕河流域跨到叶尼塞河流域；从 17 世纪 30 年代起，又由叶尼塞河流域伸展到勒拿河流域，1632 年在雅库特人聚居的中心建立了勒拿堡，后更名为雅库次克。沙俄以雅库次克为基地，继续向东推进，不久就开始侵入中国的黑龙江流域。

---

① 高尔基、斯大林等主编：《苏联国内战争史》第 1 卷，莫斯科 1936 年版，第 58 页。

二、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的入侵

（参见附图10）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入侵，是它在西伯利亚推进扩张政策的继续和发展。17世纪30年代以前，俄罗斯人不仅没有到过黑龙江沿岸，而且根本不知道有黑龙江这条流入“东海”的大河。据俄国历史文献记载，俄罗斯人第一次得知黑龙江的传闻是在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当时，沙俄的侵略势力已达东西伯利亚。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也为了解决东西伯利亚粮食供应的困难，沙俄侵略者从1638年起，曾派出数支武装的远征队，试图闯入黑龙江地区。尽管最初的几次入侵都失败了，但是，侵略者的入侵活动却一直没有停止。

（一）波雅科夫的武装入侵

沙俄第一次“成功”地武装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是瓦西里·波雅科夫的所谓军事“远征”。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沙俄雅库次克的行政长官彼得·戈洛文派他的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率领一支远征队远征黑龙江，其任务是“为国君征收毛皮贡赋，寻找尚未纳贡的人，以及银、铜、铅矿和粮食”。戈洛文指示他们：“如当地人拒绝交贡，就对他们作战”①。当年6月25日（俄历6月15日）②，波雅科夫率领由132人组成的远征队，携带铁炮一门和大量的弹药、物资，每人配备火枪一支，从雅库次克出发，沿勒拿河溯阿尔丹河、乌丘尔河、戈诺姆河南侵。他们翻越外兴安岭，闯入中国领土。在精奇里江（今俄罗斯结雅河）流域，这伙

① 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莫斯科1946年版，第40页。

② 波雅科夫出发的日期，有不同的记载。此据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赤塔1916年版，第53页。

侵略者诱骗淳朴好客的达斡尔人，绑架头人，强索貂皮牲畜，抢掠粮食，甚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达斡尔人拒绝向他们供应粮食。波雅科夫远征队抢不到粮食，一个冬天竟灭绝人性地“吃掉了50个异族人”①。黑龙江地区人民从此把他们叫做“吃人恶魔”。1644年，波雅科夫率领远征队顺精奇里江下行，闯入我国内河黑龙江。他们每到一地，都遭到当地中国居民的坚决抵抗。在松花江口，哥萨克十人长叶尔莫林带领的25名军役人员遭到当地居民的突然袭击，除两人逃脱外，其余均被打死，包括叶尔莫林在内。波雅科夫远征队陷于四面楚歌的困境。1645年初夏，只剩下50多人的波雅科夫远征队带着被绑架的三名费雅喀头人和勒索来的貂皮，出黑龙江口，沿鄂霍次克海岸北逃。又经过一年多的挣扎，波雅科夫率领残部总算于1646年6月返回雅库次克。

波雅科夫向他的上司大肆宣扬黑龙江地区的富饶，竭力怂恿沙皇政府派兵占领中国领土。他甚至扬言，只要有300人的武装，其中150人分驻3个城堡，其余的150人则到各地去收取贡赋，就足以征服黑龙江地区②。波雅科夫关于黑龙江地区的情况及其异想天开的武装入侵方案，对富有侵略性的沙俄政府具有相当强的诱惑力。因此，不久之后，沙俄对黑龙江地区新的入侵又开始了。

（二）哈巴罗夫的武装入侵

1649年（清顺治六年），叶罗菲·哈巴罗夫率一股武装人员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这是沙俄对我国进行的第二次入侵。

哈巴罗夫是西伯利亚的巨商，在雅库次克行政长官弗兰茨别科夫的支持下，率领一支招募来的由70名武装哥萨克组成的远征队，于1649年3月从雅库次克出发。哈巴罗夫此行的任务，

---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58页，注1。这里所说的“异族”，即我国达斡尔族。

② 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第68页。

“除了使拉夫凯和巴托加臣服于俄国之外，还要打听银矿的所在地”①。弗兰茨别科夫在给哈巴罗夫的训令中说：“如果这些新发现的非纳实物税的人不顺从，抗拒交纳实物税和人质，叶罗菲伊有权搜索并考虑出兵。按照军事惯例，用战争的办法来制服他们这些不纳实物税的人，并把上层人物酋长们抓起来押为人质”。同时，并要求他们“周密考虑用一切方法镇压外族人，不得疏忽”②。哈巴罗夫率队沿勒拿河南下，经乌勒克玛河（今俄罗斯奥廖克马河）拉纤上行。1650 年 1 月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领土，来到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以西黑龙江的支流鄂尔河口。哈巴罗夫率领远征队先后侵入达斡尔头人拉夫凯辖区的 5 座村寨。在侵略者到来之前，当地居民早已转移。他们偶尔见到的少数几个达斡尔人，都表示只向清朝皇帝进贡，拒绝向沙俄臣服和交纳贡赋，并说明中国有使用火枪作战的强大军队。哈巴罗夫到处碰壁，一无所获。但是，事实却使他感到，涉足中国的黑龙江，不但当地居民会起而反抗，而且必将遭到中国军队的打击，他那 70 名哥萨克根本无力对付。于是，哈巴罗夫把大多数哥萨克留下交由斯捷潘诺夫率领，他自己带少数人匆匆返回雅库次克求援。尽管弗兰茨别科夫对他非常支持，但是却无力满足他征集一支 6000 人军队的要求，因为直到 1683 年为止，沙俄在西伯利亚的全部武装力量只有四五千人。

1650 年 7 月，哈巴罗夫带着雅库次克行政长官发给他的“远征达斡尔地方”的训令和一封转交“博克达汗”（即清朝皇帝）的信件，率领他勉强收买来的 138 个亡命之徒，再次踏上入侵黑龙江的征途。当哈巴罗夫到达黑龙江地区的时候，斯捷潘诺夫正在进攻雅克萨。雅克萨位于额默勒河（今额木尔河）汇入黑龙江处的对岸，是从贝加尔湖方向和雅库次克方向进入黑龙江地区都必须经过的地方，是沙俄入侵中国理想的基地。哈巴罗夫立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1 卷，第 63 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1 卷，第 62 页注。

即向雅克萨发动进攻。达斡尔族头人阿尔巴西率众顽强抵抗，最后被迫突围。哈巴罗夫强占雅克萨之后，加修工事，修造船只，派人四出勒索贡税，强抢粮食，捕捉人质，掳掠妇女，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1651年6月，哈巴罗夫率领侵略军从雅克萨出发，沿黑龙江下犯。当他们来到达斡尔头人桂古达尔的堡寨时，达斡尔人民已做好了抗击沙俄侵略者的准备。整个堡寨由3个小村屯组成，四周围以土墙。土墙无门，但有地下出入口。土墙外有两道深沟环绕。堡寨内还修了通向黑龙江岸的坑道。哈巴罗夫对达斡尔人威胁利诱，企图使之不战而降。桂古达尔严词拒绝，他明确地回答说："我们向中国皇帝顺治汗纳贡，你们来要什么实物税呢？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①哈巴罗夫侵略军用大炮向堡寨轰击，达斡尔人则用弓箭抗击侵略者，"箭矢纷纷落下，布满整个田野，好像田地里长满了庄稼"②。但是，达斡尔人原始的弓箭毕竟难以抵抗侵略者的大炮和火枪。轰开堡寨之后，哈巴罗夫匪帮对达斡尔人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哈巴罗夫自己在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述："靠上帝保佑，托沙皇的福，我们把俘虏来的达斡尔人全部劈头盖脑地砍死。在激烈战斗时，有427个达斡尔大人和小孩被杀。所有在集会的达斡尔人，所有参加猛攻和战斗的达斡尔人全被杀死，杀死了大人和小孩661人。……托皇上的福，我们攻下了这个村屯，有牲畜，还有俘虏，抓到的妇女俘虏：年老的、年青的和小姑娘共有243人，俘虏小孩118人；我们从达斡尔人那里夺得马匹大小共237匹，夺得牛羊牲畜113头。"③哈巴罗夫匪帮在桂古达尔制造的暴行是骇人听闻的！

---

①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2页。

②③ 《哈巴罗夫呈文》，列别杰夫等编：《苏联历史文选》第1卷，苏联国家科学教育出版社1949年第3版，第438～440页。

同年 7 月底，哈巴罗夫率众继续沿黑龙江下犯。不久，他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精奇里江口附近的托尔金堡（即瑷珲旧城），俘获了逃避不及的 270 个达斡尔居民。这里的达斡尔人同样拒绝臣服沙皇，经过周密的布置，躲过哥萨克的严密看守，在 9 月 13 日凌晨，集体逃走了。头人托尔加面对侵略者的严刑拷打，毫无惧色。他对侵略者说："宁愿我们这几个人为自己的土地而死，也不能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牺牲。""砍掉我们的头吧，我们视死如归。"① 后来托尔加不堪凌辱，抽刀自尽，表现了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气概，并以此向野兽般的沙俄入侵者表示抗议。

当年 10 月，哈巴罗夫率众侵入黑龙江下游宏格力河口，在赫哲人（即俄国文献中的阿枪人）聚居的乌扎拉村地方强行登岸，修筑冬营，准备过冬。整个冬天，他们不断从称之为"阿枪斯克"的营地出发，洗劫附近村寨，绑架人质，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向东方扩张，侵占中国的黑龙江，这是 17 世纪沙俄政府的既定政策。伴随这一政策而来的是骇人听闻的烧、杀、淫、掠暴行。波雅科夫、哈巴罗夫充当沙皇政府侵略扩张政策的急先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前苏联早期的历史学家巴赫鲁申教授曾经指出："俄国人的入侵以及伴之而来的对居民的残酷杀害和对这块土地的蹂躏，给和平的达斡尔土地留下了骇人听闻的印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一繁荣富饶的地区变成了荒野：城堡成了废墟，田园荒芜，惊慌失措的居民离乡背井，到处躲藏。"② 历史已经证明，波雅科夫、哈巴罗夫匪帮是一伙受到沙俄政府支持并体现了沙俄政府意志的强盗和侵略者。

---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1 卷，第 75～76 页。

②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 31 页。

第二节　中国军民初期的抗俄斗争

一、乌扎拉村之战

沙俄侵略者的残暴和野蛮，给居住在黑龙江地区中国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的仇恨，他们以各种形式与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或者坚壁清野，使侵略者缺衣少食；或者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村寨，并利用一切有利时机，袭击侵略者。所有这一切，都给侵略者以一定的打击，但由于这些抗俄斗争是分散的，缺少统一指挥和部署，更缺少中国正规军队的参加，因而难以有效地阻止沙俄的侵略活动。

当沙俄侵略者入侵黑龙江之时，正是中国明清两朝交替之际。当时清军入关不久，关内战事正酣，关外广大地区只留有少量兵力。清政府也还没有充分注意到沙俄入侵的严重性，清朝官吏“既不了解敌人的性质，也不懂得这场斗争并不是简单的边境骚扰，而是俄国殖民主义的有组织的前锋”①。1651 年（清顺治八年），哈巴罗夫匪帮窜犯达斡尔头人桂古达尔的村寨。当达斡尔人民正在与侵略者激战时，清朝政府派驻该堡寨的官吏只是“远远地观战”，因为“霞沙汗（指中国顺治皇帝）有谕旨不得同俄罗斯人打仗，而是‘赤诚相见’”②。随着沙俄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和种种暴行，清政府逐渐看清了沙俄的真正面目，认识到沙俄入侵者是威胁中国安全的十分危险的敌人。于是，清政府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东北边疆，并直接派兵作战，坚决抗击沙俄侵略。

1651 年 10 月，赫哲人和女真人联合起来袭击哈巴罗夫匪帮设在乌扎拉村的冬营。敌人优势的火力给他们造成了重大的伤亡。赫哲、女真等族人民，为了寻求“达斡尔地区的最高君主”

---

① 曼考尔：《俄国和中国》，哈佛大学 1971 年版，第 25 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1 卷，第 73 页。

中国皇帝的庇护，派人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向清朝官吏报告：俄国侵略者“彻底破坏了我们的土地，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抢走了……请保护我们吧。”① 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根据清政府的命令，“驻防宁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击之，战于乌扎拉村”②。参加这次战斗的有正规清军600人，携带6门大炮；也有从远处赶来的达斡尔人、女真人等共1025人。清军在黎明前发起攻击。但是海色等人没有利用沙俄军正在酣睡的有利时机隐蔽地接近敌人，进行突然袭击，而是从远处用大炮、火枪向沙俄军营地轰击。从睡梦中惊醒的哥萨克开始还以为“是哥萨克用枪炮从城堡里往外打，简直没有想到博格德汗的军队会用枪炮打我们哥萨克的城堡”③。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仓促奔向城墙，进行还击。清军用装在陶罐里的火药进行爆破，把城墙炸开了缺口，猛冲上去。但在这关键时刻，海色麻痹轻敌，不是指挥部队猛打猛冲，歼灭守敌，而是命令清军“烧杀哥萨克，把他们抓起来，抓活的！”④ 这道命令束缚了清军官兵的手脚，使攻击力大为减弱。几乎绝望的哥萨克则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力量反扑，他们用大炮向正往城堡冲击的清军猛轰。由于海色指挥错误，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作战失利，被迫撤出战斗。

清军虽然在乌扎拉村之战中失败，但是这次作战却具有重要影响。首先，乌扎拉村之战是中国正规军对沙俄入侵者的第一次作战，揭开了中国军民联合抗击沙俄入侵斗争的序幕。清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指挥作战失误的海色等人予以严惩。据记载：“以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色）遣捕牲翼长希

---

① 《哈巴罗夫呈文》，《苏联历史文选》第1卷。

② 《平定罗刹方略》一，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五。

③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33页。

④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莫斯科1972年版，第135页。

福等，率兵往黑龙江，与罗刹战，败绩。海塞伏诛，希福革去翼长，鞭一百，仍令留在宁古塔。”① 此后，清政府更积极地派军队抗击沙俄的入侵。正规清军的参战，是中国军民抗俄斗争能够持续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其次，这次作战打死俄军10名，打伤78名，哈巴罗夫也被击伤，给了沙俄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一个外国学者曾指出："他们这一仗并非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它抑制了俄国人的放肆行为，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从此以后，几乎每次报告都有这样一句话：由于谣传中国人就在附近，因而哥萨克不敢四出活动"②。不久，哈巴罗夫即率军离开乌扎拉村营地，往黑龙江上游逃跑了。

二、呼玛尔之战

1653年8月，德米特里·季诺维也夫奉沙俄政府之命，率领150名哥萨克到达黑龙江，在精奇里江口与哈巴罗夫会合，为即将对黑龙江的远征作准备。由于与季诺维也夫不和，哈巴罗夫被季诺维也夫解除职务，押解回国。但是，沙皇政府为了鼓励对外扩张，不仅宣告哈巴罗夫无罪，而且给予他贵族称号和大片田产。留在黑龙江的哥萨克归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指挥。次年春，斯捷潘诺夫被沙俄政府任命为管理达斡尔地区衙门的总管。斯捷潘诺夫和他的前任哈巴罗夫一样，是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的入侵，引起清王朝的警觉，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抗击沙俄的实力。顺治十年（1653年），设立宁古塔昂邦章京，专管原由奉天昂邦章京统一管辖的吉林和黑龙江地区，任命能征善战的老将沙尔虎达为第一任昂邦章京。

---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八，顺治九年九月丙戌，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戈尔特：《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页。

次年，受到沙俄侵略者袭扰地区的各民族向清政府请求内迁，清政府将原居住于黑龙江北岸雅克萨地区至精奇里江流域的“索伦、达呼尔（达斡尔）南徙于嫩江之滨”①；将原居住在黑龙江中游、松花江下游的虎尔哈人、赫哲人迁往牡丹江流域。并将内迁的各族人民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

沙俄侵略军在黑龙江地区的大肆掠夺和破坏，不但破坏了社会的安定，而且严重地毁坏了该地区的经济，原本十分富饶的黑龙江沿岸变得满目疮痍，居民四散，田园荒芜。沙俄侵略军要抢掠到必需的粮食越来越困难。

顺治十一年（1654 年）春，清政府筹划征剿沙俄侵略军，一方面派明安达礼“自京师统兵往征罗刹”②，一方面商请朝鲜选派 100 名鸟枪手，“往征罗禅（刹），以三月初十日到宁古塔”③。五月初，斯捷潘诺夫率领 370 名哥萨克由黑龙江上行，窜到松花江地区搜寻粮食，与中朝军队相遇。中朝军队共 700 人（其中满族兵 300 人，曰哈即虎尔哈兵 300 人，朝鲜兵 100 人），配备弓箭、土炮、鸟枪和土炸药罐等武器。沙俄军战船高大，武器精良，尤以火器占优势。中朝军队扬长避短，不在江中与敌人作战，而是清军“择占江边地势最高处结阵”，“以柳棚列置岸上”，朝鲜鸟枪手“依蔽而放炮”，引诱沙俄军上岸；另派清军一部乘小船截断沙俄军前进的水道④。沙俄军果然中计，舍舟登岸向中朝军攻击。“中国人从土堤后面将俄国人挡回去，哥萨克在冲击中有许多人挂了花”⑤。经过一场激战，斯捷潘诺夫匪帮遭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二，《索伦诸部内属述略》。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六，《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孝宗五年（清顺治十一年）二月癸亥，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835 页。

④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孝宗五年（清顺治十一年）四月丁丑，第 3844 页。俄国古文献委员会：《历史文献补编》第 3 卷，圣彼得堡 1848 年版，第 524 页。

⑤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 41 页。

受重大伤亡，不得不由松花江口向黑龙江上游逃窜。

斯捷潘诺夫率领哥萨克在呼玛尔河和黑龙江会流处的一个小岛上盘踞下来，修建呼玛尔城堡，准备过冬。呼玛尔堡原是哈巴罗夫所部于1652年修筑的。斯捷潘诺夫在原堡废址上修建的新城堡非常坚固，每个角落都筑有炮台，城堡四周的围墙是由两道并排着的圆木中间填土筑成的。墙外挖有壕沟，壕沟附近有插着直立箭头的陷坑。城堡内有几个高炮台，并挖有水井。

顺治十二年（1655），清政府再次派兵赴黑龙江。“尚书、都统明安达礼自京率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①。二月中旬（3月下旬），清军接近呼玛尔城堡，一举歼灭在城堡外活动的20名哥萨克。敌人曾试图出击，结果又丢下了87具尸体。清军包围了城堡，在黑龙江对岸高冈上架起大炮，从150米至400多米的距离上向城堡轰击。二月二十七日（4月3日，俄历3月24日），清军利用夜晚向城堡运动，发动强攻，“他们弄来了各种各样的‘攻城器具’，运到城堡前的有：装有火药的长袋（这种长袋有车辕那么粗，长十五到二十俄丈②，看来是用于爆炸城墙的）、铁钩竿和装有车轮的云梯，云梯上带有往墙上固定用的铁钉和木棒；用马车运来了纵火用的木柴、树脂和干草；装有防护板的四轮马车驶近城堡，车上装满了攻城用的各种工具，此外还有一个有点像‘插有长矛的城堡’似的东西。”③ 清军激战一夜，未能攻克，遂改强攻为长围久困，在离城700多米的地方构筑工事，切断城堡的水源，毁掉俄军留在岸上的船只，不让俄军任何人出入城堡，用大炮昼夜轰击据城固守的俄军。僵持状态持续了10昼夜，明安达礼于三月初八日（4月14日，俄历4月4日）撤离了呼玛尔。

被围在城堡中的沙俄侵略军处境困难，他们对清军的突然撤

---

① 《平定罗刹方略》一，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五。

② 1俄丈等于2.134米。

③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3页。

走感到困惑不解。其实，清军是由于“饷匮”而被迫撤围班师的①。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据康熙帝说，是因为明安达礼“轻进”，以至“粮饷不继”②。但这只是表层的原因，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清军将帅对于抗俄斗争的长期性及其特点认识不足。当时清王朝在黑龙江地区没有驻军，参加抗俄作战的清军都是从宁古塔出发远征，携带的粮食、弹药等作战物资数量毕竟有限，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无法随时从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后方基地得到补充，因而作战行动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而俄军完全依靠在当地抢掠为生，他们修建城堡，贮存粮食，以对付中国军民的围攻。因此，清军继续采用我国古代在边塞用兵“长途奔趋，裹粮而行”的传统战法，已不足以应付新的俄国侵略者③。后来康熙帝总结抗俄斗争的经验教训，采用“筑城永戍”的方针，才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其一。第二，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清军不宜采用长围久困的战法。明安达礼看不到此，战前缺乏充足的准备，轻率从事，作战时又错误地与俄军对峙，顿兵于坚城之下，劳师糜饷。如此，无疑是作茧自缚，后因粮饷不继而撤围，虽是出于无奈，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

三、古法坛村之战和斯捷潘诺夫匪帮的覆灭

尽管中国军队已经撤走，但是盘踞在呼玛尔堡的沙俄侵略军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们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为了抢掠赖以活命的粮食以及貂皮等物资，1655 年夏天，斯捷潘诺夫又

---

① 《平定罗刹方略》一，《朔方备乘》卷首五。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91 页。

率领哥萨克沿黑龙江来回窜扰，到处杀人放火，掠夺粮食财物。尽管如此，仍然找不到足够的粮食。斯捷潘诺夫匪帮多次发现被杀死的哥萨克和被击毁的俄国船只。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有遭到中国军民打击的危险，人人都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斯捷潘诺夫一再向雅库次克当局呈述自己的困境，哀求增援，甚至要求政府准许他离开黑龙江。在当年6月的报告中，斯捷潘诺夫写道："现在军队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呼玛尔寨生活也很艰苦，吃的是青草和树根……又冷又饿，什么东西都缺。在阿穆尔大河，皇家火药和铅弹也一点没有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保护皇家财物、城寨和自己的脑袋。我们附近有很多博格德国的各类部队，他们坚决不让我们，君主的臣仆在博格德统治下的达斡尔·久切尔以及其他民族的人所住地区的附近住下来。我们处处受到他们各类部队的强力钳制和严重威胁。"① 在1656年的一份报告中，他说："我们等待陛下的命令，没有陛下的命令，我们不敢离开阿穆尔大河到别处去。博格德的军队就在我们附近，我们已没有弹药和他们作战。"② 沙俄政府既无力派遣更多的军队前往黑龙江，又不愿放弃在那里攫取到的利益，于是一面发布嘉奖令给斯捷潘诺夫匪帮打气，命令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土上，一面鼓励更多的人员到黑龙江去冒险。所以，斯捷潘诺夫部侵略军达到了500人的规模。

清朝政府坚持以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的方针，不断派兵讨伐。

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斯捷潘诺夫率所部沙俄侵略军窜扰松花江地区，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呼达率领所部清军，在尚坚乌黑将其击败。

顺治十五年夏，斯捷潘诺夫率军500人顺黑龙江而下，进入

---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09、213页。

② 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1卷，耶鲁大学1972年版，第272页。

松花江，又溯江而上。与此同时，沙尔呼达率领清军及非战斗人员共1400人，分乘47艘战船，搜寻沙俄侵略军。六月十一日（7月11日，俄历6月30日），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会流处（今黑龙江省依兰附近）同斯捷潘诺夫匪帮相遇。清军拦住敌船，大小火炮一齐开火。沙俄侵略军像惊弓之鸟，一片慌乱，180人在战斗刚一开始即丢下他们的首领，往黑龙江上游逃跑了，剩下的人很快陷入清军的包围，270人被打死或者当了俘虏，只有47人逃脱。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斯捷潘诺夫在战斗中被打死。

此后，斯捷潘诺夫匪帮残部在黑龙江上下窜扰，后又与另外一些侵略军或分或合，继续作恶。在清朝政府的坚决打击下，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顺治十六年，沙尔呼达卒，清政府任命其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次年，斯捷潘诺夫匪帮残部200余人流窜到黑龙江下游。巴海率清军在古法坛村（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以下约200里处）附近江岸设伏，击败沙俄侵略军。巴海在奏报中记下了这次战斗的简要经过和战绩："臣等率兵至萨哈连（即黑龙江）、松噶里（即松花江）两江合处，侦闻罗刹贼众在费牙喀部落西界，随同副都统尼哈里、海塔等领兵前进，至使犬地方，伏兵船于两岸，有贼艘奄至，伏发，贼即回遁。我兵追袭，贼弃舟登岸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众。获妇女四十七口，并火炮、盔甲、器械等物。招抚费牙喀部落一十五村，一百二十余户。"①斯捷潘诺夫残部只有少数几个人逃回雅库次克、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至此，侵入我国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势力全部被肃清，中国人民取得了抗俄斗争的重大胜利。

抗俄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坚决抗击的方针，派出正规军直接参加对沙俄侵略军作战，并得到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其次，波雅科夫、哈巴罗夫、

---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八，顺治十七年七月丁丑。

斯捷潘诺夫匪帮对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均采取无后方的长距离流窜方式，到处抢掠骚扰，既处处遭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抗击，又得不到后援，其失败是必然的。

第三节 雅克萨自卫还击战

一、沙俄侵略军卷土重来

中国军民初期抗俄斗争的胜利，粉碎了沙俄迅速占领中国黑龙江地区的迷梦，打击了沙俄的侵略势头。但是，沙皇政府“并没有放弃占领阿穆尔的计划”①。不久，沙俄侵略者就卷土重来，逐渐恢复、扩大了对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活动。

沙俄政府在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从西方的叶尼塞斯克进入贝加尔湖以东，在那里建立一个立脚点，并逐步地向黑龙江流域扩张势力，要比从北方雅库次克进入黑龙江流域更为有利。早在17世纪40年代，沙皇俄国曾数次派哥萨克从叶尼塞斯克出发，进行侵入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尝试。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彼得·别克托夫首次占领了尼布楚，但没有站住脚。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巴什科夫重占了尼布楚。尽管巴什科夫和他的继任者托尔布津野心勃勃，准备在贝加尔湖以东大干一场，但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和哥萨克的大量逃亡，他们侵占中国黑龙江的“宏图大业”并没有多大进展。

1665年（清康熙四年），犯有“戕杀长官，抢劫国库”罪的俄籍波兰人切尔尼戈夫斯基，纠集一伙逃犯，从伊利姆斯克向南侵入中国领土。是年冬，这伙逃犯来到黑龙江上我国雅克萨城故址，在以前哈巴罗夫所建阿尔巴津城堡的废墟上，重建城堡。切尔尼戈夫斯基以雅克萨为巢穴，在中国领土上四处抢掠。由于他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103页。

们是一批逃犯，得不到西伯利亚方面的供应，因此，他们比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匪帮更凶恶残忍。就是这样一伙匪徒，却受到了沙皇政府的青睐。1672 年 3 月，沙皇政府以杀人罪判处切尔尼戈夫斯基及其同谋犯 17 人死刑，但两天之后，又在庆贺沙皇生日的名义下，赦免了切尔尼戈夫斯基等人，而且任命他为“阿尔巴津总管”。于是，这伙杀人越货的强盗摇身一变，成为俄国的正式官兵。发生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原因就在于，沙皇政府认识到，切尔尼戈夫斯基一伙完全可以成为沙俄侵占黑龙江流域中国领土的得力工具。

于是，雅克萨成为沙俄向黑龙江中下游进行武力扩张的前哨阵地。

17 世纪 60 年代以后，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势头有增无减，但其策略则比 50 年代有了明显的改变。俄国侵略者吸取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等人的教训，避免孤军深入和无后方作战，采取在中国境内建立堡寨、逐步推进的策略。他们在我国边境抢占据点，修筑工事，开辟道路，利用优势火力和坚固的工事，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使据点和后方的联络保持畅通，并从据点派出兵力，去开辟新据点。侵略者每推进一步，都要在当地派驻军队，设置殖民机构，勒索贡税，绑架人质，修造教堂，建立奴隶农庄，并且竭力拉拢、收买当地上层分子作鹰犬，加紧镇压人民的反抗。这样，在 60 年代以后，俄国侵略者在从贝加尔湖到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在这块土地上，雅克萨和尼布楚、楚库柏兴是沙俄最重要的侵略据点。这三个据点分别控制了黑龙江和色楞格河的水路交通。后来，沙俄侵略者又向我国精奇里江、额尔古纳河地区进行扩张，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据点。

为了巩固侵略阵地，沙俄不断向黑龙江北岸移民，建筑村落，开拓土地，强行殖民垦殖。在雅克萨附近出现了许多哥萨克村落。

沙俄侵略者还千方百计挑拨中国边境地区各族人民同清政府

的关系，进行策反、颠覆活动。在众多的事例中，根忒木尔事件是成为中俄冲突重要导火线的典型事件。根忒木尔原是我国索伦族的一个头人，在石勒喀河和音果达河一带游牧，后来内迁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一带，并成为清朝的四品佐领。但在俄国殖民主义者的策动下，他于康熙六年（1667 年）背叛祖国，携子女兄弟及 40 个索伦族人逃到尼布楚，投靠沙皇俄国。为了利用根忒木尔进行策反颠覆活动，沙俄尼布楚总管托尔布津亲自接受他加入俄国国籍，让他长期驻扎于尼布楚，管辖这一带的居民。根忒木尔则成为沙俄殖民当局的鹰犬和走狗，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经常劫掠和骚扰我国边境，并随同俄国侵略军对喀尔喀人、布利亚特人作战。1684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根忒木尔在赴莫斯科觐见沙皇途中死去。清朝政府屡次要求俄国政府将根忒木尔引渡给中国，遭到沙皇政府拒绝。根忒木尔问题成为中俄交涉中的一个重要争端。

沙俄侵略者盘踞于我国领土雅克萨，并四出扰掠，严重威胁中国边境的安全，特别是雅克萨距清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①，清廷不能等闲视之。所以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收复雅克萨便成为清政府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清政府加强东北边防的方针和措施

（一）和战结合、筑城永戍的方针

对沙俄的入侵，清政府采取的一贯立场是，尽量通过外交途径，和平地解决两国的边界和其他争端；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诉诸武力。早在康熙五年（1666 年），清政府就曾派索伦族人切普切乌尔等为使者赴尼布楚，要求同俄国谈判。尼布楚俄国总管托尔布津竟蛮横无理地“将该使者切普切乌尔拘留在涅尔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

琴斯克堡（即尼布楚），加以镣铐，禁锢达三个月之久"①。此后，清政府为和平解决中俄争端，又"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一再申明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谴责沙俄对中国领土的入侵和在黑龙江上的暴行，要求俄国交还逃人根忒木尔，归还雅克萨，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并提议进行外交谈判，以期改善两国关系。对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沙俄政府置若罔闻，不予回答，反而变本加厉，"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又窃据（雅克萨）如故，不送还逋逃"②。事实证明，仅仅依靠外交谈判，不可能制止侵略者的侵略活动，也不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双方之间的任何争端。在同沙俄的长期交涉中，康熙帝清楚地认识到"若辈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畏"③ 这样一个真理。因此，清政府决定进行自卫还击，打击入侵者，收复祖国神圣的领土。与此同时，清政府也不放弃通过外交谈判和平地解决两国争端的良好愿望。

对于如何用兵黑龙江，康熙帝十分慎重。他认真研究敌情、己情，注意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筑城永戍"的方针。

康熙帝亲政以来，对于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雅克萨等被占领土这样一件关系到祖国领土主权的大事，时时关心，处处留意。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即平定"三藩"叛乱之后的第二年，康熙帝第二次东巡。二月十五日从北京出发，三月初到达盛京，"谒陵"之后，由抚顺、兴京、哈达城（今西丰），出柳条边，下旬至船厂（或称吉林乌拉，即今吉林市），泛舟松花江上。通过对东北边防的实地考察，"将其土地险易、山川形胜、人物情性、道途远近，备细访问，以故酌定天时地利、馈运道路、进

① 《尼布楚总管阿尔申斯基给沙皇的报告》（1670 年），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 2 件，莫斯科 1844 年版。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

③ 《平定罗刹方略》一，《朔方备乘》卷首五。

剿机宜”①。至此，对于出兵抗击沙俄侵略，康熙帝决心已定，“决意命将出师，深入挞伐”。尽管当时文武大臣“皆以路远为难”，但他“独断兴师致讨”，毫不妥协②。

当年八月，康熙帝命副都统郎谈及彭春率领近2000兵丁，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侦察敌情、地形以及黑龙江城（瑷珲）至额苏里的舟行水路、自额苏里直通宁古塔的道路等情况。十二月，郎谈等回到北京，奏称：“雅克萨可下，罗刹可破”，“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他们还建议：“今臣等愚意欲取雅克萨诸城，非红衣炮不可破。记奉天府有红衣炮数座，若速遣官至奉天府，得二十炮，即可济用。俟来春冰未融化之时，预运于吉林江口。臣又访得黑龙江船数，大船四十只，小船二十六只。大船逆水迟滞，可载粮饷后行。若与陆兵接应，缓急未便。今小船仅二十四只，应再造小船五十六只。除出兵事宜粮用几何，应候旨裁定外，红衣炮必趁地冻之时，预运至湖勒海河口。俟来春冰解时，水陆军刻期齐发。”③ 康熙帝虽然同意郎谈对形势的基本估计，但根据客观形势和对敌斗争的需要，主张“暂停攻取”，进行持久的、充分的准备：“调乌喇（即乌拉，今吉林市）、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并置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演习之人。于黑龙江（瑷珲）、呼马尔（呼玛尔）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及席北乌喇之官屯，约可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黑龙江城距索伦村不远，五宿可到，其间设一驿。俟我兵将至净溪里乌喇，令索伦接济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④ 至此，“筑

---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六月初四日，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3～3884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六，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子。

城永戍”的方针基本上形成了。

筑城永戍方针的具体内容，以后虽然有所发展和变化，如筑城的地点，先是瑷珲和呼玛尔，复改在额苏里，最后定为瑷珲一处，但是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康熙帝始终坚定不移。第一，强调充分的准备，反对轻敌冒进。康熙二十一年底郎谈提出的“俟来春冰解时，水陆军刻期齐发”方案之所以被否定，就是因为缺乏充分的准备。不久，宁古塔将军巴海又提出：“罗刹倘水陆运粮，增兵救援，更难为计。宜乘其积储未备，速行征剿。俟造船毕，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萨，即亲统大兵，直薄城下”①。这个意见也为康熙帝所否定。康熙二十二年四月，他下谕说：“所议进征罗刹军务，殊为疏略。……至所议七月兵到，即行攻战，亦属未可”②。后来雅克萨之战的实践证明了强调充分的准备，反对轻敌冒进这一思想，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抗俄、实边结合，缺一不可。清政府的任务不但要把侵略者赶跑，而且要永远有备，使沙俄侵略者不得侵入，这就必须在收复的国土上驻兵永戍，充实边防。17世纪50年代，清政府用很大力量打退了沙俄侵略军，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匪帮，但由于在边境上没有派兵驻守，侵略军不久又卷土重来。鉴于历史的教训，康熙帝特别强调在黑龙江地区驻兵永戍，以充实边防。但是当时的黑龙江地区还是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的地方，而长期驻兵就要带来筑城设官、物资供应、交通运输以至屯田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清军将领中有一部分人害怕艰苦，视黑龙江边防为畏途，不愿到那里打仗，更不愿在那里长期戍守。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提出，派乌拉（今吉林市）、宁古塔兵五六百人，达斡尔兵四五百人，携带家属至额苏里，设将军、副都统等官，永远驻守。萨布素等将领却提出一个修正方案：只派达斡尔兵500人赴额苏里垦荒耕种，屯田永戍，而“以乌拉、宁古塔三千余兵，分为三班，将

①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九，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庚辰。

军、副都统等更番统领驻防”①。这个方案实际上是以“轮流驻守”代替“派兵永驻”，理所当然地受到康熙帝的批驳，当年九月，康熙帝指出，“轮流驻守”的办法，“兵丁频事更番，必致困苦，非久长之策”。他在谕令中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筑城永戍”的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措施：“其在黑龙江建城永戍，豫备炮具船舰，令设斥堠于呼玛尔。自黑龙江至乌喇置十驿，驿夫五十人。遇有警急，乘蒙古马疾驰。寻常事宜，则循十驿以行。由水路陆续运粮，积贮黑龙江。此兵既往，且立二年之业，仍设将军、副都统领之。如罗刹船由黑龙江下，我舟师尾击甚易。况黑龙江地势辽阔，照内地置十驿，又易安置家口。如此一一区画，则罗刹自穷蹙归诚矣。”②

（二）加强东北边防的措施

“筑城永戍”的方针，是清廷加强东北边防，抗击沙俄侵略的长久之计。据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筑黑龙江（瑷珲）城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二月，清政府决定在瑷珲、呼玛尔二处“建立木城”。次年四月，鉴于“爱珲（瑷珲）、呼玛尔距雅克萨城辽远，若驻兵两处，则势分道阻，难于防御”③，故改在瑷珲、呼玛尔之间的额苏里建立木城，屯驻军队。同年九月，最终确定在瑷珲筑城。城址在黑龙江东岸瑷珲旧城的废墟上。这里原是明代奴儿干都司辖下胡里平寨旧址，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政府曾在此地建立木城。这次建城，作为将军和副都统的驻地，较之原城扩大了许多。英国人拉文斯坦（1834～1913）在英国陆军部任职期间，曾经到过瑷珲城，他说该城“从前占地仅二点七英亩，以后，扩大到十三英亩半。在城中央，有一座面积为二点七英亩的堡垒拱卫着这座城。堡垒的墙高十二到十八呎。”④ 清代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说，瑷珲城“方九百

---

①③ 《平定罗刹方略》一，《朔方备乘》卷首五。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丁丑。

④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7页。

四十步，门五”①。该城为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驻地，故又名“黑龙江城”。康熙二十四年，将军治所迁至下游12华里的西岸，重新建城，仍称瑷珲。

2、设置黑龙江将军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定都顺天府（治今北京），以盛京（今沈阳）作为留都，设八旗驻防官兵，以留守盛京的内大臣管辖东北各地。顺治三年，改内大臣为奉天昂邦章京，给镇守东北总管印，管辖东北各地。因沙俄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御力量，顺治十年在宁古塔设昂邦章京一员、副都统二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以镇守宁古塔（包括黑龙江流域地区）。康熙元年（1662年），改奉天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四年又改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驻盛京，镇守辽宁；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驻宁古塔，镇守吉林和黑龙江流域，当时叫做“大洲”的库页岛也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为了加强黑龙江地区抗击沙俄的防守力量，先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宁古塔将军的治所向西移至乌拉，又于康熙二十二年十月把宁古塔将军所辖地区一分为二，分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任命萨布素为第一任黑龙江将军，驻江东瑷珲城。

3、调派军队

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1683年1月），清政府决定调派乌拉、宁古塔兵1500人驻守黑龙江。次年夏，副都统萨布素率领第一批官兵1000人进驻额苏里。二十二年，康熙帝谕令：“我兵既命永戍额苏哩（额苏里），应派乌拉、宁古塔兵五六百人，达呼尔兵四五百人，于来秋同家口发往”②。其中乌拉、宁古塔兵是补足原定驻守黑龙江的1500人之数，而达斡尔兵则是增派的。

---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② 《平定罗刹方略》一，《朔方备乘》卷首五。

这1000人于康熙二十三年秋，赴黑龙江屯田驻守。这两批军队共2000人，永驻瑷珲①，是守卫边境和对俄作战的主力。

除此之外，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康熙帝为了配合驻守黑龙江的清军作战，令“京城每旗精简五十人，参以军前获罪人员，委授夸兰大参领，别遣将军，由陆路直趋，五旬可达（黑龙江）”②。“每旗精简五十人”，八旗即为400人，连同“军前获罪人员”，估计总数在五六百人左右。这支部队大约于当年冬天到达黑龙江。康熙二十四年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前夕，为了对付俄国的火枪，又抽调安插在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善用藤牌的原福建官兵420人赴黑龙江前线③。这两批部队是配合驻黑龙江清军作战的，战斗结束后即撤离。

以上为作战部队，共约3000人。此外，清政府还调派几批部队赴黑龙江，执行非作战任务。康熙二十三年春，盛京官兵600人在副都统穆秦的率领下到瑷珲帮助筑城，城工告竣，即撤回盛京。康熙二十四年初，因瑷珲驻军出征，又派盛京官兵500人前往瑷珲，代黑龙江驻防官兵守城种地。四月，为设立墨尔根至雅克萨前线的临时驿站，令理藩院侍郎明爱率蒙古兵500人及部分索伦兵，前往黑龙江。这三批部队共1600人，都是临时调动，任务完成即撤离黑龙江。

4、贮粮屯田

为供应黑龙江驻兵和雅克萨自卫还击作战用粮，清政府从科尔沁十旗、锡泊、乌拉等地的官屯征取粮食1.2万石，可供3年之用；派马喇至索伦村购买牛羊粮食。另外，又在科尔沁旗的漠尔浑屯设仓库，屯米1万石。

同时，清政府令驻黑龙江的清军官兵一面备战，一面屯垦，

---

① 《尼布楚条约》订立后，黑龙江将军从瑷珲移驻墨尔根，带走士兵500人。此后长驻瑷珲的军队即为1500人左右。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九，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庚辰。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康熙二十四年正月戊子。

以减轻从东北南部运粮的负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令八旗官兵用汉军披甲在瑷珲城东北黑龙江东岸永戍屯田，这里的屯垦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康熙二十四年分，盛京官兵至黑龙江垦地一千五百余垧”①。康熙二十五年，又特遣部院大臣督领盛京官兵至黑龙江，分给牛种，垦地90多顷。在墨尔根也令索伦、达斡尔官兵耕种，后又在卜奎、瑷珲、墨尔根等地设立官庄。

5、修造船舰

沙俄侵略军主要是通过水路，沿黑龙江而下进行骚扰、入侵，其巢穴也都在黑龙江及其支流沿岸。与沙俄侵略者作战，需要大量的战船；从东北南部运粮至瑷珲，要走水路，也要大量运输船。因此，清政府对造船是非常重视的。早在顺治十三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呼达就在乌拉开始造船②。乌拉亦名船厂，明初已在这里造船，后因年久废弃。沙尔呼达恢复造船以后，由于抗俄军事斗争的需要，造船规模日渐扩大。有人记述康熙二十一年该地的情形称：“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名，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四十余艘，双帆楼橹，与京口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指沙俄）。”③

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康熙帝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舰。次年三月，派大学士觉罗勒德洪筹划造船、运粮等项事宜，决定在巨流河口造长三丈、宽一丈的运粮船60艘，在吉林地方伐木制造长三丈五尺的运粮船100艘，在乌拉造大运粮船50艘。当年十一月，又派伊桑阿赴乌拉督修船舰，并决定增造

---

① 《盛京通志》卷二四，《田赋·旗田》。

② 参见丛佩远、宋德金：《明清时代吉林船厂建置年代考》，《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③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吉林文史出版社《长白丛书》本。

30艘运粮船。至雅克萨作战前夕，先后修造战船和运粮船几百艘。水手则从士兵、奴仆和流放犯人中征发。

6、组织运输

把大批粮食、军火和其他物资运往黑龙江，是一件颇为复杂的工作。清政府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组织从盛京到瑷珲之间的军运。

第一段为辽河，从盛京以西辽河上的巨流河渡口起，到辽河上游等色屯（一称邓子村，在今吉林梨树），溯辽河而上，若逢淤浅，束水以行。

第二段，从等色屯至伊屯门（今吉林长春市），其间虽仅一二百里，但无河流，不通舟楫，粮食物资，由水起陆，“派蒙古官兵车辆陆续运往”。

第三段，从伊屯门经伊屯河（今伊通河）、松花江顺流而下，至松花江与黑龙江会流处。

第四段，从松花江与黑龙江会流处至瑷珲，由萨布素派黑龙江官兵船只运取。

这条运输线路全长四五千里。沿途设防兵，招夫役，浚河道，筑粮仓，工程浩大。清政府的准备工作做得较细致，派盛京刑部侍郎噶尔图、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等分别在第一、三两段实地勘察测量河道水深，确定所造船只的大小和运载量，并且派内务府营造司郎中佛保、户部侍郎宜昌阿等人在通州（今属北京市）到瀛台之间装米行船，作了试验性的航行。这条运输线路是17世纪末沟通东北黑龙江、松花江、辽河三大河流的交通大动脉。

7、开辟驿路

为保证军需供应和通讯联络，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筹划设置吉林至瑷珲之间的驿道。户部原拟设10驿，但考虑到“设驿之地，不行相度，难以悬议”，提出派人“详加丈量”①。

---

① 《平定罗刹方略》一，《朔方备乘》卷首五。

当年十月，清政府决定遣户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前往实地测量。二十三年初，包奇等人第一次勘测丈量，吉林至瑷珲“共一千一百九十五里，拟设十四驿”。经户部与有关衙门会议，决定“再增设二驿，共设十六驿”①。但是康熙帝认为此次丈量不细，应重行丈量。他在谕旨中指出：“驿站事宜关系紧要，凡丈量时，当以五尺为度，精确量之。此次丈量，里程甚远，著重加详议具题。”②九、十月间，包奇、能特、额尔塞等第二次前往丈量，测得自吉林城北行至黑龙江（瑷珲）共 1340 里，拟设驿站 19 处。十一月三十日，包奇等将驿站路线及各站间里程、站名等，一一上奏。十二月十五日，户部就有关驿丁的选派，各驿站牛马额数及其来源，驿丁派遣的时间以及驿丁口粮、住房、工费银的发放等具体事项，均向皇帝复奏。后经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会同有关衙门多次详议，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具题，康熙帝批准了这个方案。

其后，由于形势的发展，上述方案有所改变。议政大臣和有关人员鉴于当时齐齐哈尔、墨尔根二地已修城驻兵，以及墨尔根至雅克萨之间已设驿站，提出吉林至瑷珲之间的驿路宜经由齐齐哈尔和墨尔根的修正方案，并且建议：“应由户部、兵部、理藩院各委章京一名，令其将乌拉吉林至墨尔根、墨尔根至黑龙江设驿站及增设多少驿站等事宜，议定后具题。”③ 这个提议得到康熙帝的认可，并谕令“丈量嫩江至墨尔根，墨尔根至黑龙江设驿里程”④。包奇等人按新的设想实地勘测，“以五尺为度，由吉林城量至墨尔根，又由墨尔根量至瑷珲城，共一千七百一十一里。……共议设驿站二十五处”⑤。十一月，包奇等人将测量结果和各驿站名称、驿站间里程等一一具题。户部也于十二月就设置驿

---

①② 《户部为吉林至黑龙江设十九驿事咨黑龙江将军文》（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③④⑤ 《户部郎中包奇等题吉林至黑龙江设二十五驿本》（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站的各项具体事宜，向康熙帝具题。康熙帝批准了这个方案。至康熙二十五年上半年，这条驿路最后建成。

出于雅克萨反击作战的需要，自墨尔根至雅克萨城对岸之间也设置了一条驿路。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清兵即将由瑷珲进军雅克萨，康熙帝考虑到，“凡奏报军机，自雅克萨至额苏里，经黑龙江（瑷珲）前来，恐纡道迟延”，故令理藩院侍郎明爱“自墨尔根至雅克萨设驿，奏报军机”①。明爱会同户部、兵部派员测量，自墨尔根循嫩江而上直至雅克萨城对岸额木尔河，全长1300里，共设25站。

这两条驿路的管理，主要隶属于清政府兵、户二部，由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分管。各将军下设驿站官一至二名具体主管。每驿站设笔帖式和领催各一名，驿站的驿丁、马、牛、车等都有定额，“每驿计领催在内，共派男丁三十名，马二十匹，牛三十头，车三十乘”②。驿丁除少量的索伦、达斡尔贫民外，主要是发遣到东北的罪犯，大都是原吴三桂的部下及其家属。

这两条驿路的设置，对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第一次雅克萨之战

（见附图10）

清军进驻黑龙江及其一系列加强东北边防的措施，使中国在黑龙江地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增强，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沙俄的侵略扩张，并为收复雅克萨等失地创造了条件。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8月，从雅克萨出发企图到牛满河地区进行劫掠的一支沙俄侵略军，航行至精奇里江口时被清军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〇，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乙未。

② 《户部为吉林至黑龙江设十九驿事咨黑龙江将军文》（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船队包围，沙俄军头目梅勒尼克等30余人做了俘虏，其余30多人四散逃命。清军乘胜出击，扫荡沙俄军。西林宾斯克和德隆斯克据点中的沙俄军望风而逃，新结雅斯克据点中的沙俄军来不及逃跑，全部缴械投降。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中国各族人民备受鼓舞，纷纷拿起各种原始武器，袭击沙俄侵略者。据史籍记载："牛满河之奇勒尔奚鲁噶奴等，杀十余罗刹"；"俄罗春（即鄂伦春）之朱尔铿格等，于净溪里乌喇（即精奇里江）杀五罗刹，并获其鸟枪"；"飞牙喀（即费雅喀）之人击杀罗刹甚众"①。各族人民积极配合清军作战。康熙二十三年正月，由费雅喀族向导带路，清军夸兰大鄂罗舜率领部队抵恒滚河口，"遣宜番（投诚之俄国哥萨克，时任清军骁骑校之职）等造其居，开谕之，先取其鸟枪二十具并鄂罗春留质之子三人，招抚罗刹米海罗等二十一人"②。在中国军队和当地各族人民的打击下，黑龙江中下游地区除雅克萨之外，沙俄侵略势力均被肃清。

收复雅克萨的时机成熟了。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1685年2月25日），康熙帝下达了进军雅克萨的命令。为确保这次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康熙帝任命都统彭春为统帅，副都统班达尔沙、副都统郎谈、护军统领佟宝、副都统马喇、銮仪使侯林兴珠等参赞军务，组成强有力的指挥机构。

为了进一步掌握俄军情况，马喇令达斡尔副总管倍勒尔率领30余名本族健儿，潜往雅克萨实地侦察。倍勒尔等"生擒罗刹七人"，于三月初五日返回。这次侦察，察明了雅克萨城俄军设防等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雅克萨城垣庐舍如故"，"去岁雅克萨城内设立重木，中实以土。闻大兵至额苏里，即遣人各处求援"，"雅克萨兵众不满千人"③。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四，康熙二十三年二月辛酉。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〇，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戌。

四月二十八日（5月30日），彭春等率领一支由3000名战斗人员和部分水手、夫役组成的清军，分水陆两路从瑷珲出发。五月二十二日，进抵雅克萨城下。

虽然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清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中俄两国争端的良好愿望，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和平。早在进军雅克萨之前的二月，清政府即以清军统帅彭春等人的名义，给雅克萨俄军头目发出咨文，敦促俄军“撤至雅库（即雅库次克），遣还逃人”。三月十七日，又将一封以康熙帝的名义，用满、蒙、俄3种文字书写的致俄国沙皇的敕书，交由6名俄俘从喀尔喀蒙古出境，送往俄国。敕书谴责了沙俄“入侵我境，骚扰地方，抢掠百姓妇孺，滋事不止”，“纳我逋逃”等罪行，提出了“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某地为界，于该处居住捕貂纳税，勿入我界滋事”① 的建议。同月，又把一封内容基本相同的致俄国沙皇的敕书送交彭春，让其与咨文一并发出。五月二十日，清军到达雅克萨附近的杭屋莫，彭春即派俄俘费咬多里等3人将这两封信送交雅克萨俄军头目。中国政府的要求和建议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俄方却继续坚持其侵略中国的立场。俄军头目托尔布津向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报告，说“中国都统正率领大批中国军队乘木船和骑马由水陆两路前来进攻阿尔巴津堡，并扬言要占领该堡”，要求弗拉索夫火速“自涅尔琴斯克往阿尔巴津派遣援兵，运送大炮、小型火器、火药、铅弹”②。二十二日，彭春等在雅克萨城下，再次向俄军头目托尔布津传达了康熙帝的谕旨，要求俄军撤出雅克萨。但是，“罗刹负固，出言不逊”③，拒不撤军。

---

① 《康熙帝为再次敦促俄人即速撤出雅克萨事致俄沙皇敕书》（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

②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12件。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第3884页。

通向和平的道路又一次被沙俄堵死了。只有诉诸武力，才能驱逐侵略者。五月二十三日，清军分水陆两路列营：陆师列于城南，水师战船集于城东南。

雅克萨城堡城门及俄军司令部都筑了炮楼。城堡内俄军约826人，火炮12门。

五月二十四日早晨，一队哥萨克乘木筏从上游顺江而下，企图冲进城内。郎谈命护军参领雅勒泰前往招降。俄军不从，且持兵器来犯。銮仪使侯林兴珠率领的清军藤牌兵截击敌人，“众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顶，持揙刀以进。罗刹众见之，惊所未见，呼曰‘大帽鞑子’。众皆在水，火器无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枪矢不能入，以长刃掠牌上，折其胫，皆踣江中，杀伤大半，余奔溃而逸”①。这次水上战斗，击毙俄军30余人，俘获10余人，清军无一伤亡。

二十四日夜，清军调整部署：彭春遣副都统雅钦、营门校尉胡布诺等于城南佯攻，“设挡牌土垄，施放弓弩，作欲攻之势”；而令副都统温岱、护军参领瓦哈纳、汉军提督刘兆奇等“潜进红衣炮于城北”，担任主攻；令护军参领博里秋、营门校尉乌沙、绿营兵左都督何悠等“于两翼放神威将军炮”担任助攻；令副都统雅齐纳、镇守达斡尔提督白克等集战舰于城东南江面，以防敌从水上来援或逃跑②。二十五日黎明，清军集中力量攻城。清军以冷兵器为主，鸟枪仅有100来支，但官兵同仇敌忾，作战非常勇敢。特别是清军的红衣炮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这些红衣炮是中国自制的③，其中康熙十五年制造、康熙帝亲自命名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重2000余斤，制作精良，炮弹重6～8斤，装火药3～4斤，射程远，威力大。一发发炮弹射向城堡，嗖嗖呼叫

---

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6页。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第3885页。

③ 拉文斯坦在其所著的《俄国人在黑龙江》中说：清军“带着十五门欧洲造的、发射从五磅到八磅重的炮弹的炮”。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的火箭落到建筑物上，马上燃起大火。雅克萨城内一片混乱，神甫手捧十字架为士气低落的哥萨克打气。当日上午，郎谈下令在城下“三面积柴，将焚城”①。这时雅克萨城垣大部被毁，俄军100余人丧生。俄军纷纷要求投降，托尔布津万般无奈，遣使向清军乞降。

彭春等人接受俄军投降，遵照康熙帝“勿杀一人，俾还故土”② 的谕旨，给予投降俄军宽大待遇。700多名俄国人（大部分是士兵，也有少数妇女和儿童）③ 携带着除大炮以外的武器和个人财物离开雅克萨。清军为他们提供了必需的马匹和食物，并把他们送到额尔古纳河口。巴什里等45名俄国士兵不愿回俄国，获准留居中国，安插于盛京。被沙俄侵略者绑架的160余名中国人，全被释放，其中索伦、达斡尔人“仍各发回原地”，喀尔喀、厄鲁特人“俱察送到部，给发本主”④。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胜利结束，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雅克萨的战略目标完全达到。清廷上下都浸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康熙帝下令，萨布素“向来逗留不进兵之罪”，“概从宽免”⑤。对于此战的善后事宜，康熙帝亦有所部署。早在正月二十三日下达向雅克萨进军命令时，就已经提出：“罗刹果能遵旨即回，以雅库为界，我兵即驻扎于黑龙江（瑷珲），设斥堠于雅克萨，令疆圉帖然；倘仍行抗拒，则大兵相机而行。若不如此周详区画，今纵

---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第3885页。

②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

③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对遣返和留在中国的俄俘数目各书记载不一。据班蒂什—卡缅斯基以及华西里耶夫、拉文斯坦等书中所记，遣返300余人，留在中国25人；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所记，遣返600余人，留在中国45人。但一年多以后，当俄国信使文纽科夫到达北京后，曾向清大学士明珠说：“攻取雅克萨城以后，亦仅遣回战俘七百余人，尚有四五十人未还”（《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第67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卯。

克取雅克萨城，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① 六月十四日，即接到雅克萨捷报之后的第十天，康熙帝又提出：“进剿官兵殊属劳苦，令伊等暂回吉林乌喇地方，于盛京打虎儿之兵酌量派往防守。至雅克萨城虽已克取，防御决不可疏。应于何地永驻官兵弹压，此时即当定议。著大学士勒德洪、学士麻尔图、图纳，同郎谈、关保与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具奏”②。清廷文武大臣对沙俄侵略扩张的本性认识不足，对雅克萨的防御重视不够，所以迟至九月二十四日，议政王大臣提出的方案中，除了在瑷珲和墨尔根驻兵之外，根本没考虑驻守雅克萨的问题。尤为严重的是，清军收复雅克萨之后，统帅彭春既没有“设斥堠于雅克萨”，更没有在雅克萨派兵防守，甚至连雅克萨周围将要成熟的庄稼也没有收割，仅仅放火烧毁了雅克萨俄军的城堡，就率军回瑷珲去了。这一错误决策为沙俄军队重新侵占雅克萨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第二次雅克萨之战

沙俄侵略者是不会改变其侵略本性的，不久之后，他们又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雅克萨。

1685 年 7 月（康熙二十四年六月），托尔布津等率沙俄军队从雅克萨撤回尼布楚。几天之后，尼布楚统领伊凡·乌拉索夫即派遣哥萨克 70 人赴雅克萨侦察。在得知清军已全部从雅克萨撤走的消息之后，乌拉索夫派拜顿和托尔布津率领大批哥萨克先后侵入雅克萨。托尔布津完全背弃了他今后不再到雅克萨骚扰的保证，在撤离雅克萨刚刚两个多月之后，于 9 月初重占了雅克萨。托尔布津指挥着他和拜顿带来的 670 多名侵略军，首先抢收田野里的庄稼，随后“依旧址筑城”，准备过冬。次年春天，沙俄军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卯。

队继续筑城。“其城夹木为之，中实以土”，“外墐之以泥”①。土墙是用草土、粘土和植物根夯实而成，宽一丈五尺，高一丈。据俄国人的资料，宽四俄丈，高一俄丈半②。城墙上筑有炮楼，城中盖造了督军衙门和兵营，还有火药库、军需库和粮仓，并挖掘了水井、濠沟，企图长期霸占雅克萨。

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结束后，清军先撤回雅克萨，不久又撤到吉林乌拉，只有少量达斡尔兵在瑷珲防守。瑷珲城已从黑龙江东岸迁到下游12里的西岸，并在墨尔根筑城，准备把黑龙江将军衙门迁往墨尔根。由于清军在雅克萨没有驻军，所以俄军重占雅克萨数月之后，清朝政府对此仍一无所知。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初，清军才从奇勒尔人那里听到“罗刹复来雅克萨，筑城盘踞”的消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据以上奏，并请求“于冰消时，督修船舰，亲率官兵，相机进剿”。康熙帝认为，萨布素关于俄军重占雅克萨的消息，“乃传闻之言，并非遣人亲抵雅克萨侦取确音，不便遽尔用兵”。为慎重起见，康熙帝命萨布素及理藩院郎中满丕“确探情形以闻”③。满丕派遣索伦副总管乌木布尔代等人前往雅克萨侦察，俘获俄军鄂克索木果，证实了俄军“复至雅克萨，依旧址筑城”的消息。康熙帝得此确切情报后，立即下令讨伐。二月十三日（3月6日）颁发谕旨说：“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姑停迁移家口，如前所请，速修船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④四月初五日（4月27日），又派副都统郎谈、班达尔沙、马喇等参赞军务。行前，康熙帝在乾清宫单独召见郎谈，部署了这次作战的方针：“尔等此行宜慎之，当如前降旨晓谕：‘尔罗刹外国人，贪利弃命，扰我

① 《平定罗刹方略》三，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七。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83页。

③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丁酉。

边疆，今大兵复至，当速降。如不降则尽诛之。’若得雅克萨城，即往尼布抽（楚）。事毕，还，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勿毁其城，亦勿损其田禾，俟禾熟收为我饷。”① 这个方针，总结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正确的。

五月，清军从瑷珲出发。十四日，进抵门第茵，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与郎谈、班达尔沙、马喇等举行军事会议，决定自厄尔合河分水陆两路向雅克萨进兵。二十八日（7月18日），清军水陆两路共2000人会师查克丹，进逼雅克萨城。为了避免战争，在离城5里处，释放俄俘鄂克索木果，令他带一封清军将领的信入城交给托尔布津。信是用俄文写的。信中声讨了沙俄侵略者背信弃义，重回雅克萨建城筑堡，欺凌中国渔民猎户的罪行，并提出了严正警告：

“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我方决不轻易舍弃，你们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你们将被逐出，无力卷土重来，结局便是如此。

你们休要触怒我大军，速速投降，否则将沦为俘虏。凡有愿返回者，可取道诺斯②，或到勒拿河，返回本土，即在该地安居。若不然，试图较量，继续顽抗，则我方也绝不善罢甘休。”③

这时，雅克萨城堡中沙俄武装人员共有826人，火炮12门，火枪数百支，贮备了较多的弹药和粮食。托尔布津依恃城坚粮足，拒绝向清军投降，并派出部队潜至城外壕边，炮击清军。清军以龙炮还击，毙敌22人。俄军烧毁城外房屋，退入城内固守。

六月初一日（7月20日），清军占领了雅克萨以西河对面要地，水师占据上游江面。初四日夜，清军开始攻城。在郎谈的指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第3886页。《清圣祖实录》记为四月初六日。

② 诺斯，即外兴安岭。

③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769页。

挥下，安设在城北的红衣大炮一发发炮弹射向雅克萨城；副都统班达尔沙率步骑兵从城南发起攻击。除大炮外，清军仅有火枪50支，其余主要是刀矛弓箭等冷兵器。尽管武器明显劣于俄军，但是清军官兵为收复祖国的神圣领土而战，士气高昂，并受到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许多通古斯人从邻近各地来参加中国军队，事实证明他们是一些可怕的弓箭手”①。俄军出城反扑，受到清军步骑兵的打击，很快被赶回城里。清军乘势直逼城下，自夜至旦，奋勇仰攻。初八日夜，郎谈等率军击败沙俄伏兵，夺取了城南土阜，设伏兵固守。初九日夜，自江滨逼近城下筑垒，设伏兵三处。此后，俄军多次出城反扑，均被清军击退。但是，由于火器不足和缺乏有效的攻城器械，清军亦无法攻下坚城。

清军将领总结第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遂改强攻为长围久困。六月十二日，郎谈对众将领说：“若不断其水道，则持久难为力。”② 于是率兵在城外掘长堑，立土垒。城中虽掘有水井，但俄军饮水主要靠通向黑龙江的水道，俄军恐失水道，拼命来争。清军激战四昼夜，击败俄军，堑垒乃成。七月初八日，俄军出城，猛攻城北炮台，又被击败。自此之后，俄军龟缩城中，再不敢出战。

雅克萨的严冬即将来临。根据康熙帝“今天时渐寒，河流将结，宜每事筹画，预为之备”③ 的谕旨，雅克萨前线清军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雅克萨东、南、北三面掘壕筑垒，壕外置木桩鹿角，分汛防御，并于南北二处筑高台，架设大炮；城西江中，驻有清军水师，在东西两岸泊船备御，断敌外援；离城六七里的黑龙江上游港湾，冬季可以藏船，亦派兵守护，既防城内俄军逃走，又可截击尼布楚援兵；雅克萨城对面的古城岛上筑有清军的指挥部和过冬营寨；军中瘦弱的马匹，拟发回瑷珲和墨尔根饲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44页。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第3886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康熙二十五年八月丁丑。

养；全军除原有的萨布素部2100人外，又从墨尔根调来原在那里筑城的清军200人，由副都统博定率领来援。

清军从四面把雅克萨团团围住，俄军困守孤城，处境越来越困难。早在围城之初，正在塔楼观察战况的托尔布津被清军炮弹击中右腿，四天之后因伤重毙命，别伊顿继任为统领。在清军严密包围下，雅克萨城内的俄军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曾派隆沙科夫率70名俄军到雅克萨，企图“侦察该城情况，捕捉中国舌头，以确切了解敌方意图”。他们虽然偷偷地接近了雅克萨，却难以进入城堡，也捉不到中国舌头，“因为中国人的边远岗哨人数众多，哨所坚固，防守严密，不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偷袭”①。别伊顿派出的求援人员死里逃生，历时一月才到达尼布楚，但尼布楚俄军兵力不足，且冰雪严寒，弗拉索夫无法给予援助。除了清军炮击造成的人员伤亡之外，致命的坏血病在城中蔓延开来，使死亡的人数大量增加。到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年底，城堡中原来的826名侵略军大部分战死、病死，只剩下150人。而这些人也大都是坏血病患者和伤员，死神随时都在向他们招手，“能值勤的只有30来人和约15名少年”②。加上饮水匮乏，粮食不足，弹药将要耗尽，雅克萨城内俄军完全绝望了。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仍一如既往地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表现出争取和平的强烈愿望和诚意。康熙二十五年七、八月份，清政府曾委托回国的荷兰使团和葡萄牙传教士闵明我向俄国沙皇发出两封内容相同的信件。信件以兵部致俄罗斯国察罕汗咨文的形式，抄录了康熙帝的谕旨，详细地叙述了中俄边界冲突的由来以及清政府一贯争取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努力，并再次提出：“今仍望察罕汗撤回属民，以雅库等某地为界，各于界内打牲，互相和睦相处。否则，朕决然不容伊等任意遣人侵扰我边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99～100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23页。

民，我驻边兵必予拦截擒拿，以至正法。”“察罕汗若遣使复奏，请其斟选水路或陆路，迅速遣来。若难遣使，亦可将奏书即速交付西洋国、荷兰国，请其转奏”①。

这时，沙俄政府也想结束俄中两国间的武装对抗。不过，这是迫不得已的。早在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11月，俄军在雅克萨战败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与此同时，沙皇也收到了康熙帝在第一次雅克萨战争前夕致沙皇的信件和清军统帅彭春致雅克萨俄军头目的咨文。第一次雅克萨战争的失败，在沙俄最高当局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当时沙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对外与土耳其的关系十分紧张，新的俄土战争即将爆发。沙皇俄国当时没有力量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同时进行战争，而争夺黑海出海口的战争比向黑龙江扩张对于俄国来说更迫切，更重要。因此，它不得不考虑清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建议，派出使者赴中国同清政府举行谈判。在使者出发之前，先于1685年12月派出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万·法沃罗夫为先遣信使，驰赴北京。

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1686年11月10日），俄国先遣信使维纽科夫和法沃罗夫到达北京，两天后向中国官员呈递了沙皇致康熙帝的书信。沙皇在信中对其侵略罪行百般抵赖，妄称其“属下人并未作恶滋事”，并颠倒是非，捏造事实，胡说“中国皇帝之军队来我边界”，责问“中国皇帝为何缘故，不顾祖先互相和好敦睦之谊，事先未通告原委，即行出兵?”沙皇还在信中向中国炫耀武力，进行威胁，声称“已派无数精兵，令其抵挡尔军。我英勇将士，亦情愿与尔军一战”②。

代表清政府与俄先遣信使谈判的大学士明珠对沙皇信件中的

---

① 《兵部为俄应撤回入侵俄兵并于雅库立界事致俄皇咨文》（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第61页。

② 《俄皇彼得为请解雅克萨围遣使会议事致康熙帝之拉丁文本国书》（俄历1686年12月10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第71—72页。

谎言给予针锋相对的驳斥，指出：中国“向无伤犯尔国之处，尔国人却无故施放枪炮，杀我居雅克萨等地徒手虞人，并屡次纳我逃人”，窜入我黑龙江下游，骚扰滋事。“今尔奏书谓我先进犯，然逾雅克萨近二三千里，直入我恒滚等地，骚扰滋事者，乃尔俄罗斯人。其被拿获者至今尚在，问其于何地被擒，即甚明白。……此谓我先下手？抑谓尔先下手？”① 这有力的驳斥，使得俄罗斯使臣无言以对。

清政府抱着寻求和平的愿望，提出中俄双方各派出官员驰赴雅克萨，命令各自部队就地停止军事对抗，“以迅速了结双方之事”。这个合理的建议，竟遭到俄先遣信使的拒绝，维纽科夫用种种借口，拒绝派人去雅克萨宣布停战命令，却要求清军既解除对雅克萨的围困，又撤离该地区，而让俄军继续留驻雅克萨。清政府为了促成中俄两国政府间的正式谈判，实现两国间的和平，决定作出让步，实行单方面撤兵。九月二十八日，侍郎拉巴克等向俄国先遣信使转达了康熙帝的答复：“朕不忍见雅克萨四百人死于非命，笼中之鸟，尚且放生。为此，我撤回雅克萨之兵，集驻一处。由尔派出几名人员，穿着厚衣，前往通告此种情由，并迎接尔后来大使。尔大使亦应将此情由，行文雅克萨、尼布楚。今准尔推延十日启程，以便贸易”②。维纽科夫再也找不到借口，只得同意“明后日派出二人，前往雅克萨”③。这样，中俄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清政府派御前侍卫马武等四名官员与俄方派出的沙拉波夫和布什科夫二人，一同驰往雅克萨前线。十月下旬，马武等人到达

---

① 《明珠等为俄使呈递奏书仪式及撤围雅克萨事与文纽科夫交涉纪事》（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第 62～67 页。

②③ 《明珠等为俄使呈递奏书仪式及撤围雅克萨事与文纽科夫交涉纪事》（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第 69～70 页。

雅克萨，向萨布素等宣读了康熙帝关于停战撤兵的谕旨："鄂罗斯察汉汗以礼通好，驰使请解雅克萨之围。朕本无屠城之意，欲从宽释。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定议。"① 清军坚决执行停战命令，撤雅克萨之围，"回驻大营，合兵防守"②。俄国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俄国谈判使团全权大使戈洛文在其出使报告中，记下了沙拉波夫和布什科夫在雅克萨前线中国军队驻地的见闻："中国军队长官听说全权大使和皇家部队要来，产生了疑虑，但还是下令撤下围城用的筐垒、拒马、防盾和炮，他们本人也带着军队撤离，回到原来的筑有冬营的地方。"③ 只是由于清军的木船在黑龙江上冻住了，炮和其他许多军用品不能及时启运，所以，清军暂时还不能完全从雅克萨全部撤退。瓦西里耶夫在《外贝加尔哥萨克》一书中指出，从这时起，"从狭义上来说，包围是停止了，但是轻度的封锁还在持续着"④。

中国政府和军队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对雅克萨城内俄军予以尽可能的帮助。据沙拉波夫和布什科夫说，中国军队长官"要他们到阿尔巴津晓谕全体官兵，汗（指康熙皇帝）命令中国军队长官停止进攻阿尔巴津，以待举行全权大使谈判。军队长官将不再进攻阿尔巴津，要阿尔巴津城内军役人员放心，可以到阿穆尔河取水。……如果被围城中缺少什么，城内守军可以向军队长官说明，他们将下令给予帮助。""只是希望阿尔巴津城内人员不要出城来滋生事端。"并且应俄军指挥官别伊顿请求，"由阿尔巴津到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可以允许通行，少量人员带牲畜和粮食由涅尔琴斯克到阿尔巴津也将准予通行。"⑤中国文献记载，康熙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己酉。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第 3887 页。

③⑤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 2 卷，第 117～118 页。

④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1 卷，第 187 页。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687年1月24日），“罗刹酋长杯敦（别伊顿）遣人来求饮食”①，清军立即给予救济。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康熙帝派太医二人赴雅克萨，为前线将士治病，并指示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说：“至于罗刹，虽与我兵对垒，但我兵攻雅克萨城，从未诛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罗刹，亦应听其就医，使还彼国”②。萨布素严格执行康熙帝的谕旨。但是，俄军却“怀疑中国人想借此来刺探阿尔巴津防军的医疗卫生情况，所以托词城里没有病人而拒绝了这一建议”③。四月初六日（5月16日），由于黑龙江已经解冻，清军主动后撤20里，至查克丹驻营。七月十二日（8月19日），康熙帝接到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关于俄国谈判使臣已抵其境的奏报，为了促使谈判能够早日举行，立即下令清军全部撤离雅克萨：“萨布素等统率官兵乘天时未寒，还至黑龙江、墨尔根，修整器械，休息马匹，以度隆冬。仍于要地严设斥堠，并以鄂罗斯遣使请和撤还大兵之故，晓谕雅克萨城内罗刹知之。”④ 驻雅克萨前线清军遵旨而行。据雅克萨城内俄军报告，“（俄历）8月30日，中国军队长官率领全部中国军队乘木船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退回中国城镇”⑤。至此，历时一年多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由于中国主动地单方面撤军而宣告结束。

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是中国军民为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被占领土进行的正义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长期的抗俄战争中，中国军队和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表现了不屈服于外来民族侵略和压迫的反抗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由于清政府采取了以武力驱

---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第3887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九，康熙二十六年正月戊子。

③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70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〇，康熙二十六年七月戊子。《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记为七月十一日。

⑤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76页。

逐侵略者的正确方针，派出正规清军进驻黑龙江地区，筑城永戍，周密准备，并以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有机地结合，军队和各族人民密切配合，终于取得了抗俄战争的胜利。雅克萨之战是抗俄战争的典型战例，集中体现了上述抗俄战争的特点。雅克萨之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遏止了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进一步侵略，维持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使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雅克萨之战的胜利还促成了 1689 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会议的召开。中俄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协商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即《黑龙江界约》），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整个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由于和俄国订约停战，清政府能够腾出手来，对付准噶尔贵族的割据势力，进一步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

第十二章　对准噶尔的战争

第一节　准噶尔部的崛起

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鲁特蒙古，即漠西蒙古，又称额鲁特、卫拉特，其先系蒙元之斡亦剌（斡亦剌惕）、明代之瓦剌。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厄鲁特蒙古形成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准噶尔部原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以东霍博克河、萨里山一带，后移至伊犁河一带。和硕特部游牧于额敏河两岸至乌鲁木齐地区。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中上游两岸。土尔扈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当时厄鲁特四部虽然还处于"分牧而居"①、"部自为长"②、各不相属的状态，但已形成了松散的联盟关系，有一种称为"丘尔干"（盟会之意）的议事机构。"丘尔干"由各部的封建贵族参加，共同决定内外大政，调整内部各部首领之间的矛盾。"丘尔干"设一至两个盟主，一直由和硕特部的首领担任。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担任"丘尔干"的盟主。

由于准噶尔部的游牧地伊犁河流域土地肥沃，水草茂盛，并且和中原地区、漠南漠北蒙古、西藏以及中亚细亚的贸易较发达，经济发展最快，因而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准噶尔部的首领哈喇忽喇遂与拜巴噶斯共同担任"丘尔干"的盟主。哈喇忽喇"损

---

① 邓廷桢：《蒙古诸部述略》。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光绪十年浙江书局校刊本。

害许多弱小领主的利益，拼命扩大自己的力量”①。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不堪其袭扰，于17世纪20年代末率所部5万余帐约20余万人离开雅尔（今哈萨克斯坦乌尔扎尔），越过哈萨克草原，远徙于额济勒河（今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下游，原附牧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则入据其旧地游牧。

1634年，哈喇忽喇死，其子和多和沁继位。次年，和多和沁被达赖喇嘛授予额尔德尼巴图尔珲台吉的称号。巴图尔珲台吉继承其父的事业，进一步巩固了在厄鲁特各部中的统辖地位。他“恃其强，侮诸卫拉特”②。1637年，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拜巴噶斯之弟）率其部众向东南迁移，进据青海，其原游牧地乌鲁木齐地区被准噶尔部占据。至此，厄鲁特四部联盟已基本上解体，留在现新疆境内的厄鲁特蒙古只有准噶尔、杜尔伯特和辉特三部。巴图尔珲台吉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迫使杜尔伯特部和辉特部服从其统治。1640年9月，为了调整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巩固内部封建秩序，巴图尔珲台吉与喀尔喀蒙古扎萨图汗主持召开了厄鲁特、喀尔喀各部首领会议。会议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建立了蒙古各部更广泛的同盟。巴图尔珲台吉的地位由此得以加强。与此同时，他又对其西部、南部的哈萨克、柯尔克孜、诺盖等突厥族发动战争，使哈萨克等部“臣服于他，同他和睦相处，对他唯命是从”③。在巴图尔珲台吉执政期间，他建立起以准噶尔部为核心的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使“准噶尔”由厄鲁特蒙古一个部落的名称，演变为在准噶尔部统治下，包括了当地厄鲁特各部和一些突厥部落在内的地方民族政权

---

①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年版，第113页。

②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四，《额鲁特蒙古新旧土尔扈特部总叙》。

③ 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86页。

和地区的统一名称。

巴图尔珲台吉登上政治舞台之时，正是明清更替的大变动时期。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准噶尔部首领就与清政府建立了通贡关系。清崇德三年（1638 年），巴图尔珲台吉之弟墨尔根岱青派使臣向清朝贡献马匹①。1644 年清军入关，建立起全国性政权。顺治三年（1646 年），巴图尔珲台吉与厄鲁特各部首领共 22 人联名向清朝奉表贡，“附名以达”②。顺治七年，巴图尔珲台吉遣使入贡，正式与清政府建立起臣属关系③。此后，巴图尔珲台吉建立的准噶尔地方民族政权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贡使往来不断。

顺治十年（1653 年），巴图尔珲台吉死④，其第五子僧格继位。僧格继续奉行巴图尔珲台吉的方针，保持与清朝政府的隶属关系，于康熙五年（1666 年）、六年和八年三次“遣使进贡”，受到清朝政府的礼遇和赏赉。这时，一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正在准噶尔部贵族上层间展开。康熙九年年底，僧格被其异母兄车臣、卓特巴巴图尔杀害，其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嗣位，但是统治权很快就落入僧格同母弟噶尔丹手中。

第二节　对噶尔丹的征战

一、噶尔丹的扩张和内犯

噶尔丹（1644～1697）系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自幼被送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四四，崇德三年十月庚戌，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③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八，《驻扎大臣原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蒙文老档》蒙字 46 号，－0056。

④ 据《咱雅班第达传》。一说巴图尔珲台吉死于康熙四年（1665 年）。

往西藏削发为僧，受到五世达赖的器重，被授予呼图克图尊号。僧格被杀后，五世达赖准其还俗。噶尔丹急忙赶回准噶尔，声称奉达赖喇嘛之命为其兄僧格报仇；平定准噶尔内乱。在僧格旧部及和硕特蒙古鄂齐尔图汗的支持下，噶尔丹率部与车臣、卓特巴巴图尔联军在阿尔泰山地区进行激战，擒死车臣，驱逐卓特巴巴图尔，掌握了准噶尔部的统治权。

噶尔丹野心勃勃，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在加强内部集权的同时，采取先近后远、先弱后强的"近攻计"[①]，对厄鲁特各部和邻近部族发动了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康熙十五年（1676年），噶尔丹向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发动进攻，擒获楚琥尔乌巴什并杀其长子巴噶班第。康熙十六年，噶尔丹又侵袭和硕特部，杀鄂齐尔图汗。康熙十七年，他挥戈东向，欲进取青海，因清政府防范严密，被迫中途率军折回。康熙十八年，他又率兵3万，占领哈密、吐鲁番，其势力扩展至甘州（今甘肃张掖）。噶尔丹自称"博硕克图汗"，"胁诸卫拉特奉其令"[②]。康熙十九年，噶尔丹利用"回部"[③] 黑山、白山两教派之争，率领12万大军，进兵天山南路，"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④]，消灭了察合台系蒙古贵族建立的叶尔羌汗国，扶植白山派首领伊达雅图拉和卓为王，称阿帕克和卓，充当其傀儡，使之总理回疆各城。这样，天山南路完全处在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贵族的控制之下。此后，噶尔丹又向西面的哈萨克等部发动进攻，并征服了布鲁特人，占领了费尔干纳。

噶尔丹的野心随着他实力的增大而急遽膨胀。他梦寐以求的

---

① 梁份：《西陲今略》卷七，《噶尔旦传》。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③ "回部"，又称"回疆"，清代对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称。魏源《圣武记》卷四："回部者，天门南路也。天山为葱岭之干，袤数千里，抵哈密。其左右为准、回两部。"

④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2页。

是征服喀尔喀蒙古，并进而控制漠南蒙古，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汗国，以与清朝政府分庭抗礼。这样，必然要与清朝政府发生冲突。

噶尔丹于康熙十年掌握准噶尔部统治权以后，同其父兄执政时期一样，与清朝政府保持着臣属关系，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双方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噶尔丹执政后的第二年，即上疏清朝政府，请求按照其兄在位时之例，“准照常遣使进贡”①。在得到清政府的准许后，噶尔丹不断遣使，“随小台吉附贡”，并将部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上奏清廷，殊为恭顺。康熙十六年，噶尔丹袭杀鄂齐尔图汗后，初次直接“遣使奉表入贡”②。此后，几乎每年都派出使节向清廷进贡，贡使人数不断增加。康熙十八年，噶尔丹以达赖喇嘛所授博硕克图汗号为名，遣使奉贡入告，请求承认。清政府虽然认为“从无以擅称汗号者准其纳贡之例”，但因当时正全力平定三藩叛乱，对噶尔丹采取了安抚和羁縻政策，仍准其献纳③。由于噶尔丹对清廷“尽心敬顺”，贡使不绝，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一年在给噶尔丹的敕令中说：“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自尔父兄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忱，往来不绝，殊为可嘉。”④

噶尔丹与清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协和的一面。早在康熙十六年，清政府就对噶尔丹派出贡使的资格和有关的具体事宜作了规定，令其“此后入贡遣使，务令有材识真厄鲁特为首，不得仍遣回子”，而且要求“务给符验，方准放入”⑤。康熙二十二年，由于噶尔丹贡使每次人数多至数百人以至数千人，而且“进边之后，任意牧放牲畜，践食田禾，捆缚平民，抢掠财物，妄行者甚多”，为了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理，保证边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三八，康熙十一年正月庚午，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康熙十六年六月丁未。

③ 《清圣祖实录》卷八四，康熙十八年九月戊戌。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三，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乙卯。

⑤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

清政府改变了对噶尔丹“所遣之使不限人数，一概俱准放入边关”的做法，规定“嗣后……所遣贡使，有印验者，限二百名以内，准入边关，其余俱令在张家口、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等处贸易”①。其后，清政府关于噶尔丹贡使的规定更加具体，这对“其势日张，其志益侈”② 的噶尔丹是很大的限制和约束。因此，噶尔丹对清政府心怀不满，产生了离心倾向。与此同时，噶尔丹在沙俄的引诱下，逐渐向沙俄靠拢，走上了与沙俄互相勾结的道路。

噶尔丹执政之时，正是沙皇俄国疯狂向外扩张的时期，沙俄侵略者在向中国黑龙江流域侵犯的同时，也向中国西北部和北部的蒙古地区伸出了魔爪。早在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执政时，沙俄就曾用拉拢、引诱、威胁等手段，企图“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成俄国的臣民，把从属于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变成俄国的领土”③。由于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都严词拒绝其一切无理要求，沙俄的图谋没有得逞。噶尔丹执政初期，虽然也有亲俄的言论，然而他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实际行动中更多的是与沙俄对抗，维护了民族主权。但是，随着噶尔丹力量的不断增大，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控制喀尔喀蒙古的欲望更是越来越强烈。这恰好为妄图侵吞中国疆土的沙俄所利用。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率领 2000 名俄军到达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他借口蒙古人偷盗俄军的马匹，蛮横入侵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抗击沙俄的侵略。为了镇压蒙古人民的反抗，加强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占领，使俄国在未来的中俄谈判中处于有力地位，戈洛文极力拉拢和唆使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据记载，戈洛文在给外务衙门的报告中

---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癸未。

② 《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③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 168 页。

曾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并“建议由托博尔斯克派出使团去见厄鲁特汗”①。对喀尔喀垂涎已久的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乘喀尔喀内争之机，于康熙二十七年率领3万大军，越过杭爱山，向漠北喀尔喀地区大举进犯。

噶尔丹对喀尔喀的进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他率领的厄鲁特军队，与正在贝尔湖以东地区镇压喀尔喀蒙古人民的沙俄军队，对喀尔喀形成了钳形突击，这就使得土谢图汗无法用全力防御沙俄的入侵，只能由其弟巴图尔台吉率少数军队对沙俄军队实行戒备。土谢图汗在与噶尔丹交战失利之后，为了对付噶尔丹的进犯，又不得不急令在楚库柏兴（今俄罗斯色楞格斯克）防御沙俄军队的巴图尔台吉率蒙军撤出北线，从而使俄军得到了进行反扑的机会，给蒙古军民造成很大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噶尔丹对喀尔喀的进犯，还使得即将和俄国举行重要谈判的清政府十分被动。为了避免沙俄与噶尔丹的全面勾结，出现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清朝政府在与俄国的谈判中作了重大让步。

噶尔丹进犯喀尔喀，决不是民族内部的争斗，而是他在沙俄向我国蒙古地区入侵之时，有意识地与沙俄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这从噶尔丹与戈洛文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初，噶尔丹写信给戈洛文，说：“如今，蒙古人已被你我击溃。”戈洛文在回信中说：“你曾集结所部全体官兵武装进攻蒙古领主……而我至尊的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也曾发动同样武装进攻，许多蒙古领主被随从全权大使的官兵击溃，另一些被生擒；还希望沙皇陛下方面派兵袭击其余台吉，你也率领所部开赴蒙古地方。”② 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一些领主和牧民说，噶尔丹是根据沙皇的谕旨发动战事的，有大批配备大炮等火器的俄国军队协同他作战。战场上相遇时，准噶尔人就以皇家部队的

---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莫斯科1972年版，第18页。

②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622～623页。

名义来恫吓他们。被喀尔喀人俘获的准噶尔人也证实，噶尔丹进攻蒙古地区，是同俄国军队联合行动的①。

噶尔丹率兵越过杭爱山后，在特穆尔击败土谢图汗，然后分兵两路，自率一路越过土拉河，沿克鲁伦河东岸推进，击溃车臣汗部，另一路进攻土谢图汗之弟哲布尊丹巴的驻锡地额尔德尼昭。土谢图汗集中属众于土拉河畔的尼列图至鄂尔会诺尔一线，与噶尔丹部激战三天，终因力量悬殊而全线败北，“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②。在这种情况下，哲布尊丹巴坚决反对投靠俄国的错误意见，提出内附清朝的正确主张，受到喀尔喀蒙古王公们的拥护，“众欣然罗拜”③，土谢图汗遂请胡土克图率众内附。

对于噶尔丹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之间的纠纷，清朝政府一直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噶尔丹表面上对康熙皇帝的使臣“待之有加礼，殊为恭顺”，并表示矢志服从清朝政府的命令，说其“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④，却又加紧与沙俄勾结，企图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康熙二十九年初，噶尔丹派出的使者达尔罕宰桑携带他的信件到达伊尔库次克。达尔罕在会见俄国全权大使戈洛文时说，他“奉命携函来见全权大使，请求军援，并面请各位大使从边境城市派遣沙皇陛下军队以及大使现在率领的军队去打蒙古领主。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希望沙皇陛下军队与他的兵力会合，共同打击上述蒙古人，将其彻底歼灭”⑤。噶尔丹在致戈洛文的信中也请他“即率所部驰赴约定之地会合，以便并肩作战”⑥。

---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360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庚申。

③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总叙》注引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壬申、十一月甲申。

⑤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620页。

⑥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623页。

戈洛文对噶尔丹的提议很感兴趣，他对达尔罕宰桑说："如果他们的博硕克图汗向敌对的蒙古人发动军事进攻，则沙皇陛下可根据博硕克图汗的进攻形势，从沙皇陛下边境城市，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以及其他城市发兵进攻蒙古人。"①戈洛文派人随同达尔罕去噶尔丹处，"就共同对土谢图汗及其支持者可能采取的行动继续谈判"②。

在沙俄的支持和唆使下，噶尔丹决定再次向喀尔喀进犯。噶尔丹集中兵力，"自和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向，往征喀尔喀等部"③。康熙二十九年春，噶尔丹率军从吴达汉岭东进，在巴颜乌兰一带短暂停留后，即沿克鲁伦河进入呼伦贝尔地区。五月初三日，率兵渡乌尔扎河（今内蒙古乌尔逊河），企图追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车臣汗和土谢图汗。后噶尔丹沿喀尔喀河（今哈拉哈河）而进，追及昆都伦博硕克图，"昆都伦不能御，仅以身免，所有牛羊尽为所掳"④。噶尔丹顺索约尔济河（色野尔齐河）继续南下，向乌尔会河（芦河，今内蒙古乌拉盖尔河）进发，然后分东、北二路，进入乌珠穆沁境内。六月十四日，至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大肆劫掠，受害者遍及"四佐领之人"⑤。

噶尔丹不顾清政府的一再劝告，屡犯喀尔喀，并以追击喀尔喀为名，侵入内蒙古地区，这就必然要与清政府发生直接对抗。

二、康熙帝征讨噶尔丹的决心和准备

康熙帝对噶尔丹早就有所警惕。康熙十七年，有消息说噶尔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620页。
②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81页。
③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三月甲寅。
④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丁亥。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壬寅。

丹将兴兵进攻西海（今青海），康熙帝即令甘肃提督、靖逆将军张勇整饬清军，“严加防护”。后来探明“噶尔丹虽无起兵声息”，仍严令张勇等“不时侦探，加意防守边境”①。当时噶尔丹的野心尚未完全暴露，康熙帝对噶尔丹与喀尔喀蒙古的纠纷，一直采取调解的方针，以期“喀尔喀、厄鲁特息兵修好”②。后来，喀尔喀三部被噶尔丹击溃，数十万众弃其庐帐，分路逃往漠南内蒙古，寻求清朝中央政府的救济和保护。清政府发归化城、张家口、独石口（今河北沽源南）、清河门（今辽宁阜新市西南）等处仓米予以赈济，给以牛羊驼马和茶布等以供急需，并把他们安置在内蒙古苏尼特、乌珠穆沁、乌喇特诸部牧地内游牧。康熙帝多次遣使令噶尔丹停止军事行动，撤归原地。但是，噶尔丹为其“建立一个统一的喀尔喀—卫拉特独立国”③ 的野心所驱使，根本不把康熙帝的劝告当一回事，仍然我行我素。康熙帝看出，噶尔丹“势力强横，妄自志大”，“断不免窥视中原”④，因此在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时，康熙帝鉴于噶尔丹已至呼伦贝尔，即命裕亲王福全等“预为备御”⑤。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侵入内蒙古，直接与清政府发生对抗，康熙帝遂改变原来对噶尔丹与土谢图汗兄弟双方进行调解的方针，决心诉诸武力，铲除这股割据势力。

为了征讨噶尔丹，康熙帝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准备。

首先，向沙俄提出严正警告，防止沙俄插手。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康熙帝得知沙俄与噶尔丹互相勾结、酝酿订立反清军事同盟，噶尔丹扬言“将请兵于鄂罗斯，会攻喀尔喀”的消息后，立

---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康熙十七年闰三月庚申、八月己巳。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己巳。

③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85页。

④ 敖福合译：《圣驾亲征葛尔旦方略》钞本。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六，康熙二十七年七月甲申。

即传谕正在北京的俄使吉里古里、伊法尼齐等人，义正辞严地指出："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今仍扬言会汝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① 同时，命俄使派人驰往尼布楚向俄国当局报告。这就有力地揭露了沙俄暗中助乱的阴谋，迫使其不敢进一步与噶尔丹勾结，孤立了噶尔丹。

第二，争取阿拉布坦，分化瓦解噶尔丹部。噶尔丹侵入漠北后，毒杀了僧格的次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又企图谋杀僧格长子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遂于康熙二十七年冬，率部众 5000 人，脱离噶尔丹，在乌兰乌苏（今新疆沙湾县东乌拉乌苏）击败噶尔丹的追兵，占据伊犁河流域，独树一帜。康熙帝派员外郎马迪赴伊犁颁赐敕书及缎匹，"谕绝噶尔丹"②。此后，策妄阿拉布坦对清政府"立心诚恳，贡献方物，问安之使，不绝于道"③，清政府也屡遣达虎、马迪等人为使，加以赏赐。噶尔丹南侵内蒙古，策妄阿拉布坦立刻向清廷禀告，并准备出动军队配合清军作战。准噶尔统治集团的分裂，削弱了噶尔丹对内部的控制，一些被奴役的部族纷纷挣脱羁绊，投向清朝。在策妄阿拉布坦的打击下，噶尔丹对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维吾尔地区的统治也日益削弱。噶尔丹失去了伊犁河流域的老巢，处于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困难境地。喀尔喀三部全部南迁以后，噶尔丹的给养极端匮乏，几致不能生存。康熙二十八年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从噶尔丹处返京后向康熙帝奏报："噶尔丹败于策妄阿拉布坦，下人散亡略尽，又极饥窘，至以人肉为食。"④ 康熙二十九年戈洛文派往噶尔丹处的使者吉比列夫在回国后的报告中也记述了蒙古草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一。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八，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壬午。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三，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辛未。

原上人吃人的事实①。噶尔丹的实力因之大大削弱。

第三，调兵遣将，严密部署。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康熙帝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尼调鄂尔多斯、归化城、内喀尔喀右翼和四子部落兵3000名，喀尔喀兵3000名，后又调察哈尔兵600名，汉军200名带火炮16门，由阿喇尼、兵部尚书纪尔他布、一等侍卫阿南达、理藩院侍郎文达等率领，驻守洮赖河（今洮儿河，系嫩江支流）上流，负责监视和牵制噶尔丹的行动。五月，又调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率科尔沁右翼军2000名及两翁牛特、两巴林等旗兵1300名，迎击噶尔丹。六月，噶尔丹越过呼伦贝尔时，康熙帝令盛京（今沈阳）等地兵3000名，以及敖汉、土默特、奈曼各旗骑兵，赴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班第军前，保护科尔沁草原。噶尔丹至乌尔会河以后，康熙帝又增调盛京、吉林、八旗火器营兵以及天津镇、宣化镇等绿营兵共8000余名，并增发火器。同时，又命康亲王杰书等率禁军驻归化城，直隶巡抚于成龙率兵1000名驻遵化，西安将军尼雅翰、副都统巴赛、柏天郁率满洲兵2000名、汉军兵1000名屯宁夏。这样，从黑龙江到宁夏漫长的边防线上都有重兵布防。

第四，运送军粮，安设驿站。规定所调之军均自带2～3个月口粮，另以太仆寺骆驼驮运军粮。同时，令兵部和蒙古派人从古北口（今河北滦平南）至阿喇尼驻军之地安设驿站，以保障通讯联络的畅通。

三、乌兰布通之战

（见附图11）

噶尔丹进入内蒙古境内以后，康熙帝决心派出援军支援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兵部尚书纪尔他布率领的各部蒙古军，待诸路大

---

① 伊·亚·兹拉特金：《蒙古近代史纲》，莫斯科1959年版，第51页。

军会齐后，一举歼灭噶尔丹军。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六月二十二日，康熙帝确定各军出征日期，并决定于七月初六日出京亲征。为稳住噶尔丹，以待各路援军会齐，康熙帝派出使者赴噶尔丹处，一方面斥其阑入边汛肆意抢掠和扣留清政府使者的罪行，一方面对其“婉言相慰，羁縻其前行，勿怒而激之”；同时，又令阿喇尼等“各集兵增备，姑勿与战以待，而每夜辄张两翼，严巡儆，防其夜袭。如噶尔丹见敕谕而退兵，则止之，令勿退。其或不止，则令诸军疾发击之。如或奔溃，务必穷追”①。

阿喇尼和纪尔他布原驻守洮濑河。六月初五日，阿喇尼等率军向布雨尔(今贝尔湖)进发，至博洛达卜素地方，侦知噶尔丹已进至乌尔扎河，遂率军赴布雨尔以南的他奔他什海防御，旋趋西喇西巴尔台集结。后噶尔丹追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驻于索约尔济河，阿喇尼侦知此情，即连夜率军往袭。至其地，发现噶尔丹已从济达齐牢之东进向乌尔会河，抢掠乌珠穆沁，阿喇尼遂分兵二队，乘夜奔袭。二十一日拂晓，在乌尔会河地方，追上噶尔丹军。噶尔丹军有 2 万骑兵，阿喇尼恃勇轻敌，指挥失当，仅挑选蒙古勇士 200 余人向噶尔丹军进攻，另令喀尔喀兵 500 人夺取噶尔丹军掠取的牲畜财物等。由于各部蒙古兵缺乏训练，纪律不佳，“未及战，诸扎萨克及喀尔喀兵争取其子女牲畜，阵动不能止”②。噶尔丹军分两翼立阵，凭借鸟枪火力，击退各部蒙古兵的攻击，后又从山上绕出阿喇尼部蒙古兵左右，击溃清军。当时在噶尔丹军营内的俄国使者在其出使报告中曾这样描述这次作战的情形：“博硕克图汗(指噶尔丹)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③。阿喇尼率部退驻鄂尔折伊图。

乌尔会河之战后，康熙帝因阿喇尼和纪尔他布“违命轻战以

---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甲申。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子。

③ 转引自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 286 页。

致败绩”给予革去议政、降四级调用的处分，令阿喇尼“毋以前战未捷，遽怀退怯，其收集兵马，严行警哨”①。为了制止噶尔丹继续南侵，康熙帝加紧进行出征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七月初一日，康熙帝再次强调在各路大军齐集之前暂不与噶尔丹交战的方针：“大兵陆续前进，朕亦亲征，姑勿与战，以待各路军至齐发，毋致失利。”②

七月初二日，康熙帝发布动员令，规定军纪和奖惩条款，并任命出征将领。随后，各路大军陆续出征。其部署是：以皇长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副之，率大军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扎副之，率大军出喜峰口（今河北宽城西南）；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参赞军务。两路大军迂回北进，与阿喇尼部、沙津部及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部清军一起，对噶尔丹军形成战略包围之势，以期一举歼灭之。

乌尔会河之战后，噶尔丹仍在乌珠穆沁境内。六月下旬，他在察克墩望见清军沙津部的前哨，遂于六月二十八日“潜师退去”，“退回二宿之地，似欲潜逃”③。为了麻痹、稳住噶尔丹，以待各路大军齐集，前堵后截，围而歼之，康熙帝采取“羁縻”方针，于七月初九日谕令遣使赴噶尔丹处，十三日又令噶尔丹的使者带回给噶尔丹的敕书，向其说明：“阿喇尼等在边，以尔公然阑入汛界，守边责重，不能容忍，遽与尔战，朕甚非之”；裕亲王福全和皇长子允禔率兵自京赴塞北，“非讨汝也，欲定议耳”④，“与汝申明礼法，自兹以往，永定盟好。汝不闻前者我朝出兵至鄂罗斯，以礼和好，不战而归乎！汝其谨俟王及皇子之至”⑤。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己丑。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庚寅。

③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癸卯、戊戌。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壬寅。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同时，又通过使者向噶尔丹提出警告："圣上遣皇兄及皇子与汝相见，非恶意也。汝乃不俟而去，非汝之不轨乎！虽圣上戒勿战，我不汝贷也！"康熙帝特别强调："如此往复遣使，以羁縻之。"① 为"老其锐气，疑其士卒"②，福全还遵照康熙帝的谕旨，馈送噶尔丹羊100头、牛20头。结果，噶尔丹产生了错觉，停止了后退，回军南下。噶尔丹七月上旬屯兵于乌珠穆沁旗奇尔萨布拉克，距阿喇尼部驻地西喇西巴尔台一日程。七月十一日驻音札哈河上流，十二日至贺尔洪河，十三日沿河而下。这时噶尔丹已得知清政府调集的大军正向其逼近，他派出使者于七月十五日到达内大臣阿密达处，阐明其与清政府对抗的立场："今乃闻侍卫阿南达率兵及诸路军云集，又闻有内大臣且至，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台吉亦在军中。夫执鼠之尾，尚噬其手。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③ 同一天，噶尔丹引兵内进，屯于西巴尔台。十八日至敖布喇克，二十日前徙于布立图。二十七日，噶尔丹进至克什克腾旗境，沿萨里克河至乌兰滚，屯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经棚南230里）。

康熙帝为了将噶尔丹诱归一处，一举歼灭，指挥各路清军从不同的方向成大包围态势向噶尔丹军进逼。主力福全部七月初六日从北京出发，出古北口，经鞍匠屯（今滦平县城）、博洛和屯（又名黄姑屯，今隆化县城）、坡赖村，沿伊逊河进入哨鹿围场（今围场县），再经克勒进至巴林。七月中旬，因噶尔丹沿贺尔洪河而下，将往达尔脑儿（今内蒙古达来诺尔），福全遂率军"沿拜察河（今高凉河）径由正蓝旗游牧之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正蓝旗一带）往御之"④。七月二十三日，福全部与马思哈部会师后，进至吐力埂河（今四道河），北距乌兰布通仅40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甲寅。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④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里。常宁部七月初四日从北京出发，出喜峰口北进。康熙帝令常宁部视其道之近者，往与福全部大军会合。因福全部正由拜察河往正蓝旗游牧之地，遂于十九日令其自鞍匠屯（今承德县鞍匠乡）取道兴州（今滦平境内），往会裕亲王军。二十三日，康熙帝又命常宁部不必赴拜察河，径往吐力埂河一带，与福全部会合。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部七月初驻葫芦谷尔河（今秃河），后在西喇西巴尔台会合阿南达、阿密达两军，驻于朱尔亨布喇克；七月中旬驻军木西峡及噶尔达苏台两界河。七月下旬，裕亲王福全部大军与阿喇尼、阿南达、阿密达等以及马思哈所率领的一支炮兵在拜察河会合。这时沙津、班第、苏尔达等率领的科尔沁、盛京、乌拉（今吉林市）的军队也到达达尔脑儿附近，切断了噶尔丹退回漠北的归路。至此，噶尔丹已处于清军战略包围之中。

乌兰布通为一赫色的山峦，汉语名为大红山。哈尔哈河(即哈尔汉河)和泡子河在乌兰布通的西北汇入萨里克河，再向北注入西拉木伦河。乌兰布通山南坡是陡峭的悬崖，无法攀登，山北面居高临下，利于据险扼守。噶尔丹"觅山林深堑，倚险结营"①，布阵于山冈，将骆驼缚蹄卧地，背负箱垛，蒙以湿毡，摆成一条如同城栅的防线，谓之"驼城"。噶尔丹军的总兵力约2万余人。

康熙帝于七月十四日离京，二十日到达博洛和屯，因患病不能继续前进，遂于二十三日返京，但他为即将开始的大战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并命福全总统全军。七月下旬，参战清军各部大都与抚远大将军福全部会合。在乌兰布通附近的吐力埂河和拜察河一带，清军"凡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余里，阔二十余里，首尾联络，屹如山立"②。福全的大营设在土尔埂伊扎尔，距乌兰布通40里。清军参战部队连同断役在内，约10万人，"多于敌人至少四五倍"③。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康熙二十九年八月庚申。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三，附录《内大臣出师塞北纪程》，第126页。

③ 《张诚日记》，1690年1月2日条，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福全令清军各营掘壕筑垒，戒严防御。七月二十九日，噶尔丹“遣喇嘛一人诣军前言事，大将军知贼无降意，号令三军，严整旗鼓”①，准备向敌人发动进攻。

八月初一日黎明，福全率大军出击。中午，已迫近乌兰布通。清军隔河布阵，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马思哈部火器营在前，步骑兵在后，分前后二队和左右两翼。交战开始，清军集中火铳、火炮，猛烈轰击敌人驼阵。噶尔丹军于林内隔河相拒。自午后至日落，激战半日，清军将噶尔丹军驼阵轰断为二。福全指挥大军乘势发起冲击，除正面攻击外，还以骑兵从左右两翼迂回侧击。右翼为泥泞沼泽所阻，不得不返回原处。左翼绕过水泡子，沿萨里克河冲锋前进。噶尔丹军士卒以驼城为掩护，于“栅隙注矢发枪，兼施钩矛”，奋力还击。清军受地形限制，又缺乏良好的训练，不习战阵，队形过密，因而伤亡很大，据康熙帝后来回忆说：“左翼军虽能胜敌，而右翼军不能制胜。大臣而下，以至军士，阵亡被创者甚众。”② 康熙帝的舅舅、内大臣佟国纲也在战斗中中枪阵亡。尽管如此，在清军前后夹击下，噶尔丹军亦难以支持，便以夜暗为掩护，退向山顶，在隐蔽处施放鸟枪。福全等见噶尔丹凭险顽抗，遂下令停止进攻。

八月初一日一战，双方虽互有伤亡，胜负未分，但原本兵力就处于劣势的噶尔丹军，由于远离基地孤军深入，兵员补充和后勤补给均极为困难，又处在清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所以从总体上说处于不利的态势，无法继续与清军抗衡。而清军只要不为暂时的挫折和困难所吓倒，敢于继续进攻，不难给噶尔丹军以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将其彻底歼灭。可惜的是，福全见不及此，他因并不大的伤亡而怯战，第二天出兵时，“见噶尔丹所据险恶，坚壁拒抗”，竟错误地停止攻击，令“将士暂息”。而诡计多端的噶尔丹却利用福全的错误，先后派遣伊拉古克三和济隆等人至福全大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三，附录《内大臣出师塞北纪程》，第127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三，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

营，以“讲礼修好”为名，施缓兵之计。福全虽然最初也心存疑问，曾向济隆提出“汝往来行说，能保噶尔丹不乘间奔逸，掠我境内人民乎”的问题，但当济隆保证噶尔丹“仰体圣上仁心，休征罢战，彼焉敢行劫，亦断不远去”时，竟天真地听信了济隆的花言巧语，丧失应有的警惕，看不清这是噶尔丹为脱身而施放的和平烟幕弹，竟错误地认为，“噶尔丹乃狡诈之人，虽不可全信，但战之次日，屡遣人来，必多窘迫”，向各路领军大臣发出印文，令其“暂止勿击”，企图利用暂时休战的机会，“以待盛京、乌喇（即乌拉）、科尔沁诸军之至，齐行夹击”。[①] 康熙帝得报，命福全等迅速追剿，不要中敌奸计，但为时已晚。噶尔丹乘清军暂停攻击之机，率残部夜渡萨里克河，经大碛山（今克什克腾旗西沙窝子）、刚阿脑儿（今称牤牛泡子）向漠北逃跑。沿途焚烧草地，“以绝追骑”[②]。当时，盛京、乌拉、科尔沁诸军已至达尔脑儿一带，因有福全“勿与之战”[③] 的命令，噶尔丹乃得以顺利通过。噶尔丹狂奔不止，一面遣使向清王朝请罪，诡称“誓不犯边”[④]，一面纵兵抢掠克什克腾旗 3 佐领，抢去羊 2 万余只，牛马 1000 余头。

乌兰布通之战，是清王朝征讨噶尔丹的第一个重大战役。此战，尽管由于福全违背康熙帝的战略意图，指挥失误，丧失战机，未能一举歼灭敌军，让噶尔丹得以脱逃，但从总体上说，清军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首先，粉碎了噶尔丹割据北方，与清王朝分庭抗礼的迷梦。其次，重创了噶尔丹军，使其实力大为削弱。噶尔丹战后请和，虽非“卑词乞降”，但也反映出其为避免全军覆没，急于脱身的窘迫状况。噶尔丹在向漠北逃跑的过程中，更是饥寒交迫，疾疫流行，人员锐减。乌兰布通之战的次年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康熙二十九年八月辛酉。

②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三，《克什克腾旗》注。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九，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己酉。

④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第 117 页。

春天，侍卫阿南达上奏说："噶尔丹去年败走以来，日以北徙，人畜屡毙，劫掠无所获。近者噶尔丹亲率兵来劫喀尔喀，至阿尔哈赖地方，又无所得，皆徒步而返，困敝已极。"① 康熙帝在给噶尔丹的敕谕中，也说："今闻喀尔喀逃来人等言：汝厄鲁特牲畜已尽，无以为食，极其穷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继。"②最后，噶尔丹军"得还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耳"③。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之所以没有歼灭噶尔丹军而打成击溃战，除了前线主帅福全指挥失误之外，与八旗兵军政素质下降亦有很大关系。副帅允禔与主帅福全不能精诚团结，"允禔听信小人谗间之言，与裕亲王不协，妄生事端，私行陈奏"④，康熙帝不得不将允禔从前线调回京城。在战斗中，八旗将领贪生怕死，临阵退缩。许多将领为了自身的安全，抽取精壮兵丁为护卫，直接参战的兵员大大减少，引起士兵的不满。康熙帝后来追忆乌兰布通之战时，曾对议政大臣指出："出征乌兰布通时，……索额图、明珠选勇士数百人近身防护，勇士云：'挑选我辈原拟或战或追，讵意止令防护？'共生忿怨。"⑤ 更有甚者，有的将领因怕死而丑态百出，如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乌兰布通之战，彼则大惧，故推受暑下马。其家人俱愤曰：'身为二品大臣，如此临阵退怯，归去何颜见人耶？'扶之上马。色格印复下马，卧于草内。及回营，犹战栗不已，身披甲胄，蒙被达旦。因此伊所管兵丁，无不耻笑。"⑥ 将领如此贪生怕死，怎能率领军队冲锋陷阵呢？八旗将士由于在和平环境下缺乏应有的训练，军事素质低下，以致作战时指挥失灵，战术失当，增加了部队的伤亡。乌兰布通之战刚刚结束，康熙帝就总结了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指出："我军近

---

①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〇，康熙三十年二月丁卯。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卯。

④ 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七，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壬申。

⑥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三，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庚辰。

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并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①

四、昭莫多之战

（见附图12）

噶尔丹逃回漠北以后，即完全背弃了不再侵犯喀尔喀和内蒙古的誓言。他从乌兰布通之战的失败中认识到，孤军深入到靠近京师的内蒙古，并与清军进行阵地决战，是非常失策的。因此，他改取如下战略方针："以言语煽惑喀尔喀及内地蒙古，使首尾不相自顾，彼时可图大事。满洲闻之，必然出兵。师少则与之战，师众则委地而退；满兵既旋，复蹑袭其后。如此不数年，自然财赋耗竭，必致疲敝。"② 康熙三十年（1691年）初，噶尔丹又侵至克鲁伦河流域，劫掠喀尔喀。康熙三十一年以后，更肆无忌惮地多次派遣间谍至内蒙古，煽动内蒙古王公贵族叛离清王朝，归附于他。

康熙帝对噶尔丹一直是存有戒心的。乌兰布通之战刚刚结束，噶尔丹"认罪立誓，上书请降"。康熙帝当时即指出，噶尔丹"人殊狡诈，难以深信。我大兵撤后，背盟妄行，亦未可定"，故"仍宜发兵预备。万一有悖乱之信，则夕闻朝发，即可扑灭。若待有变而后发兵，缓不及事矣"③。基于以上考虑，康熙帝对北部边防异常重视，根据形势的变化，多次调整部署，加强边境守备。他还多次出巡塞北，以稳定喀尔喀蒙古上层。康熙三十年五月举行的多伦会盟，加强了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孤立了沙俄侵略势力和噶尔丹军。

康熙三十三年，清廷诏噶尔丹来会盟。噶尔丹"不报，而遣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丁酉。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四，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壬申。

③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丁丑。

兵侵掠喀尔喀益甚"①，又多次要求清王朝把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交给他处置，并暗中遣使引诱内蒙古各部叛清。三十四年八月，噶尔丹再次侵掠克鲁伦河，并对清廷派出的三起使臣肆意侮辱。康熙帝见噶尔丹内犯的迹象日益显露，"深知此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不至殒命不止"②。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此贼一日不灭，则边陲一日不宁"③，因而决定再次进行征讨，以铲除作乱边疆、破坏国家统一的噶尔丹部割据势力。

为使征讨作战能够顺利进行，康熙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大量的准备工作：

第一，统一思想，广泛进行动员。要不要再次征讨噶尔丹？能不能消灭噶尔丹？对这些问题，在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中认识并不一致。有相当多的人认识不到征讨作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的则贪图安逸，害怕艰苦，不愿赴前线作战；还有的存有畏敌惧战情绪。因此，康熙帝将要不要征讨噶尔丹等问题交三品以上的廷臣讨论。当时，"议当征者，举朝不过三四人。其余虽口称小丑何足计议，而中情甚是恇怯"④，"大臣官员，逡巡退缩，无意自效，但云：俟彼来前，可与一战；若远在克鲁伦，必待塞草萌达，方可前行"⑤。康熙帝力排众议，决计亲征。他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阿达哈哈番（正卿）、参领以上各官，到各旗聚议，讨论如何消灭噶尔丹、清军如何设防等问题，并将讨论结果由本旗陈奏清廷，以备参考。经过多次讨论，终于统一了各级官员的思想认识。

第二，调集大量部队。除调集精锐的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外，还征调内蒙古、喀尔喀蒙古的部队，并令革职、候缺官员及进士、举人、贡生、监生、无顶带笔帖式等自愿从征。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第118页。

②④ 《御制亲征朔漠纪略》。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

⑤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六，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丁未。

第三，给清军配发火炮等武器装备，采买马匹。康熙帝对火炮非常重视。鉴于乌兰布通之战时所携火炮过重，不便运送携带，故此次出兵前令从各地调集较为轻便的火炮，并新铸重500斤的火炮48门。这些炮大都配发给中、西两路大军使用。至康熙三十五年二月，配发给西路军使用的各种火炮计有：冲天炮3门、神威炮10门、景山造子母炮24门、江南炮55门、新造炮8门，另外还有火箭3000支。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又令将内务府制造的绵甲样品交浙江、江南（今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江西5省，令其仿造5000领。这些绵甲在战前都发到军中使用。此次作战，要深入大沙漠，每兵需马4匹，运输粮草亦需大量马匹，除发钱令八旗士兵自买马匹外，又派人往内蒙古四十九旗和喀尔喀各部购买，从而保证了战争需要。

第四，筹备粮食，保证运输。深入瀚海作战，不能就地补给，因而粮食的筹备及其运输极其复杂和繁重。中路军共32970名，除自己携带（用配发的马匹）80日口粮外，每人月给米2斗，两个月需米13188石。为装运这些军粮，清政府拨出内帑银6万两，造运粮车4000辆（后又增造1500辆）。西路军，从大同出发的24260余人，除自己携带的口粮外，需粮8080石，除用运粮车1500辆运送外，还需大量骆驼；从宁夏出发的32400余人，5个月需米22400石，除自携部分外，尚有17200石，皆以骆驼驮运。由此可见运输量之大。

第五，战前练兵，申明纪律。决定再次出征之后，清军“秣马厉兵，教营伍，练攻战，激励将士，申明赏罚”①，展开了战前练兵活动。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在南苑阅兵，发布敕令：“倘遇敌奏凯而还，朕必大霈殊恩。阵亡者，除照常给赐身价外，护军则荫一子为七品官，食俸；骁骑则荫一子为八品官，食俸；如无子，则照本身钱粮，给其孀妻终老；所借公库官银，另加宽恤。倘违军令，勿得仍望如前矜宥，必照太

① 《御制亲征朔漠纪略》。

祖、太宗、世祖皇帝之律治罪。"① 十二月十六日，康熙帝又命颁布军令十七条，对行军作战宿营等纪律作出具体的规定。

第六，用间诱敌。康熙帝的决心是一举歼灭噶尔丹军，但又担心噶尔丹"闻风远遁，及至撤兵，彼又复来"②。为此，康熙帝采用了反间计。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噶尔丹写信给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策动他反叛清朝。转交此信的佐领毕立克图以其事向康熙帝告发，康熙帝秘而不宣，经过观察，沙津并无通敌之嫌，遂决定将计就计。三十四年，噶尔丹率兵3万，从土拉河东犯。八月，康熙帝获悉噶尔丹有顺克鲁伦河东进之信，见时机成熟，遂令沙津派人至噶尔丹处，伪许内应，诱其深入。这一着果然有效，噶尔丹于康熙三十五年二至八月在克鲁伦河河源处，后进抵巴颜乌兰（今蒙古国温都尔汗西）一带，即停顿不前，准备在此过冬。

康熙三十五年春，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康熙帝亲统9万大军，兵分三路，开始了对噶尔丹的第二次讨伐。其部署是：

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盛京、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黑龙江（今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及科尔沁蒙古兵约9000余人，越兴安岭西进，堵截噶尔丹东进之路，是为东路；以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将，由费扬古与振武将军孙思克等率京师八旗兵、山西左卫兵、大同绿营兵和陕甘兵共计4.6万余人，分别出归化、宁夏（今宁夏银川市），越沙漠会师于翁金（今蒙古国额尔德尼达赖西翁金河畔），尔后北上，从西面切断噶尔丹军之归路，是为西路；康熙帝自率京师劲旅约3.4万余人出独石口（今河北沽源南）北上，直指克鲁伦河上游，是为中路。约定中、西两路大军于四月下旬会于土拉，夹击噶尔丹军，以期将其一举歼灭于克鲁伦河一带。

二月十八日，西路费扬古率兵自归化城启行；二十一日，孙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七，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庚辰。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六，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己酉。

思克率兵自宁夏出发。

三十日，康熙帝亲统中路军从京师启行，经怀来（今怀来东南）、赤城，出独石口；内大臣福善率一部兵众由古北口出塞。因兵马众多，康熙帝规定：部队分前后两队，分别牧马于路之左右两侧；安营时注意保护水源，免致污染，并预先派人员寻找水源，凿井开泉，修整道路。

四月初十日，中路清军抵达科图（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北），北距克鲁伦河仅有数日行程。因久未接到费扬古的奏报，不知西路军进至何地，中路军难以确定自己的行动方案。恰在此时，先前奉康熙帝之命以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使者名义派往噶尔丹处诈降的俄齐尔回来报告说："彼（按指噶尔丹）言现今领俄罗斯炮手、鸟枪兵六万，再俟俄罗斯兵六万至，即顺克鲁伦河而下，直抵科尔沁。"① 内大臣索额图、大学士伊桑阿大惊，奏称噶尔丹已经远去，建议康熙帝率中路清军立即回师。康熙帝闻奏极为愤怒，他训谕诸臣说："不知索额图、伊桑阿等视朕为何如人？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亲行仗剑，以建丕基。朕不法祖行事，可乎？指顾间，噶尔丹可擒可灭，既至此地，而效妇人选蠕退缩乎？且大将军费扬古兵与朕军约期夹击，今朕军失约即还，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将何如还至京城？何以昭告天地宗社乎？"他坚拒回师，并警告扈从的各位大臣，如"不奋勇前往，逡巡退后，朕必诛之"！② 四月十三日，康熙帝率中路大军出汛界。此时噶尔丹已沿克鲁伦河顺流而下，与中路清军日渐接近。为防止噶尔丹闻讯后折返遁走，康熙帝传谕费扬古，令其在继续统军前进的同时，留兵一部于色楞格河，以堵截噶尔丹军退路。

四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在西巴尔台接到费扬古四月初七日的奏报，得知西路军由于粮运困难，士马疲困，沿途耽误，约于五月初三日始可到达土拉，比原定日期迟至10日。而此时中路军

① 《御制亲征朔漠纪略》。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乙未。

与噶尔丹军仅距5日程，如继续前进，则可能先行接敌，原定中、西两路大军约期夹击的计划将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令随行诸王、大臣以及清军将领讨论方略。多罗信郡王鄂札等人提出："量西路兵所到之期，缓行以待，两路夹进。"① 裕亲王福全、恭亲王常宁等人的意见与此相近，他们建议："视水草佳处，堪容八旗兵者，暂行屯驻。约计将军费扬古兵之至，然后前进，则噶尔丹之后，已为所截，因而夹击之。"② 另一种意见是应即行进兵。皇三子胤祉等人认为，中路军之兵力足可以与噶尔丹一战，"应一面移文催西路之兵，一面使贼不及为备，前往击之"③。关于清军行动方略的大讨论持续了多日。对以上方案，康熙帝都不满意。他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思考，提出如下方略：当大军进至拖陵以后，先遣使于噶尔丹，拖住噶尔丹，以待费扬古之兵；噶尔丹若闻讯奔逃，则乘其惊扰慌乱之际追杀之④。这个方略，既不是消极地等待，也不是单纯进兵攻击，更不是像索额图提出的"听彼逃窜，似比战为愈"⑤ 那样以把敌人赶跑为目的，而是以积极的行动为战胜噶尔丹创造条件，最终战胜敌人。

五月初一日，康熙帝亲率大军离开察罕布喇克，以日行50～80里的速度疾趋克鲁伦河。噶尔丹根本没有想到康熙帝会亲征漠北，当他见到康熙帝派来的使者时竟还认为，"中华皇帝不在中国安居逸乐，乃能飞越过此无水瀚海乎?"⑥ 因此，最初他毫无战斗准备。及至他在孟纳尔山遥见康熙御营"黄幄龙纛，环以幔城，又外为网城"⑦，知清军阵营强大，乃未战先怯；又闻

---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丁未。

②③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康熙三十五年四月戊申。

④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辛亥、癸丑。

⑤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二，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辛亥。

⑥ 《御制亲征朔漠纪略》。

⑦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第119页。

西路清军已过土拉河，与中路清军形成对进夹击之势，因此连夜率部西逃。

初八日，中路清军进抵克鲁伦河，河北岸虽见噶尔丹军安营之迹，但已空无一帐。原来噶尔丹已于初七日率部西逃。在清军的威慑下，噶尔丹军士气低落，秩序混乱，在逃窜过程中“彼此交怨，沿途自相战斗”①。为了逃脱清军的追击，噶尔丹不仅将帐房、釜、甲胄、兵器、网罟、衣物等尽皆丢弃，且下令杀死或抛弃士卒的妻子儿女和病人。结果，噶尔丹大失人心，士卒不愿再为他卖命，纷纷向清军投诚。

康熙帝最初判断噶尔丹必然依托克鲁伦河进行抵抗，及至见噶尔丹遁走，知噶尔丹怯战，所谓借俄罗斯兵 6 万亦属子虚乌有之事，遂对各队领军大臣说：“噶尔丹若于克鲁伦河拒战，我兵夺河交战，犹稍废（费）力。今观其不于此拒战而竟逃窜，噶尔丹于行兵之道，一无所知，是自开门户以与我也。除此地外，于他处断不能拒我军。审其情形，未必驻扎他处，必连夜逃遁矣。当轻骑急追之。”②

初九日，康熙帝令留步兵于后，以轻骑兵追击噶尔丹。初十日，亲率前锋兵追击。十一日，复令将重炮留于克勒河朔，继续穷追。十三日，至拖诺山（巴颜乌兰东）。3 天军行 200 里，仍没能追及敌军。因军粮不继，康熙帝只得于十三日班师迎粮，而以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为平北大将军，率火器营兵及前锋兵等，前往巴颜乌兰附近地区追剿，同时密谕费扬古率西路军截堵噶尔丹归路，两路夹攻。

噶尔丹逃至拖诺山时，欲据险抗拒清军，但“众奔不能止”③。噶尔丹又想在额里穆布尔哈苏台地方的柳林中摆列驼阵，与清军决战。其后得到西路清军的信息，又欲往土拉河阻击西路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四，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丁卯。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亥。

③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第 119 页。

军。但因清中路军追势甚猛，噶尔丹只好率部继续西逃。

清西路军在抚远将军费扬古率领下，于五月初三日进抵土拉河，将噶尔丹西逃必由之路严密堵截。十三日，西路军到达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附近。时噶尔丹军经5昼夜狂奔之后，亦到达附近地区，与清军相距约30里。十三日晨，清军哨探发现敌情。费扬古鉴于西路军在沙漠地带长途跋涉之后，人马均饥疲不堪，遂采取反客为主、以逸待劳、诱敌深入、设伏截击的方针。昭莫多位于肯特山之南，土拉河之北，汗山之东，其地有小山，山上林木茂密（昭莫多即蒙古语大树林之意），山根有土拉河流过，为一理想的设伏地。费扬古令署前锋统领硕代、副都统阿南达等率前锋诱敌，同时在昭莫多部署重兵：以一部依山列阵于东，一部沿土拉河布防于西，兼备林中伏贼；振武将军孙思克则率步兵居中，扼守山顶，并规定按照康熙帝所授方略，骑兵皆下马步战，待听到号角时再上马冲击敌阵。

硕代、阿南达等率400前锋兵与敌挑战，且战且却，诱敌深入。噶尔丹军除家属子女外，战斗人员约5000人，鸟枪不及2000①。噶尔丹认为西路清军比中路清军战斗力弱，贸然率兵进击，至昭莫多，集中全力进攻清军控制的山头。孙思克率兵据险防守，发子母炮俯击敌军。噶尔丹与其妻阿奴身冒炮矢，率士卒猛攻，“锋甚锐，不可败”②。激战数时，双方杀伤相当，未分胜负。此时费扬古发现噶尔丹阵后有大批人马没有参战，断定必是家属辎重，便及时调整部署，以沿河部署的骑兵一部偷袭其阵后家属辎重队，一部从翼侧横冲敌阵；据守山头的孙思克部也呼喊着从山上往下冲杀。争夺山头的噶尔丹军两面受敌，又因妻女辎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四，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壬申。而费扬古在关于昭莫多战况的奏报中则说：“噶尔丹率贼万许对阵。”见上书卷二五，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

② 殷化行：《西征纪略》，《昭代丛书》戊集续编，第9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重遭清军袭击而军心动摇，士卒在慌乱中夺路北逃。清军乘夜追击 30 余里，至特勒尔济口收军，十四日凌晨回到大营。是战，清军斩杀敌 2000 余人，俘敌百余人，收降千余人，击毙噶尔丹之妻阿奴，噶尔丹仅率数十骑逃走。

昭莫多之战，是清军征讨噶尔丹的关键一战。清军之所以胜利，除兵力占绝对优势和作战指挥正确以外，周密的后勤保障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康熙帝亲自部署，中路军和西路军为沙漠作战组织了庞大的物资运输力量。除了军队用马匹携带数十日口粮外，又组织 7000 余辆运粮车和大量的骆驼运送军粮，并派出得力的官员负责组织指挥，设专门的警卫部队，以保障军粮的输送。由于组织严密，准备较为充分，这支运粮大军克服了种种困难，越过浩瀚的大沙漠，将大批粮食送到了远在二三千里的前线，基本上保证了作战部队的需要。特别是中路军的粮运，不仅保证了本军的需要，且支援了西路大军，对取得消灭噶尔丹军的胜利，保证作战胜利之后中、西两路大军安全撤军，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噶尔丹的覆亡

昭莫多一战，噶尔丹精锐损失殆尽。战后，噶尔丹逃到塔米尔河（今蒙古国鄂尔坤河的支流）地区，所部头目丹济拉、阿喇布坦、丹津俄木布等也相继到达。噶尔丹等收集散亡，得残兵 5000 余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六月，噶尔丹、丹济拉、阿喇布坦、丹津俄木布等在塔米尔地区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当时噶尔丹等处境极为困难，没有粮食，牛羊极少，甚至连帐篷也没有，对如何摆脱困境，会上意见分歧。噶尔丹欲往翁金，掠取清军的存粮后往哈密。丹济拉认为其时力量不足，不能往翁金，而欲往阿尔台。阿喇布坦、丹津俄木布也不愿往翁金。由于“众论与噶尔丹之意不合，故无定议而散”①。阿喇布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八，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壬辰。

坦、丹津俄木布与噶尔丹早就有隙，此时矛盾激化，两人遂率部离噶尔丹而去。

康熙帝认为，“噶尔丹穷凶极恶，不可留于人世，一刻尚存，即为生民之不利，务必剿除，以安厄鲁特蒙古之生”①。尽管噶尔丹已到了穷途末路，但康熙帝对他的戒备一刻也没有放松，不断派出侦探并利用厄鲁特降人收集有关情报，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变化。为了彻底孤立噶尔丹，康熙帝派出使者前往伊犁、青海、西藏等地，联络当地蒙古、藏、回等民族的首领。伊犁地区原是噶尔丹的后方基地，早为策妄阿拉布坦袭占。策妄阿拉布坦忠于清王朝，“诚心肫笃，请安进贡，不绝于道”。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康熙帝谕令策妄阿拉布坦“如生擒噶尔丹，则擒之来；杀之，则以其首来”②。策妄阿拉布坦与土尔扈特部长阿玉奇等人派兵集中于阿尔泰山土鲁图，四面设哨，备御噶尔丹，并表示“如遇噶尔丹，将擒而杀之。如擒噶尔丹，则解送圣上”③。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蒙古族中影响很大。达赖五世已于康熙二十一年圆寂，但总管人员第巴秘不发丧，并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支持、煽惑噶尔丹叛乱。康熙帝派使者赴藏，向第巴指出“其罪甚大”，谕令他“奏明达赖喇嘛已故始末；尊奉班禅库图克图，使主喇嘛之教；副朕之召，遣之使来；执济隆库图克图以畀我；解青海博硕克图济农所娶噶尔丹之女”④。第巴的阴谋被揭露之后，诚惶诚恐地请求康熙帝原宥他的过错。为防止噶尔丹逃至青海或经青海入藏，康熙帝谕令青海蒙古各部首领，“通行属下西路所通地方人等，俱各防守，探听声息，如遇噶尔丹，即行擒解”⑤。康熙帝还派人把被噶尔丹掳去 14 年、昭莫多战后投降清军的回回首领阿卜都里什特护送回哈密故地。另一方面，又令费扬古率兵驻扎边境卡伦；令副都统阿南达率兵在布隆吉尔河（今疏勒

①②④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八，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甲午。

③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三，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

⑤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六，康熙三十五年六月乙酉。

河）至坤都伦河(今东河)、额济纳河(今弱水)一线,“侦探声息,如得噶尔丹实音,即相机堵御,擒而诛之”①；令焚毁原留屯翁金的军粮,以防噶尔丹抢掠。这样,就使噶尔丹的处境更为困难。

噶尔丹塔米尔会盟失败之后，曾在推河一带活动。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噶尔丹命丹济拉率兵往翁金抢掠清军存粮。初六日晨，清军副都统祖良壁率部自翁金回撤，与埋伏于山谷中的噶尔丹军相遇。清军背河而阵，用子母炮、鸟枪击敌。噶尔丹军马匹瘦弱，鸟枪因火药少发射无力，不堪一战，败逃而去。噶尔丹欲劫掠喀尔喀出边游牧者，丹济拉率兵南下，至阿济尔布都纳，“因大兵在喀伦（卡伦）四围处处堵截，是以惧而不进”②。噶尔丹想南走西藏，又为副都统阿南达军所阻；伊犁、哈密等地，因有策妄阿拉布坦和回回首领阿卜都里什特等部阻截，亦不能去。此时，噶尔丹四向已无去路，只能率部在萨克萨特呼里克一带游牧，残兵不过千人，且羸弱不堪，因天气严寒，衣食皆无，只得掘草根为食，致有冻饿而死者。在此情况下，不断有人逃亡。

为了进一步孤立噶尔丹，康熙帝对噶尔丹部实行“招抚为要，使之尽散”的方针，一方面对投诚的厄鲁特人妥善安置，有功者则授以官职；一方面“频遣噶尔丹下人往招之”，并指出只要如此做了，“噶尔丹虽不降，下人必散，自来归降”③。康熙帝还巡行北边，调兵遣将，筹运粮草，部署剿抚噶尔丹事宜，并命将招抚噶尔丹敕书用满文、蒙古文书写送交噶尔丹，另以蒙古文刊印数百张广为散发。因此，噶尔丹属下“人心不定，散乱已极”④，“投顺之人，成群而来”⑤。噶尔丹在“尽丧羽翼”⑥ 的

---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七，康熙三十五年七月甲子。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一，康熙三十五年十月癸卯。

③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丁丑。

④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三，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甲戌。

⑤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三，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戊午。

⑥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第121页。

形势下，派格垒沽英等为使以“议好”为名进行试探。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康熙帝在鄂尔多斯接见了格垒沽英，指出噶尔丹必须率其属下来降，“彼如不来，朕必啮雪往讨，断不中止”①，并以70日为限，过期即进兵。格垒沽英见康熙帝态度强硬，清军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并为清政府的招抚政策所感召，回到噶尔丹的驻地后，力主向清政府投降，但是噶尔丹顽固不化，拒绝投降。

康熙帝鉴于噶尔丹无降意，决定再次对噶尔丹用兵。出兵之前，康熙帝命肃州、宁夏两地各预备兵3000，每兵马5匹，2人1匹骆驼，携80日口粮，并将米1500石预先运至费扬古军驻地喀喇穆冷备用。根据第二次征讨噶尔丹作战的经验教训，康熙帝指出：“今此出兵，亦分为两路，一路兵三千名。此两路兵，不必预定期约，令相机而行。绿旗兵多无用，派兵从少，马则从多，绿旗兵酌给马匹，方可与满兵同行。”② 为了便于组织指挥，康熙帝决定再次率军亲征。御史周士皇认为，“极穷极困之小丑，无烦远御六龙，再临沙漠”，劝阻康熙帝亲征。但康熙帝决心已定，他指出：“贼势穷蹙已极，自应乘此机会，绝彼根株。朕躬亲莅近边地方，筹画调度，庶军务不致稽迟，而邮递亦免疲惫。”③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康熙帝出京师，经宣化、大同，从保德州（今保德）渡黄河入陕西境，沿长城西行，于三月二十六日至宁夏，“每日筹画兵马粮饷之事，略无刻暇”④。当了解到噶尔丹仅剩数百人时，分即谕令清军减兵。闰三月二十四日，八旗、绿营兵各1000人，在副都统阿南达、提督李林隆率领下，自肃州出发，向北进军，寻歼噶尔丹。京师八旗兵、宁夏绿营兵则先后从宁夏城出发，于闰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初一日，

---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三，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庚辰。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五，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乙卯。

③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六，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丁亥。

④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乙酉。

在距宁夏边外50里许的船站，接受了康熙帝的检阅，然后向北挺进，至郭多理与大将军费扬古会合，以堵截噶尔丹。

噶尔丹由于倒行逆施，众叛亲离，已走投无路。为解决粮荒，噶尔丹派其子塞卜腾巴儿珠赴哈密征粮。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塞卜腾巴儿珠被当地回回人擒获，献给清军。噶尔丹的左右亲信，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有的甚至当面指责他："我辈知汝之非，未常出声，今不能忍，忿恨而发。此罪当先加汝身，堕於地狱，后及我辈，才入地狱耳。"噶尔丹无奈，"默无一言"①。噶尔丹的亲信、曾多次出使清政府的格垒沽英劝噶尔丹投降清朝不成，遂携其妻子等60余口逃出，向清政府投诚。阿喇布坦、丹津俄木布也向清政府表示，遵康熙帝谕旨而行，"绝噶尔丹"②。此时沙皇俄国对噶尔丹已不感兴趣，拒绝他投奔俄国。面对这种局面，噶尔丹一筹莫展，以致一连数日"饮食俱废"③，终于在闰三月十三日午前病死④，其属下尽降。不久，两路清军均撤。

至此，清政府彻底平定了噶尔丹。

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战争，前后历时8年。清军之所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从战争指导方面说，一是康熙帝能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第一次作战，清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诱至乌兰布通，予敌以重创。第二次作战，在诱敌南下未成的情况下，康熙帝适时地改取进军漠北，主动出击的方针，三路进兵，取战略大包围的态势，终于取得了昭莫多之战的巨大胜利。第三次作战，根据噶尔丹力量不断减弱和沙漠作战的特点，实行两路出征部队不预定期约，相机而行，减兵增马

---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九，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庚辰。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一，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庚寅。

③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三，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戌。

④ 关于噶尔丹之死，《清圣祖实录》谓"饮药自尽"，后人多采此说。然据成书较早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噶尔丹实为病死。参见吕一燃《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等方针。虽然由于噶尔丹的病死清军未与敌人发生战斗，但这些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二是剿抚兼施，灵活制敌。乌兰布通之战后，康熙帝一方面奖励内蒙古官兵，妥善安置喀尔喀蒙古人民，在喀尔喀蒙古实行与内蒙古一样的盟旗制，从而将内外蒙古团结在中央政府的周围，在以后的平叛作战中，喀尔喀蒙古和内蒙古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支持噶尔丹的西藏第巴等宗教势力以及青海和硕特部、策妄阿拉布坦等厄鲁特蒙古，也都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对噶尔丹则多次遣使进行招抚，分化瓦解其内部，从而使其进退无地，众叛亲离。与此同时，又作好军事打击的准备。在噶尔丹拒绝投降之后，康熙帝毅然决定第三次亲征，指挥大军进剿，终于使噶尔丹军迅速瓦解，取得了征讨噶尔丹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三是周密的后勤保障。三次作战，因为都要长途征讨，且必经大漠，给后勤运输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康熙帝的重视和亲自组织，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基本上保证了作战的需要，为取得消灭噶尔丹叛军的胜利提供了保证。没有如此成功的后勤保障，就不会有征讨噶尔丹战争的胜利。

第三节　对策妄阿拉布坦的征战

一、策妄阿拉布坦势力的强大

策妄阿拉布坦是僧格长子，噶尔丹之侄，巴图尔珲台吉之孙。康熙九年（1670 年），僧格在内讧中被杀，准噶尔的统治权落入噶尔丹手中。策妄阿拉布坦与其弟索诺木阿拉布坦年幼势孤，无力与噶尔丹争雄，不得不依附于他。尽管如此，策妄和索诺木的存在对噶尔丹来说，仍然是他巩固其统治地位的一大障碍。康熙十八年，噶尔丹自称博硕克图汗，并夺取策妄阿拉布坦议聘之未婚妻阿海。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毒杀索诺木阿拉布坦，并欲迫害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异常恐惧，遂率忠于他的僧格旧臣 7 人、部众 5000 人由科布多逃往额琳哈必尔噶，

在乌兰乌苏（今新疆沙湾县东乌拉乌苏）击败追兵，解除了噶尔丹的威胁。随后，策妄阿拉布坦徙牧于博罗塔拉（今新疆博尔塔拉河），利用这里土地平旷、牧草丰茂的良好条件，招集噶尔丹散亡部队，扩充实力，发展生产。康熙二十九年，策妄阿拉布坦利用噶尔丹东侵的机会，派兵袭击噶尔丹的大本营科布多，“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①。次年，又派兵攻取撒克里、乌兰古木（今蒙古国乌兰固木）。额尔齐斯河至乌布萨泊的广大地区，均为策妄阿拉布坦所控制。与此同时，策妄阿拉布坦不断对外用兵，侵掠其周围的部落和地区，先后占领了哈萨克草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疆喀什噶尔城，整个新疆地区和哈萨克草原东南部以及锡尔河中游一带都成为他的势力范围。

策妄阿拉布坦注意发展准噶尔部经济。他扩大牧地，发展畜牧业；把南疆许多维吾尔族人民迁至伊犁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利用外籍俘虏和工匠，发展手工业，建立了皮革、造纸、布匹、呢绒、印刷等手工业作坊，准噶尔部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武器制造业也有很大发展。据史料记载，准噶尔专管铸造器械的鄂拓克有5000多户，专司火炮的包沁有1000多户。准噶尔人制造的火炮，“以铁为腔，中施硝磺铅弹之属。或高二三尺，圆径五六寸，木架上施放；或长四尺余，制如内地鸟枪，手中施放”②。策妄阿拉布坦利用被俘的瑞典军官雷纳特为其制造火炮，组织炮兵。英国人约·弗·巴德利（1854～1940）指出：“洪强吉（按指策妄阿拉布坦）在与中国势力（指当时已巩固确立的满洲势力）作斗争时深感缺乏炮兵，更不用说在与吉尔吉斯人以及断断续续与俄国人打仗时也有同样的需要了，于是他就命令雷纳特为他铸造火炮。”③ 雷纳特为策妄阿拉布坦制造了15门发射4磅重炮弹的炮、5门小型炮和20门发射

①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七，康熙三十五年七月戊午。

② 傅恒：《西域图志》卷四十一，《服物一》。

③ 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334页。

10磅重炮弹的迫击炮；组织了一支炮兵，训练其中的200人使用大炮①。

随着准噶尔部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策妄阿拉布坦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策妄阿拉布坦与噶尔丹决裂之初，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迅即与清政府取得联系，并“请安纳贡，克恭克顺”②。康熙二十九年，策妄阿拉布坦得知噶尔丹入侵喀尔喀，立即向清政府禀告，并积极协助清政府平叛。康熙三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按照康熙帝的敕令，与土尔扈特部长阿玉奇派兵驻守阿尔泰山，防御噶尔丹，他上书清廷，表示噶尔丹“若近逼我土，必竭力擒剿”③。因此，策妄阿拉布坦深得清政府的信任，清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也都予以满足。噶尔丹死后，清政府承认策妄阿拉布坦对准噶尔部的统治，令其在阿尔泰山以西的准噶尔部旧牧地游牧。策妄阿拉布坦羽毛渐丰，特别是噶尔丹的败灭，进一步确立了其在准噶尔部的统治地位，因而野心急剧膨胀，对清政府虽仍“貌恭顺”，但内心深处却“怀不靖志”④。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属下丹济拉等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齐海等共300户往内地降清。策妄阿拉布坦派兵于途中将噶尔丹尸骸和钟齐海等劫走。清政府多次令其交出，但他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在康熙帝的坚持下，策妄阿拉布坦才于次年九月将噶尔丹之尸交出，直至康熙四十年始将噶尔丹之女钟齐海解至京城。对策妄阿拉布坦的这种变化，康熙帝在康熙四十二年曾对议政王大臣这样说过：“以前策妄阿拉布坦上奏中常表示忠诚和景仰之心。可是当噶尔丹被消灭，以及他取得对哈萨克人的胜利并获得一定数量的战俘之后，他逐渐变了。现在他归并了一些土尔扈特人，就越来越目空一切。”⑤

---

① 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339、350页。

②③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一，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壬辰。

④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西藏部要略》。

⑤ 波兹德涅耶夫：《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史》，转引自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337页。

策妄阿拉布坦要求向东扩大牧场，占有从前噶尔丹一度占领过的阿尔泰山以东和哈密附近地区，他还想控制整个蒙古以及西藏、青海。越来越膨胀的野心，使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日趋尖锐，终于驱使他步噶尔丹的后尘，走上了挑起战乱，与清朝中央政府公开对抗的道路。

二、策妄阿拉布坦武装侵扰西藏

（一）西藏局势的动荡

西藏地方早在13世纪40年代即已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一个行政区。

明朝对西藏地方采取“众封多建”的政策，分封了三大法王（宗教领袖）和五大世俗王。明朝末年，教派之争和地方势力之争纠合在一起，纷争不已，战乱不断。由于西藏和蒙古都信奉佛教，所以各派都极力争取蒙古各部。崇祯年间，信奉黄教的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著名首领顾实汗率兵击败青海却图汗，据有青海，随后，又率兵入藏，击败藏巴汗的军队，杀藏巴汗，控制了西藏。顾实汗尊奉达赖五世为宗教领袖，并下令以西藏地方赋税作为供养达赖和黄教宗教活动的费用。在顾实汗的支持下，黄教在西藏取得胜利，成为各教派中势力最大的一派。与此同时，顾实汗以黄教护教法王的身份成为全部藏族地区的大汗，牢牢地控制着西藏地方政权：他直接任命行政官员，封赐世俗贵族，领导地方军队；西藏政务虽然由达赖的第巴索南绕丹掌管，由于第巴要由顾实汗任命，实际权力则掌握在顾实汗手中。

清朝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清入关以前。早在崇德二年（1637年），清太宗皇太极即有迎请达赖喇嘛的意愿。崇德四年，皇太极遣使入藏，致书“掌佛法大喇嘛”，阐述了清政府尊崇佛教的政策，以及“延致高僧，宣扬法教”① 的打

---

① 《清太宗实录》卷四九，崇德四年十月庚寅。

算。崇德七年，达赖的使者到达盛京，受到皇太极等人的盛情接待。此后，清朝与西藏地方的联系更加密切。顺治九年（1652年），达赖五世率领班禅四世和顾实汗的代表，至北京朝见顺治皇帝，受到清廷极隆重的接待。翌年，清廷册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册封顾实汗为“遵行主义敏慧顾实汗”。清廷对达赖五世和顾实汗的册封，是对他们分别作为西藏宗教领袖和地方政权统治者地位的正式承认。

和硕特蒙古贵族顾实汗及其子孙长期控制西藏地方政权，与西藏藏族上层人物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康熙十八年（1679年），达赖五世的亲信桑结嘉措出任第巴。桑结嘉措与准噶尔部部长噶尔丹有同窗之谊，关系密切。为了摆脱和硕特部汗王的统治，他与野心勃勃的噶尔丹互相勾结。康熙二十一年，达赖五世圆寂，桑结嘉措从维护其个人权势地位出发，“秘不发丧，伪言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命行之”①。他独专藏政，并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积极支持噶尔丹叛乱。康熙三十三年，他假达赖五世之名，向康熙帝请求封爵，企图借清政府的支持来与和硕特部汗王抗衡。康熙帝这时对达赖去世一事已有察觉，对桑结嘉措有所怀疑和警惕。为了贯彻在西藏实行“政教分立”的政策，平衡和硕特部汗王与桑结嘉措的关系，康熙帝敕封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把他的权力局限于宗教范围之内。噶尔丹叛乱被平定之后，第巴桑结嘉措的阴谋败露，康熙帝遣使严词诘责，第巴桑结嘉措诚惶诚恐地派代表赴京请求康熙帝原宥其过错。他被迫公布达赖五世的丧事，但又立由他早已择定的仓央嘉措为达赖六世。和硕特部汗王认为这是桑结嘉措玩弄阴谋，扶植傀儡，排挤自己在西藏的势力。而第巴桑结嘉措新立的达赖六世又不是虔诚的佛教徒，拉藏汗视之为假达赖，向清廷上报他“行为不端”。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第202页。

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桑结嘉措图谋杀害拉藏汗不遂，又想用兵予以驱逐。拉藏汗调蒙古兵入拉萨，击败藏兵，杀桑结嘉措。康熙帝对此表示赞赏，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并废达赖六世。拉藏汗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权，他遵照康熙帝的敕令，将仓央嘉措解送北京。仓央嘉措在解送途中死于青海。

拉藏汗废黜了仓央嘉措之后，将一个名叫意希嘉措实为拉藏汗儿子的人立为六世达赖。但是，“青海诸蒙古复不信之，而别奉里塘之噶尔藏嘉穆错（即格桑嘉措）为真达赖”①，迎至青海坐床。清政府为稳定形势，令格桑嘉措暂住西宁塔尔寺主持教务。鉴于“青海众台吉等与拉藏不睦，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独理”，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同拉藏办理事务”②。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又遣使入藏，敕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颁给金册金印，借以安定人心。

但是，西藏的局势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

（二）策妄阿拉布坦潜兵入藏

蒙古各部信奉黄教，对达赖喇嘛视若神明。策妄阿拉布坦为了给他的扩张活动披上神圣的外衣，迫切需要借助于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力量。为此，他密切注视着西藏局势的发展。动荡不安的西藏局势，为其提供了侵扰西藏的极好机会。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拉藏汗遵清政府之令解送仓央嘉措赴京，策妄阿拉布坦派人往迎，企图于途中劫持仓央嘉措。因清政府有备，其阴谋未能得逞。

康熙五十四年春，策妄阿拉布坦派兵 2000 侵扰哈密，先掠哈密北境五寨，三月二十五日进至哈密城下。驻防哈密的绿营兵游击潘至善率兵 200 余人，在哈密回部扎萨克达尔白克额敏所率回部兵的配合下，将准噶尔兵击退。策妄阿拉布坦侵扰哈密，表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第 204 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六，康熙四十八年一月己亥。

面上是他对哈密阻截准噶尔商队进入内地贸易一事进行报复，实际上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借以了解清政府的反应；同时又是一次战略佯动，以转移清政府的注意力，牵制清朝的军事力量。策妄阿拉布坦扩张的真正目标是西藏。

对西藏的侵扰，策妄阿拉布坦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他一方面暗中与反对拉藏汗的贵族、喇嘛取得联系，煽动他们与拉藏汗为敌；另一方面则通过与拉藏汗联姻，使拉藏汗认敌为友，恃亲疏防。康熙五十五年冬，策妄阿拉布坦以护送拉藏汗之子噶尔丹丹衷回西藏为名，派其表弟大策凌敦多布率兵6000人向西藏进军。与此同时，另派一支300人的部队越新疆东部前往青海西宁塔尔寺，企图劫持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事前约定，两支部队在那曲会合。策妄阿拉布坦认为："一旦他们掌握了那个灵童，整个西藏就会欢喜若狂地迎接他们，征服西藏就会成为一场不流血的战争。"① 这支东进的小部队在途中被清军击溃，没有到达目的地，而大策凌敦多布则率领大军继续向西藏挺进。

策妄阿拉布坦采取声东击西的手法，成功地隐蔽了进袭西藏的战略企图。当他传令"治办器械，预备行粮，不许属下人私骑骟马"，暗中进行侵藏准备时，就放风说是准备"向哈萨克地方出兵"②；大策凌敦多布率兵向西藏进军的时候，则打着"往阿里克处助拉藏汗征卜鲁克巴（今不丹）"③ 的旗号。准噶尔军行动十分诡密，"徒步绕戈壁，逾和阗（今新疆和田）南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④，进入西藏阿里地区。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初四日，突至纳克禅（今那曲），抢掠了当地波木宝一部人众，然后经腾格里海（今纳木错）进至达木（今当雄）地区。

大策凌敦多布之兵"自远路冲雪前来，士卒冻馁，马驼倒

---

① 德西德利：《西藏纪事》，1937年伦敦增订版，第154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五，康熙五十四年九月辛酉。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三，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壬申。

④ 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第205页。

毙，沿途食人犬，俱徒步而行”，“疲敝已极”①，战斗力大受影响。而拉藏汗在自己的辖区内作战，以逸待劳，本掌握一定的优势。但是，拉藏汗事前对策妄阿拉布坦丧失警惕，毫无戒备，甚至在接到属下送来的敌情报告之后，仍不予重视，不做应变准备，及至敌军逼近时才临时调遣部队，仓促应战。加之他优柔寡断，指挥失误，丧失歼敌良机，使自己陷入被动。尽管颇罗鼐等藏族将领率部英勇作战，曾一度遏制住准噶尔军进攻的势头，双方军队在达木地区多次交战，未分胜负，形成相持的态势，但总的形势却越来越不利于拉藏汗。十月上旬，拉藏汗不得不退守拉萨。大策凌敦多布四面包围拉萨城，一面准备攻城，一面暗中与城中联络，进行策反活动。由于和硕特蒙古与当地藏民素有矛盾，不能团结对敌，更有甚者，一些和硕特蒙古贵族与大策凌敦多布暗通，因此拉藏汗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十月二十八日（11月30日）午夜，大策凌敦多布下令攻城。噶隆沙克都尔扎布叛降，将小招献给准噶尔军。驻防布达拉北门的台吉那木扎布等开门迎降，准噶尔兵涌入城内，拉藏汗的军队逃散。二十九日，拉藏汗在突围中落马被害，其次子苏尔扎被俘，大策凌敦多布占领拉萨。

准噶尔军的入侵，给西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大策凌敦多布下令抢劫三日，男女老幼被污辱和毒打，财物被抢劫一空，达赖五世的寝室、灵塔和许多寺院遭到破坏。拉藏汗旧臣或被囚禁关押，或被拷打致死。当时居住在拉萨附近的一位西方传教士说：准噶尔军队“在1718年整整一年中，唯一的行动就是对西藏人民实行闻所未闻的残酷迫害”②。

大策凌敦多布推翻了拉藏汗的西藏地方政权之后，重新组织了一个以达孜巴为首的听命于准噶尔的政权，并不断发兵攻掠前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四，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乙巳。

② 多米尼克神父1719年寄自Thuee的信，转引自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罗马1762年版，第55页。

藏各地，企图用暴力胁迫西藏各地“都效忠于他”①。

三、清军入藏平乱

（见附图13）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策妄阿拉布坦发兵攻打哈密事件，使清政府认识到，“策妄阿喇布坦乃巨猾奸诡之人，甚属无耻”②，“今乃渐渐狂悖，居心险诈”，“干犯王章，于国法难以宽贷，自当用兵扑灭”③。从这时起，清政府“备兵边地”④，在喀尔喀、哈密、青海等地集结数万大军，一是防备准噶尔来犯，二是打算在做好各种准备之后，长途奔袭策妄阿拉布坦所据之地，而对策妄阿拉布坦用兵西藏，则缺乏应有的注意。策妄阿拉布坦巧妙地利用了哈密事件的效果，派出一支6000人的大军，选择一条崎岖险绝、人迹罕至的道路，秘密地向西藏进军。康熙五十六年七月，清政府第一次听到大策凌敦多布率军行动的消息，但当时对策妄阿拉布坦的真实意图，并不清楚。八月初，康熙帝仍认为，准噶尔“或征取拉藏，收取西边地方，或帮助拉藏，侵犯青海，俱未可定”⑤。有鉴于此，清政府重点是加强青海的防卫。其后，大策凌敦多布率军侵藏的事实逐渐明晰，康熙帝遂决定出兵西藏，以平定策妄阿拉布坦的势力。

康熙五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熙帝令已在青海形胜之地防守的侍卫阿齐图，署西安将军、湖广总督额伦特，“加谨设防，作速预备，远探贼情，相机进剿”⑥。二月十一日，令西宁、松

---

① 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第53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七，康熙五十五年三月辛丑。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三，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乙未。
④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七，康熙五十五年三月戊午。
⑤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三，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壬午。
⑥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乙亥。

潘、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噶斯等处兵马与土司杨如松属下兵丁入藏救援，并令侍卫色楞率兵与青海和硕特蒙古兵一起入藏。额伦特根据康熙帝的旨意，准备“遣人将准噶尔之兵诱来，俟所遣之人回信，然后进兵”①。但色楞认为，“准噶尔残害西藏，彼处人民悬望我师，如望云霓”②，进军西藏刻不容缓，因此，他拒绝了额伦特的意见，率领八旗、绿营兵和土司兵共2400人，先行向西藏进军。六月十八日，额伦特由木鲁乌苏(即通天河，金沙江上游)启程，进抵图尔哈图，制造皮船，渡河至七叉河，闻知色楞已自拜图一路进兵，因二地之间无路可通，遂于二十四日率兵向库库塞前进。七月，额伦特从门赞西里克（今聂荣县境）进至齐诺郭尔，败当面之准噶尔兵，随即率所部渡喀喇乌苏（今怒江上游），向狼腊岭前进。色楞也在此时率部到达喀喇乌苏，因“未知额伦特由何路进兵”，派人“侦探额伦特信息”，在得到探报之后，遂决定在喀喇乌苏等候额伦特到来，“合兵一处，前进达穆（即达木）地方”③。闰八月，两军于喀喇乌苏北岸会合。

大策凌敦多布置精兵防守喀喇乌苏河口，阻挡清军渡河，又分兵潜出清军之后，“截饷道”。清军与准噶尔军在喀喇乌苏地区“相持月余”，最后“粮尽矢竭”④。九月，清军“全军饿毙”⑤，额伦特阵亡。

清军第一次入藏，就这样彻底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准备不足，仓促入藏；色楞与额伦特意见不和，缺乏配合；对敌情了解不足，轻敌冒进，等等。清军喀喇乌苏败没后，朝中文武视入藏为畏途，认为“藏地辽远，途险且恶，不能遽至，宜固守边圉”⑥。康熙

---

①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九，康熙五十七年六月甲午。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一，康熙五十七年闰八月丙午。

④ 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第205页。

⑤ 《西藏志》，《事迹》，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⑥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二十七章，《准噶尔之役》，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4页。

帝独持异议，他认为："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且贼能冲雪縋险而至，何况我军?"① 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宁，他再次派兵入藏平定准噶尔之乱。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康熙帝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师西宁，调饷征兵，居中调度入藏的各路清军；授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在四川筹饷备兵，协助胤禵办理军务。五十八年二月，康熙帝派护军统领噶尔弼由甘肃赴四川，协同年羹尧办理军务；令都统法喇率兵驻四川打箭炉。法喇派副将岳钟琪率兵一部，先后招抚里塘（今四川理塘）、巴塘、乍丫（今西藏察雅县境）、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察哇等处民众，为大兵入藏疏通了道路。

康熙五十九年春，在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之后，康熙帝命抚远大将军胤禵移驻木鲁乌苏，管理进藏军务粮饷；授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军出青海；授都统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率军出打箭炉，两路夹攻西藏。为防止策妄阿拉布坦向西藏派出援兵，又命振武将军傅尔丹、靖逆将军富宁安分别自阿尔泰、巴里坤出兵，袭击策妄阿拉布坦所据之地，以牵制其兵力。与此同时，又册封格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宣布派兵送往西藏坐床。由于这一决定顺应了当时广大蒙藏僧俗民众的意愿，所以进军西藏的军事行动受到了西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当年四月，延信从西宁出发，噶尔弼从四川成都启程，分头向西藏进军。噶尔弼部清军在打箭炉、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等地集结之后，分两路向西挺进：一路由类伍齐（今类乌齐北）经结东（今结登）、结科噶、三大奔工等地为正兵；一路由洛龙宗（今洛隆）经朔般多（今硕般多）、达喇宗、沙弓喇、弩工拉等地为奇兵，约期会取拉里（今嘉黎）、墨竹工卡。八月初，噶尔弼率部进抵拉里，即派人与延信约会向拉萨进军事宜。时大策凌敦多布自率主力在拉萨以北的达木地区堵截延信军，而以吹

① 魏源：《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第205～206页。

木丕勒宰桑率 2600 人从章名尔自荣往墨竹工卡抵御噶尔弼军。噶尔弼得知此讯后，决定不待延信部信息，立即向拉萨以东百余里的墨竹工卡进军。由于噶尔弼进军迅速，敌吹木丕勒宰桑部尚未到达，而原驻墨竹工卡的藏族士兵又闻风溃散，清军顺利地抢占了墨竹工卡。八月二十二日，噶尔弼军乘皮船渡过噶尔招木伦河（即拉萨河），向拉萨挺进，于次日晨一举夺占拉萨。随后，噶尔弼招集西藏大小第巴、各寺庙喇嘛等，“宣示圣主拯救西藏民人至意”①；封闭了达赖喇嘛仓库；在拉萨附近要地驻兵固守，截断通向准噶尔军的运粮通道，禁止人员往来；派人潜往大策凌敦多布处，向藏族士兵散发盖有第巴达克札印章的藏文信件，“令其各散”②；逮捕了 101 名帮助大策凌敦多布毁坏法教、残害藏民的准噶尔喇嘛，将为首的 5 名斩首。这样，就狠狠地打击了准噶尔在西藏的割据势力，使清军牢固地控制了拉萨。

平逆将军延信率领 1.2 万名官兵，护送达赖喇嘛由青海入藏。青海蒙古各部“汗、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千或数百，随大军扈从达赖喇嘛入藏，军容甚盛”。八月中旬，进至卜克河，击败前来偷袭的大策凌敦多布部。八月下旬，又在齐诺郭尔、绰马喇两次击败堵截的准噶尔军。此时噶尔弼已占领拉萨，大策凌敦多布进退无据，率残部自克勒底雅（今新疆于田县境）逃回伊犁。跟随他侵藏的 6000 名准噶尔士兵，得以生还的仅仅 500 人。延信“将大军留驻于达木地方，率轻骑减从护送达赖喇嘛，于九月初八日起程入藏”③。九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坐床。拉藏汗所立的意希嘉措按清政府的命令被解送北京。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九，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庚戌。

② 《定西将军噶尔弼平定西藏疏》，《卫藏通志》卷十三上，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0 页。

③ 《抚远大将军胤祯奏报延信护送达赖入藏安床折》，《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93 页。

大策凌敦多布被逐出西藏，标志着策妄阿拉布坦控制西藏进而与清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阴谋的彻底破产。清政府平定了策妄阿拉布坦挑起的动乱以后，在西藏驻兵，设立台站，加强对西藏的管理，从而稳定了西藏地方的局势，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第四节　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

一、罗卜藏丹津反清叛乱

策妄阿拉布坦侵扰西藏失败不久，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了反清叛乱。

明朝末年，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控制了西藏、青海，他以其长子驻守西藏，其余诸子驻牧青海。清朝定鼎北京之后，顾实汗与清朝政府一直保持着朝贡关系。顾实汗死后，其留居青海的诸子相互攻夺，“频犯内地”①，在吴三桂叛乱期间乘机攻击清军，支持准噶尔部噶尔丹，成为清王朝完成统一大业的障碍。平定噶尔丹战乱之后，清王朝加快了统一边疆的进程。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康熙帝派额驸阿拉卜坦赴青海招抚，与和硕特蒙古诸台吉以及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汗在察罕托罗海会盟。顾实汗幼子达什巴图尔等和硕特蒙古首领表示愿归顺清朝，并率诸台吉于当年十一月到达北京，朝见康熙帝。次年正月，康熙帝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其余诸台吉分别授予贝勒、贝子、公等爵，从此青海和硕特蒙古正式隶属于清王朝。

罗卜藏丹津是顾实汗之孙，达什巴图尔之子，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承袭其父达什巴图尔和硕亲王爵。罗卜藏丹津虽

---

①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然是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中唯一的亲王，爵高位崇，但他不满足于仅仅管领青海一地，还想充当藏王，统治西藏。为实现其割据称雄的野心，他甚至暗中与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勾结。康熙五十九年，罗卜藏丹津奉命与其他和硕特蒙古首领率部随清军护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由青海入藏。罗卜藏丹津以为，他是顾实汗嫡孙，是青海和硕特蒙古中唯一的亲王，而藏王拉藏汗已在准噶尔之乱中被杀，凭他进藏之功，新藏王非他莫属。然而由于清政府对西藏和青海施政的改革，他的野心没能得逞。

清政府接受策妄阿拉布坦侵扰西藏的教训，决心改变在西藏通过蒙古汗王实行间接统治的政策，由清中央政府任命的四噶伦直接掌管西藏地方政权，从而结束了和硕特部对西藏的统治。在青海，为了分化、削弱罗卜藏丹津的势力，防其尾大不掉，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晋封顾实汗曾孙郡王察罕丹津为和硕亲王，贝勒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为多罗郡王，从而改变了以往罗卜藏丹津一个亲王独尊的局面。这些措施，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青海的管理，却引发了以罗卜藏丹津为代表的和硕特蒙古贵族中割据势力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对。

罗卜藏丹津早就有“驻占招地，遥管青海”[①]，割据称雄的野心，但清政府派兵入藏平定了准噶尔之乱后，青藏等地的形势比较稳定，罗卜藏丹津暂时不敢轻举妄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镇守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回京奔丧，罗卜藏丹津认为有机可乘，“遣人到侧亡（策妄阿拉布坦）家，约伊发兵，同扰内地”[②]。策妄阿拉布坦不敢贸然出兵助乱，却怂恿、支持罗卜藏丹津叛清。于是，罗卜藏丹津急不可奈地发动了叛乱。

雍正元年五月，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蒙古王公台吉于巴尔托

---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雍正元年八月庚午。

② 年羹尧：《附奏探访西宁策妄滋事片》，《年羹尧奏折》（上），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年版，第51～52页。

罗海会盟，勒令各部首领称他为“达赖混台吉，其余台吉俱令呼旧日名号，一概不许称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1]，正式宣布反叛清朝。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鼐揭露了罗卜藏丹津遣使准噶尔，勾结策妄阿拉布坦进行叛乱的阴谋活动，拒绝参加会盟。罗卜藏丹津恼羞成怒，率部向二人发动进攻，他首先“率兵四千，抢夺王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奈（鼐）等”[2]。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鼐率兵应战，交战数次，“属下人多阵亡，其余亦行逃散”[3]，只得率妻子余众逃奔甘州（今甘肃张掖）。随后，额尔得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之侄噶尔丹达锡、子阿拉布济索诺木达什等，也先后投归。罗卜藏丹津又向亲王察罕丹津进攻，察罕丹津被迫“领兵与罗卜藏丹津相持”，但“势难抵敌”，只得率妻子及属人140余名，“来到河洲（即河州，今甘肃临夏）老鸦关外”[4]，向清政府求援。

这时清廷的战略重点是准噶尔，且雍正帝即位不久，首要的任务是稳定内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而对青海问题采取了调解的方针。七月二十二日，兵部侍郎常寿奉雍正帝之命抵达罗卜藏丹津驻牧之地沙拉图（今青海海南大河坝），谕以利害，令其罢兵。罗卜藏丹津不但不听常寿劝告，而且将常寿拘禁，公然与清政府对抗。他勾结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汗，在寺院喇嘛和藏民中进行煽惑，参加叛乱的多达20万人，“西宁数百里之内，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掳焚烧，无所不至”[5]。叛军围攻府城，在西宁城外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和北川新城堡等处，“每处有贼二三千人，

---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雍正元年八月庚午。

② 《清世宗实录》卷九，雍正元年七月己卯。

③ 《清世宗实录》卷八，雍正元年六月壬戌。

④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雍正元年八月甲戌。

⑤ 年羹尧：《附奏西宁寺院喇嘛不法片》，《年羹尧奏折》（上），第46页。

以势力驱逐附近番子，攻城放火，烧毁民间积聚草谷，抢掠财物。其未受蹂躏者，西宁城外十余里耳”①。叛乱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二、年羹尧、岳钟琪率清军平叛

雍正帝鉴于罗卜藏丹津不听劝告，举兵反叛，决定调集西宁、松潘、甘州等处清军，平定叛乱。雍正元年十月初，命由甘州进驻西宁的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负责组织指挥平叛事宜。

年羹尧刚到西宁时，清军尚未齐集，叛军“悉破傍城诸堡，移兵向城”②。年羹尧一面指挥当地清军在西宁外围与叛军作战，一面加紧进行平叛部署：奏请授前锋统领素丹、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参赞大臣；征调川陕汉、土官兵；令云南提督郝玉麟、察木多总兵周瑛、副都统黑色、副将张成龙等率兵驻扎察木多（今西藏昌都）、黄胜关、巴塘、里塘等处，以截断叛军入藏之路；令靖逆将军富宁安派兵驻防吐鲁番、噶斯等地，以防叛军与准噶尔勾结；增加甘州、永昌、布隆吉尔（今甘肃安西布隆吉乡）等地的防守兵力，以防叛军内犯。

提督岳钟琪率四川绿营兵和杂谷土司部土兵6000人由松潘北进，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达西宁。此时西宁外围南川申中、西川镇海、北川新城等堡已被清军收复，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汗等也被迫投降，从各地征调的清军已陆续到达。年羹尧、岳钟琪指挥清军迅速平定了郭隆寺等寺院喇嘛叛乱。由于叛乱行动既违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也违背广大和硕特蒙古、藏族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很不得人心，罗卜藏丹津为防止其

---

① 年羹尧：《附奏查访西宁近日民情片》，《年羹尧奏折》（上），第49页。

② 《清史稿》卷二五九，《年羹尧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部属逃跑，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凡三人放一头目，昼夜稽查”①，但叛军官兵仍不断有人逃出向清军投降。罗卜藏丹津见大势已去，不得不率叛军西逃。

年羹尧欲令岳钟琪率军1.7万人于四月青草萌生时从西宁出口，进军青海。岳钟琪对这个进军方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青海之众不下十万，以兵万七千当之，不及十分之一。且口外地势衍旷，无住牧定所，贼人并集一处，何难与决死战，若散而诱我，反四面受敌，非策也。”他提议，为了“攻其无备”，应“选精兵五千，马倍之，二月初旬即发”②。雍正帝批准了这一方案，命其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日，岳钟琪率清军出日月山，分三路向青海进剿。至乌兰博尔克，叛军已经逃走，岳钟琪挥军追击，在伊克哈尔吉，将逃入山中的叛军头目阿尔布坦温布、巴尔珠尔阿喇布坦等擒获。罗卜藏丹津望风而逃，岳钟琪分兵1000往北路柴达木截击，防其逃往噶斯之路，自己亲率大军急追，“一昼夜驰三百里”③。二十日，探知罗卜藏丹津已逃往乌兰穆和儿，距离清军约一百五六十里。岳钟琪令清军稍事休整，薄暮时继续前进。二十一日黎明时至乌兰穆和儿，罗卜藏丹津已逃往柴达木。清军继续追击，俘获“罗卜藏丹津之母阿尔太喀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济农、藏巴吉查等”④。二十二日，追至柴达木时，罗卜藏丹津已“衣番妇衣，携其妻妾”等200余人潜逃。岳钟琪分兵一部，追至乌兰白克，俘获吹拉克诺木齐、札什敦多卜等，岳钟琪

---

① 年羹尧：《附奏亏空粮饷人员解往片》，《年羹尧奏折》（上），第43页。

② 《岳襄勤公行略》，《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6页。

③ 《清史稿》卷二九六，《岳钟琪传》。

④ 《清世宗实录》卷十七，雍正二年三月癸未。《岳襄公行略》所记稍有不同：“生擒藏巴札布等六台吉，并获罗卜藏丹津母阿尔太哈与其妹阿宝”。

自率大军，以日行300余里的速度，穷追数日，至青、藏交界处的桑驼海，因罗卜藏丹津已逃往准噶尔投靠策妄阿拉布坦，遂班师西宁，平叛战争胜利结束。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战争，从雍正元年十月清军出塞算起，只有短短四五个月时间，如果从岳钟琪率军于二月初八日出日月山到二十二日罗卜藏丹津逃离柴达木，则“仅旬有五日，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①。究其原因，除了平叛战争是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得到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外，还在于战争指导的正确。第一，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初，雍正帝先“遣人劝阻，令其和好”②，同时指示川陕总督年羹尧，“军务宜预先筹度”③，做好武装平叛的准备。这样，当罗卜藏丹津拒绝清政府调解，坚持叛乱时，清军出兵平叛，既争取了人心，又不失战机。第二，大将军年羹尧正确筹划，多方准备，切断了罗卜藏丹津与西藏和硕特蒙古、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的联系，把叛乱限制在青海一地；第三，岳钟琪知己知彼，指挥有方，在认真分析双方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做到了进兵神速，出敌不意，故能以少胜多。

平叛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根据年羹尧条奏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在青海地区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有：一、仿照外藩蒙古的札萨克制，将青海和硕特等5部蒙古，编为29旗，旗设札萨克，旗下设佐领。各旗首领每年会盟一次，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各旗王公台吉分班赴京朝贡。二、对青海境内的藏人，相度所居之地，添设卫所，在藏人中设立土司，分别授以千百户等头衔，归附近原设道、厅及新添设的卫所官员管辖，以改变藏人“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

---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十二，雍正元年八月戊申。

② 《清世宗实录》卷九，雍正元年七月己卯。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十二，雍正元年九月己丑。

官员"① 的状况。三、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设西宁县、碾伯县（碾伯所改）、大通卫。筑大通、白塔、永安三城，分设总兵、参将、游击，屯兵驻守。设"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总理青海政务。四、整顿喇嘛教寺院，规定寺院房舍不得超过200间，喇嘛最多不得超过300人，每年派官员稽查两次。通过上述措施，稳定了青海地区的形势，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区的统治，孤立了准噶尔部，为最终解决准噶尔问题创造了条件。

第五节　对噶尔丹策零的征战

一、噶尔丹策零与清政府的决裂

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成为准噶尔部领袖。噶尔丹策零"少年聪黠，善驭士卒，诸台吉乐为之用"②。噶尔丹策零与其父策妄阿拉布坦一样，奖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手工业生产，不但能够开矿炼铜炼铁，而且能够自己制造枪支、火药、子弹和大炮。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准噶尔的实力进一步增强。1734年，俄国奥伦堡探险队长基里罗夫在给沙俄政府的报告中说：准噶尔统治者噶尔丹策零是"所有土著民族中最强者"，他拥有持火炮的军队8万人，"对属下拥有无上的权力"③。

噶尔丹策零上台以后，一方面继承其父策妄阿拉布坦时期的政策，与清朝政府继续保持隶属关系，另一方面又"步其先辈的后尘，仍然没有放弃归并喀尔喀的想法"，他屡次出兵骚扰喀尔

① 《清世宗实录》卷二〇，雍正二年五月戊辰。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记辛亥败兵事》，第60页。

③ 佐口透：《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东京1966年版，第124～125页。

喀，并“曾不止一次地向俄国皇帝建议共同出兵进攻中国”①。这样，必然与清政府产生尖锐的矛盾，走上武装对抗的道路。

雍正帝即位之初，主要是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准噶尔部无暇顾及。雍正五年，他认为条件渐趋成熟，即开始筹划对准噶尔部用兵之事。时值西藏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等与康济鼐、颇罗鼐结仇为叛，于六月十八日将康济鼐杀害，颇罗鼐率兵对抗。雍正帝认为机会难得，决心解放西藏问题。雍正五年十二月，噶尔丹策零派出的贡使特磊到达北京。噶尔丹策零向清廷报告其父策妄阿拉布坦“病故”，呈请允其派人至西藏“熬茶”（礼佛），为其父“设供”。当时西藏形势尚不明朗，雍正帝恐噶尔丹策零袭其父“故辙”，乘西藏局势混乱之机进扰西藏，故拒其所请，并令其送还因叛乱失败逃往准噶尔的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零迟迟不予答复，也未送还罗卜藏丹津。雍正七年二月，雍正帝决心发兵征讨准噶尔。他在上谕中指出：噶尔丹策零“抗玩不恭”，将来“断非安分守法之人，必至生事妄为”；况且原来部署在西北地区的“两三路大兵尽已撤回，此际伊等如或生事，则我朝如许安享太平之喀尔喀等，及办理安插妥帖之青海、西藏，必至被其扰害，甚属可虑”。如不将噶尔丹策零剪除，“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他命文武大臣“各抒己见，公同详确密议具奏。”② 大学士朱轼、都御史沈近思“皆以为天时未至”。散秩大臣达福也认为：“噶逆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扞御。主少则易谏，臣强则制专。我以千里转饷之劳，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③ 大学士张廷玉则极力支持对准噶尔用兵。其实雍正帝决心早下，让大臣们讨论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雍正七年三月，雍正帝命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振武将军巴赛为副将军，率军2.4

---

①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370、368页。

② 《清世宗实录》卷七八，雍正七年二月癸巳。

③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记辛亥败兵事》，第60页。

万人，屯阿尔泰，出师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军2.65万人，驻巴里坤，出师西路。准备次年分进合击，直捣准噶尔腹地伊犁。

噶尔丹策零闻讯十分惊恐。这时，叛逃到准噶尔的罗卜藏丹津与其部属谋杀噶尔丹策零，事泄被执，噶尔丹策零遂利用这一事件施缓兵之计，派遣特磊赴京，声称已将罗卜藏丹津解送清廷，行至中途，因听说清廷发兵，复回伊犁，"若天朝俯念愚昧，赦其已往，即将罗卜藏丹津解送"①。雍正帝认为事情出现了转机，噶尔丹策零可能会"一一听命"，故于雍正八年五月决定"进兵之期暂缓一年"②。他一面遣侍郎杭奕禄等往谕噶尔丹策零"请封号，所有属下悉编旗分佐领"③，一面召大将军傅尔丹、岳钟琪和参赞大臣陈泰、苏图回京议事，由提督纪成斌、副将军巴赛分管西、北两路军事。雍正帝误信噶尔丹策零假意请和的诡计，丧失警惕，轻率地将两路大军主帅从数千里之遥的前线召回北京，委军事重任于其属下将领，这就给噶尔丹策零以可乘之机。

雍正八年冬，噶尔丹策零乘清西路军守备松懈之机，发兵2万，突袭哈密与巴里坤之间的科舍图卡伦，劫掠清军的驼马牲畜。清西路军总兵樊廷、副将冶大雄等率兵2000人，转战7昼夜，救出两处卡伦的清军官兵，并与总兵张元佐等合力将准噶尔军击退。驻扎在鄂龙吉的准噶尔军至次年正月中旬始渐次退去。

科舍图事件表明，噶尔丹策零不愿再受与清政府原有隶属关系的约束，准备与清政府公开决裂。

---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二十，雍正八年五月丁丑。

② 《清世宗实录》卷九四，雍正八年五月丁丑。

③ 阿克敦：《德荫堂集》卷十三，《初次使准噶尔奏》，清嘉庆丙子年刊本。

二、和通泊之战

准噶尔部偷袭科舍图卡伦之后，雍正帝令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速返科布多军营，防止准噶尔军偷袭北路清军；在青海紧要适中之地驻扎万余重兵，以防噶尔丹策零由噶斯一路遣兵扰乱青海。同时，调整了对准噶尔部用兵方略。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雍正帝在向大学士等发布的上谕中说："从前所议直捣伊里（即伊犁）之计，尚非万全之道。朕意欲于西路巴尔库尔、北路之卡伦外，各筑一城，以重兵驻扎，时出游兵以掩击其众，擒掳其人畜，贼兵必撤其游牧之所，远行藏退。我当更进数百里，择地筑城，开垦屯种，以资军食。驼马牛羊无事牧放，有事则尽收入城。贼众既无所获，我军一出，可以袭取其辎重，且贼必不敢逾我军驻扎之城而东矣。"① 遵照雍正帝的旨意，西路军在巴尔库尔筑城防守，北路军在科布多筑城防守，清军遂由进攻改为专守。

噶尔丹策零因清西路军防备严密，而且大将军岳钟琪非请得诏命不会进袭其后方，故决定令大、小策凌敦多布率领3万大军，袭击北路清军。为迷惑清军，牵制清西路兵力，噶尔丹策零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于雍正九年三四月间，派兵一部，数次侵扰吐鲁番，围攻鲁谷庆城40余日；又派间谍至傅尔丹军中伪降，诡称准噶尔部"与哈萨克迭战经年，马驼羸弱，可袭灭其部落"②。五月初六日，傅尔丹至科布多，从准噶尔俘虏供词中得知：噶尔丹策零派兵3万，令大策凌敦多布和小策凌敦多布等人率领，来犯北路，但因噶尔丹策零正与其妹夫罗卜藏策凌交兵，又要防备哈萨克乘虚偷袭，所以大策凌敦多布迟延未来，只有小策凌敦多布率兵一部进至察罕哈达。傅尔丹有勇无谋，不辨真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一，雍正八年十二月壬戌。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记辛亥败兵事》，第61页。

伪，竟认为："贼人尚未全至，乘其不备，正宜速迎掩杀。"① 副都统定寿、海兰等人认为，以羸师待敌，是外夷之故智，俘虏之言，不可轻信。但是，刚愎自用的傅尔丹不听别人的劝告，贸然率兵万人于六月初九日离科布多进袭准噶尔军。

大小策凌敦多布将主力2万余人埋伏于和通泊（今蒙古国科布多以西约200公里）附近的谷地中，不断派出间谍向清军提供假情报，诱清军深入。

傅尔丹率清军进到扎克赛河，从俘虏口中得知小策凌敦多布在距此地仅有3日程的察罕哈达，兵不过千人，尚未立营防守，而大策凌敦多布因途中有病，留驻和博克山。傅尔丹对敌人的阴谋毫无察觉，下令"乘夜进兵，袭击察罕哈达贼夷"②。师行数日，却不见敌军。六月十七日，又从俘获的敌军哨探口中听说准噶尔军驻博克托岭，有驼马万匹，兵仅2000人。傅尔丹即令参赞苏图、副都统戴豪等率兵3000人"往剿"，前锋统领丁寿率1500人在后应援。十八日，在库里野图岭与敌一支小部队相遇，交战不久，敌即佯败，驱赶驼马且战且退。傅尔丹不识敌人之计，见准噶尔军败退，即合兵一处，奋力追击。二十日，清军进入敌军伏击圈，准噶尔军"二万余人，从高埠冲突大营"③。傅尔丹"惧，移师东，陷和通淖尔"④。在转移途中，清军前锋陷入敌军重重包围之中。二十三日，准噶尔军歼灭清军前锋后，即转旗东向，直攻傅尔丹大营。傅尔丹命蒙古兵抵御，科尔沁部蒙古兵偃旗败逃，牵动全军，引起一片混乱，官、兵纷纷溃退，只有满洲八旗兵4000人护卫傅尔丹大营和辎重，且战且退。二十八日，渡过哈尔哈纳河。七月初一日，逃回科布多。

和通泊一战，清军损失惨重，副将军巴赛、查弼纳等十数名

---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七，雍正九年六月丙午。

②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七，雍正九年六月丁未。

③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八，雍正九年七月甲申。

④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记辛亥败兵事》，第62页。

将领阵亡或自尽，副都统塔尔岱身负重伤；万余清军，得还科布多者仅 2000 人，其余的不是战死就是被俘①。

和通泊之战清军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雍正帝决策失误，调度无方，用人不当，赏罚不明。他错误地认为，噶尔丹策零新立，“彼境分崩之势”②，有可乘之机，故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独断专行，决意对准噶尔用兵。由于对敌人缺乏应有的警惕，雍正帝用兵之初，即中了噶尔丹策零假意请和的缓兵之计，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轻率地将西、北两路清军的主帅从前线召回北京，给噶尔丹策零以可乘之隙，致使清军科舍图受挫，影响了士气。雍正帝缺乏最高统帅应有的军事素养和才能，在将帅的任用和部队的指挥调动等方面，随意性太大。对西路军主帅岳钟琪，始则倚为心腹，科舍图之战后，对他的指挥部署等横加指责，并派人进行监视，使其无法措手足。对北路军主帅傅尔丹则处处袒护，甚至在和通泊惨败之后，不但不治其罪，反而赐给他御带。其次，此战清军主帅傅尔丹指挥失误。傅尔丹虽然“颀然岳立，面微赪，美须髯，有名将风”，却是个勇而寡谋的庸才。据记载，岳钟琪至傅尔丹营帐，见壁上刀槊森然，遂问置此何用，傅尔丹回答说这些都是我平时习武用的，悬之以激励士卒。岳钟琪私下对人说：“为大将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③ 傅尔丹经大学士张廷玉推荐，被雍正帝委以北路清军主帅的重任。他骄傲轻敌，刚愎自用，不察敌情，疏于戒备，不纳劝谏，一意孤行，终于导致和通泊之败。第三，西、北两路清军相距遥远，联络困难，加之八旗与绿营、满族与汉族将领之间的矛盾等原因，两路清军缺乏有效的配合。七月初五日，岳钟琪得知北路军被围，迟至十二日始与参赞、提督纪成斌等率兵自巴尔库尔西进，企图袭击乌鲁木齐，而此时准噶尔军早已击败北路清军十余日

---

① 据噶尔丹策零说，和通泊之战俘获清军 1 万人。见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 369 页。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记辛亥败兵事》，第 60 页。

③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记辛亥败兵事》，第 63 页。

了。二十四日，岳钟琪等至纳邻河附近，距乌鲁木齐2日程，见"乌鲁木齐一带贼夷搬移已空"，认为"深入无益"①，又接到雍正帝撤军回营的谕令，即于次日回兵，这次袭击行动未能达到任何效果。

三、额尔德尼昭之战

（见附图14）

鉴于清军在和通泊之战中惨败，清廷对准噶尔部用兵的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雍正九年七月，雍正帝第一次接到北路军战败的奏报后即谕令傅尔丹："目前进兵之议且不必言，而防守之策倍当加意。著大将军等照近日谕旨谨慎办理。"② 其后，又一再谕令前敌将领，"果能固守，即伊等之功矣……败退贼众，亦断不可深入追击"③；"贼人虽来，不可轻进追击，但能相机坚守，即尔等之功"④。为加强防守，雍正帝令傅尔丹从科布多撤往察罕瘦尔、扎布韩等处，以便于与喀尔喀蒙古相互策应；以大学士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前往土拉河等形胜之地驻扎，会同喀尔喀王公等办理喀尔喀游牧和防守事务。

准噶尔军在和通泊的胜利，使噶尔丹策零的野心急剧膨胀。他在西、北两路备兵，"令诸台吉环峙乌鲁木齐"⑤，以窥伺清军西路；令大、小策凌敦多布驻扎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华（夸）额尔齐斯河和喀喇额尔齐斯河一带，以窥伺清军北路。雍正九年八月十一日，大、小策凌敦多布率领3万大军，自华额尔齐斯河出发，至索勒毕乌拉克沁，留兵4000人为守备，率其余2.6万人东侵喀尔喀。由于科布多、察罕瘦尔等处皆有清军重兵驻守，乃

---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九，雍正九年八月甲寅。

②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八，雍正九年七月癸酉。

③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八，雍正九年七月丙子。

④ 《清世宗实录》卷一〇八，雍正九年七月甲申。

⑤ 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西征厄鲁特记》，第143页。

取道阿尔泰山南麓，长驱直入，进至克尔伦，分兵侵扰苏克阿勒达呼、鄂尔海、西喇乌苏等处。清振武将军、顺承亲王锡保令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策凌击敌。九月二十一日，丹津多尔济、策凌率军进至鄂登楚勒，遣小股骑兵夜入大策凌敦多布在苏克阿勒达呼的营地挑战，诱敌来追。二十二日，准噶尔军进入鄂登楚勒，丹津多尔济、策凌挥军列阵力战，自辰至午，激战半日，阵斩、重伤敌将领各一名，俘虏、杀死敌士兵数百名，大策凌敦多布被迫退往台西里山。二十五日，小策凌敦多布之子曼济也战败回营。准噶尔军遂向哈卜塔克、拜塔克退却，不久即退至阿尔泰山以西。

清廷鉴于察罕瘦尔大营偏北势孤，不足以阻扼噶尔丹策零沿阿尔泰山南麓东犯，故下令在拜达里克河、推河和翁金河三地，各筑一城，置兵防守；在白格尔（今蒙古国贝格尔）驻兵1万，以与察罕瘦尔大营相犄角，控扼阿尔泰山南麓交通要道，加强喀尔喀西部的防御。十一月上旬，傅尔丹率清军从科布多撤回察罕瘦尔。与此同时，雍正帝对北路清军将领进行了调整：命顺承亲王锡保为靖边大将军，领北路大军；原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降为振武将军，为锡保协理；抚远大将军马尔赛改授绥远将军，率兵移驻扎克拜达里克，受靖边大将军锡保节制。

噶尔丹策零一直没有放弃侵掠喀尔喀蒙古和哈密地区的念头。雍正十年正月，他派色布腾、策零那木扎尔等人率兵6000人，自奇台（今新疆奇台东南）东犯哈密，深入哈密以东将近200里的塔勒纳沁，企图抢掠牲畜，由于清军防守严密，未能得逞，退了回去。不久，噶尔丹策零又开始实施其对喀尔喀部的侵掠计划。

当年六月，小策凌敦多布奉噶尔丹策零之命，在奇兰（林）河（额尔齐斯河支流）一带，集结起从布拉罕、和通胡尔哈等处调来的3万大军东犯。他避开科布多、察罕瘦尔清军大营，潜至杭爱山地区厄得尔河（今依德尔河）上游，“志欲抢夺泽卜尊丹

巴胡土克图，侵掠喀尔喀部落”①。哲布尊丹巴（即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是清廷册封的大喇嘛，掌喀尔喀地区喇嘛事务，在蒙古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噶尔丹策零企图通过控制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进而控制整个喀尔喀蒙古。

早在三月间，清廷就得到信息，小策凌敦多布“现在奇兰，聚兵三万，俟秋深马肥，欲往阿尔台，侵犯喀尔喀游牧”②。雍正帝令靖边大将军锡保等侦探敌情，加强防御。但是锡保并没有预先作好准备。他派兵赴乌孙珠尔，奏称拨兵1万，而实际只有3000人。七月十四日，当小策凌敦多布侵犯乌孙珠尔时，清军因兵力不足，作战失利，退回大营。

七月二十一日，副将军亲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策凌、将军塔尔岱等率兵赴本博图山阻击小策凌敦多布。时小策凌敦多布因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已徙多伦泊而空无所得，又侦知策凌西出，便突袭塔米尔河策凌游牧地，“掠其子女牲畜”③。策凌于途中得悉此情，“割辮发及所骑马尾，誓以死复仇”④。他立即亲率满洲、蒙古兵2万人还军驰救，同时急报锡保，请求派兵夹击。在克尔森齐老地方，策凌追及准噶尔军，奋勇截杀。但锡保不立即发兵助战，丹津多尔济又故意迟延不进，策凌与敌交战二日，因援兵不至，终让小策凌敦多布逃脱。

策凌率部继续追击。八月初四日夜，追至额尔德尼昭。额尔德尼昭，蒙古语“宝寺”之意，因该地产金银又有一座大喇嘛寺而得名，汉籍文献也称光显寺。它位于杭爱山南麓鄂尔坤河东岸，左临河，右阻山，大喇嘛庙横亘其中，道路狭窄，大军难于通行。清军乘夜暗秘密接近敌人，初五日黎明前发起猛攻。准噶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三，雍正十年九月乙酉。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三十，雍正十年五月庚辰。

③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八，《外蒙古喀尔喀齐齐里尔克盟游牧所在》。

④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四，《荡平准噶尔述略》。

尔军仓皇接战，一片混乱，又因场地狭窄，难以展开，陷入被动挨打的绝境。清军越战越勇，至日暮，“杀贼万余，尸遍山谷，河流尽赤，（敌）负伤逃走者甚众，所获器械、驼马牛羊无算”①。当夜，丧魂落魄的小策凌敦多布率其残部突围，由鄂尔坤河上游向推河逃窜，沿途尽弃辎重、牲畜以阻追兵。策凌急告绥远将军马尔赛出兵堵截。此时，马尔赛驻在扎克拜达里克，城内清军有1.3万人，倘以一部兵力截准噶尔军归路，与策凌部追兵前后夹击，可一举将残敌全歼。但马尔赛怯懦畏敌，坐视敌人逃走。副将军达尔济整兵待发，马尔赛竟不许出战。副都统傅鼐认为敌败亡之余，可唾手而取，机不可失，请求马尔赛拨给他轻骑数千出战，“事成，归功将军；事败，鼐受其罪”，但马尔赛“默然不出师”②。傅鼐“情急至于跪求，而马尔赛亦始终不允”，直至第二天，马尔赛“方领兵缓行五十余里，虚作尾追之状”③。由于马尔赛按兵不动，致使处于清军前后夹击之势的准噶尔败军侥幸走脱。

额尔德尼昭之战，清将策凌指挥灵活果断，占据有利地形，实施突然袭击，予敌重创之后又乘胜猛追，故能以“大小官员只损二人，兵丁被伤者不过数十”④的微小代价，取得“将三万逆贼斩杀大半，余贼丧胆奔逃”⑤ 的重大战果。此战也暴露出部分清军高级将领的腐败无能。战后，雍正帝下诏晋封策凌为和硕超勇亲王，授靖边左副将军（后改授定边左副将军），进屯科布多，经理军务，并分土谢图汗部38旗中的20旗予策凌，建赛音诺颜部，与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并列，自此，喀尔喀部乃分为四部。雍正帝以有意阻挠军机，紊乱国事罪，将马尔赛斩首；以贻误军机罪，革傅尔丹内侍卫大臣、振武将军和公

---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三，雍正十年八月壬申。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七，《傅阁峰尚书》，第196页。

③④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七，雍正十年十月甲子。

⑤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三，雍正十年九月乙酉。

爵，留军营效力；以调遣失宜，怯懦畏葸罪，将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解职削爵，另以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驻守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

额尔德尼昭之战，予噶尔丹策零以沉重打击，为清王朝与准噶尔部停战议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噶尔丹策零求和以及准噶尔与喀尔喀牧界的划定

额尔德尼昭之战后，准噶尔部因人员伤亡惨重、驼马物资丧失殆尽而元气大伤，已无力继续进行对清朝的战争。从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半年起，噶尔丹策零以各种方式向清廷表示，准备释放清军俘虏，派使者请和。

清王朝连年对准噶尔用兵，军费开支过多，“计自康熙五十六年备边以来，旋罢旋调，先后军饷七千余万”①，库帑银锐减。因此，朝野都有停止用兵、休养生息的要求。翰林院检讨周彬上疏说，对准噶尔用兵造成“糜费疲惫”，应该迅速撤兵，“军务俱行停止”，“舒天下之力”，“养天下之命”②。雍正帝也感到对准噶尔用兵师久无功，长此以往，不利于国计民生。雍正十二年初，雍正帝得知噶尔丹策零“欲遣使请和”的信息，他虽心存疑虑，仍然十分重视，让文武大臣议论对准噶尔用兵一事。因西、北“两路将军大臣等所议互异”③，他于五月二十日宣布当年暂停进兵，并召北路左副将军策凌、西路署大将军查郎阿晋京与军机大臣等共同详议。七月，因他们的意见“亦不画一”，又诏令“王公满汉文武大臣公同会议，各抒己见，据实具奏”④。策凌、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第147页。

② 《宫中档·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周彬奏折》，全宗4107卷8号。

③ 《清世宗实录》卷一四三，雍正十二年五月乙未。

④ 《清世宗实录》卷一四五，雍正十二年七月癸巳。

查郎阿认为，清军“兵力有余，士气奋勇；贼势穷蹙，人心离散”，故“力主进剿”。和硕康亲王巴尔图等人主张先战后和，即两路大军“约会齐进，并力歼除”，如噶尔丹策零“悔祸祈恩”，再“宽其罪戾，议定边界”。大学士张廷玉等则主张先遣使议和，噶尔丹策零“若仍执迷不悟”，“再议征讨”。雍正帝深感对准噶尔用兵“一时难以告竣”，决意议和①。为打消噶尔丹策零的疑惧，他下令驻科布多清军撤回察罕瘦尔。八月，清廷派遣侍郎傅鼐、额外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为使，前往准噶尔，宣谕雍正帝罢兵议和旨意，商谈准噶尔与喀尔喀划定牧界，从而迈出了与准噶尔议和坚实的一步。

噶尔丹策零对清政府使者的到来，十分欢迎，他派宰桑特磊、吹纳木喀等人到距伊犁10余里的地方迎接，盛情接待。

尽管双方都有议和的愿望，但议和的道路却是艰难曲折的。开始，傅鼐等宣示敕谕，提议喀尔喀与准噶尔以阿尔泰山梁为界。噶尔丹策零则提出以杭爱山为界，此议被傅鼐、阿克敦否定后，又要求将哲尔格西拉胡鲁苏等处一直向南弃为闲地。雍正帝认为此地系喀尔喀游牧地，故令将傅鼐等人的奏折和地图密寄额驸策凌。策凌认为，在哲尔格西拉胡鲁苏界外，原有清军安设的卡伦，“应议定将我卡伦照旧安设”；“厄鲁特游牧，应以额尔齐斯为止。如伊不遵，或以阿尔泰岭为界，不得越过哈巴、博尔济、阿里克泰、清吉尔等处。至中间交壤之处，彼此俱毋得打牲。嗣后阿尔泰迤东令我处巡逻，迤西令彼处巡逻”，总之“断勿令过阿尔泰岭，方为善策”②。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噶尔丹策零派往北京议和的使臣吹纳木喀提出，阿尔泰原系厄鲁特游牧地，杭爱山原系喀尔喀游牧地，要求由哲尔格西拉胡鲁苏等处至巴尔库尔定为边界。雍正帝批驳说：“所云‘阿尔泰系厄鲁特游牧之地’，此噶尔丹从前之事。……现今噶尔丹之属人及丹济拉

---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四五，雍正十二年七月戊戌。

②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三，雍正十三年三月己亥。

之子孙俱在内地，尔准噶尔部曾未越阿尔泰游牧居住，乃谓为厄鲁特游牧之地，可乎?"① 不过，为永息兵戈，安逸众生，雍正帝特允将阿尔泰山梁外哈道里哈达清吉尔、布喇清吉尔两处空闲之地俱属于准噶尔，并提出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上阿尔泰山梁，由索尔毕岭、下哈布塔克、拜塔克之中，过乌兰乌苏，直抵噶斯口为界，将胡逊托辉至哈喇巴尔鲁克全都作为空闲之地。这一划界方案，比以前对策妄阿拉布坦时已有所让步，但噶尔丹策零并不满足，他"漫指前奏未允之哲尔格西喇呼鲁苏等处"为准噶尔部"边界"，并要求清廷敕令喀尔喀内徙，于喀尔喀境内更留空地。雍正帝死后，乾隆帝继承其对准噶尔部的政策，他一方面采取近疆固守的方针，谕令清军严加戒备，一方面在定界条件方面毫不让步。乾隆元年（1736 年）正月，乾隆帝在接见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时强调，必须"谨遵皇考原旨定界"②，否则不必往返遣使。

在准噶尔，尽管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以定界和好为乐者"，但在上层贵族中，反对按清廷方案划界的意见却占了上风。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回到伊犁以后，噶尔丹策零"集宰桑大台吉等议"。小策凌敦多布及其伯父之子、大喇嘛拉卜立木主张遵乾隆帝之意，以阿尔泰山为界，"余多阿谀噶尔丹策零者，故其意亦未定"③。乾隆二年，噶尔丹策零致书喀尔喀车臣汗，仍声言欲得阿尔泰。乾隆帝判断噶尔丹策零意欲请和，又惮于遣使，故令以额驸策凌名义作书答复，逐条批驳噶尔丹策零书，奉劝他"详审是非利害，遣使达诚"，并说"如尔难于遣使，我当代奏，令尔使赴京，共成和好"④。此信由台吉额默根于九月初七日送达伊犁，噶尔丹策零随即遣宰桑达什、博吉尔二人为使随额默根奉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五，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丁酉。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乾隆元年正月壬子。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三，乾隆元年十一月壬辰。

④ 《清高宗实录》卷四一，乾隆二年四月壬午。

表至京，请求“嗣后喀尔喀与厄鲁特各照现在驻牧，无相掣肘”①。乾隆帝认为噶尔丹策零“有诚心求和之意”②，遂命侍郎阿克敦为正使，御前三等侍卫旺扎尔、乾清门头等台吉额默根为副使，于乾隆三年（1738年）三月与达什等前往准噶尔谈判划界。

当年秋，阿克敦等在伊犁与噶尔丹策零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谈判，由于噶尔丹策零坚持清方卡伦必须后撤，并表示若以阿尔泰山梁为界断然不可，所以双方未能达成共识。十二月，阿克敦等人返回京师。噶尔丹策零遣使臣哈柳等随阿克敦至京，向乾隆帝提出定界的新方案：“循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昂吉勒图、乌克克岭、噶克察等处为界，北以逊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等处为界。我边界人等，仍在山后游牧，不得越阿尔台岭；其山前居住蒙古部人，只在扎卜堪等处游牧，彼此相距辽远，庶可两无牵掣”③。同时，还提出撤退清方卡伦和进藏熬茶等项要求。乾隆帝在接见哈柳及令其带回的敕书中，赞扬了噶尔丹策零关于准噶尔游牧不越过阿尔泰山的意见，对其“请循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等处，北以孙多尔库奎等处为界”以及将布延图、托尔和卡伦内移的要求，则予以否定，“此必不可行之事”，但也表示在托尔和、布延图等处，清方“断不修筑城屋驻扎兵丁”，在科布多也不再驻兵，只是每年定期派兵二三十人前往巡视。乾隆帝还提出，关键是“休兵息民，永归和好”，如此，“即定界与否，亦非要事”④。乾隆帝既坚持了清政府关于定界的原则立场，又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作出了让步，这就为双方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

① 《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乾隆三年正月丁丑。

② 《清高宗实录》卷六二，乾隆三年二月甲午。

③ 《清高宗实录》卷八三，乾隆三年十二月戊戌。

④ 《清高宗实录》卷八三，乾隆三年十二月丙午；卷八七，乾隆四年二月庚子。

乾隆四年十二月，噶尔丹策零再次遣使臣哈柳至京进表，接受乾隆帝所提条件，同意以阿尔泰山为界，托尔和、布延图两处卡伦仍在原地安设。至此，由于清廷与准噶尔双方都作出了让步，争执多年的定界一事，遂告结束。

喀尔喀与准噶尔牧界的划定，使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因而出现了将近20年的和平局面。这对清政府特别是喀尔喀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是极为有利的，从而也就为乾隆朝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彻底解决准噶尔部问题创造了条件。

第六节　战争简评

对准噶尔的战争，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到乾隆四年（1739年）与噶尔丹策零达成和议划定牧界，历经康、雍、乾三朝，前后50年。尽管作战各有胜负，但清廷从战争全局上较好地把握了战与和的关系，采取后发制人、和战结合的方针，所以自始至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

准噶尔部与清廷长期保持着臣属关系。清廷对蒙古各部一律平等相待，主张各部之间和睦相处，避免兵戎相见；也从不干涉准噶尔的内部事务。准噶尔与清王朝之间的战争，完全是准噶尔贵族挑起的。噶尔丹首先发动兼并喀尔喀蒙古的战争，并进犯内属蒙古，直接与清廷对抗，康熙帝才不得不出兵抗击噶尔丹。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背弃誓言，继续与清廷为敌，侵掠喀尔喀，甚至煽动内蒙古叛乱，康熙帝只得再次对噶尔丹用兵。对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争，也是因为策妄阿拉布坦攻掠哈密，侵扰西藏，制造动乱，清廷才不得已而用兵。康熙帝在总结对噶尔丹的三次亲征时指出："逆形已著，然后徂征；怙恶不悛，然后搜讨。"① 正因为如此，清廷在政治上、道义上赢得了主动。

---

① 《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战争爆发之后，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清廷则针锋相对，坚决对搞分裂割据的准噶尔部上层贵族进行武力征讨。康熙帝认识到："烈焰弗戢，必将燎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① 所以，他不顾朝臣的反对，不怕艰难险阻，坚持对噶尔丹、噶尔丹策零用兵。当有人以路远难行为由反对进藏平乱时，康熙帝说："彼（指准噶尔兵）既可以到藏，我兵既可以到彼处。"② 他以"除恶务尽"的态度，将对准噶尔的战争进行到底。

在对准噶尔贵族进行武力打击的同时，清廷并不放弃招抚与和谈。康熙帝为了孤立和瓦解敌人，提出对噶尔丹"招抚为要"的原则。雍正继位之初，利用准噶尔遣使议和的机会，与噶尔丹策零进行和谈。尽管和谈没有结果，却争取了时间，巩固了统治地位。雍正十二年，雍正帝鉴于对准噶尔战争一时难于结束的现实，利用额尔德尼昭大捷后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噶尔丹策零急于和谈的心理，适时地作出了与准噶尔和谈的决策。和谈中，清廷既坚持以阿尔泰为界的原则立场，又有所让步，历时 4 年，终于达成协议，划定了牧界。和谈及其协议不但有利于清王朝休养生息，而且深得准噶尔部人民的拥护，是很成功的。

---

① 《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第十三章　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战争

第一节　对达瓦齐的征战

一、准噶尔部的内乱

乾隆十年（1745 年）九月，噶尔丹策零病死。为争夺汗位，准噶尔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攻杀，使本来就不安定的准噶尔部陷于内乱之中。

噶尔丹策零有三子一女：长子喇嘛达尔札，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幼子策妄达什，女儿乌兰巴雅尔。乾隆十一年初，年方 12 岁的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以母贵嗣汗位”①。但他昏庸无能，残暴嗜杀。其姐乌兰巴雅尔等每以善言规劝，禁其淫乱，他非但不听劝戒，反而听信谗言，将其姐和姐夫赛音伯勒克拘禁起来。那木札尔的荒淫暴戾，引起准噶尔部多数贵族及其属下民众的不满。乾隆十五年夏，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欲利用行围打猎的机会杀害对其汗位最具威胁的异母兄长喇嘛达尔札。拥护喇嘛达尔札的赛音伯勒克等人亦借机行事，将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擒获，剜去双目，囚禁于阿克苏。喇嘛达尔札登上了准噶尔汗位。

喇嘛达尔札虽为长子，但系庶出，因此不能服众，“诸台吉皆觊觎大位，各不相下”②。乾隆十六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

---

①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49 页。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四，《萨赖尔之叛》，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87 页。

纳、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以及达什达瓦等人，谋立策妄达什为汗。事发，达什达瓦和策妄达什被杀，阿睦尔撒纳和班珠尔则逃亡到达瓦齐处。达瓦齐系巴图尔珲台吉之后，大策凌敦多布之孙，游牧于额尔齐斯沙喇泰地方，人众地险，而且“他的族系出身使他有权优先继承汗位”①。喇嘛达尔札早就对他存有戒心，这时即派人前去传唤达瓦齐，欲以议事为名将其召来杀掉。达瓦齐预知其谋，拒不从命，喇嘛达尔札遂派兵往擒。达瓦齐得知此信，于九月二十二日率部众 5000 人内附。行进途中，达瓦齐在和通哈尔垓地方击败了杜尔伯特台吉策凌乌巴什所率追兵，但仍未能摆脱敌人。在纳林布鲁尔河、阿尔泰山梁一线，又有博和勒岱、鄂勒哲依率兵万余邀截，因阿尔泰山地狭难过，达瓦齐遂与阿睦尔撒纳、班珠尔经额尔齐斯逃往哈萨克。

喇嘛达尔札尽擒达瓦齐眷属及部众囚禁于伊犁，又派兵 3 万往哈萨克擒拿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逃出哈萨克，潜回原牧地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收集部众千余人，昼伏夜行，于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突入伊犁，杀死喇嘛达尔札，达瓦齐登上了汗位。

达瓦齐颟顸无能，嗜酒好杀，渐失人心。小策凌敦多布之孙纳默库济尔噶尔在达瓦齐自立之后，首先归降，但不久就在部分准噶尔部宰桑的支持下，与达瓦齐兵戎相争。他们相互攻伐，同时向各部征兵，各部宰桑穷于应付，无所适从。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不满于达瓦齐的统治，乃“集族谋曰：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依天朝，为永聚计”②。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三车凌率领所部 3177 户，计 1 万余人，离开长期居住的额尔齐斯河原牧地，投归清朝。

---

①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 1964 年版，第 430 页。

②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三，《额鲁特蒙古乌兰固木杜尔伯特部赛音济雅哈图盟游牧所在》。

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的联盟，是在反对喇嘛达尔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共同的敌人被推翻之后，由于各自利益的驱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渐渐暴露出来了。达瓦齐自立之后，阿睦尔撒纳返回旧牧地塔尔巴哈台雅尔地方，管辖5个游牧，防守准噶尔北境。他凭恃拥立之功，暗中扩充势力。乾隆十八年十月，阿睦尔撒纳提出与达瓦齐南北分辖准噶尔的要求，遭到达瓦齐的拒绝。于是，阿睦尔撒纳就与班珠尔等抢掠了伊犁北部的鄂毕特鄂托克。从十一月起，达瓦齐派兵攻打阿睦尔撒纳，但屡屡败北。次年六月，达瓦齐命台吉沙克都尔曼济等率兵3万名，玛木特率乌梁海兵8000名，东西夹攻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和纳默库等率千人在额尔齐斯夔博和硕固守，因众寡不敌，遂率众向内地转移，投奔清朝。

准噶尔由于连年内乱不已，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人民生活穷困已极，达瓦齐自立之后，更是众叛亲离，人心离散。三车凌等率部属内迁归附，既显示了包括贵族在内的广大厄鲁特人民对准噶尔统治集团的不满，也反映出他们要求结束内乱，实现统一安定的强烈愿望。

二、清政府“两路进兵、直抵伊犁”的战略决策及其作战方针

清政府对准噶尔的形势极为关心。康熙、雍正两朝都视准噶尔割据势力为实现国家统一、安定的主要障碍，但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准噶尔割据势力虽然一时被击败了，不久又卷土重来，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乾隆帝执政之后，继续雍正帝时开始的与准噶尔部的谈判，并最终与噶尔丹策零划定了牧界。但是，乾隆帝始终对准噶尔贵族保持高度警惕，非常关注准噶尔的局势。乾隆十八年八月，尚书舒赫德奏请遣使准噶尔与达瓦齐修好，乾隆帝虽然认为清王朝

"无乘乱兴师之理"，但"达瓦齐本系别支，胆敢作乱弑君，自为台吉"，实属大逆不道，故斥遣使修好之说"殊为不晓事体"[1]。当年冬，三车凌率部内附，乾隆帝一方面谕令成衮扎布将车凌等移入边卡内驻扎，妥善安置；另一方面，对准噶尔宰桑玛木特率兵追击车凌，强行进入边卡一事，极为恼火，认为准噶尔有轻视清兵之意，如不加以惩创，准噶尔强大之后，"必至渐生觊觎，出入无忌"[2]，那时不但喀尔喀得不到保护，而且对边疆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乾隆十九年，乾隆帝终于定下以武力进讨，彻底征服准噶尔的决心。五月初四日，谕军机大臣："伊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为难，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猝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3] 这是一道十分重要的上谕。第一，6个月之前，乾隆帝还说过"近日准夷内乱，堂堂天朝，固不肯乘衅发兵攻取"[4]的话，这时却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而确立了以武力平定准噶尔的总方针。第二，适时地提出了"两路进兵，直抵伊犁"的战略决策，为平准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三，制定了战后处理准噶尔部的"众建以分其势"的政策，为防止准噶尔部内乱和平定后来的阿睦尔撒纳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乾隆帝之所以在这时提出"两路进兵，直抵伊犁"的战略决策，一方面是由于准噶尔部出现了内乱，有机可乘，另一方面则是清王朝已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清朝自入关之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百余年的努力，国内出现了政局稳定、经济

---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四五，乾隆十八年八月乙巳，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④ 《清高宗实录》卷四五二，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丁亥。

③ 《清高宗实录》卷四六四，乾隆十九年五月壬午。

发展、财政充裕的局面。顺治年间，清政府入不敷出，每年约有数十万两银子的亏空。康熙末年，已略有节余，户部库存达800余万两。雍正朝，已增至6000余万两。况且，进军伊犁，还可以借助于归附的厄鲁特军队。所以，乾隆帝在召见满洲王大臣，宣示办理准噶尔事宜时曾这样说："准噶尔之事，自皇祖、皇考时，频烦圣虑，历有年所，因机无可乘，故大勋未集。今事机已值，无烦大举，以国家之余饷，两路并进，不过以新降厄鲁特之力，少益以内地之兵，即可成积年未成之功。"①

乾隆帝决策对准噶尔用兵一事，所有的汉大臣均未与议，而满洲王大臣中，只有大学士傅恒一人赞成用兵，其余的人因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战惨败，谈虎色变，以深入为难，"不愿劳师动众"②。乾隆帝力排众议，定下进军伊犁的决心。阿睦尔撒纳、玛木特先后率众归附之后，准噶尔部内乱不止、众叛亲离的情况更为明晰，乾隆帝进一步坚定了进军伊犁的决心。

乾隆十九年六月，陕甘总督永常提出"裹粮进剿"的建议，即进军伊犁的清军官兵及跟役人员，俱以6个月计算，共裹带口粮数百万斤。此议受到乾隆帝的批评，他说："此系从前岳钟琪所办，乃相沿绿旗陋习，已属失策。况此番情形，与前更自不同。现在准夷内乱相寻，人心离畔，以天朝余力乘机进取，正所谓取乱侮亡之时。若裹带米面数百万斤，驮载前往，则兵丁防护不暇，何能轻骑进剿？且与蒙古交战，惟应仍用蒙古行走之法，加以官军节制足矣。"③ 所谓"蒙古行走之法"，系指不带辎重的骑兵轻捷快速地运动，亦即是乾隆帝所说的"轻骑进剿"。部队的粮秣供应，除士兵随身携带少量的牛羊肉干和炒面等口粮外，主要采取因粮于敌，就地补给的办法，"将收取达瓦齐所有牲畜备用，倘有不敷，则以茶叶、银两，向厄鲁特、回子等换易口

---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七四，乾隆十九年十月戊午。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第76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七，乾隆十九年六月壬申。

粮，办理分给”①。轻骑进剿可以充分发挥骑兵的快速机动能力，出其不意，击其不备，速战速决。但是，在伊犁地区靠因粮于敌的办法来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是很困难的。所以，乾隆帝的决策，也为这次进军埋下了隐患。

乾隆帝原定于乾隆二十年秋季向伊犁进军。阿睦尔撒纳在热河觐见乾隆帝时建议说：“塞外秋狝时，我马肥，彼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未备，且不能远遁，可一战禽之，无后患。”② 玛木特的意见也是如此。乾隆帝认为“其言良当”③，遂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两路大军皆提前于乾隆二十年二月进兵。

三、奔袭伊犁

（见附图15）

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帝即谕军机大臣等：“所有明岁军兴一应粮饷、兵丁、马驼，均应豫为筹画。”④此后，有关方面积极地进行各种准备，如调拨兵丁、购买马驼、贮运粮秣、勘察进军路线、安设台站等，甚至制作了大批生津止渴的“果单”，以备穿越沙漠时解渴之用。此外，他还重视战前的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当时，满族王大臣在对准噶尔用兵一事上畏怯退缩，为振奋满族王大臣和八旗兵的战斗精神，他于十月十三日召见各王大臣，宣示办理平定准噶尔事宜，阐明了进军伊犁的重要意义，对“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的习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勉励他们要“奋励踊跃从事”，并坚定地表示，“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虽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七，乾隆二十年四月庚申。

②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第151页。

③ 《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

④ 《清高宗实录》卷四六四，乾隆十九年五月壬午。

儒，即失机宜，半途而废！”①为了配合军事进剿，乾隆帝于十一月又下诏宣谕准噶尔部，从政治上揭露达瓦齐的分裂罪行，号召各部首领脱离达瓦齐，归附清朝，指出：“先来者先受朕恩，后来者后蒙朕惠，即使达瓦齐痛改前非，输诚投顺，朕亦一体封爵，不令失所”，如“仍怀观望或敢抗拒者，大兵所至，必尽歼除。尔等其详求朕谕，熟思利害，善自裁择，勿遗尔悔。”②

十二月，乾隆帝决定发兵5万，于明年二月分北、西两路出击：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亲王固伦额附色布腾巴尔珠尔、亲王衔琳沁、郡王讷默库、郡王衔青滚杂卜、内大臣玛木特、将军阿兰泰、尚书达尔党阿等为参赞大臣，官兵2.5万人，马7万匹，由乌里雅苏台出发，越阿尔泰山向西南推进；西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贝子扎拉丰阿、总督鄂容安等为参赞大臣，三车凌均为参赞大臣率所部兵以从，官兵2.5万人，马7万匹，自巴里坤西进。两路大军各携两月粮，约期会于博罗塔拉河（伊犁东北300里），会师后直捣伊犁。

乾隆二十年二月十二日，阿睦尔撒纳率北路哨探兵6000人，从乌里雅苏台出发；8天后，班第率察哈尔兵3000人继进。二十五日，萨喇尔率西路哨探兵6000人，从巴里坤出发；三月九日，永常率兵继进。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原为准噶尔部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乾隆帝令他们率旧部举旧部旗号先行，是为了利用其影响和力量，即所谓“以夷治夷”。还是在乾隆十九年十一月时，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曾奏请以藤牌兵助西、北两路进剿准噶尔，乾隆帝不准，他说：“朕此次即满兵亦不多用，仍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耳。”③但是，定北将军班第不懂得这个策略。他于三月十九日抵

---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七四，乾隆十九年十月戊午。

② 《清高宗实录》卷四七七，乾隆十九年十一月甲午。

③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第十辑，第144页。

达郭勒阿里克，即率经过挑选的600名精兵急行军，前往额尔齐斯以西的喇托辉，与阿睦尔撒纳前队会合。乾隆帝得悉此情，即予以严厉批评，指出："大兵进剿，自宜略分先后。经朕屡降谕旨，令班第计阿睦尔撒纳行程，约离数日，相继前进。一则阿睦尔撒纳系准噶尔人众知名之人，今伊带哨探兵前行，人多认识，于收服准夷人众较易。再前队既有哨探兵，复有将军随后带兵继进，声势联络，军威益振。如将军、副将军合并一处，则众人惟知有将军，不复更知有副将军，转置阿睦尔撒纳于无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长，殊于军行无益。"他令传谕班第、阿睦尔撒纳二人，"务须酌量相离数日，陆续进发，不得同在一队行走。西路将军永常、萨喇勒(尔)等，亦遵朕屡次谕旨前进，毋得故违取戾"①。由于准噶尔内乱不止，人心思治，迫切要求摆脱达瓦齐的专横统治，又受阿睦尔撒纳、萨喇尔的影响，故清军所到之处，准噶尔各部皆望风迎降，"各部落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无不携酒牵羊以降，兵行数千里，无一人敢抗者"②。清军进展异常顺利。

班第与阿睦尔撒纳于西喇托辉会合后，率部经额尔得里克、察罕呼济尔等地，向额米尔（额敏）进军。四月中旬，西、北两路清军均进至博罗塔拉河（今博尔塔拉河）地区，因侦知达瓦齐已往察卜齐雅勒地方，遂不待两路会合，班第、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分率所部，轻骑前往。二十七日，萨喇尔兵至登努勒台，班第、阿睦尔撒纳等于次日进抵尼楚滚，两地相距仅20里。这时，达瓦齐已退往格登山。班第、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商定，三十日两路大军同时挥师南下。"汉、蒙军队到达伊犁时，准噶尔人便跟一些首领一起向他们投诚"③，清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伊犁。

五月初五至初七日，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分率清军抢渡伊犁河。北路军由固勒扎渡口越推墨尔里克岭，西路军由喀塔克渡口

---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六，乾隆二十年四月甲寅。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第76页。

③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443页。

越扣们岭，两路并进，进逼格登山。格登山位于伊犁西南、特克斯河北岸。“达瓦齐拥众万人，后负格登山崖，前临泥淖，驻营固守”，但是，达瓦齐部“军械不整，马力亦疲，各处可调之兵已收括无遗。现在众心离散，愿降者多”①。五月十四日，两路清军逼近格登山，占据形胜之地，严阵以待，并示以欲掠准噶尔游牧以诱敌。当日夜，阿睦尔撒纳派翼领喀喇巴图鲁阿玉锡、厄鲁特章京巴图济尔噶尔等率领22名士兵，前往达瓦齐大营侦察。阿玉锡乘敌松懈不备，突袭达瓦齐大营。准噶尔军惊溃奔窜，自相践踏。达瓦齐从睡梦中惊醒，不知虚实，率2000余人仓皇逃走。次日晨，阿玉锡清点投降者，计4000余人。

达瓦齐率残部翻越天山南逃，清军一面分道南追，一面向阿克苏、乌什等地发出檄文，令当地维吾尔等族人民协助清军擒拿达瓦齐。乌什维吾尔族领袖霍集斯旧日虽与达瓦齐友善，但接到清军檄文后，即率众于各隘口设卡防堵。达瓦齐到达乌什附近时，仅剩百余骑。霍集斯伏兵林内，遣人牵羊载酒往迎达瓦齐入城，待其酒醉后将其缚之，执献清军。至此，达瓦齐割据势力被彻底平定。

战后，乾隆帝谕令班第等将清军陆续撤回。班第等遵旨留兵500驻守伊犁，将其余各部先后撤回内地。乾隆帝对作战有功的将领论功行赏，阿睦尔撒纳赏亲王双俸即双亲王，班第、萨喇尔晋封为一等公，惟永常因筹办军需不称旨，未膺封赏。达瓦齐被押送北京后，乾隆帝赦免其罪，封为亲王，住在北京，受到清廷的优待。

第二节　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

一、阿睦尔撒纳的叛乱

乾隆帝认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准噶尔，对清王朝是一巨大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九〇，乾隆二十年六月丙午。

的威胁。所以，早在乾隆十九年，他就决定，俟平定准噶尔之后，采取“众建以分其势”① 的方针。次年正月，他对此方针又有所阐释：“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② 具体说来，即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噶尔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四部俱依照喀尔喀蒙古设立盟旗，令四汗兼管。其目的是使四部相互制约，分而治之，以防准噶尔分裂割据势力破坏国家的统一和安定。

阿睦尔撒纳虽然归附清朝，但他是想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消灭其政敌达瓦齐的势力，以达到“为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③ 的野心。阿睦尔撒纳的野心与清廷对准噶尔的方针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因而一场分裂与统一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阿睦尔撒纳的政治野心，从一开始即有所暴露。乾隆二十年初，他在向伊犁进军之前，即以托忒字④ 奏请赏给印文，以招降辉特部人，“其欲取多人，占据地方之意，已经微露”⑤。四月，进兵至塔本集赛以后，他竟拥兵不进，借口查办属人，逗留时日，而暗中将其属人迁往博罗塔拉，以攫夺伊犁的牲畜财物。由于准噶尔各部台吉纷纷率众归附，阿睦尔撒纳更加志得意满，专擅独断。他施展阴谋，玩弄手段，一方面为实现其为四部总台吉的政治野心大造舆论，声称“四卫拉特与喀尔喀不同，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御诸敌，又生变乱”⑥，又“托言

---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六四，乾隆十九年五月壬午。

②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一，乾隆二十年正月辛卯。

③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第152页。

④ 托忒字，即托忒文，为通行于厄鲁特各部的一种变体蒙古文。托忒，明了、清楚之意。清顺治五年（1648年），厄鲁特蒙古喇嘛咱雅班第达在回鹘式蒙古文基础上创制而成，因其比通用的蒙古文能更清楚地表达厄鲁特方言的语音，故名“托忒”。

⑤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一，乾隆二十年正月戊戌。

⑥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九，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子。

哈萨克人众，谓非令伊为总台吉不可"①；一方面极力讨好额附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使与班第为难，而以己情托其归奏"②，企图以此动摇清廷决心，收回分封四部汗的成命，承认他为厄鲁特四部总汗。进占伊犁之后，阿睦尔撒纳叛逆之迹日渐暴露，竟以厄鲁特四部总汗自居，将乾隆帝所赏黄带孔雀翎置而不用，一切行文也不用清廷所颁副将军印信，而仿效达瓦齐用小红钤记；不将内附实情告知准噶尔人民，而将投诚的台吉宰桑等擅行诛戮；暗中培植亲信，四处招兵买马，竭力扩展割据势力，积极准备叛乱。

清廷对阿睦尔撒纳的政治野心，早有觉察，亦有所提防。进军伊犁时，乾隆帝令阿睦尔撒纳率兵为前锋，以利用其号召力，沿途招降准噶尔人众，与此同时，又令额附色布腾巴尔珠尔与之同行，以伺察其言行。他密谕色布腾巴尔珠尔："（阿睦尔撒纳）若有反叛之状，则汝收将军印，便宜行事"③，又密谕萨喇尔等人，对阿睦尔撒纳"务须留心防范，慎勿任其所行"④。为防止阿睦尔撒纳专擅和贪功，乾隆帝谕令班第，议事时，要让萨喇尔、玛木特与阿睦尔撒纳等"会同商办"，班第则要"留心办理，切勿令彼先行独办，然后告之班第转奏也"⑤。

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根据班第、萨喇尔、鄂容安的联衔密奏，认为阿睦尔撒纳"种种不法之处，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⑥。他当机立断，决定不待其公开叛乱，先发制人，掌握主动。他密谕班第等人，如阿睦尔撒纳尚未起程入觐，即行擒拿，在军营正法；如已动身，则另行办理。同时，令阿兰泰率领凯旋索伦兵1000名往阿睦尔撒纳游牧处，擒拿其妻子及亲信宰

---

①③ 《清高宗实录》卷五〇二，乾隆二十年十二月戊申。

② 魏源：《圣武纪》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第152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一，乾隆二十年正月戊戌。

⑤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壬戌。

⑥ 《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一，乾隆二十年六月庚午。

桑。但是，班第以清军兵少，未敢擒拿阿睦尔撒纳。

七月初十日，阿睦尔撒纳从尼楚滚军营起程赴热河入觐。但他暗中却与其亲信党羽策划叛逃，先后遣人前往扎布堪河游牧处接取妻子人众，令阿巴噶斯带兵抢掠额林哈毕尔噶、业克明安各处游牧，令库图齐纳尔等带兵分路抢掠伊犁清军大营，令噶勒杂特带兵由乌隆古一路抢掠陆续撤回的清军官兵。起程后，阿睦尔撒纳一再故意拖延，次日即行住宿，并遣纳噶察向班第告称："阿巴噶斯、约苏图、乌克图与喇嘛等潜行计议，如不令阿睦尔撒纳统领驻扎，伊等宁剖腹而死，不能贪生别事他人。"① 纳噶察从班第处返回后，阿睦尔撒纳与他以及阿巴噶斯、察哈什等人"回避众人，密商竟夜"②。八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行至乌隆古河（今新疆阿勒泰境内），由于此时他已"截获了由北京下达给将军们的命令"③，而且已接近其游牧地，所以便开始实行其密谋已久的叛逃计划，将定边左副将军印信交给同行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诡言"先至游牧，再行入觐"④。二十日，即绕道额尔齐斯河逃走，沿途大肆抢掠。额琳沁多尔济领兵 300 名前往追捕，但为时已晚。

阿睦尔撒纳公开打出了反清叛乱的旗帜。在他的煽惑下，伊犁地区准噶尔宰桑喇嘛等亦纷纷攻袭清军，抢掠台站，断绝粮道。八月二十三日，宰桑克什木、都噶尔等率兵抢掠伊犁台站。此时定北将军班第、副将军萨喇尔和参赞鄂容安遵旨率八旗兵 500 名留驻伊犁办理善后事宜，因兵少且又缺乏准备，无力控制局势，乃于二十四日退出伊犁，向崆吉斯转移。二十九日，行至乌兰库图勒，班第等人被叛军包围。当日夜，班第、鄂容安力竭

---

① 《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三，乾隆二十年七月辛丑。

② 《清高宗实录》卷四九四，乾隆二十年八月甲辰。

③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00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四九六，乾隆二十年九月甲戌。

自杀，萨喇尔率兵百余人脱出，至崆吉斯河被宰桑锡克锡尔格所执，送往伊犁拘禁。此时清军定西将军永常率索伦、察哈尔劲兵5800余名驻木垒。反对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准噶尔宰桑扎木参率所部数千人来投，“永常疑其诈，挟宰桑为质，兼程却走”①。乾隆帝命永常派兵接应北路，但他闻知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消息后惊慌失措，竟置北路于不顾，于九月初八日率兵退回巴里坤，复欲退守哈密。永常的怯懦退却，使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日益蔓延开来。

二、清军再克伊犁，平定叛乱

阿睦尔撒纳叛逃之后，乾隆帝于乾隆二十年九月十二日重封准噶尔四部：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旋以永常畏葸怯战，贻误军情，将其革职解京问罪，命副都统策楞为定西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率西路清军于年内剿灭阿睦尔撒纳党羽阿巴噶斯，明年正月进军伊犁；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率北路清军驻扎于形胜之地，遥为声援。乾隆帝认为，冬季进兵较难，但进兵“愈迟缓，则贼党愈固，贼力愈强，办理更费周章”，他批评了达勒当阿、哈达哈等人于“明岁草萌时再行进发”的主张，坚持迅速进兵之议。为此，他令清军在进军途中，用补给缎匹、银两的办法，以疲乏马匹换取厄鲁特蒙古肥壮马匹；鉴于进军路远难于转运，令清军“官兵前进之时，必须因粮于敌，以壮兵力”②。同时，令署陕甘总督方观承、甘肃巡抚吴达善等官员负责粮秣的转运，以保证军粮足敷供应。

阿睦尔撒纳自乌隆古河叛逃之后，原欲回其游牧地，因阿兰泰已将其妻子拿获解京，并将其游牧人众内移，他只得率众南

---

① 《清史稿》卷三一四，《永常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〇〇，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乙亥、甲戌。

下，先至锂格尔、西喇托辉等地，又至博罗塔拉。十二月十七日，前往伊犁坐床。

西路清军兵分两路向伊犁进军：一路由珠勒都斯，一路由博罗布尔噶苏。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参赞大臣玉保率先头部队进抵特克勒河（今新疆特克斯河），阿睦尔撒纳计日可擒。二十八日，先前由策楞派往伊犁招降当地喇嘛的侍卫福昭等送来阿睦尔撒纳已于二十一日被诺尔布台吉擒获的情报："阿睦尔撒纳向哈什处败奔，因被乌鲁特兵截击，复奔至雅木图岭，正在斫冰开道之际，被台吉诺尔（布）、固尔布班贺卓、博什阿哈什、巴图尔乌巴什等追及擒获。"① 玉保以红旗驰报策楞。策楞随即飞章入奏。其实，阿睦尔撒纳被擒纯系子虚。当时清军前锋距阿睦尔撒纳仅一日行程，阿睦尔撒纳见清军来势迅猛，便散布虚假情报以施缓兵之计。玉保、策楞等人不审虚实，信以为真，立即停止进军，静候诺尔布来献俘。达尔党阿正领兵由珠勒都斯前进，策楞亦令其停止。其后，清军诸将又互相推诿，一误再误，以致完全失去追剿阿睦尔撒纳的有利战机。阿睦尔撒纳乘机经和尔郭斯（即霍尔果斯）越库陇癸（今哈萨克斯坦库陇奎山）向西逃入哈萨克牧地。

四月，乾隆帝以轻信阿睦尔撒纳诡计，贻误战机罪，将策楞、玉保撤职查办。五月，他重新调集军队，部署新的军事行动：以达尔党阿补授定西将军，率兵出西路，直入哈萨克，悉力搜捕阿睦尔撒纳；命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率兵出北路，剿灭乌梁海之后，即前往哈萨克，追剿阿睦尔撒纳；命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率兵 1500 人，自巴里坤进驻伊犁，为机动部队。

阿睦尔撒纳逃入哈萨克后，得到哈萨克汗阿布赉的支持。他与阿睦尔撒纳商定，令各游牧凑集兵丁，分路抵御进入哈萨克的清军。七月初三日，达尔党阿率西路清军 1000 人，进抵哈萨克境内之雅尔拉，与阿睦尔撒纳、哈萨克头人霍集伯尔根所率哈萨

---

① 《明清史料》庚编第十本，《策楞等奏折》（移会抄件）。

克兵2000人相遇，大败哈萨克兵，斩570余人，俘11人。清军乘胜追击，至努喇再败逃敌，杀340人，俘10人。阿睦尔撒纳兵败不支，遂改换蓝纛逃走。达尔党阿本该乘胜继续追击，但他却欲行招抚。是月十二日，达尔党阿释放哈萨克俘虏楚鲁克，令其晓谕阿布赉擒献阿睦尔撒纳。二十七日，楚鲁克和被哈达哈释放的昭华什一起回到清军军营，禀称阿布赉"恳求大皇帝开一面之网，全伊一命"，"如必责令擒献，岂敢抗违，请再予限十五日，我等星夜驰回，即将阿睦尔撒纳擒献，不敢欺罔"①。达尔党阿虽然不准其为阿睦尔撒纳请命，但由于停兵招抚而丧失了有利战机。当时达尔党阿与阿睦尔撒纳"前后相距不过里许"②，达尔党阿为敌人所欺骗，竟"下令不许众兵前进"③，致使阿睦尔撒纳得以易服潜遁，先逃往呢雅斯图山中，后逃回阿布赉的老营。与此同时，哈萨克汗阿布赉率兵千余，自巴颜山西行，欲声援阿睦尔撒纳，途中被北路清军击败。清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从俘虏口中得知"阿布赉所在，故意迟回，不即掩获，迨已逸去，始勒兵追蹑其后"④，同样丧失了歼敌良机。两路清军会师后，达尔党阿和哈达哈仍不以追歼逃敌为念，"竟于初见之次日，即分营行走。至第三日，即议及撤兵"⑤，再次坐失战机。

由于清政府连年对准噶尔用兵，并令喀尔喀和归附的厄鲁特人随征，一再征丁征马，人民不堪其累；喀尔喀和厄鲁特一些上层人物见达尔党阿、哈达哈等清军将领指挥无能，屡屡受骗，顿生轻视之心，所以反清叛乱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喀尔喀郡王、副将军青滚杂卜叛乱的影响尤大。早在清军征讨达瓦齐之时，青滚杂卜见阿睦尔撒纳"潜蓄叛志，亦隐有二心"⑥，遂与之勾结。将军班第等密参阿睦尔撒纳时，他竟私行泄漏消息，后因不满清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二〇，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乙亥。

②④ 《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三，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乙酉。

③⑤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五，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丁亥。

⑥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三十，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壬子。

廷以放走阿睦尔撒纳的罪名将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赐死"，遂自军营私自逃回其游牧地，尽撤其所设台站卡座，并煽惑喀尔喀一并撤驿，致使北路台站从十台至二十六台全部瘫痪，联络中断。乾隆二十一年十月，辉特部汗巴雅尔和哈萨克头人锡喇、尼玛、莽噶里克、扎那噶尔布等相继发动叛乱。十一月初六日，奉命率兵前往擒拿巴雅尔的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在辟展（今鄯善）被尼玛、莽噶里克等包围，力尽遇害，准噶尔全部又陷入纷乱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喀尔喀问题。八月，乾隆帝授亲王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带兵前往和托辉特；以"天时渐寒，马力亦恐疲乏"① 为由，命西、北两路清军暂停深入哈萨克，达尔党阿、哈达哈将厄鲁特兵遣回各游牧处，以轻骑兵由阿尔泰速往喀尔喀，会同成衮扎布，平定青滚杂卜叛乱，安抚喀尔喀各部。同时，派兵至乌里雅苏台，接续各台站。参赞大臣纳木扎勒率索伦兵追捕青滚杂卜，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与俄罗斯交界处的杭哈奖噶斯地方，将其擒获，槛送京师。

针对准噶尔的混乱局面，乾隆帝密谕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所属驻防伊犁兵丁撤回巴里坤，并调索伦兵 2000 名，察哈尔、吉林、阿拉善旗兵 2500 名，及安西绿营兵 2000 名前往巴里坤，以稳固西路清军要地。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伊犁办事大臣兆惠遵旨率所部 1500 余人，自济尔哈朗河撤退，转战而南，先后在鄂垒扎拉图、库图齐、达勒齐等地与厄鲁特叛军作战，歼敌千余人。次年正月初五日，退至乌鲁木齐。绰罗斯汗噶尔藏多尔济联合哈萨克头人锡喇、尼玛等部叛军围攻兆惠。清军在冰雪泥水中且战且走，苦战近 20 日，始至特纳格（今新疆阜康），此时清军官兵皆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难于继续作战，只得"结营自固"②。在此之前，侍卫图伦楚率兵 800 名自巴里坤前来接应兆惠，经过一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一八，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戊申。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

个月的苦战，于正月二十九日夜与兆惠会合。二月二十三日，兆惠与图伦楚率部回至巴里坤。

阿睦尔撒纳乘准噶尔部境内变乱四起之机，于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末从哈萨克窜回准噶尔地区。次年二月，他与参加叛乱的厄鲁特各部台吉、宰桑会盟于博罗塔拉，自立为总台吉。他网罗党羽，收集残部，企图与青滚杂卜会合后，共同反清。但是，不久他即得到青滚杂卜已被清军擒获的消息，只得又逃回哈萨克。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正月，乾隆帝调整部署，调部队赴巴里坤集结，准备再次向准噶尔进军：改授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率兵出北路；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和参赞大臣富德，率兵出西路。三月十一日，成衮扎布、兆惠等率 7000 名大军，由巴里坤起程，一由珠勒都斯北进，一由额琳哈毕尔噶西进。此时准噶尔叛军由于各部互相攻杀，力量大为削弱。先是四月初一日扎那噶尔布袭杀其叔噶尔藏多尔济，随即往博罗塔拉坐台吉床。尼玛又欲害扎那噶尔布，往迎阿睦尔撒纳管理准噶尔地方。阿睦尔撒纳因与哈萨克不睦，又回到准噶尔抢掠扎那噶尔布游牧地，适遇富德率军追袭，他不敢抵抗，望风而逃。鉴于上述情况，乾隆帝批评成衮扎布准备办理回部事务的主张是不知轻重缓急，他提出以先剿擒阿睦尔撒纳为要务的方略，命两路清军克期会合，并力擒获阿睦尔撒纳。

阿睦尔撒纳率众先逃至巴尔达穆游牧地，纠合叛军数百人，逃往额布克特山驻守。参赞大臣富德得讯，即率兵往追。五月初一日，清军追至额布克特山时，阿睦尔撒纳已经逃遁。清军分兵追击，经塔尔巴哈台，深入哈萨克境。五月三十日，追至爱登苏，击败哈萨克汗阿布赉部骑兵。六月初三日，清军俘获了助阿睦尔撒纳叛乱的辉特部汗巴雅尔。当日，阿布赉的使者至军营献马请罪，表示“倘阿贼入我境，必行擒送”①。初七日，阿布赉在爱呼斯河（今哈萨克斯坦爱古斯河）向清使递交表文，愿以哈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

萨克全部归顺，并遣使入觐，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国。这为彻底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六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率领20人逃至阿尔察图，投奔哈萨克汗阿布赉。阿布赉不动声色，约以明日早上相见，而暗中却派人“先散其马匹牲只”①，准备将其擒献清廷。阿睦尔撒纳有所察觉，带领妻子、亲信8人乘夜暗逃离，渡过额尔齐斯河，于俄历7月28日逃到俄罗斯境内的塞米巴拉特要塞。

沙皇俄国对中国的准噶尔部早就怀有野心，阿睦尔撒纳叛清后，沙俄当局曾多次写信诱其归顺俄国，在1757年1月6日的一封信中说：“凡是准噶尔地方之人，即使宰桑，如若率出其属下之众，前来投诚我俄罗斯，则予以接受。”② 阿睦尔撒纳为了能与清廷对抗，也急欲寻求沙俄的支持。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冬，阿睦尔撒纳曾派遣宰桑达瓦赴圣彼得堡，向沙俄表示，“愿意服从俄国女皇的旨意，……请求俄国政府在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之间地区修建要塞，以防满洲人。他还请求俄国当局协助，使卫拉特人承认他为汗，并服从他的旨意”③。当时俄国由于正在欧洲同普鲁士进行战争而自顾不暇，并慑于清政府的强大，因而没有满足阿睦尔撒纳的全部要求，仅答应他一旦失败，“可以带一批数量不大的随从人员在俄国安全避难”④。所以，阿睦尔撒纳在叛乱失败之后，既为清军所追捕，又不见容于哈萨克，就逃入俄国请求加入俄国国籍。沙俄把阿睦尔撒纳当作向准噶尔扩张的资本，西伯利亚副总督格拉勃连夫在托博尔斯克接见了他，并给予优待和保护。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辰。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档》，乾隆二十八年七、八月，139函，《俄罗斯边界处致阿睦尔撒纳等书信》。

③ 伊·亚·兹特拉金：《俄国档案材料记载中有关阿睦尔撒纳的情况》，见《蒙古民族的语文与历史》第310页，莫斯科1958年版。

④ 伊·亚·兹特拉金：《准噶尔汗国史》，第458页。

在得知阿睦尔撒纳逃入俄国以后，清廷内部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意见不一，有人担心“饬索过严，以致又启边衅”，因而“迁就隐忍，苟且自安”①，甚至有人主张放弃伊犁，“直欲退守玉门关”②。乾隆帝断然否定了这些错误的意见。他认为：“阿睦尔撒纳实为悖逆之渠魁……将来必不能久甘穷困，势必滋生事端，为患边境。是逆贼一日不获，西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③他尤其担心，如果让阿睦尔撒纳留在俄国，“必将为其所用，以为哈萨克一带之患”④。因此，乾隆帝令理藩院发文照会沙俄政府，要求俄国“遵照原定不匿逃犯之条”⑤，把阿睦尔撒纳交还中国。与此同时，又谕令加强北部边防，以防阿睦尔撒纳利用沙俄的力量侵扰边境。

沙俄政府先是捏造谎言，掩盖其容留阿睦尔撒纳的真相。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俄历9月21日），阿睦尔撒纳因患天花病死，沙俄政府仍对清政府封锁消息，在清政府的一再交涉之下，才于次年正月初七日正式通报阿睦尔撒纳的死讯，并请中方派人至边境验尸。清政府派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和侍郎三泰前往恰克图验尸，确认阿睦尔撒纳已死无疑，乾隆帝认为“准噶尔全局自可以告厥成功”⑥。至此，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基本平定。

第三节　战争胜利的原因

阿睦尔撒纳的败死，标志着准噶尔分裂割据势力的失败和平叛战争的胜利结束。乾隆朝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是康熙、雍正两朝对准噶尔战争的延续，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代价是

---

①④ 《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壬子。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始末》，第79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七，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丙辰。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七，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己酉。

⑥ 《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午。

巨大的。但是，这场战争消灭了准噶尔分裂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巩固了西北部边防，促进了西北地区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打击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图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平叛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

首先，是战争的正义性，得道多助。我国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是历史的大趋势，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准噶尔部上层贵族为了一己的私利，搞分裂割据，挑起战乱，甚至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是不得人心的。清政府进行平叛战争，符合包括厄鲁特蒙古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因而受到他们的欢迎和支持。

其次，经济发展，国力雄厚。对准噶尔战争之所以进行了数十年之久，与清政府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康熙、雍正两朝，虽然取得了乌兰布通之战、昭莫多之战和额尔德尼昭之战等数次作战的胜利，给准噶尔贵族以沉重打击，但也只能阻遏其入侵，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到了乾隆朝，由于经济的发展，为平叛战争提供了物质保证，使清朝政府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投入极大的兵力和财力，两次深入准噶尔地区作战，彻底铲除了准噶尔割据势力。

第三，因情用兵，策略得当。前期对准噶尔战争，康熙帝根据准噶尔地处荒漠、辽阔遥远，“我师往则我劳，贼师来则贼困”的客观情况，确定了“严兵诱致邀击”的方略。康熙、雍正两朝，遵照这一方略，曾多次予敌以重创。后期平叛战争，乾隆帝则根据当时清朝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实力大增和准噶尔内乱不已、众叛亲离、纷纷归附清朝的现实，把握住历史的机遇，制定了以武力平定准噶尔的总方针，以及长驱直入、直捣伊犁的用兵方略，一举取得平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第四，认真周密的战争准备。对准噶尔部的战争，主要在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由于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多高山、沙漠、荒原，气候严寒多变，交通不便，后勤补给极为困难。因此，清

廷极为重视战争的准备工作，认为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每战都有针对性地进行周密细致的战前准备。在这方面，康熙帝尤为突出，他通过各种办法，征集马匹，调运物资，储备粮饷，安设驿站，从而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乾隆帝对战前准备工作也是重视的，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时，他汲取平定达瓦齐战争的教训，一再强调调运军粮的重要性，他说："军营粮饷，关系紧要，理应加意办理。"① 又说："军营进剿官兵，所需口粮，甚关紧要。"② 他调派高级官员承办此事，从陕甘向巴里坤运送了大量粮食。军队边前进边留驻绿营兵丁屯垦，并招募维吾尔农民垦荒种地，对解决军粮也起了一定作用。这也是平叛战争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

乾隆帝对平叛战争的指导，固然有许多成功之处，但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如平定达瓦齐时，乾隆帝对战争前景过于乐观，认为通过"因粮于敌"在敌境筹粮的办法就可以解决清军的粮饷供给，忽视了粮食的筹集和向前线输送，结果清军在进军途中就已出现粮秣不足的情况，到了伊犁也无粮可筹："伊犁河北，从前原有存贮米粮缎匹等物，上年为哈萨克抢掠，所余马匹牲畜，俱经达瓦齐携往特克斯地方。厄鲁特、回人等，生计艰难，不足以供应大兵口粮。"③ 由于缺粮，清军被迫从伊犁撤军，留驻的500名清军根本无法应付突发事件，以至阿睦尔撒纳叛乱以后，形势急剧恶化。又如，利用招抚，分化瓦解敌人，本来是清军在对准战争中的一条成功经验，在第一次进军伊犁时，乾隆帝充分利用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部的影响，让其率领旧部先行，进军异常顺利。但在第二次进军伊犁中，他却改变了分化敌人的策略。乾隆二十一年冬，由于辉特汗巴雅尔等人叛乱和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被害，乾隆帝降旨严行惩治："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〇一，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丁亥。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〇一，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己亥。

③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九，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子。

应尽行剿灭。”甚至对尚无叛迹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也密谕雅尔哈善：“倘稍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① 这样，一方面造成了滥杀无辜的错误，一方面把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推到了叛军营垒，增加了平叛的困难。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二七，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辰。

第十四章　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的战争

（见附图 16）

第一节　准噶尔贵族对回部的统治

清代称伊斯兰教为“回教”。天山南路，即今新疆南部，聚居着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故清代称天山南路维吾尔族聚居地区为“回疆”、“回部”。

天山南路在元代为察合台汗国之一部，元太祖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裔世主其地。明末清初之时，元太祖十九世孙阿布杜勒为叶尔羌汗国汗王，驻叶尔羌城（今莎车），其诸弟则分管吐鲁番、哈密、阿克苏、库车、和阗（今和田）、喀喇沙尔（今焉耆）、乌什、喀什噶尔（今喀什）等城。他们各据一地，割据称雄，争斗不已，致使察合台后裔的势力大为衰弱。他们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不得不借助、依靠越来越大的宗教势力。察合台后裔原本信奉佛教，这时已皈依伊斯兰教。原来在明朝末年，有个叫玛赫杜姆·艾札木的人，从撒马尔罕（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到喀什噶尔传布伊斯兰教。据说他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二十六世孙，自称“和卓”，意即“圣裔”，所以很受尊重，“回部以为贵种，所至辄拥戴之”①。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伊斯兰教分化为白山、黑山两个派别，玛赫杜姆之子依敏（一称伊善·喀兰）和伊萨克·瓦力各为一派的领袖。这两个派别各自支持割据称雄的察合台后裔，成为两个势不两立的宗教派别。清初，黑山

---

① 《回部政俗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第 109 页。

派取得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的统治权，把白山派领袖阿帕克和卓驱逐出境。阿帕克和卓由克什米尔逃到西藏，投奔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利用其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影响，命噶尔丹帮助阿帕克和卓。噶尔丹早就觊觎南疆的土地，遂乘机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进兵南疆，在白山派教徒的配合下，占领了叶尔羌，"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回部及哈萨克皆为其属"①。噶尔丹灭了叶尔羌汗国，立阿帕克和卓为王，"使总理回地各城"，"为准噶尔办理回务"②。其实，阿帕克不过是噶尔丹的代理人，回疆真正的统治者是准噶尔贵族。

准噶尔贵族派出准噶尔人分驻南疆各城，对维吾尔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维吾尔人成为准噶尔贵族的"阿拉巴图"（属民，服役者，纳赋者），要承担沉重的贡赋。赋税种类繁多，有人头税、地税、果税、商贾牧养税、金银税、牲口税、贸易税、草木税、水利税等等。各项赋税，皆有定额，其数极重。如噶尔丹策零时，叶尔羌地区3万余户10万余口，每年要缴纳10万腾格（每腾格合银1两）。喀什噶尔地区，1.6万户，每年要缴纳6.7万腾格。每年秋收之后，维吾尔族农民要把当年收成的三四成甚至一半以上交税。准噶尔贵族派出的征税人还要借机敲诈勒索。大量维吾尔人被强行迁移至伊犁，为准噶尔贵族耕种田亩和服各种劳役。许多回部贵族和宗教首领被拘禁于伊犁，作为人质。

维吾尔族人民不堪重负，渴望尽快摆脱准噶尔贵族的统治。

第二节　大小和卓的叛乱

大和卓布拉呢敦和小和卓霍集占系玛赫杜姆·艾札木的后裔。

---

①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定回疆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2页。

② 七十一（椿园）：《西域闻见录》卷六，《布拉呢敦霍集占叛亡纪略》，清钞本。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进兵南疆，先后攻占叶尔羌、喀什噶尔，击败黑山派和白山派。战后，大小和卓兄弟及其父白山派首领玛罕木特被拘执于伊犁为人质。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直捣伊犁，征服了达瓦齐割据势力。饱受准噶尔贵族统治之苦的维吾尔人获得解放，纷纷投归清军。四月初八日，大小和卓兄弟向清军投顺，说："策妄阿喇（拉）布坦时，将我父缚来为质，至今并不将我等放回，我等情愿带领属下三十余户投降大皇帝为臣仆。"① 根据乾隆帝的谕旨，大小和卓兄弟将赴北京入觐，但是不久，应阿克苏阿奇木伯克阿卜都伯克的要求，定北将军班第等奏派大和卓布拉呢敦回南疆招抚叶尔羌、喀什噶尔回众，侍卫托伦泰与之同行，俟事竣后再赴京入觐，而小和卓霍集占则留在伊犁掌管伊斯兰教事务。布拉呢敦率厄鲁特兵1000名、清军400名以及在伊犁的维吾尔人，在乌什击败黑山派，乘胜进占喀什噶尔和叶尔羌，控制了天山南路。八月，已归附清廷的阿睦尔撒纳举兵反清，留在伊犁的小和卓霍集占率众参与叛乱，与清军作战。乾隆二十一年三月，清军重占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霍集占见阿睦尔撒纳失利，遂率众于五月逃回南疆，与其兄布拉呢敦会合。

其时，清廷重点在于以武力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对于回部主要是采取政治招抚，"但令其将每年贡赋照数交纳，毋庸加以兵威"②。为了争取大小和卓等回部上层贵族的合作，对霍集占参与阿睦尔撒纳叛乱一事亦不予追究。

大小和卓兄弟对清廷的招抚，反应不一。大和卓布拉呢敦想到自己靠清廷之力摆脱了准噶尔贵族的羁押，复回故土，恩不可负，因此"欲安集回地各城，听候大皇帝谕旨"③。此议却遭到

---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二四，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丙子，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 七十一（椿园）：《西域闻见录》卷六，《布拉呢敦霍集占叛亡纪略》。

小和卓霍集占的反对，他煽惑布拉呢敦说："若听大皇帝谕旨，你我二人中必有一人唤到北京以为质，当与禁锢何异？莫若与中国抗拒，地方险远，内地兵不能即来，来亦率皆疲惫，粮运难继，料无奈我何。且准噶尔已灭，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①。布拉呢敦为其所动，遂与霍集占一起走上了割据分裂、反清叛乱之路。霍集占自立为巴图尔汗，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号召大家去反对"异教徒"。他传檄回疆各地，"集士马峙糗粮器械以待"②。在霍集占等人的煽惑和胁迫下，南疆各地大都起而响应，惟库车、拜城、阿克苏三城的阿奇木伯克（即城主）反对霍集占叛乱，库车城阿奇木伯克鄂对亲赴伊犁向清军报信。霍集占竟将鄂对等人的亲族尽加残害。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受命赴南疆招抚回众并探听侍卫托伦泰信息的副都统阿敏道，率清军百名、厄鲁特兵3000名，到达为霍集占亲信占据的库车城下。阿敏道为示以诚信，答应叛乱分子的条件，仅率清军百名入城，结果被软禁城中。开始，霍集占还在徘徊观望，他说："大国使臣，不可伤害，留候布鲁特信息。若不能取胜，则仍有用处。"③ 到次年三月，霍集占利令智昏，准备杀害阿敏道。阿敏道得维吾尔人报信，逃出库车城，但又被叛军追上。大小和卓兄弟将阿敏道和清军百余人尽行杀害，正式与清政府决裂，公开打出了反清叛乱的旗帜。

第三节　库车之战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阿睦尔撒纳败亡俄国，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于是，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开始提到清廷的议事日程上来。

---

① 和宁：《回疆通志》卷十二。

②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定回疆记》，第163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六，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乙酉。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宣谕回部，公布大小和卓兄弟罪状，申明发兵征讨的原因："布拉呢敦、霍集占兄弟，在噶尔丹策零时，被拘于阿巴噶斯、哈丹鄂拓克。我兵初定伊犁，释其囚絷，令为回人头目。方欲加恩锡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鲁特变乱，率伊犁回人逃往叶尔羌、喀什噶尔。朕以其或惧厄鲁特骚扰，暂避以图休息，尚未加兵，第遣使招抚。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称巴图尔汗，情尤可恶。若不擒获正法，则回众终不得安生。用是特发大兵，声罪致讨。"乾隆帝还阐述了平叛的方针、政策，以分化叛军，解除维吾尔群众的顾虑："但闻霍集占起意倡乱，布拉呢敦被迫从行，已命分别办理。夫伊等以兄弟至亲，朕尚较其情罪轻重，期无枉抑，何况尔等回众，全无干涉，岂有株连扰害之理？惟是霍集占颇称奸狡，自知身犯重辟，或图苟延残喘，造言惑众，以厄鲁特多被剿杀为比，殊不思尔等皆无罪之人，朕何忍与叛逆之徒一体诛戮。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尔等若将霍集占缚献，自必安居如旧，永受殊恩。如执迷不悟，听从逆酋指使，大兵所至，即不复分善恶，悉行剿除，悔之何及。尚其熟思利害，毋自贻误。"①

二月，乾隆帝以兵部尚书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额敏和卓、哈宁阿为参赞大臣，顺德讷、爱隆阿、玉素卜为领队大臣，率清军万余人，征讨霍集占叛军，并谕示用兵机宜："如回人果能恭顺归降，自当收恤，令其头目从军，余人仍居本地；其稍有抗拒者，即宜剿杀。"②

雅尔哈善率清军自吐鲁番西进，库车城阿奇木伯克鄂对等率部属随行。五月初七日，清军进至库车城下。库车为南疆门户，地处交通要道，依山傍河，城墙用柳条、沙土筑成，高大坚固。霍集占早就派其心腹阿布都克勒木率千余精锐骑兵在城内坚守。叛军人数虽少，但善于守城。清军四面围城，架云梯猛攻，城上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癸丑。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三，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己未。

枪石如雨，围攻两日不克。用炮轰击亦因所携威远炮威力不足而难奏效，明朝铸造的4尊大炮更因年代久远以致炮身炸裂。强攻不成，雅尔哈善欲设计诱敌出城野战。十七、十八两日，以维吾尔人300名伪装来援叛军，令绿营兵与其交战，八旗兵埋伏于要隘。此计不成，又一面诱敌，一面攻城，但城内叛军始终闭城不出。雅尔哈善屯兵坚城之下，无计可施，决定多造云梯，再实施强攻。

小和卓霍集占得知清军围攻库车城，即自叶尔羌亲率从各城征调的兵马3000人，自沙雅尔（今沙雅）越过阿克苏戈壁，取捷径赴援。六月十五日，清军于城南托和鼐截击，歼其前队大半。十六日，在城外鄂根河又歼敌一部。霍集占率残部800人夺路入城。十八日，霍集占出城寻战，作战失利，被杀者200余人，溺水死者约1600余人。清军缴获霍集占大纛两杆，雅尔哈善始知来援者为霍集占。

考虑到霍集占援兵被歼后必不甘于困守孤城的情况，鄂对向雅尔哈善提出伏兵要地、断敌退路、防其突围的建议，他说："语云：'困兽犹斗。'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尽，必不坐而待缚。其必乘我不备以兔脱之，返其巢穴，整兵复来，其事未可量也。今城西渭干爱曼，水浅可涉，又有北山口要路通戈壁，走阿克苏，若于二路各伏兵一千，则贼酋成擒矣。"① 雅尔哈善是一书生，本不知兵，却又自以为是，对鄂对的建议置之不理，只是下令攻城。一个在城下牧马的索伦老兵向雅尔哈善报告，城中叛军的骆驼叫声高且健，似负重状，可能要逃跑。雅尔哈善不但不听，反而嘲笑老兵无知，继续下棋饮酒如故，全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二十三日三更，霍集占率400人出库车西门，渡过鄂根河后，挑选精骑百余，由戈壁逃走。当霍集占出逃时，驻西门的清军副都统顺德讷闻报后竟按兵不动，直至天晓才派出百人追击，

---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平定回部本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9页。

但为时已晚。

雅尔哈善为逃避霍集占逃脱的罪责，令清军急攻坚城，并采纳提督马得胜的建议，从城北一里外开挖地道。清军昼夜挖掘，不意挖至距城只2丈余，地道将成时，因灯光暴露为敌发觉。七月十七日夜，叛军潜出城外，于离城10余丈处横开一沟，填柴放火，数百名清军尽毙于地道中。雅尔哈善“咄嗟无他策，惟严守之，待其自毙”①。

乾隆帝因雅尔哈善、顺德讷屡屡失机将二人革职，命兆惠就近前往库车一带办理回务。

其实此时库车城内叛军已岌岌可危，人数不多，死心塌地跟随大小和卓叛乱的，仅阿布都克勒木等极少数人，经清军三个月围困，粮食匮乏，难以继续坚守。八月初六日夜，阿布都克勒木率四五十骑乘夜突围西走。天亮以后，城内所余3000余老弱百姓开门投降。清军所得，不过一空城而已。

库车之战，暴露了清军将领的怯懦无能。库车城虽坚，但叛军兵力比清军少得多，且维吾尔族人民对大小和卓的统治不满，大小和卓兄弟之间又有矛盾，因此，清军攻占库车，并非难事。然而，此战清军“以八九千官兵，驻守三月之久，俟贼首逃去，城中穷蹙出降，始得其城”，则完全是统率雅尔哈善指挥失误造成的。乾隆帝对雅尔哈善在此战中的表现非常不满，他颁发上谕指出：“数月以来，（雅尔哈善）惟事坐守军营，老师糜饷，直待贼人兔脱鼠窜，相率尽出，而后得一空城以报命。且忝为大帅，不能身先士卒，致一切措置迟误，尽以委之他人，初无一语引罪，但知高坐帐中，以邮符奏报自任。若代他人传述者，则虽刍灵木偶，皆可胜任，何必复简用将军为哉？今虽得库车，而城中所存，率系饥疲残废，转须为之养赡，即得城亦复何用？”② 因此，雅尔哈善被革职拿问，于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在北京正法。

---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平定回部本末》，第149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九，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己卯。

第四节　黑水营之战

霍集占从库车突围后，先逃至阿克苏，当地回人"闭城拒敌"①，惟伯克阿布萨塔尔率城外数百户随其西逃；继至乌什，乌什伯克霍集斯亦闭城不纳，霍集占只得继续逃跑，3000余叛军"俱甚困惫，有毁弃军器、宰杀马驼者，怨声载道"②。最后，霍集占经喀什噶尔、雅普尔噶等地逃回叶尔羌。布拉呢敦"深怨霍集占妄动，定约各守一城，相为声援"③。于是布拉呢敦率领马步万余人，在离喀什噶尔一站之地的当噶勒齐驻守，霍集占则率众入驻叶尔羌城。

对于用兵回部，乾隆帝从一开始就认为可以计日成功。尽管清军久攻库车不下，他仍于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定下决心："今年断不撤兵，且必于今冬竣事。"④ 清军占领库车后，阿克苏、乌什、和阗等地相继迎降，乾隆帝更是信心百倍，认为"回部诸城，自必闻风归顺，逆贼不日就擒"⑤。为此，他多次谕令定边将军兆惠率兵迅速南下。在乾隆帝的催促下，兆惠于八月初九日仅率800人自伊犁启程南下，抵达阿克苏后，不待清军齐集，即率马步4000余名向叶尔羌进军。乾隆帝认为回部计日可定，不必多烦兵力，因此他停止向南疆续派清军，并命原派往南疆的喀尔喀兵、厄鲁特兵各回其游牧地。这样，无形中就给兆惠和他率领的4000余名清军造成了异常困难的局面。

十月初，兆惠率师进抵叶尔羌城下。此时霍集占为防清军来攻，已采取坚壁清野之策，将叶尔羌城周围村庄民房烧毁，民户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〇，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丙申。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癸亥。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四，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子。

④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九，乾隆二十三年八月甲戌。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一，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庚戌。

和粮草等尽移入城内。城东北五六里处，建有高台一座，台前及近城之处俱挖掘大坎，坎下设伏兵。初六日，兆惠派出清军2000名，向城外之敌进攻：左右翼诱敌，自率中军向前冲击，副都统温布率兵夺占高台。在击败坎内敌之伏兵以后，清军跃过大坎追击逃敌，直至城下。叛军近千名骑兵分从二个城门冲出，清军奋勇迎战，迫使敌兵退入城中。

叶尔羌城大而坚，周10余里，共有12个城门。兆惠部清军仅4000余人，又经长途跋涉，人马俱已疲乏，难以对敌形成合围。为防城内叛军出逃，兆惠将攻城清军撤回，派兵一部于痕都斯坦、巴达克山、土默特等处驻守，截断其去路；派副都统爱隆阿等率兵800名，驻守喀什噶尔与叶尔羌间之要地，堵截布拉呢敦由喀什噶尔来援之兵，并巡查台站，保护清军后路；兆惠亲率主力扎大营于叶尔羌河东岸有水草之处。叶尔羌河又称喀喇乌苏，意即黑水，故兆惠大营有"黑水营"之称。兆惠从俘虏口中得知霍集占的牧群在城南英峨奇盘山，欲夺取叛军牲畜以充军实，遂于十月十三日率军千余名往攻。至通古斯鲁克地方，叛军阻河为阵，兆惠率兵夺桥渡河。不料，刚刚渡过400人，桥忽然断折，清军被分为两部。霍集占乘机派5000余骑兵在前，万余步兵继后，从城中冲出寻战。兆惠立即安营，指挥尚未渡河的五六百名骑兵迎击叛军，清军官兵齐声呼噪，冲入敌阵鏖战。叛军进攻受阻，骑兵先是败走，后在步兵的支持下，由正面攻击改为两翼包抄，四面合围。清军陷入叛军重围之中，而已渡过河的400余清军隔河不能相救，只得"且战且退，浮水还营"①。在撤退途中，清军被叛军分割为数段，只得人自为战，奋勇杀敌。至当日日暮，歼敌千余，但自己也损失惨重，总兵高天喜、侍卫鄂实、侍卫特通额、副都统三格等百余人阵亡，数百人受伤，兆惠面部和小腿部受伤，坐骑两匹俱中枪倒毙。次日起，叛军猛攻黑水营，激烈的战斗持续了5昼夜。因众寡悬殊，缺少马匹，兆

①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记》，第164页。

惠只得放弃整体突围的企图，一面派人持告急文书分散突围到阿克苏向头等侍卫舒赫德求援，一面掘壕结寨，固守大营。叛军亦筑垒与之相持。

十月十三日，亦即兆惠军被叛军围困于黑水营的同一天，靖逆将军纳木扎勒、参赞大臣三泰等率骑兵200余名，前往兆惠大营。当日夜四鼓，突遇叛军3000余人，仓猝对敌，众寡不敌，全军覆没。

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五日，阿克苏办事头等侍卫舒赫德接到兆惠先后发出的两封告急文书，飞章入告。乾隆帝得报后，即授参赞大臣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阿里衮、爱隆阿、福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令其调集兵力，火速前往，“惟应援兆惠为要”。同时，又指示兆惠：“此时惟坚守以待援师会合，回至阿克苏，整顿兵马，再图大举。”① 针对兆惠“轻敌妄进”、“罪实难逭”的自责，乾隆帝赞扬他“尚为有进无退之良将”，晋封其为武毅谋勇一等公，一方面承认，“向来之轻视逆回，乃朕之误，又何忍以妄进轻敌为兆惠之责乎”②。

兆惠被围后不久，大和卓布拉呢敦即亲率步骑5000余从喀什噶尔赶来，与小和卓霍集占部会合，使叶尔羌叛军的兵力达到2万人。兆惠部清军仅3000多人，不但兵力十分悬殊，而且壕浅垒低，防护作用不足，清军官兵虽“处危地”，但战斗意志非常顽强，“皆死中求生，故杀贼甚力”③。尽管叛军用各种办法围攻，皆不能得逞。十月二十二日，叛军从上游决水冲灌清军营垒，清军即挖渠排水入河下流，其水转资官兵饮用，且其后随时挖地掘井皆可得水。此计不成，叛军又以苇扫蔽体来犯，清军即用火焚烧；叛军挖交通壕伏身前进，清军即登高将其击退。叛军无法，又立高台，四面都有垛口，从高处用鸟枪射击，清军也立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四，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丁酉。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五，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甲辰。

③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平定回部始末》，第150页。

高台，与之相对，并乘敌懈怠不备之时，出兵击敌，反而使叛军不敢再登台攻击。

清军被围，粮食、弹药均感不足。兆惠派兵掘地，获粮窖20余处，军粮稍得补充。营地周围林木甚多，叛军鸟枪射出的弹丸多留于树木枝叶间，清军每伐一树，可得弹丸数升，用以击敌，弹药不足的困难亦有所缓解。

十一月上旬，布鲁特（柯尔克孜）人进攻喀什噶尔所属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城，布拉呢敦和霍集占怀疑这是布鲁特人按照与兆惠预先达成的协议为配合清军突围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因而十分惊恐。十一日，布拉呢敦遣人向兆惠求和，称："霍集占抗拒时，布拉呢敦本不知情，今奉书请和，愿助口粮，并求亲信人同行入觐。"① 兆惠扣留来使，用箭把书信射入敌营，令布拉呢敦遵照乾隆帝的谕旨，擒献霍集占。布拉呢敦不从，兆惠遂于是月十六日和十二月初九日两次派兵主动出击，焚烧敌营。在清军的打击下，霍集占只是围而不攻，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十一月初十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得知兆惠被围的消息后，即于乌鲁木齐率兵5000名，启程南下，冒雪赴援。十二月初四日，参赞大臣舒赫德也率兵3500名，马1700余匹，从阿克苏出发救援兆惠。十二月二十五日，富德、舒赫德两部于巴尔楚克（今巴楚东南）会师，不顾劳累，即整兵前进。霍集占闻讯，急忙率兵前来阻截。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富德等进抵呼尔璊，霍集占率骑兵5000迎战。清军因长途行军马匹大量倒毙，此时战马甚少，遂排列枪炮和善射步兵对敌，从上午巳时至下午申时，接战十余次，击毙叛军巴图鲁、大伯克数十名，并重伤大和卓布拉呢敦。次日晨，富德率兵出发，进入戈壁之中，又遭叛军攻击，清军一边战斗，一边艰难地徒步前进，因无水可饮，只得吞咽冰块解渴。初九日夜，抵达沁达尔，距兆惠黑水营尚有300里，人马俱已疲惫不堪，面对优势敌人的围攻，几乎无力还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八二，乾隆二十四年三月甲申。

击，更无法前进，陷入了异常危急的境地。适值参赞大臣阿里衮率兵600人，解送马2000匹、驼1000头，赶到附近，遂与先前受兆惠派遣扼守喀什噶尔来路的参赞大臣爱隆阿部会合，前来救援。援军在一片呼噪声中直扑叛军营垒，富德、舒赫德乘势挥军冲杀。霍集占见突然杀出一路清军援兵，不知虚实，不敢蛮战，慌忙撤兵逃走。清军奋力追歼逃敌，至初十日黎明始收兵回营。至此，富德等部清军与叛军激战四昼夜，杀敌千余名，伤敌无数。

在富德与霍集占在呼尔璊等处苦战期间，被困于黑水营的兆惠见围敌日渐减少，正月初八日又遥闻北方数十里外有枪炮之声，判断援兵已到，即乘夜制造云梯，分两路冲击突围，并遣人与援兵联系，约期会剿。富德接到兆惠咨文后，于十三日夜率兵赴援，次日黎明与敌接战，兆惠与之配合，内外夹攻，终于突破叛军重围，合军一处，迫使霍集占率叛军败退叶尔羌城，黑水营之战胜利结束。

第五节　大小和卓的最后覆灭

黑水营解围之后，兆惠、富德鉴于部队过于疲惫，又缺马无粮，率部撤回阿克苏休整，并催调兵马粮饷军械，以备再战。兆惠认为，霍集占兄弟拥兵数万，分守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城互相救应，而叶尔羌城大，“兵少则不足以攻城略地，须得马步兵二万人，马兵较多更善”①。为此，他提出驻兵阿克苏候马驼粮饷，富德率兵一部援和阗，然后由阿克苏、和阗两路进兵，合攻叶尔羌。但乾隆帝却认为，现在后续部队和大量军用物资正源源转运，兆惠等应于叶尔羌附近有城之地驻营，“少为休息，俟厚集其势，可以一举竣事”②。因此，当他获悉兆惠匆匆撤回阿克苏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六九，乾隆二十四年二月戊寅。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八一，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庚午。

后非常不满，责其周章退缩；对于两路进兵合攻叶尔羌的用兵方略，则认为未筹及喀什噶尔的缺点，故指示兆惠等分兵攻取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后因和阗告急，又令富德率兵先援和阗，然后从和阗进攻叶尔羌。

兆惠在乾隆二十三年进军叶尔羌时，曾令侍卫齐凌扎布率数百名绿营兵与伯克鄂对前往和阗招抚。次年正月下旬，兆惠于返回阿克苏途中，与参赞大臣巴禄等所率援军会合，知霍集占派兵侵犯和阗，该处清军待援甚急，遂令副都统瑚尔起率兵900名赴援，随后又遵乾隆帝之命，令副将军富德率军援和阗。四月二十二日，富德率兵抵和阗之额里齐城，此时被霍集占叛军攻陷的和阗六城已为瑚尔起收复，六城伯克及维吾尔民众数千人携壶浆跪迎于道。

六月初，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清军拟兵分两路，向大小和卓兄弟大举进攻：初二日，富德率1.5万人从和阗攻叶尔羌；十一日，兆惠率1.5万人从阿克苏出发，经乌什往攻喀什噶尔。

当清军向叶尔羌、喀什噶尔进军之时，大小和卓兄弟因军心动摇已无心恋战。他们从伊犁返回回疆之初，曾一度受到部分维吾尔人的拥护。但是，大小和卓只信任跟随他们从伊犁回来的维吾尔人和厄鲁特人，引起回疆广大维吾尔人民的不满。加之大小和卓叛乱以后，赋税繁重，刑法严酷，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渐增长。特别是黑水营之战，清军以少敌众，坚守三月之久终于解围，维吾尔民众和叛军士兵殊感惊骇，疑有神助，更是斗志瓦解，军心涣散，毫无战斗力了。大小和卓知道，他们已无力阻挡清军的进攻了，所以早就与霍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浩罕）和巴达克山汗国（在今阿富汗境）通使，以备逃窜。乾隆二十四年四月间，霍集占先将家属、辎重等撤出叶尔羌，迁往西面羌呼勒的赫色勒塔克，随时准备逃跑。六月十二日，霍集占遣其心腹阿布都克勒木告知布拉呢敦："将叶尔羌、喀什噶尔城堡焚毁，令回人等迁往巴达克山"①。布拉呢敦与伯克等公议未决。二十日，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七五，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己酉。

霍集占又遣人催促布拉呢敦执行焚城迁民方案，布拉呢敦抢掠民众的马匹牲畜后，于二十七日放火烧城，并强迫民众随其出逃。但维吾尔人民都不愿再为其卖命，纷纷逃往牌租阿巴特。闰六月初二日，霍集占抢掠叶尔羌城民众的马匹牲畜、勒索银4000两后，弃城由伯克和罗木渡口向羌呼勒逃跑。

在平定大小和卓兄弟叛乱的战争中，乾隆帝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减少进军阻力，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利用“攻心之策”，强调“大兵进剿，惟欲擒获布拉呢敦、霍集占，与回众无涉”①，“虽附和为恶，……倘能幡然悔悟，去逆效顺，亦从宽免罪”②。清军不但改变了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时杀戮过多的情况，而且让投诚的维吾尔族上层人物随行，进行招抚。所以，两路清军进展异常顺利。兆惠向喀什噶尔进军时，“沿途经过村庄，回众皆献牛酒果饵，情词恭顺”③。闰六月十四日，兆惠部顺利进入喀什噶尔。富德率骑、步兵各1200名，自和阗起程向固璊（今新疆皮山）、萨纳珠前进时，“沿途回人扶老携幼，道左跪迎”④。前锋鄂博什于闰六月十四日抵叶尔羌城，喀玛勒和卓等迎降，富德率大队于十八日黎明自南门入城，受到维吾尔族群众的热烈欢迎，观者塞道。

清军进入喀什噶尔、叶尔羌时，大小和卓兄弟已于半月前逃走，兆惠、富德一面安抚城中百姓，一面派兵追剿。乾隆帝得知霍集占等逃走，即令兆惠等选精兵穷追，“总以擒获逆贼兄弟，始可告成功”⑤。

为追击逃敌，兆惠先后派出明瑞、阿里衮、巴禄、富德、阿桂等几支部队。据报，布拉呢敦经玉鲁克岭逃至提斯衮，与霍集占会合后，向色勒古勒地方逃走，或往巴达克山，或往浩罕。参赞大臣明瑞率领精兵2000人，每人马2匹，于闰六月十五日从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四，乾隆二十三年六月辛酉。

②③④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二，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丁巳。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一，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甲辰。

喀什噶尔出发，抄近路昼夜急追。二十八日巳时，至霍斯库鲁克岭，见叛军约6000余人排列于山头。清军连续急行军，数日未得水草，马匹多损，前队先到者仅900名。明瑞仍毅然率众由山下往上猛攻，激战多时，以阵亡百余人的代价，大败叛军，计毙敌500余人，俘敌30余人。大小和卓急率余众向巴达克山方向逃窜。

副将军富德率部与阿里衮、明瑞二支追兵会合后，挑选精兵，组成一支4000人的大军，紧追逃敌。七月初九日晨，在阿尔楚尔追上叛军。霍集占在两山之间设下伏兵，而列阵于谷口以诱清军。富德指挥清军分队猛攻，左右翼攻左右两山，自率中军以枪炮向敌阵轰击，至中午时分，叛军不敌，败退30余里，占据一山头固守。清军追至，再次与敌激战。叛军见清军来势凶猛，慌忙越山逃走。清军又追杀40里，毙霍集占之心腹悍将阿布都克勒木以下千余人，俘敌50余人。

清军乘胜以日行百余里的速度追击逃敌，初十日傍晚到达布隆库尔后继续向叶什勒库勒诺尔（一作伊西洱库尔淖尔，一作叶什勒池）前进。该地西界巴达克山，山高石险，隘口数十里，道路狭窄，仅容单骑；北面大山中亦有一路与巴达克山、安集延等地相通。为了防止霍集占逃入巴达克山，富德分兵500名，令阿里衮等率领，在叶什勒库勒淖尔以西通巴达克山要隘堵截，自率骑步兵千余名尾随敌踪前进，以达成前后夹击之效。十一日晨，当富德等率部赶至叶什勒库勒淖尔时，叛军已占据山脚，用枪炮封锁了池边路口，掩护家属携辎重翻山逃跑。清军一边整队前进，一边用大神炮、威远炮轰击，自上午巳时至下午未时，激战大半日，叛军仍在顽抗。富德见强攻未能奏效，就派前锋参领喀木齐布等率领40名鸟枪优秀射手，从山北抢占山顶，并由侍卫额尔登额等率兵配合策应，同时令随征的回部首领霍集斯、鄂对等高竖本部大旗，在阵前向叛军喊话，劝其投降。叛军士兵早就不愿为大小和卓兄弟卖命，听见喊话，即带领家属子女，牵着驮载辎重的马驼等，从山顶奔下山来。霍集占与其亲信“在山头拦

阻，而降者益多”①。至十二日黎明，山顶上的回众已全部下山。霍集占见大势已去，只得与其兄布拉呢敦率残部400余人逃往巴达克山。叶什勒库勒诺尔一战，清军共收降1.2万人，缴获军器2000余件、驼骡牛羊万余头，大小和卓兄弟的叛乱力量损失殆尽。

霍集占兄弟等进入巴达克山后，因抢掠村庄，又欲潜通巴达克山之仇国塔尔巴斯，被素勒坦沙汗擒杀。然而，素勒坦沙汗借词拒不呈献。乾隆帝认为，“凶渠一日不获，则军务一日不竣”②，为了彻底平息叛乱，稳定回疆，必欲擒获大小和卓兄弟。富德等一再遣使严索，素勒坦沙汗迫于压力，才同意交还大小和卓尸体，经清使查验属实后，将霍集占的首级带回。富德将霍集占首级函送京师，并将目睹布拉呢敦被杀的们多索丕等送京，于十月初二日率大军凯旋。至此，大小和卓兄弟发动的叛乱被清政府彻底平定。

第六节　平叛战争的意义和战争指导得失

平定大小和卓兄弟叛乱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回疆长期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清政府不仅在天山北路，而且在天山南路也牢牢掌握了统治权，最终彻底统一了新疆。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在天山南北建立起统一的军政管理机构，派驻八旗兵和绿营兵，设置卡伦、台站，从而大大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管辖，巩固了我国西部边防，密切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同时，清政府减少赋税，推行屯田，兴办学校，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维吾尔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促进了天山南路经济文化的发展。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五，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庚子。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庚子。

乾隆帝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战争中的决策和指导，总体说来是成功的。首先，注重政治攻势。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乾隆帝多次宣谕回部，把大小和卓兄弟的罪状、用兵回部的理由及其方针、政策，公布于众，因而分化了叛军营垒，争取了维吾尔族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其次，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叛乱头目。在此之前的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战争中，由于杀戮过多，把不少准噶尔和喀尔喀群众推向叛军一边，增加了平叛的困难。乾隆帝汲取上次战争的教训，一开始就明确宣布，“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①。后来虽然把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并列为主要打击对象，但始终把他们与广大维吾尔群众区别开来。平定大小和卓战争进行得比较顺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第三，坚持“穷追务获”的决心。乾隆帝把擒获大小和卓兄弟特别是霍集占，消除分裂叛乱的祸源，作为平叛战争的目标。所以，当得知大小和卓兄弟弃叶尔羌、喀什噶尔二城逃跑之时，即谕令兆惠等“穷追务获”，并强调指出：“总以擒获逆贼兄弟，始可告成功。若仅取二城，则事仍未竣”②。当时，朝臣中有人持反对意见，说什么“诸城悉定，各部款降，似此茕茕逋贼，何必更事穷追，致滋劳费”。乾隆帝不为浮论所惑，不急图完局，并且申明：“若意在苟且迁就，遽欲贡谀称贺，谓可息事宁人，则朕断断不为也”③。正是在乾隆帝的指导下，平叛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癸丑。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一，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甲辰。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丁丑。

第十五章　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

第一节　大小金川和清廷“以番治番”的策略

大小金川，本是四川西北部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传说沿河山中有金矿、河中多金沙而得名，因此又有小金沙江之称。大金川，当地人称为促浸，意为大川。小金川，当地人称为攒拉，即小川之意。大小金川两条河流在丹巴附近汇合后继续南流，习称大渡河。

作为地区名称的大小金川，则因河而得名。大小金川地势险峻，交通不便，气候严寒，地瘠人贫，昭梿《啸亭杂录》一书有这样的描述：“其地高峰插天，层叠回复，中有大河，用皮船笮桥通往来。山深气寒，多雨雪，所种惟青稞、荞麦。”① 但大小金川东通成都，西连康藏，北界青海，南接云贵，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金川地区的居民在明清官书中皆称番民，实为藏族。当地藏民信奉喇嘛教，勇武骠悍。清顺治七年（1650 年），小金川土司卜尔吉细归附清朝，清廷采取“以番治番”的政策，仍授卜尔吉细土司原职。康熙五年（1666 年），又颁给嘉勒塔尔巴“演化禅师”印，所以小金川土司正式称谓是“四川直隶杂谷理番府金川演化土司”。康熙六十年（1721 年），嘉勒塔尔巴土司的庶孙莎罗奔因率兵随清军征剿西藏羊峒有功，被四川巡抚色尔图、提督岳钟琪委以副长官司职衔，管理大金川驻牧事务。莎罗奔，或作色勒奔、色勒奔初、色勒奔细，为同一词语的不同音译，因金川

---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四，《金川之战》，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97 页。

民众崇信喇嘛教，管理僧众，继位土司，都由“莎罗奔”承当。故“莎罗奔”本是土司儿子中出家当喇嘛的人的通称，并非人名。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川陕总督年羹尧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川省土司多有人众地广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钤束，如大金川土司之土舍色勒奔者，曾因出兵羊峒，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之势，小金川实为强横故也。”① 三月，清廷授莎罗奔以“大金川安抚司”。由此可见，大金川、小金川土司分设，完全是清廷“以番治番”政策的产物，目的是众建以分其势，使之彼此牵制，相互抗衡，便于统治。

第二节 大金川之战

一、战争的发生

莎罗奔成为大金川安抚司以后，凭借清廷的支持和庇护，其势日渐强盛，不断出兵侵扰邻近诸部落。乾隆七年（1742年），莎罗奔病故，其子承袭，仍称莎罗奔②。他蓄谋吞并小金川，先以侄女（一说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泽旺怯懦，受制于阿扣，大权旁落。泽旺弟良尔吉与阿扣私通，于乾隆十年勾结莎罗奔袭击小金川，莎罗奔乘机诱执泽旺，以阿扣改配良尔吉，并将小金川印信交良尔吉掌管。在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的干预下，莎罗奔才于乾隆十一年将泽旺放归小金川。

对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扰邻部的事件，不论是地方督抚大臣还是乾隆帝，最初都认为这不过是各土司间一般的仇杀，无足深较。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川陕总督庆复在奏陈川西地方各土司状况时提出，大金川“自在土司内相扰，并非干犯内地，要在该

① 《年羹尧奏折专辑》，台湾故宫博物院1971年版，上册第2页。

② 此据《平定金川方略》，而《清高宗实录》卷二〇四，乾隆八年十一月己丑，则说袭职者为莎罗奔之弟。

管文武务得大体，令其彼此钤制，以保无事。倘不遵剖断，亦惟有以番御番之法，用众力以收功"。乾隆帝充分肯定了他的意见，说："瞻对甫完，佳兵不祥。卿所见极是。"① 瞻对与金川一样，是由土司管辖的藏民聚居区，夹雅龙江（今雅砻江）分上下瞻对。乾隆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因瞻对藏民劫掠行旅，调兵征讨。但用兵一年有余，仍不能取胜，最后只得仓促撤兵。这时乾隆帝对瞻对之战的教训还记忆犹新，所以才有上述意见。事隔不久，乾隆帝又针对此事谕军机大臣说："苗蛮易动难驯，自其天性。如但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置之不问。如其仇杀日深，势渐张大，或当宣谕训诲，令其息愤宁人，各安生业，亦当相机行事，声威足以慑服其心，使之弭耳输诚，方为尽善。……倘果有拒抗侵轶，不得不宣布皇威以全国体，亦当相度机宜，慎之于始，不可轻为举动。"他还特别强调，要接受瞻对之战边吏、营弁"过为张皇，因小酿大"② 的教训。

但是，乾隆帝很快就改变了看法。乾隆十二年二月，莎罗奔又发兵攻掠革布什咱和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副将张兴率绿营兵、土兵前往弹压，但为大金川兵所败，千总向朝选遇伏阵亡，游击罗于朝身负重伤，土兵望风而逃。乾隆帝认为，大金川竟"敢于侵扰，伤及官兵，势甚猖獗，总因前此瞻对之事办理未善，无所惩创，不足以震慑蛮心"③。因此，他一改一个月前制定的方针，决定调派重兵镇压大金川。三月，调平定苗疆有功的贵州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令其速赴四川，"一应机宜专听张广泗调度，申明军律，指授方略，筹画粮饷，迅速进兵，务令逆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九，乾隆十一年十一月辛酉。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八四，乾隆十二年二月癸酉，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七，乾隆十二年三月己酉。

酋授首，铲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①。

二、清军进攻受挫

乾隆十二年四月，张广泗自贵州到四川接任总督后，即驰赴军营，先驻杂谷脑，后于五月二十日又进驻小金川美诺寨（今小金县城），先后调集绿营兵、土兵共3万余名，计划分西、南两路②，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向大金川进攻。西路清军再分四小路，二小路攻勒乌围，二小路攻噶拉依（刮耳崖）；南路清军再分三小路，一小路攻河西各地，二小路配合西路清军夹攻河东的勒乌围和噶拉依。

六月二十八日，各路清军同时发起进攻。最初进展尚算顺利，但大金川两岸山势险峻，当地居民皆垒石为房，长于修筑防御工事，大金川兵据碉顽抗，清军进攻受阻，师久无功。九月，张广泗在奏陈大金川战况时说：“臣自入番境，经由各地，所见尺寸皆山，陡峻无比。隘口处所，则设有碉楼，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险要尤甚之处，设碉倍加坚固，名曰战碉，此凡属番境皆然，而金川地势尤险，碉楼更多。而攻碉之法，或穴地道，以轰地雷；或挖墙孔，以施火炮；或围绝水道，以坐困之。种种设法，本皆易于防范，可一用而不可再施。且上年进攻瞻对，已尽为番夷所悉，逆酋皆早为预备，或于碉外掘壕，或于碉内积水，或附碉加筑护墙。地势本居至险，防御又极周密。营中向有子母、劈山等炮，仅可御敌，不足攻碉。”③ 用重300余斤的九节劈山大炮攻碉，击中碉楼顶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七，乾隆十二年三月己酉。

② 所谓西路、南路，均为乾隆时的说法，是就出兵地在四川境内的方位而言的，基本上是以成都为中心，西路即川西路，南路即川南路。

③ 《平定金川方略》卷三，乾隆十二年九月庚子，张广泗奏。

部时碉楼稍有破坏，击中其他部位则毫无所损，因此，尽管付出了很大代价，但进展却十分迟缓，“进剿之汉土官兵三万有余，每日之资不下三四千金，……自六月二十八日进兵以后，各路报克碉寨虽不下数百，而其极险紧要之碉不过十余处，汉兵阵亡已八十余名，土兵一百三十余名，汉兵带伤者三百五十余名，土兵四百九十余名”①。强攻不能奏效，又改用火攻，或在碉下堆积木柴点火，或向碉楼发射火箭，但仍不能制敌。张广泗不明敌情，轻敌冒进，兵分力单，失利之后，又委过于人，且对将士督责过严，以致人人怨愤，上下离心，军无斗志。副将张兴部被围粮绝，屡次请兵，张广泗并不发兵救援，惟斥其庸懦无能，最后张兴只得暗中与敌讲和，并以金银向敌买路，结果为敌诱骗。十二月十八日，张兴及所部官兵五六百人全被杀害。乾隆十三年正月十六日，总兵马良柱部因绝粮已久，一闻总督撤营命令，仓卒率5000余众撤退，军装炮位遗弃无算。至此，张广泗对大金川的进攻已彻底失败。

大金川用兵将及一年，奏凯无期，乾隆帝对张广泗大为失望。乾隆十三年四月，乾隆帝接受钦差大臣班第“特遣重臣，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的建议，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经略军务，并起用老臣岳钟琪和傅尔丹。讷亲得乾隆帝倚重，位高气盛，锐意灭敌，六月初三日驰抵小金川美诺军营，旋即赴卡撒前线视察，并下令限三日攻克噶拉依。“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②。噶拉依系莎罗奔之侄郎卡驻守之要地，周围山陡箐密，碉寨层层，独色尔力山梁稍平坦。讷亲决定夺占色尔力山梁后下攻噶拉依。六月十三日，清军万余人由昔岭攻色尔力山梁，大金川番兵据木石城卡力拒，枪石如雨，清军大量伤亡。十四日，参将买国良战死。十六日，署总兵任举遇伏阵亡，副将唐开中重伤。经此惨败，讷亲丧胆，不敢

---

① 《平定金川方略》卷三，乾隆十二年九月庚子，张广泗奏。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杀讷亲》，第14页。

复言进攻，提出以碉逼碉的守势战策。他奏称："贼番因险据碉，故能以少御众。今我兵既逼贼碉，自当亦令筑碉，与之共险，兼示以筑室反耕之意，贼番自必动摇。"① 以碉逼碉的战法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当时清军的主客观条件。乾隆帝一连两天颁旨军机大臣，对此提出批评。七月十一日说："此事披阅再四，不能解办理之意。……攻守异用，彼之筑碉以为自守也，我兵自宜决策前进，奋力攻取。且用以破碉之人，而令效彼筑碉，是亦将为株守之计耶！碉不固则不足恃，筑碉固则徒劳众。若以此筑碉之力，移之攻取破彼之碉，以夺其所恃，不亦可乎？……今因彼守险，我亦筑碉，微特劳费加倍，且我兵已深入贼境，地利、气候素不相习，而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馈运难继，少则单弱可虞。贼酋凶狡，必狃我以持久，出我之不意。浮寄孤悬，客主之形既别，情见势绌，反覆之虑尤深。师老财匮，长此安穷，不可不熟计也。……今思之一夜，终非善策，不如速罢之为宜。"② 十二日又说："建碉之策，不惟有所难行，亦且深为可虑。……碉楼非可易成，即使能成，而我兵究以攻取为事，若再行前进，其将又建一碉耶？向后屡进不已，策将安出？"③ 色尔力山梁败后，讷亲"不敢专政，仍倚张广泗办贼。张广泗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④。闰七月二十七日夜，清军进攻喇底二道山梁，统领右路的副将、游击等进至沟口而止。大金川番兵数十人从山梁呐喊着冲下，清军绿营兵、土兵3000余人闻声竞争先恐后地往回逃跑，自相践踏，多有伤亡。乾隆帝知讷亲"不足恃，然欲其稍有捷音，然后召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八，乾隆十三年七月壬辰。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八，乾隆十三年七月癸巳。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八，乾隆十三年七月甲午。

④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299页。

还，以全国体”①。但是，大金川军务仍毫无起色，非一年半载所能竣事，乾隆帝大失所望，感叹道：“军营现在情形，几于智勇俱困，金川小丑，不料负固难于剿灭，遂至如此！”② 九月，命将张广泗逮京交刑部治罪，讷亲革职。张广泗于十二月被处斩，讷亲亦于次年正月底被以其祖遏必隆刀正法。

三、大金川土司投降

乾隆帝急于结束大金川战争，命协办大学士傅恒暂署川陕总督，旋授为经略、保和殿大学士，统领大金川军务；调京营及盛京、吉林、黑龙江、西安、四川等地八旗兵8000人，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省绿营兵2.5万人，共计3.5万人前往金川前线。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从北京启程，日夜兼程前进，“征途遥远，冲寒遄发，计每日程站，远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③，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进入四川境。十二月二十一日，傅恒甫驰抵大金川卡撒军营，即将与莎罗奔勾结的良尔吉于军门枭示，以良尔吉之弟小朗素统领土兵，断绝了大金川的内应。傅恒还注重调查研究，大力整顿营务，申明纪律，准备各路兵马到齐后，采取“锐师深入，从中峰压下，直捣贼巢之策”④，向大金川大举进攻。

乾隆帝在命傅恒赴四川经略大金川军务时，曾经“面谕四月望前之期”结束战争。当时他期望的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时隔不久，这一想法就有了转变。他认识到，大金川用兵将及两年，增兵添饷，劳费无已，财政上难以支持，于是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密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杀讷亲》，第14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一，乾隆十三年闰七月辛未。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甲戌。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乾隆十四年二月辛巳。

谕傅恒，“倘至明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刻期奏绩”，也要停止用兵，“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①，显示了撤兵的意图。及至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乾隆帝已经认识到去年末增兵是错误的，表示出后悔之意，但心中又十分矛盾，认为“办理至此，势难中止”，抱着侥幸的心理，企图打一二个胜仗，“俾贼酋穷蹙乞命，即可因势纳降，尚不失为识时务之俊杰”②。正月中旬，乾隆帝接到傅恒的奏报，始知大金川地势之险和用兵之难。鉴于金川地方石碉层立，形势险峻，攻剿极难，傅恒认为“进取不可专事攻碉”，“攻碉则经年亦难克捷”，因而提出“惟在直攻中坚，立成巨功”的建策。乾隆帝却认为，不但讷亲以碉攻碉的战法不能奏效，就是傅恒厚集兵力、直攻中坚的战法也不能扭转战局，他说：“即令别有坦道，可直趋贼巢，而贼巢仍是坚碉，舍攻碉计将安出？是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信泰来之机，朕改过不吝。”③ 乾隆帝已经公开承认办理金川问题的错误决策，定下了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的决心，于是立即命傅恒班师还朝。

正当乾隆帝决策从金川撤兵之时，大金川前线形势亦出现了转机。原本就人少兵单的大金川，经过将近两年战争的消耗，已经难以与数万清军长期对峙下去了；而清军在军事上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傅恒采用四川提督岳钟琪之策，南北两路进攻大金川，岳钟琪由党坝进兵，直逼勒乌围隘口，在康八达大败大金川兵。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知傅恒决意进攻，心存畏惧，遂于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二日遣人至傅恒卡撒军营具禀乞降，随后又转请绰斯甲土司赴党坝向岳钟琪乞降，并呈献甘结，愿遵依六事：“一、永不敢侵扰诸番。一、供役比各土司黾勉。一、尽返所夺邻番地。一、向来误犯天兵凶首擒献。一、送还从前侵掠人民、马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己卯。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二，乾隆十四年正月丙辰。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丑。

匹。一、照数献出枪炮军器。”① 岳钟琪允为代奏。莎罗奔希望岳钟琪亲临勒乌围，与其商定受降款件。为示以诚信，岳钟琪于二十八日率兵四五十人，前往勒乌围山寨。“番人皆香花跪迎，壶浆夹道”，至山寨，莎罗奔与其侄郎卡次第叩拜，“尽恭上所甘六事款结”②。是夜，岳钟琪即宿于勒乌围。次日，至大金川经堂，莎罗奔和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二月初五日，在经略大学士傅恒卡撒大营外，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莎罗奔、郎卡带领喇嘛、头目多人，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傅恒轻骑减从，示以不疑。莎罗奔、郎卡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受降结束，傅恒露布飞报大捷，并于次日起程回京。当月十五日，捷报到达京师，乾隆帝宣谕中外，大金川平定。

大金川之战，清政府先后调集了七省满汉官兵和土兵八九万人，耗银1000余万两，历时二年，仍难以取胜，最后以招抚的办法，总算体面地结束了战争。有功之臣傅恒晋封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加太子太保，授兵部尚书衔，复三等威信公。莎罗奔则被赦免，仍为大金川土司。

第三节　大小金川之战

（见附图17）

一、战争再起

大金川之战结束以后，金川及其周围地区出现了一段短时间的安定局面。但是，该地仍由各土司分别管理，土司中的割据势力没有受到打击，所以数年之后，就发生了新的动乱。

大金川地广人众，恃强凌弱，不断侵扰邻近土司。乾隆二十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乾隆十四年二月癸巳。

② 程穆衡：《金川纪略》卷四。

年（1755年），出兵攻革布什咱。二十三年，再次出兵攻革布什咱，占据其地，并扰及小金川。二十五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病故，其侄郎卡承袭土司。二十七年，郎卡发兵攻围党坝。对于土司之间的纷争，清政府仍采取“以番攻番”的政策。乾隆帝称：“向来番苗自相攻击，原可不必绳以内地官法。此次金川与革布什咱等兴兵构怨，据该督等两次查奏，原不过因结亲起衅。量其情形，本与蛮触无异。……以番攻番之策，亦属可行。”① 他认为大金川周围各土司尽管强弱不一，然皆可借以为郎卡之敌。如果各土司挟仇攻击，竟将郎卡吞噬，则是策之最善者！因此，他谕令四川总督开泰：“断不可有先事部署官兵，协力佽助之计，致涉张皇。所有邻近各蛮土兵既集，或即协力剿除，分有其地，止可听其各自为计”②。乾隆二十八年，四川总督阿尔泰提出使大金川周围的绰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丹坝、鄂克什、松冈、梭磨、卓克基九土司联为一气，并力攻击大金川的合纵之计。但是，九土司或因地小兵单无力与大金川对抗，或因与其为姻亲、同族而首鼠两端难以同心协力，以致实施数年毫无成效，乾隆帝甚至发出“以蛮攻蛮之计似难奏效”③ 的感叹。三十一年八月，阿尔泰赴大金川处理边务，当郎卡提出保留部分战碉、颁给土司新印信、准许其与绰斯甲布、小金川联姻等项要求时，他误以为这是大金川与各土司和睦相处的表示，所以都一一应允。然而令阿尔泰始料不及的是，大金川通过与小金川等联姻结成联盟，打破了各土司之间的力量均势，使清廷以番治番的方针更难以实行了。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四月，大金川土司郎卡病故，其四子索诺木承袭土司职务。索诺木同样恃强凌弱，不断侵扰邻近土司。乾隆三十六年四月，索诺木与革布什咱土舍勾结，袭杀革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〇，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乙丑。

② 《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五，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丙子。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七六三，乾隆三十一年六月甲寅。

布什咱土司，侵占其官寨。总督阿尔泰前往查办，索诺木不但拒不退兵，反而要求将革布什咱百姓赏给大金川当差。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亦闻风效尤，发兵攻打明正和沃日土司，并进而进攻驻守当地的清军。乾隆帝认为，以番攻番之策既难以复行，大小两金川一再侵掠邻近土司，抗拒官兵，亦非调解可以了事，“此而不加以惩创，伊等将视内地大臣专务调停和事，不复知所畏忌，于抚驭番夷之道，甚有关系”①，故决定派兵镇压，于是金川战争再次发生。

二、初定小金川

乾隆帝认为，两金川均应征讨，但小金川介于众土司之间，力量较弱，又不如大金川有险可守，易于攻破；小金川平定，大金川自会闻风畏惧而从命，所以他提出了“先办小金川”的方略。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清军分两路夹攻小金川：提督董天弼由汶川（今汶川西南）达瓦寺卧龙关进，总督阿尔泰由打箭炉（今康定）进。董天弼进攻受阻，改由山神沟前进。因阿尔泰不谙军旅，乾隆帝命定边右副将军温福率八旗兵和贵州绿营兵自云南赴四川，代阿尔泰统兵；命户部侍郎桂林协助温福。九月，阿尔泰移驻章谷（今丹巴）。十月，温福、桂林先后抵达成都。此时，调集的满汉官兵和土兵已达 1.6 万名，分兵三路：阿尔泰率兵 7000 名出南路，由章谷进攻约咱；总兵福昌率兵 1700 名出西路，由山神沟进攻；董天弼率兵 5300 名，由木坪进攻达维（达木巴宗），为中路。阿尔泰按兵不进，且惟以铸炮攻碉为长策，清军与敌相持，进展十分迟缓。乾隆帝提出“避敌碉卡，越道而进”的方针，并将阿尔泰革去大学士衔，留军营效力；命桂林补授四川总督；将作战不利的董天弼革职，四川提督由阿桂署理。

①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八，乾隆三十六年七月甲辰。

十一月，温福抵西路军营，桂林抵南路军营，贵州等省援兵亦陆续入川，战事稍有起色。十二月，董天弼一路进攻达木巴宗，救出被困7个月之久的鄂克什土司及官兵300余人；温福一路攻克巴朗拉、松林口，逼攻日耳寨（一作资里）；桂林一路攻克卡丫附近碉寨数百座。

日耳寨距美诺仅数十里，小金川得大金川援兵的帮助，据碉顽抗。温福仍用铸炮攻碉之策，因七八百斤的大炮数百发始能破一碉，即令改铸1000～4000斤的巨炮，日夜轰击。为防清军大炮轰击，小金川兵在石碉内排扎圆木，贴护石墙，碉外挖掘地穴，面横巨木，木上填土，土上铺石，穿穴出入，昼藏穴中，夜出修葺轰损处。“官兵进攻，贼出伏墙根，由墙孔放枪抵拒，故屡攻不克”①。自十二月二十九日至次年三月十一日，费时70余天，始攻克该地。南路清军于三月攻占革布什咱、丹东、觉乐寺等地，向僧格宗进攻。但桂林与参赞大臣伍岱不和，又不以军务为重，四月在进攻僧格宗时，官兵3000余人在墨垄沟被小金川兵围困7日，桂林接到求救信后竟置之不理，致使清军粮尽援绝，大部被歼，最终脱围者仅200人。经此一败，南路清军士气大挫，屯兵不进达两个月之久。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乾隆帝命将桂林革职拿问，令阿桂接办南路军务，哈国兴补授陕西提督，由云南赴西路军营。清军不断增兵，先后从陕、甘、黔三省调兵2.5万，加上四川原有的清军官兵、土练，兵力已达六七万人。而此时小金川由于力量消耗过多，已难以支持，多次向清军乞降。八月二十六日，小金川兵主动焚毁卡栅，撤出所占鄂克什旧寨，退守路顶宗。清军遵照乾隆帝谕旨，不接受小金川乞降，继续进攻。小金川险要尽失，清军进兵速度明显加快。十月，西路清军连克路顶宗、兜乌，直逼距美诺仅十余里的明郭宗。十一月初，南路清军占领翁古尔垄，进逼僧格宗，对美诺形成夹攻之势。僧格宗为小金川西南门户，地险碉密。阿桂督军乘皮船渡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九〇四，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乙巳。

河，前后夹攻，于十一月十九日将其一举攻克，遂乘胜向僧格桑据守的美诺进攻。十二月初五日夜，西路占领明郭宗。初六日凌晨，南路攻克美诺。当日，温福亦率军抵达美诺，两路大军胜利会师。

僧格桑于初五日夜间乘船逃离美诺，经八角碉、布朗郭宗等地逃往底木达（今抚边）官寨，因其父泽旺闭门不纳，遂又往大金川投奔索诺木。温福和丰升额分兵两路跟踪追击，十二月十一日由布朗郭宗过河围攻底木达，泽旺等出城乞降。至此，小金川基本平定。

三、木果木惨败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小金川即将平定之时，乾隆帝授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令其“一俟平定小金川之后，即相机分道进剿金川”①。温福等议定，兵分三路：温福由控喀山、卡撒进，阿桂由纳围、纳札木经当噶尔拉进，两路夹攻噶拉依；丰升额由绰斯甲布、俄坡直指勒乌围。另外，董天弼率兵2000分驻底木达、布朗郭宗等要隘，以防范后路。

十二月中旬，各路清军先后进发。二十六日，温福率兵抵功噶尔拉山下的牛厂。功噶尔拉山位于大小金川交界处，峰峦剑立，中有垭口，如一线羊肠，形势极为险要，且碉卡据险排立，又时值严冬，积雪深至四五尺，给清军的进攻造成极大的困难。温福督兵铸炮轰碉，分兵攻击，但因雪深路险，大金川兵防守严密，多次进攻均未奏效。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温福留兵一部继续昼夜轰击功噶尔拉，以牵制敌人，自率大兵取道固木布尔山，绕过功噶尔拉，进驻木果木。木果木以北为昔岭，昔岭右路可通勒乌围，左路可通噶拉依。温福拟从昔岭进攻噶拉依。但昔岭敌碉卡极多，且碉坚墙厚，清军自下仰攻，伤亡不少却难有进展。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二，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癸酉。

温福乃沿袭讷亲、张广泗故智，建碉卡千余，采取以碉逼碉之策，与敌对峙。这样，2万余兵力中的大半分散于各个碉卡，真正用于进攻的兵力严重不足，无法突破大金川的防御，以致屯兵昔岭之下五六月之久。

大金川兵一方面坚守碉卡，一方面藏匿密林内以游击战术进行袭扰。与此同时，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密谋策划，派在大金川的小金川人潜入小金川，进行策反活动。温福刚愎自用，不能听取部下将领的正确意见，且不以军务为重，疏于防范，对大小金川的策反全然不知。六月初一日夜，小金川兵潜至底木达，与已编入提督董天弼部的小金川人里应外合，陷董天弼军营，焚毁营帐，提督董天弼中枪毙命。随后，金川兵相继攻占大板昭清军营卡，劫夺喇嘛寺粮台，抢劫木果木炮局，断大营水道。温福既不能先事预防，临事又惊惶失措，不敢领兵拒战，惟知关闭大营营门保命。数千名请求保护的匠役民夫被拒之大营营门外，任其散去。在此情况下，木果木大营内清军士气低落，毫无战心。初十日晨，温福率兵突围，绿营兵纷纷溃散。温福身边只有八旗兵百余人，猝遇大队敌兵，温福胸部中弹，坠马而死。参赞大臣海兰察收集溃卒，且战且走，先撤至功噶尔拉军营，再撤至美诺，六月二十一日美诺失守，只得又撤往日隆。

木果木一战，清军损失惨重。温福军营官兵约2万人，亡4000余人，除将军温福、提督董天弼外，另有四川提督马全、署贵州提督牛天界、陕西兴汉镇总兵张大经等高级将领战死，丢失粮米1.7万石、银5万余两、火药7万余斤，刚平定仅仅半年的小金川得而复失。所幸阿桂和丰升额二路清军尚未受损失。

四、再定小金川

清军木果木败后，乾隆帝一方面处分了一批文武官员，一方面调兵遣将，积极筹划对大小金川进行新的军事征剿：授阿桂为定西将军，丰升额、明亮为副将军；鉴于木果木之败“总因营中

无满洲兵可为倚恃，遂使绿营懦卒惊溃无存，亦由温福等倡议不用京兵所误”① 的教训，增调京师健锐营、火器营和吉林、黑龙江、西安、荆州、成都驻防兵以及索伦兵、厄鲁特兵等八旗兵9500人，并增调贵州、云南、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省绿营兵1.1万人，合之原来所调各省绿营兵和四川屯土兵练，共计7万余人，兵力大为增强。

乾隆帝认为，此次进剿“仍须先攻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新调各地清军陆续到达四川军营。清军拟兵分三路，合击小金川：将军阿桂、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尔珠尔率兵2.5万人，向布朗郭宗、底木达、鄂克什等地进攻，为西路；副将军明亮、参赞大臣富德率满汉屯土兵2万余人，向美诺进攻，为南路；副将军丰升额、参赞大臣海兰察率兵1.5万人，由绰斯甲布前进，为北路。另以一部兵力在革布什咱、党坝等地防守后路。总督文绶坐镇省城成都，调运粮饷，督造火炮，保障后勤供应。

十月二十九日，西路清军数路并进，先后攻克日耳、阿喀木雅、美美卡、木阑坝，收复鄂克什官寨，十一月初一日克别斯满，初二日下路顶宗、明郭宗，初三日占领美诺、底木达等地。南路清军十月二十九日发起进攻，至十一月初六日，攻克僧格宗。与此同时，西路又收复大板昭、曾头沟，汗牛一带亦已降服。至此，小金川全境基本平定。

为了稳定后路，解除进军大金川的后顾之忧，阿桂等下令将美诺、底木达等地的大小碉寨拆除焚毁；将小金川民众，一部分赏给鄂克什、瓦寺、明正等土司，一部分拨给杂谷脑屯弁管辖，降而复叛的4000余人则全部予以杀害。

五、大金川的最后平定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清军分三路向大金川进攻：阿桂率主力

① 《清高宗实录》卷九三八，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丁卯。

从小金川攻其东，丰升额、明亮率军自党坝渡大金川河上游攻其西北，领队大臣富德率军渡大金川河下游攻其西南。

“大金川之地，自（乾隆）十二三年以来，全力抗守，增垒设险，严密十倍小金川。”① 但清军乘胜进攻，士气高涨，进展比较顺利。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十日，各路清军同时发起进攻。阿桂从谷噶垭口进攻，数日之间即深入大金川 100 余里。二月下旬，攻克罗博瓦，遂向喇穆喇穆山前进。该山形势险绝，碉卡林立。清军“官兵等皆攀援超越，奋不顾身，虽遇雨夜雾晨，弥加勇往，杀贼攻碉，靡坚不破”②。六月下旬，攻克喇穆喇穆山日则垭口等处要隘，进围逊克尔宗。逊克尔宗为勒乌围外围屏障，大金川兵极力固守。阿桂鉴于该地仅一面可以仰攻，为减少伤亡，没有立即发起强攻。他一面指挥部队攻取逊克尔宗前面的碉卡寨落，一面筑栅铸炮，作进攻前的各种准备。深感恐惧的索诺木于八月十五日派头人到阿桂军营乞降，献出被其毒死的僧格桑尸身及僧格桑妾、头人等。乾隆帝于年初曾有谕令：“两金川罪大恶极，万无可逭，并非缚献逆酋所能完局。况今各路进兵，尤不宜复通文檄。设或贼人情急，差人诣军门献俘求降，均宜置之不理，一面将所献贼酋贼目拘留，仍即设法擒其所差头人，一并槛解京城，磔处示众，一面督兵上紧进剿。”③ 故阿桂不允所请，继续进攻，用在前线新铸造的大炮昼夜轰击。大金川兵则百计死守，将寨墙所塌土石堆积墙下，形成漫坡，在其中间挖掘壕沟，以阻挡清军前进；在沟沿上覆盖木板，以防御枪炮射击；清军攻城时，即将寨墙上准备的石块推下，并发射在木果木缴获的喷筒。清军屡攻屡却，伤亡颇多。强攻不成，阿桂遂舍逊克尔宗不攻，于十月十六日移兵攻占日尔巴当噶与荣噶尔博之间的墨格尔山梁。十九日，明亮督南路军攻克日旁山后碉寨。两军隔河相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第 305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己未。

③ 《清高宗实录》卷九五〇，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庚申。

望，距勒乌围均不过 20 里。阿桂返攻日尔巴当噶、荣噶尔博，敌因尽失其险，退守康萨尔山。西路清军苦战两月，才于次年正月中旬攻克康萨尔山。乾隆四十年五月，攻克噶尔丹寺和噶朗噶，随后又将逊克尔宗一带全部攻克，完全解除了进攻勒乌围的后顾之忧。

七月十四日，阿桂、明亮两军合攻勒乌围。勒乌围官寨碉坚墙厚，西临大河，南有转经楼，与官寨相犄角，其间木栅石卡长里许，东面沿山麓有崖 8 层，每层丈余至数丈不等，上立碉楼卡栅，备御甚严。明亮部从河西进攻，以断其外援。阿桂部从河东进攻，先扫清外围，攻占了山脚下贮存弹药的几个碉寨。十八日，索诺木兄弟五人具禀乞降，阿桂不允，督兵进攻转经楼与勒乌围官寨之间的寨落，毁掉通往河西的甲尔日桑桥，截断敌之退路。大金川兵凭借地势之利，拼死抵抗，枪炮如雨。清军一面用炮猛轰，一面砍伐树木作成柴捆挡牌，用布袋装沙土，进攻时伏于地上，头顶柴捆土袋，匍匐前进。到崖边时，即将柴捆土袋层层堆起，并运来木材建起三层高栅，从上俯击崖上之敌。至八月十三日，将 8 层高崖上的碉卡逐一攻克。八月十五日夜，清军发起总攻，苦战一夜，至十六日子时将勒乌围官寨和转经楼全部攻克。阿桂立即驰奏红旗报捷。

索诺木等大金川头目已先期逃往噶拉依。为了早日攻占索诺木的最后据点，阿桂于攻克勒乌围的第二日——八月十七日，就指挥清军分三路向噶拉依进军。阿桂部 3.2 万人，从达乌达围进；明亮部 2.5 万人，从碾占进；富德等率兵驻绒布以牵制敌人，相机进击。清军与敌逐地争夺，缓缓推进，十二月中旬，阿桂、明亮、富德三军皆进抵噶拉依官寨，将敌层层围住，截断寨内水陆通道。寨内窘迫异常，索诺木之母、姑、姐妹、子等先后出降，惟索诺木托病不出。清军从四面用大炮昼夜轰击，噶拉依到处是断墙残壁。索诺木无计可施，遂于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率众 2000 余人出降。至此，大小金川之战结束。索诺木兄弟和大头人等被押解至京城处死，清军统帅阿桂则因功封一等诚

谋英勇公，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第四节　战争决策和作战指导得失

乾隆帝对平定大小金川战争是十分看重的，在其自定的“十全武功”中，金川战争有其二。其实，对清廷来说，金川战争并不是成功的战争。从战争的发生看，前后两次都是由土司之间的争斗引起的。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区，这类土司之间的相互争斗、仇杀和割据，本是平常之事，如果处理得当，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乾隆帝最初也认为“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后来他很快就改变了原来的方针，作出了用兵大金川的决策。乾隆十二年的大金川之战如此，乾隆三十六年的大小金川之战也是如此。战争发生以后，乾隆帝的战争指导也多有不当。他重于增兵，轻于选将，对讷亲、张广泗、温福等人缺乏知人之明，且屡易统帅，促成了前敌清军的节节失败。即或对“以碉逼碉”之策的批评，从战术的角度看不能说不对，但其着眼点是速胜，从战略指导上说仍是错误的。只是在第一次大金川之战后期，清军屡屡失败之后，乾隆帝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作出了定期撤兵的决策。但是到了大小金川之战时，又重蹈覆辙。从战争的结局来看，大金川之战，用兵八九万人，耗银1000余万两，费时2年，在屡败之后只能以主动地撤兵停战了局；大小金川之战，用兵将及10万，耗银7000万两，费时5年，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面对的是地域不大、人户不过3万、兵不过1.5万的大小金川，竟如此劳师糜饷、旷日持久，可以说完全是战争指导失误造成的，因此算不上真正的胜利。

清军之所以在战争中屡屡失败，论者一般都认为原因有三：地形复杂险恶，气候恶劣多变，大小金川兵民同心誓死。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对清军来说，这只是客观原因，而更主要的则在于清军本身。第一，指挥失误。金川跬步皆山，悬崖绝壁，碉寨林立，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讷亲、张广泗、温福等清军将领

却不懂得这个特点，采取正面强攻、以碉逼碉的错误战法，增大了伤亡，分散了兵力，形成以大量的兵力防守碉卡而进攻的兵力严重不足的局面，这是清军进展缓慢，甚至攻剿经年而不得寸进的重要原因。傅恒、阿桂舍弃了这种笨拙的战法，战局就为之一变，清军连连奏捷。第二，将帅不和。大金川之战时，乾隆帝先命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复命讷亲为经略大臣。讷亲不谙军事，又自以为是。张广泗老于戎行，轻视讷亲不知兵，故遇事多推诿，明知筑碉为下策，竟随声附和，会衔具奏。而对岳钟琪则极力排挤，甚至在情况紧急时也不予救援。大小金川之战时，类似的情况仍然存在。这样，清军岂能不败！第三，将领怯懦惧战，苟且偷安，士气不振。讷亲身为经略，“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①。桂林不以军务为重，一味狂妄骄纵，不住帐房，另修房屋居住，终日与人饮酒作乐。将领如此，士兵岂肯用命？乾隆十三年进攻喇底，大金川兵数十人从山上冲下，3000余清军竟一哄而散。木果木之败，温福部数万清军更是一败涂地。第四，不注意保护后路。大小金川兵善于偷袭清军后路，截断其粮路，清军常因缺粮而败溃。

平定大小金川战争虽然劳师糜饷，并给当地民众造成很大灾难，但打击了土司的割据势力，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战后，清廷在大小金川设镇安屯，改土归流：新设成都将军，管理包括大小金川在内的边地文武官员；两金川共驻兵6500名，勒乌围、美诺二地设总兵；废除土司制，在小金川设美诺厅，大金川设阿尔古直隶州（后裁阿尔古直隶州入美诺厅，并改名为懋功厅），委任流官管理。清政府管理的加强，稳定了金川地区的社会秩序，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有利于该地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军事上，清廷接受了金川战争的教训，乾隆帝针对清军的弱点，抽调京城八旗精锐，组建健锐营，操练成颇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又如，清军在两次金川战争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杀讷亲》，第14页。

中吃尽了碉寨的苦头，也懂得了筑城的重要，“自金川削平，中国始知山碉设险之利，湖南师之以制苗，滇边师之以制倮夷，蜀边师之以制野番，而川陕剿教匪时亦师之，以坚壁清野，而制流寇”①。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第308页。

第十六章　抗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

第一节　廓尔喀的崛起及尼中关系

尼泊尔是与我国西藏毗邻的一个山国。长期以来，尼泊尔境内部落林立。13世纪，尼瓦尔族建立了马拉王朝，但未能统一全部尼泊尔，其内部还有不少分立的政权，直至18世纪，仍有"大小部落总共三十处"①。其中阳布（一作雅木布，今加德满都）、库库木（一作库库穆、库科木，今巴德冈）、叶楞（一作易隆，今帕坦）三部较大，在清朝文献中称为"巴勒布"（一作"巴尔布"）。各分立的王国相互争战，力量彼此削弱。廓尔喀部遂乘机崛起。

廓尔喀原是拉加普族建立的一个小邦，位于阳布西北，相距约六日路程。在首领普里特维·纳拉扬·沙的领导下，廓尔喀乘机对周围各部用兵，"节次侵占阳布等三处地方，势力愈加，随将附近之达纳隆等小部落又共占取二十七处"②，于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统一了尼泊尔，迁都阳布，建立起廓尔喀王朝。

从4世纪起，尼泊尔就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接触。由于尼泊尔与西藏毗邻，也信奉佛教，经济上又有互补性，所以尼泊尔与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往来，互通有无，"（廓尔喀）素无盐、茶，并无银两、马匹，所产惟米豆、牛羊、布帛、铜铁、珊瑚、玛瑙、孔雀，……然西藏素产盐斤，及内地贩运银、茶，实为科（廓）尔喀必需之物，故向来藏属夷民往来驼运，彼此通商，相安已久"③。清代，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商业

①②③《明清史料》庚编第九本，《户部〈为巴忠奏〉移会》。

贸易和人员交往更为密切，尼泊尔商人“自康熙年间即在前藏居住，皆有眷属，人户众多，不下数千名口”①，有的还与藏民通婚，也有不少藏民往尼泊尔贩运粮食、布匹等物。除了民间交往之外，尼泊尔与中国两国官方也有联系。清雍正十年（1732年），马拉王朝的阳布、库库木、叶楞三部曾遣使至西藏，向清廷进贡，雍正帝赐缎匹、玻璃、瓷器，但念道路遥远，往返艰难，令其使臣即由西藏返回，希望三部与西藏贝勒颇罗鼐“协力和衷，维持黄教”②。雍正十二年，阳布等三部又遣使赴京进贡。但是，由于廓尔喀入侵西藏，尼中两国长期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一度被破坏。

第二节　第一次廓尔喀战争

一、廓尔喀入侵西藏

廓尔喀统一尼泊尔之后，国力强盛，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因其国小人众，对于地广人稀的西藏，早有觊觎之心。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六世班禅之弟沙玛尔巴因与其同母异父的哥哥仲巴呼图克图争夺六世班禅巨额遗产不遂而逃亡廓尔喀。他“与大头人巴都尔萨野交好，将藏中虚实告知，从中怂恿，外夷唯利是图，顿萌窥伺之意”③。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廓尔喀致书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提出领土等要求，声称：“我境接壤之聂拉木、济咙二处，原系我巴勒布地方，仍应给还。”④ 西藏与廓尔喀贸易，向来使用廓尔喀银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戊午。

②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5号，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奏折。

④ 《巴勒布纪略》卷一，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钱。这时廓尔喀新铸银钱，向西藏地方提出，停用旧钱，专用新钱，一个新钱当两个旧钱使用。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均对廓尔喀的无理要求予以严厉驳斥，明确指出：聂拉木、济咙“二处俱系达赖喇嘛地方”，廓尔喀“新铸钱文甚少，不能流通，仍将新旧搀杂使用”①，“若一个当两个使用，我们太吃亏，不能依允的”②。廓尔喀的无理要求被驳回，遂以贸易纠纷为借口，派兵入侵西藏。

六月，廓尔喀大头目苏尔巴尔达布（一作素喇巴尔达布）率兵3000人入侵西藏，二十一日占领后藏济咙，二十四日夺取聂拉木，然后北上进攻宗喀（今吉隆）、噶协尔（今定日）等地。

二、乾隆帝运筹帷幄

西藏驻军不多，驻藏大臣庆麟在接到廓尔喀入侵的情报后，一面从各地抽调1200名绿营兵、达木蒙古兵等派赴前线，一面向北京报警，同时向四川总督李世杰求援。

拉萨至北京相距遥远，乾隆帝迟至七月二十七日才得到廓尔喀入侵的奏报。他立即发出谕令，强调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此系卫藏所属地方，理应派兵堵御”，要求“所有后藏与巴勒布接壤之处，俱宜力为守御，其前藏地方，亦著庆麟等严加防范”③。为此，他作了多方面的筹划和部署。

第一，保护、安抚班禅额尔德尼。班禅是藏传佛教最高领袖之一，在西藏民众中有很大影响。此时七世班禅年龄尚小，为防其受惊扰和被廓尔喀利用，乾隆帝令雅满泰率兵赴后藏札什伦布（今日喀则），给予抚慰，如情况紧急，即将其迁移至前藏。

第二，向西藏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八月初四日，乾隆帝发布

---

① 《巴勒布纪略》卷一，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② 《廓尔喀档》，乾隆五十七年十、十一月份，《丹津班珠尔供词》。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〇九，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丁亥。

敕谕，向西藏民众说明调集内地官兵入藏，讨伐侵犯藏界的敌人，其目的“无非保护尔等，奠安卫藏之意”①，号召西藏民众积极支援清军。

第三，发布檄文，谕廓尔喀退兵。指出聂拉木、济咙两地，“虽边外蕞尔之区，原系藏中旧属，非尔之地。从前五辈达赖喇嘛时，尔等侵夺济咙，经达赖喇嘛发兵夺回”。廓尔喀必须“往复熟筹，速行退兵，将聂拉木、济咙等处全行献出。否则，大兵一发，尔等靡有孑遗，追悔莫及，尚其详审利害，毋自贻伊戚也”②。

第四，调兵遣将。乾隆帝接报后，立即命四川总督李世杰调兵三四千名，由四川提督成德、总兵穆克登阿率领，迅速入藏；令赴热河（今河北承德）入觐的成都将军鄂辉、总兵张芝元即日起程回任。

第五，筹集军费粮饷。为支持抗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乾隆帝从四川、陕西、山西和湖北等省拨银170万两，作为采买军粮及其运输费用，并命四川总督李世杰移驻打箭炉，负责筹办军需。自打箭炉至西藏，几乎全是崎岖难行的山路，运输困难，费用昂贵。据李世杰说：按照军需则例规定，骡马驮运米粮，每石每站给银3钱，口外山路以40里为一站，自打箭炉至西藏共5365里，133站，需银39两9钱。按照此价，运送3000名官兵的口粮，负担实在太重。经李世杰筹划，定以每米1石用牛马1头，每站给银1钱6分，夫役1名照管牛马2头，每夫每站照台费旧例折给口粮一分，不给工价，也不另给烟茶糌粑，这样每运米1石，仍需银26两8钱6分③。乾隆帝考虑到，入藏官兵所携带口粮，只够途中食用，“倘由内地拨往，不特需费浩繁，且恐缓不济急，所关匪细”④，所以决定除途中所需粮食由内地拨

①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〇，乾隆五十三年八月癸巳。

③ 《巴勒布纪略》卷十二，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李世杰奏。

④ 《巴勒布纪略》卷二，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三日，上谕。

运、途中购买外，其余均在西藏就地采买。他还特别强调，兵丁并非专需米石，凡麦面牛羊青稞糌粑等物，均可作为口粮；要晓谕藏民多为出售，清军应估价给银。

四川总督李世杰接到庆麟的求援信后，即抽调成都驻防满兵、绿营兵和金川屯练土番共计3000名赴援。七月二十二日，提督成德率领先头部队绿营兵1000名，从成都出发。与此同时，驻藏大臣庆麟七月初九日从拉萨出发赴后藏。他虽到了边境，却没有深入了解前线情况，只是根据藏军将领的一面之词就向乾隆帝报告说，藏兵在胁噶尔打了胜仗，“虽贼众（藏）兵少，尚能抵御”，“仰赖大皇帝威福，俱各守坚战利”①。其实这是一份虚假情报，乾隆帝却也信以为真，认为不必调用清军入藏，他说：“巴勒布被官兵以寡击众，剿杀退败，看来贼众无能，亦无大志，不值大办。”② 于是他立即调整部署，令鄂辉、李世杰将后续之500名清兵停止派出，甚至想让成德所率出发已20余日的先头部队于中途撤回。不久，庆麟又报告说，巴勒布增兵，藏兵年久未经行阵，且一时不能齐集，前线吃紧，他自己也于七月二十八日将班禅从后藏接往前藏。于是，乾隆帝又命清军急速赴藏。但由于相距遥远，信息滞后，以及情报不准等原因，作战指挥出现了混乱。八月二十四日，成都将军鄂辉回到成都。虽然总督李世杰10天前刚刚接准雅满泰因巴勒布兵多，藏兵不甚得力，而催令所调官兵迅速前往的来咨，但这时又接到乾隆帝“续派官兵停止前往”的谕旨，鄂辉、李世杰感到“缓急轻重之间，实难悬定”③，鄂辉只得从成都赴打箭炉，查探信息。乾隆帝尽管对这种混乱情况非常不满，但也认识到必须给前线将领随机应变的权利，他说：“朕所降谕旨，系就伊等奏到之折，揆度情形，遥为

① 《巴勒布纪略》卷三，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庆麟等奏。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〇，乾隆五十三年八月癸卯。

③ 《巴勒布纪略》卷五，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八日，鄂辉、李世杰奏。

指示，及经伊等接奉时，前后机宜，又或互异。该督正当按照彼处现在情形，随机妥办，原不必稍存拘泥，方为善体朕怀也。”①与此同时，乾隆帝因庆麟、雅满泰昏愦无能，又授理藩院左侍郎巴忠为御前侍卫钦差大臣，赴藏会办。

十一月二十二日，鄂辉率满汉屯练官兵400名赶到札什伦布，因先期到达的成德已抵第哩朗古，鄂辉遂率部前往，十二月初九日两部于第哩朗古会师。鄂辉、成德率清军由第哩朗古沿山间小路寻积雪稍薄处行走，于次年正月中旬进至宗喀。廓尔喀兵已经撤走，清军不战而收复宗喀。因雪大难行，清军在宗喀暂时休整。二月下旬，天气稍晴，鄂辉率军出发，先由善于攀登的汉土兵丁在积雪稍薄处挖开积雪，开辟道路，大队清军随后在小路上翻山越岭，迤逦而行。清军行军虽然异常艰难，但一直未遇到廓尔喀兵，所以未经交战，即顺利地收复了济咙、聂拉木以及其他边境村镇。

三、仲巴、巴忠等私下议和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西藏地方当局和驻藏大臣巴忠等人，违背乾隆帝的旨意，私下与廓尔喀议和。

对如何处理廓尔喀的入侵一事，乾隆帝一开始就定下了以武力抗击的方针。九月十二日，他又谕令鄂辉、成德等人，“务即兼程迅速前抵后藏，协力剿捕。现在派调各处官兵，俱已陆续进发，军威壮盛。鄂辉等统兵驰抵该处，虽不必扫穴犁庭，尽歼其丑，但不可止将贼众剿散，俾胁噶尔之围一解，即云藏事。必须将前此彼贼抢占之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处，全行收复，并勒令该头人出具甘结，明定地界，严立章程，不敢复行越界滋事。惟当趁此兵威，使之畏惧慑服，以期一劳永逸，方为妥善”②。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二，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丁卯。

② 《巴勒布纪略》卷六，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上谕。

但是，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却畏敌如虎，为了一己的私利，竟希图与敌人私下议和。廓尔喀入侵西藏之初，掌握后藏大权的仲巴呼图克图、红教喇嘛萨迦呼图克图，不经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允许，即派使者与廓尔喀议和。乾隆帝得知此讯后，接连发表上谕，表明反对不给入侵之敌以打击即私下议和的态度。十月初七日，他说："若在藏众喇嘛均可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耶？即和息一事，亦必须倚仗兵威，使贼震怖，方可永远宁谧。如以心存懦怯，辄往议和，转为贼人所轻，安能保其不复滋事！"① 三天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巴勒布贼众擅敢侵犯藏界，业经内地派兵前往，若不示以兵威，任令红帽喇嘛等私与议和，因而完结，则置达赖喇嘛、班禅于何地？且贼众等无所畏惧，将来大兵全撤，设复潜来滋扰，势必又烦纷纷征调，成何事体！……朕非乐于用兵，不恤士卒，希图多有斩获。但贼既侵犯天朝边界，若不加之惩创，何以安番众而靖边圉？"②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巴忠到达西藏。巴忠通晓藏语，谙熟藏情，深受乾隆帝倚重，故令其接替获罪的雅满泰任驻藏大臣。但巴忠急于早日完事，回京受奖，置乾隆帝的谕令于不顾，也不听从达赖喇嘛"应行进剿"③ 的意见，竟支持仲巴等议和。曾参与议和的公班第达之子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后来供认，"五十四年正月，班禅额尔德尼之父巴勒丹敦珠布因沙玛尔巴到济咙来讲和，就往宗喀一路迎去，又要我同往。二月内，巴大人派我到宗喀约会巴勒丹敦珠布"④。

将军鄂辉、提督成德收复宗喀后，面对西藏边境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倾向于议和撤兵，所以在奏报中极力夸大前线的困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四，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乙未。

② 《巴勒布纪略》卷十，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十日，上谕。

③ 《廓尔喀纪略》卷二〇，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福康安奏。

④ 《廓尔喀纪略》卷三八，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九日，福康安、海兰察奏。

难。二月末，清军已收复了全部失地，鄂辉等人更急于撤兵。三月，鄂辉、成德在济咙军营接见了从廓尔喀返回的仲巴、萨迦私派的议和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竟认为“巴勒布因细故兴兵，固属不法，然起衅尚系有因，究其情节，实非敢争夺地方。兹该番等一闻大兵将到，旋即退界奔逃，更有申诉乞降情事。冀同为上方百姓，尚非自外生成之辈”①。于是，鄂辉、成德派总兵张芝元、穆克登阿与丹津班珠尔、巴勒丹敦珠布、巴载等前往廓尔喀地界见其头人。

所谓“议和”，其实是“许银赎地”。廓尔喀主管议和的是头人巴穆萨野达萨尔，但在前台直接与西藏代表交涉的却是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廓尔喀提出，“聂拉木等处是其抢占，必须多用银两，年年付给，方肯退还”②。沙玛尔巴狐假虎威，胁迫西藏代表答应廓尔喀提出的苛刻条件。五月中旬，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两边定议之人一一列名，钤用图记。内开：‘每年许给元宝三百个，合银一万五千两，按年付给。倘有反悔，神佛必降咎灾’等语”③。当时，丹津班珠尔等“以藏内力量，不能永远按年付给，复向沙玛尔巴讲论。他说先把当年交清，再分作三年送交元宝三百个，或可免永远给银的事，沙玛尔巴又与玛木萨野、哈哩哈尔、乌巴迭阿三人另写合同一张，作为凭据”④。丹津班珠尔等当时没带银两，为尽快完事，他们向在宗喀的西藏商人凑借元宝300个，如数付清了当年的赎银。

在与廓尔喀议和期间，巴忠在胁噶尔曾数次给丹津班珠尔写信，催促速与廓尔喀达成和议，他满足于廓尔喀愿意进表纳贡的

---

① 《巴勒布纪略》卷十八，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初七日，鄂辉、成德奏。

② 《廓尔喀纪略》卷二四，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福康安奏。

③ 《廓尔喀纪略》卷二〇，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福康安奏。

④ 《廓尔喀纪略》卷三八，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九日，福康安、海兰察奏。

承诺，而对于屈辱性的和议条款，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用瞒天过海的手法，以廓尔喀投降向清廷报捷："巴勒布震慑天威，现已畏罪输诚，设誓定界，自此藏地敉宁，边疆永靖。"① 他与鄂辉等人草草拟定善后事宜十九条，包括西藏驻兵、训练、巡防、贸易、税收等内容，规定：在后藏札什伦布驻绿营兵150人，拉子、胁噶尔等边疆地区驻藏兵200人，藏兵于每年九月十五日以后至十月底与驻防绿营兵一体训练；驻藏大臣二人按年分为二次轮赴后藏巡查；噶布伦、戴绷、第巴等官员，须由驻藏大臣督同拣选，商之达赖喇嘛，等等。巴忠不等善后事宜办完，就急急返回北京。

第一次廓尔喀战争，双方军队未曾交战，最后以"许银赎地"的形式宣告结束。乾隆帝不了解事实真象，以为廓尔喀真的是畏罪乞降，抒诚进贡，所以当廓尔喀贡使到京时连日赐宴，并册封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王爵，其叔巴都尔萨野公爵。然而时隔不久，战火又重新燃起。

第三节　第二次廓尔喀战争

一、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

巴忠等用"许银赎地"的办法，虽然使廓尔喀暂时从西藏退兵，但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每年1500两的赎地银，并没有满足廓尔喀贵族的贪欲，但对西藏地方政府来说，则是个十分沉重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屈辱性的条款是稍有爱国心的人所难于接受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达赖喇嘛为了"将所立合同撤回，永断葛藤"②，曾派人去廓尔喀谈判，因意见分歧谈

---

① 《巴勒布纪略》卷二二，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三日，鄂辉、成德、巴忠等奏。

② 《廓尔喀纪略》卷二○，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福康安奏。

判未果。当年秋，廓尔喀派两个头目以查看银钱为名，到拉萨来索取所谓的“赎地银两”，达赖喇嘛拒绝支付。十二月，奉乾隆帝之命来藏办事的阿旺簇尔提穆抵藏，“得知许银说和之事，即言：此事不成体制，未清银两毋庸找给”①。阿旺簇尔提穆的态度，对达赖喇嘛是很大的支持，他更欲废除与廓尔喀的和约。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噶布伦丹津班珠尔、扎什敦珠布等人，奉达赖喇嘛之命，以往后藏巡阅边界、训练藏兵和修理寺庙为名，来到聂拉木，写信“约廓尔喀人来至边界面议地租一事”②，不想中廓尔喀人诡计，作为人质被裹胁到廓尔喀。

与此同时，廓尔喀在沙玛尔巴的挑唆下，借口债务未清，派兵再次入侵西藏。

七月上旬，廓尔喀兵千余人越过边界，占领了聂拉木，将丹津班珠尔、扎什敦珠布及教习兵王刚、冯大成等十余人捉住，送往廓尔喀阳布，并掠去他们携带的原准备给廓尔喀的 180 个元宝。

廓尔喀诱执了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噶布伦、戴绷之后，即开始向西藏大举进攻。七月二十九日，廓尔喀军队将宗喀包围，并于八月初二日开始“四面攻围”③。教习陈谟、潘占魁督率藏兵、喇嘛等协力堵御，打死敌兵数十人，廓尔喀军败退至离宗喀30 里的俄玛。在定日，廓尔喀兵千余人前来围攻官寨，将各处寨落烧毁，藏兵被迫退守胁噶尔。在济咙，守军为防止廓尔喀兵渡河，将热索桥砍断，但廓尔喀兵伐木搭桥，占领济咙。八月十六日，廓尔喀兵 3000 余人围攻萨迦，守军达木蒙古兵奋勇拒敌，大半阵亡，而藏兵战斗力较弱，萨迦终于弃守。

廓尔喀侵略军节节进逼，威胁班禅额尔德尼的驻锡地札什伦

---

① 《廓尔喀纪略》卷十八，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福康安奏。

②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宫中档》，外交类，075 号，成德奏折。

③ 《廓尔喀纪略》卷二四，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一日，鄂辉、成德奏。

布。八月十六日，驻藏大臣保泰派兵将班禅迁往前藏，由仲巴呼图克图留守札什伦布寺，都司徐南鹏率绿营兵120人驻守官寨。仲巴畏敌如虎，毫无斗志，在廓尔喀进至札什伦布的前一天，趁夜暗逃往东喀尔，并将寺中细软搬走，造成人心混乱。更有甚者，济仲喇嘛罗卜藏丹巴等在吉祥天母像前占卜，竟假托卜辞，胡说“不可与贼接仗”，结果弄得“众心惑乱，不复守御，皆行散去”①。二十日，廓尔喀兵进至札什伦布。次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札什伦布寺。随后，廓尔喀兵围攻札什伦布官寨，遭到徐南鹏部绿营兵的顽强抗击，被打死数十人。廓尔喀侵略军在札什伦布大肆烧杀抢掠，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放火焚烧（官寨）四围所屯粮草”②，札什伦布寺金塔上“所镶松石珊瑚金银花贼皆挖取，佛前所供金银帏幔等项亦被取去，……其商上所贮银器绸缎等物俱被贼掠去”③。九月初七日，廓尔喀兵带着抢掠的大量财物从札什伦布退走。

二、清军进藏，打击侵略者

（一）乾隆帝决心对敌大张挞伐

八月二十二日，乾隆帝接到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关于廓尔喀诱执西藏噶布伦、戴绷，占领聂拉木的奏报，认为从前鄂辉、成德、巴忠办理不妥，苟且了事，以致复生事端。廓尔喀系“内附天朝之臣仆”，本次侵犯聂拉木，“不过为索取债目”不必大办，鄂辉系总督大员，“声名较大”只要带兵前往，廓尔喀“自必闻风胆落”④。所以他命鄂辉进藏相机办理，大学士孙士毅自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八，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丁未。

② 《卫藏通志》卷十三上，《纪略》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357页。

③ 《廓尔喀纪略》卷七，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雅满泰奏。

④ 《廓尔喀纪略》卷一，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上谕。

北京往成都署理四川总督。

但事情并不像乾隆帝设想的那样简单。一方面，廓尔喀不断扩大侵略，相继占领济咙、萨迦、定日等地，甚至纵兵抢掠札什伦布；另一方面，所派官员不能实心任事，鄂辉推诿不前，仅令成都将军成德率兵赴藏，他本人迟至九月初六日始离成都，二人在途中又按程缓进，观望不前，而保泰、雅满泰遇事即“心慌胆落，懦怯已极”，不但已将班禅自后藏移居前藏，且复欲将达赖、班禅移往四川泰宁，弃前藏于不顾。有鉴于此，自九月下旬开始，乾隆帝一再强调，对廓尔喀必须大张挞伐。

九月二十八日，他说，对廓尔喀，“必须慑以兵威，痛加惩创，俾知慑服，不敢再萌他念，方期一劳永逸。若少存将就了事之意，使彼无所畏惮，大兵撤后，彼必复至边境抢掠，又将作何办理？倘复须调兵进剿，是贼匪转得以逸待劳，反客为主。……若云道路遥远，粮运维艰，岂有贼匪能来，我兵难往之理！”①

十月初六日，乾隆帝又指出：“此事初起之时，朕并非必欲大办。如贼匪只因索欠启衅，抢掠聂拉木等处边境，尚可为之剖断曲直，责令清还欠项。朕之初意，原不欲劳师远涉。今贼匪肆行侵扰，竟敢抢掠札什伦布，不得不声罪致讨，非彼乞哀可完之事。若因贼匪已遁，遂思就事完结，使贼匪无所畏惧，将来大兵撤归，贼匪复来滋扰，又将作何办理？岂有堂堂天朝，转为徼外番贼牵制之理！此事势在必办，竟无二义。”②

于是，乾隆帝重新进行部署：保泰、雅满泰革职留任，效力赎罪；奎林补授正红旗蒙古都统，舒濂赏给副都统职衔，前往西藏办事；鄂辉、成德革职，以副都统衔效力军前；调两广总督福康安率兵进藏，授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命陕甘总督勒保、西宁办事大臣奎舒筹办福康安部进藏所需马匹粮草；除先期征调的 7500 名屯练土兵外，再调索伦兵 1000 名，由海兰察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七，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庚子。

② 《廓尔喀纪略》卷四，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六日，上谕。

等率领，分批进藏。

（二）福康安率兵入藏

福康安（1754～1796），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字瑶林，号敬斋。其父傅恒官居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姑母为乾隆帝的孝贤皇后。福康安曾参与平定大小金川、镇压甘肃石锋堡回民起义、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等重大战争。由于他不论情况如何艰险，都能够勇于任事，一往无前，而且在战争中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所以深受乾隆帝的器重。

十月初三日，福康安在江西途次接奉令其准备率兵赴藏的谕旨，随即兼程晋京。抵京后，乾隆帝面授方略，“以西宁赴藏较川省路近而平”，令其“取道由草地行走，以期迅速”①。十月十九日，福康安自京师启程。行进途中，曾接勒保咨会，告知“青海口外并无树株，今值隆冬，冰雪甚大，马草牛粪均被雪压，难以趱行”②，乾隆帝也令其“酌量情形，……若实有难行之处，当即改道由四川赴藏，不可勉强，以致欲速转迟”③。福康安接旨后，经过调查，认为冬季从西宁口外草地行走固然艰难，但不是完全阻隔，况且走此路比改道四川可以早到西藏一月时间，所以决计仍从青海一路进藏。十一月二十六日，福康安抵达西宁，稍事停留，在补充了必要的口粮、马驼、帐篷等物之后，即轻装减从，于十二月初一日继续前进。出口之后，自然条件越来越恶劣，山高雪大，瘴气逼人，极为难行。在亢阿拉山、扎苏拉山及和约尔达巴罕等处，“旧存积雪，或七八寸至二三尺不等，石径崎岖，艰于登陟，并有大河数道，冰坚雪厚，宽逾数里”④。鄂林察林诺尔（今鄂陵湖、扎陵湖）、星宿海、喇嘛陀罗海等处，“数百里内，溪涧交错，泉水甚多，冬令处处凝冰，远近高下，竟无路径。

---

① 《廓尔喀纪略》卷九，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奏。

② 《廓尔喀纪略》卷九，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福康安奏。

③ 《廓尔喀纪略》卷九，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谕。

④ 《廓尔喀纪略》卷九，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福康安奏。

且该处多系沟勘，沙滩乱石纵横，与冰块相间层积，马足倾滑，行走维艰”。过了巴颜哈拉，进入昆仑山区，“地势极高，瘴气最大，虽不比云贵烟瘴伤人，然人行寸步即喘，头目眩晕，肌肤浮肿，冬间冷瘴较之夏间尤甚”①。福康安出口时即已“冒寒患病”，每日仍坚持行军 16 个小时以上，“每日寅(3～5 时)初起程，行至戌(19～21 时)刻始行驻牧，止余两三时牧放马匹，尽力趱行，并站前进，一日所行道路，较之喇嘛番子人等行走两日程途尚属有余”②。正月二十日，福康安驰抵拉萨。从西宁至拉萨，行程 4600 里，除去途中先后停留的 11 天，实际行军只有 39 天。

（三）聂拉木之战

成德、鄂辉率领清军从成都出发，行走六七十天，于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下旬、十一月中旬先后抵达拉萨。

廓尔喀得知清军入藏的消息后，即收缩兵力，占据定结的廓尔喀兵数百人于十一月初一日夜间撤走，而集中兵力于聂拉木、济咙两处，添筑卡寨，加砌围墙，“以为负隅固守之计”③。

十二月初一日，成德进至后藏，鉴于聂拉木为廓尔喀兵出入西藏的大路，必须首先攻取，遂率兵经拉子（今拉孜）、胁噶尔、第哩朗古等地向聂拉木进军。二十七日，到达距聂拉木三四十里的拍甲岭。次日寅时，乘夜急进，于黎明时接近聂拉木敌寨，趁敌不备，发起进攻。聂拉木官寨围墙既高又厚，寨房高大坚固，廓尔喀兵固守不出，从墙孔施放鸟枪、投掷石块。随后数日，清军多次进攻，抛掷火弹，烧毁东边寨房，但西北官寨却屡攻不克。五十七年正月初九日，鄂辉率兵赶到，与成德会合，兵力达到 1200 余名。这时在聂拉木西北官寨内困守的廓尔喀兵仅有

---

① 《廓尔喀纪略》卷十八，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福康安奏。

② 《廓尔喀纪略》卷九，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福康安奏。

③ 《廓尔喀纪略》卷二七，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十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奏。

100 名，但鄂辉、成德“只图自守之计，不为进剿之谋”①，大部兵力被派往木萨桥、拍甲岭、第哩朗古、萨喀等处，分兵把口，而在聂拉木担任攻剿作战的仅有 500 名。即使如此，清军兵力仍有 5 倍于敌的优势，但鄂辉、成德作战消极，不敢大胆进攻，认为廓尔喀兵凭借寨墙墙孔施放鸟枪，“官兵扑近，难免受伤”②，寄希望于火攻。但因连降大雪，清军不但火攻屡屡受挫，而且有 20 余名官兵冻死冻伤。清军曾挖掘地道数处，均因遇巨石而受阻，从二十日开始利用西面墙角通向寨内的一道沟渠为掩护，连日挖成长 3 丈余的地道。二十四日，运进炸药 40 包，点火爆炸，将大部墙垣寨房炸塌，清军乘势攻入，将敌人全部歼灭，攻占聂拉木。

（四）济咙之战

清军收复聂拉木，并且后续部队正继续向西藏进发，对廓尔喀当局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致书鄂辉、成德和西藏活佛，请求清廷罢兵议和，但又不认罪，甚至把入侵西藏的原因归之于西藏背约。与此同时，廓尔喀侵略军仍占据着济咙、绒辖等地，并增派军队，加修工事，企图固守。

乾隆帝接报后，立即指明廓尔喀“总借索欠为词，意在归咎唐古特人等，胁诱说合”③ 的实质，提醒福康安等人切勿中敌人的缓兵之计，而要坚持定见，激励将士，勇往直前，给敌以痛击，“必令贼匪畏威服罪，不敢再提银两，永远不犯藏界，始为完善”④。福康安发给廓尔喀檄谕，声讨廓尔喀的侵略罪行，表明清军坚持以武力保卫祖国领土，决不与敌人议和的原则立场，指出：“尔自外生成，辄敢称兵滋扰卫藏，不但占据边界，且敢

---

① 《廓尔喀纪略》二四，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一日，上谕。

② 《廓尔喀纪略》卷十九，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二日，鄂辉、成德奏。

③ 《廓尔喀纪略》卷二五，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上谕。

④ 《廓尔喀纪略》卷二七，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上谕。

侵犯札什伦布，将庙宇塔座损坏，镶嵌金什物肆行抢掠，尔岂不思卫藏之地，岂容尔等作践。……今本将军奉命亲统大兵，问尔廓尔喀之罪，惟有将尔部落一举荡平，申明天讨，尔等从前所议钱债细事，概不值理论，现在调集各兵，源源而来，克期进发，捣尔巢穴，务在悉数歼擒，不留余孽。此皆尔孽由自作，速取灭亡，恶贯满盈，罪在不赦。至尔给噶布伦信内称，'若能说合，也免汉番官兵并廓尔喀的生灵受罪，如要动干戈，我处也预备'等语，尤属妄诞。……本将军共行天罚，号令严明，即日统兵进剿，断不似从前与尔说和完事，谅宜知悉。"①

二月十七日，福康安从拉萨起程，二十七日到达后藏。三月，清廷授福康安为大将军。鉴于廓尔喀在济咙、绒辖等地已增兵筑垒固守，福康安认为应该待所调清军到齐后，再集中兵力向敌人进攻；济咙为进剿要路，必须先行收复。闰四月上旬，索伦兵、屯练土兵均已到藏，福康安、海兰察遂率领已抵后藏的6000名清军于十八日离开札什伦布，经拉子、第哩朗古、宗喀等地，向济咙进军。五月初六日，进抵距擦木仅数十里的辖布基。擦木为济咙外围的一个要地，两山夹峙，中亘山梁，路径狭窄，廓尔喀兵在山梁扼要之处前后筑石碉两座，三面临河，均砌筑高约2丈的石墙，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向北面的寨门。由于擦木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福康安决定利用夜暗，隐蔽地向敌人发起进攻。当日适值阴雨，入夜后雨更大，清军冒雨出发，分三路秘密向敌寨运动，途中涉水渡过数道河流，于初七日黎明时进至擦木。福康安督兵迅速登山，潜至敌寨墙外，搭人梯越过寨墙，打开寨门，一拥而入，夺占前碉。后碉更险要坚固，廓尔喀兵在碉内放枪投石，死命固守。清军毁墙冲入碉内，短兵相接，奋勇杀敌。此战清军前后杀敌200余名，一举占领擦木。

为了保证主力顺利向济咙进军，福康安遣成德、岱森保率兵3000名由聂拉木南进，以牵制廓尔喀兵力；令诸神保率兵1000

---

① 《廓尔喀档》，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份，《福康安檄谕廓尔喀文》。

名驻守绒辖要口窝朗卡，以防敌抄截后路。五月初八日，福康安督兵乘胜前进，途中在玛噶尔、辖尔甲击败自济咙前来偷袭的廓尔喀兵，歼敌近270名。初九日，进至济咙。济咙寨碉高耸，形势险固。官寨建在山冈上，用石砌筑，高大宽广，周围叠石为垒，高及2丈，密排鹿角桩木。官寨西北临河处砌大碉一座，直通官寨，便于取水；东北石崖上砌大碉一座，倚石为固；东南山梁上砌石碉一座，山势陡峭，难于攀登；山下喇嘛寺与东南石碉斜对，各处碉卡可互相应援，成犄角之势，廓尔喀兵分据险要，负隅固守。福康安在摸清地形、敌情之后，决定采取攻击官寨的同时，分兵进攻各碉卡，待将各碉卡之敌歼灭后，再集中兵力进攻官寨的战法。初十日丑时（1～3时），清军利用夜暗，兵分多路，同时向既定目标发起攻击，海兰察率领索伦骑兵往来截杀。哲森保部、蒙兴保部首先攻占东南山梁和山下喇嘛寺。福康安随即调哲森保部增援巴彦泰部，合力攻击临河大碉，清军用大炮将碉座轰塌一角，跳河逃跑的廓尔喀兵不是淹死就是被索伦骑兵截杀。东北石崖大碉，被桑吉斯部用火弹焚毁。据守官寨的廓尔喀兵在阿满泰部清军的猛烈攻击下，从石垒退入寨内，放枪投石，拼死抵御。此时清军已肃清周围各据点，福康安遂集中各部清军合力进攻，一面用炮轰击官寨，一面架梯攀登，拆毁寨外石垒后，接近官寨。午后，清军冒雨连续作战，直至亥时（21～23时）始将官寨攻破，收复济咙。此战，廓尔喀兵除投河落崖者及在碉寨内伤毙者外，640余名被杀，198名被俘。

十二日，岱森保部在德亲鼎山连克敌卡三处，进至下木萨桥。至此，清军已基本收复了被廓尔喀侵占的领土。

三、追击逃敌，深入廓尔喀

早在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入侵西藏之初，乾隆帝就一再强调，对入侵我国领土的廓尔喀，必须慑以兵威，痛加惩创，并深入敌境，迫其降服，此为一劳永逸之计。福康安遵照乾隆帝的旨

意，早已做好深入廓尔喀境的准备。所以，收复济咙之后，福康安只用两天进行休整，即于五月十三日，率 6000 名清军冒雨起程，向热索桥开进。

热索桥位于济咙西南中廓两国交界处,是在一条自东往西流的河流上浮搭木板而成的渡桥,该河注入玛尔臧河后往南流入廓尔喀,廓军在南北两岸均筑有石卡,据险守御。十四日晨,清军经过一昼夜行军,到达热索桥附近时,北岸守卡廓军无法抵御清军的猛攻,弃卡逃跑,南岸守桥廓军仓促撤去桥板,隔河施放枪炮,阻止清军过河。十五日寅时(3～5 时),福康安令清军从河边正面佯攻,同时派兵越山绕至距桥六七里的上流,扎筏渡河,直扑敌卡,正面清军乘守敌慌乱之机夺据热索桥,搭桥渡河,进入廓尔喀境。

福康安率军南下，所过之地，均为高山大河，山势险峻，水流湍急，路径逼仄，难于通行，有时不得不一边修路一边前进。因受地形限制，“缘山顺河，并无容足之地，不能扎营”，清军“俱在石岩下露宿”，廓尔喀也因“沿途无驻足据守之处”而未驻军防守，所以最初几天清军进军比较顺利，“深入贼境一百六七十里，未见一贼”①。

廓尔喀采取集中兵力，重点防守协布噜、东觉等几个战略要点的方略。协布噜与热索桥形势相似，西、北两面临河，西面是玛尔臧大河，北面是东西向的支流，支流北岸的旺堆山坡低缓，南岸山坡极高，廓尔喀在山崖上树木城，外筑石墙，玛尔臧大河东西两岸均筑卡驻兵，在支流上游 30 里处的克堆，建寨数座，屯兵极多。五月二十日，福康安率兵至旺堆，见河上桥座已被敌人拆毁，遂指挥清军一边用炮轰击南岸廓军，一边伐木搭桥，但连战两日，搭桥均告失败。二十二日，福康安改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令惠龄留旺堆正路佯攻，牵制敌人，派台斐英阿率部绕至玛尔臧河西岸，攻廓军卡垒，福康安、海兰察率军绕过数道大山，

① 《廓尔喀纪略》卷三四，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三十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奏。

于次日黎明到达支流上游北岸，因廓军在对岸防守严密，且河水湍急，搭桥十余次均未成功。傍晚，大雨滂沱，福康安佯令撤退，而于夜半待廓军回克堆寨后，缚木渡河，然后兵分三路，潜至克堆寨周围，占据有利地形，于二十四日黎明时出敌不意发起攻击，焚毁敌寨后，直逼协布噜。此时台斐英阿部也翻山越岭，绕至玛尔臧河西，攻克敌寨，从西面夹攻协布噜。廓军见状，放弃木城石卡，拼命逃跑。留在旺堆的清军乘势搭桥渡河，与海兰察部一起，追击逃敌。此战，清军连战5天，共杀敌500余名，夺占了敌重兵防守的协布噜。

福康安率兵自协布噜前进110里，到噶多驻营，准备攻取东觉。自噶多南行，翻越作木古拉巴载山和一条东西向的河流，即是东觉，此为正路。东觉“为贼境险要之地，贼匪据险设备，前后高下，分布颇为联络”；自噶多东南越山至雅尔赛拉、博尔东拉一带，廓尔喀亦有重兵防守，该处“系属间道，与正路互为犄角，最关紧要”①。噶多一带“山径丛杂，处处相通”②，为防止廓军邀截清军后路，福康安决定从正路和间道两路进军。六月初三日，两路清军分别起程。福康安率兵至作木古拉巴载山，令台斐英阿等留守山梁，用大炮昼夜轰击，牵制敌人，自率主力潜往噶多普，于初六日下至山麓，浮水渡河，督兵猛攻。台斐英阿得知主力已渡过河，亦下山搭桥渡河，攻击廓军木城石卡。海兰察一路由间道昼夜潜行，初六日黎明由博尔东拉山巅向下冲击敌营，将敌木城石卡拆毁后前往东觉与福康安会合，追击逃敌。此战，清军以伤亡100余名的代价，攻克东觉，捣毁敌营寨、碉卡、木城等50余处，杀死、俘获廓军780余名。

奉命在聂拉木一路牵制敌人的成德、岱森保部，于五月下旬攻克札木和铁索桥后，也进入廓尔喀境，占领多洛卡、陇冈等地。

福康安、海兰察率军由东觉乘胜进军，于六月初九日进至雍

①② 《廓尔喀纪略》卷三五，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四日，福康安、海兰察奏。

鸦。廓尔喀军已在对面噶勒拉山等地据险设防，清军在雨雪中连续行军作战，官兵多有伤病，极度疲惫，口粮也已食尽，无法继续进攻，只得在雍雅就地休整。在此期间，廓尔喀不断派人向福康安乞降。原来清军进入廓尔喀仅20天，即前进数百里，连克协布噜、东觉等要地，威逼阳布，廓尔喀看到难以抵御清军的进攻，遂试探与清军议和，从六月初开始，先后分两批将先前抓去的兵丁王刚、噶布伦丹津班珠尔、营官聂堆及藏民等近30人全部释放，令王刚等并遣大头人普都尔帮哩赴福康安行营，投递国王拉特纳巴都尔五月二十八日和六月初九日、十八日的书信，说明抢掠后藏和诱执兵丁、噶布伦等皆系沙玛尔巴唆使，沙玛尔巴已于五月十五日病死，表示如准其归顺，"情愿磕头投降"①。福康安认为廓尔喀并非真心乞降，而是缓兵之计，故提出廓尔喀只有遵守以下条件，才准予投降，即：拉特纳巴都尔及其叔巴都尔萨野亲来大营叩头请罪，将沙玛尔巴焚化后的遗骨送出呈验，交出从前与西藏地方官员喇嘛签订的两份合同，送还从札什伦布抢掠的财宝，全部撤出噶勒拉等地驻守的廓军，等等。如有不遵，即统兵进剿。

由于一直得不到廓尔喀方的答复，福康安遂于七月初二日指挥清军向廓尔喀军进攻。雍鸦以南，山势皆南北相向，层叠横亘，陡峻异常。清军进战，全须仰攻。自辰时(7～9时)激战至半夜，占领噶勒拉、堆补木两山。堆补木山下为东西向的帕朗古河，河南为甲尔古拉大山与集木集大山，山梁东西连贯七八十里，廓军据险设木城碉卡数十处，守御极为险固。初三日，福康安率兵至帕朗古河北岸，激战半日，攻克桥北敌卡，夺占大桥。福康安"以为势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骄满"②，不采纳海兰察扼河立营的建议，率兵

---

① 《译出贼酋拉特纳巴都尔来禀》，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0页。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廓尔喀之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5页。

过河，冒雨向甲尔古拉山进攻。山崖陡险路滑，清军艰难地行进20余里，接近木城时，廓军居高临下，施放枪炮，清军仰攻，没有树木等可以掩蔽身体，只得撤退下山。山上廓军从高处冲下，驻集木集大山的廓军从旁抄出配合，另有一股敌兵在大河西隔岸放枪，三路共约七八千人一齐来犯，清军"且战且却，死伤甚众，赖海兰察隔河接应，而额勒登保扼桥力战，乃退贼"①。此战，持续两日一夜，清军深入雍鸦70余里，夺占帕朗古大桥，攻克木城4座、大小石卡11处，杀敌600余名，然而清军未能攻占甲尔古拉山，并付出了沉重代价，护军统领台斐英阿等中枪阵亡。

四、廓尔喀乞降，福康安撤兵

廓尔喀虽然在甲尔古拉山之战中阻止了清军向阳布的推进，但并没有根本解除威胁，遂乘胜遣使议和，表示接受福康安提出的除国王亲自来营请罪的所有条件，并于七月十七日向福康安呈缴大小合同、沙玛尔巴遗骸等物。由于清军在甲尔古拉山受挫，福康安不再坚持"擒渠捣穴"的终极目标，七月初九日，他在奏报中一方面承认廓尔喀态度十分恭顺，另一方面大谈清军进兵的困难，尽管他仍然表示"臣等身当巨任，虽贼匪畏惧乞哀，断不敢遽存将就了事之见"，但已显露出倾向议和的意思②。十九日，他更全面分析了清军的不利处境，认为清军兵力不足，粮饷不继，廓尔喀地势险阻，备御坚固，断难擒渠捣穴，且时届深秋，藏地早寒，冰雪封山，恐难久驻，"与其悬军深入，难以计出万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五，《乾隆征廓尔喀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6页。

② 《廓尔喀纪略》卷三九，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福康安、海兰察奏。按：此折七月初九日发出，八月二十二日奏到。

全，莫若宣示恩威，尚可永绥边境"①，建议接受廓尔喀乞降。

乾隆帝也看到了清军的困难，希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八月初九日，他传谕福康安等人说："藏内气候骤冷，……今岁节气较早，计九月中旬雪霰已在所不免。若非及早蒇事，撤兵回至内地，军需等项无由挽运，设粮运稍有不继，是进不能直捣贼巢，退又为大雪所阻，岂不进退两难，所关匪细！是以早经降旨，令福康安就近筹酌，如实在万难进取，不妨据实奏明，受降完事。"② 二十二日，接到福康安七月初九日奏折后，立即令福康安传谕廓尔喀，"赦其前罪，准令纳表进贡，悔罪投诚"，并令福康安等"亦即撤兵回至内地"③。

七月二十七日，廓尔喀缴出以前抢去的札什伦布银两等物件，请求"差办事大头人等进京请罪谢恩，瞻仰大皇帝天颜"④。拉特纳巴都尔在得到准许后，于八月初八日遣办事大头目噶箕第乌达特塔巴等四人到北京朝贡，并由福康安转奏，允诺"廓尔喀永远遵奉约束，不敢丝毫滋事，不但西藏许银之语不敢再提一字，即如济咙向来有给与鹰马之例，亦永远不敢索取"，"聂拉木边外札木地方，……五辈达赖喇嘛时曾归藏内管辖，从前私立合同内所写札木归给廓尔喀之语，实属不知分量，今情愿仍属西藏，亦不敢提及"⑤。福康安遵奉乾隆帝旨意，接受廓尔喀乞降，第二次廓尔喀战争结束。

八月二十一日，福康安率清军自帕朗古起程回国，九月初四日全部撤至济咙。十月初三日，乾隆帝发廓尔喀敕谕一道，赦其

---

① 《福康安等密陈军行困阻宜早受降完局折》，《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56页。

② 《廓尔喀纪略》卷三八，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九日，上谕。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一，乾隆五十七年八月戊子。

④ 《明清史料》庚编第九本，《礼部〈为内阁抄出大学士公福奏〉移会》。按：《廓尔喀纪略》卷四一记为"八月二十七日"，误。

⑤ 《廓尔喀纪略》卷四二，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十六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奏。

侵犯西藏之罪，准予纳表进贡。十二月二十七日，封拉特纳巴都尔以王爵。

五、确立章程，做好善后

第二次廓尔喀战争爆发之后，乾隆帝就认识到战争的发生与西藏政治宗教制度的弊端不无关系，因此决心趁此机会整顿藏政，以期永绥卫藏。乾隆五十六年底，他谕军机大臣说："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及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致屡次滋衅，成何事体。……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即可更换进京。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遇有应办事件，当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等与在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① 这一谕旨既指出了藏政的种种弊端，也指明了藏政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乾隆五十七年，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乾隆帝对筹议善后章程一事屡降谕旨。福康安等遵旨先后拟定《酌定额设藏兵及训练事宜六条》、《酌拟卫藏善后章程六款》、《藏内善后条款外应行办理章程十八条》等各项善后章程，分别奏请。经议复奏准后，福康安将上述各项章程主要条款汇集成二十九条，于五十八年正式颁发西藏地方政府遵行，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②。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三，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丙寅。

②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汉文原件至今未见，西藏档案馆收藏之藏文件作《水牛年文件二十九条》。

《藏内善后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军事、外交、财贸等各项制度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督办西藏政务，与达赖、班禅平等；在达赖、班禅和各地黄教呼图克图转世时，监督履行“金瓶掣签”手续；会同达赖喇嘛拣选西藏地方僧俗官员和喇嘛，奏请补放；管理西藏地方驻军，会同达赖选任军官，巡视边界；全权处理西藏对外交涉事宜；稽核西藏地方财政，等等。该章程还规定建立西藏地方常备军，在边界设兵驻防。《藏内善后章程》的颁行，标志着清朝在西藏的施政更为完备，不但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而且对密切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巩固西南边防和安定西藏社会秩序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四节 战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两次廓尔喀战争，都是由廓尔喀首先入侵我国神圣领土西藏挑起的，清王朝被迫派兵入藏，抗击侵略者，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清军在西藏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将侵略者驱逐出西藏，收复了被占领土，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从而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了西藏人民的利益。清朝对入侵者狠狠打击，但一旦敌人乞降，立即从廓尔喀撤军，没有索取其一寸土地和一分银两，显示了大国的气度和正义之师的风范，为两国间友好相处打下了基础。

前后两次战争，乾隆帝都提出对入侵者要“慑以兵威，痛加惩创”，然而结果却截然不同，前一次“未交一兵，而靡饷百万”①，后一次不但将侵略者驱逐出西藏，而且“深入八百里，俘擒斩获以三四千计”②，迫使敌人乞降，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五，《乾隆征廓尔喀记》，第235页。

② 杨揆：《廓尔喀纪功碑文》，黄沛翘辑：《西藏图考》卷七，清光绪丙戌刊本。

从这两次出兵结果的比较中，可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

第一，在边疆地区屯驻足够的兵力，是巩固边防的必要条件。军队是保卫边疆的主要力量，所以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边防部队的建设。在边疆地区“镇以重臣，屯以劲旅”①，则是清代治边的主要原则，康熙帝在与沙俄侵略者的斗争中，就提出了“永戍官兵”的思想。西藏地区，虽然从雍正年间就驻有绿营兵，但数量很少，而藏兵由于缺乏训练，战斗力极弱，难以担负起保卫边疆的重任。所以两次廓尔喀战争，清廷不得不从内地调兵，跋山涉水，费时数月，才能入藏，错过了打击侵略者的最好时机。

第二，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入侵之敌必须狠狠打击。第一次廓尔喀战争时，乾隆帝得知西藏仲巴呼图克图等人私下与廓尔喀议和的消息后，立即告诫派赴西藏的钦差巴忠、成都将军鄂辉等人，不可将就讲和，当示以兵威。但是巴忠等人却支持与廓尔喀议和。由于廓尔喀这次入侵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事隔不久，又再次入侵西藏。第二次廓尔喀战争时，如果不是福康安坚决执行乾隆帝“慑以兵威，痛加惩创”的谕旨，在济咙、热索桥、协布噜、东觉、帕朗古等地连打几个胜仗，廓尔喀决不会真正悔罪归降。战后，乾隆帝总结经验教训说：“远徼外夷，偶有跳梁不靖，必得痛加惩创，使之中心畏惧，然后受其归降，始能久而不变。”② 事实也是如此，从第二次廓尔喀战争之后，廓尔喀与西藏之间，出现了60余年的和平局面。

第三，前敌主帅的选任关系着战争的成败。西藏与京师相隔万余里，通信联络极为不便，前线战报要月余才能送达京师，朝廷既难于掌握前线的真实情况，也不可能随时进行作战指导，一切全靠前敌主帅的组织指挥。在这种情况下，前敌主帅的选任尤

---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② 弘历：《廓尔喀拉特纳巴都尔遣使悔罪乞降，因许其请，命凯旋班师志事》，《廓尔喀纪略》卷首二。

为重要。第一次战争时乾隆帝派往西藏的大臣、将领，如巴忠、鄂辉之流，不但支持西藏地方官员、喇嘛与廓尔喀议和，而且在奏报中隐瞒实情，骗取朝廷撤兵的旨意，一场反侵略战争竟草草了结，乾隆帝为用人不当引以为愧，写下了“示和悔用巴忠错”① 的诗句。第二次战争时选派不畏艰险、勇于任事、有组织指挥才能的福康安为主帅，则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由此可见，古人“用兵之要，在先择于将臣”② 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第四，清廷和西藏地方同心协力，筹办粮饷，保障补给，是战争能够胜利的重要原因。清军入藏作战，途远路险，粮饷补给异常困难，但乾隆帝对后勤补给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决心大，措施得力，第二次战争期间先后调拨775万军费，命大学士孙士毅、工部侍郎驻藏大臣和琳、参赞大臣四川总督惠龄筹办粮饷，分段督运。为激励他们，特谕“转输之功与接战之功无异”③。孙士毅等人针对四川、西藏两地特殊的地理、气候和社会条件，采用内地拨运、途中采买和在西藏就地采办、广为储备等办法，筹集军粮，并组织动员各种力量转运。西藏僧俗官员大力支持清廷出兵抗击廓尔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萨迦呼图克图等捐助糌粑牛羊，帮办粮运。在清廷和西藏地方的共同努力下，粮饷等得以源源接济。第二次廓尔喀战争时，福康安到达后藏后，对军粮筹办情况甚为满意，他向清廷报告说：“现在藏内所备之粮，共有七万四千五百余石，牛四千三百只，羊二万五千余只，此外尚可添办粮二万石，计算粮数已足供一万五六千人一年有余口粮，即添兵数千名已属有盈无绌，况此次进剿贼匪，……断无须办至一年之久，是藏内所办粮石，不但毋虞缺乏，实

① 弘历：《副都统成德奏报追剿廓尔喀贼匪情形，诗以志慰六韵》，《廓尔喀纪略》卷首一。

② 欧阳修：《除李端懿宁远军节度使知澶州制》，《欧阳修全集·内制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670页。

③ 杨揆：《廓尔喀纪功碑文》，黄沛翘辑：《西藏图考》卷七。

已支应敷余。”① 后来福康安率6000余名清军，深入廓尔喀境内700余里，未曾一日断粮。除粮饷外，军火武器等物资的补给也很充分及时，保证了战争的需要。

① 《廓尔喀纪略》卷二六，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三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奏。

第十七章　康乾军事思想

第一节　康熙帝玄烨的军事思想

玄烨（1654～1722），顺治帝第三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病死，年仅8岁的皇太子玄烨即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改元康熙，以明年为元年。康熙六年（1667年），14岁的玄烨亲政，但实权仍操在鳌拜手中。鳌拜恣意妄为，结党乱政，根本不把年幼的皇帝放在眼里，“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①，甚至称病不朝，要康熙帝亲去问疾。颇想有所作为的康熙帝当然不想做任人摆布的傀儡，决心搬掉这块妨碍国务活动正常进行的绊脚石。八年五月，按照康熙帝的策划和部署，埋伏在宫中的侍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入宫的鳌拜逮捕，软禁终身，其党羽也被捕杀殆尽。从此，康熙帝牢牢地掌握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之一。

康熙帝不但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军事家。他曾说过：“朕自即位以来，办理军务甚多。……部院诸事，朕尚与诸臣商酌之，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画。”② 正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显露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并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

---

① 《满洲名臣传》卷五，《鳌拜列传》。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三，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庚辰，中华书局影印本。

一、国防思想

（一）“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

康熙帝从民本思想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认识到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国家不可能安定，他的皇帝宝座也不可能稳固。所以，他非常重视人心的向背，认为它比长城、武器等物质的东西重要得多。康熙三十年（1691年），古北口总兵蔡元上疏，建议修复倾塌的长城。康熙帝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① 康熙二十一年，监察御史拉塞提出，三藩之乱已经平定，除陕西近边及沿海省分外，其余省分应禁止火器。康熙帝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说：“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于火器何与！夫火器，孰有多于吴三桂者乎？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② 可以看出，康熙帝已认识到，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是人心得失，所以他非常赞赏孟子“仁者无敌”的思想。他说：“仁者无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③

基于以上的认识，康熙帝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一方面通过赈济、蠲免地丁钱粮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负担，以“修德安民”，争取民心。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蒙古在噶尔丹军侵入漠北以后，全部迁入内蒙古。康熙帝命“发归化城、独石张家二口仓储，并赐茶布牲畜十余万以赡之，暂借科尔沁水草地使游牧”④。三十年，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四，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己卯。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三，康熙四十九年九月辛亥。

④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与内外蒙古各部首领举行会盟。期间，他巡视喀尔喀营寨，“其穷困者赏以银、布”①，又以大批牛羊赏给喀尔喀贵族。虽然受益的主要是喀尔喀贵族，但也有利于喀尔喀人民的休养生息，因而赢得了喀尔喀蒙古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当年五月，康熙帝在多伦会盟之后返京途中对扈从大臣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② 康熙帝这个思想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对噶尔丹的战争中，喀尔喀人民不但为清军“引路、探信、牧马、掘井”③，而且出动精骑配合清军作战，战争的胜利，是与喀尔喀人民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康熙帝在“施恩”喀尔喀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蒙古诸部的管辖和治理，发展了蒙古地区的经济，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密切了清王朝与蒙古的关系，巩固了北部边防，筑起了一道遏制沙俄入侵的坚固长城。

（二）“凡中国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人”

沙俄侵略者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 年）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至康熙六年（1667 年）康熙帝亲政时，侵占我国领土已长达 20 余年。富有爱国思想的康熙帝从亲政时起，就十分关注这一事实。他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平定三藩叛乱、统一台湾之后，康熙帝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北方的俄罗斯。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向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等人谈了他对解决中俄争端的看法，明确指出：“向者，鄂罗斯无故侵扰我边陲，后复渐入，越我疆界，索伦、赫哲、费雅喀、奇勒尔等处之人，皆被扰害，不获宁居。”他指示清政府派人与沙俄交涉，要求侵占我雅克萨的侵略者“当即返雅库（今俄罗斯雅库茨克）地方，以雅库为界，于彼处捕取貂皮，于彼土收其物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庚寅。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丙子。

产，勿入我边界，恣意妄行”①。康熙帝力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由于沙俄侵略者无视清政府的严正立场，继续霸占中国的领土，康熙帝在继续争取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的同时，也主张以武力驱逐侵略者。二十四年三月，康熙帝在给俄国沙皇的敕书中，详尽地阐发了上述思想，他说：“向者，尔国居于尔界，未曾侵扰我界，边民咸宁。后尔罗刹入侵我境，骚扰地方，抢掠百姓妇孺，滋事不止。……观尔罗刹并无停止侵扰之势，故兹出兵征讨雅克萨。……倘尔怜悯边民，使之免遭涂炭流离之苦，不至兴起兵革之事，即当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某地为界，于该处居住捕貂纳税，勿入我界滋事。若遵朕谕旨而行，即令我征讨大军停止前进，撤至边界地方。如此，则疆圉帖然，而无侵扰之患，贸易遣使，和睦相处。”②

从上述谈话和敕书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在与沙俄侵略者斗争的过程中，已经萌生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第一，沙俄侵略者无故越界，侵扰我边疆，占领我领土，扰害我百姓，是一种侵略行径。第二，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决不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存在。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有权诉诸武力。第三，两个国家的边界必须区分清楚。第四，两国间正确的关系应该是各居疆土，互不侵犯，派遣使臣，贸易往来，和睦相处。

尽管当时清王朝还没有与邻国划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边界，但康熙帝在与沙俄侵略者的斗争中，已经提出了边界的概念，并认识到边界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康熙帝主动撤军，与俄国进行边界谈判。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明确指出：“和睦相处，

---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一。

② 《康熙帝为再次敦促俄人即速撤出雅克萨事致俄沙皇敕书》（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页。

勘定边界，事关紧要。”①

康熙二十七年，在清政府谈判使团赴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参加中俄边界谈判之前，康熙帝召见索额图等使臣，就中俄谈判的有关事宜发布了重要谕旨。第一，首先回顾了中俄两国交恶的历史，指出其根源在于“罗刹侵我边境”，“据我属所居尼布潮（尼布楚）、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第二，指出黑龙江流域的重要地位：“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今牡丹江），及乌喇（即乌拉，今吉林市）、宁古塔（今宁安）、席北、科尔沁、索伦、打虎儿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净溪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第三，康熙帝进一步深化了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最后，强调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和约，划定两国边界，“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②。

为了保卫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和领土的完整，康熙帝提出了在边疆地区驻兵永戍的思想。早在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即已认识到，若不在边境地区驻兵，虽然将侵略者驱逐出去，也难以保证边疆的安全，将会出现“我兵进则鄂（俄）罗斯退，我兵还则俄

---

① 《议政王大臣等题应行文催促俄使臣速来议划边界本》（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80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

罗斯又进，用兵无止息之日，而民生亦不获安"① 的局面。当时清政府的文武官员因为对在边疆驻兵永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之黑龙江地区人口稀少，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不愿在边境长驻。康熙帝毫不动摇，一再强调驻兵永戍的思想。康熙二十六年，他再次提出"多贮粮食，永戍官兵"的问题。康熙对兵部尚书鄂尔多说："若黑龙江我兵不能永戍，自松花江、黑龙江以外，所居民人皆非吾有矣。尔等皆系选择差遣，往至彼处，殚心竭虑，务期为久远充裕之计。"②非常显见，康熙皇帝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思想感情已溢于言表。

二、建军治军思想

康熙帝曾写过一篇《提镇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建军治军思想。全文抄录如下：

"武臣之职，建威销萌。星罗棋布，以壮干城。韬钤宜裕，纪律宜明。拊循宜至，训练宜精。计安黎庶，爰设五兵。《易》言畜众，《诗》咏求宁。闾阎参伍，勿扰吾氓。山无伏莽，海绝长鲸。民恬耕凿，惟尔之能。馈饷食给，毋致呼庚。尔能廉洁，众以饱腾。投醪饮河，古史所称。惠逮卒伍，忠爱乃生。如捍头目，如卫父兄。群众从违，视尔攸行。文武辑睦，毋相抗衡。军民调剂，齐持其平。朕亲简阅，黜陟有程。下逮偏裨，选授匪轻。才勇必录，窳惰必惩。矧尔大帅，节钺是膺。宜体朕意，勉竭股肱。"③

康熙帝与臣僚的谈话和下达的谕令中，也有不少是关于建军治军问题的，现综合论述如下：

（一）"训练宜精"

---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一。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己巳。

③ 《清六朝御制文集》康熙第二集卷三五，《箴》。

康熙帝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在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中，康熙帝发现八旗兵已丧失了昔日能征善战的锐气，将怯兵懦，士气低落，一再贻误战机。为此，在平叛战争胜利的当年，康熙帝即建立木兰围场，以加强八旗兵的训练。康熙帝一再强调训练的重要性，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①，并谕令全国各省的驻防官兵都要行围习武。康熙二十四年，他强调指出，“国家武备不可一日懈弛”；在国家承平之时，“训练士卒，简阅军器”，是“修武备”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每岁操练将士、习试火炮的旧例②。乌兰布通之战时，由于主帅指挥无方，部分将领临阵退缩，使本来可以聚歼敌人的一次作战打成了击溃战；清军因缺乏训练，“未熟于战阵”，增大了伤亡。对此，康熙帝非常痛心和懊悔，从血的教训中，他深感“从古行兵，未有不预操练者”③的道理。此后，他“简阅官兵，岁凡两举”④，“春秋二季，令八旗官兵，集于宽敞平原之地，排列阵势，鸣锣进退，以熟操练”⑤。曾在清廷供职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于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在向法王路易十四写的一份秘密报告中，曾提及康熙帝重视军队训练和清军训练的情况。他说：“皇上还特别注意军队的练兵活动。按规定军队在春秋两季各两个月，每五天要有一天操演武艺。这项规定适用于驻守京师的所有军队，因此在练兵季节，每天都有五分之一的驻军在操练。皇上时常诏令京师军队，也有时令其中的一部在御前比武，军事技术熟练的人可以得到奖励。”⑥康熙帝每次出巡、行猎，都注意考察清军的训练、素质等方面的情况。他发现，那些平时不多训练的部队，官兵既不整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二，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丙寅。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三，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甲戌。

③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丁酉。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一，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戊子。

⑥ ［法］白晋：《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齐，且多羸弱，不耐劳苦，战时必不可用；而只要勤于训练，庸弱的部队亦可振作，骑射俱佳。由此，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官兵全须训练"①；"兵在训练之善不善耳，不关乎风土也"②。

难能可贵的是，康熙帝还认识到"学而知之"的重要性。他说："凡事必亲历乃知。"③ 只要认真学习，反复实践，就能增长才干。他回忆起自己几十年的军事生涯，说："朕于骑射哨鹿行猎等事，皆自幼学习，稍有未合式处，侍卫阿舒默尔根即直奏无隐。朕于诸事谙练者，皆阿舒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朕所以屡谕尔等者，以尔等年少，宜加勤学。凡事未有学而不能者。朕亦不过由学而能，岂生而能者乎！"④ 这是康熙帝强调训练的理论基础。

康熙帝还认为，部队的训练，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不能搞一个模式，一刀切。康熙三十六年七月，新任浙江黄岩总兵徐九如赴任前向康熙帝请训，徐是北方人，康熙帝对他说："南北情形不同，操演兵丁，各随土地之宜，不可拘泥，以北方操演之为善。"⑤ 这种按照实际情况决定训练内容和方法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二）"纪律宜明"

康熙帝重视军队的纪律，指出"节制不严，则骄惰之兵众"⑥，而"师出以律，可奏肤功"⑦。康熙三十四年，他在总结清军致胜的原因时，就把"军纪森严，信赏必罚"⑧列为第一位。

重军纪的思想古已有之，康熙帝把严明纪律和不扰民、得民心联系在一起，则是他民本思想的深化和延伸。康熙十二年底，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五，康熙四十三年二月丁酉。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二，康熙四十九年四月壬寅。

③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④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五，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己未。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四，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壬午。

⑥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六，康熙五十二年十月癸未。

⑦⑧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八，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

清廷派兵讨伐吴三桂叛乱。康熙帝在审阅兵部拟定的《出师禁例》时指出："遣发大兵，原为扫靖叛逆，以安百姓"。他估计清军所到之处可能发生"恃强掠民财物，拆人庐舍，坏人器具，污人妇女，扰害生民"之事，因而谕令统兵将帅："申明纪律，严加钤束。倘有违禁妄行，从重治罪"①。次年正月，提出了"行军之道，惟得民心为要"的思想，并要求做到"厚加抚恤，严禁侵掠"，"无犯秋毫"②。康熙三十三年十月，康熙帝在颁给将军的敕书内，把"勿得累民"放在首位，强调指出："凡行兵，若无纪律，断不能成事。前南方用兵时，不扰民者皆克成功；凡扰民之兵，无一成功者。"③ 这样就把军纪、不扰民和事业成败的关系阐述得更透彻、明确了。当然，康熙帝强调纪律和不扰民，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而且由于清军的阶级本质，也决定了不可能真正做到"不扰民"。但康熙帝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贯彻执行，这对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康熙帝曾数次制定军纪，刊布全国。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他提出了一些初具规范的军令。三十四年十二月，又"规酌旧制，参以新谟"，拟定军令 17 条。这项军令，非常详尽具体。

（三）"才勇必录"

康熙帝认为，部队的素质是与军官的素质息息相关的，军官选好了，可以把一个素质差的部队带好。康熙帝选拔武官的标准是"才"、"勇"两个方面，要求"才勇必录"④。"才"包括军事技术（步射、骑射）和组织管理能力，善于行阵，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并且要有"事必率先"的品质。以上诸方面要综合考察，不能只执一端而定优劣。当时兵部考试武官，往往以射箭中的与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康熙十二年十二月癸亥。

② 《清圣祖实录》卷四五，康熙十三年正月乙亥。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五，康熙三十三年十月甲寅。

④ 《清六朝御制文集》康熙第二集卷三十五，《箴》。

否以及相貌身材为标准，康熙帝对此提出了批评，并对兵部提出的候选武职人员中“有战功实绩者，应免其部考，即准注册推补”① 的改革方案表示赞同。

对于高级军官，康熙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韬钤宜裕”②。他认为：“用兵无谋略学问，断然不能”③；“为将尚智不尚力”④。而要有“智”，有“谋略学问”，就要读书。不但高级将领要读书，中下级军官甚至士兵都要读书。而且只有武官爱读书，有学问，才能开拓风气。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康熙帝提出：“令兵丁读书考试，诚一美事。武职虽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若不知读书，则不知兵法。今提镇等官，俱简用学问优者，该管兵丁，令其教习，故为兵者，亦皆鼓舞而读书者多矣。”⑤中国古代一般不重视武官的文化素质，康熙帝提倡武职官员乃至兵丁读书，是十分可贵的。但他同时又认为，读书应有所分析，有所取舍。他在评论《武经七书》时说：“其书甚杂，未必皆合于正。所言火攻、水战，皆是虚文。若依其言行之，断无胜理。且有符咒占验风云等说，适足启小人邪心。……用兵之道，《七书》之言岂可全用?”⑥

（四）“爱惜兵丁”

士兵是军队的基础。没有素质良好的士兵，就不可能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而要使士兵服从指挥，勇于作战，除了要有一定的纪律以外，则要关心士兵，爱护士兵。康熙帝深谙此道，提出要爱惜兵丁，这是他“得民心”思想在治军问题上的体现。他说：“恤兵之道，宜亟讲也。”⑦ 又说：“兵虽良，如不善抚绥而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八，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辛丑。
② 《清六朝御制文集》康熙第二集卷三五，《箴》。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六，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壬子。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六，康熙二十七年七月乙酉。
⑤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癸亥。
⑥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三，康熙四十九年九月辛亥。
⑦ 《清六朝御制文集》康熙第四集卷九，《敕》。

困苦之，则兵虽良无用也。”① 所谓“善抚绥”，就是军官应廉洁，兵丁应得的钱粮要如数支给，不得克扣，这就是养兵之道。因此，康熙帝对当时清军中那些“虚悬兵数，冒食钱粮”，“剥兵以自肥”的军官非常不满。他告诫都统、总兵等武职大员：“尔等武臣多出身行伍，一旦居官，顿忘在昔为兵之苦而扣克粮饷，于心何忍！今虽末员，当计日后渐臻大任，可不存心爱惜兵丁乎?”②康熙帝不但教育高级将领对兵丁“拊循宜至”，而且身体力行。他曾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教育清军将领，说：“朕御极五十余年，无时不以爱养士卒为念，内而八旗禁旅，外而各省绿旗，视同一体，或代还积债，或遣官犒赏，或严禁克减，或察核虚冒，所以体恤之者，惟恐不至。”③ 综观康熙帝的一生，这话大致是不错的，他关心和爱护兵丁，并帮助他们解除困难和疾苦。例如，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巡视吉林，发现“兵丁役重差繁，劳苦至极”④，遂将各种无益差徭予以革除。雅克萨之战时，康熙帝“闻军士间有患疾者”⑤，即派出太医院医生携药赴前线为将士治病。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亲率大军深入漠北，“每驻营，上亲拊士卒，相水草”⑥。为解决兵丁的生活困难，康熙帝多次动用公帑，贷给兵丁，并将兵丁无力偿还的予以豁免。康熙四十二年颁发帑金 655 万余两贷给八旗兵丁，四十五年将未经扣取的部分进行豁免，五十年将绿营兵丁所借帑金 4.88 万两均予免除。

（五）信任降将，重用汉将

出于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力量的需要，康熙帝重视对敌人进行招抚，并认为：“归顺即良民矣”⑦。因此，他对投诚之人不杀

---

①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二，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己丑。

③ 《清六朝御制文集》康熙第四集卷九，《敕》。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二，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丙寅。

⑤ 《平定罗刹方略》三，《朔方备乘》卷首七。

⑥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帝征准噶尔记》，第 118 页。

⑦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五，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己酉。

不辱，妥善安置，使其各得生路。对投诚的将领，则量才授以官职，使之有职有权。由于受到信任，投诚归附的将领大都能实心任事，英勇作战。施琅原为郑成功部将，降清后先后任知县、总兵、提督、内大臣等职。平定三藩叛乱后，康熙帝拟命其为福建水师提督，统兵进取台湾。"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去必叛"①。康熙帝不但毅然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而且当施琅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在出兵时机等问题上意见分歧时，给予施琅专征权。在施琅进取澎湖台湾的过程中，康熙帝予以大力支持，提供各种方便的条件。应该说，施琅统一台湾的功业，与康熙帝的信任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又如林兴珠原是吴三桂的水师将领，归附后受到信任和重用，屡立战功，被授予侯爵。后康熙帝命其率藤牌兵赴黑龙江，林兴珠不负所望，雅克萨之战中英勇杀敌，立有大功，受到康熙帝的称赞。总之，康熙帝信任降将是很高明的一着，对取得历次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重用汉将，是康熙帝在用人方面的一大特点。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而建立的封建王朝，兵权掌握在以皇族为主的满洲贵族手中。平定吴三桂叛乱战争初期，康熙帝本是想依靠八旗将士，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那些统兵的王公贝勒等大臣，"不遵指授，互相观望，迁延不进，以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②。在这种情势下，康熙帝认识到仅仅依靠满洲兵将，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重用汉兵汉将。因此，他大力提拔、重用汉将。这些汉将在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西北战场，八旗官兵人数既少，又多怯战，因此，康熙帝一方面大力招抚影响西北局势的王辅臣，一方面把收拾乱局，稳定西北战场的重任交给张勇、王进宝、赵良栋等汉将，授张勇为"靖逆将军"，封"靖逆侯"，命其"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节制，一切征剿机宜，听尔便宜以行，镇将各官悉听统辖调

① 《清圣祖庭训格言》。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五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庚子。

遣"①。康熙十四年末，宁夏兵变，戕杀提督陈福，张勇荐天津总兵赵良栋继陈福为提督。赵良栋宁夏人，祖籍陕西。"议者疑公陕人，不可信"②，康熙帝却仍然命赵良栋为宁夏提督。张勇、赵良栋和西宁总兵王进宝并称河西三将，甘肃大局的恢复，得三汉将之力最大。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已死，南方形势渐定，然尚有汉中、兴安未复，而进兵四川，此为必取之地。八旗将领咸以恢复为难，康熙帝认为必须重用西北汉将才能奏功，因而他传谕张勇等："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③ 康熙帝作为清王朝的帝王，不可能把汉人与满人平等对待。他倚重汉将，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了汉人的力量，一方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在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上层贵族叛乱的战争中，康熙帝继续采取重用汉将的方针，也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五）"军中火器，甚属紧要"

康熙帝是一个重视科学技术的封建帝王。他生活的时代，火器已大量应用于战争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康熙帝看到了火器的重要作用，认为"军中火器，甚属紧要"④。他十分重视火器的制造，经常根据战争的需要和战场的特点，对火器的研制提出具体的要求，并亲临卢沟桥视察火炮试放。正是由于康熙帝的关心和重视，康熙年间是清代火炮制造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时期。在战争中，康熙帝随时抽调火炮加强某一地区的清军，并在清军中建立了专操火器的特种兵部队——火器营，从而使火炮充分发挥其作用。与清代其他帝王相比，康熙帝思想上较少保守，实行开放的政策，注意利用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学习、引进国外先进

---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三，康熙十四年三月丁丑。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九，《赵勇略》，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05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八五，康熙十八年十月辛未。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八，康熙二十九年九月癸巳。

的武器制造技术。康熙十三年，他命比利时人、耶稣传教士南怀仁制造火炮，并且提出“务加意精工，俾越山渡水轻便利用”① 的要求，从而使清代火炮趋向小型化。曾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当过康熙帝老师的法国人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奏折中曾这样说：“这位贤明的皇帝懂得尽可能充分利用一切对本国生存和发展有价值的东西。皇上刚刚了解到西式大炮和迫击炮的铸造法，立刻命令采取这种方法，铸造许多大炮和迫击炮。他还旨令每天连续铸造各种大炮和小炮，并令禁卫军官兵练习放炮、投弹等军事技术。此外，还备置了许多用一匹马或一头骡子即可拉着走的青铜小型野战炮，并制造一种非常轻便的三角炮架。这种炮架和野战炮需要的弹药一起由另一匹马或骡子驮运，这是皇上想出的办法。”②

康熙帝虽然重视火器的制造和使用，却不把火器看作是战争胜败、政权巩固与否最根本的因素。他从儒家“仁者无敌”的思想出发，认为“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并以吴三桂为例，说明火器再多，如果不行正义，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最终也是要失败的，所以他说：“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③。但是，康熙帝对火器又存有戒心，并严格地加以控制，以免危及其统治。他不仅规定严禁民间铸造和使用火器，甚至将子母炮等比较先进的火器只装备八旗兵，连绿营兵也不得制造和使用。这种政策无疑妨碍了火器的进一步发展。

三、作战思想

康熙帝作为清军的最高统帅，指挥过数次大的战争，并曾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康熙帝的作战思想，主要是这些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

---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八，康熙十三年八月壬寅。

② 〔法〕白晋：《康熙皇帝》，第 49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四，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己卯。

（一）“用兵之道，要在乘机”

康熙帝说：“用兵之道，要在乘机。”① 战争是敌对双方各以军队为主体进行的对抗行动。所谓“乘机”，就是说军事指挥员要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适时地定下决心并采取必要的行动。这里的关键在于不失时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康熙帝认为，“惟在相机而行”，“随机而应”。他说：“朕屡次出兵，看来为将诚难。一应军务，惟在相机而行，固不可急，亦不可缓。……故为将者，必相机调遣，方能济事。”② 又说：“朕于国家之事，未尝胶执己见，惟虚己以视机宜。即用兵之道，亦复如是。一日之中，千变万化。朕统大兵至克鲁伦时，亦视贼之形势，随机而应，并不豫立己见。”③ 这就是说，第一，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战争更是如此，“一日之中，千变万化”。第二，将帅在战前虽然必须预先定下决心，拟制出战争方略和作战计划，但面对千变万化的形势，决不可“胶执己见”，把事先定下来的方略、计划固定化，而是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随时修订原来的方略、计划。“不豫立己见”，也是这个意思。所谓“相机而行”、“随机而应”，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照实际情况活用原则。第三，要“乘机”、“相机”、“随机”，首要的是要“虚己”，即客观地判断、分析形势，不能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虚己”是康熙帝对自己，也是对每一个统兵将领的要求。所以他给予统兵的高级将领相机处理兵事的权力，反对凡事请旨而行。他说：“大将军出征，进止调度必待中旨，于古未闻。”④ 因为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而当时信息的传递又受通信、交通工具的限制，“如皆请旨而行，则有仓卒军机，必致迟误”⑤。当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〇，康熙三十六年二月癸巳。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六，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甲寅。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〇，康熙三十六年二月甲申。

④ 《平定三逆方略》卷九，康熙十三年九月戊辰。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一，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壬戌。

然，对于一些事关重大的原则问题，则应随时请示报告。但是，对于上级的指示，下级也不应机械地执行。康熙十三年九月，康熙帝遣侍卫传谕勒尔锦说："若何进战，一在于王。"他还进一步说明一个将帅如何处理好执行他的敕谕与将帅个人决策的关系，指出："因王等与贼相持，朕不自暇逸，屡有敕谕，冀或有一当耳，非朕欲从中制也。……勿惟朕谕与议政大臣之议是从。"①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康熙帝能有这样的认识和做法，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剿抚兼施，恩威并用

在历次战争中，康熙帝善于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地对敌人进行招抚，以分化瓦解敌人。从平定三藩战争开始，到康熙帝晚年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叛乱的战争，其间每一次大的战争，康熙帝都充分地利用"招抚"这一重要手段。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在得到吴三桂叛乱消息几天之后，康熙帝即发敕宣谕云贵军民，进行招抚。这一工作贯穿于战争的始终，招抚的对象，从叛乱地区的平民百姓、士兵、各级官吏将领，直至吴三桂本人。康熙十五年八月，康熙帝谕令安亲王岳乐等对"叛变之人""时加招徕"，并且指出，"即吴三桂，果有悔罪输诚之心，亦何不可容受?"② 招抚的手段，或是颁发敕谕，或是通过叛乱者的父母、妻子儿女、亲友以及派遣军政官员，或是将俘获的人员放归，这些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康熙十五年六月，王辅臣归降。康熙帝下令，将吴三桂派往平凉助王辅臣的彝苗等少数民族官兵，"其官员各加一级，兵丁酌量赏赉，俱发回云南，并晓谕令各于原籍招抚从贼人民"③。次年八月，又将彝族总兵官陆道清遣回云南。后清军进军四川，叛军又想利用这些少数民族官兵对抗清军。陆道清等不愿与清军为敌，皆避入山中，"平贼之后，

---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九，康熙十三年九月戊辰。

② 《清圣祖实录》卷六二，康熙十五年八月己未。

③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四，康熙十五年六月己卯。

伊等方下山引导我军（清军），极其效力”①。在康熙帝的招抚政策感召之下，不但大批叛军将领和士兵投诚，耿精忠和尚之信等也先后倒戈，从而孤立了叛首吴三桂。统一台湾过程中，对郑氏集团的招抚亦很成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清军水师攻占澎湖，守将刘国轩退守台湾。康熙帝考虑到，台湾孤悬海外，“若不许其投诚，则彼或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②。于是对郑氏集团大力招抚，终使郑克塽率众投降，统一台湾大业卒以完成。

康熙帝招抚思想的特点之一，是认识到政治招抚与武力打击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招抚只有以武力打击为后盾，才能成功。康熙十三年底，陕西提督王辅臣叛附吴三桂，杀清朝经略大臣莫洛。鉴于陕西为边陲要地，康熙帝从大局出发，不但不兴师问罪，反而以极大的耐心，极力争取他归正。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康熙帝在给王辅臣的敕谕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赞扬了他的忠诚纯笃，继则分析兵变发生的原因，是莫洛“心怀私隙，颇有猜嫌”，且“变起仓卒，情非得已”，这就把王辅臣叛乱之罪一笔勾销了。不但如此，康熙帝还说“朕之知人未明”，“咎在朕躬”③，亲自认了错，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半年之内，数次招抚，但王辅臣首鼠两端，借故推托。西北清军统帅董额怯懦畏敌，对王辅臣一味迁就。康熙帝识破王辅臣的阴谋，指出“彼乞降，诈也，特缓我师，为苟延日月计耳”。他指示董额等统兵将领，“尔等急宜攻取平凉，……慎毋因其诈降以误进取之机”④。康熙十五年，抚远大将军图海根据康熙帝的旨意猛攻平凉，败王辅臣，随即遣人入城招抚。至此，王辅臣才俯首降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与之配合，单纯的招抚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五，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己酉。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五一，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壬子。

④ 《平定三逆方略》卷十八，康熙十四年八月戊子。

康熙帝招抚思想和策略的另一个特点是散其羽翼，孤立和打击元凶。吴三桂、耿精忠相继叛乱之后，康熙帝即指出："今日事势，先灭吴逆为要。"① 因此，他一直以吴三桂为主要打击对象，对其他叛乱分子则采取招抚笼络的手段，暂停撤耿、尚二藩，终使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归附，把吴三桂孤立起来，从而为最后战胜吴三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打击噶尔丹，康熙帝首先对沙俄作出了让步，与沙俄缔结了《尼布楚条约》，其次极力安抚、交好新疆地区的策妄阿拉布坦、青海地区的和硕特部、新疆哈密地区的回部等，对喀尔喀蒙古则"发仓给畜，滂沱沛泽"②。这样就使噶尔丹彻底孤立了。对噶尔丹，康熙帝深恶痛绝，认为噶尔丹一日不灭，"则边陲一日不宁"③，决定将其彻底消灭。但在用兵期间，仍然多次遣使招抚，康熙帝并不相信噶尔丹会接受招抚，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利用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噶尔丹内部，分化其力量。事实证明，康熙帝这一策略是很高明的。在康熙帝招抚政策的感召下，噶尔丹"所属之人乞降而来者甚多"④，后来连噶尔丹的亲近大臣也弃噶尔丹而投奔清王朝，噶尔丹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在噶尔丹羽翼散尽的情况下，康熙帝又进行征讨，终于消灭了这股割据势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三）"周详筹画，期于必克"

"多算胜，少算不胜"，康熙帝非常赞赏孙武的这一思想，认为用兵作战，事先必须要有周密的谋划和充分的准备，打则必胜，决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说："用兵所关甚巨，宜周详筹画，期于必克。"⑤ 又说："凡事必周详熟审，方获实效，不可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五二，康熙十四年正月辛酉。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二，第103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乙丑。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九，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

苟且轻率。"① 这是康熙帝一贯的思想。例如抗击沙俄入侵的军事斗争，康熙帝认为，在他之前的明安达礼、沙尔呼达、巴海等人所以失利，就在于"谋事草率"，准备不足而"轻进"。康熙帝接受前人的教训，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机宜"②。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郎坦从雅克萨侦察回来，认为"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康熙帝因其准备不足，下令"暂停攻取"③。后来又批评大学士勒德洪对造船运粮之事"所议尚未周详"④；批评巴海"所议进征罗刹军务殊为疏略"⑤。直至二十四年正月，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完成，时机亦已成熟，康熙帝才令彭春等率师向雅克萨进攻。对噶尔丹的战争也是如此，由于对进兵时间、路线、运粮、交通联络等周密筹划，充分准备，数万大军得以在塞北大沙漠中转战近百日，行程 5000 余里，取得了昭莫多之战的胜利。三十六年，康熙帝至宁夏之后，"凡有可用兵之地，必详察行道水草，全备马驼粮糗等物，然后起程。稍有可疑，虽诸臣劝行"，"亦不允"⑥。这样，表面上看来似乎慢了一点，但由于有周密的谋划和充分的准备，一切军事行动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因而胜利的把握就大一些。康熙帝曾说："朕不欲速，惟图万全。"⑦ 这就是他重视谋划和准备的思想基础。

（四）集兵要害，以众击寡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康熙帝都主张集中兵力，反对分兵。平定三藩叛乱时，他把兵力集中在湖南战场上，特别是在岳州（今岳阳）和长沙，更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康熙十七年六月，

---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六月初四日。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

③ 《平定罗刹方略》一，《朔方备乘》卷首五。

④ 《平定罗刹方略》一，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庚戌。

⑤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九，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庚辰。

⑥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〇，康熙三十六年二月癸巳。

⑦ 《平定三逆方略》卷七，康熙十三年六月辛亥。

吴三桂派大将马宝率兵进犯湖南永兴，清扬威大将军喇布部作战失利。康熙帝指出，吴三桂以大队来犯，而清军却所在遣防，兵势太分，这是清军失利的主要原因。因此，康熙帝要求将军穆占和喇布等将领，将可缓之地的所有防兵，迅速撤回要害之地，会合群力，给敌以痛击。他指授用兵方略说："凡摧寇破贼，必审量己力，可击则击之；如贼众我寡，即宜调集诸路，合为一军，壮其声势，以图攻剿。倘株守新复城池，以已经驻镇，惮于旋师，迟留疑畏，于大事殊无所济。"① 不久，康熙帝又谕将军穆占："满兵之势贵聚，聚则处处攻战，始克有济"。如果分兵驻守于无用之空城，用于进攻的兵力必然单薄，就会造成无谓的牺牲。所以，"宜合全力以破贼众。若徒分守恢复之空城，似乎不可"②。在康熙帝的指导下，清军集中兵力，终于顶住了吴三桂的进攻。在收复雅克萨、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等战争中，康熙帝都贯彻了集中兵力的思想。雅克萨之战，康熙帝在充分准备之后，派遣3000名清军进攻不足千人的俄军，一战而胜，迫使敌人投降。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率兵2万侵犯漠北，康熙帝调集大军9万余人和大量的火器，于次年春兵分三路，对噶尔丹实行战略包围。由于清军兵力占绝对优势，在昭莫多之战中给噶尔丹以毁灭性的打击。

康熙帝的军事思想，是康熙朝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指导思想，对其以后的清朝统治者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节　乾隆帝弘历的军事思想

弘历（1711～1799），雍正帝胤禛第四子。弘历天资聪慧，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骑射教育。雍正十一年（1733年），23岁的弘历封和硕宝亲王，从此开始参预军事：先是清廷讨论与准噶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七四，康熙十七年六月壬辰。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七五，康熙十七年七月庚子。

尔议和，“亲聆运筹”；其后奉命与大学士鄂尔泰等办理苗疆事务，“综理军机，谘决大计”①。十三年八月，雍正帝去世，弘历即位，年号乾隆。乾隆帝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3年多太上皇，于嘉庆四年（1799年）病逝，终年89岁。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实际掌权时间最久的一位封建帝王。

乾隆朝战争频繁，乾隆帝晚年曾把他在位期间进行的战争归结为“十全武功”。他解释说：“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今越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今尼伯尔）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幺麽（指山东王伦起义和两次甘肃回民起义），弗屑数也。”② 乾隆帝弘历正是在亲自筹划决策、命将兴师等战争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

乾隆帝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

乾隆帝对待战争，基本上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认为“佳兵不祥”，反对穷兵黩武。他即位之时，对准噶尔部的战争已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休兵息民”，乾隆帝采取以守促和的方针，经过数年往复谈判，终于与准噶尔部达成和议。后来，乾隆帝回忆说：“予自少读书，即钦天地爱物之心，深知穷兵黩武之戒。是以继位之初，即谨遵皇考之训，许准噶尔之求和，罢兵宁人，将二十年矣。”③

这并不是说乾隆帝反对战争，恰恰相反，他认为一切有利于国家安定的战争，不但要打，而且要取胜。乾隆二十四年（1759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四，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

③ 《清六朝御制诗文集》高宗文三集卷九，《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序》。

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乾隆帝写《开惑论》一文，批判了春秋硕儒一类人物反对用兵新疆的错误认识，高度赞扬了这场统一战争的重大意义，指出："师旅征伐之于国，犹雷霆霜雪之于天。非霜雪，则万汇烦嚣之气不荡涤；非雷霆，则四时湮郁之气不鬯宣；非师旅征伐，则梗我王化者无以詟伏惩创，不敢抗干。"① 就是说，战争对于国家的作用，正如雷霆霜雪对于大自然一样的重要；只有用战争手段，才能给"梗我王化者"以致命的打击。所谓"梗我王化者"，既指那些敢于反抗其封建统治的各民族人民，也指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外国势力。乾隆帝在阐述为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用兵南疆的理由时，指出："毋论逆酋前此辜恩反噬，害我王臣，难逭天诛。即去冬官兵渡河进剿，辄敢悍然抗拒，稔恶更深。今虽全师整暇如故，而元凶罪大恶极，凡我大清国臣民，当无不人人切齿。使以一战得志，妄语洗甲韬戈，不但军纪国威难于中止，且于政体亦甚有关系。佳兵之戒，朕所深凛，而天讨有罪，自古无可逭之王章。"②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乾隆帝决定派兵征讨，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什么"不应劳师动众，以致雨泽愆期"。针对这种错误认识，乾隆帝颁谕说："贼匪等竟敢扰至札什伦布肆行抢劫。若不痛加歼戮，贼匪无所忌惮，势必为得尺则尺之计，渐至侵及前藏，即察木多、巴塘、里塘一带，亦必受其煽惑，日久渐成边患。且此时仅以和息了事，将来大兵撤后，倘贼匪复来滋事，后藏距川省辽远，鞭长莫及，断无屡劳兵力，远涉剿办之理。是以特命福康安、海兰察等统兵前往，声罪致讨，无非为绥靖边圉，保护卫藏起见。"③ 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战争胜利之后，乾隆帝撰写了《十全记》，在夸耀其武功的同时，他总结经验教训说："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乾隆二十四年十月辛丑。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八一，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庚午。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〇三，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丙申。

武修文之不已，必至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①

总之，乾隆帝认为，战争是必要的，对内勘乱伐暴，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外“怵之以威”，即以武力威慑或出兵征讨，抵御外侮，绥靖边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以，他一再声明，其“十全武功”并非穷兵黩武之举，因为非此不能确保其父祖开创的江山社稷，巩固大一统的局面。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乾隆帝在中后期忘乎所以，以为凭借强大的国力，在任何战争中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很少考虑采取非战争手段解决矛盾，发动了一些本不该进行的战争，对外如安南之战，对内如乾隆三十六年的大小金川之战，都是如此，实难辞其咎。

二、“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岂可任外国侵踞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步步进逼和邻国的侵扰，乾隆帝思想上有一定的警觉。乾隆十年（1745年），他谕令江南督抚轮阅海防，说：“我国家承平日久，海疆宁谧，中外习为固然。然从来防患在于未形，未雨绸缪，古人所云。”② 这固然主要是为了防备国内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会得到外国人的支持，但从中也反映出乾隆帝对于外国势力，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是有所防范的。他认为：“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棱，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豫防，不可不早杜其渐。”③

乾隆帝在与外国的交往中表现出强烈的主权意识，清政府统一新疆之后，哈萨克阿布赉汗要求清政府准许哈萨克人进入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伊犁等地游牧，乾隆帝严词拒绝，敕谕哈萨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四，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三，乾隆十年正月戊子。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二一，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午。

克汗“加意约束所部，各守封疆”，“不应越境”；谕令伊犁将军，“有哈萨克越境游牧者，即行驱逐”。他还针对哈萨克使者所奏在“南界绰尔郭、西界沙喇伯勒、中抵勒布西”等地，“哈萨克俱有游牧”的说法，敕谕阿布赉汗，揭露哈萨克使者“隐跃其辞，希图窥伺”的实质，强调指出，“凡此数处，皆厄鲁特故地”，是中国固有领土，“试思我国家以大兵平定之地，岂可任尔等侵踞！”①

乾隆帝对俄国有一定的警惕。阿睦尔撒纳叛乱失败后逃入俄国，为防止俄国利用他制造事端，乾隆帝命理藩院再三与俄国交涉，要求将阿睦尔撒纳等逃人引渡给中国。为防止俄国的侵略，清王朝对中俄边界的管理较其他边界更为严密。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得到俄国派兵到阿勒坦诺尔等地划分疆界的报告，他虽然认为俄国此举“明系试探内地消息”，“不必以此为事，纷纷豫备”，但同时也指出，“若任伊等侵占疆界，亦殊不可”，因而谕令阿桂派兵巡察边界，“(俄国) 果有设立标记，即行拆毁；如有屯驻人等，即行驱逐”②。二十八年，乾隆帝又得到俄国在准噶尔部旧游牧地造屋树栅的情报，他非常警惕，立即明确指出：“准噶尔地方，此时均已内附，与俄罗斯无干。伊等岂可擅自造屋树栅？观此，足见俄罗斯渐有侵占准部地方之意”，并谕令成衮扎布、车凌乌巴什等派兵“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③。在与俄国就土尔扈特部回归一事的交涉中，乾隆帝主权意识表现得尤为强烈。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迤西。17 世纪 30 年代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居留，因不堪沙俄压迫，在渥巴锡的率领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回归祖国。清政府对回归的土尔扈特部予以妥善安置，但俄国政府却行文清政府，诬称渥巴锡等

---

① 《清高宗实录》卷六二八，乾隆二十六年正月乙卯。

② 《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七，乾隆二十五年七月戊辰。

③ 《清高宗实录》卷六九二，乾隆二十八年八月乙酉。

"俱系悖教匪人"，指责清政府"不当收留"，甚至声称如若收留，就是"不守和好"，就可能"兵戈不息，人无宁居"。乾隆帝认为，收留土尔扈特部属清政府的内部事务，外国无权干涉，因此他令理藩院行文驳斥俄国政府说："土尔扈特渥巴锡人等，与尔别一部落，原非属人"；对俄国政府的武力威胁，则针锋相对，毫不示弱， "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①。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帝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不惜诉诸武力的原则立场。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力恐吓难以得逞，不得不变换花样，企图以和平的手法偷梁换柱地占有中国的领土。乾隆五十八年，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向清政府提出了多项无理要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复信中逐条予以驳斥，特别是对英国提出希望将珠山（今舟山）附近的某个小岛划归英国商人居住，并作为收存货物之地的要求更是断然拒绝，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② 由于乾隆帝的反对，英国的阴谋没有得逞。

乾隆登极伊始，就提出了"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这一方针也贯穿于国防和外交政策中。他说："抚驭外夷，务在宽严得中，相安无事，固不可示弱外夷，亦不可造端滋事。"③ 具体到主权与领土问题上，就是要与邻国友好相处，中国既不谋求别国的领土，也不允许别国侵占中国的领土。乾隆初，广西巡抚舒辂为防偷越边界，在边界线上栽插筋竹。安南方面竟拔去竹根，拆毁旧栅，将签标移至中国内地。两广总督陈大受提出："体制攸关，不便姑息。为今之计，种竹不宜中止，而界址不可不清。……除高山峭壁不能栽种外，其余照界栽种，不得丝毫侵越夷界，亦不可尺寸退让。"陈大受的意见，既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九一四，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丙寅。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三，乾隆十六年六月辛酉。

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又妥善处理了与邻国的关系，所以受到乾隆帝的嘉许，称其“所办甚妥”①。

应该指出，作为封建帝王的乾隆帝，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主权意识，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与邻国友好相处；另一方面又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锁国，二者同时存在，并联系在一起。

三、骑射为本，振奋精神

乾隆帝认为，“武备一道，乃国家紧要之事”②。所以他登极以后，强调要加强武备建设，一再用“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一类的话来训饬臣下。乾隆朝正处于清朝“盛世”，中前期又很少有战争发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但国家武备却渐致废弛。对此，乾隆帝有一定的认识，并极力整顿营务。乾隆六年，他说：“承平之时不忘武备，乃经国要务。近年以来，各省营务整饬者少，废弛者多。”③ 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各级将领尤其是中高级将领领导不力所造成的，因而令督抚提镇恪尽职守，训练营伍，并提出一二年后，将派遣大臣往各地察阅，到时如仍未见改观，惟统领大员是问。

乾隆帝认为，部队训练，要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务求实效，不虚务外观。他了解到，不少将领不是认真训练部队，提高官兵技艺，而是为了应付察阅，惟事粉饰，“往往先期部署，为一切观美计，制造旗帜，更易号衣，公费不足，遂坐扣兵饷”④。乾隆帝对这种“徒务外观，不求实际”、“营员不以本务为事，惟留意于末节”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派钦差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三，乾隆十六年六月辛酉。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四，乾隆四年十一月丙午。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六年五月己丑。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二，《兵·教阅》。

大臣察阅的目的，只是“验其技勇之生熟，兵数之虚实，粮马之亏盈，以觇该督抚提镇平时训练整饬之实政，非止于旗帜、甲仗、衣服之间，取其美观而已也”；督抚提镇应该认真整顿营务，持之以恒，“不当若此急遽粉饰，务末而忘其本”。他要求各省督抚提镇，“将向来积弊悉加祛除”，以使“训练有实效，考验非具文”。如此，“戎政可望焕然改观矣”①。乾隆帝的这个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在武备建设中，乾隆帝很重视骑射，认为八旗官兵更应该以骑射为本。骑射对于满族来说，既是赖以生存的一种基本的生产技能，也是重要的军事活动。所以不论是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入关后的历代皇帝，都崇尚骑射，把骑射作为满族人的一项长技。乾隆帝更将骑射与“国语”（又称清语，即满语）相提并论，说：“满洲素习，原以演习弓马骑射为要，而清语尤为本务，断不可废。”② 他提倡国语骑射，既有保存满族文化的因素，也是为了加强武备建设。因为乾隆帝认为，“武备尤以弓矢为要务”③。乾隆十年正月，他专门颁发谕旨，命直省督抚提镇等高级官员，严饬属弁专习骑射，说：“营务以弓马为主，将备以表率为任”，武职官员，身列戎行，骑射就是其专责，只有将备骑射精良，才能搞好部队的训练④。

乾隆帝重视精神因素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满族有尚武的传统，以满族为主体的八旗兵，是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在与明军的争战中，八旗兵人数虽少，却能屡战屡胜，野战则克，攻城则取，无敌于天下。但入关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八旗兵的战斗力急遽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来那种不怕劳苦、勇敢强悍、锐意进取的尚武精神不复存在。乾隆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三，乾隆十二年正月庚戌。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乾隆六年三月己巳。

③ 《清高祖实录》卷一四七，乾隆六年七月壬辰。

④ 《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三，乾隆十年正月辛卯。

性。乾隆六年五月，他说："近见满洲人等并不以骑射为要，惟贪图安逸，畏服劳苦。即本身所用军器鞍辔撒袋等物，亦不知整顿，惟用意于浮华虚文、服饰衣物而已。"① 为改变这种情况，乾隆帝一方面发谕令八旗满洲勤习骑射，一方面准备恢复木兰行围。但是，乾隆帝的这个想法却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当年举行第一次行围时，一部分王大臣竟害怕艰苦，留恋室家，不愿随往。乾隆帝在训饬他们的时候，指出行围的作用："行围出猎，既以操演技艺，练习劳苦，尤足以奋发人之志气，乃满洲等应行勇往之事"。他特别强调这种精神因素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指出"若惟事偷安，不知愧耻，则积习相沿，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②。以后，乾隆帝还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并针对具体问题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乾隆二十二年，他了解到京外八旗驻防将军和绿营提督、总兵等武职官员，出行时不乘马而坐轿子，认为高级将领如此养尊处优、日图安逸，就不可能通过自身的表率作用来培养官兵的勇敢精神，所以立即下令，规定嗣后将军提镇概不许乘轿，原编设的轿夫一并裁去。总之，他要求八旗官兵力戒贪图安逸、怯懦畏敌、不求上进的坏风气，培养耐受劳苦、不尚浮华、敦崇淳朴、勇往直前等优良的精神品格，以振奋清军的士气。

乾隆帝重视武备建设，崇尚骑射，是从清朝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对于加强清朝的国防，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强调人的精神作用，对现在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军旅之事，为时逾久，防御愈难"

对于用兵作战，乾隆帝主张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反对迟疑持久。乾隆十年（1745 年），川陕总督庆复、四川巡抚纪山奏请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六年五月丁亥。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一，乾隆六年九月庚寅。

征讨瞻对（在今四川新龙境）土司。乾隆帝于四月下旬正式批准其请，不久即对战事的进展表示不满。当时四川提督李质粹派人前往瞻对，晓谕土司勒献劫掠行旅的“夹坝”，不期瞻对竟先发兵扎营以抗拒清军。乾隆帝批评说：“夫用兵贵于神速，始克成功。乃川督办理此事，甚属迟缓。……是我兵遣发太迟，贼人早已闻风豫备。所谓‘兵贵神速’者何在？看此情形，是伊等办理游移拘泥，业已不合机宜。”① 为了不误战机，乾隆帝认为将帅可以便宜行事。他针对李质粹奏请候旨调兵一事说：“兵贵神速。岂有贼已发兵阻挡，而汝等尚无出师之期之理！若但云候旨而行，则所谓便宜行事者何在？且将在外而受制于朝者，多不成功，朕不为也。”②综观乾隆帝的一生，他并没有真正给予将帅便宜行事的权力，反而对前线将帅干预过多，但其速战速决的作战指导思想却非常清楚。后来，乾隆帝认为“旷日失时”是瞻对战争的主要失误之一，应引为“炯鉴”③。在其后的历次战争中，他都提出了速战的要求。乾隆十三年第一次金川之战时，乾隆帝曾就清军张兴部失利一事，向军机大臣发谕说：“从来军旅之事，为时逾久，防御愈难，稍未周密，即有疏虞。即此番张兴失事，亦相持日久所致。昔人谓‘兵贵神速’，正以此也。”④ 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在《南巡记》一文中，乾隆帝提出了“举大事者，有宜速而莫迟，有宜迟而莫速”的思想。他认为做皇帝 50 年，只有两件大事，一是“西师之事”，即对准噶尔部用兵；一是南巡，南巡之事又莫大于河工。对准噶尔部用兵，为宜速而莫迟者，因为迟则必“昧机而无成”⑤。同年七月，在镇压了甘肃田五、张文庆领导的石峰堡回民起义之后，乾隆帝又专作《迟速论》一文，通过总结对甘肃回民用兵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述了“兵事

①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二，乾隆十年六月丙辰。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七，乾隆十二年三月己酉。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三〇七，乾隆十三年正月丁未。

⑤ 《南巡记》，《清高宗御制文》二集第十四卷。

宜速，河务宜迟”① 的思想。

乾隆帝主张主动进攻，反对被动应付。每一次战争之始，他都提出“捣穴犁巢”、“穷力追擒，捣其巢穴”之类的要求，企图以积极的进攻，迅速打垮敌人。这一思想在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乾隆十二年（1747 年），乾隆帝决定对金川用兵，他训谕军机大臣说：“即如瞻对、大金川之事，亦岂好大喜功？实因伊等声势日张，不得不劳师动众。然前此进兵，既不能遽得要领，临事又惟草率了局，官兵甫撤，旋复煽动，伤威损重，劳费实多。若但来则应之，去则弗追，试思十至而十应，何如以十应之劳，用之于一举，毁穴焚巢，芟除荡涤之为愈也。”② 乾隆帝这一上谕，反对“十至而十应”式的消极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彻底解决金川问题。但战争的进展却令乾隆帝大失所望。战争开始不久，乾隆帝就批评总督张广泗“不能选锐进攻，夺取要害，仅以坚壁为自全之计，调遣为策应之方”，以致造成“师日老，气日怯”③ 的后果。当经略大臣讷亲提出“以碉逼碉”的守势战略时，乾隆帝立即予以严厉的训斥，指出这不过是“株守之计”，他认为清军应该“决策前进，奋力攻取”，即“以此筑碉之力，移之攻取破彼之碉，以夺其所恃”④。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强调主动进攻当然是对的。但乾隆帝求胜心切，往往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要求进攻，结果常常事与愿违，招致失败。

乾隆帝主张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反对分兵。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是清军的传统战法，清太祖努尔哈赤大败明军的萨尔浒之战是运用这一战法的著名战例。乾隆帝重视历史，注意向前人学习，他曾专写《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〇，乾隆四十九年七月甲子。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九一，乾隆十二年五月乙巳。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三，乾隆十三年四月乙亥。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八，乾隆十三年七月癸巳。

一文，研究、总结了萨尔浒之战集兵破敌的经验，认为当敌人几路来攻时只要集中兵力打敌主力，破此一路，则他路敌兵不足为患。乾隆帝在指导战争时，历来强调集中兵力，他认为："用兵之道，合则势张，分则势弱。"① 乾隆十三年，乾隆帝不同意讷亲"以碉逼碉"之策，一个重要原因是夺取金川战碉后要派兵据守，分散了清军兵力，"夺无用之碉，而分有用之卒"，毫无意义。他认为，清军夺得敌方的碉楼，就应该立即将其平毁，这样做的好处，一可开通前进道路，二可拔除敌方据以抵抗的据点，三可"减省守兵"，以集中兵力向敌人进攻②。尽管这时乾隆帝对进攻金川的困难估计不足，有轻敌冒进的思想，但他反对守碉，强调集中兵力的意见还是正确的。清廷派重兵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起义军为牵制清军，四出袭扰，林爽文牵制北路，庄大田牵制南路，使清军只能分兵应付，奔走不暇。乾隆帝谕令将军常青、提督蓝元枚舍南趋北，与总兵柴大纪部会合一处，集中全力进攻林爽文部起义军，并强调指出，"但能将渠魁擒获，则其余贼目如庄大田、陈泮、吴领等，自无难迎刃而解，势成破竹"，这就是"擒渠制胜之策"③。后来，取代常青为统帅的福康安，正是采取了集中兵力，先攻林爽文部后攻庄大田部的方略，很快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乾隆帝军事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对固疆安邦、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起过积极作用的正确思想，也有保守甚至错误的东西，有一定消极的影响。

①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四，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庚辰。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丁未。

第十八章　清前期的边防海防

第一节　清代的疆域、边疆及边防思想

一、疆　域

顺治元年（1644 年）清军入关后，清王朝用了 40 年的时间，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消灭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南明政权，平定三藩叛乱，进军澎湖、迫使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投降，从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此后，清王朝立即进行战略转移，开始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营边疆的斗争中去。

在东北部地区，英勇地抗击了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入侵，取得两次雅克萨之战的胜利，把俄国侵略军从被占领土上驱逐出去，保卫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在西北部地区，清政府通过多伦会盟对喀尔喀蒙古的行政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与内蒙古一样实行盟旗制；历时 70 余年，最终平定了得到沙俄支持一直进行分裂割据活动的准噶尔部贵族的叛乱，接着又迅速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在新疆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各级地方行政、军事管理机构。

在西南部地区，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雍正六年（1728 年）、乾隆十五年（1750 年）先后三次平定了西藏贵族叛乱，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西藏行政体制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全面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平定了四川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在云贵川等省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设置地方政权机构，派驻地方官，实行直接统治，强化了清政府的管理。

总之，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力经营，清政府抗击了外敌的入侵，打击了边疆地区的分裂割据势力，完成了东北、西北和西南边疆的统一，并在上述地区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建立起一套听命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和适合不同地区情况、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至乾隆中期，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清代的疆域也基本上稳定下来。当时中国的版图北至外兴安岭、恰克图（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唐努乌梁海的额尔吉克塔尔噶克山，南至海南岛及南海诸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黄岩岛，最南点为曾母暗沙），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至库页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等在内的附属岛屿。清朝疆域幅员广阔，不但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有数的几个大国之一。

清代疆域是对中国传统疆域的继承。“中国”一词，原本是指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地区，周围其他地区则称为“四方”，后来中国才成为我国的专称，这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疆域从中原地区向周边地区扩展的史实。元朝时，中国已是一个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①。清朝经营边疆，完全是在中国传统疆域内进行的，并未超过历史上的疆域界线。清朝疆域，与明代相比虽有所拓展，却并没有越出元朝疆域的范围，台湾、澎湖为元朝澎湖巡检司地，漠北的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特朗）地区为元朝岭北行省地，乾隆帝用兵天山南北时纳入版图的漠西新疆地区则为元察合台汗国地。因此可以说，中国疆域是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中，经过无数次对峙、战争、融合而逐渐形成的，清朝政府在中国传统的疆域之内，大力经营边疆，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前夕完成了对边疆的统一，把中国的疆域确定下来，这是清前期历史性的贡献。

---

①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二、边疆

"边疆"这一概念，一般辞书的解释是指一个国家靠近国界的领土。有的著作则将其定义为"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区，按特定的行政或地理区划确定的一个立体的区域空间"，"由陆疆、海疆、空疆三个部分组成"①。

边疆主要是一个包含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内容的地理概念，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边疆概念的理解和认识都是不同的。在飞机出现以前，空域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所以边疆概念的内涵中就不会包含空疆。中国古代由于缺乏海权意识，一般所说的边疆主要指的是陆疆。

清代前期，边疆主要是指国家陆地疆域国界内侧具有一定的自然、人文特点的省区。一般说来，边疆是与内地相对而言的。清代内地与边疆的区分从行政区划上是很明确的，它把疆域划分为"本部"和"藩部"两部分。本部是内地，即疆域的中心部分。清初将本部划分为十八行省：直隶（约今河北）、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本部十八行省以外的是藩部，即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唐努乌梁海、新疆、西藏等地，就是边疆。但是在实际上，清代的边疆又不仅仅限于藩部。其一，东北地区，系清统治者"发祥之地"，故不划入本部的"直省"，而是作为一个特区，由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分区管辖。由于这一地区地处清朝疆域的边缘地带，外与朝鲜、俄国两国有很长的边界线，内与内蒙古、喀尔喀蒙古接壤，存在着与其他边疆地区同样的矛盾和问题，清廷在这一地区实行不同于内地地区的特殊政策，实质上是把它作为边疆对待

---

① 毛振发主编：《边防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的。其二，云南、广西、四川、台湾等地，虽划入本部直省，但地处本部的边缘，属于内边地区。这些省区大都为少数民族地区，不同于中原汉族地区，情况复杂，加之有的省区（如台湾）刚统一不久，有的省区与邻国交界，对于国防尤其是边防建设至关重要，所以事实上也把这些地区看作边疆。总之，清代边疆包括下列各省区：盛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辖喀尔喀蒙古四部和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二区，相当于今蒙古国全境和哈萨克、俄罗斯各一部以及中国新疆阿尔泰地区北部。以其辖区为蒙古族牧地，故相对漠南的内蒙古而言，清末通称“外蒙古”)、内蒙古、青海、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川、台湾、海南岛及南海诸岛。

清代，我国的东面和南面，濒临波涛汹涌苍茫无际的日本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面和东北面，是缺水的蒙古沙漠戈壁和覆盖着亚寒带原始森林的内外兴安岭；西北面、西面和西南面，为唐努山、阿尔泰山、天山、葱岭、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高山。边疆地区，大都处于高山、戈壁、沙漠、原始森林地带，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交通艰险，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天然地形成一道把我国与境外隔绝的自然屏障。我国边疆地域辽阔，清代边疆地区不但总面积比“本部”行省区大得多，而且纵深极大，从青海湖到葱岭达 2500 多公里，从盛京至库页岛北部亦有近 2000 公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至清代，除汉族外，已形成蒙古、满、藏、回等 50 多个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少数民族大多聚居在边疆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极为不便的交通和稀少的人口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一般都大大落后于内地。地形上的封闭、地域上的辽阔和大纵深、民族分布上的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构成了清代边疆的特点。

三、边防思想

边防，顾名思义就是边疆防卫。我国有关边防的思想产生很早，“边防”概念在南北朝时也已出现。南齐建元二年（480 年）齐击退北魏的进犯后，齐高帝敕令说：“虏经破散后，当无复犯关理。但国家边防，自应过存备豫。”① 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边防”概念最早的记载，至今已有 1500 余年的历史。

清朝统治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边防思想，把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边防的重要对象。清初，居住在边疆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社会组织，有一些少数民族还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但他们大都承认由入主中原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中央政权。当然，由于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情况的差异，边疆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与清中央政府也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他们希望与清朝政府只保持朝贡关系，要求更多的自主地位。一些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出于不断扩张的野心，割据自雄，侵扰邻部，甚至窥伺中原，与清政府对抗，有的不惜与外国势力勾结，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这是清廷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清朝统治者治理边疆，加强边防，目的之一就是防备边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割据势力和反清力量，尤其防止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汉人联合。因为他们懂得，只有廓清边塞，保证边疆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地位才能巩固，国家也才能够长治久安。

与以往历朝历代不同的是，清朝从一开始就遭到以西方殖民主义为主的外敌侵略，既有从海上来的侵扰，更直接的则是陆路的入侵。沙皇俄国先是侵扰中国黑龙江流域，勾结、策动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叛乱，当它把边界推进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以后，又开始威胁中国西部边疆，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在西南边疆，先后发

① 《南齐书》卷二六，《陈显达传》，中华书局 1972 年版。

生了缅甸军队侵犯云南和廓尔喀（今尼泊尔）派兵侵入西藏的事件。清政府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对中国领土的入侵，在通过外交途径与入侵者多次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坚决派清军进行反击，先后进行了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战争、反击廓尔喀的战争等，把入侵者赶出了中国。在与外国入侵者的斗争中，清朝统治者防备外敌入侵的边防意识逐渐加强。

另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情况是，清朝与邻国确定了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边界。清代以前，中国与邻国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边界，那时的边界是一种自然边界，或者称为传统习惯边界。这种边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受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现代意义的边界，是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走向明确、有一定稳定性的边界线。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雍正五年（1727 年）的《中俄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击败廓尔喀入侵后，"所有唐古忒（西藏）西南与外番布噜克巴（今不丹）、哲孟雄（今锡金）、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均已划然清楚"①。边界条约的签订和近代边界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于减少边界冲突、加强边防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清代的边防思想和边防建设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传统边防逐渐向现代边防的转变。

清朝统治者面对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威胁，因而开始把防外敌入侵与防范、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同样作为边防斗争的重要任务，认识到必须以武力与威胁国家安全的外敌相抗衡，当遭到外敌入侵时，则坚决进行反击，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康熙帝把抗击沙俄入侵

---

① 《卫藏通志》卷二，《疆域》，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4 页。

看作是关系国家久安长治的大事，他说："今征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最巨。……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① 又说，如不能加强黑龙江边防，则"自松花江、黑龙江以外，所居民人皆非吾有矣"②。清朝统治者的领土意识大大增强。康熙帝说："朕以为尼布潮（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③ 乾隆帝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④ 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与邻国签约划界的重要，明确表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⑤。在与外国谈判签约的过程中，清统治者坚持正确的原则，"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⑥。

在边防建设上，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强化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二、加强边防的军事建设，屯以劲旅，筑城永戍；设置卡伦，实行巡边制度；设置驿站、军台，改善交通、通讯。三、屯田实边，开发边疆。四、改土归流，实行直接统治。

第二节　清政府治边的方针、原则

清前期不但完成了对边疆的统一，而且对边疆地区实行了较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己巳。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三七七，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乙卯，中华书局影印本。

⑤ 《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七，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⑥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01 页。

以往任何朝代都更为有效的行政管辖。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实有效的治边方针、原则。

一、“恩威并行，剿抚兼施”的总方针

“恩威并用，剿抚兼施”，这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传统的统治方针。清朝统治者也深谙此道。早在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各部时，就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① 的方针。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清王朝在经营边疆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一总方针。康熙帝在总结清王朝“宣威蒙古，并令归心”的经验时，明确指出：“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② 乾隆帝登极伊始，就提出了“宽严相济”的施政总方针，认为“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③。这一方针用之于治边，就是“恩威并用”。他说：“驾驭外藩，若一味姑息，伊等必至骄肆，自当恩威并用，俾先知所惧，则其感益深，足以豫弭滋事之端。”④ 所谓“恩威并用，剿抚兼施”，就是政治与军事相结合。一方面，平时在边疆地区“镇以重臣，屯以劲旅”⑤，以武力相威慑，一旦边疆少数民族中的割据势力和反清力量闹事，则坚决实行武力征服与军事镇压；另一方面，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封爵、给俸、联姻、盟誓、朝觐、赐宴等，对边疆少数民族上层采取怀柔、拉拢、抚绥、笼络、羁縻、收买、招抚，以争取人心，分化敌对势力，稳定边疆局势，巩固自己的统治。

---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〇，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壬寅。

③ 《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④ 《清高宗实录》卷六八三，乾隆二十八年三月癸酉。

⑤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页。

二、治边施政原则

“恩威并用，剿抚兼施”是清政府治边的总方针，在此方针之下，还有一些较为具体的施政原则。

（一）“镇以重臣，屯以劲旅”

清廷派遣将军、都统、大臣分驻边疆各地，代表中央政府对各地进行统治。将军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东北地区有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外蒙古地区有乌里雅苏台将军（一称“定边左副将军”），内蒙古地区有绥远将军，新疆地区有伊犁将军。都统是八旗驻防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蒙古地区设置了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新疆地区设置了乌鲁木齐都统。大臣分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和办事大臣。参赞大臣设于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今喀什）、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分别协助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新疆和外蒙古地区军政事务；领队大臣分两类：一类设于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之下，管理各少数民族游牧事务，一类设于巴里坤、古城（今奇台）、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阿克苏和英吉沙尔（今英吉沙）等城，在乌鲁木齐都统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领导下，管理各城的军政要务。办事大臣设于新疆天山南路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及哈密等地，掌管当地军政事务。驻扎西藏办事大臣（简称“驻藏大臣”）则是清廷派驻西藏的最高军政长官。为加强统治，对外防御外敌入侵，对内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清政府在边疆地区驻扎大量军队，主要的是八旗劲旅。这是武的一手。

（二）“因俗习为治”

“因俗习为治”①，就是根据边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手段。这是清王朝一以贯之的治边原则。顺

① 《清高宗御制诗文十全集》卷九。

治二年（1645年），清廷颁《恩诏》41款，其中规定对甘肃等地少数民族，“一切政治，悉因其俗”①。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指出：“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② 雍正十年，他在谈到对蒙藏民族统治时，说：“因俗利导，于治化不为无助。”③ 乾隆帝也强调，要“从俗从宜”④，“因俗习为治”。

这一治边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有二点：其一，因俗设官，建立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东北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蒙古族聚居的北部边疆地区实行盟旗制；新疆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则分别实行州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藏族聚居的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体制下的噶厦治政；云南、广西等省部分地区实行土司制。总之，“设官置吏，多因其俗以治之”⑤。其二，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尊崇、利用在蒙藏民族中有重大影响的喇嘛教，“因其教，不易其俗”⑥。

（三）“宣布法纪，修明典常”

清朝统治者一贯重视法制建设，皇太极即位后即训谕群臣说：“自今以后，宜思所以宣布法纪，修明典常，为保邦致治之计。”⑦ 随着边疆的逐渐统一，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的情况都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差异，“不可以内地之法治之”⑧。因此，清王朝在加强对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司法管理的同时，非常重视民族立法。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各朝纂

---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清世宗实录》卷八〇，雍正七年四月辛巳，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 胤禛：《敕赐祐宁寺碑文》。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一七，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戊戌。

⑤ 《清朝通典》卷二六，《职官》四。

⑥ 胤禛：《善因寺碑文》。

⑦ 《清太宗实录》卷三六，崇德二年六月甲寅，中华书局影印本。

⑧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八，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甲午。

修的《大清会典》中有许多关于边疆民族事务的条文，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颁行的《理藩院则例》中也规定了蒙古、西藏、青海地区管辖的各项制度。此外，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民族法规：关于青海地区的，有雍正二年（1724年）颁行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雍正十一年颁行的《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六十八条；关于西藏地区的，有乾隆十六年（1751年）制定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乾隆五十八年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关于蒙古地区的，有乾隆五十四年纂修的《蒙古律例》；关于新疆天山南路地区的，有嘉庆十九年（1814年）制定的《回疆则例》，等等。这些法律的制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完善了治边制度。这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对于抵御外敌的侵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对主要边疆地区的管辖

一、对吉林、黑龙江地区的管辖

（一）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的设置

东北地区是清朝统治者的发祥重地，又受到沙俄入侵的威胁，因此，清政府十分重视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但在顺治初年，由于集中力量于关内，在广大的东北地区，只有留守盛京（今沈阳市）的内大臣1员、副都统2员负责管辖①。随着清王朝在关内统治的逐步巩固，清政府也逐步加强了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首要的就是增设管理机构。

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增

① 留守盛京的内大臣先后改为“奉天昂邦章京”（顺治三年）、“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康熙元年）、“镇守奉天等处将军”（康熙四年），乾隆十二年定名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

设昂邦章京1员、副都统2员、佐领8员、骁骑校8员，以镇守宁古塔及整个黑龙江地区。康熙元年（1662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改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仍驻宁古塔，负责镇守吉林、黑龙江流域以及库页岛。由于宁古塔将军管辖的地区过于辽阔，出于抗击沙俄入侵的需要，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二年增设黑龙江将军，驻黑龙江东岸的瑷珲城（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附近的维肖伊洛村）①，镇守黑龙江地区。至此，原来由奉天将军独管的东北地区，变为由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分管，从而对吉林、黑龙江地区的管辖大大加强。

将军的辖区都有明确的规定。宁古塔（吉林）将军统辖的范围，东至东海（日本海）3000余里；东南至希喀塔山（锡赫特山）2300余里，海界；东北至飞牙喀（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3000里，海（鄂霍次克海）界②。黑龙江将军的辖区，以齐齐哈尔为中心，“东至野里白赫河二千二百余里，宁古塔界；西至喀尔喀九百余里，彻陈罕（车臣汗）界；南至松花江五百余里，宁古塔界；北至外兴安岭三千三百余里，鄂罗斯界”③。副都统的辖区也很明确，如：瑷珲副都统的辖区，南至喀末尼峰之内兴安岭七百里，齐齐哈尔驻防界；北至外兴安岭二千五百里，俄罗斯界；东北至外兴安岭一千五百里，俄罗斯界；西北至格尔必齐河一千七百九十里，俄罗斯界；东至外兴安岭之亨滚河（今俄罗斯境阿姆贡河）二千六百里，宁古塔界④。呼伦贝尔副都统职衔总管的辖区，西至哈马里山四百七十里，喀尔喀界；南至克木札里山四百四十里，喀尔喀车臣汗界；东北至伊克库克图山九百二十里，黑龙江城驻防界；西北至额尔古纳河二百二十里，俄罗斯

---

① 黑龙江将军的驻地屡有变动。康熙二十四年从黑龙江东岸的旧瑷珲城移至西岸的瑷珲新城（今黑河市爱辉乡），又于康熙二十九年移至墨尔根（今嫩江市），再于康熙三十八年移驻齐齐哈尔城。

② 康熙二十三年《盛京通志》卷十四。

③④ 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二。

界①。三姓副都统统辖的范围，“三姓城南至窝集、梅佛亨二百九十里，与宁古塔接界；东二千一百里，有入乌苏里江之瑚叶河（今兴凯湖东俄罗斯境内道比河），从瑚尔穆河至入海之岳色河，与宁古塔接界”②。

将军、副都统等职官及其衙门的设置，大大加强了清政府对吉林、黑龙江地区的管辖。

（二）筑城驻兵

清政府吸取顺治年间抗击沙俄入侵的经验教训，采取驻兵永戍的方针，在黑龙江、吉林地区筑城屯兵。宁古塔在顺治年间已是清王朝的屯兵重镇，康熙年间在黑龙江、吉林地区先后筑吉林乌拉、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伊倭齐、伯都讷、三姓、珲春等城，雍正年间又筑阿勒楚喀（今阿城）、呼兰等城，屯兵驻守。

黑龙江的驻军，最初从宁古塔将军所属的吉林乌拉、宁古塔两处驻军中抽调，举家迁徙。由于道路遥远，交通不便，非常困难。康熙三十年（1691 年）六月，康熙帝说：“黑龙江、松花江接壤之地，彼处附近所居根奇勒诸姓中，原有可披甲之人，应酌量令其披甲驻防，遣满洲兵八十人往彼教训之。齐七喀尔（今齐齐哈尔）地方，以索伦、达呼里之众，酌量令其披甲驻防，遣满洲兵二百人往彼教训之。伊等居址附近，亦心乐披甲。如此，既无远徙之苦，亦不致需用糗粮矣。”③ 根据这个谕令，清政府陆续将当地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以及蒙古族的新旧巴尔虎、厄鲁特等族壮丁编入八旗，披甲驻防。索伦、达斡尔和鄂伦春人被编为“布特哈八旗”，归布特哈总管管辖，蒙古族的新旧巴尔虎和厄鲁特则编入齐齐哈尔、黑龙江城、墨尔根、呼伦贝尔等地驻防八旗。据乾隆元年《盛京通志》等有关资料统计，乾隆元年

---

① 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二。

② 《三姓应入会典档册》，转引自杨余练、关克笑：《清廷对吉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历史研究》1982 年第 6 期。

③ 《钦定八旗通志》卷首八，《敕谕》二。

(1736年）以前，齐齐哈尔、黑龙江城、墨尔根、呼伦贝尔、布特哈打牲处5城驻防清军共有246佐领士兵11920名，除满洲32佐领士兵1920名、汉军8佐领400名之外，其余的206佐领均是由当地各民族编成，士兵多达9600名。

在吉林，也进行了编组“新满洲”的工作。康熙十年（1671年），将居住于珲春河以东的库雅拉人编为12佐领。康熙十三年，宁古塔将军巴海“率松阿里吴喇（今松花江）、诺罗河、吴苏路乌喇（今乌苏里江）、木伦（今穆棱河）居住之墨尔折勒氏新满洲佐领四十员并佐领下人等，入觐行礼”①。康熙五十三年，三姓、珲春同时设官驻兵，清政府决定，“以捕貂之新满洲二百名充三姓额兵”，“以捕獭之库尔哈一百五十名充珲春额兵”②。结果，200名赫哲族新满洲编为4个佐领，150名库尔哈人编为3个佐领。雍正十年（1732年），三姓改设副都统，扩编驻防旗兵，从附近居住的赫哲族中增编了6个佐领，又从乌苏里江以东霍尔河等地的八姓赫哲族中编成10个佐领，使三姓城八旗驻防达20佐领，兵丁2800人。

清政府在黑龙江、吉林各族人民中选拔丁壮，编旗披甲，就地驻防，解决了满洲兵额短缺的问题，满足了边防建设的需要，对东北边防的巩固具有积极的作用。

黑龙江、吉林驻防兵额大致情况如下。

1、黑龙江地区（见表1）

齐齐哈尔城，康熙二十三年设兵驻防，三十年筑齐齐哈尔城③，三十八年黑龙江将军移驻于此，另设副都统1员，佐领40员，防御8员，骁骑校40员，满洲、汉军、索伦达呼尔、巴尔虎兵2412名。

黑龙江城，康熙二十二年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奉命率兵进驻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五〇，康熙十三年十一月己丑。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二，《兵》四。

③ 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五。

黑龙江东岸的瑷珲城，旋因萨布素被任命为黑龙江将军，瑷珲城成为黑龙江将军的驻地。因该城僻处江东，与内地的水陆交通和公文往来诸多不便，遂于次年开始在西岸下游10余里处筑城，仍称黑龙江城，又称新瑷珲（今黑河市爱辉乡）。二十九年，萨布素奏请黑龙江将军移驻墨尔根，黑龙江城只设副都统1员治之，下设协领4员，佐领26员，防御8员，骁骑校26员，满洲、汉军、索伦达呼尔兵1540名。

墨尔根城，康熙二十五年（一说二十九年）筑城，设副都统1员，协领4员，佐领17员，防御8员，骁骑校17员，汉军、索伦达呼尔兵1000名。

呼伦贝尔城，设副都统职衔总管1员、索伦巴尔虎两翼总管2员，新巴尔虎两翼总管2员，厄鲁特总管1员，索伦巴尔虎、新巴尔虎副总管4员，佐领50员，骁骑校50员，索伦巴尔虎、新巴尔虎、厄鲁特兵2000名。

伊倭齐布特哈打牲处，设满洲总管1员，索伦、达呼尔总管各1员，满洲、索伦、达呼尔副总管16员，佐领97员，骁骑校96员，索伦、达呼尔、鄂伦春兵2000名。

呼兰城，设城守尉1员，两翼副总管2员，佐领8员，满洲、汉军、索伦、达呼尔、卦勒察兵500名①。

2、吉林地区（见表2）

吉林乌拉城，早在明代即设有船厂，顺治十五年（1658年），“因防俄罗斯，造战船于此，名曰‘船厂’”②。康熙十二年（1673年），在此“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二千名，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船四十余艘，双帆楼橹与京口（今江苏镇江）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橹。日习水战，以备老羌”③。康熙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镇吉林乌拉，此

---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八二，《兵》四。

② 萨英额：《吉林外记》卷二，《疆域形胜》。

③ 《扈从东巡日录》卷下。“老羌”，指沙俄侵略者。

表 1　黑龙江地区驻防兵备表

<table>
<tr><th colspan="2">驻防区
驻防员额</th><th>齐齐哈尔城</th><th>黑龙江城</th><th>墨尔根城</th><th>呼伦贝尔城</th><th>布特哈打牲处</th><th>呼兰城</th></tr>
<tr><td colspan="2">将军</td><td>1</td><td></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 colspan="2">副都统</td><td>1</td><td>1</td><td>1</td><td>副都统职衔总管 1</td><td>满洲总管 1</td><td>城守尉 1</td></tr>
<tr><td colspan="2">协领</td><td>8</td><td>4</td><td>4</td><td>各族正副总管 13</td><td>各族正副总管 18</td><td>两翼副总管 2</td></tr>
<tr><td rowspan="8">佐领</td><td>满洲</td><td>16</td><td>16</td><td></td><td></td><td></td><td rowspan="8">8</td></tr>
<tr><td>汉军</td><td>4</td><td>2</td><td>2</td><td></td><td></td></tr>
<tr><td>索伦达呼尔</td><td>16</td><td>8</td><td>15</td><td>19</td><td>86</td></tr>
<tr><td>巴尔虎</td><td>4</td><td></td><td></td><td>5</td><td></td></tr>
<tr><td>新巴尔虎</td><td></td><td></td><td></td><td>24</td><td></td></tr>
<tr><td>厄鲁特</td><td></td><td></td><td></td><td>2</td><td></td></tr>
<tr><td>使马鄂伦春</td><td></td><td></td><td></td><td></td><td>6</td></tr>
<tr><td>使鹿鄂伦春</td><td></td><td></td><td></td><td></td><td>5</td></tr>
<tr><td colspan="2">满洲防御</td><td>8</td><td>8</td><td>8</td><td></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8">骁骑校</td><td>满洲</td><td>16</td><td>16</td><td></td><td></td><td></td><td rowspan="8">8</td></tr>
<tr><td>汉军</td><td>4</td><td>2</td><td>2</td><td></td><td></td></tr>
<tr><td>索伦达呼尔</td><td>16</td><td>8</td><td>15</td><td>19</td><td>86</td></tr>
<tr><td>巴尔虎</td><td>4</td><td></td><td></td><td>5</td><td></td></tr>
<tr><td>新巴尔虎</td><td></td><td></td><td></td><td>24</td><td></td></tr>
<tr><td>厄鲁特</td><td></td><td></td><td></td><td>2</td><td></td></tr>
<tr><td>使马鄂伦春</td><td></td><td></td><td></td><td></td><td>6</td></tr>
<tr><td>使鹿鄂伦春</td><td></td><td></td><td></td><td></td><td>4</td></tr>
<tr><td rowspan="9">兵额</td><td>满洲</td><td>960</td><td>960</td><td></td><td></td><td></td><td rowspan="4">320</td></tr>
<tr><td>汉军</td><td>252</td><td>100</td><td>100</td><td></td><td></td></tr>
<tr><td>索伦</td><td rowspan="2">960</td><td>60</td><td>600</td><td rowspan="4">索伦
巴尔虎
960</td><td rowspan="3">2000</td></tr>
<tr><td>达呼尔</td><td>420</td><td>300</td></tr>
<tr><td>鄂伦春</td><td></td><td rowspan="2"></td><td rowspan="2"></td><td rowspan="4">卦勒察
180</td></tr>
<tr><td>巴尔虎</td><td>240</td><td></td></tr>
<tr><td>新巴尔虎</td><td></td><td></td><td></td><td>960</td><td></td></tr>
<tr><td>厄鲁特</td><td></td><td></td><td></td><td>80</td><td></td></tr>
<tr><td>总计</td><td>2412</td><td>1540</td><td>1000</td><td>2000</td><td>2000</td><td>500</td></tr>
</table>

表2　吉林地区驻防兵备表

驻防员额＼驻防区		吉林乌拉城	宁古塔城	伯都讷城	三姓城	阿勒楚喀城	拉林城	打牲乌拉城	珲春城
将军		1							
副都统		1	1	1	1	1		总管 1	
协领	满洲	8	2	2	2	1	1	1	1
	蒙古	1							
佐领	满洲	38	12	10	15	7	6	8	3
	卦勒察								
	巴尔虎	7							
	锡伯	1							
	汉军	2							
	蒙古			2					
满洲防御		24	12	8	8	5	2	4	1
骁骑校	满洲	38	12	10	15	7	7	8	3
	卦勒察								
	巴尔虎	7							
	锡伯	1							
	汉军	2							
	蒙古			2					
兵额	满洲	2630	1400	900	1520	406	406	700	450
	卦勒察								
	巴尔虎	350							
	锡伯	60							
	汉军	120							
	蒙古			100					
	汉军鸟枪	674							
	总计	3834	1400	1000	1520	406	406	700	450

地遂成为吉林地区的军政中心。除设将军外，另设副都统 1 员，满洲协领 8 员，蒙古协领 1 员，佐领 48 员，防御 24 员，骁骑校 48 员，满洲、巴尔虎、锡伯、汉军兵 3834 名。

宁古塔城，顺治十年（1653 年）置昂邦章京，治宁古塔旧城（今黑龙江海林县西南旧街镇）。康熙元年（1662 年）更名为

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五年，治所徙宁古塔新城（今黑龙江宁安)。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改称吉林将军。宁古塔改置副都统1员，辖协领2员，佐领12员，防御12员，骁骑校12员，八旗满洲兵1400名。

伯都讷城，设副都统1员，协领2员，佐领12员，防御8员，骁骑校12员，八旗满洲卦勒察、蒙古兵1000名。

三姓城，设副都统1员，协领2员，佐领15员，防御8员，骁骑校15员，八旗满洲兵1520名。

阿勒楚喀城，设副都统1员，协领1员，佐领7员，防御2员，骁骑校7员，八旗满洲兵406名。

拉林城，设协领1员，佐领6员，防御5员，骁骑校7员，八旗满洲兵406名。

打牲乌拉城，设总管1员，协领1员，佐领8员，防御4员，骁骑校8员，八旗满洲兵700名。

珲春城，设协领1员，属宁古塔副都统，辖佐领3员，防御1员，骁骑校3员，八旗满洲兵450名①。

(三) 划界立碑，巡查边界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以东、外兴安岭直至鄂霍次克海以南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此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边界和边境地区的管理。

《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② 清政府十分重视边界刊石立碑一事。康熙二十九年春，都统郎谈和副都统诏三奉旨往额尔古纳河"立交界牌"。五月十五日，经墨尔根，翻越大兴安岭，当月二十一日至额尔古纳河口，"立牌于河口石壁上，镌

---

① 《清朝通典》卷七〇，《兵》三。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

满、汉、鄂罗斯、蒙古、里的诺（拉丁）五样字毕而还”①。与此同时，工部在给黑龙江将军的咨文中，委托巡视新定边界的官员，于额尔古纳河与格尔必齐河两河河口附近，寻找符合界碑尺寸的石块，以备镌文树碑。但由于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发动的战乱，在边界树碑一事暂时中断，清政府曾就此事于康熙三十年十二月通知俄国尼布楚当局②。后来，清政府在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河口树立了界碑，尽管由于缺少有关的记载，难以确定立碑的具体时间，但中外图籍中都有对这两块界碑的记载，界碑的位置也是明确的。

为了加强对边界和边境地区的管理，清政府在边境地区设置卡伦，派清军巡查边界，并建立了巡边制度。

（四）对边民进行编户

对黑龙江、吉林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管辖，清政府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如前所述，将边疆地区居民编入旗籍，编组新满洲；二是对未编入旗籍的边民进行编户，分户管辖。

“边民计以户”③。康熙十五年（1676 年），清政府按照血缘姓氏与地域村寨相结合的原则，开始对吉林地区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东岸以及库页岛上的赫哲费雅喀人和库页费雅喀人编户。《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加快了对边民的编户进程，据记载，康熙二十九年、四十九年和五十一年，曾三次派使者往黑龙江下游地区招抚边民，当地“费雅喀、库耶、鄂伦春等”族居民编户共达 1158 户④。雍正十年（1732 年），三姓协领改为副都统，专辖库页岛。当年，三姓副都统派人到库页岛，完成了

---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索额图等为严禁俄人至喀尔喀行猎并暂停立界碑事致俄尼布楚长官咨文》（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41 页。

③ 光绪《大清会典》卷十七，《户部》。

④ 雍正《大清会典》卷一〇六。

对库页岛边民的编户。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政府对吉林边民的编户最后完成。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傅恒报告说："康熙十五年，赫哲费雅喀贡貂之人一千二百零九户，自十五年至六十一年陆续增加七百零一户，共计一千九百十户。自雍正元年至乾隆十五年，又增加三百四十户。现有赫哲费雅喀人二千二百五十户。再，雍正十年招服居住于海岛上特门赫图舍等处库页费雅喀人一百四十六户，令其贡貂。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年增加二户，共计一百四十八户。"① 清政府决定，将乾隆十五年现有的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贡貂者共2398户永为定额，嗣后边民人口增加，贡貂户数不再增加；如有减丁，其缺由其子弟替补，照纳贡貂。

编户的边民，"每户纳貂皮一张"②，清政府则给予回赏。通过一年一度的贡貂和回赏，确定了边民与清政府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边民承认自己是清朝的臣民。

清政府对编入户籍的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人，"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③。姓长和乡长是在编户过程中清政府在当地居民中任命的，他们是清政府在吉林边疆地区基层行政单位的负责人，其职责是督促所属按时纳贡、支应官差、维持治安、处理姓内或乡内的民事纠纷等事务。姓长、乡长受三姓副都统管辖。三姓副都统通过派出官员或书面命令，指挥姓长、乡长，从而对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以及库页岛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

① 《大学士傅恒等奏请裁定赫哲、库页费雅喀人贡貂及颁赏乌林办法折》（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4年版，第460页。

② 《吉林通志》卷二八，《食货志·户口》，吉林文史出版社《长白丛书》本。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一，《舆地》三。

二、对蒙古地区的管辖

清朝，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分为内属蒙古、外藩蒙古两部分。八旗蒙古虽然也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但由于他们早在入关前就已归附，入关后与八旗满洲、八旗汉军一起，担负着拱卫京师和驻防全国战略要地的重任，实际上已成为满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廷对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采取不同的管理制度，前者实行总管制，后者实行盟旗制。

（一）对内属蒙古的管辖

内属蒙古，或者归附较晚无功于清廷，或者所部蒙古王公因曾进行反叛，被夺爵削权，没有资格再领有土地和属众，编旗后由总管进行管理。总管由清政府在蒙古上层贵族中选派，“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①，受将军、都统、大臣的统辖。

内属蒙古主要包括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察哈尔部原为林丹汗所部，林丹汗子额哲降清后部众被安置在边外义州（今辽宁义县），康熙十四年首领布尔尼举兵反清失败，被移至宣化、大同边外，编为游牧八旗，设总管以治之。归化城土默特原为俺答汗所部，降清后于崇德元年（1636 年）分设左、右二旗，不设札萨克（旗长）。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改由绥远城将军管辖，成为内属蒙古之一。此外，还包括归热河都统所辖的厄鲁特 1 旗；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的 4 部 12 旗：札哈沁部 1 旗、明阿特部 1 旗，厄鲁特部 1 旗，阿尔泰乌梁海 7 旗、阿尔泰诺尔乌梁海 2 旗；定边左副将军所辖的唐努乌梁海 5 旗；驻藏大臣所辖的达木蒙古八旗等。

内属蒙古各旗直属清廷，不设札萨克，不实行会盟，按满洲八旗编制，称游牧八旗，又称总管旗。旗民除担负清皇室或官府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7 页。

各种繁重的封建徭役外，成年男丁还要承担兵役义务。

（二）对外藩蒙古的管辖

外藩蒙古是对实行盟旗制度的蒙古各部的总称。

1、盟旗制度

盟旗制是清廷对蒙古族特有的统治制度。蒙古族上层曾长期与明廷对立，多次发兵侵扰，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清朝统治者吸取明朝的教训，对蒙古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这一指导思想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已确立，他说："蒙古之人，犹此云然，云合则致雨，蒙古部落合则成兵，其散犹云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时，我当蹑而取之耳。"① 盟旗制正是分而治之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从天命九年（1624 年）至乾隆三十六（1771 年），在蒙古各部归附清朝的过程中，清政府打破蒙古社会原有的兀鲁思（大领地）、鄂拓克（小领地）的区分和领属关系，重新分封牧地，划定地界，仿照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改编为旗，除少数就原部编为一旗外，多数被分编为几个甚至十余个旗。旗设札萨克，由清政府在本旗内的蒙古王公、贝勒、贝子、台吉等贵族中选任。札萨克旗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基本的行政、军事单位。旗下设佐领，每 150 男丁为一佐领，其中 50 人为现役兵，100 人为预备兵。每一佐领置佐领一人，每五至六佐领设参领一人统辖。每 10 户设什长一人，为最低一级行政单位的长官。旗众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参战。旗之上设盟。"盟"，原为临时性的"会盟"，后来成为固定的组织，即合一部数旗或数部数旗为一盟。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皆由本盟札萨克或闲散王公内拣选，由理藩院请旨简放。盟不是旗的上一级行政机构，盟长不得直接管辖、干预各旗旗务，也不得擅自发布政令，只是代表理藩院对盟内各旗札萨克进行监督，当盟内各旗按规定的地点和时间会盟时则为各旗札萨克的召集人。

盟旗制度的实行，一方面，盟旗的官吏都是由理藩院任命的

---

① 《清太祖实录》卷八，天命八年五月乙未。

忠于清廷的蒙古王公贵族，清政府通过他们贯彻各种政令，另一方面，中央保留管理权和监督权，因此大大加强了清政府对蒙古族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在对蒙古分而治之的同时，又对蒙古王公贵族大力安抚拉拢，维护蒙古的领主制度，不在蒙古地区驻兵，靠蒙古王公贵族负责保卫北部疆界和维护蒙古内部秩序，成功地解除了清朝的北部威胁。康熙帝曾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①由此可见，盟旗制对清代边防的巩固具有重大作用。

2、盟旗编设概况

内蒙古地区。漠南蒙古24部，编为6盟49旗：哲里木盟，4部10旗，在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会盟；卓索图盟，2部5旗，在土默特右翼旗境内会盟；昭乌达盟，8部11旗，在翁牛特左翼旗境内会盟；锡林郭勒盟，5部10旗，在阿巴噶左翼、阿巴哈纳尔左翼两旗界上会盟；乌兰察布盟，4部6旗，在四子部落旗境内会盟；伊克昭盟，1部7旗，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与右翼前旗、后旗接壤之地会盟。

外蒙古地区。喀尔喀蒙古4部，编为4盟86旗。康熙三十年（1691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在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举行会盟，清廷仿漠南蒙古行政体制，编喀尔喀三部札萨克旗32个。其后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音诺颜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四部及所附厄鲁特、辉特二部，编为4盟86旗：汗阿林盟，土谢图汗部20旗，会盟地在土拉河南汗山；齐齐里尔克盟，赛音诺颜部22旗，附厄鲁特部2旗，会盟地在齐齐尔里克；克鲁伦巴尔和屯盟，车臣汗部23旗，会盟地在克鲁伦巴尔河屯；札克必拉色钦毕都哩雅诺尔盟，札萨克图汗部18旗，附辉特部1旗，会盟地在札克河源毕都哩雅诺尔。

科布多地区。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4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

部，编为3盟19旗。乾隆十八年，杜尔伯特部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三台吉率众归附清朝，次年编为2盟16旗：赛音济雅哈图左翼盟，11旗，附辉特部1旗；赛音济雅哈图右翼盟，3旗，附辉特部1旗。在科布多阿尔泰地区游牧的新土尔扈特部，编为青塞特奇勒图盟，1盟2旗。另有新和硕特部1旗，不设盟。

新疆地区。土尔扈特、和硕特2部，编为5盟13旗。土尔扈特为清代厄鲁特四部之一。17世纪30年代，从原游牧地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及额尔齐斯河中游一带，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因不堪俄国政府的压迫，渥巴锡率部东返，经过8个月的长途跋涉，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回归故土伊犁。清政府将其分为旧、新二部，各设札萨克，分地安置。渥巴锡部为旧土尔扈特，游牧于珠勒都斯（今焉耆北）、霍博克赛里（今和布克赛尔）、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精河一带，分为南、北、东、西4路，编设4盟10旗：南路乌讷恩素珠克图盟，4旗；北路乌讷恩素珠克图盟，3旗；东路乌讷恩素珠克图盟，2旗；西路乌讷恩素珠克图盟，1旗。舍楞部为新土尔扈特，在阿尔泰地区游牧。

青海地区。和硕特部等5部，编为29旗：和硕特部21旗，绰罗斯部2旗，土尔扈特等部4旗，辉特部1旗，喀尔喀部1旗。雍正三年（1725年）编旗时不设盟长，会盟时由西宁办事大臣召集，会盟地在察汉托洛亥（今倒淌河北）。道光三年（1823年），分河北24旗为左右翼2盟，盟设盟长、副盟长各1人。

西套地区。厄鲁特、土尔扈特2部，编设2旗。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编阿拉善厄鲁特旗，乾隆十八年（1753年）建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皆不设盟，直隶理藩院。

（三）驻防大臣的设置

清政府在蒙古地区除编设总管旗、札萨克旗，通过旗长、盟长进行统治外，还派设驻防大臣以制驭之。

驻防大臣的设置如下：

热河都统，驻热河（今河北承德）。原设副都统，乾隆四十四年改设都统，除掌管围场事务外，兼管热河地区的蒙古人民事务。

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康熙十四年（1675年），设口外游牧察哈尔八旗总管每旗1人，隶属在京之蒙古都统兼辖。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设都统、副都统，掌察哈尔之军政及察哈尔八旗游牧之事。

归化城副都统，驻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隶属于绥远城将军，掌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之军政。

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简称乌里雅苏台将军。雍正九年（1731年）设置，下设参赞大臣2人（其中1人由蒙古王公、台吉兼任），共掌喀尔喀蒙古四部86旗和唐努乌梁海5旗之军政。

喀尔喀四部，各设副将军、参赞各1人，由蒙古王公充任，掌本部蒙古军务，受定边左副将军节制。

科布多参赞大臣。乾隆二十六年设置，掌游牧于科布多地区的札哈沁、明阿特、厄鲁特、阿尔泰乌梁海诸部，兼辖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诸部共8部31旗之军政。

西宁办事大臣。雍正二年，清政府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为加强对青海的统治，制定《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升西宁卫为西宁府，设“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青海办事大臣，驻西宁，故又简称西宁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掌青海蒙古和硕特、绰罗斯、辉特、土尔扈特和喀尔喀5部29旗之军政，节制西宁镇道文武官员，兼管贵德、循化二厅民事。

三、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年），清政府先后平定

了准噶尔部和“回部”贵族的叛乱，统一了新疆。此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新疆的管辖，以稳定祖国西北边疆的形势，巩固和加强西北边防，防御外来侵略。

（一）设置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

清政府因“伊犁为新疆都会，现在驻兵屯田，自应设立将军，总管事务”①，遂于乾隆二十七年十月，授明瑞为伊犁将军，新疆置将军自此始。伊犁将军总统新疆天山南北的军政事务，另置参赞大臣、都统、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分管各地事务。

伊犁将军，最初称“总管伊犁等处将军”，后通称“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伊犁惠远城（今霍城县东南），其职权是“节制南北两路，统辖外夷部落，操阅营伍，广辟屯田”。二十七年初设时，具体规定为：“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应听将军总统调遣。至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军兼管。其地方事务，仍令各处驻扎大臣照旧办理。如有应调伊犁官兵之处，亦准咨商将军，就近调拨。”② 伊犁将军以参赞大臣 1 人为辅，下设领队大臣 5 人，其中 1 人驻惠宁城领满营，4 人驻惠远城，分领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厄鲁特 4 部游牧事务。

乌鲁木齐都统，乾隆三十八年由参赞大臣改设③，掌乌鲁木齐军政事务，受伊犁将军节制。吐鲁番、巴里坤、古城、库尔喀喇乌苏各设领队大臣 1 人，分别掌各城之军政；哈密设办事大臣 1 人、协办大臣 1 人，掌哈密之屯政与粮储事务，皆归乌鲁木齐都统统辖。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乾隆二十九年设，掌塔尔巴哈台之军政，并设协办领队大臣 1 人，专管东路卡伦；专理游牧领队大臣

---

① 《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三，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乙巳。

② 《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三，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壬子。

③ 《钦定新疆识略》卷二，《北路舆图》，清道光元年刊本；《清高宗实录》卷九三五，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丁丑。

1 人，兼理西路卡伦。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乾隆二十四年设①，综理南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8 回城事务。8 回城各设领队大臣或办事大臣，办理本城事务，受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节制。

（二）修筑城堡，屯驻劲旅

新疆统一之后，清政府即决定在新疆驻兵。乾隆二十五年，除南疆各地留兵驻守外，阿桂率满洲索伦兵 500 名、绿营兵 100 名，由阿克苏进驻伊犁，筑城屯垦。此后，清政府陆续从内地调兵，派往伊犁等地驻守，但均是按照惯例更番戍守。二十七年，乾隆帝鉴于新疆统一之后巴里坤以西皆成内地，原为西陲冲要的甘肃凉州（今武威）、庄浪（今永登），已无继续驻兵的必要，遂作出了调八旗兵携眷移戍新疆长期驻守的决策。他说："现在伊犁建造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即以凉（州）、庄（浪）兵丁，挈眷迁移，较为省便！"② 经军机大臣等讨论决定，将原驻凉州、庄浪的满洲、蒙古兵以及黑龙江索伦兵、张家口察哈尔兵共计 5200 余名并其眷属将近 2 万名，陆续派往新疆伊犁驻防。绿营兵自乾隆二十五年由陕、甘两省陆续换防，至四十三年亦改为携眷永远驻防。

伊犁九城。从乾隆二十六年至四十五年，清军先后在伊犁修筑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瞻德、拱宸、熙春、塔勒奇、宁远 9 城，史称"伊犁九城"。伊犁是伊犁将军的驻地，为新疆北部重镇，需驻重兵防守。乾隆中期，伊犁驻防八旗兵计 1.2 万人，其中惠远城驻满洲、蒙古兵 4200 余名，惠宁城驻满洲兵 2100 余名，伊犁河两岸分驻索伦达呼尔兵 1000 名、锡伯兵 1000 名、察哈尔兵 1800 名、厄鲁特兵 2000 名。伊犁驻防绿营兵 3000 名，

---

① 乾隆三十一年改设办事大臣，五十二年复改设参赞大臣，道光、咸丰年间又先后改设领队大臣、办事大臣。

② 《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七，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

分驻绥定等6城：中营驻绥定城，左营驻广仁城，右营驻瞻德城，霍尔果斯营驻拱宸城，巴彦岱营驻熙春城，塔勒奇营驻塔勒奇城。

塔尔巴哈台地区。乾隆二十九年，参赞大臣绰勒多率绿营兵600名由乌鲁木齐到雅尔屯种，在该地建肇丰城（今哈萨克斯坦乌尔贾尔），为塔尔巴哈台地区首府。因交通不便，参赞大臣阿桂于三十一年在距雅尔旧城200里的楚呼楚建新城，名绥靖城（今塔城），驻八旗满营和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均由伊犁换防，或二年一换，或一年一换。

东路诸城。为在东路驻兵，清政府调绿营兵筑城。乌鲁木齐扼天山南北要冲，原有一旧城，乾隆二十八年在旧城以北建新城，名迪化城。二十九年，将原驻巴里坤的提督移驻乌鲁木齐。三十七年，在迪化城西8里筑满城，名巩宁城。次年，改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为乌鲁木齐都统，驻巩宁城，统辖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等处满汉官兵。巴里坤为天山北路重镇，建于雍正九年（1731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安西提督移驻巴里坤，改称巴里坤提督。三十七年，在巴里坤旧城东南筑城，名会宁城，设参赞大臣（后改为领队大臣）、领队大臣各1人，八旗兵1000名驻其地。二十八年，在库尔喀喇乌苏筑庆绥城，驻兵屯田。四十年，于古城筑孚远城，屯驻八旗兵。在吐鲁番地区，于乾隆二十四年建吐鲁番、辟展（今鄯善）、鲁克沁、色更木、哈喇和卓、托克逊6城驻兵，置办事大臣1人驻辟展。四十五年，改办事大臣为领队大臣，移驻吐鲁番。东路驻八旗兵5500名，为携眷戍守的驻防兵，另有相当数量的绿营兵。

南疆八城。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清军在南疆“建大城八：曰喀什噶尔，曰英吉沙尔，曰叶尔羌，曰和阗，曰阿克苏，曰乌什，曰库车，曰喀喇沙尔”①。南疆八城驻军约

---

① 《西陲总统事略》卷十，《回疆各城事宜》。

5000余名，其中八旗兵1000余名，绿营兵4000余名，均为换防兵，不带家眷，轮班更替。八旗兵由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等地换防，绿营兵主要由陕西、甘肃等地换防。

新疆驻军，有八旗兵，有绿营兵。八旗兵为驻防兵，员额约1.9万人，但常随形势的变化而增减。绿营兵多担负屯田、筑城、台站等任务。清政府因"天山北路为准噶尔故壤，疆域辽远，伊犁为总统重地，乌鲁木齐境当孔道，为往来之总汇，塔尔巴哈台界接外藩，为北路之边圉"①，故以北路为布防重点，不但伊犁、乌鲁木齐等地驻军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主要是八旗驻防兵，携眷永驻。乾隆帝认为南疆与北疆的伊犁形势不同，主要利用原有的伯克制，因俗而治，故南疆八城和吐鲁番地区，兵员数量少，多为绿营兵，不带家眷，轮班换防。

清政府在新疆修筑城堡,屯驻重兵,在边界地区设置哨卡,巡查边界,有效地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稳定了形势,巩固了边防。

（三）实行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

1、伯克制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九月，平定大小和卓的战争尚在进行之中，乾隆帝就说："回部与伊犁不同。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至回部平定后，不过拣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即从前准噶尔之于回人，亦只如此。可传谕兆惠，将来办理回部，惟于归顺人内，择其有功而可信者，授以职任，管理贡赋等事。"② 根据乾隆帝这一指示，清政府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实行了经过改革的伯克制。伯克原为突厥称号，为"首长"、"统治者"之意，后为维吾尔族所沿用，以伯克管理各城事务。清政府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各城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统辖，回官则因其旧制，仍设伯克以治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一，《兵》十三。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〇，乾隆二十三年九月戊戌。

之。城主为阿奇木伯克，综理本城及所属回庄事务，设伊什罕伯克以佐之。其下设各种名目的伯克，分任诸务，如商伯克掌征收粮赋，哈孜伯克掌刑名事务，巴济格尔伯克掌税务，密喇布伯克掌水利，莫提色布伯克掌巡查城市、防盗捕盗，杂布提摩克塔布伯克掌经馆教习，等等，多达30余种。清政府对旧的伯克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世袭制，实行任免制，并分定额缺、品级（自三品至七品），授以俸地。伯克的任免升调，率有定章。三品至五品的阿奇木伯克和伊什罕伯克，由本城大臣报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参赞大臣奏报皇帝请旨简放，六品七品的低级伯克则咨报参赞大臣补放，并参照内地官员回避之例，规定大伯克回避本城，小伯克回避本庄，由各城拣选任用。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清政府任命在平叛战争中随征有功的阿布都拉、阿什默特、噶岱默特、鄂对、色提巴勒氏、索勒屯和卓等人为第一批阿奇木伯克，主要依靠他们对乌什、和阗、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英吉沙尔等地进行管理。但他们中有的人凭借清政府赋予的权力，横征暴敛，引起民众的不满。乾隆三十年，清政府制定《回部善后事宜》八条，限制阿奇木伯克的权力，进一步完善了伯克制。作为回疆地方官员的各级伯克，不但都要在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以及驻各城的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的节制、监督之下，而且各城阿奇木伯克还要按规定时间轮班入觐，汇报政情，这就大大加强了清政府对南疆的管理和控制。

2、札萨克制

新疆地区实行札萨克制的有二部分：一是于乾隆三十六年回归的土尔扈特部及附牧的和硕特部蒙古，已如前述；一是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哈密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内附，次年清政府将其编为1旗。后吐鲁番亦内附，于乾隆年间编为1旗。两旗均置札萨克，待遇与蒙古札萨克同，但需受驻当地的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的监督。

3、州县制

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离内地较近，乾隆二十四年新疆平定

之后，清政府即在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州县制。乾隆三十八年，置镇迪道，属甘肃布政使司。镇迪粮务兵备道驻巩宁城(乌鲁木齐满城)，下辖镇西府、迪化直隶州。镇西府(治今巴里坤)，辖县二、厅二：宜禾县(今巴里坤)、奇台县(今奇台县东南)、吐鲁番厅、哈密厅。迪化直隶州(治今乌鲁木齐)，辖县三：昌吉县、绥来县(今玛纳斯)、阜康县。另外，乾隆二十九年置伊犁直隶厅(治今霍城县东南)，属甘肃布政使司。州县制的实行，为光绪八年(1882 年)新疆建省打下了基础。

四、对西藏地区的管辖

(一) 驻藏大臣的设立

驻藏大臣，全称“驻扎西藏办事大臣”，是清政府派驻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雍正五年 (1727 年)，清政府鉴于西藏上层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著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差往达赖喇嘛处”①，是为派遣驻藏大臣之始。次年，平定阿尔布巴叛乱之后，清政府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

初期的驻藏大臣主要职责是监督西藏地方政府，调解西藏贵族之间的矛盾纠纷，并不直接干预西藏地方事务。后来，清政府多次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乾隆十六年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后，规定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员噶伦“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②。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用法律条文确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议事，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③。驻藏大臣的职责是“统前藏、后藏而理喇嘛

---

① 《清世宗实录》卷五二，雍正五年正月丁巳。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六，乾隆十六年四月戊寅。

③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转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

之事"[1]。凡任免西藏僧俗官员，统率驻防绿营，巡查操阅藏兵，巡视边界，审核对外贸易和财政收支，平定刑罚，拟定法制，处理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统掌。此外，确认达赖、班禅及其他大小活佛的转世，也必须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之下进行。

（二）确立政教合一的噶厦体制

顺治初，西藏内附，清政府在西藏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即承认由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建立的地方政权，通过蒙古汗王对西藏实行间接的统治；尊崇黄教，以达赖、班禅为宗教领袖。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政府派清军进藏，驱逐了侵入西藏制造动乱的蒙古准噶尔部军队，为加强对西藏的治理，开始在西藏实行改革，废除了在西藏地方政权中大权独揽的第巴职位，实行四噶伦联合掌政。由于西藏贵族内部争权夺利，雍正五年（1727年）发生了噶伦阿尔布巴等人的叛乱，掌后藏政务的噶伦颇罗鼐于次年攻入拉萨，平定了叛乱，清政府因颇罗鼐功大，命其全权处理西藏地方政务，后晋封为郡王，四噶伦联合掌政的制度遂告中止。

颇罗鼐忠于清朝，维护祖国统一，深得清廷的信任。颇罗鼐死后，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爵位，总理藏政。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拥权自重，排除异己，"势且延及达赖喇嘛，为雄长一方之计"[2]，暗中策划反清叛乱。叛乱平定之后，清政府总结经验教训，对西藏的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一是废除郡王制，建立噶伦联合掌政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乾隆帝的原则是"多立头人，分杀其势"[3]。当达赖喇嘛等人奏请封平叛有功暂摄政务的班第达为郡王时，乾隆帝断然拒绝，明确指出："前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伏诛之后，已屡经传谕策楞等，抵藏之日，会同达赖喇嘛，酌设噶隆（噶伦）二三人，以分其势，庶不至事权太

① 光绪《大清会典》卷六七，《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二》。

② 福康安：《双忠祠碑记》。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三七六，乾隆十五年十一月甲寅。

重，易生事端。……若仍照从前颇罗鼐故事，议设藏王，是去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又立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矣。"① 噶厦由噶伦 4 人组成，其中 1 名为僧官，3 名为俗官，噶伦间地位平等，规定"噶隆（伦）事务，不可一人专办"，应由四名噶伦"公同办事"②。二是变"政教分离"为"政教合一"。清政府给予达赖喇嘛管理西藏行政事务的权力，从而使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而且也是受命于中央政府的政治领袖。西藏的重大事务，包括补放第巴头目、选派各寺院之堪布喇嘛等，都要请示或直接由达赖喇嘛决定。噶厦的噶伦中，有 1 名是"深晓黄教"的喇嘛，与另外 3 名俗官"公共办理"③ 藏务。在达赖喇嘛的系统下，还设置全部由僧官主持的译仓（秘书处）。噶厦的政令、公文，必须经译仓审核并加盖达赖喇嘛的印信方为有效。三是如前所述，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至此，西藏的行政体制基本确立。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有关西藏的内政、外交、宗教、军事、法律、贸易、职官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规定，使西藏的行政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在此体制下，"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④ 的原则得以实现，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更为有效。

（三）建立金瓶掣签制度

藏民信奉黄教，崇拜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黄教的其他活佛，达赖、班禅和其他活佛不但对西藏的宗教、政治等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拥有巨额财富。所以，当达赖、班禅和其他活佛圆寂（逝世）后，在寻访和确认"呼毕勒罕"（转世灵童）时，西藏和蒙古世俗王公贵族为了掌握更大的政教权力和更多的财富，往往明争暗夺，操纵作弊，"徇情妄指，或出自族属姻娅，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三七八，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壬申。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六，乾隆十六年四月戊寅。

③ 张其勤辑：《藏事辑要》卷六。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三，乾隆十六年二月丁酉。

或出自蒙古汗王公等家，竟与蒙古王公、八旗世职官袭替相似"①。长此以往，必然危害清廷对西藏的统治和边疆的安定。为铲除积弊，乾隆帝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

乾隆五十七年，清政府颁发金瓶，置于拉萨大昭寺。次年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正式确立金瓶掣签制度。规定遇有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转世时，即将所寻访到的数名"灵童"名字和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缮写于象牙签上，置于金瓶中，由驻藏大臣监督，在大昭寺佛像前掣签认定。京师雍和宫亦贮一金瓶，当蒙古各札萨克所奉活佛转世时，将转世灵童姓名报理藩院，由理藩院尚书监督掣签。

（四）驻防绿营，建立藏军

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在设立驻藏大臣衙门时，留绿营兵2000名驻守西藏，后改为1500名，三年一换，成为定制。西藏原设有藏兵，但"向来分派各寨农民，有事则调集为伍，既无统率，又少操娴，虽有数万之名，仅为虚设"②。所以，在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时，"藏内番兵乘间即逃，遇敌即退"③。为改变这种状况，加强边防，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七年议定（次年载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建立西藏地方常备军，与驻防绿营兵一体训练。藏军额设3000名，编为6代本，每代本2如本，每如本2甲本，每甲本5定本。武器装备，50%鸟枪，30%弓箭，20%刀矛。军队驻防，前藏、后藏各驻1000名，定日（今定日西）、江孜各驻500名，特别规定要在边界设兵。

（五）勘定边界，设立鄂博

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之战后，清政府令勘定西藏边界，设立鄂博。福康安、驻藏大臣和琳等先后组织实施，至五十九年，西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四，乾隆五十八年三月戊申。

② 《卫藏通志》卷八，《兵制》，第303页。

③ 《廓尔喀纪略》卷四七，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福康安、孙士毅等奏。

藏与周边布噜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等地疆界，均已明确，并于济咙、聂拉木、绒辖、喀尔达、萨喀、昆布、定结、帕克哩沿边一带设立鄂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在所有边界上都要树立界碑，驻藏大臣出巡时，必须予以检查。

第四节　卡伦和巡边

一、卡　伦

（一）卡伦的设置

为了防止外敌的入侵，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清政府在东北、外蒙古和新疆等边疆地区，设置了一系列卡伦。卡伦即今之军事哨所，为满语的音译。何秋涛说："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国语谓之喀伦，亦作卡伦，又有称卡路、喀龙者，皆绷译对音之转也。"①

卡伦之设始于康熙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并规定"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②。清政府为了防止擅自越界，在"黑龙江四徼，分设卡路防守"③。黑龙江两岸卡伦是最早设置的一批卡伦。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确定了两国中段边界的走向。清政府派官员会同俄国使臣勘定疆界，并设卡伦59座。在额尔古纳河东岸，从察罕敖拉（今内蒙古满洲里西北）至珠尔特依（今内蒙古额尔古纳左旗西北），设卡伦12座。其余的47座均在外蒙古境。在对准噶尔部用兵的过程中，清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置卡伦。雍正九年前，设置了西、北两路卡伦。乾隆十九年（1754年），又在科布多增

---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北徼喀伦考》。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2页。

③ 《清朝通典》卷七〇，《兵》三。

设卡伦。乾隆二十年平定达瓦齐之后，开始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区大量设置卡伦。二十四年平定天山南路后，在南疆又设置了一系列卡伦。

卡伦分常设卡伦、移设卡伦和添撤卡伦 3 种。

常设卡伦。“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是谓常设之卡伦。”①常设卡伦一般都是设在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地方。如前面提到的乌鲁苏木丹卡伦，在黑龙江东岸，“最为要隘，夷船到此，必须经日方能转过”②。新疆伊犁地处西北边陲，是伊犁将军驻地，为边防重镇，所以在其周围的重要通道关隘，设置了塔勒奇、干珠罕、安达拉、春稽、奎屯、博罗呼济尔、崆郭罗鄂伦、沁达兰、伊犁河口等 27 座常设卡伦。

移设卡伦。“住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有时移向彼处，或春秋两季递移，或春冬两季递移，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是谓移设之卡伦。”③可见，移设卡伦的驻卡官兵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转移驻地，而递移的地点和转移驻地的季节，历年都是固定的。例如，伊犁地区的库车罗木卡伦，春季设，冬季移至辟里沁；托里卡伦，春季设，夏季移额木讷察罕乌苏，秋季移托赖图。

添撤卡伦。“其地虽有卡伦，而有时安设，过时则撤者，是谓添撤之卡伦。”④添撤卡伦又称添设卡伦。黑龙江呼玛卡伦就是这样的添撤卡伦。19 世纪中叶，一个到过那里的俄国人曾这样描述呼玛卡伦：“岛屿上展延着一片草地，草地上有三架圆锥状窝棚和一栋茅舍，全都覆盖着苇秸。窝棚和茅舍里住着满洲官员和一支不大的部队。这支部队驻守在库马拉卡伦，封河以前一直在这里驻扎。一俟河面结冰，这支部队就开赴瑷珲过冬。”⑤ 这种添撤卡伦在新疆较多，仅伊犁地区就有 45 座⑥。

---

①③④⑥ 《钦定新疆识略》卷十一，《边卫》。

② 《特普钦等奏俄人烧毁卡房已派员修复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六，第 1747 页。

⑤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二章，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142 页。

三种卡伦的区别，还表现在地理位置的里外上，“其在内者曰常设卡伦，在外者曰移设卡伦，最在外者曰添设卡伦”①。

各地卡伦均由当地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负责。黑龙江地区由黑龙江将军统辖，并按地区分别由黑龙江副都统、墨尔根副都统、齐齐哈尔副都统、呼伦贝尔总管、布特哈总管负责管理。外蒙古地区卡伦则由喀尔喀王统辖，乾隆二十七年设立库伦办事大臣以后，则由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分辖。新疆地区的卡伦则由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各卡伦驻守官兵数目不等。如：乌鲁苏木丹卡伦，“驻防官一员，领兵十七名”②；额尔古纳河东岸12卡伦，每卡伦设官一员、兵三十名；新疆北路卡伦，“视其地之大小简要，设满洲、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兵自十名至三十二名有差，以侍卫或效力官一二人领之”③。卡伦侍卫由清中央政府选派。驻卡官兵采取轮换制，或一月一换，或三月一换，或一年一换。

（二）卡伦的职能

卡伦有对外和对内两种职能。对外，主要是巡查边界，防止外敌入侵骚扰。《盛京通志》载：“黑龙江并无关隘，境内俱设喀伦，所以防御俄罗斯。”④ 所以，黑龙江地区的卡伦多设在边界线附近。外蒙古地区也大致如此。新疆地区则有所不同。当时新疆地区除了在额尔齐斯河中游一小段地方与俄国相邻外，周边的浩罕、拔达克山和哈萨克等都与清政府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有的还是清政府的藩属。所以，新疆地区的卡伦大都远离边界，其职能也主要是对内的。当然，也有的卡伦主要担负着对外的职能。清代库伦城（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与恰克图(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是中俄边境贸易之地，额尔齐斯河西岸的辉迈拉虎卡伦(属

① 《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 乾隆四十三年《盛京通志》卷五二，《兵防》二。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一，《兵》十三。

④ 乾隆四十三年《盛京通志》卷三三，《关邮》。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与河东岸的尼迈拉虎卡伦(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就是为了防止俄国人私自入境贸易而设置的。

对内，卡伦的职能主要有以下几种：

管理游牧。新疆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卡伦，主要担负着管理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游牧，维护社会安定的职能。《钦定新疆识略》指出：伊犁周围，察哈尔、索伦、锡伯、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其禁在于私越”；“境外，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柯尔克孜），壤界毗连，其禁在于盗窃”①。《西陲总统事略》指出：“自叶儿羌东北行一千四百余里，至阿克苏城，其东北通著勒土斯，设卡伦二处，稽查喀喇沙尔所属之土尔扈特游牧，系阿克苏办事大臣专辖。”②

监护矿山、山场。清初，清政府在东北采取封禁的政策，对采参、捕貂等严加控制，人参和貂皮等亦不准随意贸易。黑龙江、吉林等地的卡伦，就负有监护参山、稽查捕貂猎户和商人的任务。在采参季节里，“为查禁偷采人参，三姓地方所设各卡伦除严饬兵丁坐卡外，通往大江（松花江）上游阿勒楚喀、呼兰等地之要隘，玛延河、大江以北之细鳞河等处皆拣派官兵驻守卡伦”③。各卡伦“除查无票盗参及为其送米者外，秋后亦严查飞参、调票及潜入山者”④。黑龙江、吉林还有主要为稽查捕貂猎户和商人而设的卡伦，如黑龙江左岸牛满河流域的布特哈检貂卡伦。新疆产玉产金，清政府设卡伦管理矿山，严禁私采。和阗“城外之东西河，共设卡伦十二处，为稽查采玉回民”⑤。“距叶尔羌城四百余里，有密尔岱山产玉，……设密尔岱卡伦，禁采

---

① 《钦定新疆识略》卷十一，《边卫》。

② 《西陲总统事略》卷三，《南北两路卡伦总叙》。

③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第十一卷，第351页。

④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第十二卷，第70页。

⑤ 《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八。

玉"①。塔尔巴哈台所属之"达尔达木图金厂，例禁民人私采，……于通山路径安设卡伦，拨派弁兵防守稽察，申严禁令"②。

稽查逃人。边远地区人口稀少，偏僻荒凉，历来是遣戍人犯的地方。为防止犯人逃跑，清政府在边远地区设置卡伦，稽查、追捕逃人。《钦定新疆识略》指出：伊犁附近"有铜厂、铅厂、屯工、船工，安置发遣罪人，其禁在于逋逃"③。《清史稿》说："伊犁城北塔耳奇一带，及伊犁河渡口，设卡伦七处，专为哈萨克贸易交通，并稽查逃人而设"。又说："自英吉沙尔（今英吉沙）东行三百余里，至叶尔羌城，由城西南转而东北，设卡伦七处，西南一带，外通布鲁特，东北一带，专为稽查逃人"④。

传递文报。在一些边远地区，由于不设军台驿站，传递文报的任务就由卡伦承担起来。在东北，宁古塔至三姓、珲春间往来递送文报，皆交坐卡兵丁传递。在新疆，塔尔巴哈台北路冬季卡伦与土尔扈特游牧接壤之处，"添设察罕鄂博卡伦一处，冬季公文即由卡伦行走"⑤。塔尔巴哈台南路卡伦，也承担着伊犁、塔尔巴哈台两重镇之间文报往来的传递任务。

二、巡边

由于疆域辽阔，边界线漫长，不可能沿边界遍设卡伦；卡伦也并不都设在边界一带，有许多地区的卡伦远离边界，因此，清政府决定在边界设立鄂博。

鄂博，为蒙古语音译，汉语为石堆之意。清政府在边界线上堆石立鄂博，以区分国界。"其制有二：以垒为鄂博，以山河为

① 《西域水道记》卷一。

② 《清仁宗实录》卷二〇一，嘉庆十三年九月乙酉。

③ 《钦定新疆识略》卷十一，《边卫》。

④ 《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八。

⑤ 《塔尔巴哈台事宜》卷四，《军台》，《边疆丛书》续编，油印本。

鄂博"①。在东北地区和外蒙古地区，中俄两国都在边境设立卡伦，"所有两面喀伦适中隙地，蒙古语谓之萨布。……凡萨布处皆立鄂博为界。间有丛林无可堆石，即削大树镌记"②。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福康安、和琳主持勘定西藏边界时，也是在边界设立鄂博，"将旧有玛尼堆者，加高添砌；其全无形迹者，一律堆设整齐"③。

为确保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清政府建立了巡边制度。

在东北地区，每年的五六月间，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三城，各派出协领1员，佐领、骁骑校各2员，兵80名，分三路至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等地区巡查边界。齐齐哈尔城派出的官兵，西渡嫩江，越大兴安岭，沿海拉尔河进至额尔古纳河，顺界河向东北方向巡查，进抵额尔古纳河中游的墨里勒克河；墨尔根城派出的官兵，负责墨里勒克河口至额尔古纳河口的巡查；瑷珲城派出的官兵，乘战船溯江而上，经雅克萨、额尔古纳河口进至格尔必齐河。对外兴安岭边界地区的巡查，分别由布特哈总管和黑龙江副都统负责。布特哈总管负责外兴安岭以南、精奇里江上游和牛满河上游山林地区。布特哈总管于每年秋后的捕貂季节，派出章京、骁骑校等官兵前往精奇里江和牛满河、西林穆丹河上游各地巡查，每三年一次派出副总管率佐领、骁骑校等官兵前往上述三河上游河源外兴安岭巡查，并设立鄂博。黑龙江副都统负责外兴安岭西段格尔必齐河河源等处，每三年一次派员巡查，也设立鄂博。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政府根据黑龙江将军爱僧阿的建议，重申巡查外兴安岭边境的规定："饬打牲（布特哈）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精奇里江上游）、英肯（西林穆丹河上游）两河口及鄂勒希、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回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

① 《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八。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北徼喀伦考》。

③ 《卫藏通志》卷二，《疆域》，第194页。

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外兴安岭）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毕齐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① 在吉林，三姓副都统每年都要派出官兵巡查黑龙江下游地区，直至黑龙江口，有时更要远至库页岛。对乌苏里江以东和绥芬河等地区，清军官兵也要进行定期巡查。

在新疆地区，巡边也有严格的制度。每年八九月间，伊犁将军委派参赞大臣巡查从卡伦至国界的中间地带。乾隆二十六年，参赞大臣阿桂等议安设伊犁等地卡伦。清军按规定定期巡查边界。二十八年，乾隆帝从大臣的奏报中发现新疆巡查边界尚不够周密，遂谕令伊犁将军明瑞："酌派人员，率同熟谙地理之厄鲁特，前往吹（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南）、塔拉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阿勒和硕、沙喇伯勒等处巡查"②。乾隆三十年，伊犁将军奏明，派兵500名，"令爱隆阿统领，越阿勒坦额默勒，巡察勒布什（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东）、招摩多一带"③。此后，新疆地区将巡查边境定为制度。乾隆四十二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明，每年春秋二季，各巡查所属卡伦。此外，清政府每年派领队大臣1员，领兵500名，巡查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等民族游牧地区。

在西藏，巡查边界也同样成为制度。乾隆五十七年，大学士福康安等建议，驻藏大臣每年应亲身巡查边境。次年颁布的《藏内善后章程》规定，驻藏大臣每年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各地。驻藏大臣在巡查边界时，要"随时派人堆砌石块，不得日久废弛，致有偷越"④。

巡查边界的方式，有严格的规定。巡边的清军官兵，按一定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三，乾隆三十年八月癸亥。

② 《清高宗实录》卷六九〇，乾隆二十八年七月癸亥。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七，乾隆三十年正月癸亥。

④ 《卫藏通志》卷十二，《条例·边防》，第345页。

的路线前进，相邻地区的两支巡边官兵在规定的地点会哨，彼此交换表报，互换信牌。如东北地区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三城派出的巡边官兵，“齐齐哈尔协领与墨尔根协领会，墨尔根协领与黑龙江协领会，各书衔名、月日于木牌，瘗山上。明年，察边者取归，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各瘗木牌以备后来考验，此为定例”①。新疆地区巡边的方式与此大致相同，巡查路线也是固定的。伊犁地区巡边分南北两路。北路由伊犁出发，向西经霍尔果斯、齐齐罕、奎屯等卡伦，出阿勒坦额默尔山，过哈喇塔勒（今哈萨克斯坦基洛夫斯基西北），至勒布什与塔尔巴哈台所属巡边官兵会哨。南路从伊犁出发，再分别沿特穆尔图淖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的南北两岸分为两路：一路沿伊犁河向西，经古尔班阿里玛图（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到沙勒伯勒等地巡查；一路南行过伊犁河，沿伊犁西南卡伦，经春济、格根、鄂尔果珠勒等卡伦，越善塔斯岭、巴尔珲岭，向西北行，至沙喇伯勒、吹、塔拉斯等地。塔尔巴哈台巡边官兵，从塔尔巴哈台出发，一路北上出哈巴尔阿苏山口，折向西北沿塔尔巴哈台西路卡伦，到辉迈拉虎渡过额尔齐斯河，在尼迈拉虎卡伦与科布多所属巡边官兵会哨；一路西向，至勒布什与伊犁巡边官兵会哨。

巡边制度的建立并逐渐完善，对于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加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防止外敌入侵，巩固边防，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节　驿站、军台

驿站、军台都是通信交通机构。清代各地通信交通机构，视其地理位置重要程度的差别和所承担任务的不同，分别有驿、站、塘、台、所、铺6种组织形式。驿是设于各省腹地的通信交通机构，但盛京地区所设也称驿。站是专为传递军事文书而设，

---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五，第54页。

主要设于自京师至内外蒙古和陕、甘等地区，吉林、黑龙江以及直隶、山西部分地区也设站。塘是甘肃安西州和新疆哈密厅、镇西厅（治今巴里坤）所设，传递普通文报的称营塘，传递军事文报的称军塘。所指各直省原先设立的运送官物的递运所，后裁并归驿。铺是各省腹地厅、州、县所设的铺司，由京师至各省者也称为京塘。对于边疆地区来说，主要是驿站、军台。

一、驿站、军台的安设

（一）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的驿站，基本上是顺治朝设置的。从盛京通往黑龙江地区，虽然早就有了通路，但其驿站则是康熙朝为了抗击沙俄的入侵，于两次雅克萨之战期间设置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初，吉林至瑷珲的驿路开通，从而形成了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驻地为中心，通往各地并连接京师的通信交通网络。

盛京将军辖区。自盛京西南行，至山海关外的凉水河站，计715里，共12站（不含起点盛京，下同）。自盛京东北行，至威远边门外的棉花站，计270里，共5站。自盛京南行，至凤凰城，共8站①。

吉林将军辖区。自吉林乌拉西南行，至棉花站，计490里，共7站。自吉林乌拉西北行，至伯都讷站，计505里，共10站。自吉林乌拉东北行，至宁古塔，计635里，共9站②。

黑龙江将军辖区。自齐齐哈尔城卜奎站南行，至茂兴（今肇源县境），计447里，共7站。再由茂兴南行80里，至伯都讷接吉林境驿路。自卜奎站东北行，经墨尔根至黑龙江城，计775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二；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七，《驿站》。

② 萨英额：《吉林外记》卷三，《驿站》；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七，《驿站》。

里，共12站。自齐齐哈尔西行，至呼伦贝尔，计870里，共17站。自茂兴东南行，至呼兰，计527里，共8站①。

从黑龙江至京师，有三条干道：一是经吉林、盛京入山海关，是官用驿道，俗称“御路”、“大站”；一是经蒙古草原郭尔罗斯、扎赉特、杜尔伯特、乌珠穆沁等部入喜峰口，俗称“蒙古站”，也叫“草地”，路近而难行；一是经蒙古境入法库边门（今辽宁法库东北），再经盛京至京师，俗称“八虎（法库）道”，为商贩往来之路。

（二）外蒙古地区

外蒙古地区南有戈壁沙漠，西有阿尔泰山脉，通行困难。清代外蒙古的驿路，是在对准噶尔的战争中，利用原来的古道逐渐开辟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军兵分三路讨伐噶尔丹，在向外蒙古进军的过程中，沿中、西两路大军进军的路线，在外蒙古地区从南到北安设驿站，并在中、西路之间从东到西设立驿路。雍正、乾隆年间，随着对准战争的发展和对沙俄防御的需要，外蒙古地区的驿路逐渐向北、向西延伸，形成了北通库伦、恰克图，西通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驿路。因这条驿路地处漠北，西至阿尔泰山地区，是北路清军驻地，故称“北路驿站”，又称“阿尔泰军台”。

通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台站。自内蒙古四子部落旗境内的吉思洪呼尔站西北行，接外蒙古奇拉伊穆呼尔站，继续西北行至赛尔乌苏，计400里，共6站。自赛尔乌苏西北行，涉沙漠戈壁，经土谢图汗部、赛音诺颜部，至乌里雅苏台，计3060里，共41站。自乌里雅苏台西行，经札萨克图汗部入科布多境，至科布多城，计1320里，共14站②。

库伦台站。南路自赛尔乌苏站与往乌里雅苏台的驿路分道，北行980里，共14站，至库伦。北路自库伦北行，至中俄边界

---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二；《黑龙江述略》卷二。

② 《驿站路程》，《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再补编，第一帙。

恰克图，计920里，共12站①。

乌里雅苏台北路台站。自乌里雅苏台北行，经札萨克图汗部，至察罕托罗海，计600里，共9站。由察罕托罗海入唐努乌梁海境，北接津吉里克卡伦②。

科布多北、南路台站。北路，自科布多西北行，经过明阿特旗、厄鲁特旗至索果克卡伦，计582里，共8站。南路，自科布多西南行，越阿尔泰山，至鄂兰布拉克台，计970里，共8站。由鄂兰布拉克西南行120里，接新疆古城所属苏吉台③。

以上站道的设立，不但在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严密的通信交通网，而且把外蒙古地区与新疆、京师连接在一起。从科布多至京师，总计6280里，除外蒙古地段4780里外，还包括由内蒙古边界吉思洪呼尔至张家口430里，张家口至京师430里。

（三）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的驿站、军台，是清政府在统一新疆的过程中，逐步安设、完善起来的。新疆地区的驿路，基本上是从嘉峪关西行，经安西州到哈密，再由哈密分二路：一路走天山南路至南疆叶尔羌等地，一路越过天山经乌鲁木齐西通伊犁，经奎屯北通塔尔巴哈台。在天山南北之间，除了哈密经吐鲁番至乌鲁木齐外，还有伊犁至阿克苏的南北通道。嘉峪关以西是对准噶尔部用兵时西路清军的驻地，故习称西路军台。

哈密至乌鲁木齐。有北、南二路：自哈密北行，至巴里坤折而西，经木垒、奇台（今奇台东南）、古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阜康，再转向西南至乌鲁木齐，计1660里，设营塘24、驿站18，为北路；自哈密西行，经辟展、吐鲁番，折而西北，越天山至乌鲁木齐，计1730里，设军台24、营塘3、驿站7，为南路。自北路的古城北行，经北道桥、噶顺、苏吉3台，可同

①②③《驿站路程》，《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再补编，第一帙。

外蒙古科布多南路的鄂兰布拉克相接①。

乌鲁木齐至伊犁。自乌鲁木齐西北行，经呼图壁、玛纳斯，折而西行，经奎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今精河）、鄂尔追图博木，再折向西南，经塔勒奇阿满至伊犁，计1770里，设军台23、营塘14、驿站5②。

奎屯至塔尔巴哈台。自奎屯西北行，经沙喇乌苏、鄂伦布拉克，至塔尔巴哈台，计810里，设军台9，无营塘、驿站③。

哈密至叶尔羌。自哈密西南行，经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至叶尔羌，计5498里，设军台68，无营塘、驿站④。其中：哈密经辟展至吐鲁番，1200里，设军台18；吐鲁番经托克逊、库木什阿克玛至喀喇沙尔，1020里，设军台10；喀喇沙尔经库尔勒、玉古尔（今轮台）至库车，1068里，设军台13；自库车经拜城至阿克苏，800里，设军台9；阿克苏经浑巴什、巴尔楚克（今巴楚东南）至叶尔羌，1410里，设军台18⑤。

叶尔羌至喀什噶尔。自叶尔羌西北行，经英吉沙尔至喀什噶尔，570里，设军台8⑥。

叶尔羌至和阗。自叶尔羌东南行，经哈尔哈里克（今叶城）、哈拉哈什（今墨玉）至和阗，810里，设军台9⑦。

阿克苏至乌什。自阿克苏西行,至乌什,计240里,设军台3⑧。

伊犁至阿克苏。自伊犁南行，经和纳海（今昭苏）、特克斯（今特克斯西南、格登山东南）、沙图阿满、塔什哈他什，至阿克苏，计1220里，设15台⑨。

（四）西藏地区

---

① 《钦定新疆识略》卷一，《新疆总图》。新疆各地驿程，《西陲总统事略》、《新疆要略》、《新疆回部志》、《驿站路程》、《嘉庆重修一统志》诸书记载不一，有的相差较大。限于篇幅，本书均据《钦定新疆识略》。

②③⑤⑥⑦⑧⑨ 《钦定新疆识略》卷一，《新疆总图》。

④ 哈密至吐鲁番段，虽设驿站，但系哈密至乌鲁木齐皇华驿普通快马驿站。

由四川至西藏，由西宁至西藏，均有通道，沿途设有塘铺，“自打箭炉出口至藏，计程不及五千里，共安台八十四处，安汛十三处”①。

二、驿站、军台的管理

清代驿站、军台等通信交通机构，分属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在中央，归兵部管辖，由兵部车驾清吏司具体管理；在地方，归各省按察使司管辖，具体则由各地厅州县进行管理。但在边疆地区，一般归驻防将军、大臣管辖，盛京地区则归盛京兵部管辖，驿站的具体事务也不归州县，而专设驿丞来管理。蒙古地区中央级的管理机构是理藩院，分由旗籍清吏司、典属清吏司负责。每一路段管若干台站，设专职官员负责管理；每一台站设笔帖式、领催，蒙古台站还设蒙古章京。各台站额设一定数目的驿夫、站丁，“管养马，供驰送公文差使”②。

清代邮驿有一套严密的制度。驰驿以邮符为凭，邮符由兵部掌握，按年下发。因差驰驿者，视其品级，在邮符内按规定填写应给夫马车船之数，沿途凭此领取廪给、口粮。邮符分勘合、火牌两种，官员驰驿用勘合，兵役驰驿用火牌。出差时沿途需派兵护送者，给以兵牌。凡按规定需由驿马递送公文者，加发兵部火票，根据公文的性质、缓急，注明每日递送速度，并根据途程远近、道路状况等情计以到达时限。马上飞递公文，一般规定日行300里，紧急公文，日行有400里、500里、600里之别。可以说，在现代通信手段出现以前，清代通信速度是极高的。康熙帝曾说：“我朝驿递之设最善。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③ 雅克萨战争、平准战争

① 《西藏志》，《台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② 《伊通县乡土志·地形及位置》。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甲戌。

时的通信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清代边疆地区驿站、军台的设置，不但把广大的边疆地区联成一个整体，而且把边疆地区与内地各省以及京师紧密相联，从而加强了中央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保证了通信的畅通和物资的转运。这对于打击边疆地区的割据分裂势力，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打击外敌的入侵，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节　屯田实边

要加强边防，就要在边疆地区驻兵；而我国的边疆地区，大都是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方。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清政府采取了在边疆地区屯田的政策。

为了保卫东北边疆，清政府决定在黑龙江流域驻兵永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即雅克萨之战的前一年，八旗官兵奉命在黑龙江城东北的黑龙江东岸屯田，后来发展为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二十四年，“盛京官兵至黑龙江垦地一千五百余垧”①。二十五年，令索伦、达呼尔官兵在墨尔根屯田，并特遣户部官员往黑龙江城、墨尔根城督领官兵耕种。

外蒙古地区屯田筹划于康熙五十四年，为了解决对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用兵的军粮供应，康熙帝令在漠北厄德尔齐老附近择地驻兵屯田，并“命公傅尔丹选善耕人往屯种”②。次年，令傅尔丹率土默特兵1000名，往乌兰固木等处耕种。五十七年，命将原发往黑龙江、三姓地方的罪犯，改发喀尔喀科布多、乌兰固木等地，“筑城安插，令其开垦耕种”③。至六十一年，科布多、乌兰固木、特里、坤都伦河等处，可耕种之地，俱已开垦，

---

① 《盛京通志》卷二四，《田赋·旗田》。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四，《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二。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〇，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壬戌。

“所得麦子，一倍收有六倍”①。雍正二年（1724 年），清政府又筹划鄂尔坤、图拉等处屯田，很快即见成效，收成逐年增多。十二年，鄂尔坤、集尔麻泰等处屯田收获大麦、小麦、糜子等谷物 1.97 万石②。

新疆地区的屯田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黑龙江和外蒙古地区。康熙五十四年，开始筹划哈密地区屯田，次年令副都统苏尔德往哈密、巴里坤一带管理屯田事宜。六十年，令陕甘总督鄂海、按察使永泰往吐鲁番屯田。哈密、巴里坤、吐鲁番等地屯田都卓有成效，康熙六十一年，仅巴里坤一地所种青稞即可望收获 2 万石。雍正年间，因与准噶尔部达成和议，清军从吐鲁番后撤，当地屯田停办，但仍在哈密、巴里坤屯田。

乾隆二十年（1755 年），清政府在出兵伊犁的同时，筹划额尔齐斯等地屯田事宜，“其耕种所得谷石，以备接济往来兵丁口粮”③。在战争进行期间，派绿营兵屯垦。二十二年，恢复在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塔勒纳沁屯田。二十三年，“于辟展、鲁克察克、吐鲁番、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喇沙尔规度官垦”④。据办理屯田侍郎永贵报告，辟展等五处，“屯兵共三千六百名，屯田三万三千五百四十五亩，每亩收获一石九斗至一石四斗不等，共收谷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余石，较去年多收六千七十余石”⑤。

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为了巩固在新疆的统治，强边固防，决定在新疆驻兵。北疆的伊犁地区，与一贯觊觎我国领土、积极支持准噶尔贵族分裂祖国的俄国为邻，更是屯驻重兵的边防重镇。但是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北疆人口锐减，田地荒芜，人民生活困苦异常，完全依靠新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七九，《户部·屯田》。

②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〇，雍正十二年十二月辛酉。

③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二，乾隆二十年二月丁巳。

④ 《清史稿》卷一二〇，《食货志·田制》。

⑤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三，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庚辰。

疆当地的赋税来解决大量驻军的需要，尤其是解决军粮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乾隆帝决定在新疆大规模屯田，一方面以屯田所得解决驻防清军所需的粮饷，另一方面以屯田的清军镇慑地方，强化边防。

对于新疆屯田，有人主张全面展开，大干快上。乾隆帝则认为，应该采取“由近及远”①、“渐次扩充”②、“因地制宜”③ 的方针。他任命阿桂为参赞大臣，专理屯田事务。乾隆二十五年，阿桂率绿营兵500名、南疆回人（维吾尔族）300户，自阿克苏赴伊犁。当年屯田获得丰收，阿桂遂建议扩大屯田规模。此后，新疆屯垦人数逐渐增加，规模渐次扩大，除兵屯、回屯之外，还有户屯、遣屯等多种形式。

兵屯，即绿营兵丁屯田。乾隆帝认为：“招民耕种，莫如兵屯为善。多一屯兵，即多得一兵之粮，而积贮亦得充裕。”④ 所以兵屯成为新疆屯田的主要形式之一。从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伊犁屯田绿营兵渐增至2500名。四十六年，根据伊犁将军伊勒图的建议，换班的屯田兵改为携眷驻守。伊犁屯田绿营兵设屯镇总兵官管辖，兵员定额3000名，以500名差操，2500名屯种，分为25屯，每屯100人。屯田兵每名种地20亩，由官府发给耕牛、家具、籽种，秋后根据收获好坏，予以奖惩。全疆兵屯，乾隆三十一年179290亩⑤，四十二年已达288000亩⑥。

回屯，即迁移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屯田。乾隆二十五年，阿桂从阿克苏带领回人300户，在伊犁河南岸的海努克屯田，这是最早的回屯。由于屯田成效显著，又陆续从乌什、叶尔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乾隆二十四年十月癸卯。

② 《清高宗实录》卷六〇六，乾隆二十五年二月癸未。

③ 《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壬子。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一，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丙寅。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一，《田赋·屯田》。

⑥ 转引自张羽新：《清朝统一新疆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羌、和阗、哈密、吐鲁番等处抽调维吾尔农民，乾隆三十三年，共有6383户（内给伯克服役和挖铁的383户），分为9屯，分别在伊犁河南海努克和河北固勒扎一带屯田，设阿奇木伯克管辖。每户交粮16石，每年共交粮9.6万石①。

户屯，即招内地汉族商民到新疆屯田。早在乾隆二十四年，在新疆管理屯田事务的户部侍郎范时绶就奏请招民屯垦，他说："今新辟疆土，似宜急招民开垦纳粮，以抵岁需军饷，方不致再亏帑项。"② 二十六年，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招民屯垦。后来，阜康、呼图壁、昌吉、济木萨等地亦先后兴办户屯，耕种大量土地。据统计，乾隆四十一年时，乌鲁木齐等地户屯垦种土地数为：乌鲁木齐37176亩，昌吉66938亩，呼图壁3000亩，阜康43547亩，济木萨20850亩③。伊犁于乾隆二十八年兴办户屯，初创时屯户垦地没有限制，后来规定每户分给土地30亩。四十六年，有屯户333户，垦地53317亩④。全疆户屯的耕地面积，乾隆四十年达28万亩⑤。

遣屯，即遣送罪犯屯田，又称犯屯。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决定将部分免于死刑的罪犯遣送新疆垦荒种地，此为遣屯之始。每名犯人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伊犁为12亩，乌鲁木齐为20亩，携眷者另酌增地5亩，计亩纳粮⑥。遣屯犯人只要守法种地，超过一定年限，即可释放为民。

清政府在边疆地区屯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屯田，特别是兵屯，一般都设置在军事重镇或战略要点附近，屯田兵平

① 《西陲总统事略》卷一，《伊犁兴屯书始》；卷七《回屯》。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2318卷。

③ 《钦定新疆识略》卷二，《乌鲁木齐·屯务》。

④ 《钦定新疆识略》卷六，《屯务》。

⑤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中编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⑥ 《钦定新疆识略》卷六，《屯务》；《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一，《田赋·屯田》。

时垦荒种地，一旦有警立即可以投入战斗，大大增强了边防力量，为保卫边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其次，解决了驻边疆地区清军的军粮供给。乾隆四十二年，新疆仅兵屯即生产粮食32万余石，除保证驻新疆清军吃粮外，还有剩余。四十七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称："数年以来，积贮之粮现有五十万余石，足敷三年支放。每年绿营兵丁并民人回子等所交之粮，约可得十八万石，除一年支放外，尚可余二万石。每岁积贮粮石太多，以至霉变。"① 第三，节省了大量经费。康熙六十年，驻守西路巴尔库尔（今巴里坤）的靖逆将军报告说：给驻吐鲁番官兵转运口粮，"每粮一石，需运费银几及三十两"②。当时西路清军连同随役人员将近6万人，每月需粮1.169万石③。全年所需的14万石粮食，不用说组织运输是一件庞大的工程，而且单是运费银就高达420万两，这对清政府来说无疑是十分沉重的负担。乾隆时期在伊犁驻军，从吐鲁番到伊犁2000余里，运费又将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清政府在当地屯田，运输费用就大大节省了。第四，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随着屯田的开展，内地移民和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引进，边防城镇的建立，各民族间交往的增加，边疆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为固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节　清前期海防

清前期的海防，大体上可以统一台湾和开海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清朝定鼎北京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反清斗争持续不断。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势力，拥有强大的水军，占据着沿海地区众多

① 《钦定新疆识略》卷六，《屯务》。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四，康熙六十年九月戊申。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七，康熙六十一年五月癸巳。

的岛屿，对清王朝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清军虽有水师，但兵力不足，无法与之抗衡。在这种形势下，所谓的海防，主要是防海上的郑氏反清势力，采取的措施则是实行禁海迁界。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发布海禁敕谕，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各省，“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① 顺治十八年，清廷又采纳海澄公黄梧密陈剿灭郑成功之策，下迁界令，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四省沿海居民全部迁离海边30里，沿海一带村庄房屋及船只等皆焚毁，寸板不许下海，并筑垣墙，立界石，修塞墩，设兵戍守，界内外严禁通行，出界寸步即以违旨罪逮杀②。清廷企图通过禁海迁界的办法，割断海上郑氏集团与大陆的联系，断绝其粮饷等物资的来源，以削弱、扼杀海上的反清势力。但禁海迁界的实施，并没有达到统治阶级预期的目的，反而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使清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王朝统一了台湾，海防建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台湾统一之后，在台湾的善后问题上，清廷内部出现了弃、留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见。最后康熙帝采纳了施琅、姚启圣等人主张保留台湾的正确意见，在台湾设置府县，驻扎重兵，这标志着清王朝海防意识的一大进步。

康熙帝顺应形势的变化，迅速及时地作出了从禁海迁界到展

---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二，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一。

界开海的战略转变，于二十三年十月宣布："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①清廷允许中国人出海贸易，也允许外国人来华贸易，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四个对外通商口岸设立海关。清廷开海的决策，基本上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开海令的颁布和实施，也影响了清朝的海防建设。

开海以后，海防从主要防海上反清势力变为既防海盗又防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

所谓"海盗"，其中虽有一贯以抢掠为业的匪徒，但绝大多数是由于天灾人祸而失业的商贩和贫民，不得不流亡海上，以打劫商船为生。康熙朝海盗虽有增多之势，但并不十分严重，而到了乾隆、嘉庆两朝，海盗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并有部分海盗发展成为海上反清力量。海盗也就成为清王朝海防的重点打击对象。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指出："沿海一带设立战船，原为海洋缉捕盗匪之用。"② 为此，甚至规定清军水师战船都要仿商船之式进行改造。

西方殖民主义从海上对中国的侵扰，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先后东来，以贸易通商为手段，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甚至非法占据澳门，侵占台湾。清王朝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向东方扩张的步伐。康熙帝从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不法行径中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威胁。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他第一次把海防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联系起来，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③。康熙帝实行有限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二，《兵部·外海内河长江巡哨各船》。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〇，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

度的禁海令，照旧与东洋贸易，但严禁与南洋通商，虽不禁止西洋商船来华贸易，但要严加防范。为此，谕令于东南沿海冲要地方设立炮台，增加驻军，充实水师，以切断内部敌对势力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联系。这种把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作为海防对象的思想，是清朝历代统治者的一贯思想，而且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侵扰的加剧而有所增强，但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也没有把它作为最主要的海防对象。总之，清廷在海防上重防内而轻防外，"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①。

这一时期，清廷的海防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

增设外海水师。清兵入关后，仅在旅顺口等地设少量八旗水师，主力则是绿营水师。清军水师按任务区分为外海水师和内河水师。奉天、直隶、山东、福建水师为外海水师，江西、湖广水师为内河水师，江南、浙江、广东水师则分属外海、内河。雍正年间，八旗外海水师有较大的增强，先后增设了天津、江南、福州、乍浦、广州水师营，官兵6000余人，战船数百艘。绿营水师也有所加强。乾隆年间，外海水师编制战船826艘②。嘉庆四年（1799年）时，仅福建水师即达31营，兵27730名，战船266艘③。

修造战船。清军战船亦有外海、内河之分。乾隆五十年以前，外海水师战船共有28种：赶缯船、大赶缯船、小赶缯船、艍船、水艍船、双篷艍船、艍犁船、哨船、快哨船、平底哨船、白艕哨船、双篷哨船、双篷舡船、白艕舡船、圆底双篷舡船、唬船、大唬船、巡船、六桨巡船、八桨巡船、沙船、犁缯船、平底船、平底舨船、钓船、拖风船、艕仔船、乌舣船④。其中赶缯船

---

① 《清史稿》卷一三八，《兵》九。

② 《清朝通典》卷七八，《兵十一·战船》。

③ 汪志伊：《议海口情形疏》，《清经世文编》卷八五，《兵政》一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15页。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十六·战船》。

和艍船为主力战船。赶缯船原为东南沿海渔民使用的渔船。雍正初年，天津水师大赶缯船每船配水手、兵丁86人，装备大炮4位、斗头炮1位、百子炮4位、子母炮2位、鸟枪28杆、火箭8桶、火朗8个、火罐40个、火药200斤、大铁弹200个、铅弹50斤、弓箭8副、钩连枪8杆、竹杆枪20杆、排刀10把、割撩刀8把、挑刀8把、藤牌10面、木牌8面；小赶缯船每船配水手、兵丁55人，装备大炮4位、百子炮4位、子母炮1位、鸟枪16杆、火箭8桶、火朗8个、火罐30个、火药150斤、大铁弹150个、铅弹30斤、弓箭4副、钩连枪4杆、竹杆枪15杆、排刀8把、割撩刀4把、挑刀4把、藤牌8面、木牌6面①。战船大小不等，一般长11丈至1.9丈，宽2.35丈至9.6尺。从雍正六年（1728年）开始，陆续对各省水师战船的船身大小、木板厚薄做出明确规定，"名号各殊，大小异式，皆因地制宜"②。如山东赶缯船长7.3丈，福建赶缯船大号长9.6丈，二号长8丈，三号长7.4丈。乾隆末年，因战船过于笨重，于外洋追捕海盗不能得力，令将战船一律依照商船式样加以改造。嘉庆年间的同安战船就是在福建同安商船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新式战船，因其坚实、轻捷，成为外海水师的主力战船。水师战船的制造、维修和使用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战船造成之后，按例要解送总督亲验。为防止有关人员营私舞弊，雍正六年规定，由船厂所在省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及布政使、按察使共同验收。战船维修，最初规定外海战船3年小修、5年大修、10年后拆造，以后改为新船3年后小修、小修后3年大修，使用3年再大修，如不堪修理，由督、抚等题明拆造。为便于识别和管理，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议准，水师"各营艍犁、赶缯等船于船头船尾刊刻某营某镇某号捕盗船名"③，如胜字一号，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三〇，《兵制志五·八旗军器》，第571页。

② 《清史稿》卷一三五，《兵》六。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四，《兵十六·战船》。

捷字六号等。

建立巡防制度。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清政府规定，各省区外海水师定期在所辖海域巡哨，并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与邻近省区水师会哨。康熙朝，绿营水师以总兵为总巡，亲自督率官兵出海巡哨，以副将、参将、游击为分巡，千总、把总会哨；八旗水师以协领为总巡，佐领、防御、骁骑校为分巡。雍正二年（1724 年），令沿海各省总督、巡抚出海巡视。嘉庆初，针对清军武备废弛，巡哨时以低级军官代巡的弊端，令沿海各省绿营水师总兵为统巡，以副将、参将、游击为总巡，都司、守备为分巡，因故不能出巡则以低一级军官代巡，但不得以微员擅代；八旗水师亦仿照各省巡海之例，派三四品官一员为总巡。统巡总兵负责按季度轮派出巡军官，并将名册报送兵部和移送总督、巡抚、提督核查。出巡时间，各省不一，前后亦有变化。嘉庆六年（1801 年）规定：江南省以 3 个月为一班，轮流出巡；广东以 6 个月为一班，上下两班轮流出巡；福建自二月至九月分为上下两班，十月至次年正月按单双月轮班巡哨；浙江自二月至九月以 2 个月为一班，十月至次年正月以 1 个月为一班，轮流巡哨；山东登州水师每年三月出巡，九月回哨。为明确巡防海域，确定了相邻省份海面分界：山东与奉天两省海面以隍城岛为界，山东与江南两省海面以牛车山岛为界，江南与浙江两省海面以大洋山为界，浙江与福建两省海面以镇下关为界，福建与广东两省海面以铜山大澳为界。各省水师各在本省海面巡防，并在两省海面分界处与邻省水师会哨。每一省水师的各镇、协、营、汛所负责的海区也有划界，同样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邻近的水师部队会哨①。

在沿海险要之地修筑炮台，增兵防守，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十月，康熙帝令于沿海各地设立炮台。五十八年五月，两广总督杨琳奏称："广东沿海险要地方，修造炮台、城垣、汛地共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三二，《兵部·绿营处分例·外海巡防》。

一百二十六处，盖造营房共一千三百八十间，拨守官兵共三千九百九十一人，安炮八百零七位。"① 其他沿海各省也大体如此，吴淞、镇海、厦门等地都建有炮台。广东虎门于康熙五十六年建横档、南山两处炮台，嘉庆五年（1800 年）建沙角炮台，二十年建镇远炮台，二十三年建大虎山炮台，道光十年（1830 年）至十五年，又建大角、威远、永安、巩固等炮台，使虎门要塞成为由三道防线组成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体系。

在台湾设置府县，驻兵防守。康熙二十三年，设台湾府，属福建省，下辖安平、凤山、诸罗（后改名嘉义）3 县。雍正元年（1723 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 年），又先后析置彰化 1 县和淡水、澎湖、鹿港、噶玛兰（今宜兰）4 厅。在台湾、澎湖设总兵 1 员、副将 3 员，绿营兵 1 万，分水陆 10 营。

加强对澳门及在华外国人的管理。自康熙末年起，清朝统治者对在华的外国人产生了不信任感。康熙五十六年，清廷严禁天主教的传播。雍正元年，雍正帝尽迁西洋人于澳门。澳门是葡萄牙人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强行租占的，其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他们私自扩展土地，设立官署，构筑炮台，几乎成为国中之国。不过，中国在澳门仍设有官署，驻有军队。清雍正九年（1731 年）在前山寨设立香山县丞衙门，乾隆八年（1743 年）在前山寨增设海防同知衙门，派驻军队。次年，第一任海防同知印光任主持制订了《管理番舶及澳门章程》七条，强化了对澳门、澳门附近海域及在澳外国人的管理。十四年，清廷批准了澳门同知张汝霖等议订的《澳门善后事宜》十二条，进一步加强了对澳门的控制。与此同时，英国等西方国家来华商船逐渐增多，为加强海防，清廷于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下令关闭浙海、闽海、江海三关，限定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乾隆二十四年，为加强对来华外商的管理，清廷又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这是清朝第一个全面管理外商的正式章程。所有这一切，对于加强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四，康熙五十八年五月丙戌。

对澳门及在华外国人的管理，巩固海防，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嘉庆朝，不断发生英国兵船擅闯中国内洋的事件，嘉庆十三年(1808年）八月，英国军舰甚至强占澳门炮台。清政府大力整饬澳门防务，增设炮台，并于嘉庆十四年四月重新拟订《华夷交易章程》六条，不准外国兵船擅入我国海口。为加强海防，嘉庆帝一再强调："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官兵实力查缉"，必须"修明武备，整顿营伍，使奸徒闻风自远，以慑外夷而靖海疆"①；"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倘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②。

通过以上措施，清代前期的海防有了一定的加强，防备外敌入侵的意识也逐渐有所明确。但是，从边防、海防的总体来看，清代前期重边防而轻海防；从海防来看，则重内轻外，重海盗而轻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

综观清前期的边防、海防和对边疆的治理、管辖，确有许多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举措。但在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和管辖中，也反映出清廷浓厚的封建统治意识和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一些偏见和不正确的看法，这是研究清前期治边问题时，应当指出的。

---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一四〇，嘉庆十年二月辛酉。

② 《清仁宗实录》卷三〇〇，嘉庆十九年十二月戊午。

第十九章　清前期兵书

第一节　概说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兵书数量最多的时期之一，从顺治初年至鸦片战争以前，清人编纂的兵书约有300余部①。

明清之际，长期的战争环境，为兵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客观基础，战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引起军事家和兵学家的思考；战争中的经验教训，等待着兵学家去总结。顺治朝战争仍在进行，又只有短短的18年，兵书不多。康熙朝统一全国之后，社会生活相对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从而促进了兵书的编纂。康熙朝兵书数量多，质量较高，种类齐全，是清前期兵书发展的鼎盛期。据统计，康熙朝有兵书100余部，代表性的著作有：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邓廷罗撰《兵镜或问》，郑端撰《孙子汇征》，郑达撰《孙子附解》，顾炎武撰《惧谋录》，王馀佑撰《居诸编》、《乾坤大略》，魏禧撰《兵法》、《兵谋》、《兵迹》，王源撰《兵论》，薛凤祚撰《中西火法》，陆世仪撰《八阵发明》，薛熙撰《练阅火器阵记》，金德纯撰《旗军志》，温睿临撰《本朝八旗军志》，等等。特别应指出的是，科举制度对清前期兵书发展影响

---

① 兵书数量之统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近人编著的几部兵书目录，如陆达节《中国历代兵书目录》、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等，统计的兵书数目各不相同，有的还相差悬殊。这一方面是他们所掌握的资料有多有少，更重要的是由于标准和方法的不同，如种（部）数与版本、丛书与子书的关系等。著者把不同版本的同一兵书只视为一种（部）；《武经七书》注疏类兵书，每一种只作一种（部）计，其中的子书不再重复统计。

甚大。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很快就举行科举考试，提倡尊孔读经。清承明制，武科内场考试不论是默写还是策问的内容，都出自《武经七书》。与此相适应，注疏《武经七书》的应试读本应运而生，顺治朝就有陈裕辑《武经全题汇解》、尤大臣辑《武经七书题炬》等数种刊行，康熙朝《武经七书》、《武经三书》[①] 一类的应试读本大量问世，有 27 部之多，主要有朱墉辑注的《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辑注的《武经全解》、黎利宾曹曰玮夏仲龄辑注的《武经七书汇解》、鲁经纂辑的《武经大全会解》、王瞰辑注的《武经三书集注》等。这一时期兵书作者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

雍正、乾隆两朝是清前期兵书的萧条期。清代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对文化领域进行严密控制。雍正、乾隆两朝文字狱接连不断，统治者企图以此来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上的异己力量。乾隆朝更借修《四库全书》之名，寓禁于征，在全国范围内收缴、查禁所谓的“违碍”图书，大量的图书被销毁、抽毁和删改。据统计，“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②]；而收入《四库全书》的兵书仅 20 部 153 卷，存目 47 部 388 卷。在这样的环境中，学术空气日渐沉闷，汉族知识分子动辄得咎，人人自危，不敢研究历史（尤其不敢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不敢研究现实，只好在古书中讨生活，读经校书，考据辑佚。兵学本是一个敏感的领域，这时更视言兵为禁忌，结果是兵书数量明显减少，雍、乾两朝 73 年仅有兵书 73 部，而其中注释、辑佚古兵书一类的约占四分之一。李培辑《灰画集》、汪绂撰《戊笈谈兵》是这一时期较重要的兵书。

嘉庆、道光两朝是清前期兵书复兴期。其主要表现是：第

---

① 指《孙子》、《吴子》、《司马法》三书，因康熙四十八年诏令武科策题改用此三书而得名。

② 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一，数量明显增多，从嘉庆元年（1796 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 年）的 45 年间，有兵书 118 部。第二，有关现实的军事战略以及军纪、部队训练和城守等内容的兵书多，作者多为军队将领。嘉、道两朝，八旗、绿营更加衰败，军纪败坏，训练废弛，作战不力。这些兵书都是为挽救时弊颓势而作，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最具代表性的是龚景瀚撰《坚壁清野议》和关天培撰《筹海初集》。《坚壁清野议》是龚景瀚为对付川楚陕农民起义，在总结清军作战失利的教训的基础上，向清廷提出的新作战方略；《筹海初集》是关天培在广东水师提督任上关于筹划海防、整饬营务、训练部队等奏稿、章程稿的汇编。但相当多的著作则是从清代以前的兵书中摘录有关章节编辑而成，如嘉庆年间马慧裕辑《武备集要》、薛大烈编《训兵辑要》、陈阶平辑《戎政刍言》，道光年间许学范辑《武备辑要》、谢瑛辑《教练辑要》、陆嵩龄辑《御侮备览》等。第三，在古文献的整理、辑佚方面成就突出。孙星衍校勘的《孙子十家注》和毕以珣撰的《孙子叙录》代表了清代孙子学的最高水平。孙同元、洪熙煊、张澍、钱熙祚、黄奭等人均为辑佚大家，《黄帝问玄女兵法》、《太公金匮》、《司马法》、《战略》等古兵书都有逸文辑出，发掘出一些早已亡佚的古兵书。第四，边疆军事地理著作大量刊行。乾隆统一新疆后，西北边防成为朝野关注的重大问题，于是有关著作应运而生，主要有祁韵士撰《西陲要略》和《西域释地》，汪廷楷原辑、祁韵士编纂、赓宁绘图、松筠纂定作序的《西陲总统事略》，徐松撰《新疆识略》，沈垚撰《新疆私议》等。第五，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军事技术的兵书，如汪仲洋撰《铸炮说》、郑复光撰《火轮船图说》、丁守存撰《西洋自来火铳制法》等，呈现出传统兵书向新型的军事著作过渡的趋势。

清前期兵书是对明代以前兵书的继承与发展，在军事理论上有一定的创见，在兵书的发掘、整理上卓有建树，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如论述初起之兵战略原则的《乾坤大略》、论述军事范畴的专著《兵镜或问》、军事地理学巨著《读史方舆纪要》

和代表清代兵书整理最高成就的《孙子十家注》等，有的对当时和后世的兵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看，清前期兵书中比较优秀的并不多见，大量的是平庸之作，只是摘录、编辑前人的文字，转述别人的思想，抱残守缺，不敢面对现实，缺乏创新。

第二节　主要兵书介绍

一、兵 法 类

（一）《乾坤大略》

《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约 5 万字，王馀佑撰。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宝文堂刻本、宣统三年（1911 年）绿云楼铅印本和《畿辅丛书》本等刊本。

王馀佑（1616～1684），字介祺，一字申之，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新城镇）人。明末诸生，先后受业于著名学者鹿善继、孙奇逢等人。他生逢乱世，“念天下多故，究孙、吴兵书，善击射”①。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王馀佑与其父延善、兄馀恪等纠众千余，起兵对抗起义军，先后攻占雄县、新城县、容城县。不久，清兵入关，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撤往陕西，王馀佑与其父、兄等遂遣散所部。因受仇家构陷，王馀佑父兄被杀，本人亦险遭不测，遂入易州五公山双峰隐居，号“五公山人”。清康熙十一年（1672 年），移居献县，主讲献陵书院。王馀佑究心于兵学，著有《居诸编》十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络图》一卷、《诸葛八阵图》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机利害也”②。

《乾坤大略》约成书于五公山隐居期间。这时他虽讲学授徒，

① 《王馀佑传》，乾隆《献县志》卷十，《人物》二。

② 王源：《五公山人王馀佑传》，《碑传集》卷一二五。

寄情于山林，但一直在谋求以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遂“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总序》），撰成此书。作者以明末茅元仪《武备志·战略考》为基本资料，选取明代以前的史料180余条，按类分篇，以篇为卷，篇冠以序，序标以目。各卷的序言文字简短，总共不到2400字，但系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乾坤大略》为作者反清立国的战略计划和军事纲领，总结、论述了兵起先知所向、兵进必有奇道、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攻取必于要害、据守必审形胜、立国在有规模、兵聚必资屯田、克敌在勿欲速等十个战略原则。涉及战略方向的选定、战略机动、战略进攻、战略防御、军事地理、瓦解敌人、政权建设、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对于王馀佑来说，要反对清王朝的统治，起兵之后面对的将是强大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真是“以乌合之市人，当追风之铁骑”，其强弱、众寡对比自是十分悬殊。所以作者紧紧围绕着初起之兵的特点，阐发其战略理论。主要是：

1、正确选定战略进攻方向。起兵之后形势的变化异常迅速，“呼吸间耳，成败判焉”，所以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及时地选定战略方向，“霸王大略，此其首矣”（卷一，《自序》）。战略进攻方向的选定，应以敌人的强弱为准。敌人兵力弱小，可以直接向敌人的腹心地区进攻。如果敌人十分强大，则“断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卷一，《自序》）。就是说，这时应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发展，避实而击虚，乘势而趋利，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待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之后，再来打击敌之根本。王馀佑强调说，只要弄清了战略进攻方向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抓住了战略的精髓。

2、坚决、快速地向敌人进攻。初起之兵处在强大敌人的战略包围之中，要想不被敌人一举击垮，就应趁敌人分散和不备之时，快速行动，坚决进攻，这就是“贵进取，贵疾速”（卷一，《自序》）的原则。因为快速行动，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坚

决进攻，才能夺取胜利。

3、出奇制胜。初起之兵兵寡势弱，要摆脱被动，必须“用寡以覆众，因弱而为强”（卷四，《自序》）。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按常规办事，而应该奇、正结合，尤其要重视用奇，善于用奇。进军要得奇道，不识奇道者即为“愚主”、“黯将”。作战时不可与敌人堂堂正正地列阵角逐，而应出奇制胜，或突袭，或设伏，“一战以挫其锐”，每战必胜，逐渐转变敌己形势。王馀佑还指出，奇正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的，“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卷二，《自序》）。因此，要根据不同的客观情况，灵活运用。

4、慎重决战。作者虽然提出“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但并不是说初起之兵就要与强敌进行战略决战，而是指当不得已而与敌人遭遇时，应不畏强敌，敢打敢战，因为“非战无以却之”。即使如此，作者也十分强调要善战，坚决反对在不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他以搏虎作喻，说明经过多次作战之后，我虽然不断取得胜利，敌人占领区日渐缩小，但由于敌人兵力更加集中，仍然是一只“负隅之虎”，决不可等闲视之。所以，欲克强敌，必须“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其器”，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只有在敌己力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后，才能最后与敌决战。在此之前，“宁蓄全力以俟之”（卷十，《自序》），决不可轻举妄动。

5、政治招降与军事打击结合。王馀佑虽然高度评价政治招降对于瓦解敌人、发展自己势力的巨大作用，但他又强调指出，政治招降是有条件的，即必须以军事打击为后盾，而且只有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政治招降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他说：“要非战胜之后，则断不及此。何也？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利害迫于前，而祸福怵其心，故说易行，而从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嬲众，是犹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卷五，《自序》）

6、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王

馀佑在考察了大量以弱胜强的战例之后，对于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补遗一卷的《自序》中指出："迹其所以胜，不在强弱也，顾人之运用何如耳。"

《乾坤大略》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战略学著作。说它是战略学著作，是因为该书从战略的高度总结、论述了初起之兵的指导原则。王馀佑自己在该书的《跋》中说得很明白："此非谈兵也，谈略也。"但《乾坤大略》又不是一般的战略学著作。中国历来的兵书都是只研究两个国家或两个军事集团间的军事斗争规律，而《乾坤大略》研究探讨的却是既没有政权又没有正规军队的"初起之兵"，对拥有国家政权和正规军的统治阶级进行军事斗争的战略问题，因此可以说它是第一部论述初起之兵战略原则的军事学专著。该书所阐述的战略理论反映了初起之兵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对于研究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启迪作用。尽管该书理论深度和广度都嫌不足，但其在中国兵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二）《兵镜或问》

《兵镜或问》，二卷，约2.3万字，邓廷罗撰。有康熙间抄本和映旭斋初刻本、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重刊本、同治间重庆桐石山房刊本、来鹿堂刊本等。

邓廷罗，字叔奇，号偶樵，江苏江宁（今南京）人。顺治中拔贡生。出身于江南大族，少尚豪侠，读书重大义，耻事章句，喜论兵。康熙间由京师南下福建漳州参军事，后授山东莱阳知县，升湖南辰沅道，转荆南道。于荆南道任上撰《孙子集注》、《兵镜备考》、《兵镜或问》，通称《兵镜》(一作《兵法全书》)。

《兵镜或问》是第一部论述中国古典兵学范畴的专著，所论亦有一定的深度，在中国兵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上下卷各15篇，共论述了38对兵学范畴：其中关于战争观方面的4对，即"王霸"、"天人"、"内外"、"文武"；关于治军方面的6对，即"用舍"、"人势"、"道法"、"赏罚"、"创守"、"恩威"；关于用兵之道的28对，即"微彰"、"谋战"、"先后"、"缓急"、"弃

取”、“奇正”、“众寡”、“虚实”、“坚瑕”、“强弱”、“胜败”、“常变”、“险易”、“分合”、“老壮”、“久速”、“劳逸”、“锐惰”、“攻守”、“迂直”、“彼己”、“治乱”、“进退”、“生死”、“顺逆”、“主客”、“长短”、“步骑”。作者“将历代帝王将相庙谟胜算，文德武功，事迹相反，名义相类者，设为问答，使之相提并论，以考其得失，于同处求异，于异处求同，务期诸家之是非离合，与历代之成败兴亡合契同符”（《凡例》)。书中有不少很有见地的议论。作者重视人的作用。在《天人》篇中指出：“天视即我民视，天听即我民听。不可知者，天也。无不可知者，人也。”所以关键在于任人。在《人势》篇中，进一步论述了人的重要性，认为无其势而得天下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是无其人而得天下的情况则不可能存在，因为“国之规模存乎势，势之枢机存乎人”，有人不必用势。所以，作者强调说：“君相之职，莫大乎知人。”重视人才的作用。在《用舍》篇中强调指出：“一用一舍，而天下之安危系焉。甚矣，人才之有利于人国也。”用舍之道，“贵乎明与断而已”，不能明断，则用舍皆失其道。所以，用舍之道的根本原则是无亲疏、德怨、门第，必须至公无私。关于用兵作战，作者认为固然要像木匠切墨引绳一样遵守一定的法则，但也不能胶柱鼓瑟而不知变通。变通的思想贯穿于各篇之中，如《虚实》篇提出：“明乎致人之术，而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矣；明乎不致于人之术，而在我者常实，在敌者常虚矣。虚实有定形哉?”又如在《主客》篇中，认为主客之势，有常有变，常变之势，或利或害，善兵者，“因利以制变而已”。

(三)《兵经》

《兵经》，三卷，揭暄撰。此书作者在世时没能刊行，长期以抄本流传。后来的刊本因所据抄本不同，文字差异很大，甚至连书名也不相同。最早的刊本是道光七年（1827 年）《清经世文编》本，名《兵法百言》。咸丰九年（1859 年）濠塘刻本为《揭子兵经》，光绪十八年（1892 年）刊本称《兵法圆机》。《清经世文编》本内容不全，删去了“言”字条，“左”、“较”、“蹙”、

"嘜"、"半"、"静" 6 字条佚。从文字上看，《揭子兵经》、《兵法圆机》比较接近，为同一个系统，而《兵法百言》与其差异较大，系另一个系统。

揭暄，字子宣，江西广昌人，明末诸生。明亡，揭暄起兵抗清，为南明隆武政权职方司主事，失败后隐居山林。揭暄精天文历算，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曾将所著《璇玑遗述》草稿寄给著名的天文学家梅文鼎。卒时已年过 80，具体年份不可考。揭暄喜论兵，除《兵经》外，还著有《战书》十七卷。

《兵经》全书分 3 篇 100 字条，每条用一个字为名。上卷智篇 28 字：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论述"计谋之事"，即以谋略制敌的原则和方法；中卷法篇 44 字：兴、任、将、辑、材、能、锋、结、驭、练、励、勒、恤、较、锐、粮、行、移、住、趋、地、利、阵、肃、野、张、敛、顺、发、拒、撼、战、搏、分、更、延、速、牵、勾、委、镇、胜、全、隐，论述"行军之事"，即治军和用兵的原则；下卷术（一作"衍"）篇 28 字：天、数、辟、妄、女、文、借、传、对、蹙、目（一作"眼"）、嘜（一作"声"）、持（一作"挨"）、混、回、半、一、影、空、无、阴、静、闲、忘、威、由、自、藏（一作"如"），论述"推极之事"，即有关用兵作战的最高深的理论。

《兵经》主要论述用兵作战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战争观等方面则很少涉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继承了古代兵家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天命论，认为"数"（天命）本来是没有的，"用兵贵谋，曷可言数"①！作者在书中讲的"天"，是指天候等自然变化，而且认为"天未尝不在人，惟人能因之取胜耳"（《术篇·天》），所以提出了"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

---

① 《兵法百言·术篇·数》，《清经世文编》本。以下凡不特别注明版本者，均据此本。

机”（《术篇·辟》）的正确主张。

在治军方面，认为治军一定要用法令，对犯法者要严惩不贷，使士卒不敢轻法，军队才能有战斗力，所以“胜天下者不弛法”（《法篇·勒》）。可贵的是，作者正确认识到以法治军与爱兵并不矛盾，不使士卒陷于敌是“恤士”，“不使陷于法”也同样是“恤士”（《法篇·恤》，光绪三十四年《兵法百言》侯荣释义本），决不可“以濡忍为恩，使士轻其法，致贻丧败也”（《法篇·勒》，咸丰四年《兵经百篇》高氏抄本）。对于将帅，主张给予独断专行的权利，不干涉将帅的指挥，令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以专制而成”，只能“将制其将”，不可“以上制将”（《法篇·任》）。将领应该文武双全，才德兼备。作者把将领分为以智见长的儒将、以能征善战见长的勇将、以胆气见长的敢将、以善于节制下属见长的巧将和以技能见长的艺将等类型，但认为军中应该兼有各种类型的将领，而具有全面素质的将领就更为可贵，“兼无不神，备无不利”（《法篇·将》）。将领要善于集中下属的智慧。“智不备于一人”，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将帅在进行谋划时，“必参诸群士”（《智篇·谋》）。对于主动出谋献策的人，“偶然之见，一得之长，虽以卒徒，必亟上擢”。这样，“言有进而无拒，不善不加罚”，就能够罗致天下的英雄（《法篇·材》）。将帅一方面要善于发现人才，另一方面要善于因材施用，用其长而抑其短，使其能而去其凶，收其益而杜其损，“则天下无非其才”（《法篇·驭》），所以只要善于用人，虽“偏裨皆大将也”（《法篇·能》）。作者认为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保证事业成功，所以提出了“胜天下者用天下”的原则，就是要善于利用与国的、邻国的，甚至是敌人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勾敌之信以为通，勾敌之勇以为应，与国勾之为声援，四裔勾之助攻击”（《法篇·勾》）。

在战略战术思想方面，突出的有二点。一是继承发扬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思想。作者认为，兵事务杀，这与务生的天德相矛盾，但为了安民除暴，可以采取战争的手

段。然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最佳的选择是战争爆发之前，“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智篇·先》）。战争一旦爆发，善于用兵的将领，就应该“不务数胜，而务全胜”，具体说就是“定不攻自拔之计以全城，致妄杀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法篇·全》，光绪三十四年《兵法百言》侯荣释义本）。二是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兼取的思想。作者把“先”字放在百字之首，又设“速”字条专论速战速决，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先发制人的。与此同时，作者也主张在某些情况下要后发制人，而且其论述相当精彩，如“持”字条就列举了应该与敌人相持的 11 种情况，并指出，待敌人疲惫之后，再来收拾它，“则力全而功多”。后发制人的战法既可以“延以固己”，保存自己的实力，又可以“持以窘敌”，疲惫敌人。用后发制人的手段，完全可以达到先机制敌之利，所以作者强调说：“以后为先，兵经之秘。”

鲜明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兵经》一书的特色。作者认识到，事物都具有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术篇·对》），而动与静、攻与守、常与变、主与客、阴与阳、强与弱，也无不如此。“是此也，非此也”（《智篇·变》），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事物又可以转化，动转为静，攻转为守，奇转为正，主转为客，阴转为阳，强转为弱。所以，对于用兵作战，作者强调“活”，“兵必活而后动，计必活而后行”（《智篇·活》）；强调“变”，“以常行者而变之，复以常变者而变之”（《智篇·变》）；强调转化，“善用兵者，能变主客之形，移多寡之数，翻劳逸之机，迁利害之势，授顺逆之状，反骄厉之情，转乎形并转乎心，以艰者危者予人，易者善者全身”（《智篇·转》）。由于“时移则理迁”（《智篇·读》），对古兵法也不能照搬照套，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善计者，因敌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书而生，因天时地利事物而生，对法而生，反勘而生”（《智篇·生》），“人泥法而我铸法，人法法而我著法，善兵者神明其法”（《智篇·读》）。

《兵经》言简意赅，富有哲理，是清前期理论色彩比较浓厚、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一部兵书。该书流传较广，特别是在清末，不但有抄本存世，而且出现了多种刊本，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兵谋》、《兵法》

《兵谋》、《兵法》，各一卷，共约1.9万字，魏禧撰。有道光《昭代丛书》本。

魏禧（1624～1681），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又号勺庭，江西宁都人。明末诸生，明亡后绝意仕进，隐居宁都翠微峰，授徒山中，后游学江南，以文会友。康熙十七年（1678年），举博学鸿词，以疾辞。魏禧以散文著称于世，与侯方域、汪琬并称清初散文三大家。著有《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日录》三卷、《左传经世》十卷、《诗集》八卷。喜谈兵，除《兵谋》、《兵法》外，另有《兵迹》传世。

魏禧自小喜读《左传》，《兵谋》、《兵法》就是归纳整理《左传》中用兵谋略、用兵之法的兵书。魏禧认为："凡兵，有可见，有不可见。可见曰'法'，不可见曰'谋'。法而弗谋，犹搏虎以挺刃而不设阱也；谋而弗法，犹察脉观色而亡方剂也。"于是他据《左传》编成《兵谋》、《兵法》二书。

《兵谋》将《左传》中用兵谋略归纳为32种，各用一个字命名：和、息、量、忍、弱、强、致、畏、防、需、疾、久、激、断、听、诡、信、谍、间、内、衅、逼、与、胁、假、名、辞、备、法、同、本、保。和，即上下礼让，同心合力；息，即息民而用之；量，即量己量敌；忍，即忍辱负重，以图大谋；弱，即强而示之弱以骄敌；强，即弱而示之强以慑敌；致，即敌不欲战，则调动敌人，迫其就范；畏，即畏敌而有所戒备；防，即战争未起，早事预防；需，即迟缓待敌；疾，即急而乘之；久，即持久以要击之；激，即自我克制，激怒敌人；断，即决断不疑；听，即倾听部众、贤能、尊者的意见；诡，即了解敌人的诡诈，而又欺诈敌人；信，即诚信不欺，遵守规范；谍，即用间谍；间，即施行离间之计；内，即利用内奸；衅，即乘敌之隙，观衅

而动，而防敌乘我之隙；逼，即以势逼敌，不战而胜；与，即与国，与友好国家联盟以孤敌，攻灭敌之盟国以弱敌；胁，即攻敌所必救，胁迫敌人不得不听从我“指挥”；假，即假借对梦境等事物的解释，假借鬼神和物象，鼓舞官兵斗志，威胁敌人；名，即师出有名，必执义循礼而后名；辞，即要善于辞令；备，即未战备战，未败备败，有备无患；法，即赏罚有法；同，即与臣僚士卒同甘苦；本，即修其本以胜敌；保，即不骄不躁，确保已得的胜利。

《兵法》将《左传》中用兵之法归纳为22种，亦各用一个字命名：先、潜、覆、诱、乘、衷、误、瑕、援、分、尝、险、整、暇、众、简、一、劝、死、物、变、将。先，即先声夺人，先发制人；潜，即秘密出兵；覆，即埋伏乘敌；诱，即示弱诱敌；乘，即乘间击敌；衷，折而取其衷，即分割包围；误，即多方以误之；瑕，瑕隙，即攻敌薄弱之处；援，声援，置援以备不虞，且张其声；分，兵必分道，以应付各种情况；尝，尝试，先进行试探，然后据情采取行动；险，知地之险阻，或自迫于险，或凭险以自固，或厄人于险，或陷人于险，或自奋以出险；整，军容整饬；暇，闲暇，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样子；众，兵力众多，兵少则示众以慑敌；简，选拔精锐；一，号令进退统一整齐；劝，用恩、威、忿、身等手段激励将士；死，利用敢死之士；物，做好各种物资准备；变，权变，因情制变；将，讲究将将之法，不可不慎。

《兵谋》、《兵法》在对每一种兵谋、兵法作简短的解释之后，列举《左传》中若干战例说明之，计《兵谋》730多条，《兵法》420多条。每条战例都注明相应的年份，便于查阅。

（五）《兵论》

《兵论》，不分卷（一说二卷），原本32篇，今存29篇，约1.8万字，王源撰，有清铅印本。

王源（1648～1710），字崑绳，一字或庵，大兴（今属北京）

人。自幼“唯喜习知前代典要，及关塞险隘、攻守方略”①，曾从魏禧学古文，56岁时师事颜元，确立其经世致用思想。对兵学多有研究，曾参与撰修《明史稿》，《兵志》部分即出其手笔；著有《兵论》、《舆图指掌》、《兵法要略》等兵书；所撰《平书》十卷中亦有《武备》一卷。《兵法要略》三编二十二卷，“上编，则《孙子》诸家之说，刈其繁而存其要，用兵之方略也；中编，则束伍、营阵、操练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车骑水陆、接刃合战、攻城守垒之法也；下编，则春秋以迄于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②。另有《居业堂文集》二十卷。

《兵论》是一部论述将领、作战、阵法等军事问题和评论古人用兵得失的兵书，现存篇目如下：权论、将论、战论、八阵论、郑庄公论、子元论、司马戌论、魏舒论、吴越论、庞涓论、赵胜论、项羽论、李广论、赵充国论、邓禹论、贾诩论、费祎论、诸葛诞论、张宾论、庾翼论、谢安论、苻坚论、唐太宗论、李密论、耶律休哥论、岳忠武王论、韩蕲王论、伯颜论、耿炳文论。

该书认为，得人心者将之本，明号令、信赏罚者将之权，任天下之智勇者将之用。欲任天下之智勇，知以感之结其心，任以劝之展其才，利以诱之遂其欲。用兵作战，必权其先后而启动。先后之间，要无定势，唯审敌强弱，度其难易，相其机宜，悬权而动。一切行动都要视具体的敌情而定，攻守因乎敌之形，缓急因乎敌之势，奇正因乎敌之情。

该书指出，阵法之要在于奇正分合而不是诡设物象，所谓“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不过是假其名而已，未尝有其象。阵法亦即平时教战之术，要根据兵力多寡、地形广狭而定，但作战时又不可拘泥于成法，“善奕者未尝按谱以置子，善战者未尝执法以

① 《清史列传》卷六六，《王源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27页。

② 王源：《兵法要略序》，《居业堂文集》卷十二。

立阵”（《八阵论》）。

该书对军事人物用兵得失的评论，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每篇主要从一个侧面阐述一个主题；每篇虽以一个人的名字名篇，但所论列的事件并不限于一人，而是列举历史上相类或相反的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论证，所以每篇都比较深入地论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原则。书中体现的主要军事思想是：第一，灵活用兵的思想。《张宾论》提出，用兵作战，有定计，有变计；必须量彼己之力以为攻、守、战之方。若只有定计，待情况变化了，或不知前计之不可用，或知其不可用而不知变计，就算不上是一个好的将领，必然招致失败。所以，应该“因机制变”。《魏舒论》提出了“因机变化以取胜”的观点。《韩蕲王论》批评韩世忠在黄天荡与金兀术相持 48 日而不知变计的错误，指出：“用兵之道，存乎变，变则生，变则通，变则神。处败势而能变，终于胜；处胜势而不知变，终于败。”第二，深根固本的思想。在《唐太宗论》中，赞扬李世民不汲汲于目前之小利，弃东都洛阳不攻，引军还保长安，使自己先置身于不败的做法，深得固本自强之策，也是其后来能够席卷天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强调说：“善图天下者，必深固根本，先除腹心之害，使无后顾之忧，然后以全力争天下，故可以定天下而不难。”第三，集中兵力、先攻弱敌的思想。作者认为：“以寡御众者难为力，避众击寡者易为功。”（《耿炳文论》）靖难之役耿炳文以 36 万之众败于真定，其原因就在于面对善战能谋的燕王朱棣，不知以守为攻，却分兵 9000 人为先锋，由杨松率领径薄雄县，置松于必败，结果杨松一败，耿炳文全军之众俱心摇气馁，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临大敌而分兵不厚者，其势必败。”（《耿炳文论》）在集中兵力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两阵相当，先击偏师以取胜”的作战原则，认为“世徒以攻坚犯锐为良将，不知将自有所以为良将者，初不以攻坚犯锐为能也”（《子元论》）。此外，《兵论》论强与弱、大与小、攻与守、持久与速决等，强调变，强调转化，辩证法思想比较突出。

《兵论》一书，立论比较公允，观点明确，有一定的理论深

度，是清前期一部很有特色而又有学术价值的兵书，但因印行较晚，影响不大。

（六）《坚壁清野议》

《坚壁清野议》，一卷，龚景瀚撰。有咸丰间刊本，另有抄本存世。

龚景瀚（？～1802），字惟广，号海峰，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乾隆进士，先后任知县、知州等职。嘉庆元年（1796年），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爆发，龚景瀚入陕甘总督宜绵幕，充翼长，参军事。三年，上《坚壁清野议》。

该书系针对嘉庆初年清军在镇压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向清廷上的奏议。作者首先分析了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以来，清军调邻省之兵、增新兵、募乡勇的弊病（“三害”），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种种困难（“剿贼四难”），认为民心无所恃则是清军作战屡屡失利的根本原因。因此，提出先安民而后杀“贼”的方针，具体办法就是“行坚壁清野之法，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壮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并小村入大村，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与此同时，建立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其任务是牵制农民起义军，“不与争锋，但尾其后，‘贼’攻则救，‘贼’退则追”。这样，对清军有“十利”，而起义军则进不得战，退无所食，“不过旬余，非溃则死耳”。

《坚壁清野议》与清代那些闭门造车空发议论，甚至仅仅摘抄古兵书成文的兵书不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现实性和实用性。它从实际出发，分析矛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因此得到了嘉庆帝的赞同。川、楚、陕等省先后采用坚壁清野之法，从而隔断了起义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给起义军造成极大的困难。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的最后失败，与清政府采纳龚景瀚之议，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这一政策，对后世亦有极大的影响，它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的有效手段。

（七）《洴澼百金方》

《洴澼百金方》，十四卷，约 14 万字，图 175 幅，旧题惠麓酒民编。有多种清抄本，刊本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榕城嘉鱼堂刻本为最早，以后又有道光十年（1830 年）来鹿堂《三书宝鉴》本、道光二十年陈阶平校刊本（易名为《备豫录》）等多种。

惠麓酒民其人，一说为无锡袁宫桂，一说为吴宫桂，皆不可考。关于此书的编撰，惠麓酒民在《序》中说："后于友人处借得钞本城守书二种，至简至明而可施诸实用者，乃略为删节，合而编之，为一十四卷，名曰《洴澼百金方》。"在卷首《凡例》中又说："是书系明人钞本，一种有十二卷，一种有十三卷，俱不著撰人姓氏，……其中皆节取《左传》、《周礼》及《二十一史》备御之策编辑而成。"经查对，十二卷本为《金汤十二筹》（一题《金汤借箸十二筹》），题李盘撰；十三卷本为《金汤借箸》，题周鉴辑著，都是明代兵书。二书最大的差别是《金汤借箸》多出"营阵"一卷，其他的仅仅是卷次顺序不同和文字稍有差异而已，实为同一书的两个不同版本。陈阶平在《洴澼百金方》刊行 30 余年之后最先指出，此书实本于《金汤十二筹》，后人多认同此说。但更确切些应该说，《洴澼百金方》基本上是以十三卷本《金汤借箸》为蓝本，部分地参考了十二卷本《金汤十二筹》编辑而成的：第一，《洴澼百金方》惠麓酒民的《序》，主体部分是对该书各卷的介绍，其文字与《金汤借箸》周鉴《自序》基本相同。第二，各卷卷目与《金汤借箸》完全相同（仅将十三卷本卷一分为二卷），与《金汤十二筹》有多处不同。第三，《洴澼百金方》"营阵"全卷和其他各卷一些零星内容，如卷一的"建城八忌"、"贤才宜备"、"精勇宜备"、"伎艺宜备"，卷八的"行军号令"，卷十的"防墙"等内容，《金汤十二筹》中都没有，却可以在《金汤借箸》中查到。当然，《洴澼百金方》与《金汤借箸》、《金汤十二筹》也有不同，一是卷次顺序上的变动；二是个别文字的修改，如将暗指清或虽非特指但可能刺激清统治者的"虏"、

“奴”等改为“敌”字，某些文字删繁就简，将原书中“周公台曰”、“李小友曰”、“王之岳曰”改为“酒民曰”、“居士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形式上的、枝节性的，因此可以说《洴澼百金方》就是《金汤借箸》的另一个版本。

尽管如此，《洴澼百金方》的刊行，仍有一定的价值。《金汤借箸》和《金汤十二筹》因是明人写的兵书，又有强烈的反清倾向，所以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由于书名变成《洴澼百金方》，并在封面上打出“福（康安）大将军鉴定”的旗号，竟使其成为清代最为流行的兵书之一。后来，有不少兵书更是摘录其部分篇章单独成书的，如薛大烈的《训兵辑要》，几乎就是《洴澼百金方》的简本。再如陈阶平《戎政刍言》中的“训兵”篇，全文照抄《洴澼百金方》卷三中的“训兵”篇。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刊行的协之撰《营伍指要》，其中的“晓谕兵丁五条”，即抄了卷三中“训兵”六则中的五则。道光二十五年，御史江鸿升上《整顿兵政》折，全文抄录《洴澼百金方》“训兵六章”，请求由兵部颁令各省绿营，于每月小合操之日向兵丁宣讲。后来，分别以《训兵六则》和《训兵六章》之名，刊行了单行本。民国时期，《洴澼百金方》又改名为《自卫新知》，多次出版铅印本。

二、军事地理类

（一）《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舆地要览图 36 幅、沿革表 35 份，共约 280 多万字，顾祖禹撰。有稿本和多种清抄本传世，康熙间通志堂刻本为最早的刊本，惜已残缺不全；刊本以嘉庆十六年（1811 年）龙万育敷文阁本最为通行，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新化邹代过三味书室本为佳。1936 年商务印书馆将其收入《国学基本丛书》时即据邹本排印，1955 年中华书局重印。

顾祖禹（1631～1692），字复初，号景范，人称宛溪先生，

江苏无锡人。顾氏高祖顾大栋精于边疆军事地理，著有《九边图说》一书；曾祖顾文耀曾奉使九边，深悉边情；父顾柔谦精于史学。顾祖禹少承家学，遵奉其父考究“先代所著述”，“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抒志意，昭示来兹”（《总叙一》）的遗嘱，隐居不仕，立志著述。他从 29 岁起，博览群书，考订史料；历山川城郭，访商旅征夫，经 20 余年的辛勤耕耘，十易其稿，终于撰成这部军事地理学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前 9 卷系历代州域形势，记上古至明代政区沿革。末 7 卷系川渎、分野，采录历代著述中有关山川源委和漕河、海道的记载及天文星宿分野之说。中间 114 卷系明代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省）地理分叙。每一省首列总叙，概述其地历史地位和作用；次疆域、沿革、名山、大川、重险等，明其形势；再以府、州、县为单位，详记城邑、山川、关隘等，并记载其地发生的战争，重点分析山川险要、攻守利害，阐明地理形势对军事的影响。另附《舆图要览》4 卷，用概况说明、图、表三种形式介绍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九边、黄河、海运、漕运及朝鲜、安南（今越南）、海夷、沙漠等情况，实为最为完备的明代兵要图籍。

顾祖禹撰写《读史方舆纪要》的目的是反清复明，他企图通过对地理形势及其相关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中国数千年间治乱兴亡的规律，为其复兴大业服务。他不满于历代志书或者“纪胜山川稍备，求其攻守利害则已迂”，或者“考核有余，而于形势险夷则未尽晰”（《凡例》），所以在书中特别重视论述地理形势与军事的关系，力求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军事地理学的特色异常鲜明，正如魏禧指出的那样，“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①。书中强调，战守攻取都应以分析地理形势为基础，“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总叙三》）。地利是行军用兵之本，

① 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

只有先知地利并在战时借助于向导的帮助，“然后可以动无不胜”（《总叙三》）。但同时又认为，地利并不是永远不变的，“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像函关、剑阁这样的险要，其作用往往因时因人而异，“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汎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总叙二》），所以重要的是要“得人”，即善于利用地利的优秀将领。在分析地理形势时，顾祖禹经常对攻守、奇正、虚实、迂直、分合等军事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分析四川地理形势时说：“弃守以为战者，不可谓善战者也。故曰：以战为守，守必固；以守为战，战必强。战、守不相离也，如形影然。”（《四川方舆纪要序》）顾祖禹十分强调都城的重要性。魏禧指出，“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的思想，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最伟且笃”的两大观点之一①。顾祖禹认为：“势莫如建为京师。”（《直隶方舆纪要序》）为加强京师的防卫，必须采取居重御轻的方针；设防要前有屏障，后有纵深；要重点设防，实行积极防御，等等。

《读史方舆纪要》取材宏富，作者参考了二十一史、地方志等典籍100余种；考核精详，观点鲜明；体例完备，正文顶格书写，注文低格书写，注中之注则用夹行书写，是一部得到学者和兵家高度评价的军事地理学名著。魏禧赞其为“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②；刘献廷谓其为“千古绝作”③；梁启超亦指出，此书“体裁组织之严整明晰，古今著述中盖罕其比”，“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国内战争一日未绝迹，则其书之价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④。《读史方舆纪要》对后世影响较大，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的《大清一统志》，有一部分就是采自

---

①② 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6页。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18页。

该书。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详于古而略于今”；过分强调地理因素对朝代兴亡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治因素；对地理的记述亦有错误，等等。尽管如此，《读史方舆纪要》在学术上和军事上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灰画集》

《灰画集》，二十卷，约50万字，李培纂辑。有清雍正六年（1728年）稿本和民国时期训练总监编辑局排印线装本。

李培，字益谿，直隶蠡县（今属河北）人。活动于康熙、雍正年间，生卒年月不详。喜读史书，“以考今昔兴亡得失”；更嗜好地理书，“日夜玩索其说，写画其图”（《序》），因而受到其师著名学者颜元的赞许，研习地理之志益坚。雍正四年至六年，将平生所得30余种地理图书资料，如《读史方舆纪要》、《秦边纪略》、《居诸编》、《皇舆志略》、《焚馀集》、《聚米集》、《文武库》、《舆地全览》、《舆图指掌》、《爵秩全览》等，以及其个人的著作《书〈北直历代善政录〉后》、《辽东明志录》、《山西大同边说》，辑为一书，取王馀佑诗句“灰画何年计得成”之意，题为《灰画集》。该书大体分为三部分：前3卷为边腹总论，以明天下之大势；中15卷为京省利弊、九边要说，以次为北直、南直、盛京、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四川、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末2卷为《秦边纪略》。

《灰画集》资料丰富，所辑图书有不少是稀见的稿本，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该书虽以辑录他人著述为主，但全书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并对所辑资料有补充，有辨证，体现出编纂者的学术观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综合类

（一）《兵迹》

《兵迹》，十二卷，9万余字，魏禧编辑。该书成书于明末清初，长期以来仅有抄本流传，至民国四年（1915年）始由南昌

豫章丛书编刻局刊印。

《兵迹》是一部分类辑述军事史实的兵书，全书分十四编，依次为：历代编、列国编、将体编、将物编、将兽编、将能编、将效编、华境编、华人编、土夷编、鸟夷编、近国编、远邦编、边塞编。编下设目。历代、列国二编，为史的叙述，将中国从远古时期传说中的伏羲、神农到明代的数千年间，按朝代和国别列目，辑述有关战争的产生、发展以及军事制度概况等史实。将体、将物、将兽、将能、将效五编，辑录历代将帅利用各种条件胜敌的史事。华境、华人二编，辑录有关中国境内各地兵卒和标兵、僧兵、赤脚兵、被窝兵等特种部队的习性特点以及利用商贾、寇盗、渔人、猎人、民人、乡兵、土人、农民、妇女、儿童作战等方面的史料。土夷、岛夷、近国、远邦四编，介绍国内各少数民族、日本等岛国、中国边疆地方政权及中国周边国家、欧美诸国的诸如地理、物产、人文、军事等情况。边塞编，记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镇、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边塞地区的兵要地志，紫荆关、居庸关、高阙、长城在边防中的作用，以及明代兵制的沿革等。

该书虽然主要辑录史实，但亦间有辑录者对某些问题的议论，从中可窥其军事思想。魏禧从民本思想出发，重视民众的力量和民心的作用，认为元朝既强且大，但不到百年而亡，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不顾民怨，不顾民变，不顾民死尽，不顾兵死尽”（《历代编·元》）。主张以法治军，既要严格执法，又要善于用法。认为只有严明法令，军队才有战斗力，“从来名将未有不法之峻者”；善于用法者，“能于败中用法，亦可转败为胜”（《将兽编·律》）。主张将领融贯文武，将领应通儒，儒亦可为将，反对“儒不可战”的观点；应该尊重儒者，指出“汉高溺儒冠，全忠置浊流，亦大误矣”（《将兽编·儒》）。重视“士”在军队建设和战争中的作用，认为“能得士者强，能用士者胜”，并提出：得士，关键在于“善求”、“恭礼”、“奉侍”、“隆典”、“尊事”、“尊名”、“听荐”、“善选”；用士，则在“因其材”、“纳其谋”、

"纳其谏"、"任之一"、"任之专"、"任之久"、"不计败"、"不听谗",等等(《将兽编·驭》)。作战指导,主张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用兵。论阵,强调临时制变、临敌制变,或顺天时,或因地形,因机制敌,不可拘泥于成法。论守,则说:"苟能先、能因、能变,又何守之不固哉?"(《将能编·守》)针对"长城易溃,顷刻而入,无益疆圉"的观点,充分肯定长城的防御作用,指出如无长城,则塞下田不可得而耕,塞下人不可得而居,兵势亦将因此而孤,所以提出了"外凭长城以为藩,内列堡塞以为固"(《边塞编·长城》)的防御战略。

《兵迹》辑录资料丰富,分类编排,便于查阅,为学习、研究古代军事问题提供了方便;魏禧的评语虽不多,但大都能点明问题实质,起到画龙点睛之效,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戊笈谈兵》

《戊笈谈兵》,十卷,十四笈,汪绂撰。汪绂(1692～1759),清初学者、教育家。初名烜,字灿人,号双池,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自幼志于学,因家贫曾赴景德镇为佣工,后流浪至福建,先后在枫岭、浦城授学。读书务博,精儒学,通兵法、术数,著述多达30余种,主要有《易经诠义》、《尚书诠义》、《诗经诠义》、《四书诠义》、《春秋集传》、《理学逢源》等。《戊笈谈兵》为汪绂未成之书,书稿由汪之高第弟子收藏,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始刊刻行世,然卷六上第九笈、卷十第十四笈已佚。全书有地图、星图、阵图123幅,文约23万字。

该书以天时、地利、人和为纲,分为三大部分。

卷一至卷三,为周天图说、七曜灾祥、云雨风角、遁甲奇门、演宿翻禽五笈,论天文、占卜,属天时。作者赞同儒家"天人合一"的学说,主张用经学、理学的观点研究天文,认为"人事召于下,则天道感于上;天象变于前,则灾戾应于后"(卷二上,《七曜灾祥》序)。

卷四至卷六,为宇内舆图、形势更革、州郡财赋、水陆路程等五笈,论军事地理,属地利。作者认为,地理形势对于军事关

系极大，虽然兵家从舆图上可得形势之大概，但其间重地要害地势形便等重要内容，有很多是舆图所难以表现的，所以著《天下形势总论》、《天下形势分论》、《南北形势分论》，详论全国山川形势，燕京、长安、洛阳、建康、汴梁、成都等要地的战略地位，南北地理形势的差别及其相应的攻守战略。

卷七至卷十，为司马吴孙、黄尉李姜、古今阵法、军器四笈，论兵书、阵法和兵器，属人和。

对于兵书，作者将“武经七书”分为两组，采取总论、每篇分论和原文（《司马法》、《三略》为全文，《吴子》、《孙子》、《尉缭子》、《唐李问对》、《六韬》五书为节选）注释的形式，对其源流、真伪、内容等一一考辨评说。汪绂用政治标准和军事标准综合考察，认为七书中《孙子》、《吴子》、《司马法》最为精粹。他把政治标准摆在第一位，首要的是看是否符合儒家的仁义王道思想，并据此而改变“七书”的排列顺序，将《司马法》列为首位，《吴子》次之，《孙子》又次之。军事上，汪绂强调节制、奇正、机变，认为“握奇之妙，自当推《孙子》”（卷七，《孙子·军形》评语）；“论机变，则《孙子》为长”（卷七，《司马吴孙总论》）；“《孙子》谈兵，高出于七书之上矣”（卷七，《孙子·始计》评语）。对其余四书，也分别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进行评价，总而言之，“《六韬》伪而险，《李子》驳而肤，《尉缭》严以刻，《三略》尚矣”（卷八，《黄尉李姜总论》）。

关于古今阵法，书中对古阵的名称、阵容结构以及各种阵法的变化与运用都有论述，并根据古阵法原理，创七军大衍阵、五叠连环阵、山战猿猱阵等新阵。作者认为：“师之有阵，自古已然，要之所以整齐士卒，使无扰乱而已耳。古之为阵者，或直以形名，或假以象名，名可考而法不存，然坐作进退之节，行列纲纪之数，犹昭然也。”（卷九，《古今阵法》序）他主张因时制用，对古阵法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成规在昔，然而通变由人”，反对泥古而不能通；“严编伍所以节制之方，立阵名又所以编伍之则”，反对“泥名而别问神奇于左道”（卷九，《律臧赋》）。

该书作者知识广博，对军事问题有其独特的见解，所以虽为文人谈兵，却并非空谈，尤其是关于军事地理、兵书、阵法的论述，有不少是很有见地的。该书印行之后，在社会上亦有一定的影响。但作者论兵，过于强调政治标准，而对军事的独特性重视不够，甚至有不少儒者的偏见。

四、注疏类

(一)《武经全解》

《武经全解》，或题《武经七书全解》、《武经七书标题全解》，七卷，丁洪章辑注，邓琟校订。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赐书堂刊本。

丁洪章，生卒年不详，字南翔，江苏丹阳人，撰有《武经全解》和《策论翼文》初集、二集、三集等。

《武经全解》是典型的武科应试辅导读物。正文分上下两栏。下栏列《武经七书》原文，以注《四书五经》之法，分列“全旨”、“节旨”、“注”、“疏”、“参订”、“考证”等项，详加注解：全旨以提其纲，节旨以挈其领，注以训其字义，疏以阐其意旨，参订以穷其理，考证以核其事。上栏则为标题详解论法，先列标题，每题之下有“题解”以为拈题之的，有“论法”以为立论之宗。“七书”前后附列《射谱》、《武闱乡试条约》、《棘围事宜》、《武经七书数目隐义题全解》、《武经七书标策全解》等，以为武科内外场指南。《武经七书数目隐义题全解》将有关“七书”中数目的策题分门汇纂，编为歌诀；隐义题则注明其来龙去脉，以帮助应试者相题立论。《武经七书标策全解》列出 48 道策题，每题之下分列“题源”、“注疏”、“题解”和“策法”。

该书在清代武闱读物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体例相当完备，注解等亦有可取之处，对于理解原书有一定的帮助。

(二)《武经七书汇解》

《武经七书汇解》，九卷，朱墉辑注。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怀山园刊本、康熙三十九年朱墉自序刊本和光绪二年（1876年）广东古经阁国英重刊本等。

朱墉，字鹿冈，祖籍江苏吴县，后迁居江宁。初应童子试不中，乃改应武试，中武秀才。康熙间应乡试失败后，离江宁入总督蔡毓荣幕，以才名。后归江宁讲学于雪浪庵。著有《毛诗春秋通论》、《广百将论》等。

该书系武科应试辅导性读物。卷一至卷七，对《孙子》、《吴子》、《司马法》、《唐李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七书逐书进行疏解。每卷一书，分段注疏：先列原文，再低一格分列"直解"、"汇解"、"开宗"、"全旨"、"纂序"等目，或集众说，或述己意，解释词义，提示段落大意，"既统括其大纲，更纂序其神吻"（《序》)。引用书目85种，既有《易经》、《诗经》、《周礼》、《史记》、《汉书》等儒家经典和史书，也有《虎钤经》、《武经总要》、《登坛必究》、《武备志》等历代兵书，还有明清以来为适应武科考试之需而以"合参"、"醒宗"、"句解"、"正义"、"指南"、"题矩"为名刊行的各种《武经七书》注本；注家83人，从三国唐宋时期的曹操、杜佑、李筌、杜牧、贾林、梅尧臣，到明清时期的刘寅、王世贞、李贽、尤大臣、彭继耀、邓廷罗等。首卷、末卷为参考性资料，首卷依次为《引用书目》、《注释前贤》、《经籍考》、《数目全题》、《列国世代考》、《封建考》、《四裔考》、《阅史释义》。末卷为《历代兵制考》、《标策题义》、《射法秘传攻瑕》、《射学问答》、《射经》、《射义》。其中《数目全题》开列《武经七书》中含有数字的语句117个；《标题策义》开列与《武经七书》相关的武科策题40道，每题均给出题源和答案（解）。

该书广集众说，资料丰富，为学习、研究《武经七书》提供了方便，尤其是它保存了大量今天不易见到的甚至原书已经佚失的材料，其史料价值就更显得可贵了。由于它适应了清代武科考试的需要，故问世之后，多次刊印，影响较广。但该书没有凡例，引用之书书名用简称，给后人阅读带来一定困难；注文选录

欠精当，缺乏条理，给人以重复繁杂之感。

（三）《孙子十家注》

《孙子十家注》，十三卷，附清毕以珣《孙子叙录》一卷、宋郑友贤《孙子遗说》一卷，孙星衍、吴人骥校。有清嘉庆二年（1797年）兖州观察使署刊本，乾隆嘉庆间兰陵孙氏《岱南阁丛书》本，咸丰五年（1855年）淡香斋木活字本，光绪三年（1877年）浙江书局辑《二十二子》本，光绪十年杨霖萱重刊本，光绪十九年上海鸿文书局石印《二十五子汇函》本，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辑《子书二十二种》本、文瑞楼铅印本、留耕书屋刊本；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聚珍本、袖珍古书读本、《四部备要》本（排印本、聚珍仿宋本），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排印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育文书局石印本等，达数十种。在国外有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官刊本。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一字伯渊，江苏阳湖（今武进）人。著名经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官至山东督粮道，后引疾归里。曾主讲浙江“诂经精舍”。喜藏书，精校勘，辑刊有《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所据均善本。勤于著述，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孙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等。

孙星衍认为，《孙子》“传本或多错谬，当用古本是正其文”（《序》），遂以华阴岳庙藏明《道藏·孙子集注》为底本，参考大兴朱氏明刻《孙子注解》本，用《通典》、《太平御览》等宋以前的古书引文进行校勘更正。孙氏的工作，一是对注家的辨别。指出十注家为：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原本于十注家之外多出杜佑一家，而杜佑实未注《孙子》，其文乃《通典》之文，故据《宋史·艺文志》题为《孙子十家注》。二是订正原本注文编排顺序上的错乱。指出原本的错误或将梁人孟氏排在唐人陈皞之后，或将杜佑置于其孙杜牧之后，订正为孟氏排第二位，其后即为杜佑。三

是校正《孙子》十三篇正文及其各家注文。以双行夹注的形式出校记，或说明校改、增补的依据，或不改动原文，但指明某书作某某，以备查考。

《孙子十家注》以明《道藏》本为底本，比较接近于宋本；孙星衍校改后的文字，有的于文义优长，如原本《形篇》"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句，孙校本据《通典》、《太平御览》改"之"为"必"，一字之改，意思更为确切；有的则改正增补了原本不少误脱，使《孙子》本文更接近于古本原貌，在校勘学上有很高的成就，这在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出土之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孙校本刊行之后，流传甚广，成为《十一家注孙子》系统最主要的传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孙星衍在校改此书时，参照的材料不多，既未见到宋本，也没有用《武经七书》系统，过于相信《通典》、《太平御览》等古书引文，未能辨明其臆改臆增之处，因而出现了一些疏漏。另外，该书有的版本刻工不精，校对不细，文字错漏较多，特别是初刻的兖州观察使署本以及出于依据此本的《二十二子》、《诸子集成》、《四部备要》诸本，有大段漏刻注文现象。

第三节　辨伪

兵书作伪自古有之，或伪托于神人，或伪托于圣贤，或伪托于名将贤相。这些伪托兵书，有的很容易看清其伪，有的却弄得真假难辨，至今还争论不已，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困难。

清代，伪托之风也很盛，如《百战奇法》本是宋代兵书，最早见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刻本《武经总要》，是作为该书的附刻刊行的。茅元仪在其《武备志》中，已明确指出宋代已有此书，但是到了清雍正年间，有人却将其更名为《百战奇略》，托名明初军事谋略家刘基所作。

也有伪托清朝人的。康熙、雍正年间著名将领年羹尧因其独特的经历，成为作伪者伪托的对象。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四十八年，授内阁学士，旋迁四川巡抚。五十七年，因其办事明敏，被授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主要为进藏平叛的清军筹运粮饷。六十年，授四川陕西总督。雍正帝即位后，因年羹尧是藩邸旧人，对其殊为宠信。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授年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率兵迅速平定了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以功晋一等公。二年五月，年奏陈青海善后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雍正帝一一采纳。但年羹尧恃功骄纵，揽权枉法，不守臣道，引起雍正帝的猜忌。三年四月，雍正帝先是将年调改杭州将军，七月革职降为闲散章京，九月又拿解进京治罪。十二月，议政大臣定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本该立正典刑，雍正帝从宽令其自裁，家产抄没入官。

清代伪托年羹尧编撰的兵书有三部：《治平胜算全书》、《经邦轨辙》和《年大将军兵法》。

《治平胜算全书》，二十卷（另有十二卷、十四卷、十六卷、十九卷、二十八卷等不同的抄本），约15万字，附图450余幅，是一部军事类书，内容涉及战场选择、军队管理、阵法营法、守城攻城、火攻水战、火器火药制造使用等。旧题年羹尧辑，《清史稿艺文志》亦著录为年羹尧撰，然实系伪托。此书在所谓年羹尧写于“雍正二年春三月”的“自序”中，有“今谪官武林”之语。武林，为杭州的别称，以武林山得名。雍正二年三月，年羹尧不可能在杭州，因为如前所述，年羹尧失宠，调任杭州将军，时在雍正三年四月。尽管“二”字有可能是“三”字之误，然而无论如何“春三月”年羹尧都不可能在杭州。此其一。年羹尧虽为一代名将，却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记载他曾编撰过《治平胜算全书》。如果他真撰写过此书，后来定会成为他的罪状之一。退一步说，定罪时不知有此书，抄家时也会发现，特别是序中“今谪官武林，闭门谢客，旅舍无聊，检点旧箧，复观此书，因叹数十年之精力，至今日乃湮没于残简破簏之中”一类的牢骚，更是

欲将其置之死地的雍正君臣不会放过的材料。但不论是定九十二款大罪之时还是年羹尧死后，都没有提及，这除了说明年根本没有写过此书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此其二。书中一些材料，在《金汤借箸》、《金汤十二筹》和《洴澼百金方》等书中有相关的内容，但从文字上看，与前二书差别稍大，而与《洴澼百金方》更为接近，有的一字不差。《洴澼百金方》刊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时年羹尧被杀已经 60 余年，不可能见到此书，此其三。综上所述，《治平胜算全书》决非年羹尧所辑。

应该指出，《治平胜算全书》是一部辑录性兵书，全部文、图都辑自他书，主要是《武经总要》、《登坛必究》、《武备志》、《纪效新书》、《神器谱》、《洴澼百金方》等，没有辑录者本人的论述文字。那种认为《治平胜算全书》是年羹尧“读书心得和作战经验的总结”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

《经邦轨辙》是《清隐山房丛书》中的一种。《清隐山房丛书》为沈汝翰所辑，清光绪九年（1883 年）刊行，全书包括《天文秘录》、《乾坤变异录》、《太乙秘书》、《奇门遁甲元机》、《六壬大占》、《经武要略》和《经邦轨辙》七部子书。《经邦轨辙》不分卷，约 1.3 万字，题“国朝年羹尧著”。书前有《序》一篇，以“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始，以“今采历代攻城之器可施设者，图形于左，以备采用焉”终，约 590 字，末题“年羹尧序”。该《序》全文抄自《武经总要》卷十，一字不差。正常情况下，任何作者都决不会仅仅从古书中抄录一段文字，当作自己著作的序文。连“作者”年羹尧的序都是假的，其书的真实性就更值得怀疑了。事实正是如此，该书正文没有作者个人的东西，全部抄自明代王鸣鹤纂辑、刊行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的大型军事类书《登坛必究》，以原书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和卷二十五为基础，拼凑而成：卷二十七《攻城》抽掉“辑攻城说”、“火盗”、“行烟”、“烟球”数条，插入卷二十九《器图》中的两条；卷二十九《火器》抽掉“辑火器说”、“神铳议”等八条，中间插入卷二十八《守城》“单

梢”、“双梢 ”两条；卷二十五，《水战》部分抽掉“辑水战法”、“蜈蚣船”等十条和“水兵束伍法”的部分文字，《江防》部分只选取其中的“江防图”。

《年大将军兵法》，不分卷，旧题年羹尧撰，《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为“《年将军兵法》二卷，年羹尧撰”，有《八旗丛书》抄本、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上海射樽楼刻本。该书书前有署名“曾国藩”的《序》，其他与《经邦轨辙》相同，连原书装订错乱的书页顺序也没有改变，只是“作者”《序》文最后“年羹尧序”变成了“年羹尧自序”，但这也改变不了作伪的事实。

第二十章　乾嘉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

第一节　清王朝的衰败

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在此期间，清王朝对外抗击了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对内在平定三藩叛和统一台湾之后，又平定了准噶尔上层分裂割剧势力的叛乱，统一了喀尔喀蒙古、新疆和西藏，在东到大海、南到南沙群岛、西跨葱岭、北达外兴安岭这样广袤的疆域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内地经济的发展，封建经济呈现空前的繁荣，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达到了最高峰。

但是，清王朝康、雍、乾时期的发展和进步，是在封建主义轨道上的发展和进步，它并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反而时有发展。乾隆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统治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满汉大地主阶级及其官僚统治机构日益腐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接连不断，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严重威胁。

（一）土地兼并不断加剧

康熙中叶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土地的收益增加，满族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商人等，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掠占土地。康

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曾说："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① 乾隆朝，土地兼并更趋激烈。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有感于土地兼并之剧，上疏乾隆皇帝，指出："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② 在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③ 的严重局面。乾嘉之际，土地的集中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拥有数千、上万亩土地的地主比比皆是，拥有十余万、数十万亩的也不鲜见。

土地兼并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地价的不断上涨。乾隆前期，杨锡绂在陈述米贵缘由的上疏中论及了地价问题，他说："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二十余两。"④乾嘉时人钱泳说得更明确：苏南地区，良田一亩，顺治初不过值银二三两，康熙年间增至四五两，乾隆三十年前后，已增至七八两甚至十余两⑤。面对高昂的地价，贫困的农民卖地之后，绝无能力再买回来。

（二）封建剥削异常沉重

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大部分沦为佃户、佣工；地主则将土地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取高额地租。在土地兼并和买卖盛行之时，一些官僚、商人和富裕农民，把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土地转租给贫苦农民，充当二地主的角色，形成"一田两主"（地主与二地主）、"一田两租"（大租与小租）的现象，租地的农民要承受双重的剥削。乾隆、嘉庆年间，农民一般要将全年收获物的五

---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五，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辛酉，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④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经世文编》卷三九，《户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58页。

③ 崔述：《无闻集》卷一，《救荒策一》。

⑤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田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页。

成交租，有的地区更高达七八成，如河南汲县，夏租收麦“二八分”，秋租收粮“三七分”，且“柴草俱归主人”①。地主在收租时往往用大斗收进，并随意增加地租，如佃户不允，就要“夺田另佃”。“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豚布帛无不搜索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大概皆然”②。农民在生活上毫无保障，丰年尚不得温饱，倘遇天灾人祸，就不得不忍受“驴打滚”的高利贷盘剥。有些地区的地主、高利贷者，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出一年，利息竟远远超过了本钱。农民至期无力偿还，贪得无厌的地主、高利贷者就会登门催租逼债，“每于岁暮封印之后，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至家，百般吊打”③。这样，就更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逃亡。

清朝实行摊丁入亩之后，虽然结束了田赋与差役、丁银、土贡物料分征的局面，实现了一切出于田赋的目的，但广大农民对地主的劳役负担，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有日趋繁重之势。他们要替地主收割豆麦、砍柴送炭、挑运粮米、看管园林山场，甚至还要为地主的婚丧嫁娶、祭祖扫墓提供人力。在一些地区，地方官依然把差徭摊派给农民。据史载，当时有10亩土地的农民，一年所交的差钱就比正赋多出10倍。如此沉重的差钱，只能逼迫贫苦农民卖田宅及其妻、子，从而加深了阶级矛盾。

由于社会承平日久，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人口急剧增长。据记载，康熙平定三藩以后，人口只有7000余万；乾隆初年，人口已增到1.4亿；乾隆五十五年，更高达3亿。人口急剧增长，加之土地兼并激烈，耕地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致使米价上涨的幅度越来越大。康熙四十六年，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

---

① 乾隆《汲县志》卷六，《风土》。

② 雅尔图：《心政录》卷二。

③ 戴兆佳：《天台治略》卷六。

府，米价每升仅 7 文，雍正、乾隆初年，每升也不过 10 余文，乾隆五十年大旱，每升涨至 57 文左右。“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① 米价的急剧上涨，给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提供了机会，反过来更加促使贫苦人民食不饱腹，一遇荒年，不少人只好以野菜、树皮、观音土等充饥。

总之，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乾隆中叶以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激烈，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三）统治阶级日益腐败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整个统治集团奢侈腐化、巧取豪夺成风，日趋腐败。特别是乾隆中后期，更是习俗日侈，风气日坏。

作为清朝鼎盛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穷奢极欲，游山水成性，嗜园林成癖，又纵恣声色，铺张无度。从乾隆十六年（1751 年）到四十九年，他先后六次南下江浙巡幸。乾隆帝南巡，虽然有巡察河工海塘、考察吏治、观风问俗等方面的考虑，但更主要的是游山玩水，寻欢作乐。每次南巡，随行人员除皇太后、皇后、妃嫔外，还有王公大臣、扈从官兵，约计 2500 余人，可谓一支浩浩大军。旅途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数百辆；水路用船千余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蔚为壮观。六次南巡，总计耗资达 2000 多万两白银，相当于乾隆三十一年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而地方官吏又借征调夫役之机，科派勒索，大肆扰民，更加重了百姓的灾难。乾隆帝临死前终于认识到南巡是“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② 之举，但这种忏悔已难以挽回其历史过失了。乾隆帝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圆明园在雍正时已有 28 景，乾隆初扩建为 40 景。修建清漪园，历时 15 年，

①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米价》，第 27 页。

② 《清史稿》卷三五七，《吴熊光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耗银近450万两。承德避暑山庄，康熙时只有36景，乾隆时扩充为72景，仅须弥福寿庙和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就耗费黄金3万两之多。乾隆帝不但自己享乐，皇太后等人的寿辰庆典，儿女的婚嫁迎娶，也都奢华至极。乾隆帝"以天下养"① 皇太后，太后六十、七十、八十寿辰时，乾隆帝为其举行的庆典活动一次比一次隆重，不仅向她进献大量的金银珠宝，而且在西华门至西直门外高梁桥的十余里大路上张灯结彩，搭起一座座楼阁，楼内以色绢堆成山岳，用锡箔铺成波涛，每隔一段距离还要设一个戏台，内备四方之乐，不时敲打弹奏，奢华至极。乾隆五十四年，乾隆帝之女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珅之子，朝鲜使臣记述说："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翌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概论其直，殆过数百万金。二十七日，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屡千百。"② 国家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就这样大量地被皇室挥霍掉了。

乾隆帝和皇室的恣意挥霍，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向奢转化，王公大臣、文武官僚、地主商人、八旗子弟，无不奢侈淫靡，挥金如土。生活上的腐化，是政治腐败的体现。乾隆中叶以后，吏治更加败坏，各级官吏追逐名利、贪污受贿成风。最为乾隆帝宠爱的大臣和珅，就是明显的例证。和珅，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任军机大臣24年，位极人臣，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二皇帝"。但是和珅最大的本事就是榨取钱财和收受贿赂，他依靠皇帝的倚重搜刮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有的史书称多达数亿两。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地方官更是明目张胆地敲榨勒索，贿赂公行。乾隆帝虽然也曾查处过国泰、王亶望、陈辉祖、伍拉纳、浦霖等几起大贪黩案，但却无力煞住大小官吏的贪污之

① 《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孝圣宪皇后》。

②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正宗十四年三月丁未，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09页。

风，因为正如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曾指出的那样：乾隆索之于和珅，和珅索之于督抚，督抚索之于州县，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索贿网①。嘉庆四年（1799 年），嘉庆帝处决了和珅，摆出一副整顿吏治的姿态，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企图匡正时弊，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大局。贪污聚敛、营私舞弊之风更加弥漫：文官贪赃，武官克饷，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暴；连一向号称“清苦”的朝廷六部官员，也在挖空心思贪污，吏部公开收受贿赂，户部吃“平余”（即除赋税和正项钱粮外，另立名目加征的部分），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利用兴建工程大肆渔利，礼部官员无污可贪，就在科举考试时容情受贿。

清代，官吏的俸银不高，办公费用短缺，因此在征收地丁钱粮和捐税时，都在定额之外提取一部分以供开支，称为“陋规”，实质上是一种合法名义下的公开贪污。当时，那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政府部门，如漕运、盐政和河工等衙门，都成为官吏中饱私囊的重要基地。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九月，即位不久的道光帝发布谕旨，令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兼公详议”，并强调此后“如再有以赔累为词，于此外多取于民者，一经发觉，即行从重治罪，不稍宽贷”②。他本想以此表示自己锐意整顿吏治，进行改革，不料谕旨一下，即刻引起轩然大波。朝廷内外官吏纷纷上疏反对，“皆以此事为不可行”。道光帝不得不向反对派让步，再下谕旨称：“朕心已悟此举之非矣”，表示要“迁善改过”③。于是，停止清查陋规，并罢免了最初提此建议的军机大臣英和。一场改革就这样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这充分反映了吏治的腐败在当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任何人对此均已无回天之力了。

---

①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83 年新 1 版，第 214 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四，嘉庆二十五年九月甲子，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 《清宣宗实录》卷十，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

二、武备逐步废弛

骁勇善战的八旗兵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清统治者马上夺天下，为使政权永固，特别看重这支八旗劲旅，所以定都北京之后，赋予八旗贵族和官兵种种特权，“平时赏赐优饫，制产一壮丁予田三十亩，以其所入为马刍菽之费；一兵有三壮丁，将不下十壮丁，大将则壮丁数十，连田数顷”①。统治者的本意是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使其专于武事，精于骑射。但事实却与统治者的愿望相反，八旗官兵在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少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中，消磨掉了勇猛顽强的作风；政权机构中的腐败风气，更加速了八旗兵的腐败。

八旗兵的腐败，首先表现在贪图享乐，生活腐化。高级将领养尊处优，在吃喝玩乐等方面则竞相攀比，谁也不肯落于人后，“八旗将佐居家皆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宾客子弟饮”②。八旗兵丁也深受这种腐化风气的影响。满族本有“淳朴旧风，衣服率多布素。近则狃于习俗，兵丁等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及他人为耻”。又往往“耽于口腹，饷银一经入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资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随即贱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钱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③。甚至有的当月钱粮不足花销，又将次月钱粮典当出去。其次是军纪败坏，骚扰百姓。平时，八旗官兵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有的暗中制造赌具，“出境贩卖”；有的聚众赌博，诈骗钱财；有的“串结土豪，放债盘利”；有的欺压民众，“强买市肆”；有的根本不把地

①② 金德纯：《旗军志》，《昭代丛书》乙集卷十，第2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③ 《清仁宗实录》卷一〇〇，嘉庆七年七月癸未，中华书局影印本。

方官放在眼里，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哄市辱官”①。战时，各级将领不思杀敌立功，保护百姓，反而“于攻城克敌之时，……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名通贼，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②。第三，疏于训练，武艺生疏。八旗将领贪图安逸，玩忽职守，在规定的训练日不亲赴训练场，或轮流派一人前往，训练时也不过令兵丁放一二枝箭应付了事，军事训练流于形式③。八旗兵丁更不把骑射放在心上，平日不勤习武艺，而是“沉于戏玩”，有“入班唱戏者，亦有不入戏班，自行演唱者”④。因此，八旗官兵的军事技艺普遍低劣。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谕中指出：“前因武职官员射箭，往往有及半即坠，或低掠地面者，朕曾降旨训饬。乃今日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带领引见人员内，犹有仍前不堪之人，甚则明知弓力软弱，故将前手挑高。”⑤ 第四，战斗力下降。早在顺治年间，八骑兵的腐败和战斗力的削弱即已显露出苗头。顺治十四年（1657 年），顺治帝说：“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躁敝，不及曩时。”⑥至康熙朝，八旗兵的腐败更为明显，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已暴露无遗。派往前线任大将军的八旗亲王、郡王、贝勒等，“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⑦，完全失去了当年驰骋疆场、奋勇争先的锐气。康熙十六年（1677 年），清安亲王岳乐在湖南浏阳城外与吴三桂叛军交战，“安亲王发兵十九路，自城北铁佛寺后布阵，至城之西南，度数十里。三桂亦发兵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一二，《八旗处分例·禁赌》；卷六一三，《八旗处分例·杂犯》。

② 《清圣祖实录》卷八二，康熙十八年七月壬戌。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乾隆六年五月丁亥，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乾隆三年九月乙丑。

⑤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二，《兵·教阅》。

⑥ 《清史稿》卷三，《世祖本纪》二。

⑦ 《清圣祖实录》卷七一，康熙十七年正月戊戌。

十九路以应之，将军王绪先陷阵，清军合围之数重，旗帜尽偃，金鼓无声”。陷入重围的叛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已是必败无疑，连在城头观战的叛军都大惊失色，“以为此军全没矣”。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少顷，闻交枪连发如急鼓，清兵纷纷堕骑。王绪军冲突无前，莫有撄其锋者，深入敌境，获全胜而返”①。此战，充分暴露了八旗兵素质的低下和战斗力的削弱。

康熙帝心中非常清楚，要想迅速平定三藩叛乱，唯有重用忠于清廷的汉将，依靠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清廷正是依靠绿营兵将的力量，才最终平定了三藩叛乱。

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康熙帝曾采取过不少措施对八旗兵进行整顿，但是收效甚微，八旗兵的腐败有增无减。所以，在此后对内对外的重大战争中，绿营兵遂成为清廷主要依赖的武装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营兵也日趋衰败。绿营兵平时担负着差、操两项任务，大量的差役等杂务，严重地妨碍了绿营兵的训练，且承平日久，训练荒废，“教训演习惟事粉饰”②，形同虚文。特别是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绿营中钻营取巧、油滑偷惰、克扣冒饷等风气迅速滋长，加之编制不够完善，将帅不知营制，将士各不相习，家属随营居住，致使营务废弛，军纪败坏，战斗力锐减。

清代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都已腐败，将领不理营务，只知克扣军饷、贪污受贿，过着酒肉笙歌的享乐生活；兵丁不事操练，却吸食鸦片成瘾，烟枪须臾不离手，不仅白白耗费了大量钱财，而且严重地损伤了身体，致使许多兵丁骨瘦如柴，根本无法行军打仗，成为货真价实的老爷兵。结果，八旗和绿营战斗力十分低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颙琰随乾隆帝南巡至杭州，见到清军官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

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7页。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二，《兵·教阅》。

一时成为“笑谈”①。嘉庆十四年（1809 年），清廷对其精锐之师健锐营、火器营进行考核，结果 2.7 万名士兵之中，列为头等的仅有 60 名。

八旗和绿营的腐败衰弱，迫使清廷在嘉庆初镇压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时转而招募乡勇，企图依靠乡勇的力量维持其统治。“是时，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兵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② 但事与愿违，乡勇中多地痞流氓，素质本来极差，一遇战阵，保命要紧，不待厮杀，便纷纷溃逃，而八旗、绿营更无斗志。当时川楚一带流行着这样的谚语：“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这是对清军辛辣的讽刺。

另外，清军武器落后，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一直没有完成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过渡；沿海要塞的守备设施陈旧，火炮锈蚀以至无法使用，几乎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

总之，清朝中叶以后，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促使各族人民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以至举行武装起义。早在康熙六十年（1721 年），在台湾就爆发了朱一贵领导的农民起义，已经暴露出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处于清朝全盛时期的农民起义，只是零星的、个别的，起义规模也不大，起义不久就被镇压下去了。乾隆中期以后，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而且起义规模大，坚持时间久，有的起义波及数省，历时 10 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清王朝武备废弛，八旗、绿营衰败，对内镇压各族人民起义时屡屡失败，对外更逐渐丧失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能力。

---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嘉庆四年正月戊子。

② 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00 页。

第二节　山东王伦起义

一、起义的爆发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秋，在山东西北部爆发的王伦起义，是由清水教组织和发动的。清水教是八卦教的一个支派，“声言饮水一瓯，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为清水”①。乾隆中期，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在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省）、河南等地秘密流传的白莲教得以迅速地传播开来。王伦，山东寿张（今阳谷东南）党家店人，精拳棒，会气功，善医术。初充县役，后被斥革。乾隆十六年从张既成入清水教，即以行医和教授拳棒为掩护，往来于寿张、堂邑（今聊城西北）、阳谷等地，广收徒众，发展组织。王伦济危扶困，为人治病不受酬报，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各处乡落愚民多有为其煽惑者”②，甚至“县役营兵，纷纷归教”③。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在王伦周围形成了一批骨干力量，如贫苦农民王经隆、孟灿、和尚焚伟、“盐枭”国太、女艺人乌三娘、皂役李旺等。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一带年景歉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④，激起农民的不满。王伦认为时机成熟，决定乘机举行武装起义。不料清水教的活动为官府觉察，寿张知县沈齐义差人搜捕教徒。王伦决定先发制人，派孟灿到堂邑县张四孤庄通知王

---

① 俞蛟：《临清寇略》，《昭代丛书》辛集别编卷十，第 1876 页。

②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四，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己亥，舒赫德·阿思哈·杨景素奏。

③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清嘉庆刊本。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舒赫德等奏，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59 页。

经隆："二十八日有风雨，是时正好动手"①。八月二十八日，王伦在党家店率数百人起义，当天夜里，在已经入教的县衙胥役接应下，占领了寿张县城，杀知县沈齐义。王经隆也在堂邑县张四孤庄聚众五六百人起义响应，然后率众至寿张与王伦会合。

王伦等在寿张一面置办旗帜、盔甲、弓箭枪炮等军用物资，一面编组队伍，设立元帅、将军、军师、参谋、宣行、总兵、校尉等官职。九月初二日晚，起义军弃寿张，占阳谷，寻北进堂邑。他们击败来剿的清军，杀游击赵福，败兖州镇总兵惟一于张秋镇。堂邑"胥役皆党羽，故陷之倍易"②。九月初四日傍晚，起义军攻破堂邑县城。

起义军连破寿张、阳谷、堂邑三城，皆弃而不守。每到一地，即打开监狱，释放关押的犯人，向群众声明，"止杀官劫库，不杀百姓"③，并把"当铺衣物米粮等项随处分给"④ 起义军战士和贫苦百姓。起义军纪律严明，"不杀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价"。有一起义军成员"食人梨而少与值，立斩之而倍以偿"⑤。起义军的言行深受群众拥护，民众纷纷参军参战，数日之间，起义军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

王伦欲由临清北攻直隶，遂于攻陷堂邑的当日弃城北上，进至距临清仅40里的柳林。为围剿起义军，山东巡抚徐绩、河道总督姚立德、总兵惟一率清军三路堵截，但起义军于九月初六日一举打破敌之围堵，进逼临清城下。

---

①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十四，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己亥，舒赫德·阿思哈·杨景素奏。

② 俞蛟：《临清寇略》，《昭代丛书》辛集别编卷十，第1877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徐绩奏折。

④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卷七，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子，舒赫德·拉旺多尔济等奏。

⑤ 俞蛟：《临清寇略》，《昭代丛书》辛集别编卷十，第1877页。

二、临清之战

对王伦起义，乾隆帝一开始认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自不难扑灭。但事态的发展却使他震惊。他本来已命大学士舒赫德往江南筹办黄河老坝口堤工，第二天就急令其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山东督师；又命额驸拉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率京城八旗健锐营、火器营兵1000人，并调集沧州、德州等地驻防八旗兵和天津绿营兵，前往镇压；命直隶、河南两省派兵堵截。

临清城位于大运河东岸，“绾毂南北水陆咽喉”①，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州城分新旧二城，旧城又称外城，为土城，位于西南，是居民区；新城又称内城，为砖城，是行政中心。署知州秦震钧和副将叶信认为，“土城颓坏不可守，内城完固，宜并力保守”②，故在起义军到来之前，即撤除运河东岸河防，放弃旧城撤入新城，闭城固守。起义军到达运河西岸时，因清军没有设防，得以从容结筏渡河，一举占领临清旧城。九月初七日夜，即开始进攻临清新城。

新城内清军仅数百人，但城池坚固。起义军有2000余人，然而武器装备十分简陋，“所执器械，半皆镰刀、菜刀等物，尚无火器、马匹”③。起义军攻城时，或放火焚烧城门，或挖掘地道，或架云梯强攻。城上清军射下密集的枪弹和箭头，起义军勇敢顽强，没有护身的甲胄，“人顶秫秸一束”④，冒死前进。起义军英勇作战的情形，在清政府高级官员的奏报中亦有所反映。大学士舒赫德说：他们“临阵并不畏惧枪炮，连次交锋，俱执短

① 魏源：《圣武记》卷八，《乾隆临清靖贼记》，第373页。

②④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清嘉庆刊本。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山东布政使国泰奏折。

刀，纵跃直冲"①。山东巡抚徐绩说："亲见其领头入阵之人，两手持刀，故矬其腿，疾走如飞，宛如猕猴。其余愍不畏死，不避枪炮。"② 尽管如此，起义军终因武器太差，难以破城。

九月十二日，兖州镇总兵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图肯率清军千余人来援，驻屯州城东北。起义军预设埋伏，而以小股赴北门外挑战诱敌，待敌进入伏击地域时，伏兵突起，将敌冲为两截。清军争相逃命，"无一人迎敌者"③，惟一逃往东昌（今聊城），格图肯逃往夏津。此后，清军更加怯战，"每战距贼半里许即放枪，不中，再入药。贼故习俯趋，争死斗哄而前。再放，再从贼背上过，又不中。马、步兵皆惊曰：'贼果有神术，不畏枪！'则相率溃走，走且数十里不止"④。山东巡抚徐绩率清军进剿时，"适遇大风，官兵望见贼影，即将枪炮放尽，及至贼人蜂至，无法抵御"⑤。

九月十二日战后，王伦将大营从运河西岸迁至临清旧城，指挥起义军继续进攻新城，但仍久攻不下，时清回空漕船被阻于临清北水关，起义军便聚集漕船搭桥，欲渡河西进。二十一日，起义军从船桥渡河后，受到驻守西岸的直隶清军的阻击，只得退回旧城。

当起义军在临清旧城与清军相持时，大量清军援军正向临清扑来：舒赫德率健锐营、火器营兵从德州经恩县、夏津前进；徐绩率山东清军从东昌前进；直隶总督周元理率直隶清军从景州（今河北景县）经故城、油坊前进。九月二十三日，三路清军四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日，舒赫德抚奏折。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徐绩奏折。

③ 秦震钧：《守临清日记》。

④ 潘相：《邪教戒》上。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舒赫德等奏折。

五千人到达临清，周元理部直隶清军在运河西岸堵截，舒赫德、徐绩所部清军分两路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出1500人分两路在东门、北门外迎战。因众寡不敌，武器简陋，作战失利，被迫退回旧城。清军将起义军严密包围，并派兵进入旧城搜捕。旧城民房鳞次栉比，小巷纵横相错，处处可通。起义军依托房屋，与清军展开巷战。舒赫德下令放火焚烧民房，起义军奋勇抵抗。据舒赫德等人奏称，“贼人上屋放枪，并飞掷瓦片，又手执红旗招呼匪党，并不言语。我兵随用枪仰击，四面围绕，自辰至亥，房俱焚毁倒塌，并无一人窜出”，“且有妇女执刀迎敌”①。战斗持续了数日，大量起义军壮烈牺牲。为了搜捕起义军领袖王伦，清军数千人分路“挨屋逐户严查，下极地窨、水沟，无不遍加寻觅”②。清军曾一度将王伦捉住，“正在捆缚间，两厢突出十数贼，一拥至前，音济图猝不及备，身受刀伤，贼竟将王伦夺去”③。二十九日，清军探得王伦在原河南巡抚汪灏宅院的一座小楼内，即将小楼团团围住，“喝令下楼”，王伦“总置不理，自上抛掷砖瓦”④。后来形势危急，王经隆劝王伦投降，王伦坚决表示：“我宁可烧死楼上，断不肯投降！”随即举火自焚，“火势炎烈时，王伦衣服胡须已经焦灼”，“仍坐东北角上”⑤，壮烈殉难。

三、起义的意义和作战指导得失

王伦起义的规模不算大，时间也不长，仅仅持续了一个月就被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舒赫德等奏折。

②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舒赫德等奏折。

③ 《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七，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卯。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舒赫德等奏折。

和巨大的影响。清王朝历经康、雍、乾三世100多年和平安定的环境，到乾隆中期，达到了“康乾盛世”的顶点，而王伦起义则把升平景象下掩盖的社会矛盾彻底暴露出来，宣告了盛世的结束。王伦起义之前，人民的反抗斗争主要采取抗租抗粮、秘密结社的形式，虽然也有农民的起义，但往往在起义的酝酿阶段或刚刚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影响不大。王伦敢于在清王朝统治力量较强的山东率众起义，以武装斗争的形式与清军对抗，表现出农民群众大无畏的气概。这次起义不但给了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极大的鼓舞。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预示着各族人民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将到来。

王伦起义所以会很快失败，固然是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但从作战指导上说，起义军的失误也加速了自己的失败。第一，战略方向选择不当。清初王馀佑指出，初起之兵要高度重视战略方向的选择，而战略方向的选择要“以敌之强弱为准：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①。王伦起义之后，力量还十分弱小，就想北攻清王朝的腹心重地直隶，显然是错误的。第二，强攻坚城。王伦起义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都比较差，尚不具备阵地攻坚的能力。起义军初起时虽曾攻陷寿张、阳谷、堂邑三城，都是趁敌人不备，利用内应，里应外合：“贼党随地潜伏，约定入城之人，放火为号，城外贼匪聚集，即便攻城”②。临清新城比上述三城都要坚固难攻，又没有内应配合，而王伦等起义军领导人却屯兵于坚城之下，百般攻城，作战指导上明显犯了错误。第三，没有及时撤围。起义之初，起义军的行动还是很灵活的，“窜伏无定，东追西逸”③，曾使统治阶级穷于应付。但是到了临清以后，王伦却放弃了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法，驻止一地，强攻坚城；攻城不克，又没有在敌人援兵到达之

① 王馀佑：《乾坤大略》卷二，《自序》，《畿辅丛书》本。

②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山东巡抚徐绩奏折。

前迅速转移，而是与敌相持，终于被优势敌人聚歼于临清旧城。

第三节　甘肃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和田五等领导的回民起义

一、门宦制度和教派斗争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爆发的甘肃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和乾隆四十九年爆发的田五等领导的回民起义，都是从伊斯兰教新旧教派斗争开始的。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公元 7 世纪中叶。按照伊斯兰教教规，穆斯林的个人资财达到了一定数量时，每年应按一定的比例交给清真寺，这种所谓“奉主命而定”的宗教赋税，称为“天课”，又称“济贫税”。事实上，这些“天课”绝大部分成了清真寺教长、阿訇的财富。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穆斯林个人财富的增加，教长和阿訇们占有的“天课”越来越多，他们不仅依靠“天课”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且可以利用“天课”购置土地，租佃给无地或缺地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进行剥削。于是，教民交纳的“天课”转化成教长的土地和地租收入，教长转化为封建地主；教长与教民之间的关系，则由原来单纯的宗教等级差别，逐渐转化为在宗教等级差别外衣掩盖下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

与此同时，原来由教民推选的教长，变为世袭的宗教领袖，“门宦”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门宦制度是我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特有的宗教制度，约产生于清初。所谓“门宦”，相传由中国古籍中的“门阀”、“宦门”两词的第一个字合并而成，用以表明其权势和地位。门宦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主兼地主的世袭制度，是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封建土地占有和剥削制度。

乾隆时期，备受封建剥削的农民不断进行反抗，“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①。在我国西北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农民的反抗斗争，正是在宗教的外衣下，以教派斗争的形式进行的，而当时甘肃省（今甘肃、宁夏二省区及青海省东部）伊斯兰教的教派斗争，则主要是新教与老教的斗争。

老教为门宦虎非耶，创始人是河州（今甘肃临夏、和政、东乡三县之间）人马来迟。新教为门宦哲合林耶，创始人为安定（今甘肃定西）人马明心。马明心早年曾随叔父赴麦加朝觐，并长期留居国外学习，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回国，到甘肃循化（今属青海）传教。马明心是一个勇敢的宗教改革者，他有感于老教的种种弊端，有针对性地创立了新教。“新教之异，念经时则摇头，念毕则要拳舞手，其死而葬之也，以足踏坟，视其升天入地之别，大略不过如此”②。这些都是宗教仪式上的差异，如果仅止于此，当然算不上什么改革。重要的是，马明心把握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农民的要求，大胆地向门宦制度提出了挑战。“马明心自西域回，慨然欲革除门宦制度，意谓道者公也，岂为一家所私有？教规者随时变通也，不宜胶柱鼓瑟”③。针对老教门宦传子的世袭制，马明心提出了传贤的主张。针对老教“多收布施，敛钱惑众”的弊端，他新纂的《卯路提经》比老教的《冥沙经》更为简化，念一次经的费用比老教大为减少，而且在新教内部提倡富有者“散家财”，使“入其教者，皆有周济”④。新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愿望和要求，减轻了农民的宗教负担，因而受到当地撒拉族和回族人民的欢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乾隆帝说：“近闻旧

---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5页。

②④ 龚景瀚：《循化志》卷八，《回变》。

③ 慕少堂：《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十八。

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所费较多，而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是以穷民愿归新教者较众。”① 据记载，当地1000多户撒拉族中有800多户改奉新教②，从而出现了马明心之新教“反盛于马来迟之教（老教）”③ 的局面。

新教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老教门宦地主的恐惧和不安，他们对新教进行压制和打击。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新教创始人马明心被逐出循化，三十四年（1769年），马明心的学生贺麻路乎又被发配到乌鲁木齐为奴，马明心的另一学生苏四十三遂成为新教首领，继续领导群众与老教斗争。由于统治阶级对新老教采取挑拨、分化的政策，使教派斗争愈演愈烈，并多次发生械斗。

二、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在清水工打速古庄发生的教争中，新教一人被打伤，数日后死去。循化同知洪彬仅判罚老教半个命价。新教不服，苏四十三和另一新教首领韩二个令尸亲不具领，以示抗议，并于十二月十六日召集草滩坝八工新教开会，令“备器械，将尽杀老教，灭土司”④。四十六年正月十二日（1781年2月24日），苏四十三、韩二个率新教徒千余人攻入清水工河东庄，杀死哈尔户长（总头人）韩三十八等人。苏四十三戴“大红顶”，自称“回王”，韩二个以下皆蓝白顶，立旗号。苏四十三等率众向老教进攻，而“老教亦集众相拒”⑤。

陕甘总督勒尔谨闻讯，即派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带兵前往镇压。三月十八日，新柱到达循化境，对佯装成老教出迎的苏四十三等人说：“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作主，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四一，乾隆五十四年十月甲戌。

② 《兰州纪略》卷六，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丁丑，阿桂·和珅奏。

③④⑤ 龚景瀚：《循化志》卷八，《回变》。

尽洗之。"① 这话使新教群众认清了统治阶级镇压新教的反动政策，加速了新教从教派斗争向反清起义转化的进程。苏四十三等决定立即举行反清起义，当天夜里即率众千余包围新柱的公馆，杀死新柱，次日晨围攻起台堡，中午时攻破，杀知府杨士玑、守备徐登彦、外委陈伏得等，正式举起了武装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旗帜。

三月二十日，苏四十三、韩二个率起义军从起台堡东进，直指河州，"原想杀马来迟子孙，还要灭旧教的人"②。三月二十一日攻占河州，缴获了对起义军极其宝贵的七八十驮火药铅子。不幸的是，韩二个在攻城战斗中中炮牺牲。

统治阶级对撒拉族人民起义极为惊恐。乾隆帝闻讯，即派大学士阿桂为钦差大臣，派户部尚书和珅等率兵驰赴甘肃，同甘肃地方当局相机镇压。与此同时，他又多次谕令利用撒拉族新教、老教两派的矛盾，实行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应明切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杀之罪，作为前驱，令其杀贼自效。如此以贼攻贼，伊等本系宿仇，自必踊跃争先，既壮声势，又省兵力，而贼势益分，剿灭自易"③；"新旧教既自相仇杀，必非合伙。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④；"此案办理关键，现在总以帮扶旧教、灭除新教为词，明白晓谕，以安旧回众之心"⑤。甘肃总督勒尔谨一面用计捕获马明心，关押在省城兰州狱中，一面调兵镇压起义。循化厅同知洪彬等调当地撒拉族老教和番寨土兵防守循化城，勒尔谨飞调甘肃固原、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西宁（今属青海）、肃州（今酒泉）等镇清军2000名，并亲率500名督标兵前往镇压。但当他行抵狄道（今甘肃临洮）时，起义军已攻占河州。

---

① 龚景瀚：《循化志》卷八，《回变》。

② 马复才供词，《阿文成公年谱》卷二三。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壬寅。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癸卯。

⑤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一，乾隆四十六年五月癸巳。

苏四十三等得知马明心被关押在兰州的消息之后，为了救马明心，匆忙地作出了北攻兰州的决策。起义军由小路北上，三月二十四日到达洮河西岸时，渡船早已被清军破坏，在洪济桥、唐家川等处回族和东乡族群众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地渡过洮河，于二十六日进抵兰州，攻占西关，烧断了西关之南的黄河桥。二十七日中午，起义军以西关为基地，开始了攻城战斗。

此时陕甘总督勒尔谨尚滞留狄道，兰州城内仅有督标兵800名。由于从各地征调的清军尚未到达，布政使王廷赞一面飞章入告，请求援兵，一面组织力量防守。他下令将西、南两关厢烧毁，以防起义军利用房舍攻城。起义军先用云梯攻城，城上清军矢石雨下，且推倒女墙，压坏云梯。起义军又背负木板以避矢石，直趋城下，用木驴掘土闉。王廷赞见形势危急，乃施缓兵之计，将马明心押上城头，强令他劝说起义军交械后撤，听候总督处理。马明心坚不从命，并掷头巾于城下，表示了他视死如归，反清到底的决心。王廷赞计不得逞，气急败坏地杀害了马明心。起义军攻城益急，但为清军炮火所阻，只得暂停攻城。

随后，各路清军陆续到达兰州，达一万数千人。起义军强攻不克，遂退据兰州西南的龙尾山、华林山一带坚守。从此，起义军从主动进攻转入与敌相持。

龙尾、华林二山北临黄河，西南有洮河之隔，紧临西关，山高于城，起义军占据山梁，修筑工事，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两山之间有水磨沟，河水可饮，利于长期坚守。清军虽有万余但皆营于城东，各部互相观望，不敢出战。因而只有2000余人的起义军，可任意往来于华林山与西南关一带。起义军作战勇敢，“皆新教死党，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故不仅多次挫败敌人的进攻，且可主动袭扰敌人，使清军“屡衄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①。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第310～311页。

清军因多次遭起义军打击，伤亡过多，官兵怯战，作战时“兵不顾将，将不顾兵，一遇‘贼匪’，惶遽退回”①。四月中旬，和珅到达兰州，他企图挽回颓势，立即组织清军向华林山进攻。起义军奋勇还击，凭高下压，势如建瓴。四月十九日一战，又一次粉碎了清军的进犯，毙固原总兵图钦保、游击王三杰等990余人。

四月二十一日，钦差大臣阿桂到达兰州。阿桂曾参与平定准噶尔部、平定回部和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到兰州后，没有急于向起义军进攻，而是积极进行进攻前的准备：一是对从各地抽调的八旗兵、绿营兵和土兵等申明纪律，实施统一指挥。二是调整部署。设大营于城中，将原驻城中、城东的清军前移，逼近华林山起义军阵地。三是添调劲旅。从四川调曾参加过金川战争善于山地作战的五寨屯练和番兵1000名，从阿拉善旗抽调700名骑兵，“欲候川兵及阿拉善兵到齐，以川兵攀逾险阻，直捣贼巢，以阿拉善兵防其窜逸，乘骑追捕”②。四是安设卡栅，实施围困之计。自西关外沿黄河岸往南直至华林山山梁，安设栅栏营卡，又于山包上安一大营，以照料各卡，并阻断起义军下山之路。为防起义军突围，又于兰州外围驻兵设卡，加强防堵。五是进行政治攻势。鉴于起义军“立誓死守，难于解散”③，令信奉老教的土兵书写“回”字传单广为散发，并在起义军阵地附近插立书写“回”字的布旗，后又令老教土兵阵前喊话，企图动摇起义军的斗志，诱使起义军战士叛变投降。

闰五月初，阿桂所调各部清军均已到齐，总兵力达2万人。在此之前，清军对华林山仅有几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有时仅用火炮进行轰击。由于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阿桂即下令发动大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九，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壬申。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〇，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丙戌。

③ 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三三。

规模进攻。此时起义军被困于华林山一带，兵员无法补充，经过多次作战伤亡，仅剩千余人，为迎击清军的进攻，遂放弃龙尾山，以便集中兵力守华林山。他们于山前立大卡一座，以土坯碎石砌筑碉房，内安孔穴，卡边挖掘深沟一道，大卡前设小卡四座。闰五月初九日，清军倾巢出动，分四路向华林山猛扑。起义军潜伏沟内，放枪抵御，或从高处放枪抛石，清军的多次攻击均被击退。

阿桂从失败中认识到，起义军人数虽少，但“以逸待劳，居高临下，若力攻仍无把握”①，于是变强攻为计取。闰五月十五日，清军佯为撤兵，而以一部兵力潜至华林山东南山沟内埋伏，又以一部兵力在龙尾山南埋伏策应，阿桂等指挥满汉官兵在龙尾山梁向起义军阵地开炮轰击，随后向华林山发起进攻，并令老教土兵搦战诱敌。中午，清军佯为败退，撤回山梁潜伏。起义军见清军撤退下山，不知是计，便只留少数人守卡，大部回营休息。清军伏兵乘机突出疾驰，直扑大卡。起义军猝不及防，又力寡难敌，大卡终被清军抢占。夜间，起义军几次争夺大卡均未得手，次日黎明，清军又乘起义军困惫疲乏之时，抢占两个山包，并将起义军大营本布尔庙烧毁。

清军乘胜向起义军进逼，在新占地段前沿安设木城营卡，空缺处则挖掘深壕，使包围圈大为缩小，并切断了起义军去黄河取水之路。为了彻底断绝起义军水源，清军还派人从水磨沟上游泄水断流，并将华林寺后及雷坛二处的水井填塞。起义军陷入严重缺水的境地，营内数百头牲畜干渴而死。闰五月二十九日，起义军已断水数日，清军趁机发动进攻。500 余名起义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他们“虽不能如前剽悍，尚于沟内卡上放枪抵御”，“拼命支持，不肯溃散”②。正是凭着这种顽强的精神，起义军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六月初一日以后，天不时下

---

① 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三。

② 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四。

雨，缺水的困难稍有缓解。

阿桂见断水一法不能解决问题，又令清军挖掘壕沟，直通至起义军阵地前，并沿阵地建一层木栅，距起义军壕沟不过三至五丈。木栅内构筑炮台数座，上架新铸的仿四川劈山炮和从凉州调来的“食子六十两重神炮”，不断向起义军阵地轰击。清军还于第二层木栅外刨挖“人”字形沟三处，与起义军壕沟相距不过数尺，沟上均立木卡，使起义军的处境更加困难。

六月十五日，清军大举进攻。当日清晨，天气浓阴，清军乘机将土袋和柴捆抛入起义军壕沟，随即跳入填浅的壕内，攀附而上，起义军忍着干渴，与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争夺。但终因力量悬殊，阵地被清军突破。下午，清军攻入起义军营垒，投掷火箭火弹，起义军帐房及贮存在土窖内的粮食、弹药尽被烧毁。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起义军英勇异常。阿桂等在奏折中说，起义军“虽负伤甚重，苟延残喘，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有中箭五六支尚持石奋击者。于官兵焚烧贼营时，犹复舍死前来抢夺粮食雨水，实属剽狡强悍”①。战斗中，苏四十三及其他几位领导人壮烈牺牲，起义军只得退回华林寺坚守。

起义军原在华林寺周围筑有土墙，南面挖有壕沟一道。清军逼近华林寺立栅，并架炮向寺内轰击。六月十六日，起义军突围不成，遂在沟边建木卡 10 余处固守。在随后的战斗中，起义军“虽多死伤，不肯溃散”②。七月初五日，清军又一次发起进攻，华林寺殿屋均被击塌，起义军退入尚存的一角及围墙内，放枪掷石，尽力抵御。第二天，清军继续进攻，起义军与敌人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最后除 67 人被俘外，全部壮烈牺牲。

至此，撒拉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经过 4 个半月的英勇战斗之后，终于失败了。

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清廷又下令搜捕参加或支持过起义的新教教徒及其家属。据《循化志》记载：“其未赴省及逃亡并其

---

①② 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四。

家属，自三月至八月，为循化兵捕杀一百余名，生获男妇幼孩六百余名。逆党皆正法，妇女遣伊犁给兵丁为奴，男孩遣云南监毙及逃匿深山冻饿死者不在内。凡撒拉十二工，惟查汗大寺、孟达、夕厂三工无新教，其九工新教凡九百七十六户，皆剿尽无余。"① 同时，严行禁止新教。阿桂于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向清廷奏称："现已严饬各属，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如查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照邪教律从重办理。"② 为了加强对宗教的控制，规定"回民不得复称总掌教、阿洪、阿衡、师父名目，择老成人充乡约，稽查约束。循化掌教改为总练，阿洪改为乡约。新教礼拜寺全毁，旧教嗣后亦不得增建。不许留外来回民学经教经及住居。每年乡约头人具无新教及前项情节甘结一次"③。对撒拉族人民更加以种种限制，"嗣后撒拉尔回人不准复充循化厅、河州衙役及营伍兵丁，亦不准其任意至内地行走，其有往各州县村镇贸易者，由循化同知给与照票，定以限期，事毕即令回巢，将票缴销，不许在各处逗留"④。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清廷增加在陕甘的驻军共12940名，将陕西提督由西安移驻固原，固原总兵移驻河州，改河州协为镇，循化营添设参将一员。

三、田五、张文庆领导的回民起义

统治阶级以为，实行残酷的镇压和严密的控制，就可以消除人民的反抗。但是，与其愿望相反，它却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新的反抗。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在甘肃东部又爆发了田五、张文庆等人领导的回民起义。

田五，又名富，甘肃盐茶厅(今宁夏海原)人，回族，与张文庆、李可魁等人都是马明心的徒弟。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失败以后，田五等人愤于统治阶级对新教回民的残酷镇压，欲为马明心

①③ 龚景瀚：《循化志》卷八，《回变》。

②④ 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五。

等人报仇，遂积极联络新教群众，在通渭石峰堡、静宁底店山、伏羌(今甘谷)鹿鹿山、隆德潘陇山等处险要秘密修筑堡寨，储备粮草，制备旗帜兵器，等待时机，举行反清起义。乾隆四十九年一、二月间，田五与李可魁、张文庆、哈得成等新教首领约定，于当年五月初五日分率各地新教徒同时起义①。不料事机泄露，田五遂于四月十五日在盐茶厅小山地方率众提前起义，首先攻克离盐茶厅30里的西安州营土堡，补充了部分武器之后，即弃堡向西北转移，进入山区，队伍很快发展到数百人。当月十九日，攻靖远县城不克，即于二十一日撤退。陕甘总督李侍尧、甘肃提督刚塔急调各地清军进行围剿。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起义军与清军多次交仗，因作战失利，多有伤亡，田五也不幸腹部中枪，为避免被清军俘虏，他在马营水自杀身亡。李可魁率起义军余部八九十人与清军周旋，先后在官川、马家堡、马营等地活动，新教群众不断参加，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起义军利用夜暗，巧妙地摆脱围堵的清军，"翻山而遁"，与通渭县张文庆和大通县(治今青海大通县西北白塔城)马四娃领导的石峰堡起义军会合，五月十一日攻克通渭城。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八旗兵、绿营兵1200人，由静宁州往石峰堡进剿。起义军按照"将官兵诱至石峰堡内，里外夹攻"② 的预定方略，诱敌深入，设伏以待。五月十二日，击毙明善，全歼来犯之敌。随后，起义军先后进攻伏羌、静宁、秦安等地，均未能攻克，乃分据静宁州之底店和通渭之石峰堡等要地，与清军对峙。

回民起义之后，乾隆帝原以为"此案系内地回民，非撒拉尔可比，尚易扑灭"③。不料甘肃当局进剿不力，陕甘总督李侍尧"逗留靖远，借审讯余党为名，不亲赴督剿"④；甘肃提督刚塔等清军将领，也不敢与起义军交锋，仅事尾追，应付了事，以至于

---

① 一说原定八月十五日起义，见《钦定石峰堡纪略》卷十五。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七，乾隆四十九年五月甲戌。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五，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丙午。

④ 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第312页。

清军处处被动。为改变这种情况，乾隆帝先是命尚书福康安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甘肃，继于五月二十日命阿桂为将军，福康安、海兰察等为参赞大臣，数日之后又将李侍尧、刚塔革职拿问，以福康安为陕甘总督，哈当阿为甘肃提督，并调集阿拉善蒙古兵、四川金川番兵、健锐营火器营京兵、宁夏八旗兵、陕甘绿营兵、撒拉老教土兵等共万余人赴援。

六月上旬，福康安到达隆德。他根据乾隆帝的谕令，采取先进攻起义军的外围据点，然后集中兵力围攻石峰堡的方针，令西安将军傅玉率所部清军赴石峰堡附近石沟庄扎营，以牵制石峰堡起义军，主力则由隆德、静宁分两路向底店山进攻。为对付清军的进攻，起义军在底店山扎立大营，在相距10余里的潘陇山扎营3处，在周围山梁又设小营10余处。十一日，两路清军同时向起义军发起进攻，起义军英勇抗击，“从山梁压下，势甚凶猛”①。但是，起义军毕竟兵员无多，武器简陋，难以抵挡清军的攻势，而马文熹的投敌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马文熹本是武举，参加起义军之前，就暗中与清隆德县当局勾结，这时见形势危急，便公开率众向清军投降，调转枪头，充当清军的帮凶。起义军被迫放弃底店山，撤往石峰堡坚守。

石峰堡在通渭以北60里，本系一无人居住的旧堡，田五、张文庆所以选择这里作为根据地，主要是因为该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石峰堡因山得名，石峰“本在万山之中，而石峰堡又高踞峰顶，四面有山围绕”②，三面为悬崖峭壁，只有东南地势稍平。乾隆四十八年五月，田五、张文庆为准备起义，将旧堡修葺加固，山顶修土墙1道，高7.5尺，厚4.5尺，南北长63丈，东西宽15.2丈，堡外挖壕3道。六月十五日，福康安率清军进

---

① 《钦定石峰堡纪略》卷十一，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福康安奏。

② 《钦定石峰堡纪略》卷十二，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福康安奏。

逼石峰堡。他认为，从正面进攻，徒增伤亡，故“此时要著，必先扼要放卡，断其水道，并周围刨挖沟壕，使贼无路窜逸，方能制其死命”①。据此方针，清军在石峰堡周围山梁安营 20 余处，派兵驻守，各营盘之间设立卡座，刨挖沟壕，将起义军包围起来。二十三日，阿桂抵达军营，他察看了石峰堡周围的形势之后，指示清军阵地前移，缩小包围圈。二十五日，清军抢占了石峰堡西北和东南两处靠近河流的山脚，使起义军无法取水。在逼近起义军阵地之处建立 20 余个卡座，挖掘深宽各一丈的壕沟一道。三十日，清军分两路从东南和西北山脚发起进攻。起义军虽然已断水数日，但仍在壕内放枪投石，拼死抵御，最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三十日战后，阿桂等又令清军将壕沟加宽加深，各营卡均加派士兵严守，并用大炮向起义军不断地轰击。起义军困守堡内，水源断绝，干渴难忍，夜间曾派数十人出堡取水，但均被清军发现，无功而返。张文庆鉴于堡内难于继续坚守，决定进行突围。七月初四日，妇女小孩 1500 余人陆续投出，次日子时，张文庆、杨四娃等与起义军战士一起突围。由于叛徒告密，清军预有准备，起义军冲到壕边时，遭到清军枪箭雨点般的射击，伤亡惨重，偶有“佚围而出夺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杀，贼投崖堕阱无算”②。至寅时，已有 1000 余起义军牺牲，张文庆亦受箭伤。突围不成，起义军只得退回堡内。黎明时，福康安、海兰察挥军冲入堡内，搜捕起义军将士，张文庆、杨四娃以下 700 余人被俘，后全部被害。田五、张文庆领导的回民起义失败了。

清统治阶级对起义的残酷镇压，给回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约有万名起义军将士被杀害，4500 余名子女被赏给满洲官员兵丁为奴，许多村庄成为废墟。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五，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己酉。

② 钱泳：《履园丛话》卷五，《景贤·书会宁令李君守城事》，第 131 页。

四、起义失败的原因

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和田五、张文庆领导的回民起义，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它表面上由教派斗争引起，其实是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乾隆朝中期阶级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是撒拉族、回族群众反对阶级压迫的农民起义。

这两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客观上固然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但从起义军方面来说，它自身的许多不足和失误，则是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第一，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两次起义都是从教派斗争开始，起义的领导者始终也没有跳出教派之争的圈子，甚至提出了“杀尽老教”的错误口号，但却没有从政治方面提出自己的斗争目标和口号。这样，就无法争取、团结老教群众和不信教的其他民族人民参加起义，从而孤立了自己。苏四十三起义军盛时只有2000余人，田五、张文庆起义军也只有几千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缺乏通盘的筹划。起义之前，至少在起义之初，起义的领导者应该着眼于战略全局，进行认真而周密的筹划，并制定出大致的行动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复杂的情况。苏四十三等起义领导人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行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攻占河州后，“原想同撒拉尔去攻循化，又想要两路攻狄道、兰州，因闻总督在狄道看守严紧，不敢过去”，在兰州住了两天后，因为“听说马明心已被省城拿去收监”，苏四十三等领导人竟作出了进攻兰州，“要救马明心”① 的决定。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起义之初，起义军在打喇赤土堡与清军交战后，“纷纷退据南山，既欲回扑盐茶，又欲前往官川”，缺乏计划性。对这一点，乾隆帝当时已经注意到

① 那彦成：《阿文成公年谱》卷二三。

了，他指出：“可见贼匪仓猝纠合，胸无定见。”①

第三，不适当地采取单纯攻城守城的战法。苏四十三起义之后，率领仅千余人的起义军，离开撒拉族、回族比较集中的循化、河州地区，放弃已经攻取的河州城，贸然向省城兰州进军，在战略上已犯了孤军冒进的错误；攻兰州不克，不是及时撤退转移，反而不顾主客观条件，困守华林山，与优势敌人进行阵地战，终为敌人聚歼。田五、张文庆起义，最初曾多次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摆脱了清军的围堵，甚至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下，“屡次翻山而遁”②，待清军发现时，“惟见空营一座”，起义军已“不知去向”③。但是后来起义军却退守石峰堡，消极防守，重蹈了苏四十三起义的覆辙。这足以说明，农民起义之初，在兵力、装备等方面都远不如敌人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适合自身条件的游击战、运动战战法，而不能与强大的敌人打阵地战。如果不顾主客观条件，长时间地采取攻城或守城的战法，则必败无疑。

第四节 台湾林爽文起义

一、起义的背景

（一）沉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随即在台湾建府置县，设官驻兵，以加强管辖。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又取消海禁，招民垦种。台湾原本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气候宜于农作物生长，因此广东、福建沿海等地贫苦农民纷纷渡海前往谋生。他们带来了大陆人民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手工业技术，与番族（高山族）同胞共同开发台湾，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六，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乙卯。

② 《钦定石峰堡纪略》卷八，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初五日，福康安奏。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六，乾隆四十九年五月丁卯。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统治阶级对台湾人民的封建压迫和剥削愈益加重。台湾赋税较内地为重，如田赋、丁赋都比内地高出一倍。此外，还有"船税"、"陆饷"、"水饷"、"房税契"等名目繁多的"杂税"。广大农民在交纳各种租赋杂税之后，竟无余粒。而吏治的败坏，使台湾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台湾隶属福建，清政府规定，台湾地方文武官员，任期满后即转升内地，不使久任。尽管台湾孤悬海外，但官吏们垂涎那里的财富，争相前往任职。乾隆帝说："督抚遇有台湾道府厅县缺出，又以该处地土丰饶，不问属员能胜任与否，每用其私人，率请调补，俾得侵渔肥橐。所调各员，不以涉险为虞，转以调美缺为喜，到任后利其津益，贪黩无厌，而于地方案件，惟知将就完结，希图了事。"① 这些贪官污吏"以宦为贾，舞弄文墨，剥民肌膏，三年报罢，满载而归"②。台湾总兵柴大纪就是一个被台湾人民称为"残官"③的贪官。他利用巡查营务、管理海口船只等一切机会，肆意搜括钱财，甚至"私令守兵渡回内地贸易，每月勒交银钱"④。据其家属供认，他在"台湾任内，前后所得共有五六万金"⑤，仅仅掌管营伍兵丁的武职，贪索所得尚少，不过是文官所得十之一二而已，文官贪污之巨可想而知。正是这种封建压迫和剥削，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终于在乾隆末期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台湾人民起义。

（二）天地会在台湾的传播

林爽文起义是一次由天地会组织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天地会是清代民间的秘密结社，又称三合会、三点会，会内

---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五，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庚戌。

② 连横：《台湾通史》卷六，《职官志》，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02 页。

③ 《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顺天丁未年七月初一日），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第 155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七，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丙戌。

⑤ 《清史列传》卷二五，《柴大纪传》，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936 页。

通称“洪门”。天地会由何人创立于何时，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提出，天地会是明末遗民为“反清复明”于清初创立的。陶成章说：“始创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① 随着天地会研究的不断深入，清代档案和官书中的天地会资料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在查阅了有关天地会的大量案卷，并对天地会重要成员行义、陈彪等“反复细勘，熬刑究诘”后，奏称：“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名洪二和尚”，“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编造悖逆诗句”②。伍拉纳、徐嗣曾的报告成为乾隆中期说的主要立论依据。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天地会创立的时间意见不一，乾隆中期说未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天地会在乾隆中期迅速传播并引起清朝统治阶级的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

乾隆朝前半期，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商业经济的发展尤为迅速。与此同时，阶级矛盾也逐渐激化，当时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被迫离乡背井，到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水陆交通线上以肩挑负贩谋生。他们生活贫苦且极不稳定，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加之身处异乡，孤立无援，因此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以争取生存的权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地会为下层社会的劳动者所接受，其主要成员是小商贩、以挑夫纤夫为主的运输工人、手工业者、无业游民以及贫苦甚至破产的农民等。天地会初起时，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口号，其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主要思想武器是“自卫和互助”。天地会重要成员严烟说：“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

①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纪簿》，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折，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见《历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所以愿入会者甚多。”① 后来，由于清政府的镇压，天地会的首领才提出了“反清复明”的政治口号。

天地会最初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广东、福建，后来发展到江西、广西、湖南等地，并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中流传。天地会在台湾的传播，始于福建人严烟。严烟是福建平和县人，以卖布为生。乾隆四十七年，由广东人陈彪发展入会。次年，严烟渡海至台湾，在彰化开设布店，秘密传授天地会。彰化县林爽文、刘升、陈泮、王芬，诸罗县杨光勋、黄钟、张烈，淡水厅王作、林小文等人，相继入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天地会会员“众至万人”②。

二、起义的爆发和胜利发展

林爽文，福建漳州平和县人，因家贫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随父林劝渡海至台湾，迁居彰化县大里杙庄（今台中县大里乡），以耕田赶车为业。乾隆四十九年三月，经严烟传授，在溪底阿密里庄加入天地会。他积极发展会员，很快就成为彰化地区天地会的重要首领之一。

清政府对民间的秘密会社一直采取严禁的政策。乾隆五十一年秋，台湾诸罗县（今嘉义）天地会首领杨光勋等被人告发，台湾总兵柴大纪、台湾道永福和台湾府知府孙景燧等率兵驰往诸罗镇压，扑杀数十人。因张烈等人避入大里杙，彰化县知县俞峻督率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领兵数百名前往镇压，十一月二十日在距大里杙五六里的大墩扎营。俞峻胁迫大里杙群众“擒献”林爽文等人，扬言“如不交出林爽文，就要烧庄搜剿”③。清军

① 《审讯严烟供词笔录》，《天地会》（一），第111页。

②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一，《林爽文传》，第571页。

③ 《高文麟供词》，军机处录副奏折，《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812页。

"先焚数小村怵之，被焚者实无辜也"①。统治阶级烧杀抢掠的暴行，激起群众的愤怒，林爽文等决定举行武装起义。

十一月二十七日(1787年1月16日)夜，林爽文率天地会会众1000余人前往大墩偷袭，一举攻破清军营盘，杀死俞峻、赫生额、耿世文等，全歼敌人。首战告捷，为武装起义举行了奠基礼。

在取得大墩偷袭战的胜利之后，林爽文等率起义军向彰化县城进军，沿途不断有贫苦农民参加，到彰化县城时，起义军队伍已增加到三四千人。县城无墙垣，插竹为墙，起义军砍开竹墙，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攻入城内，杀知府孙景燧、都司王宗武、同知长庚等。

攻占彰化之后，林爽文开始进行政权建设。起义之初，大盟主为刘升。由于林爽文为人豪爽，有义气，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不久被推为大盟主。林爽文定年号为"天运"，第二年改为"顺天"，以原彰化县署为盟主府。在顺天政权之下，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地方行政组织，设节度使、知县、同知、总爷等官职；一个是军事组织，设元帅、副元帅、左都督、右都督、军师、大将军、将军、总督、监军、提督、先锋等官职。另外还设有管理法律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机构和人员。

林爽文领导的顺天政权，采取保护人民群众、严厉打击贪官污吏的政策。林爽文在以"顺天盟主"、"顺天大盟主"名义发布的告示中明确指出："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以救吾民"②；"本盟主因贪官污吏剥民脂膏，爰是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③；"本盟主因文武贪

---

①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清经世文编》卷八四，《兵政》，第2068页。

② 《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天运丙午年十二月初八日)，《天地会》(一)，第153页。

③ 《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顺天丁未年三月)，《天地会》(一)，第154页。

污，剥民膏脂，爰举义旗，共灭剿除，以快民心"①。起义军处死人民所痛恨的贪官污吏，没收其财物，除用以解决起义军粮饷之外，都分给贫困人民。起义军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他们纷纷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林爽文注重农业生产，他以"安民心"、"保农业"② 为己任，一再号召"军归伍，民安业"③，"务宜安分耕农"④。因此，起义军控制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粮食充裕，物价低廉，与清军控制区形成鲜明的对照。台湾同知杨廷理在禀报中说："北路本系产米之区，……刻下鹿港米价腾贵，每石三千。而贼巢大里杙、水沙连诸处，窝积甚多，每石仅需八百。"⑤ 林爽文注意改善军民关系，声明"本帅严谕军伍，不许丝毫妄取"。遇有军民纠纷，秉公处理，"如吾军不是，失一赔二，焚茅赔瓦，仍究明强暴。若吾民不该，亦照法究处。本帅至公无私，尔等不必怀疑，致伤和睦"⑥。当时台湾民众之间矛盾较深，参加林爽文起义的主要是福建籍漳州人，广东和福建泉州籍移民则因与漳州人有隙，很少参加起义，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义民"。林爽文注意团结、争取他们，在布告中指出，"其从前虽有被胁为'义民'，今既知悔归顺，无论闽粤民番，皆属百姓，更当加恤"⑦。林爽文起义军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所有分别查封粟石以应军需，不许众兄弟滥搬星散"⑧。所有这一切，对于起义的发展壮大，都起了积

---

① 《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顺天丁未年七月初一日），《天地会》（一），第155页。

②④⑥ 《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天运丙午年十二月初八日），《天地会》（一），第153页。

③⑦ 《顺天大盟主林爽文告示》（顺天丁未年三月），《天地会》（一），第154页。

⑤ 《台湾同知杨廷理禀报》（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军机处录副奏折，《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775页。

⑧ 《林爽文起义军守城官告示》（顺天丁未年六月初四日），《天地会》（一），第156页。

极的作用。

攻占彰化之后，林爽文决定乘胜进攻，除留数百人驻守彰化和大里杙外，分兵数路，向外发展，于十二月上旬克淡水，占诸罗，斗六门（今云林）、南投诸地亦为起义军控制。与此同时，林爽文派人前往南路凤山（今高雄），与台湾南部天地会首领庄大田联络。庄大田起而响应，他“出资造军器，树大旗……数日之间，众至数千”①，于十二月十三日一举攻占凤山。十二月下旬，北路林爽文部起义军和南路庄大田部起义军会师，分四路围攻府城。

台湾府城（今台南市）是清政府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当时，台湾府属四县一厅，彰化、诸罗、凤山三县已被起义军占领，府县同城的台湾城是清军控制的唯一的大城镇。台湾总兵柴大纪率领清兵并联合以黄奠邦为首的所谓“义民”武装，在城内坚守，起义军进攻受挫。

林爽文起义之后，福建总督常青即飞章告变，调集清军水陆万余人赴援。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夜，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领清兵2300余人在鹿耳门登陆，次日至台湾府城。海坛镇总兵郝壮猷亦率兵1700余人于同日到达。初六日，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率兵2000余名在鹿港（又称鹿仔港）登陆。林爽文见清军兵力骤增，形势不利，遂于初七日撤围北走，庄大田亦率众退屯大岗山。

黄仕简抵台之后，即指挥清军向南北两路起义军发动进攻。总兵柴大纪在黄奠邦、陈宗器等地主武装的配合下，攻占了彰化、诸罗。而向南路进攻的总兵郝壮猷部南行20里，即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顿兵几五十日”②。二月二十日，庄大田部起义军主动撤出凤山，而以一部潜伏在城内。郝壮猷率军进入凤山

①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一，《林爽文传》，第572页。

②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清经世文编》卷八四，《兵政》，第2068页。

后，对起义军的活动竟毫无察觉。三月初八日，起义军里应外合，复占凤山，歼清军大半，杀游击郑嵩。郝壮猷狼狈逃回府城，后被斩首。

任承恩率兵抵达鹿港之后，慑于起义军的强大，亦以“兵单难于远捕”为辞，“株守鹿港”，仅令游击穆腾额、守备潘国材率兵500人攻南投，游击海亮率兵300人攻嵌顶，守备常万雄率兵300人攻北投，以应付塞责。这几股清军在起义军的阻截打击下，均难以前进，无所作为。

黄仕简、任承恩率万余清兵抵台，增强了驻台清军的兵力。但是，清军纪律败坏，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这更加激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台湾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军，清统治者说，“遍地皆从贼”①，“迨官兵自邻省调至闽，又守风过海，凡两三月，官军仅增万，而贼已增十万”②。

乾隆帝对黄仕简、任承恩到台后的无所作为非常不满，下令将黄、任二人“革职拿问”，而令李侍尧接任闽浙总督，驻扎厦门，命常青为将军，带兵往台湾接办军务，以“习台湾事”的江南提督蓝元枚和福州将军恒瑞为参赞。李侍尧请调广东兵4000人、浙江兵3000人、满兵1000人前往台湾。但是，常青并不能挽救驻台清军的颓势，“甫交绥，常青战栗，手不能举鞭，于军中大呼曰：‘贼砍老子头矣！’即策马遁，诸将因之即退，……青入城，即令闭关，又请兵一万”③。主帅如此怯战，清军当然不可能有强的战斗力。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南北路起义军又联合攻府城。南路庄大

---

①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清经世文编》卷八四，《兵政》，第2068页。

② 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福康安柴大纪平台湾》，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13页。

③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页。

田部号称10万大军，直逼府城，林爽文亦派二三千起义军前往支援。月底，正当起义军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负责攻打府城南门的庄锡舍率2000人投敌，使起义军战斗意志大受影响，“登时哄乱”①，庄大田只得收兵退回南潭。林勇、谢桧、许尚等闻庄大田退兵，亦相继撤退。

围攻府城失败之后，林爽文便集中全力围攻诸罗。诸罗是台湾南北孔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起义军来说，它是后方根据地的屏障。起义军首领董喜说：“我往攻郡城，柴大纪必蹑我之后，且或乘虚捣我巢穴。巢穴一失，大事去矣。今用兵当自诸罗始。”② 对清军来说，诸罗亦是府城的北部屏障，“诸罗失，则府城亦危。……一朝弃去，克复为难”③。因此，诸罗成为起义军与清军争夺的焦点。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林爽文亲督大军攻诸罗，自六月中旬起，“连日夕不止”。起义军切断了诸罗与府城两地清军的联系，“禁粒米不得入城”，清军以地瓜、野菜等充食，“已饥疲不能支”④。为阻断清军援兵，起义军在通往诸罗的路径上皆遍插竹签，并放水灌田，将田埂削窄，使敌难于运动。常青令恒瑞、普吉保带兵往援，因道路梗阻，二人均观望不进：恒瑞借口“贼多兵少”，驻兵盐水港迁延观望；普吉保自鹿港赴援，“以贼势盛不敢进”⑤。副将贵林、蔡攀龙奉命率兵1600余名往援，不断遭起义军伏击，伤亡大半，被迫退回，只有600余名清兵进入被起义军严密包围的诸罗。“诸罗之围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纪告急之文，用小字书寸纸，募人间道夜行，始得达府”⑥。此时，常青驻守的府城，也被起义军围困。清军分守诸

---

①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十五。

② 《平台纪事本末》。

③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一，《福康安传》，第579页。

④⑤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清经世文编》卷八四，《兵政》，第2069页。

⑥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第157页。

罗、府城两地，声势不能相联，起义军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但是，由于本身的弱点，也由于敌人的顽抗，起义军终未能攻克诸罗。

三、起义的失败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帝将常青免职，派陕甘总督福康安赴台督办，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十一月，福康安、海兰察等率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省清军万余人抵台。福康安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声言进攻起义军的根据地大里杙，实际上仅以舒亮率领的一支小部队进攻大里杙，而以主力解诸罗之围。林爽文率起义军迎战，与清军首先在仑仔顶交战，战斗失利，被迫退却。海兰察等率清军乘胜前进，接连攻占焚陴头、沟仔等地，直逼林爽文起义军的重要据点牛稠山。起义军虽负山阻溪坚守，仍接连败北，被迫撤围。达半年之久的围攻诸罗之战，终于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清军解诸罗之围后，又先后攻陷彰化、斗六门等地。林爽文被迫率起义军退守大里杙。大里杙是起义军的根据地和最后的据点，东倚大山，南绕溪河，砌筑土城，密排大炮，内设竹栅两重，城外沟渠堤岸重叠，林爽文率起义军恃险坚守，并派其弟林勇去庄大田部求援。

庄大田竟对林勇说："我在这边滋扰，可以牵制官兵，你哥哥那里未必官兵就能得手，可以放心，你既来了，就帮同我把守地方。"① 庄大田置大里杙安危于不顾，不发救兵，林爽文部起义军只得孤军奋战。十一月二十四日，福康安率清军进抵大里杙以南5里的平台庄，随即向大里杙大举进攻。起义军奋起还击，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官兵至，贼犹数万出拒，退而复集者数次。既夕，我兵伏沟间，贼万炬来索战，我兵在暗中，贼不能

---

① 《林勇供词》(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见，而我兵视贼，则历历可数，发枪箭无不中。贼自知失计，遽灭火，复击鼓来攻，我兵又从鼓声处击之，杀死无数。黎明，遂克其城。”①

大里杙弃守，林爽文率起义军残部2000余人退至集集埔。集集埔“前临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垒石为陡墙，长数里，其所预营扼险处也”②。十二月初五日，清军追至集集埔，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军又伤亡千余人，有生力量损失殆尽。林爽文仅率数十人逃入高山族居住的内山。福康安派“义民”进山，配合清军搜捕起义军。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林爽文在淡水中港老衢崎被俘，同年三月初十日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

林爽文部北路起义军失败之后，福康安指挥清军转旆南向，镇压庄大田部起义军。庄大田率部抗击，因力量悬殊，连连失利。清军先后攻占湾里溪、大穆降、九社口、本县庄、大武垅、大埔、十八重溪等地，并乘胜攻占凤山，庄大田率部退守台湾最南端的琅峤。福康安遣侍卫乌什哈达率水师由海上绕道阻截；海兰察、鄂辉由山路进攻。起义军腹背受敌，“冲突不得出，阵杀者数千，溺海者数千，擒而戮者亦千余”③，庄大田亦于二月初五日被俘。

四、起义失败的原因

林爽文起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

与天地会组织松散、山堂林立的特点相适应，起义军各部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林爽文名义上是起义军的最高领袖，实际上并不能实施统一指挥；庄大田虽是林爽文加封的洪号辅国大元

①③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清经世文编》卷八四，《兵政》，第2068页。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第158页。

帅，但并不受林爽文直接指挥、调动。起义前期，两部起义军曾实行联合作战，也只是十分松散的联合，到了后期，林爽文和庄大田更是“各自号召不相下”[①]。在清军全力进攻林爽文起义军根据地大里杙的紧急关头，庄大田竟不顾大局，不但拒不派兵赴援，而且将前往求援的林勇强行留下，帮其防守。即便是同一部起义军内部，也存在着组织涣散、争权夺利的情况。闽浙总督李侍尧在奏报中说：“近闻官兵焚烧南潭，见贼寮内粮食就尽，其伙党乏食，且互相欺夺，彼此不睦，是南路贼匪已有涣散之势。”[②] 起义军内部这种“缓则彼此相助，急则彼此相图”[③] 的状况，使其无法形成强大而统一的打击力量，更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

（二）战略指导失误

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原来都是下层劳动者，既没受过军事训练，又受文化、阅历等条件的限制，往往缺乏战略眼光。

第一，在围攻台湾府城之前，没有首先占领鹿港和鹿耳门。鹿港和鹿耳门两港是台湾与大陆联系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其中又以鹿港为最。鹿港距彰化仅 20 里，与府城的交通也十分便捷。如果起义军在占领彰化之后，趁清军兵力空虚之机，攻占鹿港，派重兵驻守，既可切断清军的交通运输线，防止清兵渡海增援，进攻府城时又可保护自己的后路，使自己处于非常有利的战略态势。但林爽文等计不及此，起义之初虽一度占领鹿港，但仅派人收税而没有派兵驻守，故很快就复为清军控制，致使援台清军多次在鹿港顺利登陆。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随福康安抵台的赵翼曾说：“幸林爽文等皆山贼，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故我师得扬帆至。然海舟大，不能附岸，须鹿港出小船二十里来

①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清经世文编》卷八四，《兵政》，第 2068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六，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丙午。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七，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庚申。

渡兵。倘贼稍有智计，先攻鹿港，鹿港无城可守，其势必拔，拔则据海口禁小船，我海舟虽至，亦不得薄而登。"① 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只重攻城守城。起义前期主要是攻城，后期则主要是防守。攻城时，不注重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起义后期，起义军处于被动和劣势，面对兵力大大增强了的清军，不适当地采取阵地防守与敌人硬拼，终于失败。

（三）人民内部的矛盾纷争

嘉庆初年福建巡抚汪志伊说："会匪由来虽久，而不致酿成如川湖巨案者，则以各乡邑械斗，互相仇杀，其仇不可解，其心不能合，其势不能联之故。"② 此话从一个侧面说明人民内部的矛盾与分裂是林爽文起义没有太大发展以至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台湾居民，一是当地的番族（即今之高山族），一是大陆移民。番族以居住地区和"归化"与否分为生番和熟番。大陆移民中，福建漳州、泉州籍占十分之六七，广东潮州、惠州籍占十分之三四。由于各种原因，番族与福建、广东籍移民之间，福建籍与广东籍移民之间，福建漳州籍与泉州籍移民之间，隔阂较深，时有磨擦，甚至械斗。林爽文懂得，民众内部这种分裂、对抗的状况不利于起义发展，所以起义之后，他注意团结番族和广东、福建泉州人。但是，历史形成的矛盾和误会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消除的；统治阶级则有意识地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分歧，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使番族和广东、福建泉州人为其所用。结果，许多人开始时"各自团结，据庄为守"，后来则随清军作战，成为镇压起义军的工具。奉林爽文之命到鹿港收税的刘志贤被泉州人林凑杀害，而林爽文也是在清军和番族、"义民"的联合搜捕下被俘的。

---

① 赵翼：《论台湾要害》，《清经世文编》卷八四，《兵政》，第 2077 页。

② 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天地会》（一），第 144 页。

第五节　湘黔苗民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 年）初，湖南、贵州两省接壤地区爆发了苗民起义，这是清前期苗民反清武装起义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清朝自雍正年间对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后，税捐、徭役益重，一些来到苗族地区的汉族地主、官吏、商人大肆掠夺土地和进行高利盘剥。其中一些地区如湖南永绥厅（今花垣），最初“环城外寸地皆苗”，乾隆年间已“尽占为民地”①，致使苗民“田产罄尽”②。苗民向地主、高利贷者借谷一石，一年之内竟要偿还三至五石。如此沉重的高利盘剥，更加速了苗民的破产和不满，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反抗民族压迫和清王朝的统治。

这次苗民起义发生在贵州的松桃厅（今松桃苗族自治县）和湖南的凤凰厅、乾州（今吉首西南）、永绥厅四地。起义前，各地首领在当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准备。他们提出的“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一时响遍苗疆，标志着起义的风暴即将来临。

乾隆六十年正月初四日，松桃苗民石柳邓、永绥苗民石三保、凤凰苗民吴陇登和吴天半、乾州吴八月等人秘密集会，约定二月初六日四地同时举行起义。不料，石柳邓在松桃操练兵马、制造火药的行动被汉族地主告密，地方官吏紧急进行搜捕，迫使石柳邓率众于正月中旬提前起义。起义者围攻松桃厅正大营（今贵州铜仁东北），树起了反清大旗。紧接着，湖南苗民石三保在永绥厅黄瓜寨起兵响应。永绥副将伊萨纳、镇筸镇总兵明安图急忙率兵围剿。与此同时，吴天半、吴陇登、吴八月等也按计划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军给前来围剿的清军以迎头痛击，击毙明安图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湖贵征苗记》，第 314 页。

② 严如煜：《苗防备览》卷二二，《杂识》，清道光刊本。

等人，进围永绥，攻克乾州，并将贵州镇远总兵珠隆阿围困于正大营城内。一时间，"苗疆大震"①。

二月，乾隆帝获悉湘黔边境苗民起义消息，立即命云贵总督福康安、湖广总督福宁等率兵前往镇压，并派侍卫额勒登保、德楞泰等参赞军务，又令四川总督和琳率兵于四川秀山一带拦阻，以防苗民起义军和川楚陕三省农民起义军联合。

三月，福康安会同福宁、和琳调集湘、黔、川、滇四省清军3万多名，分三路全力围剿石柳邓部起义军。起义军依靠苗民的支持和善于在峭壁悬崖中攀援险阻的特点，灵活运用"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② 的流动战术，飘忽不定地打击清军，使其死伤遍野。不过，石柳邓由于不能改变腹背受敌的局面，最后被迫将主力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石三保会师。这样，清军就先后解了正大营、松桃和永绥之围，并乘胜进攻黄瓜寨。

面对清军咄咄逼人的攻势，石柳邓和石三保紧密合作，相互支持，进行了激烈的外围阻击战。清军丢盔弃甲，死伤遍地。福宁率兵6000余人偷袭乾州时，遭起义军伏击，全军覆没，他本人仅以身免。苗民乘胜再围永绥，昼夜急攻两月有余。清廷急命四川提督穆克登阿率部往援，至当年八月方解永绥之围。

八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在乾州平陇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推举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军势复振。吴八月指挥起义军采取避实就虚，节节阻击的策略打击敌人，迫使清军统兵大员"束手不得展尺寸"，频频以"暴雨山潦涨阻"③ 为辞，欺骗朝廷。

九月下旬，起义军中有勇有谋的吴天半在同清军作战时被俘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湖贵征苗记》，第314页。

② 转引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6页。

③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湖贵征苗记》，第316页。

投降，乾隆帝将其改名为吴半生，“以示釜底游鱼，克期生擒之意”①。

招降分化瓦解，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的惯用伎俩。早在当年五月，福康安就提出“设法离间，用计解散”② 的策略，经过一段观察了解后，他认为吴陇登是最合适的招降对象。因为吴陇登出身苗民上层，擅长投机取巧，起义前手上就沾有苗民的鲜血。在清军的节节进攻面前他早已吓破了胆，思想动摇。在清廷官秩花翎的诱惑下，吴陇登暗中向清军“乞降，许杀贼自效，阴为官军乡导”③。十月，吴陇登出其不意地将吴八月缚送福康安军营。接着，在吴陇登的煽动下，起义军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头目相继降清，一些村寨的苗族上层人士也纷纷乞降。这不仅使起义军人心涣散，战斗力严重削弱，而且葬送了起义的大好形势，使起义从此转入低潮。

嘉庆元年（1796 年）三月，石柳邓辅立吴八月的儿子吴廷义为吴王。五月，福康安病死。这时，张正谟、姚之富等人先后在湖北起义，揭开了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清军被迫分兵应付，人心涣散，厌战情绪笼罩军营，清廷也有媾和罢兵之议。可惜不久石三保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石柳邓孤掌难鸣，立脚不住，被迫撤离了乾州，集中到平陇。

六月，继福康安任清军统帅的和琳督军攻占了乾州。之后，和琳一方面派额勒登保进攻平陇，另一方面为减轻因川楚陕农民起义而造成的压力，制定了“善后六条”章程，主要内容是“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罢旧设营汛，分授降苗官弁羁縻之”④。这就进一步割断了苗民和起义军的联系，动摇和瓦解了起义军的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光明日报社 1987 年版，第 51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八，乾隆六十年五月癸亥。

③ 曾国荃等:《湖南通志》卷八四，《武备·苗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年影印本。

④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湖贵征苗记》，第 317 页。

军心，使起义军的处境更加艰难。

八月，和琳病死，额勒登保继任清军统帅。九月，额勒登保会同前来增援的将军明亮，分四路大举进攻平陇。在石柳邓率领下起义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保卫战。经过 3 个月的激战，虽屡创清军，击毙贵州提督花连布，但起义军本身也损失颇重。十二月，石柳邓在战斗中受伤牺牲，吴廷义被俘，平陇落入清军之手。至此，大规模的苗民反清起义被血腥镇压下去了。清军除留 2 万余人驻防苗地外，大部分调往川楚陕地区，以镇压那里的农民起义。

事后，清政府非但不认真执行“善后六条”，而且对苗民进行野蛮的烧杀抢掠，引起苗民的极大不满和反抗。这时，凤凰厅同知傅鼐鉴于“兵罢难再动，且方民弱苗强”①，提出了“屯田养勇，设卡防苗”② 的政策，获得了清廷的允准。该政策的主旨是，以招募乡勇和设置碉堡封锁苗民，从而对其分而治之。具体做法是：“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十余碉则堡之”；“近其防闲，遥其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边墙亘山涧，哨台中边墙，炮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③。

清军在苗疆修建的碉堡竣工之后，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小规模的苗民反抗斗争依然层出不穷。嘉庆四年（1799 年），镇筸苗民千余人在吴陈受的领导下，向当地驻军发起进攻，击毙清军守备、千总等多名将领以及大量兵丁，清廷为之震惊。嘉庆六年，贵州石岘（今松桃南）14 寨苗民联合湖南苗民反清。云贵总督琅玕檄调傅鼐前往会剿。经过 3 天激战，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嘉庆十一年，永绥厅苗民石宗四率数千人起义，围攻永绥厅城，后被清军击败，牺牲 2000 余人，石宗四也被俘获。至此，湘黔苗民起义全被平息。

湘黔苗民起义，既是苗族下层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也

---

①③ 魏源：《圣武记》卷七，《嘉庆湖贵征苗记》，第 319 页。

② 严如熤：《苗防备览》卷十三，《屯防》。

是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起义过程中，他们采取流动作战和避实就虚的战术，给了清军一定程度的打击，但由于活动余地相对较小，又缺乏全国反清起义形势的有力配合，所以最终还是失败了。而清朝方面，一开始就把起义压缩在苗民聚居区内，不使其与川楚陕农民起义军相联合，加之采用腹背夹击、行反间计以瓦解起义军内部、割断起义军和苗民群众的联系等手段，终于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湘黔苗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苗民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在湖南、贵州坚持反清斗争长达12年之久，杀死和击毙清朝文武官员达200多名，毙伤大量清军，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同时，这次起义牵制了大量清军的兵力，使清廷无法抽调更多的军队去镇压川楚陕农民起义，因而对后者是一个有力的支援。

第六节　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

（见附图18）

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一次反抗清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起义波及河南、甘肃二省，故又称川楚陕甘豫五省农民大起义。它是鸦片战争前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一、起义的组织和发动

川楚陕农民起义是由红阳教组织和发动的①，起义的基本成

① 在川楚陕三省农民起义过程中，红阳教的两个支派起了关键作用。其中，以刘松、刘之协为代表的混元教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以宋之清、齐林、姚之富为代表的收元教则是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参见许曾重《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起义中作用的考察》、《试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分载于《清史论丛》第二、三辑，中华书局1980、1982年版。

员也是红阳教徒。

红阳教属白莲教系统，是在明朝末年由白莲教分化出来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创立者是韩春坡。韩春坡，号宏阳，直隶（约今河北）曲周人。他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自称“一辈红阳教主”①，开宗立红阳教。

乾隆末年，红阳教就在破产农民和无业流民比较集中的川楚陕交界地区广为传播。这里是群山叠嶂、广袤无垠的茂密森林地带，形势异常险阻。其范围包括由豫南到楚西北的南山老林、川楚豫交界地区的巴山老林。自明朝中叶以来，流徙迁入这个地区的贫苦农民，已超过数百万人。他们或为地主、土豪佃耕，或为地方官吏、作坊主做工，身受残酷剥削和种种超经济压迫，生活极不稳定，生命也无保障。于是红阳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刘之协和另一支派收元教首领宋之清、齐林等在这一带传教收徒，秘密发展组织。当时，红阳教内广泛流传这样的政治性预言：“弥勒佛转世，现已生在河南无影山张家，要保辅牛八起事”②。牛八即“朱”字。无影山是民间宗教经卷中的地名，这里暗指由齐林、姚之富领导的收元教所在的湖北襄阳地区。“保辅牛八”实际上并非要恢复朱明王朝，而是借以反抗清朝的封建统治。这自然就引起了清廷的恐慌和震惊。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刘松、宋之清、齐林等被官府捕获。接着，地方官吏又“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役多方勒索”③，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次年冬天，刘之协、姚之富、张汉朝等红阳教主要首领在湖北襄阳聚会，提出了“官逼民反”的口号，决定分东、中、西三路于次年三月初十日同时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折。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革命运动》，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福康安奏折。

③ 《清仁宗实录》卷七二，嘉庆五年八月乙丑。

举行反清起义。姚之富派人到各地传达起义命令："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数收缘了"①。他要求教徒们迅速地组织起来，加紧制造兵器，准备起义。后因事泄，各地起义未能按计划同时举行。

二、王聪儿、姚之富起义

（一）襄阳举义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日，湖北宜都（今枝城市）、枝江（今枝城）、长乐（今五峰）等地红阳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率众起义，从此揭开了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各地教徒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他们占据山寨，攻拔县城，惩办贪官。

三月，姚之富、王聪儿、张汉朝、高均德等率众集中于襄阳地区。为了表达对已故襄阳地区红阳教首领齐林的怀念和敬重，姚之富等人推举齐林的妻子王聪儿为总教师。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下，起义烽火迅速燃遍襄阳、郧阳（治今郧县）、宜昌、施南（今恩施）、荆州、汉阳、荆门等湖北大部分地区。起义蔓延到陕西、四川、河南等省，当地的红阳教首领徐天德、王登廷、冉天元、王廷诏、荀文明等纷纷率众响应。各路起义军多则数万人，少则数千人，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镇压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福宁、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围剿，不久又命都统永保总统军务。但是，在最初的半年中，清军的围剿并不顺利，"官兵先后杀贼不下数万，而贼起益炽"②。起义军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势力旺盛。而各地的地主阶级则全力站在官府一边，组织团练乡勇，协助清军镇压起义军。因此，这场以红阳教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革命运动》，《陈德本供单》。

② 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

名义发动的反清斗争，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大搏斗，是一次真正的农民大起义。

起义一开始，各路起义军因受红阳教内派系繁多、互不统属的影响，大都分散作战，彼此不相联络。他们或固守孤城，或盘踞山寨，消极防御，为清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以致聂杰人、张正谟、曾士兴、陈德本等部很快即为清军消灭。而襄阳起义军则与其他各路起义军有所不同。

王聪儿、姚之富在起义之初就主动出击。四月初，他们率部猛攻襄阳城，“顷刻间，该府长门、南门、东门蜂屯蚁集，不计其数”，冒着清军密集的炮火和弓箭的射击，“抢取门板遮面直前，用木梯、木板攀城”①。但由于襄阳城高墙厚，清军顽强抵抗，起义军久攻不克。

五月下旬，王聪儿、姚之富从襄阳撤围，挥军南下，进攻湖北重镇钟祥。当时，清守军力量薄弱，而起义军在贫苦农民的支援下，日聚日多，斗志极为旺盛，六月初终于攻克钟祥。起义军的胜利，引起清廷的极度恐慌。在嘉庆帝的再三督令下，永保亲自坐镇指挥，调度各路清军，实行南北夹击，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为了冲破清军的包围圈，王聪儿、姚之富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即以一支部队佯攻清军粮台，转移永保的注意力，然后率领主力越过山岭，冲破清军拦截，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清军尾追不舍，在陈家河（襄阳北）一带遭起义军伏击。双方短兵相搏，清军大败，急忙撤退。嘉庆帝闻讯，大骂永保无能，下令将其逮入京师治罪，而以惠龄总统军务。

这时，姚之富认识到，在敌强己弱的形势下，再与敌人打阵地战无异于飞蛾扑火，遂决定采用流动战术，与清军周旋。他再三告诫部属：“断莫与官兵接仗，遇见时即四散奔走，总要官兵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元年四月十九日，毕沅奏折。

不知我们出没才好，……俟官兵赶逐疲乏之时，再拼死上前抗拒，若敌不住，再逃不迟。"① 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战术，保存了襄阳起义军的主力。

嘉庆二年正月，王聪儿、姚之富为了避开清军的围追堵截，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向河南挺进。一路上，起义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②，使清军疲于奔命，而又找不到起义军主力。起义军却经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清军。王聪儿亲自带领的一支由女教徒组成的起义部队，个个英姿飒爽，战斗力颇强。她本人又能身先士卒，勇敢善战，在马上运用双刀，矫捷如飞，所向无敌，不少清军将士见了惟恐躲避不及。

三月，起义军抵达陕西镇安。为摆脱清军的尾随追剿，王聪儿、姚之富又决定向四川进军，以便与当地起义军会合。他们沿汉水北岸经洵阳（今旬阳）、安康，直抵紫阳。五月十二日，由紫阳白马石、汉王城等处渡过汉水。5天之后，清军统帅惠龄才率大队兵马赶到，结果贻误了战机。

嘉庆帝闻讯大怒，斥惠龄竟"放贼全数渡江"，"无耻之至"，并说："兵法有半渡而击者。贼匪于十二日偷渡时，若急蹑贼踪，邀之半渡，可以聚而歼戮。乃坐失机会，实属大错。"他下令革去惠龄的"总统之任"③，而以陕甘总督宜绵代之。

（二）东乡会师

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的襄阳起义军顺利地渡过汉水后，即分三路向四川挺进。六月初，又合兵一路，穿越大巴山区，经通江、达州（今达州市）于二十二日进入东乡（今四川宣汉），与四川起义军徐天德、王三槐部会师。

---

①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一，嘉庆二年二月十四日，惠龄奏折。

② 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第379页。

③ 《清仁宗实录》卷十七，嘉庆二年五月己巳。

徐天德、王三槐等人在四川起义后，就把山寨设在悬崖峭壁、深林密箐之间，消极防守，结果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使清军赢得了集结力量、移师入川的时机。在宜绵的亲自督令下，明亮、德楞泰、惠龄等人分率所部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起义军猛扑过来。徐天德、王三槐等率众与清军苦战，屡遭失败，大量减员，情况十分危急。王聪儿、姚之富等人率领襄阳起义军入川，扭转了四川起义军的不利处境，推动了四川反清斗争形势的发展，为其后来成为这场大起义的主要战场奠定了基础。

川楚起义军会师后，"分屯山冈，延亘三十余里"①，起义声势更为壮大。经共同协商，决定按地区分别编为黄、蓝、青、白等号，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其中，湖北起义军方面，王聪儿、姚之富等称襄阳黄号，高均德等称襄阳白号，张汉朝等称襄阳蓝号；四川起义军方面，徐天德等称达州青号，王三槐等称东乡白号，龙绍周等称太平（今万源）黄号，罗其清、苟文明等称巴州（今巴中）白号，冉文俦、冉天元等称通江蓝号。

东乡会师壮大了起义声势，但也暴露出农民小生产分散、保守、落后的弱点。各路起义军不仅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部，没有提出统一的斗争纲领和口号，而且彼此猜疑，互相防范，不能团结对敌。会师不久，即以"大家分散便于逃走"② 为由，川楚起义军各自为战，互不联系。这就使瞬间出现的大好形势化为乌有。

（三）起义失败

东乡会师以后，王聪儿、姚之富鉴于四川起义军中部分人的不合作态度，认为难以在四川立足，加之一味迁就部下"四川地方生疏，不愿前往，立意总欲渡江回乡"③ 的安土重迁思想，作

---

① 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第381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王三槐供单》。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庆成奏折。

出了分两个梯队重返湖北的决策。前队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直趋襄阳，后队由王廷诏等率领，牵制清军主力，保证前队顺利到达目的地。一路上，前有清军明亮部堵截，后有惠龄及恒瑞、庆成等部紧追。但起义军发挥勇敢善战的精神，冲破白帝城清军防线，进入湖北巴东、归州（今秭归）地区，然后趋南漳，欲从南漳回襄阳。由于前有清军重兵堵截，回襄阳之路已被断绝，王聪儿、姚之富又率部西走房县、竹山，旋经竹溪再度进入陕西，并在入陕途中大败清军明亮部，毙护军统领惠伦。嘉庆帝得知起义军又回陕西的消息后，将宜绵革职，改由湖广总督勒保总统军务。

十月，王聪儿、姚之富为了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决定强渡汉江，伺机奔袭西安。为此，将襄阳各号起义军重新组成四支部队，分别由王聪儿和姚之富、王廷诏和高均德、李全和樊人杰、张汉朝率领。十二月初，王、姚率部向汉中东挺进，以吸引清军主力，而高均德则乘清军不备，趋汉中西，出其不意地强渡汉江，兵锋直指西安。明亮、德楞泰唯恐西安有失，撇下王、姚部，追剿高均德部。这就使王、姚等各部起义军得以顺利渡过汉江，并与高均德部胜利会师。

襄阳起义军渡过汉江以后，王、姚、高部于嘉庆三年二月在镇安、山阳、商州一带，与清军主力明亮、德楞泰、额勒登保部作战，而李全、王廷诏所部则由城固北趋宝鸡，直逼郿县（今眉县）、盩厔（今周至）。随后，李全部的前锋王士奇部经盩厔进至西安城下，迫使陕西巡抚秦承恩龟缩城内，“日久哭泣，目皆肿”①。然而，王士奇部战斗力毕竟有限，且孤军深入，弹药粮草无从接济，以致与清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失利，随即败退。王、姚部在额勒登保所率清军的围攻下，也立脚不住，不得不向湖北方向且战且走，于三月初退到湖北郧西与陕西交界处的三岔河时，被清军和当地地主武装团团围住。王、姚指挥起义军占据山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四，《王文雄》，第92页。

梁，居高临下与清军战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终因弹尽援绝，突围未成，全军覆没，王聪儿、姚之富先后跳下悬崖，壮烈牺牲。王聪儿、姚之富牺牲后，襄阳起义军中的王廷诏、李全、高均德等部，在陕西南部及陕西、湖北两省交界处与清军进行过多次战斗，因失利而进入川东北地区，继续坚持反清起义。至此，湖北各地的起义均已先后被镇压下去，只有张汉朝部还在湖北西部活动。此后，四川成了起义的主要战场，四川起义军成为这次起义的主力军。

三、四川起义军的反清起义

(一) 起义军的艰苦斗争

四川起义军中队伍繁多，一般来说分为两大支：一支由达州青号徐天德和东乡白号王三槐、冷天禄领导，另一支由通江蓝号冉文俦和巴州白号罗其清领导。

嘉庆三年正月，两支四川起义军由梁山（今梁平）、垫江、渠县四出活动，不久“又复合并一处，以致达州、开县等处道路梗阻，军火、粮饷未能接济”①，引起了清廷的惊恐。为了改变清军在四川的被动局面，嘉庆帝令勒保任四川总督，统一筹划四川军务。

早在嘉庆二年十二月，勒保就认识到，四川清军少而起义军多，“以致有贼之地无兵，有兵之地无贼，并有贼过而兵犹未来，有兵到而贼已先去者”。为此，他提出应通盘筹划，“先从川东进剿，清一路，再进一路”②。通过观察，他选定王三槐为突破口。东乡白号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是一个斗争意志极不坚定的人。自参加起义后，他就幻想通过清廷招抚，谋个一官半职。嘉庆三年七月，勒保派人诱劝王三槐去其军营“谈判”，将其逮捕，解京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六，嘉庆三年正月癸未。

② 《清仁宗实录》卷二五，嘉庆二年十二月癸亥。

处决。

王三槐死后，东乡白号由冷天禄统率，继续高举反清大旗。十月，勒保以大军围攻东乡白号义军据点安乐坪寨。鉴于寨中盐粮将尽。冷天禄行缓兵之计，诈称请降，麻痹勒保，然后于夜间率军冲出包围圈。但由于损失很大，东乡白号起义军从此一蹶不振。

接着，勒保又把罗其清部当作围剿的主攻目标。当年六月，罗其清和冉文俦两支起义军占据川北大神山，与陕西起义军连营数十里，一时势力大盛。不久，德楞泰、惠龄等遣兵扼住山后的渠河，防止起义军向北撤退，而以主力围攻大神山。经过激烈战斗，清军连破起义军几个营寨，杀死 2000 人。但由于起义军顽强抵抗，清军始终未能攻占大神山。七月，清军又分三路猛攻大神山，起义军被迫撤至营山县的箕山。德楞泰和惠龄率军前后夹击，起义军又损失 4000 余人。八月，德楞泰见起义军坚守营寨不出，便派少数清军前往叫骂，而于中途埋伏重兵邀击。罗其清中计，亲自引兵下山迎战，结果大败。这时，高均德、龙绍周等湖北起义军北走广元，与徐天德、樊人杰、王登廷等部起义军合兵直趋陕西，德楞泰急忙舍弃罗其清、冉文俦部起义军，分兵数路截剿高均德、徐天德部。经过四昼夜的战斗，高、徐起义军损失四五千人，已无路可退，被迫来到箕山。而罗其清部起义军乘清军北追之际，分兵五六千人猛攻营山县城。徐天德也扼住渠县饷道，与罗部形成犄角之势。不久，清军主力到达，罗、徐等部被迫退回箕山。德楞泰遣乡勇严防各隘口，并约诸路清军会剿。九月，罗其清等被迫放弃箕山，与李全、王廷诏等部退据营山附近的大鹏山。

大鹏山广百余里，四周多悬崖峭壁，地形极为险峻。山上有泉水，并有旧建城寨，石墙甚坚固。起义军刚至大鹏山，即遭到额勒登保、德楞泰、惠龄、恒瑞四路清军的围攻。起义军将士毫无畏惧，一面屯聚粮食，分立卡隘，严密防守，一面派兵分劫巴州、渠县运道。由于徐天德、冉文俦率兵攻打大竹、梁山二县，分散了清军的部分兵力。十月，清军架梯猛攻大鹏寨，又四处放

火焚烧，使整个山寨成为一片火海。罗其清立脚不住，率部分起义军出走。十一月，额勒登保亲自督军攻寨，用炮轰击，终于攻破大鹏寨。随后，罗其清和逃散的起义军战士均被清军和乡勇搜获。十二月底，冉文俦部在通江被德楞泰、惠龄部击败，冉文俦于突围时牺牲。

（二）清廷战略上的重新部署与进攻

嘉庆四年（1799 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嘉庆帝亲政，真正掌握了朝廷大权。

此时，起义军虽因罗其清、冉文俦部的覆没，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挫折，但起义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张汉朝部在陕豫交界至陕甘交界的南山地区，坚持抗清斗争；高均德、李全、樊人杰、徐天德等部，在川楚陕交界地区时而独立作战，时而联合行动，使清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清军统帅勒保陷入一筹莫展的窘境。乾隆帝自川楚陕三省农民大起义爆发即"寝膳靡宁"①，至咽气时犹拉着嘉庆帝之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憾"②。

在嘉庆帝亲政之前，一切"剿捕"事宜均由乾隆帝及其宠臣和珅主持。而各统兵将领"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重，虚报功级，坐冒空粮，其弊不一而足"③。清军将领平时惟酒肉笙歌自娱，一遇战事则"拥兵自卫，不敢近贼，或命将弁堵剿，将弁亦不向前，惟催督乡勇，乡勇亦不踊跃"④。当时川楚各地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⑤ 这是对清军腐败无能最辛辣的讽刺。

---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嘉庆四年正月癸亥。

② 《清仁宗实录》卷三八，嘉庆四年正月戊子。

③ 《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嘉庆四年正月戊辰。

④ 张鹏展：《练乡勇核军需疏》，《清经世文编》卷八九，《兵政》，第 2203 页。

⑤ 《清史稿》卷三五六，《谷际岐传》。

显然，川楚陕起义形势和战局的发展变化，迫使嘉庆帝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相应的措施，重新部署力量。其主要措施有：

第一，惩办权臣。嘉庆帝在乾隆帝大丧之际，果断地处决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使政治、军事大权操于己手。第二，统一事权。嘉庆帝认为，以往镇压起义之事所以收效不大，还在于"事权不一"，为此"特申明军纪"，授勒保为经略大臣，"赐以印信"①，统一指挥川、陕、楚、豫、甘五省军队，所有各路带兵大臣、各省督抚均听其节制。同时，对作战屡次失利的将领责以"纵贼"之罪，其中督抚、将军如湖北永保、惠龄，河南景安，陕西宜绵、秦承恩，四川英善等人或被处死，或革职充军。第三，增调兵力，除了集中五省兵力之外，又先后抽调京营满兵、蒙古兵、陕甘回兵、苗疆兵、广东兵，以及不计其数的军资、器械。第四，竭力分化瓦解起义军。嘉庆帝亲自撰写了《邪教说》一文，公开申明：凡习教而又奉公守法者不予查拿，聚众犯法者必严加惩办。尤为毒辣的是，嘉庆帝三令五申，要在各起义地区广置寨堡。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不仅危及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直接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慌。各地地主、乡绅纷纷组织乡勇、团练，帮助清军守城和镇压起义军。据载，嘉庆二年仅四川一省的乡勇即达 30 余万人。同年，襄阳一带地主阶级为卡断王聪儿、姚之富起义军的粮饷和武器供应，开始大修堡寨。嘉庆三年，兰州知府龚景瀚提出"坚壁清野"之法。他说："为今之计，必行坚壁清野之法，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壮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练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别选精锐之兵二三千名，以牵制贼势，不与争锋，但尾其后。贼攻则救，贼退则追，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八，嘉庆四年正月己卯。

使之进不得战，退无所食，不过旬余，非溃则死耳。不战而屈人，策之上者也。"①

勒保任经略大臣以后，采纳了龚景瀚的建议，并会同各省督抚晓谕各州县，设立碉堡，坚壁清野，招募乡勇，建立地主武装团练。随之，各地修筑堡寨，垒起三四米的高墙，墙前挖有深沟，把当地民众强行集中到堡寨里，并行保甲之法。乡勇平时清查起义军的"细作"，战时则登上堡寨高墙抵抗起义军的进攻。此法一经实行，几乎割断了起义军同广大人民的联系，使起义军的兵源、粮饷和武器供给均发生严重困难。不过，清廷的修堡寨和坚壁清野政策，其效力毕竟是有限的，起义军也未被困难吓倒，仍以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嘉庆四年八月，嘉庆帝以勒保"安坐达州，虚糜厚饷，又坚执不必添兵之说，致贼蔓延"②，严旨诘责。随后又以围剿徐天德不力，将勒保革职拿问，改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

当时，各地起义军时分时合，运用游击战术四处打击清军。在激烈的战斗中，高均德牺牲，冉天元毅然挑起指挥重任。冉天元英勇善战，他屯兵苍溪，抗击来犯之敌。十一月，额勒登保指挥清军进攻苍溪。他以杨遇春、穆克登布分左右翼进行包抄。左翼穆克登布恃勇先进，绕出起义军前。起义军抓住机会，以大部队冒死冲突穆克登布后帐，使其腹背受敌。双方短兵相搏，清军副将以下 24 名军官、兵勇 200 余人被歼。接着，起义军以全力猛攻额勒登保大营，血战竟夜，安全突围。苍溪之战是起义军处于低潮时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王廷诏等人鉴于难以攻破敌人堡寨，遂率 2 万名起义军将士由陕西城固、南郑（今汉中市）转移，于略阳抢渡嘉陵江，进入甘肃，与那里的起义军会师。额勒登保急忙移师追

---

① 《清史列传》卷七四，《龚景瀚传》，第 6116 页。

② 《清史列传》卷二九，《勒保传》，第 2206 页。

剿，与陕西巡抚台布配合，将甘肃起义军逼回陕西境内。经额勒登保、杨遇春、王文雄等部清军合力围剿，这支起义军后来兵败川北南江，王廷诏被俘。

苍溪之战后，冉天元重整旗鼓，于嘉庆五年正月率领万余名起义军将士由定远（今武胜）渡过嘉陵江，向川西挺进。此举吓坏了清统治者，成都、重庆同时戒严。嘉庆帝以四川总督魁伦防范不力，将其革职留任。魁伦本一介书生，不谙军事，他派悍将朱射斗率3000清兵进击，自率主力殿后。当朱射斗在蓬溪被义军包围时，魁伦拥兵不救，致朱射斗部全军覆灭。

二月，冉天元率部进至梓潼、江油（今江油北），拟北上与甘肃起义军会师。不料，德楞泰此时也率清军赶到江油，于是双方在江油西之马蹄冈大战。冉天元先派一支弱兵前去挑战，而将主力埋伏起来。双方一接仗，挑战的义军且战且走，很快将清军引诱至伏击圈内，伏兵尽起，重创其左、右、前营。德楞泰率中军驰救，内外冲击，鏖战至暮，清军乘夜突围退走，方免覆灭命运。三月，在嘉庆帝的再三督促下，德楞泰率军围攻马蹄冈。冉天元再次设伏迎战：以大队人马屯聚冈内，而以万名起义军埋伏在数十里外的火石垭后。当时，清军四路扑来，德楞泰亲率大队人马直趋马蹄冈，进入起义军伏击圈内方发觉中伏，只得仓促应战。双方鏖战3昼夜，清军又饿又困，数路皆败。德楞泰见大势已去，率数十名亲兵占据山巅，作垂死挣扎。冉天元见状，决定活捉德楞泰。正当冉天元督众登山时，因坐骑中箭而被俘。与此同时，杨遇春率援军和乡勇赶到，战败起义军。冉天元被俘后在成都牺牲，其余部万余人，由张子聪等率领，趁魁伦防范不严，向成都方向进军。嘉庆帝得讯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迫令魁伦自尽，而以勒保署四川总督。

马蹄冈大战后，起义军的力量越发削弱了。在清廷的严厉镇压和分化瓦解下，至嘉庆七年二月，徐天德、冷天禄、李全、张汉朝、樊人杰等人均在战斗中相继牺牲，仅剩下苟朝九、王世贵、苟文明等小股义军，在老林中坚持战斗。

（三）起义的最后失败

嘉庆七年（1802年）初，苟文明重整起义军余部，转战陕西、甘肃，与清军周旋。七月，苟文明从老林中兵分三路，向清军发起攻击。他们在林径错杂之处，或遍践足迹，或乱掷衣物，以麻痹和迷惑清军。但清军以投降的义军战士为向导，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先后俘斩王世贵、苟文明。到当年十月，四川起义军基本上被消灭。十二月，额勒登保以"大功戡定"奏闻皇帝，获得嘉奖。

就在清廷朝野弹冠相庆之际，南山老林中起义军声势又逐渐壮大起来。原来，清廷在"大功戡定"后，为节省军费开支，大量裁撤赖以镇压起义的乡勇，规定每名乡勇仅给银2.5两，收其刀矛，遣送回原籍，由于乡勇多半来自穷苦流民，一经裁撤，无家可归，谋生无路，立刻陷入生活无着的窘境，于是不少人被迫拿起武器，重返老林，和潜藏在那里的苟朝九等起义军残部联合起来，进行游击作战。他们人数虽然不多，活动范围有限，但因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之熟悉清军号令、作战方法，以及老林路径，因而能"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即使屡遭围困也能"乘雾溜崖突窜"，"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①。嘉庆帝只得再下谕旨，先后令班师回京的德楞泰、额勒登保率军前往镇压。

从嘉庆九年（1804年）春开始，清军和起义军展开多次激战。起义军虽处绝境，但却经常利用有利地形，拼死拒敌，战斗中"竟有带箭四五支，而犹力扑者，其情形殊为凶悍"②。然而，毕竟寡不敌众，经过多半年的战斗，起义军伤亡殆尽。九月，起义军的最后一个重要首领苟朝九被俘牺牲，至此，轰轰烈烈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终以失败告终。

---

① 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第449页。

②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二三，嘉庆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上谕德楞泰。

四、起义失败的原因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坚持了10年之久，最后在清廷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从起义军方面来说，第一，这次起义虽然提出了“官逼民反”等口号，但没有拟定出为广大农民群众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的纲领。红阳教在开始传教时，只是以空洞的“富贵”相许诺，起义前有的地区的教首提出了“事成之后，分给地亩”①的诺言，但并未认真执行。第二，这次起义是由民间宗教组织红阳教发动和领导的，教内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家长制成为起义军的组织原则，以致各支派自编名号，独立活动，不容其他派系干预。这就使起义军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不称王，不建号，政治目标很不明确，因此也就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出现各行其是的状态。表现在战略战术上，各路起义军互不协调，前后变化也很大。嘉庆元年，湖北首举义旗后，各路起义军便大多转入防御，利用有利地形和清军展开阵地战。至当年秋天，湖北各支起义军在清军全力围剿下，均已先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被迫率众进行战略转移，次年六月，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但此后各路起义军依然独立活动，互不统属。嘉庆三年三月王、姚牺牲后，余部转入了流动作战。四川起义军的力量强大起来后，一度在嘉陵江以西采取进攻态势，获得一些发展。后因清军全力镇压，也转入了流动作战。直至嘉庆五年春，冉天元等人采用伏击战法，先后在苍溪之战和马蹄冈之战中给了清军很大打击。但马蹄冈之战后，起义军的力量也严重削弱，并分成许多小股，进行“忽南忽北”、“忽分忽合”的流动作战。无论是阵地战，还是流动战，都未能大量歼灭清军的有生力量。况且这种没有可靠根据地的流动作战，本身就是一种“流寇主义”的逃跑战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王义供词》。

术，虽能避开清军的一时的打击，却不能根本改变失败的命运。

反观清廷方面，当时清朝政府还能牢牢地控制全国的局势，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调动全国的兵力、物力，对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和分而歼之。特别是它的大修堡寨和坚壁清野政策，割断了起义军和广大人民的联系，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陷于孤立，而最终归于失败。

第七节　林清、李文成领导的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农民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京畿和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林清和李文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虽然持续时间不长，规模也不大，但由于一开始即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统治中枢紫禁城，震惊了朝廷内外，故被称为“紫禁城之变”，又因嘉庆十八年为癸酉年，故又称“癸酉之变”。

一、起义的组织与爆发

这次起义是由天理教组织和发动的，主力军是京畿和直鲁豫三省的广大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嘉庆帝在回顾这次“作乱”原因时，“几暇静思其故”，不得不承认“总因穷困而起”①。这虽然回避了清廷在政治上对人民群众残酷压迫的一面，但也确实道出了问题的一部分症结。

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农民，清初以来就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各种徭役，因而这一带的阶级矛盾始终尖锐地存在着。早在雍正年间，雍正帝就密谕三省督抚：“（三省）接壤之区，人民杂遝，极易藏奸，文武兵役巡察难周，此处尤为紧要。尔等可

---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八一，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丁巳。

各差干员会勘。应如何委专员拨兵弹压，应归某省管辖处，尔等会同详议具奏。"① 乾嘉时期，直鲁豫三省占有数百上千乃至万亩土地的地主比比皆是，而终岁辛劳的广大农民，"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饥号寒，几于无生"②。三省官吏和地主阶级利用各种特权，对农民进行敲榨勒索，中饱私囊。起义前，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人利用天理教在各处发展教民时，"所言皆系地方文武贪酷不仁等弊"③，当然深得民心。

嘉庆初年，在清统治者日益腐朽、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下，京畿大兴县人林清决心利用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来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林清把直隶青县边二领导的白阳教、固安李五领导的白阳教、京畿地区屈四领导的青阳教、通州（今属北京）地区李国有领导的红阳教和大兴一带刘呈祥领导的劳华会（即坎卦教）统一起来，定名为白阳教。其后，又联合了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由河南滑县人李文成领导的震卦教、冯克善领导的离卦教、刘国明领导的兑卦教。嘉庆十七年(1812 年）正月，林清和李文成、冯克善等人在滑县道口镇开会，将由上述各教派组成的新组织定名为天理教，并分封"三皇"，分别以林、李、冯为天皇、人皇、地皇。"三皇"之外，分八卦统其众，每卦立一宫王。宫王之下，各设立八个卦伯，共设六十四卦伯。同时又决定明年九月十五日在京师和直鲁豫三省同时起义，然后李文成等自河南率军赴京师，和林清会兵一处，共同赶走清朝皇帝。

为了便于组织和发动群众，林清自称弥勒佛，又自命为"文圣人"，"就同孔夫子一般"④。同时，林清等人用白莲教经典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朱谕》。

② 道光《辉县志》卷十八，《艺文志》。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庆升奏折。

④ 《林清供词》，《故宫周刊》第二〇二期。

《三佛应劫统观通书》中“十八子明道”的话比附李文成，在教内宣传“李文成即明朝李自成也”①。李文成也自号“严霜十八子”②，称“李自成转世”③。在传教过程中，天理教首领还提出了土地问题：入教者“俱输以钱”，“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注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④。

嘉庆十八年秋，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入高潮时，起义风声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京畿大兴、宛平二县就流传着“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⑤，河南流传着“若要红花开，须待盐霜（李文成自号盐霜）来”等歌谣和政治性预言，引起了清朝地方官吏的注意。

当年八月底，李文成派手下得力干将牛亮臣在滑县大伾山组织天理教徒数百人，加紧制造兵器，自己则在谢家庄进行战前动员。由于人多势众，起义机密泄漏。滑县知县强克捷一面密报巡抚高杞请兵镇压，一面先发制人，于九月初二日突然逮捕了李文成和牛亮臣，并断李文成双足，准备解往省城报功。冯克善、宋元成和李文成的妻子张氏激于义愤，一致认为：“今事已急，（九月）十五之期断不及待。此间兵食既足，鼓行而前，径取滑城，据而守之。直隶之开州（今河南濮阳）、长垣（今属河南），山东之金乡、定（县）、曹（县），皆吾声援。官兵四路牵制，措手不及。然后成师以出，数百里可传檄而定也。”⑦ 遂决定于九月初六日提前起义。

---

① 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五，《书滑县平贼事》。

②⑥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李文成》，上海书店 1987 年版影印本。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秦理供词》。

④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五，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托津奏，清嘉庆刊本。

⑤ 《陈绍荣供词》，《故宫周刊》第二二六期。

⑦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三，《滑县之难》。

其时，山东的起义准备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当年七月，天理教首领徐安国的徒弟崔士俊在金乡西茂林椎牛、设酒宴享客达8昼夜之久。除了当地的天理教徒外，金乡的县役、营兵也前来赴宴，热闹异常。他一开始就把这次活动与反清起义结合起来，公开称林清为天理教内的总教师，并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定于七月二十八日开科取士，诠选官吏。这就过早地泄露了机密，以致金乡知县吴堦在从容准备后，将崔士俊等一网打尽。这一事态的发展，也促使山东的天理教徒于九月十日提前起义。

林清不知豫鲁两地提前起义之事，故京畿起义仍按原定计划进行。

二、京畿起义

夺取京城，赶走清朝皇帝，这是此次反清起义的政治目标。按照事先设想和计划，九月十五日京师和直鲁豫三省同时举义，林清率领京师起义者先抢占紫禁城，然后紧闭四门，等待李文成、冯克善援军的到来。

为了使这一计划切实可行，林清在起义前做了两项准备工作：第一，秘密联络了宫中太监刘得财、刘金等人，作为起义军进攻紫禁城的向导。第二，组织起义队伍。林清从大兴、宛平、通州及直隶固安、雄县、新城（今新城东南）等地信奉天理教的200多户人家中，挑选出100多人组成起义队伍，并分成若干小分队，每一小分队打一杆小白旗。他计划分东、西两路，分别由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紫禁城：东路由陈爽带头，刘呈祥押后，太监刘得财和刘金引路；西路由陈文魁带头，刘永泰押后，太监杨进忠和高广福引路；太监阎进喜等则在中间接应。起义战士每人分得白布两块，用来缠头、系腰，作为识别标志。

九月十四日，林清挑选出的精壮教众百余人由陈爽等率领，潜入京师。林清留在黄村，待滑县援兵到后，一同往援进袭紫禁

城的起义军。十五日一早，起义者身藏大刀，扮作行商小贩，分从东、西路来到紫禁城下。午时，进至东华门的起义战士由于受到官军拦阻，只冲进陈爽等5人。进门后，龚恕、刘金玉二人由刘得财带领直奔苍震门，准备先杀死总管太监常永贵；而陈爽等三人则冲进了熙和门。在景运门值班的署护军统领杨树增等急忙传集守卫官兵迎战。经搏斗，陈爽、刘金玉、龚恕被俘，另两名被击毙，东路进攻完全失败。

攻打西华门的起义军四五十人在陈文魁、刘永泰率领下于午时到达西华门，太监杨进忠已在门口迎候。起义军冲进门内，立刻将写有"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的小白旗插上城头，作为向城外起义战士和河南援兵发出的信号。

起义军攻进皇宫犹如晴天霹雳，使清统治者乱作一团。礼亲王昭梿急忙命人火速去调各营步军和火器营兵入宫，以解救宫内之危。

起义军进至隆宗门时，门已关闭，五六名起义者立即爬上墙头，准备从西大墙跳进院内开门。这时，皇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正站在养心殿石阶上焦急地等待援兵，他见起义者行将越墙而入，吓得手足无措，后在别人提醒下，忙开数枪。不久清军精锐之师火器营和健锐营开进紫禁城内，并牢守四门。起义军寡不敌众，进退无路，有的被俘，有的牺牲，有的慌忙跳出城墙之外。于是西路的战斗也失败了。

紫禁城之战发生时，嘉庆帝正驻跸热河（今承德）。十六日，他接到起义者攻进紫禁城的消息，惊恐万状，"垂泪览之，笔不能宣"①，决定马上启程回京。他令吏部尚书英和先行回京处理善后事宜。英和回京后，派人秘密逮捕了坐镇黄村的林清。嘉庆帝于十九日抵京后，即故作姿态地颁布《罪己诏》，自称"朕以凉德，仰承皇考付托，兢兢业业，十有八年，不敢暇豫"，表示"突遭此变，实不可解"。但他不得不承认这次起义"祸积有日"，

① 《故宫周刊》第二〇一期。

惊呼它“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①。

二十三日，嘉庆帝亲自在中南海丰泽园审讯太监刘得财和刘金，随即下令予以处决。接着提审林清。林清面不改色，毫无畏惧，嘉庆帝无计可施，下令凌迟处决。林清挺胸昂首，当面警告皇帝说：“此时应劫，将来另有起事之人。”② 显然，林清至死未向清朝统治者低头。

至此，京畿地区的农民起义基本结束。

三、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起义军的反清斗争

（一）直鲁豫地区燃起反清烈火

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的农民起义，是在李文成、冯克善等人领导下进行的。起义行动按地区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河南的滑、浚二县。这里是起义的中心，也是起义军主力所在。

九月初六日夜晚，滑县天理教徒在冯克善、宋元成等人领导下，里应外合，一举攻下县城，救出了李文成和牛亮臣。知县强克捷仓皇逃至封丘自缢，其家属和滑城官吏30余人全被起义军杀死。

起义军占据滑城后，首先在城上悬挂起“顺天王林”的大旗，由李文成“开帅府，设羽帐”，帐后树“大明天顺李真主”的旗幡③，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秦学曾为提调兵马总先锋，并设置各种文武官职。同时，整顿军纪，派人将写

---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

②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页。

③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有“不许掳掠，违者处死”等内容的禁约贴于各交通要道，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赖。在此基础上，又于滑城北门外挂起招军旗，吸收贫苦农民加入起义队伍；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和房屋，迫使他们“风栖露处，甑釜毁残”，又将滑县库贮征粮花户底册焚毁，使“民粮逆产无凭”①，以防官府和地主、豪绅反攻倒算。这些行动，既是对当时农村大搞土地兼并的一种愤怒回答，也是对整个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冲击，因而深得群众拥护。不久，李文成又派兵攻占了滑县附近的道口和桃源（今山东曹县西北），与滑城形成犄角之势。

与此同时，李文成派于克敬率起义军四面围困浚县。此前，浚县知县朱凤森已得知滑城起义的消息，立即将该县四个城门紧闭，又组织乡勇武装，“每乡勇十人，置长一人，火器随之；令绅士每一人率乡勇十人，日夜周巡城上，各街巷亦如之”②。朱凤森还令人搜集铁器、硫磺和硝，制造刀枪、弹药，大肆搜捕和屠杀潜伏在城内的起义军战士和家属。九月二十二日，起义军大举攻城，多次奋勇冲锋，一直未能攻克。二十六日黎明，于克敬又亲率起义军将士猛攻县城西南浮邱山上的高杞军营。清军凭借山势陡险的有利地形，在登山必由之道暗设炮位，以逸待劳，而起义军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实行人海战术，“前贼中枪倒地，后贼复蚁附而来”③，不惜任何代价硬拼硬打，造成了极大的伤亡。最后，于克敬也中弹牺牲，起义军只得终止了进攻，转而加强河南滑县和道口的防御。

这次起义的第二部分是直鲁豫三省交界的中间地区，即直隶南部的东明（今属山东）、长垣一带。这里的起义军因队伍分散，力量较弱，所以一般都在各县的村镇活动。但是，他们经常数十人、数百人组成一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如东明县起义军组

① 民国《定陶县志》卷十二。

② 赵如椿：《黎阳闻见录》。

③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八，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一日，高杞奏。

成之后，立即把前大寨七村的乡勇“尽行杀毙”①。唯有长垣县天理教徒曾计划在九月十五日攻打县城，由于事泄，起义者在匆忙杀死知县赵伦后，放弃了攻城的计划。

第三部分是山东西南的曹县、定陶、金乡等县。

九月初十日黎明，定陶、曹县的天理教徒分别在朱成贵、李克让等人领导下，冲进县衙，杀死知县。曹县参将刘凤喈得知县城失守，匆忙带200名清兵前往镇压，于半路“击贼败绩，凤喈仅以身免”②。

（二）清军的部署和进攻

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到京师，嘉庆帝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由北面包抄，令山东巡抚同兴在东面堵截，又令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两路，“勿使渡河奔窜，亦勿令窜入（太行）山谷”③。不久，再派大同镇总兵张绩“前往山外扼要处所驻扎”④，徐州镇总兵沈洪率军迅速由东南迎头北上，“并力兜围”⑤，两江总督百龄带兵驻扎徐州，防止起义军向江南逃跑。不难看出，这种兵力调动和部署主要是为了防堵。直至九月十五日林清起义军进攻紫禁城的事件发生后，嘉庆帝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转而全力镇压这次起义。

嘉庆帝鉴于川楚陕农民起义初起时镇压不力的教训，于九月十七日改以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总管一切军务，同时把能征善战的陕西提督杨遇春和清军2万余人调往河南。此后不久，嘉庆帝又派托津为监军，驻守直隶开州督战。这样，温承惠在北，同兴在东，高杞在南，杨遇春在西，逐渐形成了对起义军

---

①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三，嘉庆十八年二十一日，那彦成奏。

②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二，《长垣定曹之变》。

③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三，嘉庆十八年九月丁丑。

④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五，嘉庆十八年九月辛卯。

⑤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三，嘉庆十八年九月戊寅。

的严密包围。与此同时，清廷还命令地方官吏组织乡勇，坚壁清野，使“贼众被剿奔窜之时，因所至有备，不致肆行裹胁”①。

九月下旬，清军开始向直鲁两省的起义军大举进攻。十月上旬，先后攻下了山东起义军的主要据点定陶、扈家集、曹县。同时，各地官吏选乡勇，办团练，坚壁清野，配合清军将分散在山东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击破。在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一带，由于起义队伍过于分散，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结果从十月初至十一月初，在清军三次攻势之下，丢失了一个又一个据点。至此，山东、直隶地区的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只剩下河南滑县、道口、桃源三个据点。

（三）道口之战

道口（今河南滑县）在滑县西北 18 里，西面紧靠卫河，是滑县附近最大的起义据点，李文成特派冯克善、徐安国等在此防守。十月初九日，温承惠、高杞等人率领清军从卫河西直扑道口，遭到起义军的迎头痛击，狼狈逃回。刚从陕西进抵河南的那彦成得此消息，屯兵卫辉（今汲县）不敢前进，受到嘉庆帝严旨痛斥。嘉庆帝警告那彦成：“今日之旨，是汝生死关头，信与不信，凭汝自议，掷笔付汝，好自为之。”② 那彦成被迫率杨遇春等向道口一带移动，先攻占新镇、罗家寨，周潭村、丁栾集等据点，对道口形成步步紧逼之势。李文成鉴于敌势强大，命令徐安国伺机转移，前往太行山开辟新的局面（后由于清军严密堵截而未能实现），并令冯克善准备突围，前往山东联络天理教徒，以支援河南起义军。

十月二十一日，道口起义军分两路进攻清营，那彦成派杨遇春、格布舍分路迎战。清军在枪箭的掩护下，用马队冲锋，步队继进。起义军英勇还击，与敌酣战竟日。冯克善乘混乱之机，

---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八〇，嘉庆十八年十二月甲辰。

②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七，嘉庆十八年十月己酉。

"独骑白马，持大刀，弃滑奔山东去"①。

冯克善出走后第四天（即十月二十七日）清晨，那彦成、杨遇春指挥万余清军分7路进攻道口，同时派兵伏击滑城援军。徐安国率万余起义军民全力抗击，打退清军的多次冲锋。最后，清军在大炮火力的掩护下，突破了起义军的防线，攻占道口，并放火烧城。徐安国率左右杀开一条血路，直奔滑城。这一仗，起义军伤亡万余人。

冯克善奔往山东后，由于当地起义已遭镇压，准备转往山西蒲州（治今永济西）一带发动教徒，再图起义。不幸的是，当他十一月十九日走到直隶献县三角村时，为知县侦知逮捕，后被解京处死。

（四）司寨之战

道口陷落以后，镇守桃源的天理教首领刘国明感到，桃源乃弹丸之地，起义军兵力薄弱，如一味固守，必遭全军覆灭，便于十月三十日乘夜暗率众退守滑城，与李文成等紧急会商下一步的对策。

清军攻占道口后，随即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起义军的大本营滑城。面对清朝大军压境而起义军援军不至的紧急形势，李文成决定亲自前往山东，以聚集直鲁起义军余部往援河南起义军。在刘国明等人的陪护下，李文成乘坐大车秘密离开滑城，率部分起义军向开州、东明等地进发。尽管当时三省交界地区的起义已经失败，但由于李文成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声望，故这支队伍经过的地方仍有不少贫苦农民参加进来。不久，便由出发时的1000余人激增到4000多人。李文成等转移的头几天,清军既未摸清他们的真实动向,更不知道李文成就在其中。直至十一月初十日,那彦成才从一个俘虏口中得知确切消息,赶紧报告嘉庆帝。不久,嘉庆帝命清军加紧对这支起义军围追堵截,务要生擒李文成以泄忿。

十一月初，李文成等人在长垣县境内稍事休整，适逢"四川

① 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五，《书滑县平贼事》。

提督奉调带兵赴滑县围剿，经过东明……，因恐贼匪东窜，即在东明县属郝士连村扎营"①。李文成意识到前往山东之路断绝，为避免自投罗网，遂当机立断，改由豫北向直隶进军。途中再次受到清军和乡勇的堵截，被迫退到辉县西北60里群山环抱的侯兆川，占领了川北面的司寨，准备向山区发展，与尾追之敌周旋。但由于清军早已执行嘉庆帝"勉力防堵，勿令入山"② 的谕令，防范甚严，起义军进退无路，只得在司寨与清军决一死战。

司寨东面靠山，西南有河，四周围墙耸立，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山寨。李文成率领起义军刚一进寨，尾追不舍的清军总兵杨芳部就占领了寨北的一些村镇和侯兆川北面的咽喉白虎岗。十一月十九日清晨，杨芳派400名清兵到寨前挑战，而以大部队埋伏于岗前的山坳之中。清军佯装败退，将起义军引入伏击圈，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虽英勇顽强，但伤亡甚众，只得退守阵地。次日清晨，清军再次发起进攻。经半天激战，清军将寨墙轰塌了一段，乘势冲入寨内。起义军"据险掷石，枪炮齐发，官军死伤甚众"③。当杨芳亲自督军包围李文成所在的碉楼时，刘国明持刀跃出，连杀两名清兵后牺牲。此时，杨芳趾高气扬的高喊："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双足已被刑断的李文成无畏地高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④最后举火自焚，壮烈殉难。剩下的数十名起义者也群相拥抱，让烈火吞没了自己的身躯，充分显示出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李文成牺牲后，清军全力围攻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滑县县城。

(五) 滑城保卫战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章煦奏折。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嘉庆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仁宗朱批。

③④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三，《司寨之捷》。

早在李文成离开滑县之前，他就组织和领导当地军民进行了下列战备工作：第一，把道口屯粮运至滑县城内，足够一年之用；第二，清除清军奸细，绝敌内应；第三，训练士卒，部署兵力，将城西、北、南三门堵闭，只开东门出入，门内安放大炮。李文成率部分起义军从滑城转移后，守城重任就由大元帅宋元成、军师牛亮臣及李文成之妻张氏等肩负起来。

十一月初，清军将滑城团团围困，在城外建立炮台，掘挖地道，并将林清的首级悬挂于营帐外，企图瓦解起义军的军心。为加强防守力量，起义军加紧赶制了 4 门大炮、11 杆大鸟枪，还从地下刨出 600 斤硝磺制造弹药。起义军不断抛下断碑巨石，压塌清军地道，使敌千总以下多人毙命，又采用以地道制地道及水灌等方法，对付敌之地道战术。由于滑县系河南四镇之一，历来为军事要地，城墙坚厚，易守难攻，加之起义军防守顽强，清军围困月余，始终未能攻破。

十二月，那彦成在嘉庆帝限期攻占滑县的严令威逼下，命杨芳等加强攻势。初九日，清军在城西南角挖的地道越过城墙根，西门的地道也已进到城内。次日，清军发起猛烈进攻，但多次冲击受挫，狼狈退回。正当起义军集中全力抗拒扑城之敌时，一声巨响，西南和西面的城墙被轰塌了一大段。清军从缺口冲入城内，起义军拼命抵抗，牺牲了三四千人。接着，起义军在街巷和清军展开肉搏战，“自卯至酉”，“阅七时之久”①，最后起义军大部战死，少数被俘，滑城沦于敌手。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起义军中的女英雄、李文成的妻子张氏，表现得十分英勇。城破之时，牛亮臣、徐安国劝她“诡作被难妇女出城”，她毅然表示：“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②接着，挥刀参加巷战，击杀多名清兵，力竭后和女儿一起自尽。

---

①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彦成·高杞·杨遇春奏。

②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滑城陷落，标志着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农民大起义的最后失败。

四、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一）起义失败的原因

林清、李文成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从嘉庆十八年九月至十二月，仅坚持了3个多月，其所以迅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

就起义军方面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林清、李文成等人以为，利用民间宗教作为发动起义的组织形式及冒险突袭紫禁城，就能推翻清统治者，实际上模糊了农民群众的斗争视线。他们在起义前声称："（嘉庆十八年）八九月间，白阳大劫，……惟入教之人，……即可免祸，其余遭劫，一概死亡。"① 结果造成人心惶惶，一些人虽入了天理教，但并没有真正明确起义的目的。"询以入党有何好处，答言不久有事，可以保妻子免杀戮。"② 林清、李文成在规划中还天真地认为，只要夺取了北京城，就可以把皇帝赶回关东，进而夺得天下③。这种违反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幻想，必然导致起义的失败。另外，林清和李文成虽然提出了涉及土地问题的口号，但没有具体的措施，只能吸引一些贫苦农民入教，而不能真正激发起他们的反清热情，积极参加起义斗争。

第二，作战指导失误。林清、李文成等人在军事上采取冒险攻坚、困守孤城和与清军拼消耗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首先，林清以百余人进攻紫禁城是一个明显的冒险主义错误。据史载，紫禁城内每天值班的兵士有680名之多④，京营额

---

① 吴增：《金乡纪事》卷一。

② 吴增：《金乡纪事》卷二。

③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七。

④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六，嘉庆十八年十月甲辰。

兵中有数万八旗兵、绿营兵和装备精良的健锐营、火器营，可随时调往任何出事地点。而林清头脑过于简单，既对京城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缺乏清醒的估计，又根本没有建立起足够强大的起义队伍，就急于发难，无异于以卵击石。他的起义准备工作做得十分草率，直到预定起义日期的前几天，才勉强拼凑了一支未经任何训练的小分队，其中有些人手中还没有武器。在敌已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仅凭匹夫之勇，冒险突袭清朝统治中枢紫禁城，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

再次，李文成等人困守滑县孤城，也是作战指导方面的严重失误。李文成在起义军占据滑城后，没有到各地去发动群众，而是单纯依恃地利，困守孤城。起义将领们纷纷将自己的家口搬进滑城，更加恋城不舍，严重地拖住了起义军战略转移的后腿。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正符合清统治者的愿望。礼亲王昭梿就说："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明亮与其看法相同，认为："贼自趋灭亡，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①。果然，至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中旬，困守滑城的起义军在清军的四面包围下，终于被全部歼灭。

最后，起义军攻打浚县时采取拼消耗的战法，也是十分不妥的。过去曾有人片面强调浚县战略地位的重要，为起义军未能攻下浚县而惋惜。实际上，按当时的形势来说，嘉庆帝一听到滑县起义消息，即调集各路清军前来围剿，已使起义军处于敌强己弱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如果不倾全力围攻浚县，而是挥戈东进，把分散在直鲁豫三省的起义队伍统一起来，做到进而联成一片，退有牢固的后方可守，就完全能够壮大自己的力量，粉碎敌人围剿。但是，起义军没有这样做，而是强攻浚县，结果伤亡很大，被迫撤回滑城，丧失了向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加速了自己的失败。

---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滑县之捷》，第173页。

（二）起义的历史意义

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要而言之，这次起义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促使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走向衰落。这次起义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继续，虽然为时短暂，但由于它发生在"天子脚下"，斗争矛头直指清朝统治者，这就极大地震动了清廷，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嘉庆帝不止一次地哀叹："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①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②。这是清王朝统治中国170年来，最高当局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哀叹。后人也指出："自是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故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关键。"③ 这都表明，此次起义更进一步地把清王朝推向下坡路，清廷的统治已无可挽救，进入了彻底衰败的阶段。

第二，在广大农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力地鼓舞他们继续进行反清武装斗争。这次起义失败后，民间宗教组织的一些教派，在天理教的影响下继续在各地活动，并在时机成熟时再次发动反清起义。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离卦教徒曹顺在山西赵城以"先天教"的名义发动了反清的武装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同样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第169页。

② 《清仁宗御制诗集》。

③ 铁庵：《林清之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期（1935年）。

第二十一章　平定张格尔叛乱

第一节　张格尔叛乱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清政府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当地“回民”(维吾尔族）得以休养生息。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政府派驻新疆地区的各级官吏贪婪腐败的本性恶性发展。嘉庆时，他们与当地维吾尔族官吏（伯克）狼狈为奸，“敛派回户，日增月甚”，除铜钱外，“又土产、毡裘、金玉、缎布赋外之赋，需索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①，致使回民和其他少数民族怨声载道。此后，回民反抗事件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早已将势力伸入西亚地区的英国殖民者，别有用心地在浩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等国培养了一批外逃的和卓后裔，利用他们与清政府相对抗。张格尔即是其中之一。

张格尔是乾隆年间维吾尔族统治者大和布拉呢敦之孙。布拉呢敦被诛后，其子萨木克逃至浩罕，生有三子，次子即张格尔。张格尔野心勃勃，时刻梦想在南疆恢复和卓家族的统治，为此“以诵经祈福传食部落”②，笼络和愚弄维吾尔族人民。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张格尔利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对参赞大臣斌静的荒淫贪暴和残酷压迫极为不满之机，率数百名叛军潜入南疆，勾结维吾尔族上层人士比苏兰奇，向清军发起进攻，失败后慌忙逃往浩罕。道光四年（1824年）秋、五年夏，张格尔屡以

①② 魏源：《圣武记》卷四，《道光重定回疆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2页。

小股袭扰近边，而清军屡捕不获。五年九月，清领队大臣色彦图率兵200人出塞巡逻，未遇张格尔叛兵，回师途中，纵兵滥杀无辜的布鲁特部妇孺100余人，激起义愤。该部头目率部追杀，将色彦图等围歼在一座山谷里。道光帝得知后，感到边事日紧，一面迅速调兵遣将，加强清军的防御力量，一面告诫伊犁将军庆祥："现在张格尔窜逃未获，难保不乘间窥伺"①。他令庆祥加强警惕，密切注视张格尔的行踪，随时做好平叛准备。

道光六年六月，张格尔纠集安集延(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布鲁特(柯尔克孜)500余人，由开齐山路闯入中国，进至距喀什噶尔(今喀什)数十里的阿尔图什(今阿图什)，以祭祀祖墓为名，煽动当地民众反清。新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闻知消息，立即派兵进讨，消灭叛军400余人、生擒40余人。但张格尔突围逃走，喀什噶尔一带发生叛乱，以致"道路不通，万分紧急"②。

张格尔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同清军抗衡，便遣使向浩罕求援，以出卖祖国权益为条件，"约破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③。浩罕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汗利欲熏心，亲率万人进攻喀什噶尔，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后因与张格尔发生矛盾，恐腹背受敌，率军退走，但有二三千浩罕兵被张格尔诱留，并被置为亲兵。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张格尔叛军先后攻占了和阗(今和田)和英吉沙尔(今英吉沙)二城，接着全力进攻喀什噶尔城。守军在庆祥的指挥下，英勇作战，顽强抵抗了两个多月。终因援绝力竭，喀什噶尔于八月二十日被叛军攻破，庆祥自缢身亡。不久，叶尔羌(今莎车)也落入敌手。张格尔得意忘形，竟在喀什噶尔"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宣布为当地的统治者"④，随即在南疆实行极其野蛮的统治，其暴虐甚

① 《清宣宗实录》卷九〇，道光五年十月壬申，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〇，道光六年七月癸巳。

③ 《清史稿》卷五二九，《属国四·浩罕》，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④ 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3页。

于从前的和卓千百倍。不久，广大维吾尔族人民认清了张格尔的嘴脸，转而支持清军，有的还积极参加了以后的平叛战争。

第二节　平叛部署与措施

张格尔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意识到如不迅速平定叛乱，势必危及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因而立即进行平叛部署，并在随后开始的平叛战争中，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其中主要有：

第一，在军事上，迅速调兵遣将，以期厚集兵力，一鼓平定叛乱。道光帝最初任命能征善战的署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令其统领万余大军，前赴新疆筹办剿捕事宜。不久，又以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杨遇春和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并调派吉林、黑龙江、四川三省清兵，总兵力达3.7万余人①。道光帝认为，阿克苏为“回疆适中要路”，再三叮嘱长龄、杨遇春等人，清军先头部队在此地暂时屯驻，养精蓄锐，待后续部队到达，再会合前进，“务期厚集兵力，一鼓扫除，以彰天讨”。他还再三告诫将士，“勇往之中，寓慎重之意”，“不可冒昧轻进，致堕贼人奸计”②。大军出发后，道光帝又提醒长龄、杨遇春等人，注意严防后路，廓清台站，以免腹背受敌。为了保证平叛战争的顺利进行，清廷还制定了奖惩和严守军纪的条例，规定“一切军情，无论满汉官兵，总当视为一体，秉公持正，微功不掩，小过亦惩，俾令众志成城，同心敌忾”③，以充分调动清军将士平叛的积极性。

第二，政治上惩办贪横不法官员，并向回城居民宣示恩威，实行严格的区别对待政策。道光帝在出兵平叛的同时，寻思回部“久已习为恭顺，何致遽思变乱”？最后得出“总由近十余年来，历任参赞、办事大臣等贪淫暴虐”的结论，并令长龄对此“细加

---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五，道光六年九月戊子。

②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一，道光六年七月辛丑、戊申。

③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二，道光六年八月丁巳。

察访”①。不久，他根据长龄的奏报，将民愤极大的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等人定为斩监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另外，道光帝还多次谕令长龄、杨遇春等人，行军途中广张告示，宣示朝廷恩威，并对叛乱者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对“甘心助逆”而又“执迷不悟，抗拒大兵”者决不宽贷，而“被胁附合之众，果能解甲迎降，投诚乞命，皆可量予宽贷，乃令各复旧业”②，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张格尔为首的叛乱者。

第三，后勤供应上，竭力保证粮饷和其他军用物资的源源接济。道光帝在调兵平叛的同时，命令户部筹集军火粮饷及一切经费，使之“源源接济，兵精粮足”③。为了使这一思想落在实处，先后采取了如下得力措施：先命陕西巡抚鄂山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需粮饷驮载等项事宜。接着，又把熟谙陕甘事务的前任陕西巡抚卢坤派驻甘肃肃州（今酒泉），督办一切军需粮饷，并命鄂山驻扎兰州，调度策应，遇事与卢坤“和衷商榷，督饬委员及地方官迅速转运，源源接济，毋得短绌迟误”④。随后，又派办理粮饷颇有经验的大臣恒敬驻哈密，以确保关内外粮饷的转输顺畅。当大军集结于阿克苏时，道光帝鉴于乌鲁木齐屯粮数额原本不少，将此地之粮运往阿克苏，较之由内地转输，路途几近过半，毅然决定以乌鲁木齐为后路粮台，令大臣英惠总办其事。这就更好地解除了参战部队的后顾之忧，保证了平叛战争的需要。

第三节　战争经过

一、柯尔坪之战

道光六年八月，道光帝得知张格尔叛军攻占和阗、英吉沙

---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二，道光六年八月丁巳。

②③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一，道光六年七月甲辰。

④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一，道光六年七月丁未。

尔，并围攻喀什噶尔的消息之后，立即发布谕令，严肃指出："刻下紧要机宜，总以严守东四城（阿克苏、乌什、库车、辟展）为要，阿克苏尤为适中扼要地方，更应加意固守。"① 实际上，此时张格尔叛军正向清军的主要集结地阿克苏挺进，并到达距阿克苏仅 80 里的浑巴什河，后又进至距阿克苏仅 40 里之地。在这形势危急之际，清军在杨遇春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对叛军两面夹击，击毙和俘虏叛军 1000 余人，"大河以北，已就肃清"②。张格尔又在浑巴什河以南裹胁回众，妄图再攻阿克苏。此时，清军已在阿克苏境内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并在河南岸搜剿叛军 300 余人，又一次使张格尔夺取阿克苏的阴谋化为泡影。

正当清军在阿克苏一带接连获胜的时候，道光帝于十月得知喀什噶尔城失守。他立即颁发谕令，提出"以密速进取喀什噶尔为急"，一面向叛军"扬言官兵驻守阿克苏、乌什，且不进剿，以懈贼心"，一面分奇兵断敌归路，以主力由英吉沙尔等处前进，"两路会合夹攻"③。当时各路清军已会师阿克苏，长龄、杨遇春等人遵照道光帝的旨意，决定立即向战略要地柯尔坪（今柯坪）进军。柯尔坪地处阿克苏西南约 300 里，是清军进剿叛军、收复喀什噶尔的必经之路。正因为如此，张格尔派 3000 名叛军在柯尔坪恃险据守，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阻挡清军的前进。长龄、杨遇春派陕西提督杨芳率部前去剿灭。杨芳挥军分两路突袭该地，叛军拼死抗拒。副将胡超身先士卒，挥刀接连砍杀数名叛军，清军将士一拥而上，剿杀叛军过半。接着，清军又两路追杀，将叛军全部消灭。

柯尔坪之战的胜利，使清军在整个平叛战争中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具有巨大意义：第一，沉重打击了叛军的嚣张气焰，宣布了张格尔夺取南疆东四城、进而占领全疆迷梦的破产。第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三，道光六年八月壬戌。

②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六，道光六年九月甲午。

③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七，道光六年十月庚申。

二，有利于促使被张格尔裹胁的回众反正，从而削弱叛乱势力。第三，打通了西进的道路，鼓舞了清军的士气，增强了平叛的信心。

柯尔坪之战后新疆已进入冬季，大雪封山，道路难行，清军暂停进攻，抓紧时机为来年的平叛战争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第一，厚集兵力。在阿克苏集结清军5万余人，为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清军兵力的2倍多。第二，确定用兵方略。道光帝先是提出三路进兵、一正二奇的方略，长龄则认为应分奇正两路进发。道光帝表示不为遥制，但应奇正并用，截其归路，“断不可令正兵先入而奇兵未到，转驱该逆使遁也”①。第三，从各地迅速调运粮饷和其他军用物资。在道光帝的多次谕令下，鄂山、卢坤二人同心协力经理粮饷的转输工作，使乌鲁木齐存粮充足，仅面粉一项，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就采买438万多斤②，雇买2.65万余只膘壮骆驼和900余辆双套铁脚车③。第三，进一步分化瓦解张格尔叛乱势力。道光帝指示，对叛军要“设法用间”，尽量将与叛军离心离德的回众“收为我用”④。

二、喀什噶尔之战

道光七年二月六日，集结于阿克苏的清军主力开始向喀什噶尔大举进军。张格尔闻讯，急忙在洋阿尔巴特（今伽师东）纠集叛军2万（号称5万），临时筑起一道防线。二十二日，清军进至大河拐。当晚，叛军乘清军扎营未稳之机，以3000人偷营劫寨。清军早已有所戒备，枪炮立时齐发，击退叛军。次日晨，长龄亲自督率官兵，星驰进发，抵达洋阿尔巴特。叛军2万余人据沙冈防守，阵地长五六里。长龄、杨遇春率主力由正面，杨芳由

---

①④《清宣宗实录》卷一一三，道光七年正月乙酉。

②《清宣宗实录》卷一一四，道光七年二月壬申。

③《清宣宗实录》卷一一〇，道光六年十一月壬寅。

右翼，武隆阿由左翼，分路扑杀，叛军虽拼死反击，终于不支，纷纷溃逃。清军追击30里，大获全胜；毙敌万余人，俘敌3200余人。二十五日，清军向张格尔重点设防的沙布都尔庄（今伽师西）发起猛烈攻击。张格尔利用沙布都尔庄的有利地形，"决水成沮洳，贼数万临渠横列"①，妄图阻挡清军的前进。战斗开始时，清军步兵冒险从正面越过水障强攻，叛军恃险施放枪炮，并用马队进行反冲击。清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和叛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正当战斗激烈进行时，长龄派马队从左右两翼包抄，叛军阵营顿时大乱，大败而逃。长龄又亲自督军分路追杀，歼敌万余人。二十八日，清军又在阿瓦巴特大败叛军，歼敌二万余人。乘胜追至洋达玛河，距喀什噶尔城80里。二十九日，清军进至浑河北岸，距城仅10余里。张格尔不甘束手待毙，令叛军倾巢而出，10余万人背城阻水而阵，绵亘20余里，以作最后一搏。清军选死士乘夜袭扰敌营，使其疲惫。当夜大风，飞沙障目。长龄以敌众我寡，敌又据有利地形，恐其趁风霾之机反击，欲退营10余里，待风停再攻。杨遇春却劝阻说："天赞我也，雺晦中贼不辨我多少，又不虞我即渡，时不可失；且客兵利速战，难持久。"② 长龄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以索伦马队千余骑绕趋下游佯渡，牵制叛军主力，由杨遇春亲率主力乘昏暗在上游抢渡。果然叛军因遭突袭，阵脚顿时大乱，纷纷溃逃。三月初一日拂晓，清军全部顺利渡河，并乘势进抵喀什噶尔城下，随即发动猛烈进攻。城内叛军既缺乏杀伤力大的火炮，又没有统一指挥，数万人龟缩一处，乱作一团。清军迅速攻占了喀什噶尔城，生俘叛军4000余人。狡猾的张格尔在城破之前已先逃遁，欲归附浩罕，被拒绝入境，只得流窜于柯尔克孜族的游牧处所，伺机卷土重来。

清军收复喀什噶尔之后，即一分为三：长龄留驻喀什噶尔，

---

① 《清史稿》卷三六七，《长龄传》。

② 魏源：《圣武记》卷四，《道光重定回疆记》，第187页。

杨遇春率军向英吉沙尔、叶尔羌进剿，杨芳率兵进攻和阗。杨遇春兵行迅捷，以雷霆万钧之势，于三月初五日攻克英吉沙尔，10天后又兵不血刃地收复了叶尔羌城。不久，杨芳所率清军于毗拉满（今和田西）击败叛军5000人，乘势克和阗。至此，南疆西四城全部收复。

三、张格尔的最后覆灭

早在张格尔叛乱发生时，道光帝就屡下谕旨，务必生擒张格尔，治以重罪。清军收复喀什噶尔城时，张格尔已先期逃逸；清军收复英吉沙尔后，仍无张格尔的确切行踪。为此，道光帝下谕严厉斥责长龄等人“未能仰体朕宵旰忧勤之意，致有疏纵，办理不善”。又质问长龄等人：张格尔“如竟不获，该将军等自问可称蒇功否?”①

张格尔不甘失败，自喀什噶尔逃逸之后，时刻梦想卷土重来。道光七年末，他获悉大部分清兵已在杨遇春的率领下撤回内地，便重新拼凑了一支500人的叛乱队伍，欲乘清军除夕不备之际偷袭喀什噶尔。十二月二十七日，当他窜至阿尔图什时，受到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的持械拦阻，被迫折回卡伦之外。长龄得知消息，立即令杨芳带兵连夜前去搜剿。杨芳分兵三路追击，终于在喀尔铁盖山（今喀拉铁克山）追上叛军。经激烈战斗，叛军大部被歼，仅剩30余骑簇拥着张格尔往山上逃跑。这时，副将胡超等人飞骑直前追捕。山高路滑，张格尔等被迫弃马徒步上山，胡超等亦弃马穷追不舍，消灭叛军20余人。走投无路的张格尔见难逃灭顶之灾，即欲自刎。胡超等立即飞身上前，生擒张格尔和其余8名叛军。至此，张格尔叛乱被彻底粉碎，清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道光八年五月，张格尔被解送京师，道光帝亲临午门受俘，

---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一一六，道光七年四月辛酉。

并颁发谕旨，历数张格尔煽动、组织武装叛乱和背叛祖国的种种罪行。不久，道光帝又在圆明园廓然大公殿廷讯张格尔，随后予以处决。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张格尔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第四节　平叛取得胜利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一、平叛胜利的主要原因

平定张格尔叛乱之所以迅速取得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张格尔来说，他进行叛乱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之举，违背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维吾尔人民的意愿，因而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张格尔把自己绑在外国殖民者的战车上，同5名英国特务形影不离，这就更加丧失人心。他对南疆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残害生灵，淫虐妇女，搜索财物，其暴虐甚于从前和卓千倍万倍”①。这就必然激起民愤，使自己迅速成为孤家寡人。因此，当清军云集阿克苏之际，和阗民众自发将张格尔伪封的4名官吏“缚献军营，并将附贼一百余人全行击毙”②，一度收复和阗。只因大雪封路，清军无法驰援，和阗才得而复失。

就清廷来说，平定张格尔叛乱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正义之举，因而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拥护。除了得道多助之外，道光帝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也是这次平叛战争得以顺利进行和最终取胜的重要保证。仅就军事方面而言，值得指出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坚持“厚集兵力，一鼓扫除”的方针。新疆幅员辽阔，地

① 冯家昇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下册，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341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一一三，道光七年正月丁酉。

广人稀，且距内地道路遥远，从内地调遣的兵力毕竟十分有限。因此，在张格尔叛乱之始，“各回响应，旬日万计”① 的不利形势下，如果用有限的兵力四处出击，全面开花，势必陷入重围。由于长龄、杨遇春等坚决执行了道光帝的上述方针，将各路大军云集阿克苏，然后一战一战地打，使有限的兵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正确选择战略集结地域。张格尔进行叛乱的战略设想是：首先抢占南疆西四城，然后兵锋指向东四城，进而使全疆脱离清朝的统治。道光帝根据新疆舆地情况，对此已有所察觉。因此，当张格尔叛军进攻西四城之时，道光帝及时下达谕旨，指出阿克苏为“回疆适中要路”，各路大军必须云集并扼守此地，以保卫东四城和进军西四城。事实的确如此，阿克苏东连库车，西邻乌什，南接叶尔羌，北界伊犁，为南路之要地，北路之屏障，若有闪失，就会影响全疆局势。正由于道光帝抓住了关键之处，在阿克苏集结重兵，不仅使东四城安然无恙，避免局势恶化，而且有利于集中优势兵力，以高屋建瓴之势，将盘踞于西四城的叛军各个击破。

第三，前敌将领指挥得当。前敌将领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是确保作战胜利的前提条件。实践表明，长龄作为此次征战的主帅，其应变能力和指挥能力都是比较好的。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择善而从，并当机立断，更是难能可贵。清军进攻喀什噶尔时利用恶劣天候出敌不意地渡河突袭成功，就是他及时采纳杨遇春正确意见的结果。杨遇春戎马一生，具有较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和杨芳等人在此次平叛战争中都表现出了较好的前敌指挥才能，为平叛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平叛胜利的历史意义

张格尔叛乱，同外国侵略势力密切相关。早在19世纪初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就不断派遣特务冒充商人潜入新疆地区，收集政

① 魏源：《圣武记》卷四，《道光重定回疆记》，第183页。

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各种情报，进行罪恶的间谍活动，企图蚕食新疆，进而向中国内地扩张其侵略势力。外国殖民者为了在新疆寻找可靠的代理人，自然就把目光瞄准了始终梦想在新疆恢复和卓家族统治的代表人物张格尔。“在这次叛乱中，张格尔军队就是在英国援助下组织和装备的，军队的教官是由英国人担任的，而且在张格尔的身边，经常有五名英国特务和他形影不离，支配着张格尔的一切行动。”张格尔事件“是在外国侵略势力支持下进行的民族分裂的叛乱”①。因此，张格尔叛乱的被平定，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对于反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维护国家独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

①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85 页。

后　　记

《中国军事通史·清代前期军事史》的编写，前后经历了十个春秋，由于我们的工作更迭，编写工作可谓一波三折。受领这一任务之初，由孔德骐同志牵头，他为此而做了较多的组织工作和学术准备工作，并与邱心田同志一起拟定出全书的纲目，确定了分工。又经领导同意，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尚英同志和我院战略部三室任力同志撰写部分章节。编写中，考虑到有的内容需要扩充和增写，作者对原定纲目做了某些修正。正当甫稿之际，孔德骐同志另有任务，由邱心田同志负责统稿工作。

全书的撰写情况是：绪论，孔德骐、邱心田；第一章至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第一、三节，孔德骐；第十章第二节，第十一章至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三、四节，邱心田；第十九章第一节，邱心田、李尚英；第十九章第五、六、七节，第二十章，李尚英；第八章，任力；作战示意图，第1至9图由孔德骐设计，第10至18图由邱心田设计。

在《清代前期军事史》的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特别要提到的是，编委会副主任梁巨祥同志认真审改了全部书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大正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李鸿彬研究员在百忙中为书稿进行了评审，战略部三室钟少异同志帮助收集了大部分照片，军事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潘宏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8年6月